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杜勃罗留波夫

文学论文选

辛未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Н. А. ДОВРОЛЮВОВ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本书根据«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1 年版本译出

文学论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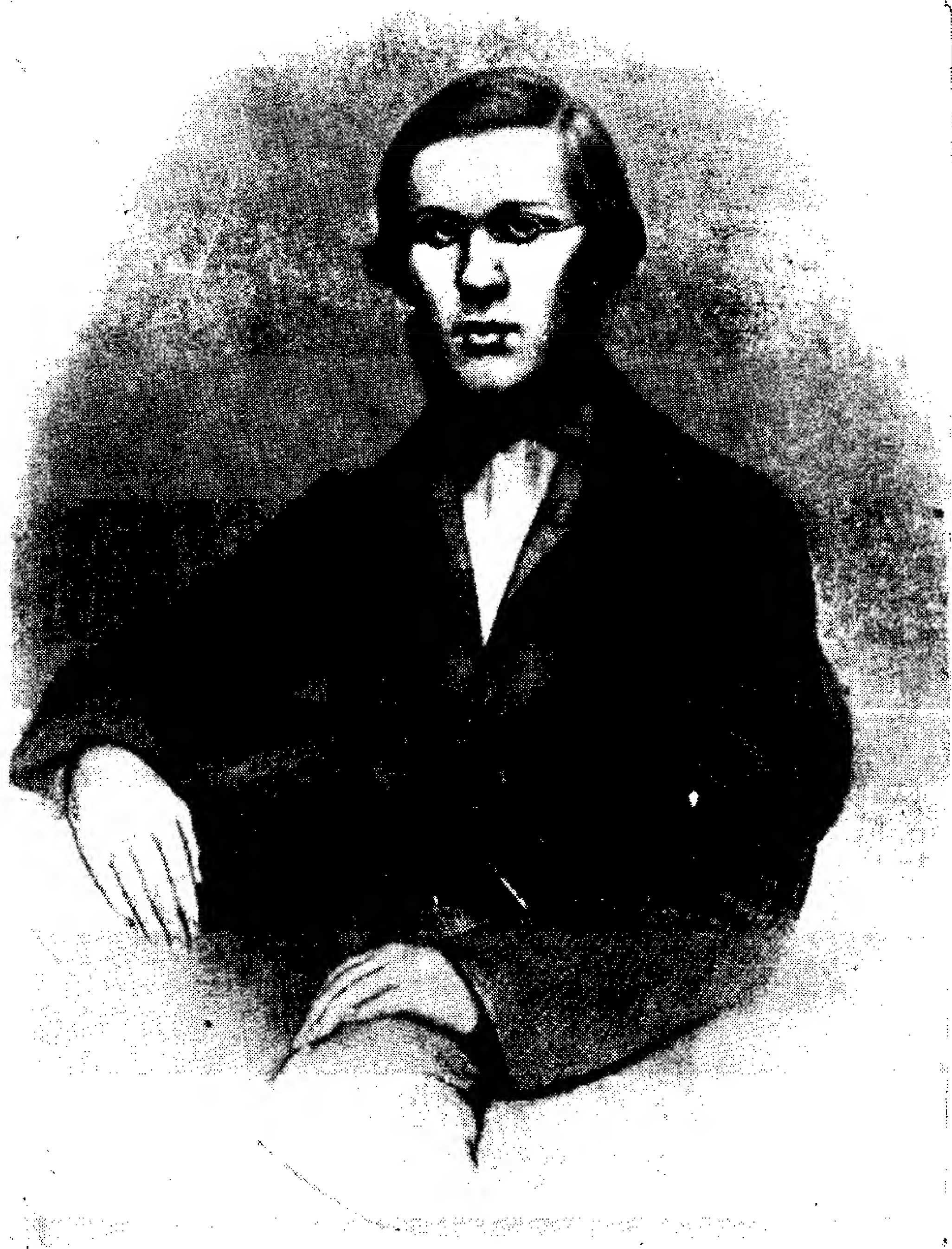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75 插页 3 字数 364,500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000 册 (内精装 1,700 册)

平装本定价 2.10 元 精装本定价 2.90 元

书号: 10188·534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选收十月革命以前各时代各学派具有代表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外国文艺理论著作或批评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杜勃罗留波夫

目 次

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	1
黑暗的王国	60
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	255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319
逆来顺受的人	417
译后记	487

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①

伊·亚·冈察罗夫作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
《祖国纪事》杂志^②一八五九年，第一至第四期。

能够用俄罗斯灵魂的固有的语言，来告诉我们这个雄伟有力的字句“前进”的人，在哪里呢？一世纪接着一世纪的过去了，好几十万逗留不前、村野粗鄙、昏愚无知的人，都在永远唤不醒地昏睡，能够迸发出这个雄伟有力的字句的人，还很少在俄罗斯生长……

果戈理^③

我们的公众等待冈察罗夫君的长篇小说，已经有十年了^④。在小说还没有出版的很久以前，大家就把它作为一部出类拔萃的作品来谈论了。大家都怀着最大的期望来开始读它。然而，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还是在一八四九年写成的，和现在的流行趣味颇为不同，许多人都觉得它很沉闷。就在这同一时候，出现了《贵族之家》^⑤，大家都被小说作者的诗情的具有高度魅力的

才华所吸引去了。于是《奥勃洛莫夫》就被许多人冷落在一旁；有许多人，甚至因为在冈察罗夫的长篇小说中，贯穿着一种非常精细而深刻的心理分析，感到了疲倦。这些爱好外表上引人瞩目情节的读者，所以会对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感到疲倦，就因为直到这一部分的终结，它的主角还是继续躺在沙发上，他们已经在第一章的开头，在这张沙发上见到过他了。那些爱好暴露倾向的读者，很不满意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始终没有触到正当的社会生活。要而言之，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在许多读者身上引起不良的印象。

看来，可以断言整个小说并不成功的征象，似乎并不少，至

-
- ① 本文发表在一八五九年《现代人》杂志第五期中，署名为“Н—бов”。冈察罗夫的长篇小说发表在《祖国纪事》的第一至第四期中，它一发表，杜勃罗留波夫就写了这篇文章。
- ②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在一八一八年，曾以文集的形式出版。至一八二〇年，改为杂志。但那时所发表的，主要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材料和文章。后来停刊了。等到一八三九年复活，就改组为文学月刊。别林斯基曾在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六年间，主持这杂志的批评栏，这是它的最辉煌时期。但自别林斯基退出以后，它就逐渐显出自由主义的色彩，它的威信也日益削弱。直到一八六八年，因转入了涅克拉索夫的手中，它才恢复从前的战斗立场，重新获得巨大成功。但此后沙皇当局的检查也日益严紧了，这杂志终于在一八八四年被封。
- ③ 引自《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引文与果戈理原作字句略有出入。
- ④ 冈察罗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 1812—1891），杰出的俄国作家。在大学时，颇受进步教授纳杰日丁的影响。在一八四六年，认识了别林斯基，并和别林斯基的文学团体有了接近。一八四七年，在《现代人》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得到了大家的重视。在这个小说之后，他开始构思《奥勃洛莫夫》。在一八四九年，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奥勃洛莫夫之梦》。但后来，由于出使国外等等的原_因，没有再写下去，直到一八五五年，作者回国以后，才重新续写。
- ⑤ 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写于一八五八年，于一八五九年一次发表在《现代人》的一月号中。这个长篇小说当时得到读者与批评家热烈的欢迎。据当时的一个批评家说，“屠格涅夫的长篇，使大家都读得兴奋若狂……大家都涌向它；把它当作一种期待已久的宝物。”

少,在我们那些已经习惯于把所有诗的文学看作是一种玩乐,只根据最初印象就把艺术作品批评一通的读者,是这样的。然而这一回,艺术的真实却很快占了上风。这部小说的续集部分,终于把一切从前曾经有过这样印象的人的最初不满意的印象都消泯了,而且冈察罗夫的才能,借助于它的所向披靡的影响力,甚至把那些绝少同情他的人都制服了。我们以为,这样一种成功的秘密,可以归结为,在作家的艺术才能中直接表现多少力量,那么在这小说中就有多少卓越丰富的内容。

这看起来也许是很奇怪的:我们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虽然发现特别丰富的内容,可是就主人公性格本身来说,在这小说里面简直就没有什么行动。但我们打算在下文说明自己的意见,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在阐述若干观察和结论。照我们的意见,这些观察和结论,正是冈察罗夫的小说必然要引出来的。

毫无疑问,《奥勃洛莫夫》招来了许多批评。在这些批评家中,有些人大约是校雠家,他们一心在语言与文体中搜索什么错误;有些大约是多情善感的人,他们会对某些情景或者人物的动人之处,发出许多感叹;还有一些大约是审美药剂师,他们根据美学的药方,严格地检验每一作品,看它们是否处处正确地把某一类性质的药品最合宜的分量分配给登场人物,这些登场人物是否一直是按照药方上所说明的情形来使用它们的。但我们对于深入这一类精微的细节,却连丝毫欲望都感觉不到,假如我们不在这方面绞尽脑汁——那样的句子是不是完全合乎主人公的性格和地位,或者其中某一些字眼是否应当更换一下之类,读者们似乎也不见得会觉得怎样遗憾。因此我们也就一点都不以为,假如我们只对冈察罗夫小说的内容和意义作比较概括性的考察,便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虽然,那些“真正的批评家”,无疑又要责备我们,说我们的文章不是在论“奥勃洛莫夫”,而仅仅

是关于“奥勃洛莫夫”了。

我们以为，批评家对冈察罗夫，比之对任何其他作家，更有责任来扼要说明从他的作品中所抽取出来的一般结论。有这样的作者，他们自己就会担负起这个工作，向读者阐明他的作品的目的与意义。有的作者，他们并不直截了当说明他的意图，但却这样叙述整个小说：使它成为他们的思想的明白而又正确的具体表现。这些作者的作品的一页，都在努力启发读者，必须十分迟钝的人，才会不明白它们。……但是阅读了这些作品的结果，多多少少会完全（视作者的才能高下而定）同意在这作品基础中所包含的思想。其余一切却在读了这本书的两个钟点以后，都化为乌有了。冈察罗夫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不给你、而且他是显然不愿意给你任何结论的。他所描绘的生活，在他并非作为一种抽象的哲学手段，而是生活本身的直接目的。他是不关心读者的，也不关心你们会从他的小说中得到什么结论：这已经是你们的事情了。你们假使弄错了，只能怪自己眼光近视，怎么也不能去怪作者。他把生动的形象传达给你看，他只保证这些形象是同现实一致的；至于阐明被描写的对象的价值等级，这已经是你们的事情了：他对这一点，是完全漠不关心的。他也缺乏一种能够赋予其他天才以巨大力量与魅力的热烈感情。例如，屠格涅夫叙述他的主人公，就好象在谈论他的亲近的人们一样；他从他们的胸膛中提炼出热烈的感情来，并且怀着温柔的同情、病态的烦虑看护着他们，他同自己所创造的人物一起受苦，一起欢乐，他自己就神往于他一直很喜欢使他们置身于其间的那种诗意的环境……他的迷恋是有传染力的：它不可抗拒地抓住了读者的同情，从第一页起就使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凝结在小说上，迫使他们也来体验和感受那些屠格涅夫人物就在其中向他们显现的那种时刻。过了许多时候，读者们也许会忘却故事

的进程，失去各个事件详细情节之间的联系，遗忘个别人物和情势的特征，也许，最后，把所有读过的东西都忘记干净了；然而他们会一直记住和珍爱他们在阅读小说时所体味到的那些生动而愉快的印象。但冈察罗夫却没有这一套东西。他的才能决不会轻易向印象认输。他不是一看到玫瑰花，一看到夜莺，就唱起抒情歌曲来的；他可能给这些东西所惊动，他会躊躇着，长久地注视着，倾听着，沉思着……但在这个时候在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这是我们无法好好弄明白的。……然而他终于开始勾勒一些什么了。……于是你们就冷静地注视着那个还不怎样明晰的轮廓。……它们渐渐明晰起来，明晰起来，又渐渐变得美丽起来。……突然，不知道由于一种什么奇迹，从这些轮廓中，终于显现了包含有无限美丽与魅力的玫瑰和夜莺了。他不但把它们形象描绘给你们看，而且还使你们嗅到了玫瑰的芳香，听到了夜莺的歌声。……假如玫瑰和夜莺能够鼓舞你们的感情，那么你们就唱起抒情歌曲来吧；艺术家既然把它们勾勒出来以后，他就满足自己的工作，走到一旁去了；他不再添加什么。……“添加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这样想，“假如形象本身不能告诉你们的心灵什么东西。那还有什么话可以对你们说呢？……”

冈察罗夫才能的最坚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对象的完整形象，善于把这形象加以锻炼，加以雕塑。）这就是他所以特别不同于同时代俄罗斯作家的地方。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才能的其他一些特征，也就容易说明了。他有一种令人震惊的能力——他能够在随便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那正在飞驰过去的生活现象，把握它的全部完整性与新鲜性，把它保持在自己的面前，一直保持到它整个都属于艺术家所有。生活的阳光落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然而它刚刚触到我们的意识，就立刻从我们身上消逝了。紧接着它的后面，又从别的物体上射来了别的光

华,但它们却又同样迅速地消逝了,几乎不留一点痕迹。全部生活就是这样过去的,它只是在我们意识的表面上滑过去。艺术家就不是这样;他能够在每一种事物上,捕捉一种跟他的内心十分接近而又亲切的东西,善于摄住其中有什么东西特别打动他的一瞬间。按照诗人才能的性质,按照这才能造诣的程度,艺术家所达到的范围,有的可能显得狭窄,有的就显得宽阔;其印象有的可能显得生动活泼,有的就显得深邃沉着;其表现有的可能显得热情激动,有的就显得安详平静。诗人的感应,常常会给某一对象的一种什么品质所吸引去,于是他就到处努力呼召和搜寻这一种品质,他把尽可能完全地、并且生动活泼地将它表现出来作为自己主要使命,他把他的艺术力量大部分都化在这一点上。这样,艺术家就使自己灵魂里的内在世界跟外部现象的世界交融在一起,能够通过统治着他们的精神的三棱镜来观察全部生活和自然。这样,有一些艺术家就使一切东西都受造型美的感觉所支配;有的艺术家主要就只描写柔和的和能够引人同情的面貌;还有一些艺术家,就通过一切形象,通过一切描写,来反映人道的与社会的追求,等等。但这些方面,却没有一种是在冈察罗夫的身上特别显示出来的。他有另外一种特质:一种属于诗人世界观的宁静和丰满。他不会被什么东西特别地吸引去,或者一切东西对他有同一程度的吸引力。他决不迷离于某一对象的一方面,也不会迷离于某一事件的一个瞬间;而是把这一对象转来转去,从四面八方来观察它,期待着这一现象所有的瞬间的完全显现,到那时候,他才开始从事艺术加工工作。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艺术家对待他所描写的对象,当然就能比较平静,比较不偏不倚,甚至对于琐碎的详细情节,都能弄得轮廓分明,而且对于小说中所有个别事件,也能给予同等程度的注意了。

有些人会觉得冈察罗夫的长篇小说过于冗长的原因就在于

此。假如您愿意这样说，这部小说的确可以算是冗长的。奥勃洛莫夫在第一部中躺在沙发里；在第二部中，他到了伊林斯基家，爱上了奥尔迦，她也爱上了他；在第三部中，她发现自己错看了奥勃洛莫夫，于是他们就分了手；在第四部中，她嫁给了奥勃洛莫夫的朋友斯托尔兹，而奥勃洛莫夫却娶了他所租的房子那里的房东太太。这就是一切了。没有什么外部的事件，没有什么阻碍（除非涅瓦河上的吊桥拉起来，才会阻止奥尔迦与奥勃洛莫夫会面），没有什么次要的事故闯到这部小说里去。奥勃洛莫夫的懒惰和冷淡——这是他全部历史中的唯一动力。这怎么可以拉长到四部分呢！这个主题要是落到了别的作家身上，就会把它写成另外一副样子了：他可能把它写成五十来页轻松而又赏心娱目的文字，可能把它创作成可爱的笑剧，把他的懒鬼可能嘲笑一通，可能赞美一阵奥尔迦与斯托尔兹，于是事情就这样完结了。这样的故事无论如何是不会使人厌烦的，虽然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艺术意义。可是冈察罗夫却用另外一种方法进行这个工作。他对于自己的视线曾经一度投射过的现象，在还没有穷根究底，还没有找出它的原因来，还没有了解它同一切包围着它的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前，他是不会离开的。他要努力把一种在他面前闪过去的偶然的形象提高到典型的地位，赋予它普遍而又持久的意义。因此，凡是和奥勃洛莫夫有关的一切，在他都不是空洞而卑微不足道的东西。他对一切东西都满怀兴味，他把一切都详细而清楚地勾勒出来。不但是奥勃洛莫夫住过的屋子，还有他只是梦想着去住的屋子；不但是他的睡衣，还有他的仆人查哈尔的灰色制服和粗硬的颊须；不但是奥勃洛莫夫写一封信的情形，还有村长写给他的那封信同纸质和墨色——这一切都非常清晰地并且凸出如浮雕地传达和描写出来。甚而至于对那个在小说中不起什么作用的男爵冯·兰格瓦庚，作者也

不能随便放过去；他以很出色的整整的一页地位来描写这个男爵，假如在一页中还不能把他尽情描写出来，就不惜写上两页或者四页。这一点，您也许可以说，要妨害剧情的速度，使得那些要求有一种强烈激动把他们不由自主地吸引去的冷漠的读者感到疲倦。然而，虽然如此，这在冈察罗夫身上，却是一种对于他的艺术描写极有帮助的高贵的特征。当你开始读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许多东西好象都不能证明它们是严格地必要的，好象都不能符合艺术的永久性的要求的。可是很快，你就会习惯于他所描写的世界，就会不由自主地承认所有他所描写的现象的规律性和自然性，就会把你自己也放在剧中人的环境中，而开始感觉，在他们这种地位，在他们这种环境中，那是不可能有什么别种做法，而且似乎也不应该有别种做法。作者所不断地介绍着的，他所满怀着兴味并以卓越的技巧描写着的琐碎的详细情节，到最后终于产生了一种魅力。你完全转到了作者引导着你去的那个世界里：在这世界里，你找到了一种亲切的东西，在你的面前展开的，不只是每个人，每件事物的外表形式，还有他们的内部，还有他们的灵魂。于是在读完了全部小说以后，你就会感觉，在你的思维领域里已经加上一种新的东西，在你的灵魂里已经深刻地镌刻着一些新的形象，一些新的典型。它们会长时间跟踪着你，你老是要想着它们，你老是要想弄明白它们的意义，以及对于你个人生活、性格和习惯的关系。这时候你的颓唐和疲倦就不知道隐匿到哪里去了；勇敢思想和清新的感情在你的心中苏醒过来了。你打算从头再读许多页，思索着它们，辩论着它们。无论如何，奥勃洛莫夫对于我们是有影响的：《奥勃洛莫夫之梦》以及其他几个独立的场面，我们就接连读了好几遍，全部小说我们差不多从头至尾读了两遍，在读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几乎要比读第一遍时还要喜欢它。这些被作者用来编排故事

进程的详细情节,这些照某些人的意见说来,是把这小说“拉长了”的详细情节,就具有这样一种富于魅力的意义。

所以冈察罗夫在我们的面前,首先就是一个善于把生活现象的完整性表现出来的艺术家。把生活现象描写出来,就是他的使命,他的欢乐;他那客观的艺术创造,决不给什么理论上的偏见或是先入的观念所迷惑,也决不屈服于任何一种独占性的同情之下。这种艺术创造是平稳的、清醒的、冷静的。这是不是艺术活动的最高理想呢?或者说不定,这甚至是一种缺点,它暴露着艺术家的感受力是薄弱的?要给这个问题以严格的回答,这很困难,假使要不加保留和不加解释,无论如何也是不公平的。有许多人不喜欢这位诗人对于现实的冷静的态度,他们准备立刻对于这种天才的无动于衷的性格宣告严厉的判决。我们了解这一类判决的自然性,而且说不定,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愿望,要求作者能够更加刺激我们的感觉,能够更强烈吸引我们。然而我们却也明白:这种因为希望经常有一个指导者的习惯而产生的愿望,甚至在感情中也需要指导者的愿望——多少有点奥勃洛莫夫的气质。假如只因为那些印象还没有在他身上唤起抒情诗的兴奋,却默默地潜入他的灵魂深处,就编派作者感受力比较薄弱——这是不公正的。相反,那些印象越是迅速、越是激动地表现出来,它们就越是显得表面化,越是显得浮光掠影。我们可以经常从那些天赋与他们言语上以及表情上激动的取之不尽蕴藏的人身上,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假如一个人能够把事物的形象放在自己的灵魂里,经过一番孕育和抚养,然后把它明确而又完整地表现出来——那么这就是说,他那锐敏的感受性已经和深刻的感情结合起来了。他不会在时间没有成熟以前,就表达出来,但是世界上也没有一样东西会对他没有用处。一切在他周围生存的和活动的,一切使得自然与人类社会丰富起来的,这

一切在他那里——

都象一种神秘的东西
生活在他的灵魂深处。^①

一切生活现象，反映在他的里面，就好象反映在魔术的镜子里似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这些生活的现象，都能按照他的意志停留下来，凝结起来，成为一种固定不移的形式。看起来，他好象能够摄住生活的本身，使它永远固定起来，把它最难以捉摸的瞬间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永远看着它，向它学习或者享受着它。

这一种发展到了最高程度的威力，当然，极值得我们称之为这是天才的一种吸引力、魅惑力、鼓舞力或者潜力。不过就是这一种威力也有它不同的程度，而且，它可以发挥到同样重要的各个不同种类的对象上去。在这里，我们是和那种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徒的意见不同的，这批人以为，能够非常美好地描写树上的叶子，是和例如能够非常卓越地描写人物的性格，同样重要。从主观上想，这也许是正确的：两个艺术家彼此的才能可能是一样的，只有他们的活动范围各不相同。然而，我们永远不能同意，一个把他的才能浪费在工整地描写小叶片与小溪流的诗人，可以和那个善于把同样的才力发挥在——例如说——再现社会生活现象的人，有同等的意义。我们觉得，就批评、就文学、就社会本身来说，关于艺术家把才能运用在什么地方，怎样表现出来的问题，是比艺术家自己所具有的才能在抽象的状态上、在潜在的状态上有怎样的范围和性质的问题，远来得重要。

① 引自丘特契夫(Ф. И. Тютчев, 1803—1873)的诗·《寂静》。

冈察罗夫的才能是怎样表现的呢？它是用在什么地方了呢？应该分析了这个长篇小说的内容之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显而易见，冈察罗夫没有给自己的描写选取广大的范围。关于这个心地善良的懒人奥勃洛莫夫怎样躺着和睡着，以及不论友谊、还是爱情都不能惊醒他，使他振作起来的故事——这到底算不上怎样重要的故事。〔然而在它里面，却反映着俄罗斯的生活，在它里面，那种生动的现代俄罗斯典型正以无情的严厉与真实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它的里面说出了标志我们社会发展的新词，这个新词是以明确而坚定的声调，没有失望、也不带稚气的希望，而是对真理怀着完全的自觉之下发出来的。这个新词——就是奥勃洛莫夫性格；它是解开俄罗斯生活中许多现象之谜的关键，同时它使冈察罗夫的长篇小说拥有了比较我们那些暴露小说所具有的意义更要巨大的社会意义。在奥勃洛莫夫这个典型中，在这整个的奥勃洛莫夫性格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比较出于强大才能之手的成功作品更要巨大的东西；我们发现了这是俄罗斯生活的产物，这是时代的征兆。〕

奥勃洛莫夫在我们的文学中已经完全不是什么新的人物了；然而在以前，这种人物却从来不曾这样朴实而自然地呈现在我们之前，象现在冈察罗夫长篇小说中所描写似的。为了不要涉古太远起见，我们要说，奥勃洛莫夫型的同类特征，在奥涅金身上就已经找得到了，后来，我们又在我们那些最好的文学作品中，好几次碰到他们的再现。问题在这里：（因为这是我们的土生的民族的典型，所以我们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没有一个能够避开这种典型。然而跟着时序的流驶，跟着社会意识的发展，这个典型也在改变它的形式，对于生活形成了另外一种关系，获得了新的意义。指出这种典型所以存在的这些新姿态，阐明它的新的意义的本质——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巨大任务，而能够完

成这一工作的天才，也任何时候都是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完成了最重要一步的前进。冈察罗夫就用他的《奥勃洛莫夫》完成了这样的一步。我们要先观察一下这个奥勃洛莫夫型的主要特征，然后再试试在他和各个不同时期我们文学中所出现的几个同类典型之间，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奥勃洛莫夫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一种彻头彻尾的惰性，这种惰性是由于对一切世界上所进行的东西，都表示冷淡而发生的。冷淡的原因，一部分在于他的外部地位，而另一部分，则在于他的智力和道德发展的方式。就他的外部地位来说——他是一个绅士；按照作者的说法：“他有一个查哈尔，还有三百个同样的查哈尔。”伊里亚·伊里奇^①向查哈尔这样解释着自己的优越地位：

“难道我也得奔跑，也得做事？我难道是少了吃的？样子瘦了还是憔悴了？难道我还缺少什么东西？伺候我，给我做事——似乎有的是人呵！托福上帝，我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自己在脚上穿过袜子呢！我应该去操心烦恼吗，干吗我要去烦恼呢？……我是对哪个在说话？你不是从小就跟着我的吗？你是什么都知道的，你看见我娇生惯养，你知道我从来就受不住什么寒冷、饥饿，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贫穷，没有给自己挣过一块面包，总而言之，没有做过辛苦的事情。”

奥勃洛莫夫说出了毫无疑问的真理。他所受到的教养的全部历史，都可以作为他这些话的证据。他从很小年纪起，就养成

^① 这是奥勃洛莫夫的名字与父名。

懒汉的习气了，因为有人服侍他，有人给他做事；在这种情形下，即使他心里不愿意，他也总是只能无所事事，只能懒洋洋地生活。真的，请告诉我，对于在这样条件下成长的人，你们能够要求些什么呢：

查哈尔，——象从前的保姆一样，——给他穿袜子，穿靴子，而伊柳莎^①那时已经是十四岁的孩子了，还只知道躺着，时而把这只脚，时而把那只脚伸给他；只要他稍为觉得不如意，他就立刻把脚踢到查哈尔卡^②的鼻子上去。假如不服气的查哈尔卡想去告诉，那他还得在老一辈那里再挨一顿打。随后，查哈尔卡就给他梳头，穿上衣服，小心地把伊里亚·伊里奇的手臂塞进衣袖去，免得过分打扰了他，同时还得提醒他应当做的这件那件事——譬如：起来、洗脸等等。

伊里亚·伊里奇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只消眨眨眼睛——就有三四个仆人奔过去实现他的愿望；有的时候，如果失落了什么东西，如果想要一件需要的东西而得不到，如果他想带点什么东西来，或者为了什么事要去跑一趟，——他也象那种好动的孩子一样，很想亲自跑去，自己来做完这一切事，然而这当儿，父亲和母亲，再加上三个婢母却以五个声音，一起喊道：

“干什么呀？哪儿去呀！要华西卡、凡卡、查哈尔卡来干什么的呀？喂，华西卡、凡卡、查哈尔卡！你们在瞧什么呀，昏蛋？看我揍你们……”

① 伊柳莎是伊里亚的爱称。

② 查哈尔卡是查哈尔的小称。

因此，伊里亚·伊里奇就从来没有亲自做过什么事情。后来，他觉得这样倒舒服得多，于是自己也学会了这样叫喊了：“喂，华西卡、凡卡，把这个给我，把那个给我！我不要那一个，要这一个！快跑，把它拿来！”

有的时候，父母慈爱的关心，也很使他厌烦。他跑下扶梯，或者在院子里奔跑，突然在他的后面响起了十个绝望的声音：“啊，啊！拉住他，挡住他！这样要摔倒的，要跌伤的！站住，站住呵！……”到得冬天，他如果要窜到门廊里去，或者要打开气窗，——于是又有叫喊了：“啊，哪儿去呀？这怎么行？别跑，别走动，别打开它：身体要弄坏的，要着凉的……”于是伊柳莎只好郁郁地留在家里，好象暖室里异国种的花朵被人抚爱一样，同时也象这种花朵一样，在玻璃底下慢慢地、懒洋洋地成长。他那要找寻一个发挥力量的机会，就转向内部，开始枯萎凋谢了。

这样一种教育，在我们有教养的社会中，根本不算是什么特别的、奇怪的东西。当然，不是所有地方的查哈尔卡都是替贵族少爷干穿袜子这类行当的，然而，不该忘记，这一类优惠特权，只有在一种特别的宽宏下，或者出于一种高等教养的观点，才会赐给查哈尔卡，而且这一点和家庭生活的一般进程，也是完全不调和的。贵族公子也许会自己穿衣服；但是他却知道，这对于他，只是一种有趣的消遣、一种玩乐，而在本质上，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应该自己做的。事实上，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必须去做的。他干吗要去操劳呢？难道没有人来侍候他，替他做一切需要做的事情吗？……所以他永远不愿意使自己为工作而操劳憔悴，不管人们怎样向他谈论劳动的必要和神圣：他从小就在家里看见一切家务工作都有奴仆和婢女们去做，他的爸爸和妈妈只要发号

施令，叱骂那些做得不好的。因此，那种先入观念——叉手坐着，是比为了工作而奔忙更要可敬，很早就在他的心里形成了。……所有以后的发展就是顺着这个方向行进的。

孩子所处的这样的地位，对于他的整个道德与智力的培养，要起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内部力量势必会“枯萎凋谢”。如果这孩子有的时候要试试把这种力量加以发挥，那也无非是任性使气和傲慢地要求别人奉行他的命令而已。这是很明白的，这种予取予求的任性使气将要怎样发展他的无毅力的性格，骄傲不逊将要怎样和真正地坚持一个人的品质的能力发生冲突。一个孩子当习惯于提出一些无理要求的时候，他就立刻失去了使他的愿望不要超出可能性与实际性的范围的能力，丧失了思考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的能力，这样，一旦碰到了第一阵阻碍，一旦必须运用自己的努力才能除去它，他便望而却步了。这种人当他成长了，就变成奥勃洛莫夫，他们的冷淡与无毅力在程度上或者有大有小，他们所蒙的巧妙的假面具或者有高超有低能，然而他们永远保有一个不变的特质——厌恶严肃和独立的活动。

奥勃洛莫夫们心智上的发展也在这里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心智上的发展，当然也是受他们的外部环境所左右的。正因为他们最初就是从相反的方面来看生活，——所以，以后一直到他们生活的终结，他们都不可能达到很有理性地理解自己对世界以及对人们的关系。以后即使将许多东西向他们作了明白的解释，他们或者也明白了一些什么；然而在童年时代，已经生根了的看法，还是躲在一个什么角落里，老是从那里窥视着，阻挠着一切新的观念，不让它们安置在灵魂的深处。……于是一种混沌就在头脑中形成了：有的时候，一个人或者怀着决心去进行什么事情，可是他却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开

始，应该转向哪里去。……毫无疑问：一个正常的人，他永远只想做他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因为这样，他就立刻去做一切他要做的事情。……然而奥勃洛莫夫……他却是不习惯做什么事情的，因此，他就不能好好地决定，他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而因此，他也就不能严肃地、果敢地来要什么东西。……他的愿望只变成一种形式：“假使这完成了，该多么好；”然而怎样去完成它，——他却知道了。就为了这缘故，他就喜欢幻想，而到了这幻想必须和现实接触的时候，他就害怕得要命。逢到这种场合，他就努力把事情推卸到别的什么人身上，假使没有什么人可以推卸，那只好碰运气了……

这一切特征非常明白地烙印在——并且以非常的力量和真实集中在伊里亚·伊里奇·奥勃洛莫夫的身上。你决不能认为：伊里亚·伊里奇是属于一种特殊种类的人，认为蛰伏不动就是这一类人的本质的、基本的特征。同时这样想法也是不公正的：什么他生来就丧失了随心所欲地活动的能力。完全不是：他生来就是跟别的一切人一模一样的。在孩子的时代，他就很想奔跑，很想跟孩子们玩雪球，自己去得到这样或者那样东西，跑下峡谷去，或者越过沟渠、篱笆和水潭，到最近的小白桦林去。他曾经利用奥勃洛莫夫卡通常午睡的时间，“跑上走廊去（那里是不准走的，因为它每分钟都有倒塌的危险），绕着轧拉轧拉发响的木板飞跑，攀登了鸽笼，走到了花园的幽深处，倾听甲虫嗡嗡地叫，眼睛远远地盯着甲虫在空中飞行。”有的时候——“他走向小沟，挖掘了一会，发现了什么根，就剥去了皮，津津有味地吃着，比吃妈妈给的苹果和果酱还喜欢。”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作为温柔和安静性格的因素，然而却不能看作是浑浑噩噩和懒惰性格的因素。那种已经发展为胆怯，让自己的背脊给别人爬的温柔——这完全不是人类生来的东西，而纯然是后天养成的习惯，正好象无礼

和傲慢一样。在这两种品质之间的距离，完全不象通常所想象那么巨大。没有一个人会象奴仆似的那样神乎其技地掀起他的鼻子；没有一个人会象那些善于向长官奉承趋拍的人似的那样粗鲁地对待他的下属。伊里亚·伊里奇，不管他怎么温柔，他却不害怕把脚踢到替他穿鞋的查哈尔的脸上去，假如终他的一生，没有把这个施之于别的人，那末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预期有必须加以克服的反抗。于是迫不得已，他只好把他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三百个查哈尔的身上了。倘若他拥有了一百倍或者一千倍以上的查哈尔——如果他还是碰不到什么反抗，万一有人跟他有了什么纠葛，他也会习惯于肆无忌惮地把脚踢到每个人的牙齿上去的。这一类行为，完全不足以证明，在他的身上有什么残酷的天性；这一种行为不论在他自己，还是在一切周围的人看来都很自然的，都很必要。……没有一个人会在脑子里想到，这可以而且应该有其他什么做法。然而——幸乎不幸乎——伊里亚·伊里奇却生长在中等地主的家里，他的收入不超过一万纸卢布，因此之故，他便只能在自己的幻想中来安排世界的命运了。可是，他在自己的幻想中，却喜欢把自己献身给一种威武的和英雄的追求。“有的时候，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所向无敌的统帅，在他的面前，不但拿破仑，就是叶鲁斯冷·拉扎列维奇^①也是不足道的；他又虚构了一场战争以及战争的原因：例如吧，他的非洲民族侵入了欧洲；或者呢，他建立了一支新的十字军，从事作战，解决民族的命运，毁灭城市，宽恕，惩罚，表显仁慈、宽宏的勋业。”或者他想象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在他的后面，有一大群人跟着他，谁都向他们顶礼膜拜。……很

① 叶鲁斯冷·拉扎列维奇，俄国民间故事中的主角。他曾经得到一匹马，后来骑着它建立了武功。

明白，奥勃洛莫夫并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冷淡的典型，而是一个在其生活中也在摸索着什么东西的、也在思索着什么东西的人。然而那种令人嫌恶的习惯，那种不是依靠他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别人的努力使他的愿望得到满足的习惯，却在他的心里发展了一种冷淡的、蛰伏不动的性格，使他陷在道德上屈从的可怜的境地。这一种屈从是这样密切地和奥勃洛莫夫的贵族性格互相纠缠起来，是这样互相渗透着，是这样交互为条件，以至要从它们中间寻出一个界限来，简直没有一点可能。奥勃洛莫夫这种道德上的屈从，也许是他的个性以及他的整个生涯中最耐人寻味的一面。……然而，象伊里亚·伊里奇这样享有独立地位的人，为什么也要堕落到卑屈里面去呢？既然谁都可以享受自由，为什么他不能呢？他并不做事，也并不同社会交往，他有一笔可靠的财产。……他曾经这样自称自赞，他并不感觉自己有鞠躬、恳求、低声下气的必要，他并不象那些“别人”，必须不倦地工作，奔走，忙碌，——不工作，就没有吃的。……他能够使那个善良的寡妇普希尼青娜对他表示敬爱，就因为他是一个老爷，就因为他灿烂而光辉，走路和谈话是那么自由自在、独立不羁，他“并不无穷无尽地抄写文件，并不因为迟到办公室而害怕得发抖，并不这样来看一切人，好象在请求别人给自己按上马鞍，让他们骑在自己的身上，而是这样大胆，这样自由自在地来看一切人和一切事物，好象要求他们服从着自己。”然而这个老爷的整个生活，却被另一种东西所毁坏了：他始终做着别人意志的奴隶，从来不肯把自己提高到这种水平；能够多少发挥一点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是每一个女人的奴隶，每一个碰到的人的奴隶，每一个企图操纵他的骗子的奴隶。他又是自己的农奴查哈尔的奴隶，他们之间，谁更有权力支配谁，简直很难决定。至少——查哈尔所不愿意干的，伊里亚·伊里奇就不能强迫他干，而查哈尔

愿意干的，即使违抗着主人的意志也得干，主人却只能服服贴贴。……这都是非常自然的：查哈尔他到底还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来，可是奥勃洛莫夫简直就什么都不能干，不会干。且不要提起塔伦季耶夫和伊凡·马特维奇^①了，他们在心智的发展和道德品质上，虽然远比奥勃洛莫夫低，可是他们愿意怎样摆布他，就能怎样摆布他……为什么这样呢？这仍旧还是为了奥勃洛莫夫是一个老爷，他不愿做事，而且也不会做事，同时又不了解自己同一切环绕着他的事物之间的真正的关系。他在一切活动还只存在于幻象境界，离开真正的实现还是很远的时候，他还不嫌弃什么活动：例如吧，他也曾拟订过经营领地的计划，非常热心地忙碌这个计划，——只是“细目、预算、数字”之类却把他吓坏了，他就常常把它们抛在一边，因为他实在没有能力应付它们！……他是老爷，正象他把自己解释给伊凡·马特维奇听的时候所说的：

“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您可以去问……去问查哈尔，他就会告诉您：‘老爷！’不错，我是一个老爷，什么事都不会干。您假使知道，您就干，假使能够，您就帮忙，为了您的工作，您要什么就拿什么：——学问的用处就在这里！”

那末，你是不是以为，他这样说只是要逃避工作，是以无知为借口，来努力掩饰自己的懒惰？不是的，他的确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会做，他的确没有能力来担任随便哪一件有用的工作。在谈到他自己的领地（他已经拟订好计划，要加以改造）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向伊凡·马特维奇招认自己的无知的：

^① 塔伦季耶夫和伊凡·马特维奇都是《奥勃洛莫夫》中的人物。

“我不知道，徭役是怎么一回事，农事是怎么一回事，贫农是怎么一回事，富农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四分之一普特^①的裸麦或者燕麦，究竟是多少，要值多少钱，在哪一个月可以播种些什么，收割些什么，怎样出卖，并且什么时候出卖；我不知道，我是富呢，还是穷，一年以后我是不是还能够吃得饱饱的，还是要做乞丐——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您应该把我当作小孩一样，跟我说话，或者劝告我……”

用另外一种话来说，就是：您来做我的主人吧，您打算怎么安排我的财产，就怎么安排吧，您只消分给我您自己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份就是了。……事实也果真是这样：伊凡·马特维奇差不多把奥勃洛莫夫的财产全部都抓到他的手里了，可惜的是，斯托尔兹却来打了岔。

奥勃洛莫夫不但不知道农事生产的规矩，不但不了解自己的事情的状况：这还不算怎么糟糕！……最糟糕的是：他完全不能领会生活对于自己的意义。在奥勃洛莫夫卡没有一个人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生活，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意义和它的使命又是什么？奥勃洛莫夫们是把生活了解得非常简单的：

“他们把生活看作是安静与无为的理想，这种理想时不时要被疾病、损害、吵架——这种不愉快的偶然事件所破坏。他们把劳动当作一种施于我们祖先的惩罚来忍受，但

^① 一普特等于一八·三六公斤。

是不能够喜欢它，只要有机会，他们总是设法逃避，他们认为这是可能而且应当的。”

伊里亚·伊里奇也就是这样看待生活的。他向斯托尔兹所描绘的幸福理想，除了这种饱食终日的生活——有着花房、温室，可以带了茶炊到树林里等等地方作郊游，——穿着睡衣，做着酣梦，在中间休息的时分——就同自己的温柔而美丽的妻子，作一次充满诗情画意的散步，观察农民们如何操作以外，就不包括什么别的东西。奥勃洛莫夫的智慧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定型了，即使是在最抽象的根据中，是在最乌托邦式的理论下，他也有能力把现在一刹那摄住不动，以后不管什么理由，就永远不再离开这一种 status quo^①了。伊里亚·伊里奇在描绘他的幸福的理想时，从来不曾想到问一问自己关于这种幸福的内在意义是什么，从来不曾想到如何证明这种幸福的合法性与正确性，从来不曾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打哪里去张罗这些花房和温室，谁来支撑它们，凭什么权利他可以享受它们？……奥勃洛莫夫既不曾向自己提出类似的问题，又不曾弄清楚自己对世界、对社会的关系，当然，他也就不能理解自己的生活，而因此，对于一切必须去做的工作，他就不免感到厌烦和倦怠了。他曾经去当过差事，但他却不能明白为什么尽是抄写那些文件；既然不能明白，那末除了辞职，什么都不写之外，就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了。他也曾去学习过，可是他不知道，学问对于他究竟有什么用处；既然不知道，他就决定把书籍堆在角落里，冷淡地看着它们给尘灰所掩盖起来了。他也曾在社交界出场，但他不能向自己解释，人为什么要去作客；既然解释不出，他就丢弃他的一切相识的人，

① 拉丁语：现状。

整天都躺在沙发上了。他也曾接近过女子，但他却想到：可是，能够从女人那里期待和得到一些什么呢？他想了一阵，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样就开始避开女人了。……一切都使他疲倦和厌烦，于是他就侧身而卧，对于那些天知道为着什么而烦扰、而忙碌的人们的“蚂蚁似的工作”，就充满着完全的有意识的轻蔑。

关于解释奥勃洛莫夫的性格，既然已经谈到了这一点，我们觉得，现在转到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种文学上的对比去，应当是很适当的。前面的见解，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奥勃洛莫夫并不是一个在天性上已经完全失去自由活动能力的人。他的懒惰，他的冷淡，正是教育和周围环境的产物。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奥勃洛莫夫，而是奥勃洛莫夫性格。说不定，如果他能够找到合乎自己的工作他的话，他甚至也能工作的；但当然，要达到这一点，他必须在另一些条件下，而不是在他以前所发展过来的条件下作某一些的发展。不过在他现在这种地位里，他却找不到地方可以找到合乎他的意愿的工作，因为他根本不明白生活的意义，他不能达到从理智的观点来观察自己同别人的关系。在这儿，就给了我们拿他来和以前我们最优秀作家所创造的典型相比的理由。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注意到：最有名的俄国中篇小说或者长篇小说的所有主人公，都为了看不见生活中的目的，又不能给自己找到合适的事业而痛苦着。就为了这个缘故，他们就对一切工作都感觉厌烦和憎恶，因而他们就跟奥勃洛莫夫显得极其相象。真的，——假使你去打开，例如吧，《奥涅金》、《当代英雄》、《谁之罪？》、《罗亭》、《多余的人》，或者《施企格罗夫郡的汉姆雷特》^①，——在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身上，你都能寻到几乎和奥

① 《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的作品；《谁之罪？》是赫尔岑的作品；《罗亭》、《多余的人》、《施企格罗夫郡的汉姆雷特》都是屠格涅夫的作品。

勃洛莫夫的性格一模一样的特征。

象奥勃洛莫夫一样，奥涅金也撇开了社会，因为他已经——

给多次的变心弄得疲倦了，
给朋友和友谊弄得厌烦了。①

于是他就弄起写作来：

这个背弃狂欢作乐的人，
奥涅金，把自己禁锢在家里，
一边打呵欠，一边拿起笔，
他打算写作，可是他受不了
这种坚忍的劳作；
从他的笔下什么都写不出。②

还有罗亭，他也曾在这个舞台上出场，他喜欢向那些他所挑选过的人，诵读“他计划要写的论文、巨著的最初几页”。田吉特尼柯夫③也多年写作着“要以所有一切的观点来理解整个俄罗斯的庞大著作”；可是就是他这种“计划，也多半只止于一种想象：他咬着笔杆，在纸上涂了一些图画，接着就把这一切东西都推到旁边去了。”伊里亚·伊里奇在这一方面，也并不比他的兄弟们落后：他也曾写作过，而且翻译过，——他甚至还翻译过萨依④。“你的作品，你的翻译在哪里？”——斯托尔兹后来这样问他。

① 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第三十七节。

② 同上第一章第四十三节。

③ 果戈理《死魂灵》第二部中的人物，也是属于奥勃洛莫夫型的。

④ 若望·巴伯蒂斯脱·萨依(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信徒。

“我不知道查哈尔放到哪儿去了；大概，放在哪一个角落里吧，”奥勃洛莫夫回答。从这里可以看出，伊里亚·伊里奇甚至比那些象他一样，怀着同样的决心来处理工作的人，好象还要多做一点。……奥勃洛莫夫家族的兄弟们，不管他们地位上和智力发展上的差别，他们几乎都做过这个工作。只有彼巧林一个人高高在上地俯瞰着那些“小说贩子以及小市民戏剧的作者”；可是就连他也写过一些随笔散记。至于别尔托夫^①呢，他的确写过什么东西，而且，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演员，他还访问过冬宫博物馆，坐在画架那里，打算画一幅从西伯利亚回来的比隆与要到西伯利亚去的米尼赫会见^②的巨大图画……可是它的结果是什么，读者们是都已经清楚……就是这同样的奥勃洛莫夫精神统治着这个家族的全体……

至于“吸收别人的知识”——也就是所谓读书呢，奥勃洛莫夫也跟他的兄弟们没有什么大差别。伊里亚·伊里奇也读过一些什么的，而且并不象他的故世的父亲那样读法：他的父亲会这样说，“好久没有读书啦”；或者“让我来读书吧”，——于是他就拿起随手可以拿到的书来……不是的，现代教育的思潮已经触到了奥勃洛莫夫：他已经能够有选择地，自觉地读书了。

听到了一本什么名著，——他也有要跟它相识一下的愿望；他就寻觅，访求这本书，倘使这本书很快弄到了手，他就马上来读它，于是关于事物的观念，便开始形成了；这

① 别尔托夫是《谁之罪？》的主人公。

② 比隆(Бирон, Эрнст Иоганн, 1690—1772), 拉脱维亚库尔良其亚的贵族。他是俄国女皇安娜·伊凡诺夫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 1693—1740)的宠臣。女皇沉湎于声色游娱，大权便落在比隆的手里。女皇死后，他曾做过短时期的摄政。但到了一七四〇年，故女皇的甥女安娜·列奥波尔陀夫娜(Анна Леопольдовна)便在米尼赫的帮助下，把他推翻了。

样，只消再进一步，他就可以精通它了，可是你再一看，他却已经躺了下来，眼睛漠然地望着天花板，至于书呢，却躺在他的身边，没有读完，也没有懂得……他的冷淡漠然较之情热更能迅速地把他捕捉住：他从来不会重新再来读一本已经丢开的书。

这不是跟别人一模一样的吗？奥涅金想到了自己应该吸收一下别人的智慧，他就开始——

把书成排放在书架上，①

读了起来。可是他却得不到什么好处：于是他立刻对读书发生了厌倦，就——

和抛弃女人一样，他丢开了书，
书架和它那满是尘灰的家族，
蒙上了一层黑色的软绸。②

田吉特尼柯夫也是这样读书的（因为在习惯上他总是把书随手放在手边的），——他大部分是在午饭时间读的：“一面喝汤，蘸调味品，吃烧肉，甚至甜点心……”还有罗亭也曾对列兹尧夫③承认过，他自己买了不少农业书，可是没有一本是读到底的；他又做过教师，可是他发觉对于实际事物知道得很少，甚而至于在十六世纪的一种文献上，他都被一个数学教师难倒了。他也象

①② 均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第四十四节。

③ 《罗亭》里的人物。

奥勃洛莫夫一样，容易接受的只有一般概念，至于“细节、预算、数字”之类，他一向是把它们搁到一旁去的。

“可是这还不是生活，——这不过是生活的准备，”——同奥勃洛莫夫以及这一伙人的全体一起跋涉在一大堆没有用处的学问中、没有一点点改变生活力量的安特列伊·伊凡诺维奇·田吉特尼柯夫这样想。“真正的生活——这就是供职服务。”所有我们的英雄，除了奥涅金以及彼巧林以外，都出去干过差事，可是他们干的差事对于他们全体，都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并且毫无意义的沉重负担；因此他们大家结果都高傲地很早就辞了职。别尔托夫不愿意再花十四年六个月一直做到获得勋章，因为他在开头时候热烈了一阵之后，很快就对例行公事表示了冷淡，变得容易发怒、漫不经意起来了。……田吉特尼柯夫曾经同长官高声说话，而且，他要亲自去管理自己的田庄，给国家更多的利益。^①罗亭跟他曾经在那里当过教员的中学校长吵过架。奥勃洛莫夫不愿意老是跟长官“用不是自己的声音，而是用一个别的什么人的细弱、令人厌恶的调子”说话；——由于不愿意用这种声调向长官解释“把一份应该送到阿斯特拉罕的要紧公事，错发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的原因，他就递了辞呈。……到处都是同样的奥勃洛莫夫性格……

奥勃洛莫夫们在家庭生活方面，彼此之间也是非常相象的：

散步，读书，睡梦沉沉，

森林的荫影，水流的低吟，

① 田吉特尼柯夫曾经由他的叔父的介绍，在彼得堡的一个衙门里做一个小公务员。由于忍受不住誊写公文，伺候长官脸色的生活，他跟长官吵了架，马上辞了职。临走，还向他的叔父发表了一通回家管理田产，应该比做誊录生更有功于国家的道理。

时或有黑眼白皮肤的美人
清新而青春烂漫的接吻，
听从着缰辔指挥的骏马，
更有精美丰盛的肴饌，
一瓶清澈的葡萄酒，
孤独，而又寂静，——
这就是奥涅金神圣的生活……①

除了骏马以外，就是同样地、逐字逐句地画出了伊里亚·伊里奇对于家庭生活的理想。甚至连奥勃洛莫夫都没有忘却黑眼睛白皮肤美人的亲吻。

“一个农家女子，”伊里亚·伊里奇这样梦想着，“她有晒得黑黑的脖子，裸露着的臂肘，羞怯、低垂、却又是狡猾的眼睛，表面上看去，这好象是在提防主人的抚弄，可是实际上却感到一种幸福。……但是……上帝保佑，别给太太看见才好！（奥勃洛莫夫想象他已经结过婚了）……”

倘使伊里亚·伊里奇不是因为懒于离开彼得堡，真的回到了乡村里，他一定会尝试去实现那久已向往的田园生活。一般说来，奥勃洛莫夫们是都神往于田园生活，神往于一种没有什么要求的无为幸福的：“使我高兴一下，这就够了。”他们这样说。……彼巧林比较起来算是有点生气的，可是连他也以为：所谓幸福也许就在于安静和舒畅地休息。他在他的笔记的一个地方，曾经把自己跟一个为饥饿所折磨的人比拟，这个人“疲惫

① 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四章第三十八节。

不堪地睡过去了，于是看见在他的面前摆着丰盛珍美的肴饌和沸腾起泡的美酒；他喜出望外地吞完了这些想象出来的虚幻的赠物，他似乎觉得轻快一点了。……可是一经苏醒过来，幻梦就立即消失了，只剩下加倍的饥饿和绝望。”……彼巧林又在另一地方，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走上那条命运为我所开辟的道路呢，宁静的欢乐和灵魂的安宁在哪儿等着我呢？”他自己以为，——这是因为“他的灵魂已经习惯于暴风雨，正在渴望着热烈的活动。”……然而他是常常不满意自己的努力的，他自己老是这样说，他所以会想出这一切令人嫌恶的放荡行为，只不过因为他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来。……就因为找不到什么事情可以干，结果就什么都没有干，什么都不能使他满意，这样他爱好无为，就更甚于活动了。……这也是一种奥勃洛莫夫性格……

对人的态度，特别是对待女人的态度，在所有的奥勃洛莫夫中，也有一些共通的特点。他们总是因为人们的渺小的劳动，人们的偏狭的见解以及目光浅短的企求，而轻视着他们。“这些都是做粗工的。”——甚而至于他们之中最有人道主义的别尔托夫，都这样毫不在乎地表示。罗亭也天真地把自己想象做一个谁也没有能力来理解的天才。彼巧林不消说，他要把每一个人都放在脚下践踏。甚至奥涅金，也在两句诗中这么想，这诗句说：

凡是生活过而且思想过的人
他就不能不从心底轻蔑人。①

甚至连那个性情温和的田吉特尼柯夫，当他走进办公厅的时候，都会感觉“好象他犯了什么过失，把他从高等阶级贬降到

① 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第四十六节。

了“下等阶级去似的”；而等到回到了乡村里，他也象奥涅金和奥勃洛莫夫一样，立刻设法跟一切急于要和他结交的邻人断绝了来往。我们的伊里亚·伊里奇在轻视人们这一点上，也不输于任何人：这对于他是这样轻松，甚至什么力气都不必花费。在查哈尔的面前，他自满地把自己跟“别人”作了一个对比；他在同朋友们的谈话中，也表示了一种天真的惊奇，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劳累自己，强制自己去办公，写字，留心报纸，参加社交生活等等呢。他甚至非常直率地告诉斯托尔兹，他知道自己比一切人都优秀：

“他们说生活是在社会里吗？好一个生活！你在那里找寻些什么？理智的乐趣呢，还是心灵的？你瞧，哪儿是一切东西环绕着它而旋转的中心呀：没有，没有什么深刻的能够打动人们心灵的东西。这些在人世上出头露面的人物，比我更糟，他们全都是死人，全都是昏睡不醒的人！……”

于是伊里亚·伊里奇就滔滔不绝地、雄辩地谈论着罗亭也会这样谈论的题目。

一切奥勃洛莫夫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也都要弄出可耻的样子来。他们简直就不会恋爱，而且也不知道在爱情中可以找寻一些什么，正象他们平常在生活中一样。当他们把女人当做依靠弹簧而动作的玩偶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拒绝去诱惑她们的，他们是不会拒绝去奴役一个女人的心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是非常符合他们的贵族性格的呀！然而只要事情稍微发展得严重一点，只要他们稍微怀疑到在他们面前的，实在并不是什么玩偶，而是也可以向他们要求尊敬自己的权利的女人，——那么他们就立刻变而为可耻的逃跑了。这一切先生都有过度的胆怯病！奥涅金，“他很早就会挑逗名门多情女子的芳

心”了，奥涅金对于这些女人，“找到了她们时没有什么狂喜，丢弃了她们时也没有什么怜惜”，——可是在塔姬雅娜的面前，就显出了畏缩不前，第二次又是这样畏缩了，——一次是在他从她那里得到了教训的时候，一次是在他自己给她以教训的时候。他显然一开头，就爱上了她，假使她爱他并不怎样严肃，他也不会让自己用严厉的道德教师的口吻对她说话了。可是他却看出，开玩笑是危险的，因此就开始絮述他的衰惫的生活，絮述他的拙劣的性格，絮述她将来会爱起别的什么人来，等等。后来，他自己这样解释他的行为：“他在塔姬雅娜身上发现了柔情的火花，但他不敢相信它，”同时——

他又不愿意丧失
自己的卑微的自由。①

他是用怎样的辞句来掩盖自己的卑怯！

别尔托夫对于克鲁齐菲尔斯卡雅②，大家都知道，他也不敢进行到底，反而从她那里逃了开去，虽然他是根据了完全不同的理由——假使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至于罗亭——当娜塔丽雅要求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决心的时候，他就完全手足无措了。除了劝告她“忍从”之外，就什么都不会做。第二天，他又在信中向她明智地解释，说他“还不习惯”和象她这样的女性相处。彼巧林也是这样的，他在博得女子的欢心方面是一个专家，他承认世界上除了女性之外，他是什么都不爱的，为了女人，他准备奉献世界

① 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奥涅金给塔姬雅娜的信，普希金的原诗是：

……我不愿意丧失
我的卑微的自由。

② 赫尔岑的《谁之罪？》中的人物。

上所有的东西。但他却又承认：首先，他“不会喜欢一个有性格的女子；性格关她们什么事呢！”其次，他永远不会结婚。

“我无论怎么热情地爱一个女子，”他说，“然而只要她使我这样感觉：我应该娶她——那么去它的吧，这种恋爱。我的心会变得石头一样，没有什么东西再可以把它重新燃烧起来。我准备贡献一切，只除了这个；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甚至于名誉，作二十次的打赌，可是我决不出卖我的自由。为什么我要这样珍重它？为什么我需要它呢？为什么我要给自己这样预备呢？对于将来我等待着什么呢？绝对没有什么。这只是一种天生的恐惧，一种不可理解的预兆，”等等。

而在本质上，这左右不过是一种奥勃洛莫夫性格。

那末，伊里亚·伊里奇，你们以为就他说来，他的内部就没有彼巧林与罗亭的成份，就不用奥涅金的腔调说话吗？他也有这种成份的，而且多的是！例如吧，他也象彼巧林一样，要想占有一个女人，要想强迫她作种种牺牲来证明她的爱情。看出没有？在最初时候他就不曾指望奥尔迦竟会嫁给他的，所以他抱着胆怯的心情求她做他的妻子。但她却这样告诉他，他早应该这样做了。他就弄得狼狈起来，开始有点不满意奥尔迦的允诺了，他就——你怎么想呢？……他就开始去试探她，她爱他到底到了怎样的程度，配得上做他的爱人吗！当她告诉他，永远不走那一条路^①时，他就立刻有点不自在了；不过后来她的解释以及

① 奥勃洛莫夫由于一种“自尊心”的要求，希望得到奥尔迦忘我的牺牲，以此使自己陶醉，他就对她说：另外还有一条通幸福的道路。这道路，他解释就是要女子牺牲一切的路：安静、公理、尊敬，而在恋爱中去找寻报酬。……奥尔迦却回答：完全不是这样，可以不走这条路，而爱得更深。

热烈的场面却又安慰了他。……然而到了临末，他又变得胆怯起来了，甚至不敢在奥尔迦跟前露面，装作有病，借口桥已经撤去，让奥尔迦明白，她可能连累他，等等。这一切都为了什么呢？——都为了她要求他下决心，要求他去工作，要求他去做那些还不曾习惯的事情。结婚本身还没有使他害怕得象彼巧林和罗亭那样厉害；因为他有一种更其厉害的封建宗法的习惯。然而奥尔迦却要他在婚前把产业安排好；这简直就是一种牺牲，当然他不会去完成这种牺牲，而是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奥勃洛莫夫。可是他自己对于别人却是非常严格的。他对奥尔迦玩了一个彼巧林在当时也会这样玩的花巧。他觉得自己并不怎样漂亮，而且没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吸引奥尔迦强烈地爱着他。于是他开始痛苦了，通夜不睡，最后，他就积聚所有的毅力，匆促地写给了奥尔迦一封罗亭式的书信，在这封信里他重复着奥涅金对塔姬雅娜，罗亭对娜塔丽雅，甚至彼巧林对曼丽公爵小姐所说的那套熟悉的、老朽的、陈腐的东西，他说：“我，就是那个不是生来就能够使您跟我幸福生活的人；过了一阵时候，您就会爱上别的、更有价值的人的。”

年轻的姑娘三番四复地
用幻想来替换轻浮的幻想……
您应该重新再去爱；然而……
您要学会控制自己；
不是每个人了解您，都象我一样……
没有经验结果就要使您不幸。①

一切奥勃洛莫夫都喜欢自轻自贱；然而他们所以这样做的

① 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四章第十六节。

目的，是在满足于自己被人家所诘难，听一听那些——他们曾经在这些人的面前把自己痛骂过一番的人的赞许。他们满足于自己的自轻自贱，他们大家都象底克索夫^①所谈论的罗亭：“他开始叱骂自己，身上滚满了泥泞，——于是，你就以为，现在他再也没有脸在世界上见人了。哪儿有这种事！他甚至还觉得高兴呢，好象痛喝了一杯苦味的伏特卡似的！”奥涅金也是这样骂了一通自己之后，就在塔姬雅娜面前，渲染着自己的宽宏的。写过一封斥骂自己的信给奥尔迦的奥勃洛莫夫，他也是这样的，他感觉，“他已经不再感到沉重了，他几乎是幸福起来了。”……他用象奥涅金曾经说过的那套道德的说教，来结束这封信：“您跟我的事情，”他说，“可以作为将来您正常恋爱中的指导，”等等。伊里亚·伊里奇当然忍受不住让自己在奥尔迦面前一直自卑到底的：他要奔过去瞧，这封信到底在她身上惹起了怎样的印象，他一看到，她正在那里哭泣，他就高兴起来了——而且不能抑制自己不在这个紧张的时刻在她的面前出现。但她却向他指出，他在这封“为了关怀她的幸福”而写的信中，暴露了多么可耻而又可怜的自私。于是，就象一切奥勃洛莫夫碰到了在性格上、在发展上都比他们强的女子时一定所做的那样，他也完全泄气了。

“可是，”有深刻思想的人们会叫道，“在您的对比中，虽然选择了一些看来是同样的事实，但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给一种性格下定义时，外表的现象可远没有推动人们去做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动机来得重要。问题既然牵涉到了动机，那末在奥勃洛莫夫的行为与彼巧林、罗亭以及其他人们的活动方式之间，怎么不能看出巨大的差别来呢？……奥勃洛莫夫无论做什么，都

^① 《罗亭》中的人物。

是由于惰性，因为他懒于自己移动，当有什么人拉扯他的时候，他就死命的撑拒着；他的整个目的，就在使他的手指不要多余地动一动。然而其余的人，却都给想活动的渴望所磨折，他们狂热地进行一切，他们常常给

不安所笼罩，

竭力想变换一下环境……①

又给其他种种性格坚强征象的病痛所困扰。假如他们没有做出什么真正有益的事情来，那只是因为找不到适合他们能力的活动。按照彼巧林的说法，他们都好象是被束缚在办公桌上，命定要抄写文件的天才。他们超出于包围着他们的现实之上，因此他们有权轻视生活和人们。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对事物的现存秩序在相反意义上的否定；可是奥勃洛莫夫的生活，却是被动地受已经存在的影响所支配的，他对于一切变革都表示保守性的嫌恶，在性格上完全缺乏内在的反应。怎么可以把他和那些人相比呢？……把罗亭和奥勃洛莫夫相提并论！……责难彼巧林也象伊里亚·伊里奇同样陷在卑微琐碎里！……这完全不可理解，这是愚鲁，——这是罪恶！……”

啊，我的天！真的，——我们似乎忘记了，对付这些有深刻思想的人，必须尖着耳朵；他们的确会弄出您做梦也想不到的结论来的。假如你打算去游泳，那末深思明察的人们就会背着他那被捆扎着的双手，站在河岸上，夸耀他游得非常出色，而且发誓，当您快要沉没的时候，一定来救你，——这时候您不能说：“可是，亲爱的朋友，您的手是缚着呀；您要操心的首先就是，

① 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第八节。

给您自己把手解开来。”你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那个深思明察的人，会立刻勃然大怒起来：“啊，你们断定我不能游泳！你们称赞那个把我的手缚起来的人！你们不同情那个来援救落水沉没者的人吗！……”就这样一直发挥下去。……深思明察的人们总是能言善辩的，而且在构想出人意料结论上面，总是层出不穷的。……你看就是现在，他们也会立刻得出结论说，我们是要把奥勃洛莫夫放得比彼巧林和罗亭还要高，我们是要辩护他的懒惰，我们看不出在奥勃洛莫夫以及前述人物之间，有着内在的、根本的区别，等等。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向这些深思明察的人进行解释。

就我们已经说过的一切说来，我们对于奥勃洛莫夫性格，比对于奥勃洛莫夫以及其他人物的个性还要注意。谈到个性方面，我们自然不能不看出气质上的差别，例如，彼巧林与奥勃洛莫夫是有差别的，我们同样也可以在彼巧林与奥涅金之间，在罗亭与别尔托夫之间，找出差别来……谁会来争辩人们之间是存在着个性上的差别呢（虽然，或许可以说，还远不是通常所推想的那种程度，那种意义）。然而问题是在这里，沉重地压在这些人物身上的，都是同样的奥勃洛莫夫性格，这种奥勃洛莫夫性格，在他们身上烙印下了懒惰、寄生、在世界上毫无用处这些难以磨灭的记号。这是很可能的，在别的生活条件下，在别的社会中，奥涅金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善良的青年，彼巧林和罗亭可能完成伟大的功勋，别尔托夫也可能变成一个真正优秀的人。然而，在别的发展条件底下，可能连奥勃洛莫夫和田吉特尼柯夫也不会变成那样懒惰的人，也会替自己找出什么有益处的工作来的……问题是在这里，现在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徒劳无功地追求活动，认为他们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做出来。……在这方面，他们都是惊人地相象的。

“我过去的全部生活，都在记忆中掠过去，我不由得要问自己：我活着，为的什么？我生下来，为的是什么样的目的？……自然，目的是一定有过的，而且自然，赋予我的，一定是一种伟大的使命，因为我在我的灵魂里感到了一种无穷的力量。可是我猜不到这种使命，我给空幻而徒劳无益的情欲这个钓饵所慑住了；在它们这个熔炉里，我已经被锻炼得又硬又冷，好象一块铁，然而我却永远丧失了向往于崇高目标的热情，——人生最美丽的花朵。”

这就是彼巧林……底下是罗亭怎样描写他自己：

“是的，自然给了我很多东西；然而我直到死，不会完成一件值得我的能力去做的事，不会给自己留下一些可贵的痕迹。我的全部财富都要无缘无故地浪费掉；我看不到我播下种子的果实。……”

伊里亚·伊里奇也没有落在其余的人的后面：他也是——

“痛苦地感觉到，有一种好的辉煌的元素埋在他的里面，好象埋在坟墓里似的，也许，现在已经死了，或者呢，它是象深山里所蕴藏的黄金那样地躺着，这黄金早就到了应该制成通货的时候了。然而这宝物却被脏物和堆积着的尘芥所深深地沉重地掩埋起来。仿佛有什么人把世界和人生赠给他的宝藏偷了去，然后再把它深埋在他的心底里。”

你看吧——宝藏就埋在他的天性里，只是他永远不能在世

界面前，把它们打开来。他那些比他年轻的兄弟们，

却都在世界上漫游着，
给自己找寻伟大的事业，
托福着有财势父亲的遗产
摆脱了最微小的劳动……①

奥勃洛莫夫在年轻时代，也梦想着“要在还有力量的时候，去供职服务，因为俄国为了采掘永无穷尽的资源，正需要许多手和头脑……”就是现在，他也“很能理解一般人的悲哀，而且善于体会崇高思想的愉快，虽然，他不能在这世界上找到伟大的工作，可是他还是幻想着全世界性的活动，还是轻蔑地来看那些出卖劳力的人，他热情地叫道：

不，我不愿意把我的心灵
浪费在人们蚂蚁似的工作上……②

他并不比其余一些奥勃洛莫夫兄弟更为懒惰；只不过他比较更公开些，——他甚至在社交场合的谈话，以及顺着涅瓦大街的散步中，也并不努力掩藏自己的懒惰。

然而奥勃洛莫夫以及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人物使我们所产生的印象，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区别呢？那些人，我们觉得都是受不利环境所压抑的各种不同的坚强性格，可是这一位却是一个懒汉，这种懒汉就是在最好的环境之下，也是什么事都做不成的。

① 引自涅克拉索夫(Н. А. Некрасов)的长诗《萨莎》第四章(字句略有出入)。

② 引自《萨莎》第四章。

但第一，——这是因为奥勃洛莫夫的气质实在太萎靡了，因此，很自然的，他在实现自己的企图以及反抗敌对的环境上所作的尝试，要比容易冲动的奥涅金和肝火旺盛的彼巧林来得少。但在本质上，当他们面向着真正而又严肃的活动时，他们总是在充满敌意的环境的力量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总是沉没在虚无琐碎里。奥勃洛莫夫的周围事物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给他开辟出一片顺利的活动天地呢？他有一笔可以由他来安排的产业；他有一个召唤他从事实际活动的朋友；他有一个性格毅力和看法明晰都超过他，温柔地爱着他的女子……可是，你说吧，在奥勃洛莫夫们中间，谁没有这一切呢，凭这一切，大家又做出些什么来呢？连奥涅金，连田吉特尼柯夫都管理过产业，而且关于田吉特尼柯夫，农民最初甚至还这样说呢：“眼光好尖利呵！”然而这同一个农民，却很快就理会到，他们的主人开头虽然活跃了一阵，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都没有，什么用处都没有的……至于友谊呢？他们大家对于朋友又做了些什么呢？奥涅金杀死了林斯基^①；彼巧林常常同瓦尔纳^②争论；罗亭把列兹尧夫从自己身边推开去，而且不去利用波柯尔斯基的友谊……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在一生中所碰到的波柯尔斯基似的人们难道还在少数？……他们做了些什么？有没有为了共同的事业把彼此团结起来，有没有为了防卫敌对环境的压迫，把他们组成一个紧密的联盟？什么都没有……一切都象灰烬一样飞散掉，一切都以老一套的奥勃洛莫夫性格来终结。关于恋爱，那更不用说了。每一个奥勃洛莫夫碰到了比他自己更高明的女子（克鲁齐菲尔斯卡雅是高于别尔托夫的，甚至公爵小姐曼丽也还是高出于彼巧林的）时，就可

① 林斯基，奥涅金的好朋友，后来为了不满意奥涅金挑逗他的爱人，忿而决斗，被奥涅金打死。

② 瓦尔纳，彼巧林的朋友，他是医生。

耻地逃避了她的爱情，或者努力做到使她自己来把他赶跑……假如不是因为可鄙的奥勃洛莫夫性格压迫着他们，这一点怎么解释呢？

除了气质上的差别以外，在奥勃洛莫夫和其他人物的年岁上，也有巨大的差别。我们这里并不是说一般的年龄，他们几乎都是同年的，罗亭甚至比奥勃洛莫夫还大三岁哩；我们是说他们出现的时期。奥勃洛莫夫出现在最晚的时期，因此，他对于青年一代人、对于现代生活来说，就似乎要比以前同样年龄的奥勃洛莫夫们远来得老些……他在大学里的时候，正当十七、八岁，他也深深地充满那种憧憬，也给罗亭在三十五岁时感到鼓舞的思想所打动。经过这种感染以后，对于他，就只有两条路：或者是活动，真正的活动，——不是舌头，而是头脑、心、手连在一起；或者简直就束手躺着。他的冷淡的性格却把他引到后面一条路上去：这虽然是一条可耻的路，但至少，这里没有说谎与欺骗。假使他，也象他的兄弟们一样，把他只敢幻想的事情，高声地说出来，那末他每天都会体验到好象他在接到村长的来信，以及房东的通知——要他让出房屋时所体验到的那种烦恼。从前，大家都以敬爱虔诚的态度来倾听雄辩家怎样谈论某一种必要性，谈论崇高的追求等等。在那时候，说不定，连奥勃洛莫夫都不会厌烦去说的。……然而现在每一个雄辩家和梦想家却都碰到了这样的要求：“您试一下不是更好？”这就不是奥勃洛莫夫们有能力可以担当的了……

的确，——人们在读完了《奥勃洛莫夫》，来思索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个典型在文学中出现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新生活的微风。这不能单单归功于作者的个人才能和他的视野的阔大。我们就在那些创造了上面已经引述过的过去典型人物的作家身上，

也可以找到这种天才的力量，以及最宽广、最人道的看法。但重要的是，从他们中间的第一个——奥涅金出现以来，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时候，这还只是在萌芽状态中，这还只是朦胧不明的片言断句，嚯嚯低语，但现在却已经采取确定而强固的形式，公开而大声地诉说出来了。辞句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在社会本身之中，已经出现了对于真正工作的要求。别尔托夫和罗亭——这些怀着真正崇高而尊贵意向的人，非但没有体会到有跟压迫着他们的环境作残酷、誓死斗争的必要，甚至还不肯想象这种斗争有迫近的可能。他们走进了一座郁苍茂密、人所不知的森林里，他们走到了一个泥泞而危险的池沼上，看到了在他们的脚下，正有各式各样的爬虫和大蛇，他们就攀登了树木，——这样做，一方面是要观察一下，能不能在什么地方发现一条路，一方面也是休息一下，至少可以暂时避免陷到泥潭里去或者被螫刺的危险。跟随在他们后面的人们，一心期待着他们说话，把他们当作一群先驱者，满怀着敬意注视着他们。然而这些先进的人物从他们所攀登的高处，什么也没有看到：森林是太广大，太茂密了。但就在他们攀援上树的时候，他们却擦破了自己的脸孔，擦伤了自己的脚，钩坏了自己的手。……他们痛苦，他们疲累不堪，他们在树上找到了一个比较算是舒服一点的地方，必须休息一下。虽然，他们没有替公共福利做出点什么来，而且又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说；站在下面的人们，必须不依靠他们的帮助，自己给自己斩伐出和清除出一条道路来。然而谁又忍心向这班不幸的人们，投掷一块石头，使他们从高处跌下来？——他们是心存公共的福利，历尽艰辛，然后才在那里栖息下来的。人们会同情他们，甚至并不要求他们来参加清除森林的工作；因为落在他们身上的，是另外一种工作，他们已经把它完成了。假如什么结果都没有得到，——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过

去，每一个作家，都从这一观点来观察他的奥勃洛莫夫式的人物，这是不错的。而且这里我们还得加上这事实，全体的旅行者，对于从森林里可以找出一条什么出路来的希望，是长久地在心里保持着的，同样，他们对于那些攀援上树的先进者有远大眼光的确信，也是长久都没有消失的。然而，事情渐渐变得更明白了，它起了另外一种变化：先进的人们终于对树木发生了爱好；他们娓娓动听地讨论着脱出沼泽和森林的途径和方法；他们甚至还在树上找到了一些果子，就在那里享用起来，而把果皮抛到了下面；他们又招呼了几个从人群中选出来的什么人攀登到他们那里去，这些人上去之后，也停留在树上，不再去探索道路，只顾贪吃果子。这个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奥勃洛莫夫了。……可是那些不幸的旅行者，却仍旧站在下面，辗转在泥沼里，大蛇咬啮着他们，爬虫威胁着他们，树枝鞭打着他们的脸孔……最后，这一群人决定大家动手干，还要把不久才爬上树去的人叫回来；可是奥勃洛莫夫们却一声都不响，只管大嚼果子。于是这一群人就转向这些以前的先进者，请求他们下来，给共同工作以帮助。然而这些先进分子却还是重复着过去的老调子：寻出路来是必要的，要清除出一条道路来，却没有什么用处。——到这时候，这些可怜的旅行者就看清了自己的错误，于是把手一挥，说：“嘿，你们全都是奥勃洛莫夫！”接着他们就开始勤奋地、不知疲倦地工作了。……砍倒树木，用树木在沼泽上架起了桥，开拓了一条小路，杀死了爬过来的大蛇和爬虫，不再留心这些聪明睿智、这些有坚强性格的人，这些以前大家寄予希望、无限钦佩着的彼巧林们与罗亭们。奥勃洛莫夫们开初平静地注视着大家的行动，然而后来，照他们向来的习惯，终于胆怯起来了，开始叫喊。……“啊，啊，——别做这种事，停止呀！”当他们看到自己坐着的树也要被砍倒时，就这样叫喊起来。“不要这样，我们要

被弄死的，接着那些美丽的思想，那些崇高的感情，那些人道的倾向，那种雄辩，那种激动，那种对于一切美丽而高贵事物的爱，那些一直活在我们心里的东西，都要跟着我们同归于尽……停住，停住！你们在干些什么？”然而这种美丽的辞句，旅行者已经听过一千遍了，所以并不对他们注意，还是继续工作。奥勃洛莫夫们这时候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挽救自己和自己的名誉：从树上爬下来，跟别人一起工作。然而他们按照向来的习惯，还是茫然的，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好。……“为什么这样突如其来呢？”他们在绝望之余，重复着说，一面继续向那些已经对他们失去敬仰的愚鲁的群众，投掷毫无结果的咒骂。

可是群众是对的！如果他们已经认识了实际工作的必要，那么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彼巧林，还是奥勃洛莫夫，对于他们全都是一样的。我们这里并非又在说：彼巧林在特定的环境中，会跟奥勃洛莫夫做得一模一样；他在这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会朝另一方向发展。然而这些强大天才所创造的典型，是有永久性的：就在现在，还生存着许多仿佛跟奥涅金、彼巧林、罗亭以及其他人物同一面型的人物，而且他们并没有变得这种样子：有可能在其他环境下去发展；而正是被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所描写的那种样子。不过在公众的心目里，他们却越来越变得是奥勃洛莫夫了。不能说，这种变化已经完成；不是的，就在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谈话中消磨着光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把谈话当做事业。然而冈察罗夫所创造的奥勃洛莫夫这个典型，却已经证明了这种变化正在开始。倘使现在，对于这一切过去赞美过的 quasi-天才性格^① 是毫无价值的这种认识，连社会上的少数人都还没有成熟，这种典型的出现，就是不可能的。从前

^① 法文：假的（天才性格）。

他们用各色外套掩藏着自己，以各种头发式样把自己装扮起来，以各种才能吸引着别人。然而现在奥勃洛莫夫在我们的面前，已经是一个被除去装饰，恢复本色，沉默寡言，从一个美丽的高台移到柔软的沙发上，代替外套，只穿一件宽大的睡衣的人了。现在这些问题：“他在干什么？”“他的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在哪里？”——已经被直截了当的提了出来，不为任何枝节问题所阻挠。这是因为现在从事社会活动的时代已经来到了，或者立刻就要来到了。……这就是我们在本文开端时所以说，我们在冈察罗夫的长篇小说中，看到了时代征兆的理由。

真的，请看，人们对于那些有教养而且能言善辩，先前奉之为真正的社会活动家的懒汉，在观点方面，起了怎么样的改变。

例如吧，在你的面前，现在有一个青年人，他非常漂亮、灵敏、有教养。他进出上流社会，在上流社会里得到成功；他驱车到剧院，参加舞会或是假面舞会；他穿得高贵，吃得讲究；他念书，而且写得很有条理……他的心成天都给上流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事件所激荡着，可是他也有关于高尚问题的观念。他喜欢谈论热情，

谈论永久的成见，
和坟墓中命运的神秘……①

他有一些可敬的规章：他能够

以轻微的租税来替代
古来劳役的重担，②

① 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二章第十六节。

② 同上，第二章第四节。

他有时候，能够不去利用一个他所不喜欢的女孩子的无经验；还能够不给他的社交成就添上特殊的声价。他是这样高出包围着他的上流社会之上，意识到了它的空虚；他甚至能够撇下社会，驱车到乡村里去；可是就在那里，他也感到了烦闷，他不知道，该给自己找些什么工作。……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做，他就跟自己的朋友吵架，轻率地把这个朋友在决斗中杀死了。……过了几年，他又回到了社会里，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爱，先前他是拒绝过的，因为为了她，就势必要放弃他的放浪生活的自由。……你认出这个人是奥涅金。然而你仔细看下去：这却是奥勃洛莫夫。

在你的面前，现在出现另一个人，他有一个更加热情的灵魂，他有一种更加巨大的自尊心。这一个人好象天生就拥有一切在奥涅金说来，必须经过一番操心才能得到的素质。他并不在装饰和衣着上花心思：他没有这些，就已经是一个很体面的人了。他不需要斟酌辞句，也不需要以艳俗的知识来炫耀：没有这个，他的舌头就已经象剃刀一样。他毫不掩盖地蔑视着人们，他很了解他们的弱点；他真正懂得去攫取女人的心，不是短短的一瞬，而是长时期，往往还是亘古永久的。一切在他的道路上所碰到的东西，他都知道怎样去排除它们，或者去消灭它们。他只有一个不幸：他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他的心是空虚的，对一切东西都表示冷淡。他什么都经历过，他还在年轻时候，就对一切凡是金钱可以办到的享乐，感到了厌倦；他也讨厌世俗美女的爱情，因为它没有给他的心以什么东西；学问也使他发生厌烦，因为他看出，无论光荣，无论幸福，都不是依靠学问而存在的；最幸福的人——就是无知无识者，光荣只是一种侥幸；战争冒险也很快就使他腻烦，因为他在其中看不出什么意义，因此他很快就对它习惯起来。最后，甚至那个真诚而纯洁的、他自己也喜欢着的

女孩子,也使他感到了厌倦:因为他在她身上也找不到能够满足他的激情的东西。然而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激情呢?它们要领着他到哪里去呢?为什么他不把他的灵魂的全部力量都奉献给它们呢?这是因为他自己也并不了解它们,而且,他也不肯烦劳自己去考虑,应该把他的灵魂的力量往哪儿发挥;因此他就在嘲弄笨汉,扰乱没有经验的姑娘的心,干涉别人的恋爱事件,在惹起争吵,在对于琐碎小事表示勇敢,在没有必要的争斗中,打发着他的生活了。……你记起了,这是彼巧林的历史,你记起了他自己也曾以一部分简直是同样的语句,向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①解释过自己的性格。……请仔细地审视一下:就在这个人身上,你也看得出这是同样的奥勃洛莫夫……

可是这里又有一个人,他是更加自觉地走着自己的道路的。他不但明白,他禀赋着许多能力,而且还知道他有一个崇高的目的。……可是甚至他,似乎也有点怀疑,这是什么样的目的,它位置在哪里。他是一个高贵、正直的人(虽则他常常不能偿付债款);他热烈地谈论着的不是那些琐碎的问题,而是崇高的问题;他保证,他准备为了人类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在他的头脑里,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一切事物都已经归入于一种活的、整然的关系里;他用自己的有力的言辞迷惑了那些无经验的青年,以致他们一听到他的话,就觉得这是号召他们去追求什么伟大的东西。……然而他的生命是怎样消耗的呢?是这样的,他一切事都做了个开始,却并不把它们结束,他的注意分散到四面八方,他热情地把自己奉献给一切事物——事实上却对什么都没有奉献。……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对他说,不管母亲的禁止,她是准备着归属于他的;可是他却回答:“老天!这样

^① 《当代英雄》中的人物。

说，你的母亲并没有同意！一个多么突然的打击！老天！多么快呵！……没有办法，——必须服从，”……他的全部生活就表现在这个真实的范例里……你已经知道，这是罗亭……不，现在连他也都是奥勃洛莫夫了。当你仔细观察这个人物，并且使他跟现代生活所要求的面面相对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这样确信的。

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在生活中，没有一种工作对于他们是真正必要的，是一种内心的神明、是一种宗教；也没有一种工作，是有机地跟他们一起成长，如果把它从他们那里夺去，也就是剥夺了他们的生命。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外在的，没有一种东西在他们的本性里生根。也许，当外界的需要强迫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会做出点什么来，如象奥勃洛莫夫到斯托尔兹拖他去的地方作客去，给奥尔迦买乐谱和书籍，并且阅读她强要他读的书本之类。然而他们的灵魂却并没有放进这个偶然落到他们身上来的工作里去。如果能够把一切他们应当通过自己的劳作才能获得的外部利益白白送给他们中每一个人，那末他们就会乐不可支地放弃自己的工作。由于这种奥勃洛莫夫性格，一个奥勃洛莫夫式的官员，假使不去办公也能保持他的薪俸，也能升官晋爵，就会不再上班去。一个战士，也要发誓不去抚摸武器，假如也能允许他有同样的条件，让他保持他的美丽的制服的话，因为这种制服在某种场合是很有用处的。教授也将停止讲解讲义，学生也要停止学习，作家也要抛弃著作事业，演员也不再在舞台上显身手，艺术家也会打碎雕刻刀和调色板，一味去高谈阔论，如果他们能够白白获得一切现在必须花劳动才能得到的东西的话。他们只是谈论着关于崇高的追求，关于道德责任的认识，关于对公共利益的体会，可是若要去考查一下，那末这一切总不过是言语加上言语而已。他们的最真挚、最赤诚的热望，就是在追求安静、追求睡衣，他们的最大的活动，除了那

件可以掩盖自己的空虚和冷淡的可敬的睡衣(这种说法,并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之外,就没有别的。甚至那些最有教养、同时还是性格活泼、心地温和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也极容易放弃他们的思想和计划,很快就跟围绕着他们的现实相妥协,虽然,在言论上,他们还是不停地在说这种现实是卑鄙而且肮脏的。总之,他们所说和所幻想的一切,——对于他们都是格格不入的、皮相的;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只有一种梦,一种理想——一种最悠然自得的安静,一种无为主义,一种奥勃洛莫夫性格在生根。有许多人简直就想象不出,人可以凭着爱好而工作,可以凭着热情而工作。请读一下《经济导报》^①里这种说法吧,假如平均分配财富夺去了私人对于蓄积资本的刺激,那末大家都要因懒惰而饿死了……

实在的,这一切奥勃洛莫夫们,从来不曾把那些使他们如此感动的原则,化为血肉,从来不曾把这些原则引导到最后的结论,从来不曾达到这种境界:使言语变成工作,使原则跟灵魂的内部要求合在一起,消融在里面,成为推动人的唯一的动力。正因为这样,这些人就不断地说谎,正因为这样,在他们活动中的个别场合,就显得这样贫乏无力。正因为这样,对于他们,抽象的观念就比活的事实更值得尊重,一般的原则就比朴实的生活真理更来得重要。他们阅读那些有益的书籍,为的是要知道,写的是些什么;他们写出那些高雅的文章,为的是欣赏自己那套议论的逻辑结构;他们说出那些勇敢的东西,为的是倾听一下自己那套措辞的音调,并以此来博得听众的喝采。然而接下去的是什么呢,这一切阅读、书写、谈论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们或者是

① 《经济导报》(«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这是当时俄国的一种为资产阶级张目的经济杂志。

根本不想知道，或者是并不因此而觉得有多大的不安。他们不断地对你说：“你瞧，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你瞧，这就是我们所思想的，至于其余的东西，——人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可不关我们的事……”只要还没有见诸工作，他们总可以把这一套向听众大吹一通的，总可以这样自傲，说什么：我们到底在忙碌，在奔走，在谈话，在议论。类似罗亭的人们，在社会中的成就，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而且，更有甚者——他们还可以沉湎酒宴，追逐女色，谑浪谈笑，纵情剧场，而一面却使人相信，他们所以这样放纵，是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更广大的活动天地了。当时，连彼巧林，甚至奥涅金，都似乎是一个有着无限精神力量的人。然而现在，这一批英雄都退到后台去了，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意义，已经不再以他们的难解的哑谜，不再以他们和社会之间、他们的伟大力量 and 他们的无足轻重的工作之间那种神秘的不调和，来使我们迷惑了……

现在谜语已经揭晓，
现在给它找到了一个词。^①

这个词——就是奥勃洛莫夫性格。

假如现在我看见一个地主，他谈论着人类的权利以及发展个性的必要，——我从他的第一句话就知道，这是一个奥勃洛莫夫。

假如我碰到一个官吏，他抱怨着官厅事务的错综复杂和困难重重，他就是一个奥勃洛莫夫。

假如我听到一个军官在怨诉阅兵令人精疲力尽，同时放肆

① 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第二十五节。

地批评着慢步行进的毫无用处等等时，我就毫不怀疑地说他是一个奥勃洛莫夫。

当我在杂志上，读到了自由主义者对于贪污舞弊的攻击，以及由于我们久所期望、久所希冀的东西终于做到了，因而喜形于色时，——我就以为，这一切都是从奥勃洛莫夫卡写来的。

当我置身在有教养人们的圈子里，他们热烈地同情着人类的需要，并且多年以来，一直以不减的热诚絮谈着那些老一套（有时也是新鲜的）关于贿赂、关于压迫、关于各种各样枉法的逸话时，——我就不由得要感觉，我已经被搬移到老奥勃洛莫夫卡来了……

假如在这批人喧闹争辩的时候，去打断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说这样不行，那样不好；那末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就知道了。……如果向他们建议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他们就说：“为什么要这样突如其来呢？”他们一定这样说，因为奥勃洛莫夫们无法作其他回答……假如你继续同他们谈下去，问他们：您究竟打算怎么办呢？——他们就会拿罗亭回答娜塔丽雅的说法来回答你们：“怎么办？当然，服从命运。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深切知道，这是多么痛苦，多么沉重，多么难受，可是你自己判断一下……”等等。此外，你们再也不能从他们身上期待更多的东西了，因为在他们身上都铭刻着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印记。

最后，谁能够用那句果戈理那样梦寐以求的，而俄罗斯又是这样长久、这样焦躁地期待着雄伟有力的语句——“前进！”来推动他们从原地方动一步呢？到现在为止，不论在社会中，不论在文学中，还没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冈察罗夫虽然深切了解我们的奥勃洛莫夫性格，而且懂得怎样把它描绘给我们看，但是他却不能不对那种到现在为止还是在我们社会中强有力的普遍的误解，表示赞同；他决定埋葬掉奥勃洛莫夫性格，并且还

这种奥勃洛莫夫性格发表了一通墓前悼辞。“永别了，古老的奥勃洛莫夫卡，你已经活完了你的时代，”他通过斯托尔兹的嘴，这样说，可是这说法是不真实的。全俄罗斯，曾经读过《奥勃洛莫夫》或者将要读它的人，他们不会同意这一点的。不，奥勃洛莫夫卡就是我们真正的祖国，她的支配者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者，她的三百个查哈尔，就是永远准备为我们而效劳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包含有奥勃洛莫夫的显著的部分，给我们写墓前悼辞，那还太早。下面几行关于我们以及伊里亚·伊里奇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在他的身上，有一种比一切智慧更要珍贵的东西：一颗正直、忠诚的心！这是他的天生的黄金；他带了它毫无损伤地经历了一生。他因为被推撞而摔倒，心冷下来了，最后，这个被打倒的、绝望的人，终于沉沉地睡着了，他已经失去了生活的力量，然而他并没有失去正直和忠诚。他的心没有发出过一个虚伪的音符，污垢也不能玷染它。随便怎么漂亮的谎话，都不能诱惑他，而且怎么也不能把他引上虚伪的路；任凭你整个污垢和邪恶的海洋，都在他的周围咆哮汹涌；任凭你全世界都中了毒，弄得七颠八倒，——奥勃洛莫夫永远不会向虚伪的木偶叩头，在他的灵魂里永远纯洁、光明、正直……这是一个水晶似的透明的灵魂；这样的人是少有的；这是人群中的真珠！你无论用什么东西都买不动他的心，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信赖他。”

我们打算再详细征引这种文句；不过每一个读者都会注意到，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很大的不真实。在奥勃洛莫夫的身上，的确，有一种好的成份：这就是，他从不打算去欺骗别人，但是这

也是他的懒惰性格的一种表现。倒要请问，在什么事情上可以信赖他呢？难道在什么事都不需要做的场合？在这方面，他的确是很出色的，没有人及得上他。然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没有他也可以呀。他并不向邪恶的偶像叩头！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懒得从沙发上站起来。假使把他一把拖起来，迫使他跪在这个偶像的面前：他就没有力量能够站起来了。他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动的。可是向他买什么东西呢？是买他从原来的地方动一动吗？不错，这的确是很难的。污垢不能沾染他！是的，只要他一个人躺着的时候，那还没有什么；可是只要塔伦季耶夫、查吉尔退、伊凡·马特维奇一到——呸！在奥勃洛莫夫的周围，就会立刻出现一些多么可厌的丑剧。他们吃光了他的，他们痛喝完了他的，他们迫使他也喝酒，又用一张捏造的期票勒逼他签了字（斯托尔兹为了这张期票，多少有点鲁莽地、按照俄国的习惯、不经过诉讼和追究，就使奥勃洛莫夫脱了干系），他们推说农民败坏了他的产业，他们无缘无故就从他那里强取大笔的金钱。他对于这一切都默默地忍受着，当然，这是因为他从来不发出一个虚伪的声音。

不，不能这样阿谀活着的人，我们还活着，我们仍旧还是以前的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性格从来不曾离弃过我们，甚至现在——在现在，当已经如此这般的时候^①，也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的文学家、杂志作家、有教养的人以及社会事业家，他们之中谁不同意，当冈察罗夫用下列几行文字来描写伊里亚·伊里奇时，正就是指他们而言：

① 杜勃罗留波夫这些话，是用来讽刺那些自由主义者对于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所进行的改革所发出的兴高彩烈的颂辞的。

他理解高尚思想的乐趣；对于全人类的痛苦，他也并非无动于衷。有的时候，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会为了人类的不幸而痛苦地哭泣，也会体味着一种暧昧不明的、莫可名状的苦难和忧郁，一种对于遥远的什么地方憧憬，对于可能就是斯托尔兹以前要引他前去的那个世界的憧憬。甜蜜的眼泪，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又有一些时候，他对人类的罪恶、对虚伪、对诽谤、对泛滥在世界上的邪恶，充满着憎恨，激起要把人们的创伤指给他们看的愿望，——而突然，在他的心里，也会燃起一些思想，这思想好象大海里的波浪，在他的头脑里起伏奔腾，后来，它们就成长成为一种企图，使他身体里所有的血，都燃烧了起来，——于是他的筋肉蠕动，血脉绽露，企图终于变化成为追求：为精神的力量所激励的他，在一分钟之内，迅速地改变了两三次姿势，张着发光的眼睛，从床上半坐起身子，伸出手，感动地看了一下周围……啊，看来，这种追求就要实现，就要成为丰功伟绩了……那时候，老天！从这种崇高的努力上，可以期待一些怎样的奇迹，怎样幸福的结果来呵！然而，你再看，早晨闪过去了，白昼已经偏向黄昏，奥勃洛莫夫疲劳的精力也跟着它趋向于平静：暴风雨和兴奋在他的灵魂里宁静下来，头脑也从思虑中清醒过来，在血管里的血也流得比较慢了。奥勃洛莫夫静静地并且深思地转过背，用忧郁的眼睛透过窗子，望着天空，悲伤地目送着太阳庄严灿烂地沉落在那一家四层楼房的后面。他伴送这样的落日，已经有过多多少少次了呵！

有教养而又高贵的读者，这不是很对吗——这不是忠实地描写着你们的善良的追求，以及你们的有益的活动吗？差别只在于，在你们的发展中，你们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阶段？伊里亚·伊

里奇达到了从床上坐起身，伸出手去，环顾一下周围。有的人还不能达到这么远；好象大海中的波涛，他们的思想只是在头脑里徘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另一些人的思想总算发展成为企图，然而却没有达到追求的阶段（这样的人比较少）；第三种人居然显露了追求（这已经是非常少的了）……

因此，遵循着现代的倾向，当整个文学，按照别涅奇克托夫^①先生的意见，就是以——

……散文和诗的铁链，
折磨着我们的肉体

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谦虚地承认，冈察罗夫君的赞扬，不论怎样满足我们的自尊心，可是我们不能承认它们是公正的。奥勃洛莫夫是比彼巧林和罗亭更少会引起朝气蓬勃、年轻能干的人们的激怒，然而他的虚无，还是令人嫌恶。

冈察罗夫君为了对他的时代表示他的敬意，就提出斯托尔兹作为奥勃洛莫夫的解毒药。但关于这个人，我们还得再一次重复我们常常在说的意见——就是文学不能跑在生活之前太远，斯托尔兹，这种拥有彻底而精力充沛的性格，在这种性格之下，一切思想立刻表现为追求，接着就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人们，还不曾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我们这里是说有理解高尚追求能力的有教养社会；至于在思想和追求只限于非常切近的、数目不多的事物上的群众，这样的人却是时常可以碰到的）。作者自己在谈论我们的社会时，也承认了这一点：

^① 别涅奇克托夫(В. Г. Бенедиктов, 1807—1873), 诗人。后面的诗句, 引自他的《现代的祈祷》。

“瞧，他们的眼睛终于从瞌睡中苏醒过来了，他们听到了活泼、阔大的步伐声，生气勃勃的话声。……应该出现多少起着俄国名字的斯托尔兹啊！”

他们应当出现很多，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然而现在还没有适合他们的土壤。就因为这样，我们从冈察罗夫君的长篇小说中只能看到，斯托尔兹是一个活动的人，他老是在忙着什么，在奔来跑去，在得到什么东西，说什么，生活就是劳动之类。可是他究竟在做些什么，他在别人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地方，究竟规划了一些什么正经的事情——这对我们却是一种秘密了。他一会儿为了伊里亚·伊里奇去整顿奥勃洛莫夫卡的产业；——怎样整顿的呢？这我们并不知道。他一会儿去毁掉伊里亚·伊里奇的假期票；——怎样弄的呢？这我们却是知道的。他跑到了伊凡·马特维奇的长官那里——奥勃洛莫夫就是把期票交给马特维奇的——他跟这位长官亲切地谈了一阵，——于是伊凡·马特维奇就被叫喊到长官那里去，不但命令他退还那张期票，甚至还勒令他离职。当然，这是他罪有应得的；然而，就从这一件事情看来，斯托尔兹还是没有达到俄国社会事业家的理想。而且也不可能这样：因为太早了。现在，——纵使你非常聪明，在引人注目的社会活动方面，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慈悲为怀的专卖商人穆拉索夫，拿一千万家产来充善举，或者做一个高雅的地主——康斯坦若格罗^①，——可是再下去就不成了。……我们不明白，斯托尔兹在他的活动中，对于一切连奥勃洛莫夫都征服过的追求和需要，怎么能够安之若素，怎么能够自满于他的地位，怎么能够

① 穆拉索夫和康斯坦若格罗都是《死魂灵》第二部的人物。

自安于他的孤独的、个别的、特殊的命运。……不应该忘记，在他的脚下是沼泽，古老的奥勃洛莫夫卡就在附近，要走到康庄大道去，要从奥勃洛莫夫性格中逃出来，就先得清除森林。斯托尔兹为了这一点做了什么没有，他做的是些什么，怎样做的——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不明白这一点，我们是无法满意于他的个性的。……我们只能说，“他并不是那个能够用俄罗斯灵魂所明白通晓的语言，向我们叫出‘前进！’这个雄伟有力词语的人。”

也许，奥尔迦·伊林斯卡雅对于进行这种事业，是比较斯托尔兹更有能力的，是比他更接近于我们的新生活的。对于冈察罗夫所创造的女性，无论是奥尔迦、无论是阿迦菲叶·马特威耶夫娜·普希尼春娜（甚至无论是也显出她们不同性格的阿尼西雅以及阿库林娜），我们都还没有说过什么，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完全无力对她们说出一些什么来。要分析冈察罗夫所创造的女性的典型，就要求他是一个对于女人的心有丰富知识的人。我们因为没有这一种品质，就只能一味的赞叹了。女士们都在说，冈察罗夫心理分析的忠实与精细是令人惊异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相信这些女士。……对于她们这种反应，我们不敢再添加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害怕会迷失在这个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国度里。然而我们还是得鼓起一点勇气，在文章结束的时候，就奥尔迦、并且就她对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关系，说几句话。

奥尔迦，就其发展来说，她是俄国艺术家在现代俄罗斯生活中，仅仅能够找到的最高的理想。就因为这样，她的逻辑的异常明彻和单纯，以及她的内心与意志的惊人和谐，就使我们震惊到至于要怀疑她的诗意的真实，而说，“不会有这一种女孩子的”了。然而，如果能够跟着她通过整个长篇小说，我们就可以发现，她永远忠实于自己以及自己的发展，她不是作者的警世格言，而是活的人，只是这样的人，我们还不曾碰到过。在她的身

上，比较斯托尔兹，可以看到更多的关于俄罗斯新生活的暗示；从她的身上，可以期待着能够把奥勃洛莫夫性格烧成灰烬，吹得四散的语句。……她从爱上奥勃洛莫夫开始，就信仰他，就相信他的精神是可以改变的。……她怀着热爱和温柔的关切长时期地、锲而不舍地为了刺激这个人的生命，唤醒这个人的活动而劳苦。她不愿相信，他是这样无力做什么好事；她珍爱着在他身上的她的希望，珍爱着她的未来的创造，她为了他，什么事都做了：甚至鄙弃那些因袭的礼节，什么人都不告诉，就单独去见他，而且并不象他一样，害怕丧失自己的令誉，然而，她立刻又以惊人的敏感，发现了他的性格里所表现的各式各样的虚伪，于是就非常直白地向他解释，怎样而且为什么这是虚伪，而不是真实。例如，他写给她一封信，这封信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了，后来，他又去说服她：他写这封信，纯粹是为了关切她，完全把自己忘记了，把自己牺牲了等等。“不，”她回答，“这不对：假使您只想着我的幸福，并且相信为了这种幸福，我们必须分手，那末您就会干脆离开，用不着预先写什么信给我。”他说，他害怕她会弄得不幸，如果现在她了解，她错看了他，她就会厌弃他，去爱上别人。为了回答这一点，她反问：“您又在哪里看出我的不幸呢？现在我爱您，我觉得很好；以后我要是去爱上别人，那末，我会觉得跟别人也很好。您为我烦恼，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一种思想上的率直和明彻，就是新生活的萌芽，而不是那种使当代社会在它的条件下得到成长的生活……可是后来，——奥尔迦的意志还是服从着她的内心！她不管局外人的不愉快、揶揄之类，还是继续她跟奥勃洛莫夫的友谊，仍旧爱着他，直到终于证实他是一堆彻头彻尾的尘芥为止。到得这时候，她就直率地告诉他，她错看了他，现在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跟他结合在一起了。但就在这种拒绝中，她还是称赞他，爱抚他，甚至后来也还是这样；然而她的行

动终于把他毁了，没有一个奥勃洛莫夫是曾经被女子所毁灭的。塔姬雅娜在诗体小说的结束时，对奥涅金这样说：

我爱你(为什么要装假?)

可是我已经给了别人

我就要永世对他忠诚……

这样，只因为外部的道德义务，才救她逃脱了这个空虚的花花公子；假使她是自由的，她就会扑上去围住他的脖子了。娜塔丽雅的抛弃罗亭，也只因为他在最初时候，就显得固执无情，而当她送他走的时候，她也只是证实他是不爱她的，于是为了这一点而深深地感到悲哀。关于彼巧林更不必多说了，他只得到了曼丽公爵小姐的怨恨。不，奥尔迦就不是这样对付奥勃洛莫夫的。她简单而直截地告诉他：

“我不久才知道，我爱过你里面的、我希望你有的、斯托尔兹曾经向我指出过的、我跟他曾经虚构过的东西。我爱过未来的奥勃洛莫夫！你宽宏、正直，伊里亚；你温柔……好象一头鸽子；你把头藏在翅膀底下——再也不想要什么了；你准备一生都在屋檐下面咕咕咕的叫喊……我可并不这样；我觉得这太少了，我还需要别的什么东西，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我却不知道！”

这样，她就离开了奥勃洛莫夫，她努力去追求她的什么东西，虽然，她还没有好好地了解它。她终于在斯托尔兹身上找到了它，跟他结合起来，幸福了；但就是在这里，她还是不肯停留下来，还是没有麻痹起来。还是有一些朦胧的问题和疑惑扰乱着

她，她还是在探索着什么东西。作者并没有在我们的面前，把她的激动完完全全的显示出来，我们在推断有关于它们的特征时，可能犯错误。然而我们却觉得在她的心灵和头脑里，是洋溢着一种新生活的思潮的，对于这种思潮，她比斯托尔兹更要无可比拟地接近。我们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下列对话中，发现了一些暗示：

“怎么办呢？屈服并且苦闷吗？”她问。

“没有什么可做的，”他说：“用坚毅和镇静把自己武装起来。我和你都不是泰坦神族^①，”他拥抱着她继续说：“我们不会追随在曼弗莱德和浮士德^②之后，对动荡不安的问题进行不顾一切的战斗，不会接受他们的挑战，而是低下头，顺从的熬过这个艰苦的时际，那末以后生活、幸福又会微笑起来了……”

“可是假使他们永远不放松我们：悲哀越来越扰乱我们呢？……”她问。

“那有什么？把它当作一种生活的新的要素，接受过来……可是不，这种事情是不会有，我们不可能有这种事！这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悲哀；这是人类的通病。你的身上也溅上了一点。……在一个人脱离了生活，——在一个人没有支柱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很可怕的。可是在我们……”

他没有把在我们这句话说完。……但很明白，他是不愿意

① 泰坦神族(Titans)，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奴斯与地神该亚的子孙。

② 曼弗莱德是拜伦诗剧《曼弗莱德》的主人公；浮士德是歌德长诗《浮士德》的主人公。

“跟动荡不安的问题进行战斗”的，他决定“顺从的低下头来”。……可是奥尔迦却准备进行这个斗争，她为了这个斗争而烦恼，并且常常恐惧，她跟斯托尔兹恬静的幸福不要也变成类似奥勃洛莫夫式的冷淡无情的那种东西。很明白，她是不愿意为了希望以后生活又会微笑起来，于是低下头，顺从地经历这种艰苦的时际的。当她不再相信奥勃洛莫夫的时候，她就舍弃了他；假使她不再信仰斯托尔兹了，她也会舍弃他的。这是可能发生的，如果问题和疑惑还是不停地折磨着她，而他还是继续向她忠告——把它们当作生活的新要素来接受，低下头来的话。她对于奥勃洛莫夫性格是太熟悉了，她能够从它的各种不同形态中，从各种不同的假面具下，把它辨别清楚，而且永远能够在自身找到对它发出无情批判的足够力量……

黑暗的王 国^①

(《亚·奥斯特罗夫斯基作品集》，两卷本，
一八五九年，圣彼得堡出版。)

一

这算是一种什么倾向？你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他们就已经写出一篇故事来了，——多少有点儿意义，倒也罢了……但是既经传播开去，可见，就一定有什么原因。

果戈理

没有一个当代俄国作家，在他的文学活动中，曾经遭遇到象奥斯特罗夫斯基这样奇怪的命运。他的第一部作品(《家庭幸福图》)完全没有得到什么人的注意，也没有在杂志中引起一句话——无论是对于剧作家的赞美，无论是责难。过了三年，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第二部作品：《自己人好算账》问世了；剧作家却得到了大家的欢迎，把他当作一个文学界簇新的人，而且立刻被公认为，这是一个有非凡才能的作家，这是果戈理之后俄国文学中

戏剧艺术的优秀代表。然而为了一些使普通的读者非常奇怪的、同时也使剧作家觉得非常遗憾的偶然性^②，这种偶然性是这样频繁地在我们贫乏的文学中重复着，——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不但并没有在戏院里上演，而且也没有在任何杂志上遇到详尽而严肃的批评^③。《自己人好算账》最初发表于《莫斯科人》^④，后来又印成单行本，可是文学批评却一声都不响。因此，这个喜剧在某一个时期，就象丢在水里似的，无声无息。过了一年，奥斯特罗夫斯基写成了新的喜剧：《穷新娘》。文艺批评方面，就对剧作家怀着敬意，常常称他是《自己人》的剧作家，甚至还指出，他们对于他的第一个喜剧，比起第二个，要付与更多这样的注意，第二部喜剧大家都认为要比第一部差。这以后，奥斯特罗夫斯基每一部新作品，都在杂志上引起一些波动，它们还立刻因此形成两种互相坚决对立的文学派别。一派是由《莫斯科人》少壮派编辑同人^⑤组成的，他们宣言，奥斯特罗夫斯基“以四个剧本

① 本文发表在一八五九年第七期以及第九期《现代人》上。署名为《Нбв》。

② 关于“偶然性”，杜勃罗留波夫是指《自己人好算账》最初要想上演，而被沙皇政府禁止的一件事。这本戏直到一八六一年才得公演。但剧本的结尾，已被勒令修改过了。

③ 《自己人好算账》是在一八四六年开始写的，至四九年完稿送检，直至一八五〇年才在《莫斯科人》第六期上发表，但在这以前它已经为许多人所周知了，因为奥斯特罗夫斯基曾经在好几个文学团体与沙龙中朗诵过这个剧本。

④ 《莫斯科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是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六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保守倾向的文学、历史、科学杂志。由历史学家波高琴（М. П. Погодин, 1800—1875）所主编，这杂志鼓吹“正教、专制精神以及国粹主义”的思想。反动作家谢维辽夫经常在这里发表文章，激烈攻讦别林斯基。由于内容的关系，这本杂志只有开头两三年获得一些成功，其后，销路就日益减缩，几至无人闻问，后来，虽因诱使奥斯特罗夫斯基加入，形式上稍稍作了一些改变，一度颇有起色，但因为这杂志实质上的限制，只支持到一八五六年，就停刊了。

⑤ 少壮派编辑同人是指以奥斯特罗夫斯基为中心的一个文学—戏剧集团，其中有阿波隆·格里高列耶夫、爱特尔森、亚尔马淑夫等人。《莫斯科人》在一八五〇年以后，由于杂志主编波高琴设法接近刚在文学中露头角的奥斯特罗夫斯基，怂恿他加入了编辑部，发表了他的剧作，这杂志就日有起色了。后来波高琴又进一步把艺术栏与文学批评栏交付与奥斯特罗夫斯基、阿波隆·格里高列耶夫和他们的朋友们负责，其余仍归波高琴自己，于是在《莫斯科人》的编辑，就有老少之分了。

创造了俄罗斯的人民戏剧”，他是一个——

诗人，他宣告了新的真理，
我们置身在新的世界里，
告诉了我们一个新词，
虽然他解释的是旧真理，——

这个为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描写的旧真理，比起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真理，是——

更简单，但却更可贵，
对于心灵能起良好的影响。①

这几行诗曾经在《莫斯科人》（一八五四年第四期）上发表，它是为了《贫非罪》这个剧本，特别是为了其中的一个人物——柳比姆·托尔卓夫而写的。对于这种古怪可笑的诗，从前已经有许多人嘲笑过了，但它们实在并不是什么诗人感情奔放的表现，而只是作为无条件歌颂奥斯特罗夫斯基所写每一行文字的那一派别——他们的批评意见的最忠实的表现。遗憾的是，这些意见时常表现得非常傲慢、暧昧、含糊，弄得那些反对派简直无法进入严肃的争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赞美者叫喊，他说出了新的词；可是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新词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却久久没有回答，直到后来才说，这个新词并不是别的，就

① 杜勃罗留波夫这里以及下面所摘引的诗句，都是从阿波隆·格里高列耶夫那首《艺术与真理》的诗中引来的。阿波隆·格里高列耶夫（Апрон Григорьев, 1822—1864）是一个“斯拉夫派”的诗人和批评家。他在文章中主张纯艺术的理论。

是——您怎么想呢？——就是民族性！但是这个“民族性”由于柳比姆·托尔卓夫的关系，是被这样生硬地拉上了舞台，是这样跟柳比姆结合起来，以至那些对奥斯特罗夫斯基不怀好意的批评家，不肯错过利用这个事实，向这些拙劣的赞美者伸出舌头，挖苦他们说：“那么你们的新词——就是在托尔卓夫，在柳比姆·托尔卓夫，在酒鬼托尔卓夫身上啦！酒鬼托尔卓夫——原来就是你们的理想”等等。自然，这种伸舌头，在严肃地谈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上，是并不十分合宜的；但是必须承认，——在读了下面这样几行关于柳比姆·托尔卓夫的诗以后，谁又能保持严肃的态度呢：

伟大的喜剧演员用血和肉
再现了诗人的生动形象……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一上来
就有股一致的电流贯穿过大家的心胸。
这就是为什么，
在戏院大厅的上上下下
所有的人都给一阵
热烈、真诚和亲切的兴奋所震动。
柳比姆·托尔卓夫抬起了头
神气活现地站在她的面前，
胡子乱蓬蓬，
披了件破旧大衣，
这个不幸的人，沉醉而憔悴，
可是他却有一个俄罗斯纯洁的灵魂。

这是喜剧吗，却当着我们而哭泣，

这是悲剧吗，却会跟着它一起笑起来，——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
赶快到戏院里去吧！人群正在往那儿挤，
那儿现在有亲切的生活，在你的灵魂里荡漾；
那儿有俄罗斯之歌，自由而嘹亮地奔流，
现在人们在那儿时而哭泣，时而欢笑，
那儿有整个的世界，美满而生气勃勃的世界。
我们这班朴实而温和的时代赤子，
从此不再恐惧，却为人类而欢乐：
心里充满着温暖，胸怀自由地呼吸，
柳比姆·托尔卓夫向我们的心灵这样直率地指出了道
路！（到哪儿去？）
大俄罗斯的生活在舞台上举行着盛会，
大俄罗斯的原则高奏着凯歌，
在奔放的叠句里，在欢乐的歌曲中，
洋溢着大俄罗斯语言的声音。
大俄罗斯的智慧，大俄罗斯的观念
好象伏尔加妈妈一样奔放、深广，
对我们这些给痛苦的欺骗弄得疲倦不堪的人，
它们是一种温暖、自由与享乐！……

在这几行诗以后，跟着就痛骂了一顿拉歇尔^①，痛骂那些对她表示赞美、暴露着奴性的盲目模仿精神的人。这首诗的作者叫嚷道：就让她是个有才气的人，就让她是个天才，——“可是她

① 拉歇尔(Rachel Élixa, 1821—1858)，法国著名戏剧女演员，她在法国古典悲剧的演技方面，是没有匹敌的。

的艺术是不适合我们的园地的！”他说，我们不象别的人，我们需要真理。于是这位批评诗的作家就趁这个可靠的机会，在下面这些诗句中，叫骂着欧洲和美国，赞美着俄罗斯：

让那老朽的欧罗巴，或者是
象老狗一样衰弱无力的
年事尚轻、齿牙已脱的美国满足于这种虚伪吧……
可是我们俄罗斯是坚强的！她有许多力量、情热；
俄罗斯爱好真理，上帝赏赐她
能够了解真理这个神圣的恩典；
一切使人类高尚起来的东西
现在只在她那里才能找到荫庇！……

毫无疑问，这一类关于托尔卓夫可以使人类高尚起来的欢呼，是无法引导到正常而公允地研究问题的。它们不过是给反对派的批评家一种公正的口实，让他们在议论关于柳比姆·托尔卓夫时，表示一种高贵的愤慨：

这就是某些人所说的新词，这就是他们认为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全部文学创造中最优美的花朵！为什么要对俄罗斯的文学施以这样粗鲁的谩骂呢？的确，俄罗斯文学还没有说出这样的词来，它从来也没有梦想过这样的主人公，可是这是因为，旧的文学传统在它里面还保持新鲜，这种传统是不允许这种趣味上的败坏的。只有当这种传统开始落到遗忘国里去的时候，柳比姆·托尔卓夫才能丑态百出地在舞台上出现……真使我们觉得奇怪，真使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什么托尔卓夫似的酒鬼形象，可以成为一种理想，人们

应当把这种形象当作诗篇里民族性最纯粹的表现而自满自傲，托尔卓夫应当作为衡量文学成就的尺度，并且在所谓他是我们的“自己人”，他“适宜于”我们的“园地”的借口下，迫使大家都来爱他！难道这不是趣味的败坏，不是把一切纯正的文学传统都置之脑后？可是现在究竟还是有所谓羞耻之心，还是有所谓文学的规范，它们虽然在优秀的文学传统湮没以后，还是能够留下来。为什么我们要侮辱自己，称托尔卓夫为“自己人”，把他抬高为我们诗的理想呢？（《祖国纪事》一八五四年第六期）

我们从《祖国纪事》中摘引这段文字，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责难者以及颂扬者之间的争吵，是要怎样经常给予奥斯特罗夫斯基许多损害^①。《祖国纪事》一直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敌对阵营，他们的攻击，大部分是针对着那些颂扬他的作品的批评家。剧作家自己，直到最近，直到《祖国纪事》宣告奥斯特罗夫斯基同格里哥罗维奇先生^②以及叶甫格尼雅·屠尔夫人^③一起——都已经走到了他们的诗的活动的尽头为止（见

① 但是，读者也许会觉得这样更为满意——他掠过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批评意见的整个始末，就从我们这篇论文的第二部分开始。我们所以要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批评家来当面对质，多分是为了让他们可以互相欣赏一下。——作者注

② 格里哥罗维奇(Д. В. Григорович, 1822—1899)，果戈理派的作家。由于《乡村》与《苦命人安东》这两部中篇小说，他出现在现实主义作家的队伍里，成为《现代人》的重要同人。但在后来的作品中，却对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抱着敌意。到得六十年代的开头，他就和《现代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表示了决裂。此后有长时期放弃文学活动。一直到八十年代，他又重新回到文学中来，写了一部描写卖艺孩子的悲惨命运的小说：《橡皮孩子》。

③ 叶甫格尼雅·屠尔夫人，这是莎里阿斯·特·屠尔涅米尔(Саллас де Турнемир, 1815—1892)的笔名。小说作家，以描写贵族式的“优雅动人”的恋爱见称。后来，也写过一些批评文字，激烈反对现实主义。

《祖国纪事》一八五九年第六期），一直袖手站在旁边。可是责难奥斯特罗夫斯基崇拜柳比姆·托尔卓夫，敌视欧洲文化，歌颂彼得以前的旧时代的全部重压，却还是照旧落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天才上面，盖上了一种迷信旧教，几乎就是蒙昧主义的阴影。他的保卫者虽然还是在谈论关于新词，——可是却不敢把它发出声来，——他们宣告，奥斯特罗夫斯基是现代第一个俄罗斯作家，因为他有一种特殊的世界观。……然而这种特殊性是什么东西形成的，他们解释得也很混乱。他们常常用例如下面这一类的文句来搪塞：

奥斯特罗夫斯基是现在这个文学时代，唯一有其坚实的、新的、同时又具有特殊色彩的理想世界观的人(!)，这种特色就是现在这个特定时代所产生的，或者也可以说，就是诗人本身气质所产生的。我们要一点都不踌躇，把这种特色称作是俄罗斯根本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健康而宁静，幽默而不带病态，直率而又不被某一种极端性所迷惑，而且最后，就理想主义的正确意义上说来，它正是最理想的东西，并没有虚伪的夸张或者是同样程度的虚伪的感伤(《莫斯科人》一八五三年第一期)①。

“他写得这样晦暗而且散漫。”②——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才能的特色，以及关于他在当代文学中的意义这些问题，却什么都没有解释。过了两年，这同一位批评家开始撰写有系统的论文：《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以及它们在文学和舞台中的意

① 这篇文章就是阿波隆·格里高列耶夫所写的，题为《一八五二年的俄国文学》。

②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诗句。

义》(《莫斯科人》一八五五年第三期),可是在第一篇论文上就停顿了下来,就在这里,也是夸张的议论和大胆的武断超过真正的事实^①。他非常粗鲁地表示,现在的批评,还够不上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才能,因此批评对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关系,就陷入了非常可笑的境地;他甚至还断言,对于《自己人》所以没有什么批评,就只因为在这个剧本里已经说出了新的词,批评家眼睛虽然看得见,可是牙齿却碰不到^②……使人看起来,好象这位论文的作者,不钻进抽象的思考里去,也能够正确了解批评家所以对《自己人》表示沉默的原因似的!……因此,这位批评家在提出他对奥斯特罗夫斯基见解的梗概后,就根据他的意见讲到,他在奥斯特罗夫斯基身上找到的那种才能的独创性表现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他的定义:“它,第一表现在剧作家所描写的新的生活风貌中,在他之前,没有什么人接触过这种生活,除了威尔特曼和路冈斯基^③(他们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优秀的先驱者!!)的一些散文以外;第二,表现在剧作家以新的态度对待他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中;第三,表现在新的描写方式中;第四,表现在语言的新鲜——表现在它的色彩丰富(!)、它的特殊性(?)中。”就是这一套。这位批评家并没有把这些原则加以解释。而在这篇论文的后面,他却又对那些批评家投掷出一些轻蔑的讥刺,他说,“这种生活(这就是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描写的)使他们觉得很辛辣,他的语言是辛辣的,他的典型也是辛辣的,——按他们自己的心绪来说这些都是辛辣的,”——这以后,批评家就什么都

① 这篇文章的第二篇被检查后禁止发表。

② 典出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与葡萄》。

③ 路冈斯基(或称路冈的哥萨克——Луганский казак),这是达里(В. И. Даль, 1801—1872)的笔名。作家,也是著名的《大俄罗斯语详解辞典》的编者。他写了许多民间故事和传说,在他的作品里反映着丰富的民众生活。他开头倾向于浪漫主义,后来转向现实主义。

不加解释,什么都不加证实,却心安理得地转移到《编年史》、《家训》^①以及波索施柯夫^②的著作上,去叙述所谓“我们的文学对国民性之关系概观”了。这位担任了奥斯特罗夫斯基辩护人、对抗反对派的批评家,他的事情就到这里完结。这样一来,这种对奥斯特罗夫斯基表示共鸣的赞美,就很快陷到一个极端里,在这个极端里,它变成一块被亲切的朋友投到自己人脑门上去的沉重的石头;在《俄罗斯丛谈》^③第一卷中,曾经发表了一篇吉尔基耶·菲里普波夫君^④关于《切勿随心所欲》的论文。《现代人》在前些时候,已经揭露过这篇文章的荒谬绝伦,——它宣扬妻子应该心甘情愿地把背脊给醉酒的丈夫痛打,歌颂奥斯特罗夫斯基,说他仿佛也分有着这些思想,并且把它们浮雕地表现出来。……这篇论文在读者中间也遭到了普遍的不满。而且很可能,连奥斯特罗夫斯基自己(他又为了他那不相识的论客而遭受人们的责难)也不会满意这篇文章的;至少,从那时起,他已经不再给人们以任何借口——让他们又一次用这些可爱的东西来诽谤他了。

由此可知,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这些热烈的赞美者,他们对于向读者解释剧作家的意义以及剧作家天才的特点,实在做得太不够了;他们无非是阻碍许多人去直率而朴实地观察奥斯特罗夫斯基。要这些热烈的赞美者去向公众解释作家的真正意义实

① 《家训》(《Домострой》),这是俄国十六世纪社会、宗教、家庭生活规箴的纪录。它反映着十五、十六世纪封建贵族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

② 波索施柯夫(И. Т. Посошков, 1652—1726),他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卓越政论家与经济学家,农民出身,著有《论贫与富》一书。

③ 《俄罗斯丛谈》(《Русская Беседа》, 1856—1860),“斯拉夫派”倾向的杂志。

④ 菲里普波夫(Т. И. Филиппов, 1825—1899),“斯拉夫派”政论家。《俄罗斯丛谈》就是他和柯歇列夫一起创办的。

在很少有真正的益处，非难他的人在这方面就可靠得多；他们在搜寻缺点（甚至是其中所没有的缺点）时，到底表现着自己的要求，使人能够判断，这个作家究竟使他们满足到何种程度，不满到何种程度。可是就奥斯特罗夫斯基说来，就是他的非难者，也不比崇拜者好到哪儿去。倘使你把整整十年中，各方面所加于奥斯特罗夫斯基头上的、直到现在还在加上去的全部责难，都汇集在一处，那末你就会断然放弃一切愿望，去了解那些批评家究竟在向他要求些什么，究竟怎样在观察他了。每个人都提出了他自己的要求，每个人都借此来叱骂别的有着相反要求的人，每个人都必然要利用奥斯特罗夫斯基某一作品的某一种优点，来指责另一个作品，或者是反过来。有一些人指摘奥斯特罗夫斯基改变了他的原来的倾向，不去生动地描写商人阶级生活形态的庸俗性，却把它理想化起来。另外一些人，相反，却为了这个理想化而赞美他，但又常常保留这样条件，他们认为《自己人好算账》是一个未经深入思索的、片面的、甚至是虚伪的作品^①。而当奥斯特罗夫斯基后来几部作品出现以后，除了抱怨他把那个——他从其中选取喜剧主题的、庸俗而没有色彩的现实生活，粉饰得太可爱之外，同时还能听到，一方面，有人为了这种粉饰

① 例如，有一个批评家，在批评《贫非罪》的时候，就为了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的第一个作品中“只是一个纯粹的讽刺家：并不曾把相反的东西提出来，和他所描写的丑恶并列对照”，而攻击他（《莫斯科人》一八五四年第五期）。《俄罗斯丛谈》的批评家说得还要尖锐^②。在评论《切勿随心所欲》这一个剧本时，他用下面这一套说法，来批评《自己人》：“《自己人》，当然，是一种镌刻着不平凡天才印记的作品，可是它却是在对俄罗斯生活抱着否定看法的强烈的影响下，构思出来的，虽然，这种看法有一部分，由于艺术的完成，多少显得缓和；因此，从这方面看来，就应该毫不怜惜地把作品看作是自然主义倾向的结果”（《俄罗斯丛谈》一八五六年第一期）。——作者注

② 指菲里普波夫。

而赞美他^①，另一方面，可又有人指责他，说他把全部肮脏的生活，好象照相式地描写出来^②。这一种对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文学活动最基本看法上的矛盾，已经足够扰乱那些一心一意要信托批评家对奥斯特罗夫斯基所下判断的天真的人了。然而矛盾不只限于这一方面；它还伸展到许多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各种不同优点和缺点的枝枝节节的意见里去。他的才能的多样，他的作品所包括的内容的广袤，就常常给他们以借口，向他提出最相反的责难。例如，为了《肥缺》，有人就指责他，他所描写的受贿者，并不十分可恶^④；而关于《养女》，有人却抱怨他，这里面

① 有一个批评家所以认为喜剧《贫非罪》比《自己人》优越，是为了“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贫非罪》中，“已经不是一个讽刺家，——除了丑恶的虚伪的文明以外，现在他又在这同一生活中，看到了一种亲切而质朴的、跟原来的各种传统、习惯结合起来的生活。他的全部同情，在这样两个敌对原则的冲突下，自然倾向于后面一边”（《莫斯科人》，一八五四年，第五期）。《俄罗斯丛谈》的一个批评家，也为了这一点而激赏奥斯特罗夫斯基，他认为，在《自己人》之后，剧作家对于生活的否定态度，已经为他的同情态度所代替了，现在代替那些我们已经在《自己人》中间看见过的阴暗画面，终于出现了不同的形象，这些形象就是受生活中另一些较好的印象所感悟因而创造出来的。——作者注

② 例如，《祖国纪事》方面，在批评这同一个喜剧《贫非罪》时，有人就责备奥斯特罗夫斯基，说他“不但把现实最肮脏的一面用它的真实色彩描写出来，而且还把它提高到理想化的地位”。可见，批评家是不喜欢把现实的肮脏的一面，原原本本描写出来的。跟着指责他的理想化而来的，常常还能听到这样的责备，这种责备，在不久以前，甚至变成这样的形式了：“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君笔下的喜剧，已经改变了它的艺术意义，而成为现实生活单纯的模写了”（《雅典尼》^③一八五八年第八期）。——作者注

③ 《雅典尼》（《Атеней》），一种批评、历史、文学杂志。一八五八年至一八五九年在莫斯科出版。

④ “这些被搬到舞台上来的事物，原该激起读者或者观众对于他们的憎恶，可是在实际上，他们却只是引起了同情。受贿，这种社会的疾病，——并没有通过他们的行为，令人痛恨地而且明显地表现出来。……剧作家应该指出，各种各样的受贿者和窃盗国库者，在里里外外，在每一个地方，是怎样折磨、败坏、糟蹋我们的多灾多难的亲生母亲俄罗斯”（《雅典尼》一八五八年第十期）。——作者注

所描写的人物，是太可恶了^①；为了《穷新娘》、《各守本份》、《贫非罪》以及《切勿随心所欲》，奥斯特罗夫斯基也不得不从各方面去倾听责备，什么：他为了他的基本题旨，已经牺牲了戏剧的完成之类^②，但同时为了这同样的作品，剧作家却又听到了这一类忠告：不要满足于奴气地模写自然，而要努力扩大自己的智慧的界限^③。不但如此——有人还责备他，他对于现实的忠实的模写（也就是再现），是太专心致志了，以致不关心他的作品的思想。

① “《养女》里的全部人物，除了那奇亚以外，——全都不是什么人物，而是各色各样抽象的沉淀下去的人类渣滓，这些渣滓，在读者的心灵上留下了最沉重和最不愉快的印象”（阿赫莎鲁莫夫君的论文：《春天》）。——作者注

② “剧作家迷离于他的题旨的高贵和新鲜，他没有使它们在心灵里作充分的孕育，不曾让它们成熟为充分完整而清晰的表象。……如果奥斯特罗夫斯基能够把他的戏剧压缩在一些紧密的框子里，如果能够多少节制一下他的过度崇高和广阔的题旨，如果在对待他所挑选的戏剧情势时，不是一下子把他所思索过、体验过的一切东西都丢弃掉，那末这一个作品就会更加调和，更加完整了，虽则，这也许要花去他一些精力”（《莫斯科人》一八五三年第一期评《穷新娘》）。

“剧作家为了解决他的题旨，而选取了戏剧的形式，这样一来，他自己就得担负起责任，来满足这个形式的一切要求，也就是说，首先要使读者或者观众产生戏剧冲突和动作的印象，从而把这个喜剧的基本观念铭刻在他的心里。

从这方面看来，我们就不能完全满意奥斯特罗夫斯基君的新剧本了”，云云（《莫斯科人》一八五四年第五期评《贫非罪》）。

“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君那些作品中，他的题旨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充满着深刻意义的，在道德方面也总是健全的……因此就不能不觉得惋惜，这一个思索得这样精美的，同时，在戏剧方面布局得这样完善的作品（《切勿随心所欲》），在描写上，偏偏比奥斯特罗夫斯基君到现在为止所写的其他一切作品软弱”（《俄罗斯丛谈》一八五六年第一期）。——作者注

③ “奴气地模写——不但在这个新的喜剧的语言上，而且差不多在它的全部内容上，都可以发现，在整个概念上是这样，在详细情节上也是这样。您即使只要在其中找寻出一种理想的轮廓，也是白费心机的：不论在人物中，不论在动作本身中，都找不到它。……我们首先愿望剧作家能够跨出他就在里面把他的活动一直禁锢到现在的这个偏狭的圈子，多少扩大一点他的智慧的界限”（《祖国纪事》一八五四年第六期）。——作者注

换句话说来说,也就是指责他,他是缺乏或者是漠视题旨的——但对于这种题旨,别的批评家却已经认为太广泛,远超过去完成它们的手段了①。

总之,为了多多少少对各色各样批评家在十年来向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提出的(有时候也就是这同一批作家所提出的)种种要求表示一点同意,去想象出一个可以倚据的中庸之道,那是很困难的。这一个说——他为什么把俄国生活渲染得过分黑暗;那一个说——为什么把它涂得这样白,这样红润?这一个说——为什么他要这样沉迷于说教;那一个说——为什么在他的作品里,没有道德基础?……这一个说——剧作家太奴气地传达现实了;那一个说——这种现实是不真实的;这一个说——他是太关心外表上的修饰了,那一个说——他是太不关心这种修饰了。这

① 这种说法,特别表现在那篇发表在《雅典尼》上的傲慢不逊的文章里。这篇批评的结束语是这样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君的作品,虽然它在表现现实生活,可是它的本身并没有什么生活;在这些作品里,既没有观念,也没有行动,更没有真正的诗的性格。……自然,应当在这方面给予剧作家以公平,他能够在他的剧本里(在描写商人生活的喜剧里)表现商人与小市民生活风习的正确而真实的图画——但这也就是一切了。在这些作品中,只有一个比较突出些,这就是:《穷新娘》,可是因此,它比其他一切还要坏。至于说到思想的丰富,性格的多样,在这方面,我们就说不出什么令人宽慰的话来。可以充分知道的,只有这件事,某一种作品,可以说,也就是触发他用对比法来写别的原因。例如吧,《自己人好算账》这一喜剧,就是《切勿随心所欲》这个戏剧的 Pendant②,后者也可以称之为《自己人好算账》。《穷新娘》也伏下了写作喜剧《各守本份》或者《富新娘》的动机;《贫非罪》这个喜剧跟它们也是非常近似的,它可以完全正确地称之为《穷新郎》。从这里可以想见,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幻想中,蕴藏着的用来表现他们的思想和形象是多么丰富。

值得提醒一下,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赞美者,长久以来,总是惊奇于这位剧作家在创造许多新的典型以及剧情方面,有取之不竭的财富,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这种对剧作家表示同情的批评,在解释这个作家的意义方面,是显得多么低能。——作者注

② 法文:相似物。

一个说——他的剧本中的剧情，进行得太缓慢了，那一个说——剧情的转变是太迅速了，前面的剧情还没有充分使读者对这个转变有所准备。这一个说——人物的性格是太平常了，那一个说——是太特殊了……这一切，都是在谈到同一些作品时，那些在基本观点上看起来应该是相同的批评家们常常在说的。倘使公众不能不根据批评家十年来所写的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意见来判断他的话，那末他们必然会弄得极端糊涂：对于这位剧作家，他们到底应该作如何的想法呢？照这些批评家的说法，一会儿他是一个偏狭的爱国者，一个蒙昧主义者，一会儿，他却是一个全盛时期的果戈理直接的继承者了；一会儿他是一个斯拉夫派^①，过一会儿，却变成西欧派^②了；一会儿他是民族戏剧的创

① 斯拉夫派——这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俄国哲学与社会思想斗争中，一个代表守旧思想的派别。它的代表人物有康·谢·亚克萨柯夫、伊·谢·亚克萨柯夫、尤·菲·萨马林、伊·瓦·基列耶夫斯基等等。别林斯基、赫尔岑以及他们的继承者曾经对斯拉夫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斯拉夫派坚决反对当时西欧社会一政治方面的进步形式以及精神文化上的进步现象。他们特别反对欧洲的革命运动，反对社会主义的学说，反对唯物论哲学。他们认为俄罗斯有她的特殊的独立的历史发展的道路，他们把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理想化了，幻想在农民与贵族、君主政体、正教教会之间维持一种封建宗法的关系。他们以为在俄罗斯是不会发生革命的，俄罗斯是始终和社会主义者的危险学说格格不入的。在文学方面，他们激烈反对现实主义，反对所谓暴露文学，反对讽刺倾向。他们认为俄罗斯生活中的黑暗的一面，只是特殊的、局部的现象，一个作家不应当受这些现象所迷惑，他应当描写生活中的肯定的、光明的一面。然而斯拉夫派所谓光明和肯定的事物，内容是非常偏狭的、反动的，它们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评和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和解释的完全不同。他们除了一度错认奥斯特罗夫斯基是他们的理想外，又把康士坦丁·亚克萨柯夫奉为典范。因为他把农民描写成正教、封建宗法道德的拥护者，说他们不被贫困所压迫，他们敬爱自己的村长，他们不需要受教育云云。虽然斯拉夫派中间也有一些人对农奴制表示不满，也批评了尼古拉一世的制度，甚至出版物也遭受沙皇当局的禁止，可是他们决不越出贵族自由主义的范围，他们始终是君主政体坚定的拥护者。《莫斯科人》和《俄罗斯丛谈》就是斯拉夫派发言、写文章的主要阵地。

造者，过一会儿，他却是一个商贩柯采布^③了；一会儿他是一个具有新的特殊世界观的作家，过一会儿，他却是一个对于他所模写的现实，一点都不理解的人了。到现在为止，不但没有一个人，画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完全的特征，甚至连构成他的作品的根本意义的轮廓，都没有指出来。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的现象呢？“总应该有什么原因的呀？”说不定，奥斯特罗夫斯基真的常常在改变他的倾向，他的性

-
- ② 西欧派——这是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俄国社会思想中代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派别。西欧派是俄国农奴制度瓦解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在当时社会思想的争论中，西欧派是和斯拉夫派处于敌对地位的。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有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学者：季·尼·格伦诺夫斯基、康·狄·卡维林、米·尼·卡特柯夫、巴·瓦·安宁柯夫等，在思想上和他们接近的，还有屠格涅夫、格里哥罗维奇、德鲁日宁、冈察罗夫等。

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俄国未来的历史发展的道路的问题。西欧派认为俄国没有特殊发展的道路，只有遵循西欧国家的轨道前进。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西欧派关于文学方面的争论文章主要发表在《祖国纪事》与《现代人》上；到得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之初，代表西欧派倾向的则是《俄罗斯导报》与《雅典尼》了。西欧派反对农奴制度，反对尼古拉一世的专制统治，但他们不主张用革命手段来推翻这种制度，而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革，主张君主立宪，主张议会政治。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是抱否定态度的，他们的哲学世界观的基础是唯心论。他们和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俄国社会思想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有着原则性的不同。在四十年代前期他们和斯拉夫派之间表现得颇为激烈的论争，到得四十年代末，就失去它的尖锐性了。作为一种思潮的西欧派，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完全中止它的存在。特别是在人民大众为了摆脱农奴主压迫的斗争尖锐化以及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宣布以后，原来西欧派的大部分人都落到自由主义者、农奴制拥护者的阵营，与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为敌。所以把四十年代社会思想的斗争归结为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斗争，这是不对的；同时，把别林斯基与赫尔岑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列入西欧派，象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所做似的，这也是不对的；杜勃罗留波夫在这里，不但尖锐地批判了斯拉夫派，而且也批判了西欧派，就是这个道理。

- ③ 柯采布(A. Kotsebu, 1761—1819)，德国外交家与戏剧家。热烈赞美反动的“神圣同盟”。写过许多寓有道德教训的戏剧。

格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定下来?或者,相反,他一开始,就象《莫斯科人》上的批评所断言,是站在超过同时代批评家理解程度的高峰?我们觉得,既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到现在为止,那种混乱的现象所以还在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判断中占着优势,其原因就在于,大家都竭力要他作为某一种信条的代表者,因此,当他不忠于这种信条时,就惩罚他,反过来,在拥护它们时,那就赞扬他。大家都承认奥斯特罗夫斯基是一个卓越的天才,因此一切批评家都想在他的身上看到他们是他们自己所服膺的那种信念的拥护者和领导者。带有斯拉夫派色彩的人们觉得非常喜欢,他是这样卓越地描写着俄罗斯生活,为了鄙夷腐朽的西欧,他们冒冒失失地宣布奥斯特罗夫斯基是“俄罗斯美好的旧时代”的崇拜者。奥斯特罗夫斯基,作为一个真正了解和敬爱俄罗斯民族的人说来,的确给了斯拉夫派许多把他派作“自己人”的理由,可是他们是这样漫无节制地利用这些理由,以致同时也给予反对派以理直气壮的借口,把他们看作是欧洲教养的敌人,看作是反动倾向的作家了。然而,在本质上,奥斯特罗夫斯基从来不是这种人,也不是那种人,至少,在他的作品里是这样。也许,从承认某种抽象的理论的意义上说来,某一个集团是对他起过什么影响的,可是这种影响不可能消灭他心里的对于现实生活的真正感觉,不可能把他的才能所指示的道路完全掩蔽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常常能够从那种由两个相反的极端来衡量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尺度下滑过去的原因。斯拉夫派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中,很快就发现了那些根本不是用来宣扬从顺、忍耐,宣扬谨守祖先的习惯和仇视西欧的特征,于是就认为必须把他痛斥一顿了一——或者怪他没有完全表现出来,或者怪他向反对见解低头。斯拉夫派批评家中的一个人最无知的人,曾经斩钉截铁地表示,奥斯特罗夫斯基一切都

好，“可是有的时候，他却缺乏决心和勇气，去实现他所思索过的东西：看样子，他是被那种为自然派倾向在他身上熏陶成功的、虚伪的羞耻以及卑怯的习惯所扰乱了。因此，他虽然常常开始构思什么崇高和阔大的东西，可是一想起那个自然派的尺度，他的构思就被吓跑了；他应当使他的欢乐的感想尽情奔放，可是他仿佛害怕高飞，因此他的形象总显出某种程度的不完全”（《俄罗斯丛谈》）。而在另外一方面，那些因为《自己人好算账》感到无限兴奋的人，也很快就注意到，奥斯特罗夫斯基在把商人生活中俄罗斯生活的古老原则与欧洲主义的新的原则作对比时，他常常倾向于前面这一边。这是很使他们不高兴的，于是所谓西欧派的一个最无知的人，也以下列的样子，表示了他的斩钉截铁的意见：

决定着这些作品的性质的说教倾向，不让我们在里面认出真正的诗的才能。这个倾向是以那些——我们的“斯拉夫派”称之为民族性的原则作为基础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的喜剧和戏剧中，就在使人的思想、感情与自由意志受那些原则所控制（《雅典尼》一八五九年）。

从这两个相反的摘录中，可以找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批评家们到现在为止，还不能把奥斯特罗夫斯基当作一个描写俄罗斯生活特定部分的作家，去直率而单纯地观察他，却还是把他当作一个适合于这一派或者那一派概念的道德的说教者去观察他的关键。批评家们应该抛弃这支预先准备好的标尺，应该抱着这样的决心——根据奥斯特罗夫斯基自己所提供的东西，纯粹为了研究他的作品而去研究它们。然而那时候，就该抛弃想要把他拉到自己这一伙里来的愿望，就该把自己对于反对派的偏见

放到脑后去，就该不去留心反对派的自我满足以及十分粗鲁的行为……可是这对于这一派，对于那一派，都是非常困难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变成了他们之间论战的牺牲品，他为了满足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弹出了几个不正确的和音，这样只有使他们弄得更加混乱。

幸运的是，公众很少去注意批评家之间的争吵，他们自己读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看了舞台上那些准许上演的剧本^①，于是重新再读几遍，这样就充分熟悉了他们这个心爱的喜剧家的作品。由于这个情形，现在批评家的工作，已经大大减轻了。他没有必要逐一分析每一幕，重述它的内容，注意一场接一场剧情的发展，一路上去搜索琐碎的缺点，赞美成功的表现，等等。这一切，读者都已经很明白了：大家都知道戏剧的内容，而关于局部的缺陷，也已经一再在谈论了，那些成功而正确的文句，也久已得到公众的赞赏，并且当作谚语之类在交谈中加以应用。而另一方面——强把自己特有的思维形式去束缚剧作家，这也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恰当的（除非也象那个《雅典尼》的批评家——莫斯科的尼·彼·涅克拉索夫先生^②所表现的那么大胆）：现在每一个读者都已经明白，奥斯特罗夫斯基不是一个蒙昧主义者，不是一个作为家庭道德的基础——鞭子的辩护者，不是一个宣扬无限制忍从，宣扬放弃自己的个人权利的卑鄙道德的拥护者，——同样也不是一个用尽一切方法，拚命暴露俄罗斯生活的污斑，使人们觉得羞辱的盲目而粗暴的诽谤家。当然，要这样做，也是意志的自由：不久以前，还曾经有一个批评家打算证

① 当时，在莫斯科的小剧院，在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院，都曾上演过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在一八五三年，上演了《各守本份》，在一八五四年，上演了《贫非罪》，在一八五九年，上演了《大雷雨》。

② 涅克拉索夫(Н. П. Некрасов, 1828—1913)，文学批评家与哲学家。

明,《各守本份》这一喜剧的基本思想是在表现:一个商人女儿去嫁给一个贵族这是不道德的,最合乎道德的是,遵照家长的命令,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同一个批评家,又断定(非常有力地),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切勿随心所欲》这个戏剧中,是在宣扬“完全顺从老年人的意志,盲目信仰自古以来所定下的法律的公正,完全屏弃人类的自由,完全屏弃任何以为人有权利去表现自己的人类感情的要求,——这些似乎远比人的思想、感情与自由意志的本身,更要高超”。这同一个批评家,后来又非常机智地表示,“在《节日好梦饭前应验》那些场面中,那种梦中的迷信,是很可笑的……”^①然而现在《奥斯特罗夫斯基两卷集》已经在读者的手里了——谁能够相信这样的批评家呢?

因此,现在我们既然以为读者已经了解奥斯特罗夫斯基剧本的内容以及这些剧本本身的发展,我们这里就只打算回忆一下他的所有作品、或者是其中大部分作品的共通特征,把这些特征归纳为一个结论,从而根据这个结论,阐明这个作家的文学活动的意义。为了这样做,我们就只想描绘出一个虽然没有我们,大部分读者也久已熟知的、但也许有许多人还没有把它归纳成为一个充分完整而统一的东西来的总轮廓。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还需要预先声明,我们并不向剧作家提出什么纲领,也并不想替他制订什么先决的规则,叫他应当按照这些规则来构思,来完成他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样的批评方法,对一个才能已经为大家所公认,公众对于他的敬爱已经根深蒂固,同时又在文学中占有一定成分的意义的作家,是非常无礼的。这种目的在于指示作者应该怎样做,指示作者对自己应该做的已经实现了多少的批评,只有在对待已经显示一些希望,但却走上了一条绝对

^① 这一切都载于《雅典尼》杂志里。——作者注

错误的道路，必须给予指导和忠告的新进作者，偶然还有一点用处。然而，一般说来，这种批评是令人很不舒服的，因为这样，就要使一个批评家落在好象正在聚精会神考试一个小学生的村学究一样的境地里。对于象奥斯特罗夫斯基这样的作家，这种经院哲学式的批评，人们是不能允许的。每一个读者都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向我们指出：“为什么你们要精疲力尽地去想象：这里需要怎么样，那里缺少什么东西？我们根本不想承认你们有什么权利来训海奥斯特罗夫斯基；我们根本没有兴趣去知道，他所创造的剧本，按照你们的意见，应该怎样制作。我们阅读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于是就喜欢他起来，我们所要求于批评的，就是要它在我们的面前，解释是什么东西常常把我们不知不觉地吸引去，要它归纳出一个条理来，向我们解释我们自己的印象。倘使，在这个解释已经做过以后，判明了我们的印象是错误的，它们的结果是有害的，或者我们把作者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加到了他身上，——那末就让批评来开始打破我们的误解，可是这仍旧要以剧作家自己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为根据。”我们承认，这样的要求完全是公正的，因此我们就认为，为了做得更好起见——就得使用目的在于批评他的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的现实的批评，来对待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在这里，我们不想作这一类要求：为什么奥斯特罗夫斯基不象莎士比亚一样刻画人物的性格，为什么不象果戈理一样发展他的喜剧剧情^①，等等。一切类似的要求，照我们的意见看来，是跟这一类要求，例如：要求奥斯特罗夫斯基成为一个热情的喜剧家，给我们写出许多莫里哀^②的泰托夫和奥巴贡^③型的人物，或者要求他模仿

① 真有一些聪明的批评家向奥斯特罗夫斯基提出这种意见。——作者注

② 莫里哀(Molière, 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

③ 泰托夫是莫里哀《伪君子》中的主角；奥巴贡是《吝啬鬼》中的主角。

阿理斯托芬，赋予喜剧以政治意义，一样毫无必要，毫无结果，毫无根据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假使奥斯特罗夫斯基能够联结阿理斯托芬、莫里哀和莎士比亚于一身，这是最好的了；然而我们知道，这是不会有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是认为奥斯特罗夫斯基在我们的文学中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并且觉得他，即使是现在他本身所显示的样子，也不见得怎样不好，还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和研究的……

同样，现实的批评，也不允许强要剧作家接受别人的思想。剧作家所创造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行动，就站在批评家的评判之前；他应当说出，这些人物在他的心里，引起了一些怎样的印象，如果这个印象是不完全的、不明朗的、暧昧的，那时候才可以去指责作者。批评家永远不能允许自己做出这样的结论，例如：这个人物显出有执着于古老偏见的特点；可是作者却把他描写得善良而并不愚蠢，由此可见，作者是要把那些古老的偏见表现得辉煌动人了。不，对于现实的批评，这儿，首先着重的是事实：作者描写了一个传染着古老偏见的善良而又并不愚蠢的人。批评家应当去研究，这样的人物是不是可能的，是不是真实的。如果看出它是忠实于现实的，那末批评家就进而用自己的看法，来思考它所以产生的原因等等。假使在被研究的作者的作品中，已经指出了这些原因，批评家就应该利用它们，同时应该感谢作者；假使没有，也不要用匕首直指他的咽喉，对他说，为什么他胆敢描写这样的人物，而并不解释这个人物生存的原因？现实的批评对待艺术家作品的态度，应该正象对待真实的生活现象一样：他研究它们，努力弄清楚它们本身的界限，搜集它们的本质的、典型的特征，然而千万不要为了这个而奔忙：为什么这是燕麦，而不是裸麦，这是煤，而不是钻石……也许有这样的科学家，他会从事这样的实验，证明燕麦可以转变为裸麦，也许

也有这样的批评家，他会证明，如果奥斯特罗夫斯基能够把这样的场面如此这般改变一下，他就能变成一个果戈理了，如果他能够把这样的人物如此这般修饰一下，他就能变成一个莎士比亚了……然而可以推想而知，这样的科学家和批评家，是不会带给科学与艺术什么好处的。那些能够把生活中，或者把作为生活的再现的艺术世界中，以前所隐藏着的，或者还没有明确起来的某些事实，带到共通认识里去的人，就比他们更有益处得多。如果到现在为止，对于奥斯特罗夫斯基，还不曾做过任何类似的工作，那末我们只能够为了这个奇怪的事实而惋惜，要努力尽我们所能够获得的力量与才能，加以纠正。

然而为了总结一下前面那些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批评家，我们现在要把他们几乎全都同意的、值得注意的意见，汇集在一起。

第一，大家都承认奥斯特罗夫斯基具有观察的天才，以及表现某些等级生活习俗的正确图画的才能，他就从这些等级中选取他的作品的题材。

第二，大家都观察到（虽然大家不是都给它以应有的公正）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中的民间语言，是正确而且忠实的。

第三，一切批评家都同意，奥斯特罗夫斯基戏剧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平凡的，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超出于他们所置身的平庸的环境的地方。这使得许多人都根据这个理由来责备作者，说是这些人物一定是面目苍白的。但别的一些人却公正地在这些平凡的人物中，找出非常显明的典型特征。

第四，大家都同意，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的大部分，“在戏剧的布局 and 结构方面，都不够（这是依据他的一个热心的赞美者的说法）经济”，因此（依据他的另一个崇拜者的表示）“他的剧本里的剧情，就没有作彻底而连续的发展，戏剧的主要情节也没有与

戏剧的思想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使人看起来，好象它是有点无关系的样子。”

第五，大家都不喜欢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里的急骤而突如其来的结局。照一位批评家的说法：在剧本的结尾，“好象有一阵狂风吹进了房间里，把剧中人都吹得颠倒过来了。”

这一切，似乎就是到现在为止，每一个批评家在谈起奥斯特罗夫斯基时，还在表示同意的……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整篇文章，都用来发展这些大家公认的原则，那时候，也许我们算是挑选到了合宜的工作。当然，读者们多少要觉得厌烦；可是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把它完成，博得审美批评家的同情，甚至，——谁知道呢？——也许还能获得艺术的美和艺术的缺陷的精细的鉴别家这个称号。然而，抱歉得很，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有培养公众审美趣味的使命，倘使为了对于艺术性的精微纤细的色调，作冗长而思想深刻的谈论，作学究式的说教，我们自己就会觉得非常气闷。这种工作，应该介绍给亚尔马淑夫^①、阿赫莎鲁莫夫之流去做；我们这里所要说明的，只是根据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描写的现实，去研究他的作品时所得到的那些结果。可是在事前，还得对作家的艺术才能同他的抽象思想之间的关联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个有才能的艺术家的作品，不管它们如何多样不同，总可以在其中看出一种共通的东西，这个共通性显出了它们全体的特点，使得它们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有所区别。用艺术的术语来说，这可以叫作艺术家的世界观。然而我们若是竭力把这

^① 亚尔马淑夫(Б Н Алмазов, 1827--1876),作家。在《莫斯科人》与《读书文库》等杂志里,经常发表批评文章。

种世界观引到一种明确的逻辑组织里去，把它用抽象的公式表现出来，这却是徒劳无功的。这些抽象的东西，通常并不存在于艺术家自己的意识里；艺术家甚至在抽象的议论中，他所吐露的观念，也常常要和他在艺术活动中所表现的观念，处于显明相反地位，——因为这种观念或者是他信以为真的结果，或者是用虚假的、草率架搭起来的、肤浅的三段论法这个手段所得到的。为了解他的才能的特征的关键——他对于世界真正的看法，这还得在他所创造的生动的形象中去找寻。艺术家的才能与思想家的才能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在本质上，无论对于哲学家，无论对于诗人，思维的能力和创造的才能同样都是他们所固有的，同样都是必要的。哲学家智慧的伟大和诗人天才的伟大，同样是在于：他们在看到一件事物的一瞬间，就能够从许多偶然性中区别出它的基本特征，然后，正确地把它在自己的意识里组织起来，并且把它们融会贯通，以便随心所欲地唤召它们，把它们组成各种各样的联合。然而在思想家与艺术家之间，却还有这种区别：后者的感受力要远比前者生动得多，强烈得多。他们两者都是根据他们的意识已经接触到的事实来提炼自己的世界观的。可是一个感受力比较敏锐的人，一个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当他在周围的现实世界中看到了某一事物的最初事实时，他就会发生强烈的感动。他虽然还没有能够在理论上解释这种事实的思考能力，可是他却看见了，这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特别的东西，他就热心而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事实，把它摄取到自己的心灵中来，开头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形象，加以孕育，后来就使它和其他同类的事实与现象结合起来，而最后，终于创造了典型，这个典型就表现着艺术家以前观察到的、关于这一类事物所有个别现象的一切根本特征。相反，思想家却不会这样迅速，不会这样强烈地受感动。光是一个新种类事物的第一个事实，不

可能立刻使他产生生动的印象；在大多数场合，他对于这件事实，简直不加理睬就走过去了，仿佛在一件奇怪的偶然事件旁边走过去似的，甚至不耐烦把它吸收到自己的心里去。（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想谈论个别情形：一个哲学家，当看到一件事实的第一次出现，他说不定也象诗人一样迅速——去热爱，发怒，悲哀。）只有到了后来，当许多同类的事实集中在他的意识里的时候，那时这个感受力比较弱的人才会终于去注意它们。但在这里，由于以前聚集在他的意识里的、还有不知不觉地在他的意识里潜伏下来的个别现象丰富多样，就使他能够一下子用它们来组织一个普遍的概念，这样一来，这个新的事实，就立刻从生动的现实世界中转移到抽象的理性领域里去了。而接着他就能在一排排其他概念中，替这个新的概念寻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解释它的意义，根据它得出许多结论，等等。在进行中，思想家，或者，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有推理能力的人，也能够把那些被艺术家的艺术根据生活所再现出来的形象当作真正的事实来利用。有的时候，这些形象本身甚至能够启发这些有推理能力的人对现实生活的若干现象构成正确的概念。这样，艺术活动在社会生活其他各种机能中的意义就变得非常明白了；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好象一个焦点一样，把现实生活的许多事实都集中在本身中，它大大地推进了事物的正确概念在人们之间的形成和传播。

从这里可以明白，作为艺术家的作家，他的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的描写的真实；否则，那些错误的结论就将由此而产生，那些虚伪的概念，也将倚赖它们的恩典而形成了。然而怎样来了解艺术描写的真实呢？说实话，一个作家是永远不会虚构出一种绝对的虚假来的；就是对于最拙劣的长篇小说以及通俗剧，也不能说它们所描写的激情和琐碎小事都是绝对虚假的，那也就

是说，甚至要把它们当作一种畸形的偶然，也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类长篇小说和通俗剧所以虚假，就在于它们所选取的都是现实生活中偶然而虚伪的特征，这些特征并不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并不是它的典型的特点。它们之所以虚假，还在这里：倘使要根据它归纳出一个理论上的概念，那末就可能达到一种绝对错误的思想。例如，有这样的作者，他们把自己的才能都用来歌颂色欲的场面和各种放荡败德行为；他们把色欲描写成这样子，如果人要相信他们，就会觉得人类真正的幸福，只有在这里了。这种推论，不消说，是很荒唐的，固然，也的确有这样的人由于他们的发展水平，除了这种幸福之外，就没有能力去理解别的幸福。……还有另一批更加荒唐的作者，他们歌颂穷兵黩武的封建领主的武功——这些领主使鲜血流成大河，烧毁城市，掳掠自己的臣民。在描写这些强盗的赫赫武功中，自然不会有彻头彻尾的谎话；可是它们却被作者涂以这样的光彩，致以这样的赞美——这些赞美清楚地证实，在这些歌颂它们的作者的心里，并没有什么人性的真实的感情。由此可见，无论那一种片面性和偏狭性都将妨碍艺术家去完整地观察真实。所以，艺术家或者是完全不可侵犯地保持着他对整个世界的那种单纯的、稚气地直率的想法，或者（因为这在生活里是绝对办不到的）就应当依靠吸收那些有推理能力的人已经研究出来的普遍概念，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视野，以摆脱这种片面性。知识和艺术的关连，就表现在这方面。把最高的思维自由地转化为生动的形象，同时，在人生的一切最特殊、最偶然的事实中，充分认识它的崇高而普遍的意义——这就是一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人能够达到的、使科学和诗完全交融在一起的理想。然而一个在自己的总的见解中，有正确原则指导的艺术家，终究要比那些没有发展的或者不正确地发展的作家来得有利，因为他可以比较自由地省

察他的艺术天性的暗示。他的直接的感觉，总是正确地把目的物指给他看；然而要是他的总的见解是错误的话，那么在他的心里，就势必要引起一阵冲突、怀疑和踌躇，即使他的作品并不因此变得彻底错误，也一定会显得脆弱，苍白，不调和。反过来，如果艺术家的总的见解是正确的，而且是和他的性格完全相谐和的，那末这种谐和与统一，也必然会反映到作品里去。那时候现实生活就能够更加明白、更加生动地在作品中反映出来了，这种作品使得有推理能力的人，可以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对于生活的意义也就更大了。

倘使我们把上面所说的一切，应用到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上去，并且回忆一下前面所谈的我们对他的批评家的一些看法，那末，就可以看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文学活动，还不能彻底摆脱那些动摇性——这些动摇性，是当艺术家内在感情和他从外界吸收来的抽象概念之间有所分歧时所常常发生的。这些动摇性，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批评家对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所表现事实的意义，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的来由。如果去责备他，说他在宣扬屏绝自由的意志，宣扬白痴似的谦卑，宣扬顺从之类，这当然多半只能算是批评家的钝感，可是剧作家自己，也真有不能充分回护自己躲过这一类责难的地方。真的，在《各守本份》、《贫非罪》和《切勿随心所欲》这些喜剧里——我们的古老生活方式本质上丑恶的一面，在剧情的进展中，就围绕了许多使人觉得它们并不怎样丑恶的偶然性。这些偶然性既然作为上面几个剧本的基础，这就证明剧作家已经赋予它们比它们实际所有的还要巨大的意义，这种错误看法是损害了作品的完整性和明朗性的。然而就在这里，艺术家直接的艺术感觉的能力也并没有背弃剧作家，因此他所描写的局部剧情和个别人物，还是常常能够显出无比的真实。只有在极稀少的场合，一种观念上的吸力，才会

引导奥斯特罗夫斯基对某些人物或者个别的戏剧情节作牵强不自然的想象，例如，在《各守本份》中，勃罗达金表示愿意娶鲁莎柯夫的不名誉的女儿做妻子这一场，就是这样的。勃罗达金在整个剧本中，都显出是一个古道可风的高尚而善良的人；他的最后一个行为，是完全不符合勃罗达金所代表的这一类人物的精神的。可是剧作家却要把各种各样善良的品质都归到这个人物的身上，甚至把其中连真正的勃罗达金自己大约也会惊奇地否认的那些品质，也加到了他的身上。不过在奥斯特罗夫斯基作品里，这种牵强不自然的地方是非常少的：因为艺术真理的感情，常常会来援救他。有极多地方，看上去他好象离开了他的观念，但这也正是因为他要忠实于现实。那些竭力想在奥斯特罗夫斯基身上看出他是自己这一派拥护者的人，常常指责他，说他没有把他们要想在他的作品中看见的思想，充分表现出来。例如吧，有些批评家渴望在《贫非罪》里看到神圣的和解以及对长者的服从，他们就责备奥斯特罗夫斯基，说是戏剧的结局并不是这位谦让自卑的米佳道德品质的必然结果。然而剧作家却了解这样一种结局的实际上的荒谬和艺术上的虚伪，因此他就采用柳比姆·托尔卓夫的偶然干涉作为结局。同样的，为了《切勿随心所欲》里的彼得·伊里奇这个人物，剧作家也被他们指责，说是他并没有把那种性格的奔放和强大的气魄加到这个人的身上去。他们说，这些品质是俄国人所特有的，特别是在他荒唐的时候。然而作者的艺术家的直觉，却使他了解这个因钟声而清醒过来的彼得，并不是俄国奔放性格，放浪不羁性格的代表，而只是一个道地的小酒鬼。为了《肥缺》，他也听够了可笑的责难。有些批评家这样问，——为什么奥斯特罗夫斯基要把象查陀夫这样坏的绅士当作有真诚抱负的代表；有的甚至因为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受贿者是这样平凡与天真无邪，觉得愤愤不已，他们表示这样的意

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批挖空心思，巧妙狡猾地制造、发展并且拥护着贿赂和奴颜婢膝道理的人，这批使用一切他们能够使用的力量，来反对把新的要素引到国家与社会机构中来的人，交付公审。”接着，这个严格的批评家又补充说，“我们应当成为这两个派别^①之间的有时是激烈的，有时是巧妙地掩藏起来的那种冲突最注意并且最热烈的观众”（《雅典尼》一八五八年第十期）。这种愿望，就抽象方面说来，虽然是公允的，但却证明了，批评家完全不曾了解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描写的黑暗的王国，这种王国的本身就不允许有这一切疑难：为什么这样的人物是平庸的，为什么这样的剧情是偶然的，为什么这样的冲突是脆弱的。我们不打算强迫任何人接受我们的意见；可是我们却觉得，奥斯特罗夫斯基如果忽然想到把我们的受贿者当作一个正确地组织起来的自觉的集团来表现，那末他就得违反真理，就会拿完全跟俄罗斯生活没有关系的现象来诽谤俄罗斯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您哪里找得到这一类集团呢？您从什么地方可以发现自觉的、考虑周详的行动的痕迹呢？您必须相信，如果奥斯特罗夫斯基要虚构出一些这样的人物来，一些这样的剧情来，那么不管它结构怎样戏剧化，不管剧本中一切人物性格写得怎么突出，就整个方面说来，这个作品总是没有生命的，总是虚假的。在这一个喜剧里，在查陀夫这个人物的身上，就已经出现过这种虚假的调子了；可是剧作者自己在一切批评家发觉之前就感到这一点了。在剧本的一半，他就让他的主人公从开头几场所站的高台上走下来，而在最后的一幕，他更指出了，这个人物是绝对没有能力去奔赴他要想担负起来的奋斗的。我们对于这一点，非但不去苛责奥斯特罗夫斯基，而且相反，倒看见了他的才能力量的证

^① 这里一派是指受贿者，一派是指与受贿行为作斗争的人们。

据。毫无疑问，他是感觉到查陀夫所说的美丽动听的事物的，但同时，他却又体会到，如果要迫使查陀夫去做出这一切美丽的事物来——那就等于是歪曲真正的俄罗斯的现实，在这儿，艺术真理的要求，阻止了奥斯特罗夫斯基去接受外来倾向的诱惑，帮助了他逃避索洛古勃君以及尔伏夫君^①的覆辙。这些没有才能的辞藻雕饰家的例子，证明着要制作一个机械的玩偶，把它称作正直的官员，这毫无什么困难；但困难的是，在它的身上鼓舞起生命来，使它按照人的样子说话和行动。奥斯特罗夫斯基在描写这种正直的官员时，也不是到处都能够克服这种困难的；然而在他的喜剧里，人类的本性，还是能够透过查陀夫的高谈阔论得到更多的表现。他的才能就在于此，避免去描写一个人的外部的、事务的关系，而去识别他的本性，深入人的灵魂深处，把握他的感情，——我们认为这就是奥斯特罗夫斯基才能的一个重要而且优秀的特质。因此，当有什么深思的批评家来指责他，说他在描写人物上，已经不再忠实于他们乐于在其中发现的那种基调时，我们就在任何时候都要加以辩护了。

同样，我们还要替奥斯特罗夫斯基辩护他的那些喜剧中的偶然性和看来是不合理的结局。要是在剧作家所描写的生活本身之中，就没有理性，你又从哪里去找寻它呢？毫无疑问，奥斯特罗夫斯基是能够想象出比钟声更要有效的什么理由，去阻止一个人酗酒的；然而要是彼得·伊里奇本来就不了解什么是理性，那怎么办呢？你无法把你的智慧塞到别人的头脑里去，你也无法去改造民众的迷信。倘使你把它^②原来所没有的意义加在它的

① 尔伏夫(Н. М. Львов, 1821—1859)，作家。他写过几本喜剧：《世界上不是没有好人的》，《成见》……又做过几个月《滑稽》(《Весельчак》)杂志的编辑。

② 指迷信。

身上，那末你就会把它歪曲了，并且诬蔑了它就在那里出现的那个生活的本身。在其他许多场合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去创造一些镇静而且考虑周详地去追逐一个目标的百折不回的戏剧人物，或者去设想一种严格地配合着的巧妙地贯穿起来的情节——那就是强把俄罗斯生活原来所没有的东西加到它的身上去了。凭良心说，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碰到过这一种险毒的阴谋家，这一种有计划的作恶者，这一种自觉的奸徒。我们中间假使有人要做出卑鄙的勾当，那多分因为是性格上的弱点；假使有人要欺骗投机，那多分是因为他的周围的人，都是十分愚笨而且轻信的；假使有人要压制别人，那多分是因为用不到花费什么努力：——所有的人已经是这样顺从而恭敬。我们那些阴谋家，权术家和为非作恶的人，时常使我想起那个象棋手，他曾经对我说：“谁要认为可以预先算定自己的着法，这是胡说八道：这是下棋的人故意这样夸张的；实际上，你要估计到三步以外，就已经不可能了。”象这样的象棋手也打败了不少的对弈者；可见别的人连三步都估计不到，而只能够——看见他的鼻子下面的东西。我们整个俄罗斯生活也是这样的：谁能够看到三步之外，这个人就已经得算是聪明人，可以去愚弄和摆布几千个别人了，可是这里有人却在要求，艺术家应该把长着俄国人皮肤的什么泰托夫们、理查们、夏洛克^①们描写给我们看！照我们的意见看来，这样的要求是完全跟我们不适合的，而只能引起一阵经院哲学的讨论。根据经院哲学的要求，艺术作品不应该纵放出一点偶然性；在这作品里，一切东西都应该严格地配合起来，一切东西都应该从一个特定的观点，根据逻辑的必然性，

^① 理查是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三世》中的主人公；夏洛克是《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富翁。

同时也根据自然性加以彻底的发展！然而假使自然性要求排斥逻辑的彻底性的时候，怎么办呢？根据经院哲学家的意见，凡是其中的偶然性不能符合逻辑必然性的要求的题材，就不应该选取。可是照我们的意见看来，不论什么题材——不管它是不是偶然的，对于艺术作品，却都是合式的，而且在这些题材中，为了自然性，甚至必须牺牲抽象的逻辑，我们充分相信，生活，正象自然一样，有它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说不定比我们通常在叫的那种逻辑更加好……不过，这个问题在艺术理论中，还太新一点，而且我们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不可动摇的规则来表现。我们只想趁现在谈到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的机会，顺便提它一下，我们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无论什么地方，他总是把忠诚于现实生活的事实放在首要的地位，他甚至还有点鄙视作品里的逻辑的偏狭性，——不管怎样，他的喜剧仍旧有它的卓越性，有它的内在的意义。

我们在说完这些草率的解释以后，在转入我们这篇论文的本题以前，还得写出下面的“但书”。我们认为艺术作品的主要价值是它的生活的真实，因此我们就得指出那种可以让我们决定每一种文学现象的价值等级和意义的尺度。如果能够判断作者的眼光在现象的本质里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他在他的描写中对于生活各方面现象的把握，究竟广阔到何种程度，——那么他的才能究竟是否伟大，也可以得到解决了。没有这一工作，一切议论都是毫无用处的。例如，费特^①君是有才能的，丘特契夫君也是有才能的；怎样来决定他们相互间的意义呢？毫无疑问，除了考察他们每一个人所达到的范围以外，就没有别的路。只有这

① 费特(A. A. Фет, 1820—1892), 俄国抒情诗人。他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派和农奴制拥护者，在艺术上他拥护纯艺术。他所描写的主要题材就是自然与爱情。

样,才能发现:这一位有才能的人只能够把全部力量发挥在从那些静止的自然现象上捕捉一些过眼云烟的印象;而那一位却除此之外,还了解火炽的热情,粗犷的精力,深刻的思索,这种思索不单被一些自然的现象所激动,而且更被一些道德问题和社会生活的利益所激动。两位诗人才能的评价标准,实际上就应当包含在这一切事实的表现里。到那时候,读者们即使没有什么美学的(通常总是很朦胧的)判断能力,也能够了解这个诗人或者那个诗人应当在文学上占有什么地位了。对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我们也打算这样着手。根据上面这一切解释,已经使我们能够确认,对于现实,对于生活真实的忠诚——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里,是一直得到遵从的,一直站在第一位,超过其他一切题旨和一切隐藏的思想的。然而光是这样还不够:即便是费特君吧,他也能够非常忠实地表现出自然的一定印象,可是绝对不应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他的诗在俄国文学中有巨大意义。为了说明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才能的一种明确的意义,当然不能只限于一般的结论,什么他忠实地描写了现实;而还需要指出,他的观察范围究竟广阔到何种程度,使他感到兴趣的那些事实的某些方面,究竟重要到何种程度,他究竟怎样深入到它们的里面去的。为了这样做,就必须把他的作品中所包含的东西,作现实的考察。

在这考察里,应该指导我们的一般的原则是下面这样的:

奥斯特罗夫斯基能够看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能够从一切由外部接受来的畸形事物以及赘疣上区别出本性来;因此,在他的作品里,人们对于外部的压迫,对整个环境加在人身上的重压,要比许多内容上令人非常憎恶、但在事实的外表上冠冕堂皇的一面完全掩盖了内在的人性的一面的小说,更能够强烈地感觉出来。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还没有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的高等阶层，而只限于中等阶层，因此它们还不能提供解答这些作品所描写的许多痛苦现象的钥匙。然而至少这种喜剧能够很容易提示许多和那种没有直接接触到的生活状态也有关系的类似的思考；这是因为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的典型人物，往往不只包含了商人或者官吏的特征，而且还包含了全民的特征。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很少触到社会的活动，这无疑是因为我们的市民生活本身，就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墨守陈规旧法的习惯，简直没有一个可以自由而奔放地表现人的真正活动的例子。但是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里，却非常完整地而且浮雕似地描绘出两种关系，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可能还在把自己的灵魂奉献给这两种关系，——这就是家庭的关系以及财产的关系。因此这就不必奇怪，为什么他的戏剧的主题以及名称本身，总是在家庭、新郎、新娘、富与贫中间转来转去了。

奥斯特罗夫斯基戏剧中，一切戏剧冲突和灾难，都是由于两个集团——老年的与青年的、富的与穷的、专横的与谦卑的之间冲突的结果。很明白，就问题的本质上说来，这一类冲突的情节是应当带有急遽的性质，并且应该引出偶然性来的。

我们现在就怀着这些先决的意见，踏进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为我们开辟的世界，努力来观察居住在这个黑暗王国里的住民。您很快就会相信我们叫它黑暗，不是一种无的放矢。

二

哪里越是严厉，哪里罪恶也就越多。应当凭着人性来判断。

我们的年轻兄弟们的悲哀而顺从的面貌，正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的命运注定要做一个被支配、受折磨的存在。敏感的米佳，温柔的安特莱·勃鲁斯柯夫，穷新娘——马里霞·安特列耶夫娜，不名誉的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不幸的达莎与那奇亚——他们都站在我们的面前，沉默而顺从着命运、委屈而又胆怯……这是一个由于悲哀而低声叹息的隐藏的世界，这是一个由于疼痛而呻吟的迟钝的世界，这是一个象监狱里、棺材里一样寂静的世界，只有偶然才有一种低沉无力的、刚一产生立刻又告衰竭死灭的喘息渲染一点活气。没有光明，没有温暖，没有空间；这种黑暗而拥挤的牢狱正在散发着腐朽而潮湿的气息。没有一个声音从自由的空气中传进来，明亮的白天也没有一道光穿透到它的里面。在这里，只有偶然才会迸发出一种暂时还没有被俗世生活的泥污堆所压灭的、还在人们胸膛中燃烧的神圣火焰的火花。这种火花在这监狱里的潮湿与恶臭中，只是微微地冒着烟，但有的时候，在一刹那之间，它也会勃然发作，用真理与善良的光，沐浴着这些困顿衰疲的囚徒们的黝暗的躯体。凭借这一刹那之间照耀的帮助，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的兄弟们正在这里受苦，看见了在这些鄙野、沉默、污秽的生灵中，可以辨别出人类面貌的轮廓——于是我们的心就因为疼痛和恐怖而蜷缩。这些不幸的囚徒，他们一言不发，——他们昏昏沉沉地坐着，甚至连自己的铁链都不去抖动一下；他们几乎失去了认识自己的悲苦地位的能力；但至少他们还能感觉到压在他们身上的重量，还没有丧失感觉到自己的疼痛的能力。如果他们沉默不语地、一动不动地承受着这种疼痛，那末这是因为在这种奇臭的深渊里，每一声叫喊，每一下叹息，都会使他们的喉咙窒息，使他们的胸部感到刺人的疼痛，被锁链所捆缚的身体的每一种动作，都在威

胁他们这要使压力加重，这要使他们痛苦受折磨的状况加深。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盼望欢乐，他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找寻慰藉，一种毫无意义的专横顽固，粗暴而蛮横地统治在他们的头上，它通过各式各样的托尔卓夫们，〔鲍尔肖夫们〕，勃鲁斯柯夫们，邬兰别柯瓦们以及其他的人们而体现，它不承认有什么理性的权利和要求。只有它的犷野粗鲁的叫声，在这人类的思想与意志的悲哀的坟墓中，打破了这种阴沉的寂静，引起了恐怖的混乱。

然而所有这些可怜的人并不是什么死尸，他们并不是在这黑暗的坟墓里诞生或者长大的。在从前，在他们的很早的无思无虑的童年，那种自由而神圣的光，也曾经在什么时候在他们的面前展布过，虽然只有极短的时间。对于这个黄金时代的回忆，就是在这奇臭的牢狱里，在这专横顽固的痛苦的女役下，他们也没有断念过。随便哪一个顽固独夫的粗鲁、放肆的叫吼，他的手臂放肆的挥动，都会使他们记起自由生活的天地，记起自由的思想与炽热的内心那种骄傲的激动，——这种激动在这些不幸的受苦者心里，现在虽然已经被压溃了，但还不是毫无痕迹地消灭掉。因此，在这阴暗深渊的底部，就有一种愤懑、无力的怨恨以及笨拙的激怒的黑色渣滓开始翻动，它们竭力要想浮到这个动荡深渊的表面来，用它们这股浊流把它弄得更加奇形怪状，更加可怕。对于生动的思想，对于真诚的言论，对于崇高的事业，在这里，没有一点回旋的天地和自由；沉重而专横顽固的禁锢压抑着那种高声、公开、奔放的活动。然而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对于生活的追求，就不可能在他的心里消灭，这也就是说，它会用任何一种形式在种种外部行动中表现它自己。这种追求越是被压抑得厉害，那么它的表现也越是奇形怪状；但只要这个人还没有完全麻痹，这种追求是不可能完全中止存在的。在这托尔卓夫们、勃鲁斯柯夫们以及邬兰别柯瓦们的黑暗王国里，专横顽固的

力量已经到了这地步，许多人在这里面已经真正地麻痹了，丧失了思想，丧失了意志，甚至丧失了真诚感觉的力量——这一切形成理性生活的东西，——他们就在这白痴的衰弱中虚度过一生，只完成了动物生活的作用。然而也有那种生活力较强的性格；这些人把自己的愤懑的毒液深深地集结在内心，以便一有机会就放它出来；不过在此刻他还只是象毒蛇似的无声无息地爬行着，还只是象青蛇和蟾蜍一样蜷缩着、屈曲着并且转动着……他们沉默不语，无声无息，不为人们所注意；他们知道，每一种迅速而奔放的动作，都要使他们的被束缚的身体引起不能忍耐的疼痛；他们了解，即使能够打碎自己身上的镣铐，他们也无法逃出这个牢狱，而只是把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地撕裂开来。因此他们就隐秘地并且悄悄地进行工作；他们弯曲着，转动着，蜷缩着，他们千方百计地尝试——能不能偷偷地腾出一只手来，以便日后可以锯断自己的锁链……于是一种偷偷摸摸的、间歇的运动开始了，他们四面察看着，不让什么人来注意他们；欺骗与卑劣，装假和怨恨，冷酷地对待周围的人，只关心自己，只关心钻求个人的安静，也开始了。在这里，并没有什么恶毒地仔细考虑过的计划，也没有在进行一种有步骤的地下斗争时那种自觉的当机立断，甚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狡猾；这里纯粹是一种自我保存感情的表现，这种感情的表现是被外部环境不由分说地逼迫出来的，它根本没有经过考虑，而且也没有跟什么东西好好地配合起来。正象由于烟雾，由于感激，由于辣山药，我们的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流出来一样，正象我们的眼睛碰到突然而过分强烈的光华，就不由得眯细起来一样，正象我们的身体由于寒冷而蜷缩起来一样，——这些人也正是因为不可能进行公开的、正直的以及亲切的活动，就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从事起诈欺、伪善以及极端自私的勾当来了……对于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责备，固然对

他们怀着戒心还是应该的；他们自己就看不清自己所做的是什
么。他们在责骂和殴打的威胁下，受着奴隶似的教养，——由于
经常害怕会弄得一片面包都不剩，他们奴隶似的生活着，他们用
尽全力来获得奴隶的一个重要美德——无耻的狡猾。为什么他们
要觉得羞耻呢，什么样的真理，什么样的权利值得他们去尊敬
呢？当专横顽固统治着他们，压迫着并且虐杀着他们的时候，不
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理，没有什么理性，没有什么廉耻吗！那种
道德责任以及名誉和权利的真正原则的自觉，在这些被这一种
统治所教养出来的人中间，是不可能发展的。这就是为什么那种
最荒谬的奸计，在他们看来却是一种最可赞扬的功绩，而最卑鄙
的欺骗却是一种巧妙的笑话的缘故。他们能够欺骗你，偷窃你，
甚至谋杀你，但同时他们却仍旧能够对你保持真正亲切的和殷
勤的态度，仍旧能够保持安详的诚恳，以及许多真正善良的品质。
在他们的天性里完全没有那种邪恶以及弃义背信的东西；可是
他们总打算尽可能浮上来，脱出这个腐臭的泥沼，他们就是被
这些霸道的顽固独夫投放到泥沼里去的；他们知道，可以凭借欺
骗和金钱的帮助，挣脱到这个顽固独夫这样舒畅地呼吸着的空
气里来；因此他们就开始实行狡猾、阿谀、欺骗，开始是小注，后
来就是大股了，但一直是偷偷摸摸地、攫取式地把别人的财产放
进自己的口袋里。既然这是别人的财产，这有什么关系呢？他
们自己所有的一切，自己的意志以及自己的思想，不也给别人
夺去了；他们为什么要考虑什么是正直，什么是无耻呢？他们为
什么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骗别人呢？

由此可见，在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描绘的黑暗王国里，那种外
表的顺从，那种达到完全疯狂地步的、其中的个性被令人痛心
地抹煞了的、迟钝的、集中起来的悲哀，是和奴性的狡猾、是和丑
恶的欺骗、是和无耻的背信弃义交织在一起的。在这里，谁都不信

托谁：每分钟您都可以盼望到您的朋友会这样夸口，他怎样巧妙地算计了您，或者怎样偷窃了您；一个合伙人为了有利的投机，就把全部金钱和证券轻易地捞到手里，却让他的同伴为了债务去坐牢；一个岳父向女婿敲诈聘礼；一个未婚夫要去算计或者侮辱媒人；一个做新嫁娘的女儿在欺骗父亲和母亲；一个妻子也会欺骗丈夫。在这个黑暗世界里，没有神圣，没有纯洁，也没有真理：统治着这个世界的是野蛮的、疯狂的、偏执的专横顽固，它把一切正直和公正的意识都从这个世界里驱逐出去了……在这人类的尊严、个性的自由、对于爱情和幸福的信仰、正直劳动的神圣都被专横顽固粉碎成尘埃，都被赤裸裸地践踏的地方，这样的意识是不可能存在的。

可是就在这儿的旁边，只不过是在墙背后，却还有另一种光明、纯洁、有教养的生活在进行……这个黑暗王国的两方面都感觉到这种生活的优越性，时而觉得它可怕，时而却又向往着它。然而这个生活的基础，它的内在力量却是这些可怜的人所完全不了解的，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关系中，对于一切理智和真实都觉得格格不入。只有这个有教养生活的最粗糙的最显而易见的外表现象，他们才能了解，当他们想到嫌恶这种教养的时候，他们所能攻击的只是这些东西，而当他们热心地神往着要象高贵的人们一样生活的时候，他们所能模仿的也只是这些。老一辈的顽固独夫剃掉了胡子，代替伏特加，喝起香槟酒来；他的女儿唱着热情的情歌，被军官们引得神昏志迷；他的儿子放荡作乐，给舞女购买昂贵的衣服和披肩；这就是他们的教养的全部法典。……但相反，这些害怕新世界的人，——假使他们碰到了维霍列夫或者是巴尔查明诺夫那些昏蛋，他们却愉快地把这些人当作有教养人们的代表来接待，利用他们，把自己的愤懑倾注到新规矩上面去……这种和新生活浪潮的斗争，就通过这些顽固独夫的一

生,通过这些沉默而不反抗的人整整悲苦的一生而进行着,当然这种生活总有一天,要把全部积贮已久的垃圾都冲走,而使泥泞的沼泽变而为明彻、壮丽的大河,可是这种生活现在还只是使这堆垃圾泛腾起来,自己也浸染在它的里面,跟着它一起腐朽、发臭……现在这种生活的新的原则,还只是象遥远的幻境,或者是象梦魇似的,扰乱着黑暗王国全体住民的意识。甚至对于那些自己敢于模仿这种新式样的人,这种生活也是非常沉重的,正象每一种梦魇,即使其中有最动人的景象,也总是非常沉重难受的一样。而且也正象在梦魇之后一样,甚至对于那些看样子已经能够摆脱这种专横顽固的压迫、已经能够恢复他们的感情和意识的人,——连他们大家都还不可能在他们的新环境中好好地安顿下来,他们既不了解真正的教育,又不了解自己的使命,他们更不善于坚持自己的权利,不敢放手去进行工作,却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对于命运的顺从,或者是同虚伪以及专横顽固偷偷摸摸的勾搭起来。

我们所了解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的总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为了把这个模糊的轮廓的某些特征表现得更加凸出起见,我们要提一提可以用来证实和阐释我们所说的话的几个细节。在现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只把我们的想象局限在道德的腐化,局限在无耻而不自然的人间关系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里找到的,它们就是压迫着一切的专横顽固的直接结果。

我们来打开《奥斯特罗夫斯基作品集》的第一页。我们现在是在商人普查托夫的家里,是在布置得毫无趣味的房间里,这个房间里有着肖像、极乐鸟、杂色的窗帷和几瓶甜酒。那个普查托夫的妹妹,十九岁的女孩子玛丽雅·安季波夫娜,正坐在刺绣架那里,唱着“乌黑的颜色,阴暗的颜色”。过后,她就自言自语

起来：

“瞧，夏天已经过去，现在是九月啦，可是你还是坐在四垛墙壁里，好象修道士一样，连窗畔也不能走近去。这有什么趣味呢！”（《家庭幸福图》）

真的，这个女孩子的生活是并不怎样有趣的：玛丽雅·安季波夫娜的哥哥，普查托夫这个顽固独夫和骗子正统治着这个家庭；当他不在的时候，那个虔敬、善良、准备以一文钱出卖一个人的唠叨的老太婆，普查托夫的母亲，就来监视着她的女儿和儿媳。年轻的女人跟这些人在一起，既没有愉快，也没有安静，更没有自由；她们只能在这个老妇人永无休止的唠叨以及家长的专横任性下，抱恨含屈地死去。于是她们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替自己找寻隐秘的消遣，当然，这是可以找到的。这就是玛丽雅·安季波夫娜在抱怨了一阵她的命运之后，紧接着所说的：

“最好不放我们出去，把我们用锁锁起来！拚命虐待吧！我可要跟姊姊要求到修道院做晚祷去，我们穿扮好了，一直溜到公园里，或者到索柯尔尼基。总得想出一些什么花样……”

看吧，这就是这种不由自主的、不必要的狡狴的第一个例子。在玛丽雅·安季波夫娜的心里，这种想法是怎样形成的，这种狡狴倾向是由于一些怎样的特殊的偶然性发展起来的，——这关我们什么事！……我们知道的是这种性情的一般原因，这是奥斯特罗夫斯基自己就非常清楚地指给我们看的，我们看出，玛丽雅·安季波夫娜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而是一个最平凡的、

在这一类人物中经常会发见的现象。关于她的很早就腐化，我们此外已经没有什么，而且也不需要作什么解释了。可是奥斯特罗夫斯基却一直把我们引导到这个家庭的最深处。强要我们在最隐秘的场合中出场，因此我们就不但了解，而且我们的内心还痛苦地感觉到，这儿除了一方面立脚在欺骗与狡狴上，另一方面立脚在无耻的专制精神上以外，就不可能有别的关系。玛丽雅·安季波夫娜和普查托夫的妻子玛特辽娜·莎维丝娜的一场，还有她们俩跟女厨子的一场——就说明了这个家庭全体人们所依凭的那种放荡生活的彻头彻尾的无耻。玛特辽娜·莎维丝娜向玛莎^①解释，不要逗引军官们骑着马在窗下走来走去，因为这样要有坏名声传出去的，以后就弄得不可开交了。但在这时候，她们却已经打发女厨子到一个年轻人那里去了，这些年轻人要她们到奥斯坦基诺，还要求她们带一瓶马得拉酒^②去。当然，这个事情是偷偷摸摸地、战战兢兢地进行的，因为普查托夫虽然没有在家，可是他的母亲却正在监视着，并且阻挠着她们的一切行动。玛辛加从窗子上看见达里雅^③回来了，她就吃惊地叫道：“啊呀，姊姊，她不要碰到妈妈才好！”但达里雅却真的碰到了妈妈；不过她是不会出岔子的，——她懂得去圆谎：“到铺子里，”她说，“买丝线去。”这一回女看守被她们混过去了。然而就在这两个年轻女人跟女厨子谈话的时候，在幕后忽然传来了轻轻的喧嚷声；女厨子惊恐地倾听着，一边说：“我的娘，不要是他来啦！”……果然，普查托夫的声音已经从前厅里传来了：“老婆！喂，老婆！玛特辽娜·莎维丝娜！……”于是妻子就走到

① 即玛丽雅·安季波夫娜的昵称。

② 一种红葡萄酒。

③ 女厨子的名字。

门边去，问：“什么事呀？”丈夫回答道：“你好！你以为老天才会知道吗！……”这一种开场白已经给了您一个估量安季普·安季贝奇与玛特辽娜·莎维丝娜之间的夫妇关系的尺度。很明白，妻子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橡皮玩偶，让孩子们闹着玩的：一会儿拉拉它的腿，一会儿把它的头压瘪了，一会儿把头拉长，看着，这会弄出一个什么样子来。在普查托夫的内心里——从来就不曾有一点儿想到她有什么人的权利，也不曾有一点儿想到去尊敬她的精神上的个性。他对她的关系只限于动物性的冲动，只限于让他的顽固精神得到畅快。他说，他的妻子，“要是穿扮起来，比什么姑娘都好，——比她们更漂亮，真的！那些人都是起码东西；老实说，不配咱们这班人去瞧一眼。可是她呀，我看起来是那么……我这是说——她的身段……唔，还有那一切……”因此，他对妻子的责任，他所要获得的她的爱，也就只限于这一些了。请听他怎样说：“她能够撇下我这样出色的人——这样漂亮的人，去掉换别的什么人吗！……”可是他漂亮在什么地方呢？请看他自己的定义：“一个脾气好，身体肥胖，面色红润润的商人，事情就不同，——好象我这样。总有人会来爱他的；不比那种皮包骨头的小职员……”但是，也许他这样说是对的：怪不得我们画起漫画来，老是把那种依靠人家老婆的财产过日子的绅士，画成一个穿着燕尾服的豪华浮夸的浪荡子！……所以如果玛特辽娜·莎维丝娜偷偷地离开丈夫，到奥斯坦基诺去跟年轻人相见，那末当然，这一部分是因为她的发展多少有点转向另一方面去，而一部分，也是因为她已经受够了丈夫的专横顽固所给她的痛苦。这种专横顽固是这样表现出来的，请看下面这个例子。安季普·安季贝奇在等候茶的时候，他坐着，打量着房间的四周，终于因为没有什么事做，就开起下面这样的玩笑来：

安季普·安季贝奇（严厉地）老婆！过来！

玛特辽娜·莎维斯娜 又有啥事啦？

安季普·安季贝奇 过来，我告诉你。（用拳头捶击着桌子）

玛特辽娜·莎维斯娜 怎么，你疯了不成？

安季普·安季贝奇 看我拿你怎么办？（他捶击着桌子）

玛特辽娜·莎维斯娜 你要我怎么样呢？（胆怯地）安季普·安季贝奇……

安季普·安季贝奇 呃？吓了吗！（大笑）别怕，玛特辽娜·莎维斯娜，我这是——开开玩笑（透了一口气）。茶弄得怎么样了？

瞧，他这是因为烦闷而开开玩笑！等茶等得厌烦了……这就很明白，即使一个最心平气和的妻子，对于这样的丈夫，也会怀着什么样的感情。

然而安季普·安季贝奇——比起他的母亲来，还是一个比较进步和人道的人呢。他认为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才适宜打妻子，而且就是这样他也并不完全同意。当他把他的妹妹许给谢里亚洛夫^①的时候，他问：“你在喝醉酒的时候，不是也很和气吗？也是不打架的吗？”可是他的母亲，施吉邦尼达·特罗菲莫夫娜，却连这一点都不以为然：她埋怨儿子，为什么他不让妻子保持恐惧。她说，“你爹无论怎么疼我，怎么怜我，他总是在卧房的钉子上挂一根鞭子，预备随时都可以用。”她的儿子并没有鞭子，她就以为这是道德的堕落了……然而他的妻子就是没有鞭子，也已经看出必须在丈夫面前装假了：她带着伪装的温柔吻

^① 这是剧中的一个六十岁的商人。

着他，跟他亲热，请求他和婆婆准许她做晚祷去，固然，她自己也对这个专横顽固透露过若干不满，她说，“这世界还没有出生这样的人，可以强迫我不说话。”欺骗和装假正彻头彻尾地统治着这个家庭，我们觉得，这好象是一种特别的宗教——它可以称之为伪善的宗教。

普查托夫撇下了妻子之后，就转到妹妹头上，开始给她介绍未婚夫。在这场合，他又说出了关于她的体态之类的各种粗鲁的暗示，使得这个多少有点害羞的姑娘终于从房间里跑出去了。接着在母亲与儿子之间，就开始了一场关于她的命运的秘密的商议。母亲提议让谢里亚洛夫作未婚夫，她这样介绍着他：“他虽然老了一点，而且是个鳏夫，可是他的钱，安季普希卡，却多得要命——数也数不清。而且他又是一个稳重、尊敬神道的人，一个人人敬重的规规矩矩的商人。”儿子就这样简短地回答：“妈妈，只不过人太狡猾了点。”你也许要想，普查托夫是尊敬循规蹈矩，不喜欢欺诈撞骗的。完全不是这回事。他有他自己的特别的见解，照这种见解说来，欺诈是应该的，只是应该有一个范围，虽然，究竟到什么范围为止，他自己也没有好好地了解……但他却似乎已经觉得这个人还不是太狡猾，而那个人却已经太狡猾了。因此一觉得这是太狡猾了时，他的良心就不免要受责备。然而，就是这种感情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结果。请看母子俩是怎样谈论他们的道德见解的。施吉邦尼达·特罗菲莫夫娜对于儿子所说的关于谢里亚洛夫欺诈撞骗的意见，这样回答：

啊呀，我的爹！他哪一点狡猾呢，你倒说说我听！逢时逢节，他总到教堂里去，去得比什么人都早；他还吃斋，碰到大斋期，他喝茶也不加糖，——只吃蜜糖，或者葡萄干。真的，宝贝，他不象你那样……即使他欺骗了什

么人，那又有什么坏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是一个商人，安季普希卡，做买卖总是这样的。俗语说得好：“不骗人——货就卖不出去”。

安季普·安季贝奇 那还用说！只要可以下手，为什么不把朋友骗一下。没有关系。可以这样做。不过，妈妈，有的时候良心也会来责备你（搔一下脖子）。这是真话。你会想到你死去的时刻的（沉默）。我只要抓准机会，玩起花样来不会比他坏。事后还要告诉他，我说：你瞧，我只要这样轻轻地玩你一手。譬如去年，在算账的时候，我骗了莎瓦·莎维奇五百卢布。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莎瓦·莎维奇，你瞧，眼睛一映，你就错掉了五百卢布，可是现在，兄弟，我说，已经晚啦；不过你，我说，也不要瘪气。他当时稍微有点儿生气，可是后来又是朋友啦。这有什么要紧。

您看吧，普查托夫并不以为他的欺诈是一种坏事情，甚至还并不以为这是一种欺骗，而纯粹是一种巧妙、聪明的玩笑，这种玩笑甚至还是值得嘉许的。而那些被他所欺骗的人，也支持这同样的见解：莎瓦·莎维奇因为自己竟被欺骗而生气，可是过后，当专横顽固的侮辱归于平静的时候，他就仍旧跟安季普·安季贝奇作朋友了。欺骗在这里是一种正常而且必要的现象，正象战争中总要杀人一样。这个黑暗王国里的生活就是这样安排的：永世的敌对统治着它的住民。这里一切人都置身在战争中：妻子跟丈夫，为了他的专制顽固；丈夫跟妻子，为了她不肯听话，或者不会奉承；做父母的跟孩子，为了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智慧去生活；孩子们跟父母，为了做父母的不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智慧去生活；老板与伙计，长官和下属——也都为了这一种人要运用他

的专横顽固，去压迫大家，另一种人为了不能替自己的最合法的要求找到活动天地而作战；经商的人也为了别人不要来打断他们的买卖的利润而作战，他们的买卖总是以榨取别人为基础的；游手好闲的懒汉也为了不要让这些人从他们那儿溜走掉而作战：他们的白吃白喝，豪华奢侈，发财致富，就是倚赖着这些人的劳动。而且所有这些人都以共同的力量来对那些正直的人作战，因为正直的人能够使得被压迫的劳动者睁开眼来，教导他们高声而真实地表示他们的权利。由于事情这样发展的结果，许多人就都落在包围状态中，大家都只操心着，如何挽救自己摆脱危险和麻痹敌人的警惕心。在所有人的脸上，都刻划着恐慌和不信任；思维的自然进程改变了，那种健全的见解，被一种明显地表示着凶残性质的、和人类本性完全相敌对的、特殊的、因袭的想法所取而代之了。谁都知道，战争的逻辑是和常识的逻辑完全不同的。军事的诡谲，被当作一种智慧的证据而被赞美，这种智慧指导着去毁灭自己的邻人；杀人，被看成一种人类的赫赫武功而被颂扬；成功的抢劫——攻城夺垒，截击辎重之类，——也抬高了这个人在他的同胞们眼睛里的地位。然而，在所有法律中——对于欺诈，对于抢劫，对于杀人，是都规定着惩罚的。不仅如此，在所有法律中，还都承认有减免的条款，而且有时候，如果杀人的动机是出于无可避免的话，它本身就可以获得减免。可是对于那些——例如吧——为了奥地利仍旧能够压迫意大利人，因而去对意大利人作战的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又有些怎样的减免条款呢？而对于每一个匈牙利人以及斯拉夫人的军官或者士兵，为了他们向法国军团以及萨丁军团所发射的每一发子弹，又应该用怎样恐怖的刑罚来惩罚他们呢①！然而这是一种无可避免要在某种情势中给予人们以损害的流行的盲目势力，——这种在战争中杀人和抢劫，非但没有什么人受惩处，而

且还得到赞扬和奖励！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里，当着我们的面而复活起来的黑暗王国里的一切住民，也正落在这同样疯狂的盲目状态中。他们和周围的人物，经常置身在战争之中，因此，你就不必去要求，并且也不必去期待他们会有什么理性的想法，这种想法是每个人在安静与和平状态中应该有的。普查托夫做出了这一种战争的三段论法：“假如我不打垮你，那末就是你打垮我；所以最好还是我来打垮你。”你怎样来反驳这种三段论法呢？它难道不会在每一个当着胜利与失败之间的选择中陷于狼狈境地的人的心里自动产生吗？所以，这就不必奇怪，普查托夫在谈起那笔德国人允许他在店里挂欠的钱，怎样才可以少付一点的时候，他就这样盘算：“那么，全部都付给他吗？为什么这样呢？不，将来再谈名誉吧。他们可以随便改动价目，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还要骗人糊里糊涂相信他们。下次倘使他不向我要支票的话，我还要这样做哩。”你瞧，这里就是一种最平常的赌博：谁玩得巧妙，谁就赢钱。

但是普查托夫不喜欢为欺骗而欺骗，不喜欢毫无需要的欺骗，没有获利希望的欺骗；他所以不喜欢，这同时也是因为在这种欺骗中，表现不出一一种热心于重大利益的严肃的才智，而只是表现了一种毫无什么根据的轻率。至于谢里亚洛夫呢，他的欺骗却是逾越一切界限的，普查托夫所以不以为然，多半就因为这个人分别现在是战事，还是和平，——有时在休战的时候，也会突然射击起来，有时甚至还要射击自己人。普查托夫说：“他好象是一个犹太人：连亲生的父亲都要欺骗。真的，眼睛一看到什

① 系指一八五九年意大利独立战争。当时奥地利方面由于意大利民族运动的中心——萨丁尼亚王国的军事准备已经明朗化，为了先发制人，就向萨丁尼亚宣战。路易·拿破仑因与萨丁尼亚方面缔结有密约，也立即向奥地利宣战。战争结果，奥军败绩，萨丁尼亚得以统一全意。

么机会，他对每一个人都会下手。可是他还要装出神圣的样子哩。”不过，普查托夫的不以为然，在这场合，是不能当作正经的：就在他痛骂谢里亚洛夫的时候，这个商人却走到安季普·安季贝奇家里作客来了。安季普·安季贝奇不但非常亲切地迎接着他，不但注意地倾听着他的那个强要他老人家结婚的儿子——辛加的花天酒地的故事，以及谢里亚洛夫自己所串演的欺诈撞骗的故事，在临末，还把自己的妹妹许给他，而且没有得到玛丽雅·安季波夫娜的同意，也没有通知她，就把这个事情完全肯定下来。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做这件事的呢？这问题的回答，可以在谢里亚洛夫走的时候，普查托夫所说的几句简短的话里找到。“这个家伙真是一个强盗，”普查托夫一边眯一眯眼睛，一边这样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一个狡猾的坏蛋！还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拉撒路^①哩！你瞧，还要说是辛加的错处哩！……可是，老弟，这样说有什么用处呢：根本就是你老头儿的胡思乱想……好吧，我们都会满意的！没有什么，可以这样！……只不过，巴拉蒙·菲拉庞狄奇^②，关于嫁妆究竟谁骗谁，——这还是一个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我和妈妈是不会随便让人家摆布的……”所以，这里事情已经变得很简单：既然可以有利地出卖妹妹了，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而且这对于妹妹也是一件好事：她迟早总应该有个着落！……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在《家庭幸福图》里，在这就时间上说来，还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第一个作品里看到的。在这里面，我们已经能够发现许多在后来几个喜剧中得到更完全、更明朗表现的萌芽了。至少我们可以看出，

① 拉撒路，《新约·路加福音》中富人与乞丐故事中的乞丐。

② 这是谢里亚洛夫的本名与父名。

剧作家在这时候，已经吃惊于我们大多数人在最亲近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上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敌视的与阴沉的性质了。这种阴沉和敌视，有一部分原因，已经在这里揭示出来：一方面是毫无理性的专横顽固，另一方面是胆怯的逃避和毫无作为。那种事物的不自然的规律所产生的结果，也在这里得到了显明而突出的表现——欺诈撞骗不论在家庭里，不论在社会关系中，都已经成为稀松平淡的现象了。

在《自己人》里面，我们又看见了这同样的伪善与欺诈的宗教，同样的无理性与专横顽固，同样的欺骗的忍从，奴性的狡狴，不过现在是更加五花八门了。我们可以从这里想象出压迫的几种等级，看出专横顽固它的分类的某种体系，得出它的历史的梗概。最最主要的顽固独夫对于所有亲近的人都实行专制，不知道自己应该有点约束的人，这就是萨姆松·西雷奇·鲍尔肖夫。他引起了全家的人们怎么样的恐怖呵！他的妻子阿加拉芬娜·康特拉季耶夫娜威吓着她的已成年的女儿，说她“要告诉爸爸去”；女儿却回答：“上帝生了你，就是为了去告诉爸爸，可是你自己，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对于第二次的恐吓，她是更加尖锐地反唇相讥了：“你只会反来覆去，什么父亲不父亲；有他在，你就神气活现的讲话啦，可是自己怎么不试一试呢！”可见，萨姆松·西雷奇无论在妻子看来，无论在女儿看来，都是吓人的纸老虎一类的东西，但她们虽然互相拿他来威吓，同时却又对他形成一种迟钝的、隐秘的、自然而然的对抗。阿加拉芬娜·康特拉季耶夫娜，由于目光非常浅近，她无法自己来弄清楚自己的感情，而只能唉声叹气地表示，什么她很苦。可是里波契加却毫不客气地说：“妈妈时刻都在改变主张；爸爸——要是不喝醉，他就一声不响，一喝醉，可就要打人，等着瞧吧……受过教育的姑娘怎么能够忍受这个呢！”所有家里的仆人也都渗透着这种阴沉，畏

缩的感觉：男童基施加抱怨着被主人打耳光；女厨子福敏尼希娜也和乌斯基尼雅·那乌莫夫娜——这个替鲍尔肖夫的女儿里波契加寻找新郎的媒人，有过下面的谈话：

乌斯基尼雅·那乌莫夫娜 坐呀，福敏尼希娜，——你的腿没有劲，又有毛病。

福敏尼希娜 啊，妈妈！没有工夫呀。你瞧，受的是什么罪呵：他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从城里回来，大家都吓得要命啦；等着瞧吧，他一定醉醺醺回来。啊，老天，他是多么凶恶！这种凶暴的人，真不知道怎么会出生的！

乌斯基尼雅·那乌莫夫娜 大家都知道：跟有钱的人在一块，真象跟魔鬼在一块一样，一下子简直捉摸不透。

福敏尼希娜 我们已经领教过他的折磨。上星期，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回来；就大叫大骂起来。那真是吓死人呵！把盆子都打碎了……“哼！”他说，“你们这些家伙，一起宰了你们。”

真的，可以说萨姆松·西雷奇使得全家的人都陷进了象畏惧上帝一样的恐怖里。当他出现的时候，大家就直瞅着他，一边提心吊胆地努力猜测，——他现在是怎样啦？从这短短的一场戏中可以领会他给全家散布了一种怎样的恐怖。福敏尼希娜跑进了屋子里，就叫道：

福敏尼希娜 萨姆松·西雷奇来啦，好象已经喝醉啦！……

基施加 啊！要遭殃啦！

福敏尼希娜 跑呀，基施加，跑到拉查尔那儿去吧；好孩子，快跑呀……

阿加拉芬娜·康特拉季耶夫娜（在扶梯上出现）喂，福敏尼希娜，我的妈，他往哪儿走？

福敏尼希娜 看样子，我的妈，他是朝这儿来呢！啊，我要把门关起来，天呵，要把门关起来；让他走到楼上去，亲爱的，你就待在这儿吧。

但是结果萨姆松·西雷奇根本没有喝醉；这不过是福敏尼希娜的想象。不过这已经很明白，这种不分皂白地统治着一切人的沉重的专制主义，是怎样使大家的见解混合起来，怎样消灭着彼此间的区别：母亲、女儿、女厨子、主妇、男童、掌柜——这一切人在艰苦的关头，便都汇合成为一体——汇合成为一个关心着如何防卫自己的被压迫的集团。福敏尼希娜在别的时候是要殴打基施加，把他乱支使的，可是现在却求他跑开去，并且叫他好孩子；而当阿加拉芬娜·康特拉季耶夫娜可怜相地对她的女厨子提出这个问题时：“喂，福敏尼希娜，我的妈……”福敏尼希娜就同情地看着她，并且准备用关门来掩护她……只有掌柜拉查尔·波德赫留静，才稍稍能够置身在每一个踏进鲍尔肖夫家的人总要挨到的那种恐怖的事外，他和他的主人是有一种偷偷摸摸的、心照不宣的同盟联系起来的，而且自己也准备做一个小小的顽固暴君。在波德赫留静的身上，我们看出了这是另一种低级的顽固暴君，他到现在为止还是受着沉重的压迫，可是已经开始抬起他的头来了……当那个媒人跟波德赫留静说话的时候，她对他这样说：“你自己不是也知道，我们这位萨姆松·西雷奇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他会冷不防把你连头发带帽子都揉得皱皱的。”可是波德赫留静却很有自信地回答：“他不会揉皱什么东西的。”而当基施加为了拉查尔打了他的脖子，威吓着他要去告诉主人时，他就回答得更加坚决了：“告诉主人！你的主人关我

什么事！倘是这样我就……”他开始这样说，但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可见，就是他吧，也并没有忘记萨姆松·西雷奇是怎样的一个怪物。然而，当鲍尔肖夫为了宣布自己破产所布置的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时，波德赫留静可就嚣张起来了。他觉得自己已经达到可以把他的监狱看守推进牢门去的地位，他自己就是从这扇门里跳出来的。然而监狱大门的钥匙却还留在看守的身边，还得把它们要过来，因此波德赫留静虽然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在监狱里了，可是同时却又知道他还没有完全得到自由，他就常常从沾沾自喜转到了烦扰不安，使傲慢无礼和奴性卑屈混合了起来。他这时已经获得鲍尔肖夫的房子和店铺了；他还得去完全掌握老人的财产，并且还要娶他的女儿，他是非常喜欢她的。波德赫留静的成功的希望就寄托在鲍尔肖夫的专横顽固上。他并没有耗费长时间的探索，也没有做出特别阴险的计划，他只是怂恿那个媒婆去说服里波契加的原来的那个贵族出身的未婚夫，而自己却以卑屈谄媚的声调，对鲍尔肖夫表示关切的语气，去迎合他。他的事先的打算是非常简单的。他这样自言自语说：

“知道了萨姆松·西雷奇的性格究竟是怎么样的以后，这就很容易对付了。他有这样的习惯：只要他脑子里想到了什么，那就没有法子把它从那里除掉。正好象三年以前，他打算剃掉胡子一样：不管阿加拉芬娜·康特拉季耶夫娜怎样请求，不管她怎样哭泣，——他还是说，‘不，以后可以再养起来的，但是现在我要照自己的意思做。’他既然决定了，他就剃了。所以这件事也可以这样来办：只要迎合他的意思做，或者他的头脑里自己想到这样做——那末明天就可以去结婚了，可能事情就这样定局，谁也不敢说一句话。”

很明白，全部打算是并不怎样复杂的；他完全摸准了鲍尔肖夫的专制的性格。这里当然用不到什么特别的狡猾，因为每一个混蛋都没有一定的准则，顽固暴君更不用说了，所以，正象乌斯基尼雅·那乌莫夫娜所说，对于这种顽固暴君，您是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波德赫留静很知道他是在碰运气。“或者是迎合他的意思做，”他说，“或者是他的头脑里自己想这样做”——这两个机会同样是可靠的，也同样是不可靠的。而说到迎合，这里也不需要花费怎么多的心思：吹嘘自己的顺从，吹嘘自己的感激涕零，吹嘘自己给这个人效劳是多么幸福，自己在他的面前是多么渺小卑微，——此外对于这班具有专制性格的笨伯，就不需要再作别的奉承了。在人生的各种各样的交往中——这是最低级的一种，它并不比在下棋时只能料到后面一着棋的情形高出多少。鲍尔肖夫所以会被这种简单的欺骗所征服，就因为他那种专横的习惯已经剥夺了他身上的一切判断力，已经毁灭了一切直率地、健全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他把他自己当作一切只要他的活动能够接触到的人们的唯一的法律和中心。他在自己的家里就把这一点表现得十分赤裸裸。他这样说到女儿：“孩子是我的：我要把她拌稀饭吃就拌稀饭吃，我要把她榨油就榨油。”因此违反女儿的意志，强把她嫁给波德赫留静，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一件有趣的玩意儿。“你先到未婚妻跟前去，”他对拉查尔说，“我们来跟她们开一下玩笑。”玩笑是这样的，他向妻子和女儿出其不意地宣布，拉查尔已经是里波契加的夫婿了。所有的人——母亲、媒人、福敏尼希娜，以至女孩子自己，都弄得昏头昏脑起来，不过女儿到底是受过教育的，终于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表现坚决反抗的力量，她叫道：“我不要，我不要，我不愿意嫁给这个讨厌鬼。”但当然，这种反抗，什么结果都得不到：您没有办法去说服

萨姆松·西雷奇。何况波德赫留静又在这时候向他撩拨，他狡猾地说：“爹，你瞧，不会听从你的意思的。”这些话已经足够促使鲍尔肖夫强把女婿的手跟未婚姑娘的手联起来，并且这样反驳：“既然我打算这样做，怎么能够不如我的意？要是我不能发命令，干吗要做爸爸？难道我是白白养活她的？”您瞧，鲍尔肖夫在做父亲的责任上，只承认了一件事：向孩子们发号施令。他既然养育了女儿，那么这就是恩惠了，为了这个恩惠，她就得以完全排斥自己的意志来报答他。在一切活动上，就正是这样的。例如，他自己也察觉，波德赫留静是一个骗子；可是这事情却跟他不相干，因为波德赫留静就是他的掌柜，正在为了他的利益而努力。他毫无什么羞耻地斥责波德赫留静忘恩负义，向他指出这些事实：“记住，拉查尔，我已经好几次发现，你的手脚有点不干净；不是吗？我可没有把你赶走，也没有在全城破坏你的名誉。我让你做了掌柜，我把我的财产都给了你，而且，拉查尔，我把自己的女儿也双手给了你。”这一切都是希望拉查尔能够继续出色地进行欺骗，去赚取一切人的钱，当然，只除了鲍尔肖夫自己。同黎斯波洛任斯基——这个包揽词讼，有时也替鲍尔肖夫经办一些讼事的、嗜酒的法院书记，也是这样的：萨姆松·西雷奇嘲笑他怎样被人家从法院里赶出来，而且非常严厉地断定，必须把他充军到堪察加去。黎斯波洛任斯基问他：“为什么要到堪察加去？”鲍尔肖夫这样回答：“为什么？为了你无法无天！难道还要纵容你吗？”然而这种对一个被开除职务的官吏的所作所为的严厉的看法，一点都不会阻挠萨姆松·西雷奇去要求这个人在他所策划的诈欺破产中，给他效劳。鲍尔肖夫仿佛把自己看作是完全超脱于道德规则以外的人，而这种道德规则对于其他的人他却认为是一种义务。这种奇怪的现象（可是它在我们的社会里却是屡见不鲜的）的所以产生，就是因为鲍尔肖夫不了解社会联盟的真正原

则，不承认一个人对于其他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互相保证的关系，他也象普查托夫似的，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敌对的阵营。“我只想把自己尽量弄得好一点；至于，谁挨受谁的折磨，或者谁得到利益，这可不干我的事；要是有谁在受苦，那末这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太疏忽啦。”鲍尔肖夫的一切打算就是立脚在这种考虑上面的，他想宣布破产，也就是受这种考虑所唆使。人们责难奥斯特罗夫斯基，说他没有在他的喜剧中，把鲍尔肖夫心里的那种要宣布自己破产的企图——是以什么形式，是由于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影响的结果，是通过了一种什么样的彻底性，是和鲍尔肖夫性格的一般特征怎样适应着而显现的等等，非常完整而明朗地表现出来。“诈欺破产，”批评家们说道，“是一种比简单的欺骗、偷盗和杀人更要可怕的罪行。它把这三种罪行都结合在自己的身上，它所以更加可怕，这是因为它是深思熟虑地进行的，它是准备了很长时间的，它要求巨大的阴险的忍耐以及最无耻的镇定自若。只有具有错误的确信的人，或者是由于一种特别恶劣的影响的结果，才敢于犯出这种罪行来。但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里，对于这一点，却不但一点都没有加以表现，甚而至于还把鲍尔肖夫的破产，简单地当作一种欲望来描写：就是他不愿意把款子付出去。”所有这一套说法，在理论方面说来，虽然是完全真实的，然而实际上却是和俄罗斯生活不相符合的。因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种生活根本不可能促使随便哪一种信念形成起来，假使它们居然能够在什么人身上出现了，也不会让这个人去发挥它们的。只有一种信念，才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繁荣开花，——这种信念认为，不需要有（或者最低限度是显露出来）什么道德的信念。然而，象这种信念就连萨姆松·西雷奇也不是没有的，虽然它还没有怎样在他的头脑里明朗起来；就由于这种信念的结果，他就去笼络拉查尔，跟黎斯波洛任斯基打交道，

并且决定宣布自己破产了，总之，必须说，我们的“黑暗王国”中的某些生活，就只是因为凭借这种信念的帮助，才能得到保持；由于它的力量，事业搞出来了，利害相关的集团组织起来了，资本积累起来了，普遍的尊敬也获得了。如果在“黑暗王国”中，这种唯一的信念没有得到发展，那么在这里面什么东西都要停滞起来，昏睡起来，冻结起来了。当然，在这个王国里，是也有一些禀赋着坚定的道德原则，禀赋着正直而神圣的信念的人们的；可是，抱歉得很，这些人却全都是奥勃洛莫夫型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在实践活动里，也不是在和生活的虚伪性的战斗中获得他们的信念的，而是在阅读优良的书本中，在跟朋友们热烈的谈话中，在面对女子吐露庄严的誓言中，乃至当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在高贵的幻梦中得到的。这些人从幼小的时候起，就能够不被拖到实践活动里去，——他们得到了许多空闲的时间，用来思索自己对于世界的关系，以及思索支配着自己的行为的道德原则！他们站在实际活动范围之外，遐想着美丽的事物；然而也因此他们就不适合去做真正的工作，而等到他们不得不和“黑暗王国”里什么事物或者什么人冲突的时候，就显得毫无用处。在开头，当他们带着奥涅金的带柄眼镜，穿着彼巧林的严肃的无袖外套，发表着罗亭式的庄严的演说而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对他们表示惊异，可是后来就了解，这些全是奥勃洛莫夫，如果他们还能够使得几个姑娘感到惶恐的话，那么无论如何，对于实践家总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这些怀着纯正的愿望和独立的信念的人（但在事实上，由于他们不善实践的结果，他们就常常改变这种信念），他们就这样站在生活之外。所以如果不能说，当他们在跟包围着他们的猛兽决斗的时候，他们象鸽子一样纯洁，那末至少也能肯定地说，他们是象鸽子一样柔弱无力。至于“黑暗王国”中，那些能够有进行活动的力量和习惯的住民，他们大家当跨出第

一步的时候，就踏上这样的岔路，从这儿是无法获得纯正的道德信念的。在这里要工作的人永远找不到和平、自由与有利于公众的活动；他还来不及四面察看，就发觉，不知道怎么一来，自己却已经落在敌人的阵营里了，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就应当想些什么方法来欺骗他的敌人，甚至不惜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心甘情愿的叛徒。于是他为了蒙蔽敌人的警觉心，使自己能够逃开他们，就开始使用起狡猾来；如果这是成功了，那么就再想些恶意的行动去回敬他们，这一部分是为了复仇，一部分是为了保卫自己摆脱新的危险。这儿什么地方可以让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确观念得到发展呢？这儿什么地方可以培养对于人类尊严的尊敬呢？在这儿，所有的人都应当为了别人的什么不公平的行为连带负责，所有的人都要为了那种我在其中根本没有什么错处的事情而加害于我，我也得被迫去回击所有的人，即使根本没有一点要打击别的什么人的欲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人终于不再加以辨别，开始碰到人就打，甚至在还没有丧失他根本不当去殴打什么人的这种意识的时候都是如此。这里，令人不由自主地又要拿“黑暗王国”的生活，来和酷烈的战争相比较。在战争中，如果一个士兵要打死一个不曾向自己这边阵营打过一枪的敌人，这不算什么罪过：那个人吃了一弹——也就完了。杀人者的士兵在良心上不会觉得难过。那么，一样的，如果一个商人去欺骗一个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做过些微恶事的最诚实的人，那又有什么罪过呢？他在买卖货物，这就够了；买卖货物就是打仗，不欺骗，就卖不掉！……把这个结论用到“黑暗王国”里的地主身上去，用到官吏身上去，或者用到你喜欢的随便什么人身上去，——也都是一样的：大家都置身在战争状态中，正因为没有一个人有什么道德的信念，就没有一个人的良心会为了欺骗或是占有了别人的东西，而觉得内疚，大家都能够适应着环境而

生活下去。

因此，我们就能在这里找到深刻地忠实的、典型的俄罗斯的特征：鲍尔肖夫在他的诈欺破产中，除了害怕可能要吃官司以外，既没有什么特别的信念，也没有体会到什么深刻的内心斗争……从抽象方面看来，我们觉得好象一切罪行都是十分恐怖、十分不平凡的；然而在特定的场合上，做起它们来，大部分都是非常容易的，而且解释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强盗，一个杀人犯，要在刑事法庭上受审；于是你就以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天生的怪物。可是你再仔细一看，——就发现他根本不是一个怪物，而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甚至还是一个好心的人。而且他也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以为抢劫与杀人是一些值得称赞的东西；当他完成这种罪行时，也并没有跟自己经过艰苦而持续的斗争，而只是偶然地干了出来，自己也没有好好地知道干了些什么。如果你去跟那些看见了许多犯罪者的人谈一下，他们就会向你证明，这种事情是常常会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每一种罪行并不是人的本性的结果，而是他在这种社会里所处的一种不正常关系的结果。这种不正常关系越是强烈，那末这种罪行就越是会层出不穷地出现，甚至禀性正直的人也是这样，而在犯下这种罪行来时，也越是缺少思考，缺少条理，越是显得偶然，几乎是无意识的样子。在这个我们所观察到的“黑暗王国”里，它的社会关系的不正常性，已经到达了极限，因此，它的居民在道德问题上完全失去一切理解力，这就显得明白了。他们对于犯罪，只了解它的外表的法律的一面，如果能够跨越过去的话，就不客气地加以蔑视了。至于它的内在的一面，至于这种罪行对于其他人们以及对于社会所产生的结果，他们就完全不加考虑了。鲍尔肖夫在策划诈欺破产时，他并没有想到，这可能影响到债权人的幸福，而且，说不定，还要迫使几个人

沿街求乞。这种思想甚至在把他抓到监狱里去时，都不会来到他的头脑里的。他叽咕说，当他走过伊伯里安门^①，一看见伊伯里安圣母像，就觉得害怕，他还抱怨，小孩子们都用手指向他指指点点，他害怕会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去；然而关于那些被他所害苦的人，——就一句话都不说了。所以，他这样轻易地决定去进行一件他并不了解而在本质上是卑鄙丑恶的罪行，这有什么惊奇的地方呢！他只看到“别人也这样干”。这句话对于他并不是一种辩解的句子，也不只是一个例子，正象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一个严厉的批评家所断言的。不，这是鲍尔肖夫全部道德的出发点。他看到别人也在宣布破产，把他的钱据为己有，后来就依靠着这笔钱给自己建造附有望楼的房子，置办出色的马车；于是他马上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为了不让别人来赢我，我应当努力去赢别人。”鲍尔肖夫的债权人会不会宣布破产，会不会来陷害他，这已经不必去注意了；反正，只要能够攫取到自己的利益，什么人身上都好。这里，正象在战争中一样，是没有什么个性可以分析的。现在，如果没有人在进行欺骗，那么这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战争，那时候就是萨姆松·西雷奇也能很安静地而且正直地过活，对谁都不加以欺骗。可是当一切周围的人都在进行欺骗的时候，他又怎么能够控制自己呢？谁可以从他的正直上得到益处呢？不是他，那么别人也是要欺骗的，反正是一样。请看鲍尔肖夫跟波德赫留静对于这个题目的谈话：

鲍尔肖夫 这样，拉查尔，到你有空闲的时候，你给我做一张结算表，把那跟大户人家往来的零卖账核算核算，还有别的什么账。要不然，买卖尽是做下去，做下去，兄

^① 这是帝俄时代克里姆林宫围城城门之一，附近曾有伊伯里安修道院。

弟，却一文钱的好处都没有。还有那些伙计，他们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坏事，把东西偷给家里的人，或者是相好的；你也得多少劝劝他们。做买卖不赚钱，那贪图什么呢？他们连做买卖的窍门都不知道吗？好象该是时候啦。

波德赫留静 这怎么可以，萨姆松·西雷奇，怎么能够不知道做买卖的窍门？难道我自己不是常常进城去，常常跟他们谈起的吗？

鲍尔肖夫 那你怎么跟他们说的呢？

波德赫留静 那当然罗，我尽力把一切事情都弄得井井有条，都合乎规矩。我说，伙计，你们可不能大意：你们瞧，只要一有适当的机会：如果买客是个糊涂蛋，或者一种颜色和花样中了一位姑娘的意，——那么，我说，每一尺就可以涨一个或者两个卢布。

鲍尔肖夫 你总该知道，兄弟，德国人的铺子里怎样搜刮咱们阔老们的钱。当然，咱们可不是德国人，而是正教教徒，可是咱们也要吃有馅儿的面饼的。不是这样吗，唔？

波德赫留静 那当然。我还说，量起尺寸来，也要做得很自然：把它拉直，轻轻地拉直，只要上天保佑，不裂开来就行；要知道，我说，以后穿的不是咱们。顾客要是很大意，这就不能怪什么人，——我说，说不定，只要一挥手，就可以混过去一尺。

鲍尔肖夫 反正总是一样的：裁缝不是也要揩油的？唉，拉查尔，现在利息很不好：不象先前啦。

事情已经明白：萨姆松·西雷奇的全部道德，就以这个规则为基础；与其让别人偷去，还是我来偷的好。这个规则也

许并没有什么戏剧趣味，——这都听批评家的便；然而在我们的生活范围中，它却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就根据这个原则，有的人收取贿赂，违拗自己的良心，一边想：反正是一样，——不是我，那么别人也要拿，别人也要违背良心的。还有一些人坚持他的地主的权利，他盘算：反正是一样，——如果不是我来管理，那末周围的人也要压迫我的农民的。还有人向长官献媚邀宠，他想：反正是一样，——要知道，如果没有我，那么他就会另外找别人给自己效劳，我徒然损失了位置。总之——不管你转到哪里去，到处都可以碰到按照这个规则而行动的人们：这个人殷勤招待无赖坏蛋，那个人欺骗有钱的糊涂虫，第三个人在进行密告，第四个人在引诱姑娘，——这一切都立脚在这同一个可爱的理由上：“不是我，就是他。”这已经很明白，这种想法完全是不足为训的……它无非是由于缺乏任何崇高的道德原则，一种最粗暴、最可恶的利己主义的表现而已。

由于这种利己主义的暗示，鲍尔肖夫就策划起他的破产来。他的利己主义，就这方面说来，是也还有可以原谅之处的：他不但看见了别的人倚靠破产而发财，而且他自己也正由于许多债务人无力偿付而遭受过一些损失。他向波德赫留静痛心地说起这件事：

“你现在总该知道，拉查尔，做买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倒想想！你以为能够白白收到钱？人家说，哪来的钱，——只看到它象青蛙一样蹦跳。拿去吧，他们说，给你一张票据，可是他们身上什么都拿不出来，那你凭这张票据可以要到什么呢！我手里这样的票据，总有十万卢布上下，都有退票理由单，每年只看到加上去。你只要拿半块银卢布，就全部奉送给你！这批欠债的，即使带了猎狗去搜寻，也搜不到

的：有的死了，有的逃跑了，——没有一个人坐牢。就是坐牢了，拉查尔，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有的人坐了会习惯的，用烟都不能把他从那儿熏出去。他们说，我在这里很不错，你还是走吧。”

鲍尔肖夫凭借这些理由，就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利对那些债权人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开头在他心里还只有一种模糊不明的愿望——他想尽可能避免偿付欠款，——这笔款项有许多必须在同一时候支付。他当时只挖空心思想“这方面可以耍些什么花巧”，可是对于这件事，不论他自己，不论他的顾问黎斯波洛任斯基，——都还不曾好好地了解。黎斯波洛任斯基曾经这样回答鲍尔肖夫的问题：“那要看情形了。”但他们立刻就打算——强要债权人订立契约，——全部款项以每卢布折付二十五戈比的比例偿付，要是有人强索了，那么就再加一点，要再不肯，那么就全部照付。鲍尔肖夫说：

“正是这样，讲讲价钱我看不会有妨碍：要是二五折不接受，那么就会接受对折；要是折对折不肯接受，那么照七折算，他们总会伸着两手来抢的。横竖有利可图。随便你怎么说吧，我可还有一个要出嫁的女儿，需要现在就找个婆家，需要把她打发出去，而且我自己，我的老弟，也到了休息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清静清静，在床上躺躺，让所有的买卖都见它的鬼去吧。”

你瞧，鲍尔肖夫的决心是非常善良的，完全显不出他有什么特别恶毒的性格：他所以要尽最大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从债权人那儿攫取一点什么，就是为了他还有一个待嫁的女儿，他自

己也需要安静……这里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呢？为什么鲍尔肖夫应该体会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灵魂激动呢？他把他的新的打算，当作他在从前已经干过不少的那些欺骗中间的一件，这种欺骗对于他完全是一种正当合法的东西。只有一件事多少有点使他烦恼——这就是，他显然还没有好好地把握他的手法。这一部分是因为他胆怯，所以他老是想跟债权人缔结按二五折偿还的契约。然而波德赫留静却对他说：“照我看来，萨姆松·西雷奇，与其按照二五折偿还，还是完全不付更好，”于是鲍尔肖夫就毫无什么反驳地十分轻率地同意了。“我想，”他说，“正是这样，勇气，决不会使什么人奇怪，可是还是不声不响地来做这件事比较好。将来到了基督再临的时候，可以让上帝来审判。只不过麻烦却是很多的。”然而对于这种算计债权人勾当的不道德性，鲍尔肖夫却一言不发，一点暗示都没有。他只想起了“上帝的审判”；但就是这个也多半是形式上的：“基督再临”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并不比鲍尔肖夫在那句家喻户晓的话里所说的“上帝保佑”，赋予更多的东西：“波拿巴归波拿巴，可是我们一切还得多多依靠上帝，何况现在还说不上这种话。”就正因为还说不上这件事：鲍尔肖夫所注意的，就不是要在将来的什么时候才到来的第二次降临时的审判，而是对于迫近眉睫事情的操心了。这些操心使他弄得非常狼狈：它们根本就不是他的性格所适宜的。仅仅是突如其来的作一二次欺骗，即使是采取最无耻的形式，——这对他倒还没有什么；然而要他去思索、策划、或者长时间去准备一种欺诈，去准备整个的阴谋，——去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无耻，他就无能为力了，而所以无能为力，完全不是因为在他的身上缺少什么无耻和狡猾，——不论这个，不论那个，在他的身上都是很丰富的，——而纯粹是为了他不习惯于严肃地思索什么东西。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苦闷的时候，甚至还这样

告诉黎斯波洛任斯基说：“这真是糟糕，我们的兄弟，这些商人，都是笨虫，——他们什么都不懂，这就方便了象你这样的蚂蝗。”甚至可以说，鲍尔肖夫的全部专横顽固，就是因为不习惯独立而有意识地活动而发生的，虽然在一种无可怀疑的天赋智慧之下，对于这种活动，他也会有所冲动。在喜剧里，我们看不到鲍尔肖夫怎样成长，怎样受教育；从小时候起是一种什么影响对他起作用；然而这一点我们却是很明白的：他也是在一对于正常、独立的发展不利的影响下熏陶出来的。在他的行动中，常常可以看到他缺乏一种自己的智慧；显而易见，他不习惯理智地唤醒自己去从事活动，并且让自己去了解自己的种种行为。可是虽然如此，他现在的地位以及他那还没有在压迫之下遭受彻底破坏、内部还保持着一种矛盾精神的性格本身，此刻正在要求一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在顽固专横中表现出来。大家都知道，顽固就是缺乏性格的征象；专横顽固也正是内部无力和奴性的忠实证据。顽固独夫正在努力证明，没有什么人可以命令他，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然而一个真正有独立与坚强灵魂的人，永远不需要证明这一点的！他把他的性格的力量，只使用在那里需要它的地方，他不会把它在荒谬的打算上作为一种试验而浪费。鲍尔肖夫老是兴奋地重复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他愿意干的事，没有一个人可以命令他；仿佛他自己还无法决定去相信这一点似的……可见，他那天性上还不是柔弱的个性，说不定在过去就被强烈地压制下去了，他的灵魂的固有的力量也大部分都被剥夺掉了。就因为这样，一旦到了自由自在，他就不会驾驭自己。他在专横顽固的时候，好象是很可怕的，可是这只是因为，无论在另一方面，他都没有遭到反抗；斗争，他却是忍受不住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别的喜剧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把这种特征表现出来，因此我们打算以后再回到这方面来。可是它在鲍尔肖夫

身上也是很显著的，鲍尔肖夫甚至在决定采取象诈欺破产这样步骤的时候，他都是不但努力把麻烦从自己身上推开去，而且简直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从自己的利益面前退却开去，甚至拒绝把自己的意志放到这个勾当里面去，把一切都推卸给命运……波德赫留静和黎斯波洛任斯基互相勾结好了，进行这样的密谋，使鲍尔肖夫决心宣布自己破产，来代替和债权人订立契约。然而波德赫留静却又装作劝阻他做出这种行为的样子。鲍尔肖夫怎么回答呢？他一时兴奋起来说道：“怎么，付钱吗？你是怎么想出这个主意来的？我宁愿拿一把火把一切东西都烧掉，可一文钱也不给他们。把货都搬去吧，把票据都卖掉吧，谁要，就让谁拖去吧，抢去吧，我总是不会付给他们的。”波德赫留静惋惜，“我们的店本来是很出色的，现在一切都要弄得乱七八糟了；”可是鲍尔肖夫却叫吼道：“这关你什么事？这不是你的事……你只要努力做，——我不会忘记你的。”是什么东西把他攫住了？有人会想，这就是那种坚强性格的爆发，这就是那种不屈不挠的意志了……可是，第一，是什么东西在他心里激起这种违反他自身利益的决心来的，同时，为什么他的意志只表现在对波德赫留静的叫喊中，而不是表现在对于实际事务的积极参与中呢？第二，——鲍尔肖夫自己很快就舍弃了他的意志。当波德赫留静向他说明，那可能会碰到“什么麻烦”，说不定他的产业要被剥夺去，他自己也要被拉到法庭去的时候，鲍尔肖夫就回答：“有什么办法呢，兄弟；要知道，这实在是上帝的意志，违反它是不行的。”波德赫留静这样回答：“正是这样，萨姆松·西雷奇，”但是在实际上，它并不是“正是这样”，而是非常愚鲁可笑。鲍尔肖夫不但想把一切道德责任都从自己身上推卸掉，甚至还竭力不去思索他所计划的勾当。已经采取的决心，在他的脑子里，是盘踞得很牢固的，可是这种决心好象没有和他的思想

与观念中的什么东西联系起来，因此对于他就显得是陌生的、死板的东西了。他甚至竭力在相信，就是：这不是他自己决定的，“实在是上帝的意志，违反它是不行的。”这种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分布得非常广泛的特征，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里，也得到了非常精细与真实的表现。单只是这个特征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很多的东西，而且把鲍尔肖夫的性格，钩画得比用几个悠长的独白所能够描写他的还要好。这种理性上的黑暗，对于思考的嫌恶，在一切冒险行动的面前意志的无力，就产生了这种愚钝、绝望的宿命论以及甚至要违背个人利益的专横顽固，这一切都非常突出地表现在鲍尔肖夫身上，而且非常容易地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把他的产业交与他的掌柜兼女婿波德赫留静的这个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有的批评家想要看出这是仁慈宽大的一种难以理解的迸发，以及对于李尔王的模仿。在鲍尔肖夫的行为中，的确和李尔王的行为有外表上的相似，然而这种相似也只止于一种喜剧现象能够和悲剧现象相似的程度而已。李尔在我们看来，也是一种畸形发展的牺牲品；在他的行为中，充满着骄傲的自觉，他以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伟大的，而不是由于他手里掌握着权力，这种行为同时也是对他的骄傲自大的专制精神的一种惩罚。然而假使我们能够把李尔和鲍尔肖夫来对比一下，那末就可以发现，他们中间的一个，从头到脚就是一个不列颠王，而另一个却是俄国商人；在这个人身上一切都是堂皇的、华贵的，在另一个人身上却一切都是脆弱的、渺小的，老是在计算每一文钱。李尔的确有坚强的性格，因此普遍的对他卑屈奉承，只不过使得这种性格得到了片面的发展——他不再为了仁爱这个伟大的事业以及普遍的利益而打算，而仅仅是为了满足他自己个人的欲望。这一点在那种习惯于把自己算作是一切欢喜与快乐的来源，算作是他的王国中一切生活的开始和终结的

人们身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儿，由于外部行动天地的广阔，由于一切愿望都能轻易得到奉行，他的精神上的力量便无从发挥。但是他的自我崇拜终于越出一切常识的范围：他把由于自己的地位而享受到的一切光荣，一切尊敬，都直率地归之于自己个人，他决定抛弃他的权力，他相信，在这样做了之后，人们仍旧会继续对他表示敬畏的。这种痴愚的确信促使他把王国转让给女儿们，因此，他就从他的野蛮无意识的地位转到一个平凡人的普通地位，体验到了一切与人类生活相结合的悲苦。他的灵魂中的一切好的方面，也就在这里，就在这个紧跟着而开始的斗争中显露了出来；同时我们也在这里看出他也有宽大仁慈，也有温和，也能同情不幸者们，也有最富于人道的公正心。他的性格的力量不但表现在对于女儿们的诅咒里，而且还表现在当着考黛丽霞^①的面，认识自己的错误中，表现在痛惜自己的严厉的性格中，表现在悔恨他很少去想到不幸的穷人，很少去爱过真正的诚实中。就因为这样，李尔就有这样的深刻的意义了。当观察他的时候，开头我们会对这个毫无约束的专制暴君觉得痛恨；可是，跟着戏剧的发展，我们却越来越会把他当作一个人而加以谅解，而到了最后，我们就已经不是对他，而是为了他、为了整个世界——对那种甚至能够把象李尔这样的人们也引到无法无天去的野蛮而无人性的环境，充满着不满和炽烈的憎恶了。我们不知道，对别人究竟怎么样，可是，至少，《李尔王》对于我们，是常常能够引起这种印象的。

有一个批评家相信，奥斯特罗夫斯基也要把他的鲍尔肖夫抬高到同样的悲剧地位，为了这一点，他就在第四幕中，拉着萨姆松·西雷奇走出拘留所，使他去恳求女儿和女婿替他按照二成

^① 李尔王第三个女儿。

半的比例把欠款偿还债权人。这一种见解暴露了他不但完全不了解莎士比亚与奥斯特罗夫斯基，而且连一般的戏剧情势的道德素质都不了解。照我们的意见看来，在最后一幕中，鲍尔肖夫一点都没有在读者的眼里提高，一点都没有失去他的喜剧性格。在最后几场中，是有悲剧的成分的，不过这种成分在这里所起的只是纯粹外表上的作用，例如，正象它在《钦差大臣》中那个宪兵的出场时所显现的一样……可是这里，那种能够使人去哀怜鲍尔肖夫，对他的个性表示谅解的内在的悲剧性，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种把鲍尔肖夫性格上的专横顽固的浓密的苔藓洗净并且擦清的内心斗争的痕迹，又在哪里呢？并没有这种痕迹，而且这个喜剧也并非为了指出这一点而写的；我们以为它的最后一幕，不过是把鲍尔肖夫的性格彻头彻尾描写给我们看的神来之笔，这种性格，在它的自然生长中，已经被敌对的、压力沉重的环境所阻碍了，它不但在有利于进行广泛而独立活动的情势中，而且也在又把它束缚起来的灾厄中，都显得衰疲无力并且渺小卑微的样子。对于我们，就是在最后一幕中，鲍尔肖夫也不失为是可笑的；在他自己给自己惹出来的大变动以后，并没有一道光透过这黑暗的灵魂。他一点都不认识他的行为的丑恶，他也并不为内心的羞耻而苦恼；使他气苦的只是外表上的羞耻；债权人把他拉到法庭上去，坏孩子们用手指向他指指点点。

“坐在监牢里是什么味儿呵，”他说，“在街上跟着大兵走又是怎么样呵！四十年来，全城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我，四十年来，没有一个人不向我鞠躬到底，可是现在，小孩子都在用手指向我指指点点了。”

这就是在他心里首先出现的，至于伊伯里安圣母像则是后

来才出现在他的思想中的，可是就连这个也并不怎样长久：他对于圣母像的回想，立刻就被害怕在西伯利亚过不惯的念头所代替了。这就是他的话：

“我在经过伊伯里安门的时候，我要怎样去看她，怎样去看圣母呀？拉查尔，你知道，好象我们为了钱，把良心卖了一样，犹大也为了钱，把基督卖了……为了这件事他受到了什么呢？……要知道我这是故意的，预谋的……人家要把我充军到西伯利亚去。老天！要是你不肯光光为了我而给钱，那么为了上帝，总得给我呀（哭泣）。”

可惜得很，《自己人》不能在戏院里上演：有才能的演员，是能够以惊人的力量把伊伯里安圣母和犹大、充军到西伯利亚去和求乞这种荒谬的混合——它的全部喜剧性，表现出来的……这段台辞的喜剧性，由于前面以及后面的对话抬得更高了，波德赫留静在这场谈话中，冷漠而且婉转地拒绝给鲍尔肖夫偿付超过一成以上的债款，于是鲍尔肖夫——一会儿叱责他忘恩负义，一会儿威胁他要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提醒他，他们两个人都会同归于尽的；一会儿责问他以及女儿，他们心眼里还有没有基督，一会儿为了自己失策而自怨自艾，并且引出这样的谚语：“斩草不除根，只好自食其果，”——最后，又以嘲笑的态度向女儿说：

“好吧，现在您是有财有势了，您可以象阔人家小姐一样过活了；去参加晚会，参加舞会——安慰魔鬼去了！可是奥令庇阿达·萨松诺芙娜，您可别忘记，还有装着铁格子的牢房，那里坐着一些穷苦的囚犯……别忘了我们，这些倒楣

的囚犯呀。”

照我们的意见看来，整整这一场，和《钦差大臣》里市长的痛骂商人，说他们不记得过去他怎样帮助他们进行欺诈这一场，是极其相象的。只是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里，这种喜剧的特征是刻划得稍为细微一点，并且还得承认，鲍尔肖夫个性的内在的喜剧性，在最后一幕他的不幸的境遇中，多少有点被掩盖了，就为了这一点，眼光锐利的批评家，就把一些奥斯特罗夫斯基大约在梦里也没有看见过的观念和目的，强加在他的身上。假使一个批评家认为在最后一幕中，鲍尔肖夫被作者那么描写，是为了诱使观众对他表示同情，批评家这种道德概念，当然是好的……但照我们的意见看来，到戏剧的终结，鲍尔肖夫比较所有以前几幕，是更显得卑鄙微末了。我们看见，甚至是不幸和坐牢，都很少能够启发他，都不能够唤醒他的人的感情，因此，我们要公正地断言，在他的心里，这种感情，显然是早就死灭，所以他就变得昏睡不醒了。他甚至到现在还在说，照二成半付给债主——这还是太多，可是人家再少就不肯收，那又有什么法子。

“他们把我在拘留所里关上一年半，每礼拜叫大兵牵着我街上走，而且等着瞧吧，还要把我转送到监狱里去哩，到那时才高兴付给他们五成。”

这个性格的可笑无力在这里不是很明显吗？既没有决心跨出勇敢的一步，又不能支撑持久的斗争。这个人物的道德上的卑微渺小，不也是很明白吗？在全剧之中一次也不曾显露过守法和尽责的自觉。不仅如此：在他的灵魂深处，甚至父亲和丈夫的感情都已经死灭了，这一点我们在全剧的最初几幕就可以看到，

在最后一幕也可以看到。妻子的悲哀一点都没有触动他，同时女儿的可厌的粗鲁，也并没有伤害父亲的感情。奥令庇阿达·萨松诺芙娜对他说：“爹，我在您这儿，生活了二十年，——还没有见过世面，干吗要叫我还您的钱，自己倒依旧穿了印花布衣服出门去呢？”鲍尔肖夫对这一点找不到更好的话来回答，除了拿他在把自己的产业交到女儿和女婿手里去的时候所扮演的无意的善举来责骂女儿和女婿以外：“我不是问你们要饭来的，”他说，“而是要自己的财产。”这种父亲对女儿的态度，难道不可笑吗？鲍尔肖夫在他整整一生中，能够给自己抽出来的道德，——他在自己的道德发展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就是：“别追求更多的东西，而要满足于已经有的；倘使你追求了更多的，那么连已经有的也要丢掉了！”这些话向我们指出了这种道德品质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一个蒙受自己诈欺破产的危害的人，在这种情势之下，并没有找到别的道德教训，除了这句格言：“要不丢失自己已经有的，就别强求更多的东西！”可是过了一分钟，他又在这句格言之上，加上他的惋惜：他不善于巧妙地玩花样，他引用这句谚语：“斩草不除根，只好自食其果”。这种性格的荒谬绝伦与道德上的卑微，在这里是多么强烈地表现出来，倘使根据那种使得一切周围的人都会感到的恐怖来判断，在戏剧的开头，这种性格也许多少还能显出一种力量！……可是却也能够找到这种批评家，他断定《自己人》的最后一幕，是应该引起观众对鲍尔肖夫的同情的①！

① 我们还打算征引一段H·II·涅克拉索夫从莫斯科所写的那篇不可思议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在《雅典尼》终刊号上，同时也部分地说明了这本学术杂志所以夭折的原因。“有人发问：因为自己欺诈而落到监狱去的鲍尔肖夫，为什么又在舞台上出现呢？难道作者是要唤起人们同情他，证明，这个商人坐在牢狱里是觉得多么可耻吗？然而，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权利来问：鲍尔肖夫凭什么得到同情呢？这最后一幕中的整个哭哭啼啼的第

然而，这个喜剧人物在实际上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呢？它的意义难道只限于如他所说，“请看吧，世界上竟有这样坏的人”吗？不是的，这对于这个严肃的戏剧的主要人物说来，是太少了，这对于象奥斯特罗夫斯基这样的作家说来，也是太少了。一个人从仔细观察鲍尔肖夫的性格中所得到的印象的道德意义，还要深刻得多。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奥斯特罗夫斯基才能的显明特点之一，就是他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灵魂最深处，不但看出他的思想和行为的轮廓，还有他的思维本身的过程，他

四场，其目的何在呢？大概是要证明给可敬的公众看：‘瞧吧，’他说，‘一个商人实行欺诈是多么不应该；而且，更坏的是结果却欺骗了自己。’这是多么出色的思想，它的道德原则又是多么崇高！……”

显而易见，这位批评家在理解道德原则的时候，并没有比萨姆松·西雷奇本人高出多少，因此就把上面我们所引述的鲍尔肖夫的话：“要不丢失自己已经有的，就别强求更多的东西！”——当作全剧的基本思想。这位批评家在用这种方式把鲍尔肖夫的见解跟剧作者本身的思想混合起来以后，就开始向奥斯特罗夫斯基宣读下面的训令：“作者有没有感觉到，使艺术受现实支配是多么危险？他有没有注意到，他的作品的道德的一面，是多么微末不足道？难道一种真正的艺术作品可以拿这种生活规箴作为根据：‘若要为人所欺，你就不要欺骗人’，或者，‘不要给别人掘坑，——掉进去的是你自己’，或者跟我们这个喜剧更接近的——‘不要欺骗，欺骗不是永远能够成功的’。人类的道德品质怎么能够在这里得到挽救呢？至少，这是不是把欺骗当作人类本性的卑鄙的一面来嘲笑呢？不……这个喜剧并没有告诉我们，欺骗（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而显现的）是怎样违犯人类的道德本性，而只是告诉说，不管我们关于债务的法律还有缺点，商人们有时候还是不免要自食其果，他们就因此而坐牢，后来就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真的，不能不同意，——真有这样的事情。可是把它在舞台上重演一番，又有什么必要呢？……”于是紧接这天真的问题之后，批评家就胜利地叫道：“奥斯特罗夫斯基君就是以这一幕他所特选的戏来适应作品的思想的！……”

我们以为，现在由于《雅典尼》的停刊，这位“来自莫斯科的H·П·涅克拉索夫”君，是可以给勃拉雪维奇编的《鹰隼》^②杂志，出色地写文章了。——作者注

② 《鹰隼》（Орел）——这是一种反动杂志；由勃拉雪维奇所出版，一共只出了四期。

的欲望的最初萌芽。这种能力我们在他创造鲍尔肖夫性格时也能看到，并且发现，由于作者心理观察的结果，他就能以非常人道的观点，来察看生活中显然是最阴暗的现象，而对人类性格的道德价值深深地感到尊敬，——还把这种感觉传达给读者。在鲍尔肖夫身上，在这詐欺破产中，我们看不到什么险毒的、离奇的东西，也看不到什么可以把他当作怪物的东西。作者使我们撇开正经堂皇的法律的观点，引导我们钻到正在实现的事实的本质里去，迫使那不光彩的算计在我们的眼前现形并且成长起来。我们在这个就法律意义上说来，是多么可怕的算计勾当中，看到一些什么呢？这里既没有阴险怨毒的影子，也没有伪善谰诈的特征！一切都是这样简单，善良而且愚钝！萨姆松·西雷奇决不是地狱中所诞生的，他不过是一头愚鲁的畜牲，在这种畜牲的身上，性格中一切能够引起同感共鸣的方面，从小就被窒息了，任何道德观念都没有得到发展。在他的性格中，并没有一种叫做独创性的东西，或者一种能够促使自己进行活动的自由奔放的感奋；他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没有多大的算计，也没有多大的考虑。他所以要专横顽固，是因为在周围人们之中，并没有碰到坚强的反抗，而是一贯的顺从；他所以要欺騙以及压迫别人，是因为他只感觉到，这对他是多么愉快，却没有能力去感觉，这对于他们是何等的沉重；他决定宣布破产，也是因为他对于这种行为的社会意义没有些微的概念。对他说来，法律本身并不是最高真理的代表，而只是必须从路上搬开去的障碍、石头。他的良心并不表现在他的内部的声音里，而是表现在过路人的嘲笑中，在对伊伯里安圣母像的瞥视中，在害怕充军到西伯利亚中。简而言之，——你们在鲍尔肖夫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罪恶的、无法无天的活动，正是因为在他身上没有人的教养而发生的。他在我们看来所以显得丑恶，正因为在他身上，几乎完全缺乏人的

要素；在同时，他还卑鄙而且可笑地把那些在他性格里已经有的人性的萌芽，也都歪曲了。然而这种表现为性格的不发展结果的丑恶和卑劣的本身，正指示着我们正确、自由发展的必要，并且在我们的面前，恢复了人类本性的特质，使我们确信，卑劣和罪恶并非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东西，它们不可能是自然发展的定命。

全剧的整个发展以及其余一切聚集在鲍尔肖夫周围的人物，大大地促进了这个目的的到达。在全剧之中，没有什么特别的花巧，也没有矫揉造作地发展的剧情，去满足学究式的理论，而损害剧情的朴素与人物的生气勃勃。所有剧中人都是按照他们本身的意义，真诚地行动的，没有一个人落入通俗歌剧人物的窠臼。在这儿，智慧的最好能力以及精神上最崇高的力量，在它们的最高发展阶段上，并不是用来达到一个可耻的目标的；相反，全剧却清楚地指出，就正是这种发展上的缺点，把人们引到了卑鄙琐屑中去。在所有剧中人的身上，都透露出这一种人类的企望——使自己从专横顽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一切人就是在它的下面诞生而且成长的。鲍尔肖夫在外表上是从它的下面摆脱出来了；然而那种压迫着思想和意志的教养的痕迹，却终身都残留在他的身上，使他也变成狂妄的暴君。“黑暗王国”生活中这种荒谬的秩序，已经传染到这种程度，每一个受尽压抑的个性，只要稍微从别人的压迫底下解脱一点出来，他自己就会努力去压迫别人。这些粗野的关系非常巧妙地贯穿过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整个喜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专横顽固的一个完整的体统。事实上，鲍尔肖夫是不容分说地统治着一切人；波德赫留静害怕主人，可是却敢叱责福敏尼希娜以及殴打基施加；阿加拉芬娜·康特拉季耶夫娜，她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甚至是有有点愚蠢的女人，——害怕丈夫象害怕火一样，可是责罚起基施加来，却是神气活现的，她还要斥骂女儿，如

果她有力量，一定会把女儿严厉管束的。例如，请看吧，在第一幕第二场里，她是怎样发起火来。——“难道你以为，”她对女儿叫道，“我没有权力来使唤你？你说吧，你这无耻的眼睛，为什么你的眼光要这样妒忌？怎么啦，你要比母亲显得更能干吗？我马上就会这样做的：我要差你到厨房里洗碗去。真有你的！嘿，你是我的娘啦！我要做一件布袍子套在你的头上。”

里波契加给了她恶狠狠的回答，阿加拉芬娜·康特拉季耶夫娜就反复着说：“你想爬到母亲头上来啦！再敢聒出一个字，把你舌头一直缝到脚跟去。”然而里波契加却能够集中精神的力量，认识自己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因此就很少去留心母亲，在跟她母亲的争吵中，她总是占上风的：她开始责骂母亲，说她没有这种教养，接着就哭起来，于是母亲害怕了，马上自动去安慰这个受委屈的女儿。里波契加清楚地暴露了她是倾向于这种粗鲁狂暴的专制精神的。她对母亲说：“我知道，我是比别人更加有教养，干吗我要忍受你的愚笨呢？为什么呢！当然不罗！”当她许婚给波德赫留静以后，他们互相谈论道，“老一辈人在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作威作福过了，——现在是轮到我们的时候了”……只有基施加一个人还没有暴露出任何追求特权的愿望，而且，相反，他却是整个家庭中那种专制顽固的习惯所指向的目标：“我们这儿，”他抱怨道，“要不是这个人给你吃耳光，就是那个人，要不是男东家，就是女东家；不然，就是那个掌柜，拉查尔，再不然，就是那个福敏尼希娜，再不然……每一个混蛋都可以对你发号施令。”这一种发号施令以及永不间断的打耳光的痕迹，已经在基施加身上暴露了出来：他已经学会了欺骗和偷窃。到得钱偷得比较多了的时候，那末当然，他自己也要狂妄而且凶暴地发号施令了，正象别人命令他一样。基施加的一生经历，被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独自一个人留下来计算他的金钱的一场所吐露的寥

寥数语中，非常传神地揭示出来……

“半块银币——这是拉查尔给的(为了替他悄悄地带来了伏特加)；前几天，我从钟楼上摔下来，阿加拉芬娜·康特拉季耶夫娜给了我十个戈比；二十五个戈比是猜正反面^①赢来的；在前天，主人在柜台上忘下了一块卢布。”

这就是基施加获得的来源：跑出去张罗伏特加，从钟楼上摔下来，赢钱，偷窃。在这样的生活下，有些什么样的道德感情可以在他的身上得到发展呢？他怎样去同情别人的苦难，当他自己就因为从钟楼上摔下来，得到十来个戈比，就聊以自慰的时候！显而易见，他将来是很可能成长为一个波德赫留静的……这个“黑暗王国”的土壤就是这样的，在这种土壤上，不可能有别种产品出生！

但是波德赫留静自己又是怎么样呢？这是一个见解发达、自觉而又聪明的骗子呀！他同这个促使我们认识——在这种环境中一切罪恶都是由于智力昏暗以及性格中人性一面不发达的结果而产生的喜剧的一般的印象不是大相矛盾吗？恰恰相反，波德赫留静还是能够彻底说服我们去忠于这种印象的。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正因为人类的思想潮流对他多少已有一些接触，他多少还算懂得一点。他并不冒冒失失地进行诈欺，他仔细地筹划他的事业，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身上现在已经出现一种对于在赤裸裸方式下进行欺骗的憎恶感情，一种用各种各样诡辩来掩饰他的欺诈的努力，一种要给自己的欺诈找寻什么道德根据，并且在欺诈进行中保持外表上、法律上正直的愿望。有些东西，他根

^① 一种铜元游戏。

本就没有想过，——例如，在铺子里克扣和欺骗顾客，——他做起来完全是平心静气的、良心上也没有什么折磨。然而到得不平常的场合，到得要从主人的财产中利用巨额款子的场合，这儿，波德赫留静就沉思起来，开始替自己作辩解了。

“人家说，人必须有良心，”他这样忖度道，“当然这是很明白的，人必须有良心，可是应该怎样来了解它的意义呢？对付好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良心；不过要是他自己也在欺骗别人，这儿还有什么良心不良心！萨姆松·西雷奇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他搞这一套把戏，可以说，无非是消磨时间。可是我却是一个穷人！要是在这一件勾当里，捞一点油水，那也没有什么罪过；因为他自己就做得不公平，就做得犯了法。我为什么要可怜他呢？运气既然来啦，那就不能错过；他玩他的鬼计，你要你的花样。我很想多搞他一点，可是却没有机会了！”

你瞧吧，就连波德赫留静也还不是凶神恶煞，他还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按照自己的看法来理解它。他，正象其余一切人一样，他也被整个“黑暗王国”的军事情势所迷惑了；他在寻思他的骗局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当作欺骗，而是当作一种巧妙的、虽然从法律的观点上看来是不合法的，实际上却是正当的玩笑；直截了当的撒谎，他是不喜欢的：他答应过给媒人二千卢布，后来只给她一百个卢布，他的根据是，多给她是不值得的。他把钱付给黎斯波洛任斯基时是零零星星地付的，他还只付给他几百个卢布，就拒绝继续支付了，觉得，他是到了“该知道良心的时候”了。他也没有完全拒绝替鲍尔肖夫本人付款给那些债权人，而只是算计，按二成五偿付——这是太多了。因此，在这种场

合，他对于自己的行为就有明显的根据：他记得鲍尔肖夫自己对他说过些什么话，他还引证鲍尔肖夫自己的话来回敬他。萨姆松·西雷奇在把女儿许给他的时候，曾经和未来的女婿作过这种谈话：

鲍尔肖夫 这是我的财产，自己挣来的……我要给谁，就给谁……这还有什么说的！布恩做好事总是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统统都拿去吧，只不过要供养我和老婆子，还得付给债权人一成债款。

波德赫留静 爹，这还值得说的。我难道还体会不到吗？自己人好算账的呀。

鲍尔肖夫 告诉你，统统拿去吧，这就完事了！谁也管不到我！只不过债主的钱你是要付的。你付不付呢？

波德赫留静 您放心吧，爹，这是最起码的责任。

鲍尔肖夫 只不过你得留神——不要付他们太多了。要不然，你什么都给他，那就未免太傻了。

波德赫留静 爹，我们可以算的。请放心吧，自己人嘛。

鲍尔肖夫 正是这样呀。你不要付他们超过一成。这已经够他们的啦。

波德赫留静很明白这些见解，当鲍尔肖夫从拘留所里出来，跑到他那里时，他就很婉转的向鲍尔肖夫提醒这种看法。对于要付债权人二成半的要求，他并不认为是公平合理的；相反，他觉得他们“是太目中无人了；倘是不愿意，那么五年之内只付他们八厘”。既然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想法，他就殷勤地款待岳父，跟他一起叱骂债主，并且表示这种希望，“总可以避免的”，因为“上帝会保佑的”；不过要他按照债主所要求的数目偿付，他却拒

绝了，因为他们“所要求的价钱，完全不合理”。从他的观点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既没有什么不正直，也没有什么残酷，而只有显出慎重与坚定。他甚至把他的慷慨表示到这样大的程度，他同意替鲍尔肖夫偿付一成半，以代原先的一成，他甚至还决定亲自跑到债主那里，去请求他们。可见，他甚至并没有丧失同情心以及某种程度的廉耻心；可是他总是想尽可能多搜刮一点，因此，他希望，说不定，这事情能够解决得更加有利。在这里，在波德赫留静的身上，越来越表现出他是一个小手小脚的骗子，这是那种从小就压迫着他的专制重压的直接结果所形成的。他并没有一种强盗似的决心，拒绝作任何偿付，或者把鲍尔肖夫全部事业都付之于命运的摆布，去从事新的投机，新的奔忙和冒险；他也缺乏一种显出他是一个高超的骗子，促使他们在任何一场投机中，只要能够把事情了结，多少获得一点什么就放手的聪明的打算。手段高超的、机灵的骗子，在进行例如诈欺破产这套勾当的时候，他是不会放过每卢布只付二十五戈比的机会的；他会立刻达成这个协议，而把这全部投机了结，并且觉得很满意。能够白白收受人家四分之三的财产，怎么会不满意呢？除了俄国土生土养的骗子以外，谁都会对这种结果觉得满足的。一个真正的骗子，一个真要把自己奉献于这个专门事业使命的人，他是不会拚命在每一次骗局中去硬拖，去博取侥幸的，他是不会在一场已经获得一些卢布的投机勾当中，再去为一二文钱而奔忙；他知道，在眼前这场投机的后面，还有第二个人在等着他，在第二个人的后面，又会出现第三个人，等等，因此，他就赶忙去完成这一件事，以便从这件勾当中获得可能获得的东西以后，就转到第二件去。我们这个在专横顽固的无理压迫下诞生和成长的小骗子，就完全不是这样做法的。在他的身上，正就缺乏这种在俄国人与人之间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称扬着的豪放，但因此他就变得

非常愚蠢地贪得无厌。有一些人也可能在波德赫留静的行为中，看出俄罗斯性格的豪放的一面：“你瞧，”他们说，“这是怎样的人，——既然拿的是别人的财产，那么就该尽量多拿些，不只拿四分之三，而是十分之九……”然而，事实上，波德赫留静在这里，正就表现他是缺乏进取精神和自信心的。他运用他的欺骗，好象一次碰巧拾到的东西一样，下一次碰不到了，也就算了。因此他很舍不得离开他的投机勾当，老是在等待，——能不能从它那里再拖出些什么东西来：真的，他不肯徒劳无功地进行冒险！他对于每一种冒险都觉得这样不习惯，这样沉重，甚至他害怕去设想同类事件的第二次尝试……现在他只求能够安顿下来，以后他只想进行一些小骗局，正象这本喜剧的第一版，他在最后面向观众时所许诺：“咱们开了一家小铺子！请你们赏光：打发小孩子来吧，——一文钱都不会多算他的。”^①这是说，他很满足于这种他以前曾经向鲍尔肖夫的伙计们解释过的实践……除非，又有另一种机会来临，出现了一些什么容易得到的东西：他才会尽他力所能及加以攫取。

由此可见，就是波德赫留静，也并不是什么怪物，并不是一切卑劣下贱的精髓。他最卑鄙的地方是在当着鲍尔肖夫的面哭泣，要他相信他的眷恋之意以及其他花样的一场。但必须知道他这里所以向萨姆松·西雷奇这样曲意奉承，与其说是由于利欲熏心，毋宁说是要骗取老人允许把里波契加嫁给他，对于里波契加——值得提一句，——波德赫留静是强烈地而且真诚地爱着的……在第四幕中，就是当她已经做了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对她的态度就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为了这样的爱情，我们不是应该原谅这种在最热情的故事里那些最道德角色的狡诈吗！

① 杜勃罗留波夫在这儿所以提到《自己人》的新版，是暗示那些由于被检查，为奥斯特罗夫斯基在第二版中加以改写的地方。

不需要在这方面多拉扯：虽说里波契加在精神上是鄙陋的，但她一点都没有损害这喜剧的总的印象。人们以为，她对母亲的态度以及后来在最后一幕中对待父亲的一场——已经超越了喜剧的范围，她是太可恶了。我们却一点都不觉得这样，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象鲍尔肖夫这种家庭的血亲关系中，认出神圣的地方来。在里波契加的身上，也可以看出家庭专制精神的痕迹：这些冷酷、没有灵魂的性格，这些对待亲人的冷酷的、嫌恶的态度，只有在这种专制精神之下，才会形成，这种就在里波契加身上显现的完全缺乏任何道德意义的事实，也只有在这种专制精神之下，才有可能。倘使除去那作为压迫着她的专横精神的痕迹而遗留在里波契加身上的东西，那么她不但在商人阶层里，甚至也在贵族阶层里，都不会比我们大部分姑娘逊色的。在她们中间，不是有许多人用一种外表的东西来充实她的整整的一生，不是用衣饰在悲愁中自慰，不是在跳舞中强自宽怀，不是在梦想着军官们吗？假如，在先前，我曾经同三个有教养的姑娘作过谈话，那末一定的，我可以从她们中间的两个人那里听到里波契加有名独白的重述：

“跟军官们在一块儿那可完全不同了！啊，那真是美妙动人！不管胡髭，不管肩章，不管制服，甚而至于还有他们那带着小铃的踢马刺！……这怎么可以相比呢——一个军官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军官，你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又灵活，而且什么都好；可是一个普通人怎么样呢？看起来，他好象是没有灵魂的……”

对于吐露出这一类独白来的姑娘们，可以拿什么东西去严肃地责备她呢？这不是很明白，里波契加无论做什么事情，她总

是由于道德与智慧完全不发展，而决不是由于什么恶意或是天生的野蛮之故吗？在这个不幸的个性中，有些什么东西会使人觉得愤慨呢？

总的说来，在《自己人好算账》中间，有些什么东西可能使人愤慨呢？不是人们，也不是他们的个别的行为，而是威压着他们全体生活的可悲的无知。我们已经看到，人们以其人性的一面，通过喜剧，呈现给我们看，而不是他的法律的一面，因此即使是他们本身的罪恶所引起的印象，在我们看来也变得缓和了。在这里，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是一个狡诈的破产者，一个把他的主人掠夺一空的更要狡诈的掌柜，一个冷酷地把自己的父亲打发到监狱里去的毒辣的女儿，——于是我们把这一切人都烙上恶棍和怪物的名称。然而喜剧的作者却把我们引到这些人们的家庭生活的深处，使他们的灵魂展开在我们的面前，传达他们的逻辑，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于是我们就不由自主地确信，这里既没有恶棍，也没有怪物，一切人都是极平常的，象其他所有的人一样，那些使我们吃惊的罪行，根本不是那种在其本质上是倾向于残暴的特殊性格的结果，而单纯是那些为我们所指责的人们就在里面诞生而且活着的环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基于这种确信，在我们心里就产生了对人类天性以及一般个性的尊敬，嘲笑并且蔑视那些正在喜剧里行动的、在表面上的意义说来会引起恐怖以及厌恶的畸形的个性，最后，就深刻地而且毫不妥协地去仇恨那种阻滞而且歪曲人们正常发展的影响。这样我们才能直接转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它们又是起着怎样的作用？这部喜剧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里所有有害的影响，就在于这一种人以野蛮而无法无天的专横顽固对付另一种人。在这喜剧里，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解释了这些影响的最起作用的方式。我们看出，鲍尔肖夫根本就不是坚强的性格，他没有能力进行持

续的战斗；而且一般说来他也并不喜欢奔忙；我们还看到，波德赫留静是一个精明干练，根本不留恋自己的主子的人；还看到，全家的人对于萨姆松·西雷奇都没有多大的好感，只除了他的老婆，这个完全不足道的、愚笨的老妇人之外。是什么东西阻挠着他们采取公开反对鲍尔肖夫的狂暴的那种立场呢？是他们在物质上要依靠着他，他们的幸福和他的幸福相连在一起吗？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波德赫留静既然是关切着主子的利益的，那么为什么不去阻止这个人为了无知，“为了消遣光阴”的缘故而采取的危险的步骤呢？那当然是因为波德赫留静自己也打算在这里插一手了？是的，——可是在这里，通过《自己人》而描绘给我们看的那些荒谬的关系的整个恐怖，已经完全揭露无遗了。请注意，这里的问题，并非在于压迫着自己的家庭以及所有周围人们的顽固独夫的个性。他本身实在是无力而且渺小的；你可以欺骗他，排挤他，最后还可以使他坐在牢狱里……但问题是在于：专横顽固不会跟着他的毁灭而消失。它所起的影响是有传染力的，它的种子还要落在那些正在遭受它的折磨的人们身上。它是无法无天的，它破坏了对法律的信任；它在根柢里是黑暗的、虚假的，它赶走了真理的一切光辉；它是荒谬的、任性胡来的，它消灭了常识以及一切从事理性的与目标明确的活动的能力；它是粗野的、沉重的，它破坏了爱情和信赖的一切关连，甚至毁灭了对自己的信任，使人厌弃正直而公开的活动。这就是它对社会显得危险的地方！顽固独夫的消灭是并不困难的，如果正直的人们能够有力地把这件事情担当起来的话。然而不幸的是，在专横顽固的影响下，就是那些最正直的人也显得渺小起来，而且在奴性的无所事事中弄得疲惫憔悴，而做事的却只是那些性格中人性的一面不大发展的人。但就是这些人的活动，由于他们在专横顽固的影响之下，他们的观念已经被歪曲了，

也就带有渺小、偏私以及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性质。他们的目的，并非是要消灭使他们遭受折磨的专横顽固，而是只要用随便什么方法把顽固独夫打倒，让自己取而代之。因此——在鲍尔肖夫滚到监狱里以后，波德赫留静就出来代替他了，——他就依靠这些同样的权利而作威作福^①。

这些就是我们从《自己人好算账》这个喜剧中提出的一般的结论。我们所以就这一点谈得特别长久，是有许多原因的。第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严肃地谈论它的文章；第二，那些在顺便提到它时所做的简短的评语，常常暴露出对于剧本意义作了某种生硬的理解；第三，这个喜剧本身就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一部最光辉以及最经得起考验的作品；第四，它无法在舞台上演出，比较起他的其余作品来，在公众之间，较为不普及……此外，它所以使我们作更详尽的观察，还由于在它里面所描写的，都是那些在专横顽固的压迫下所发展起来的好动的、欺诈撞骗的人

① 但是，在奥斯特罗夫斯基戏剧的新版中，波德赫留静也并没有能够作威作福，在到全剧终了时，他就被警察抓了去，将来的前途，不外是到西伯利亚去了。不过我们却以为这种添加完全是多余的。当然，剧作家所以作出这段添补，并非根据他自己的信念，而是为了满足某一些太严格的修辞家^②——他们要求凡是罪恶一定要得到惩罚。然而我们看出，这里问题并非在于人物，也并非在于外表事实，而是在于生活本身，在于支持着这全部生活的连系的本身。同时我们还知道，如果波德赫留静可能受到惩处的话，那仅仅是由于他有了什么疏忽——由于他没有能够干净利落地进行那套勾当。虽然他还有一个机会：他碰到警察的时候就建议去喝伏特加，跟他谈一下，希望这样能够把事情了结下来。但警察并没有同意，还是把他抓走了；但我们知道，波德赫留静的命运并非以警察为依归，而且一切在黑暗王国的人，也不会象这位不平凡的警察那样执拗不通……我们甚至至于几乎相信，在那波德赫留静就在里面行动的那个环境的现存的社会关系之下，随着幕帷的下降，他一定会找出轻便的方法，求得脱身，求得辩白的。——作者注

② 这是暗示审查官的苛求。

物。这里的一切人物，除了阿加拉芬娜·康特拉季耶夫娜，都是这样的。他们甘愿受专横顽固的支配，败坏了自己的智慧，使自己也成为专制压迫所产生的罪恶污毒的参与人。要看清楚这种道德上的败坏——这是比较指出一个人的内在力量在外部压力的重压下单纯地崩溃了更要复杂，更要困难的课题。我们在奥斯特罗夫斯基以后几部喜剧中所看到的主要的方面，正就是后一类被压扁了的、被折磨死的、失去任何力量与灵活性的性格，对于这些喜剧我们现在应该加以注意。在这后几种作品中，我们要努力更简短地去探究那专横顽固的致命的影响，而要特别论述它的一种形态——我们妇女在家庭中的奴性地位。然后，就结合着专横顽固方面的同一个问题，或者索性直接以它为根据，再来观察是这样折磨着我们“黑暗王国”的居民的那种教育方式的意义，此外，还要观察这个王国中许多人物为了巩固他的物质幸福所使用的那些手段。不过要审察这所有的问题，并且指出它们跟专横顽固的直接关系——正象它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中所暴露的，——这应该是另一篇文章了。

现在我们在结束《自己人好算账》的分析时，还只能够问读者：他们是不是会否定为我们这样详细分析过的、在生活的真实上、以及在艺术的想象力上的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表现才能呢？倘使这些人物以及这种生活是忠实于现实的，那么读者会不会觉得：奥斯特罗夫斯基向我们描绘的俄罗斯生活的那些方面，——是不值得艺术家去注意的？他们能不能决定说，他所描写的现实，只有局部的和渺小的意义，对于有判断力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重要的结果的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证明我们在分析我们从奥斯特罗夫斯基几个喜剧中所看到的事实的时候，是不是达到了目的……至于关系到我们个人，那我们对谁都不想强迫他来接受什么东西，我们在谈到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时，

甚至不想表示兴奋，也不想表示愤懑。我们只想探究他所描写的那些现象，并且解释它们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读者们可以按照他自己对生活的观察，按照他自己对法律、道德以及人类本性要求的见解，来自行决定——我们的判断是不是公平正直，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中那些吸引着我们的生活事实，具有怎样的意义。

三

而今四野都是荒漠与空虚……
树叶不再和淙淙泉水啾啾；
他白费心机央求预言家赏赐阴影，
只给他带来滚烫的尘沙，
还有那草原上的傲客，竖起冠毛的鹞鹰，
折磨着而且撕裂着它的猎获品。

莱蒙托夫^①

在观察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自己人好算账》的时候，我们促使读者注意在这个喜剧里反映出来的俄罗斯的特别是商人生活的某些特征。我们说过，照我们的意见看来，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性的基础，是在描写专横顽固——在这个词最广大的意义上——对于家庭与社会生活的狂妄影响。从萨姆松·西雷奇·鲍尔肖夫对待他周围一切人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种专横顽固——它本身就是无力的、衰老的，在它里面没有什么道德的力量，然而它的影响却是可怕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荒谬的、丑恶的，它歪曲了一切跟它有过接触的人的常识以及对于法律的见解。我们看到了，在专横顽固关系的影响下，诈欺和阴险都得到

^① 题辞引自莱蒙托夫的《三株棕榈》。

了发展,即使是善良性格的一切人道的愿望,也都变聋了,那种偏狭而极端的自私精神以及对邻人的仇视,却得到了发展。人必须具有清明睿智的头脑,天真纯朴的心灵,泰坦似的强大的意志,才有决心跟周围的环境——跟这个它的荒谬只不过助长了每一个有生命、好活动的性格的自私感情和背信弃义愿望的发展的环境——进行实际而真正的斗争。

然而要从这一类斗争中胜利地挣脱出来,——要达到这一点,光是我们列举过的一切品质,还嫌不够;还需要钢铁般的健康,而且,——更重要的,——还要有完全安稳可靠的地位,然而按照“黑暗王国”的结构来说,——它的一切邪恶,它的一切虚伪,却只把种种灾祸和困苦压在那些衰弱的、疲累不堪的、在生活中毫无保障的人身上;而对于那些有力而且有钱的人——这同样的虚伪却变成生活的享乐。暴露这种虚伪,和这种虚伪作斗争,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能不能期待商人鲍尔肖夫,例如吧,去要求他的掌柜波德赫留静凭着良心办事,叫他劝阻顾客别买腐烂的货色,别为它付出多余的钱,却使自己陷于破产呢?自然,如果做掌柜的是怀着这种良心的,他自己就会很快照这种方式来做。然而掌柜和主人是联结在一起的;他凭着主人的恩典吃饭穿衣,如果主人宠爱他的话,他就可以“在社会上混下去”;可是倘使不宠爱他的话,那末这个怀着不切实际的良心的掌柜,他又有什么办法?因为——他原是个渺小的东西!……因此波德赫留静就开始为自己的地位钻求机会。他不是有天才的人,不是英雄,也不是泰坦,而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要求他在实际上反对他周围的整个环境,反对那些树立了已有几世纪的习惯,反对那些当他还是无知无识的孩子时候,就当作神圣事物来体会的观念,这是办不到的……显而易见,他势必受统治着他周围环境的那种道德所支配,——他势必走那别人走过的老路……他在已

经有一条现成的老路可以走的时候，他不会去尝试走一条新的谁也不知道的道路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活动而能干的性格来说，波德赫留静也向自己提出了几个迫切的疑问与课题。他的课题平常总是非常渺小的，他的疑问也是不深刻的，因为他的视野极受限制。他看到站在他面前的他的专横顽固的主人，这个人什么都不做，吃吃，喝喝，在自我满足中享受安乐，不必听随便哪一个人的谩骂，相反，——他自己却可以毫无遮拦地痛骂一切人，——他就在这个可厌的人物中，看到了幸福的理想，以及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峰。至于要从这个他已经习惯的日常生活的褊狭圈子里脱身出来，对这一点，他却还只有模糊的见解，他一点都不关心，他觉得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关于这件事，我们这批人是用不到去想什么的。……他既然决定了这样做，既然给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不可逾越的范围，很自然的，波德赫留静就拚命使自己去迎合这个他必须在那里行动的圈子，因此他就蜷缩着身子，弯起腰来。这是不需要他花费多大劳力的，——因为这是从小就习惯的事情：好象你背上挨到了板子，或者你的头开始遭受拳头的殴打，——你就立刻不由自主地弯起腰来和蜷曲起来一样……波德赫留静自己在熬过了一切考验以后，终于发觉，这是事物的一种规律，他就把他的个人的生气勃勃的愿望深深地掩藏起来，希望将来总有一天是他在街上庆祝的日子。他的道德发展也走上了它自己的道路，在这种情势下，这是逻辑上所不可避免的：波德赫留静发现，大家都以敌意来迎接他的个人的愿望，他就渐渐达到这种确信，觉得他这个个性正象其他每个人的个性一样，应该和一切周围的人保持敌意，他越是从别人身上攫取得多，理所当然，他就越是能充分满足他自己。这种永恒的戒严状态，就从这个原则上发展开来，——“黑暗王国”里，每一个

怀着要达到某种东西的企图因而从事实活动的居民，都不可避免地要置身其间……那种一切人都对它负有同样义务的崇高的道德规条，在他，只出现在几句天花乱坠的议论和训条中——从来不去实行它；他的性格中的同情的一面，并没有得到发展；科学所研究出来的关于社会的休戚相关以及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那些观念，他也并不理解。他的最好的理想（因为正象《钦差大臣》中的市长一样，波德赫留静也有他的理想），就是粗野、糊涂、无法无天与残忍。市长所梦想的，就是等他做了将军之后，要迫使市长们等他五个钟头，波德赫留静也恰好是这样想法的：“岳父他们已经在从前荒唐过了，——现在轮到我们啦。”所以只要他一获得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机会，他就真的毫不迟疑地迫使别人也对他表示畏惧、阿谀、装假并且承受他的折磨，正象他在还不能保证自己有专横顽固的权利的时候对别人表示畏惧、阿谀、装假，并且承受折磨一样……

探索类似这样的生活，这是多么沉重，看到人的本性变得这样丑恶，这是多么可悲。仿佛再没有比在波德赫留静这一类人物的性格中由于专横顽固对他们折磨的结果而产生的那种粗野而不自然的发展更坏的了。然而，在奥斯特罗夫斯基晚近一些喜剧中，我们又看到了这种影响的新的方面，就其阴沉和荒谬来说，并不稍逊于我们在前面那一篇所指出过的程度。

这个新的方面，我们觉得就在那些被压扁的、逆来顺受的性格中表现出来。这一类性格，几乎在奥斯特罗夫斯基每一个喜剧里，都可以发现，或多或少都带着鲜明的轮廓，甚至是《自己人》中的阿加拉芬娜·康特拉季耶夫娜，也属于这一种性格，只是她在这里并不起显著的作用。在最近一些喜剧中，更明显地呈现给我们看的，就是《贫非罪》中间的米佳，《代人受过》中的勃鲁斯柯夫的孩子，以及几乎是奥斯特罗夫斯基全部喜剧中都

有出现的女孩子的角色。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柳薄夫·托尔卓娃、达莎、那奇亚——这些都是专横顽固的无辜的、毫无反应的牺牲品，这种为生活所造成的人类个性的磨蚀、泯灭，促使灵魂里感到的悲哀，并不比人类的天性在欺诈中被歪曲，象波德赫留静似的更差。在那儿，生命究竟还在某些地方冒出来，还有独创性，还闪烁着某一种希望的光辉；而这里——却是木然的寂静，漆黑一团的阴暗，这里，在你们面前站着的是，置身在一片杳无人迹的草原中的死美人，只有那由于在天空中寻觅食物而苦恼的草原鹞鹰的动作，才会打破这笼盖一切的死一般的寂静……惊心动魄，正象置身在坟堆之中，或者在大斋节的前夜，在杂货商人的家里一样！

为了观察逆来顺受的、受尽压迫的人在各种不同的情势和环境中的表现，我们现在要在《自己人好算账》之后，研究奥斯特罗夫斯基描写商人生活的喜剧，就从《各守本份》这个喜剧开始。

然而，在谈到这个戏剧的时候，我们认为必须向读者提醒那些已经在第一篇文章中讲过的话——关于艺术活动的一般意义。《各守本份》，引起了人们对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信念发出非常分歧的议论。有的人为了他能够把斯拉夫派对于俄罗斯古国的魅力的动人的看法融会在自身之中，加以颂扬；另一些人却为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竟然是现代教育的敌人而惶惶不安。所有这一切议论，都可能使奥斯特罗夫斯基感到沮丧，这特别是因为：由于议论他的看法，就完全忘却了他的才能，忘却了他所描写的一些人物和场景。用这种手段对付奥斯特罗夫斯基是非常愚蠢的。我们了解，例如吧，要对索洛古勃伯爵^①的作品进行分析，除了问：“他通过他的《官吏》打算说一些什么？”就不可能有别的方

^① 索洛古勃(1814—1882)，俄国小说家、戏剧家。

法——因为《官吏》无非是一种时新的表面的东西而已——它甚至不是什么观念，而只不过是一种戏剧化的文句而已，毫无一点才能的特征。例如，对于罗森赫姆君^①的诗，也可以作如是观，他的诗没有一句是有诗意的；因此，评定诗的价值唯一尺度，就只剩下这些诗所表现的观念的相关意义了。这样一来，倘使不进一步作什么艺术上的考察，那么我们很可能，例如吧，为了那篇不久以前刊登于《俄罗斯文学》^②上的《雷雨》而称扬起罗森赫姆君来，——他所描写的主题并没有象他关于官吏以及包税商人的哀歌那样庸俗。在这里，我们可以完全安心，专心去注意作者所企图在剧本中表现的看法。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它们却都当得起另一种批评，因为它们并非以作者的理论概念为依归，而总是具有艺术价值的。我们已经指出过，一个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把一些普遍观念加以接受、发展并且表现，是和寻常的理论家完全不同的。艺术家们所处理的，不是抽象的观念与一般的原则，而是活的形象，思想就在其中而显现。在这些形象中，诗人可以把它们的内在意义——这对于自己甚至是不自觉的，远在他的理智把它们阐明以前，就加以捕捉，加以表现。有时候，艺术家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在描写着什么；但是批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说明隐藏在艺术家创作内部的意义，不过在分析诗人所描绘的形象的时候，批评可完全没有权利在诗人的理论见解上去纠缠不休。《死魂灵》的第一部，有些地方，就其精神来说，是和《书简选》^③颇为接近的，然而《死魂灵》并不因此

① 罗森赫姆(М. П. Розенгейм, 1820—1887), 诗人。

② 《俄罗斯文学》(«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这是一种文学杂志，阿波隆·格里高列叶夫、波隆斯基、赫密尔茨基等都在这杂志中参加过编辑工作。

③ 即果戈理《与友人书简选》，果戈理在这里发表了一些违反真理的见解，别林斯基在一篇专文以及给果戈理的公开信中，给予它严厉的批评。他说这是：“空虚之空虚和种种色色的空虚”。

就丧失它的一般意义——和果戈理的理论见解这样大相径庭的一般意义。所以别林斯基的批评,并没有去触动果戈理的理论,当果戈理还只是以艺术家的身份站在批评的面前的时候;只有到得他宣告自己是一个道德说教者,同时又并没有带着生动的故事,而是带着训诫书籍^①走到公众面前的时候,那时候批评才会对他实施攻击……

我们不想把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意义和果戈理在我们发展史上的意义相比较,但我们要指出,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许多喜剧中,不管它们是在哪一种理论的影响下写成的,总可以找到深刻、忠实而又明显的特征——它们证明了生活真理的自觉从来没有抛弃过艺术家,也没有纵容他为了满足理论,就去歪曲现实。既然是这样,那么这就是说,艺术家世界观的基本特征,不可能完全被判断的错误所毁灭。他可能不替自己的描写选取那些生动的事实,使某种观念在其中以最好的方式得到反映,他可能给它们加上任意的联系,把它们解释得完全不真实;然而只要艺术感觉还没有对他变心,只要作品中的真实还保存着,——批评就应当用它们来解释现实,对于作家的才能的特征也是这样,但绝对不能为了那种他也许还不曾有过的想法,而去痛骂他。批评应该说:“这就是作者所描写的人物和表现;这就是剧本的情节;这个,照我们的意见看来,就是艺术家所描写的生活事实所具有的意义,这就是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的等级。”从这种论断中,自然而然就会显示,作者自己在观察他所创造的形象时,是否忠实。倘使他,例如吧,把一个什么人物高抬成为一个普遍的典型,而批评家却证明,它只有非常褊狭与渺小的意义,——那么很明白,作者是以对主人公虚伪的看法损害了作

① 指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

品。倘使他把几件事实，互相依存地放在一起，而批评家观察以后，却发现，这些事实从来就不曾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出现过，而是完全依存于另一种原因，——那么它的本身又很明白，作者没有正确地理解他所描写的那些现象的联系。然而，即使是这样，批评家在自己的结论中，还是应该非常小心；倘使，例如吧，作者在剧本的结尾，夸奖了一个坏蛋，或者描写了一个高贵的其实却是愚蠢的人，——那么从这一点要达到这样的结论：什么他是企图给坏蛋辩护，或者他认为一切高贵的人都是傻瓜，那还是离题很远的。在这里，批评家可以观察的只是：被作者当作一个高贵的傻子而描写的那个人，是否真正符合批评家关于智慧与高尚的见解，——其次：作者有没有把他的那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那种意义，给予他们？

这样做法，照我们的意见看来，应该是现实的批评对待艺术作品的态度；在概观一个作家的整个文学活动的时候，他们尤其应该这样去对待作家。批评家在谈到个别作品时，可能被一些局部性所迷惑，于是就归罪于作家，说是他还没有足够解释清楚。可是在作一般性分析的时候，这局部性就得搁在一边，而对作家的总的世界观的描述，它怎样在他的作品的整体中表现出来，就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世界观怎样表现出来，这是被那些把作者的注意和同情吸引过去、同时又作为他的描写的材料的事物和现象所决定的。

写完了这些解释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根本不愿意在《各守本份》里面，看到对于宗法家长制的、古老的生活方式的辩解，看到证明俄罗斯的无教养是比欧洲的有教养来得优越的企图。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个喜剧中找到某种矛盾的东西，但我们却不愿意这样做，而只想指出作为剧本基础的事实。我们已经看出了，奥斯特罗夫斯基剧本的基调，就是社会关系的不自然，

这种不自然是由于一种人专横顽固，另一种人毫无权利的结果而产生的。艺术家的感觉，由于愤慨于这种事物的秩序，就在它那错综繁复的变态中去搜索它，并且就当社会的面前把它暴露出来，这种社会就是生存于这种秩序之中的。下面就是它的许多变态中的一个。

在罗斯有着这么一个专横顽固的商人，他善良、正直，甚至于就其本身来说，他还是聪明的，——然而他却是一个顽固独夫。他有一个女儿，正象每一个女儿当着每一个顽固独夫的面一样，她在他面前，也是毫无声息与毫无权利的。人们不承认她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权利，也不给她什么可以在生活中保卫她个性的东西；她没有教养，她甚至在家务中间也是没有发言权的，她没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人的习惯，她甚至在切身相关的事情上都没有想到自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她已经成长为一个充分高大的人了，可是她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未成年的人，当作一个无知的孩子。她对父亲的那一种爱，已经被恐怖所麻痹了，这种爱是不完全的、愚蠢的并且是偷偷摸摸的，因此，这个女儿就偷偷地背着父亲，从姑母那里吸取种种见解，这位姑母是一个老处女，曾经在锻工桥^①那边受过教育，后来由于她姑母的怂恿，她就相信自己已经爱上了那个年轻的浪子、退职的骠骑兵，这个骠骑兵是这几天才来到他们这个城市中的。骠骑兵去求婚，父亲拒绝了；那时候骠骑兵就决定把这个姑娘带走，她也决定跟他一起走，可是，她又老是在说什么她不能走，最好还是回到父亲那里去。然而在第一个驿站上，骠骑兵就知道，那父亲连一文钱都不肯给这个逃跑的女儿，当然，他就立刻把这个可怜的女孩子赶跑了。她回到了家里；父亲给她一顿痛骂，还要把她用锁禁闭

① 这是当时莫斯科的商店荟萃之区。

起来,免得她再在世界上现眼,再在人前出丑;然而那个年轻的商人却决定要娶她,他早已爱上她了,她自己在遇见维霍列夫^①以前,也是爱着他的。一切就这样平稳地结束了。

这些就是组成《各守本份》这个喜剧本质的事实。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有没有多少授人以口实,以为他要发展关于古老生活优越性的主题,要表现斯拉夫派的传统?好象并没有。它的意义是这样:专横顽固,不管它形式上表现得怎样温和,不管它怎样转变为温和的监护,它还是至少要促使那些蒙受它的影响的人,走到个性被磨灭的道路上去;个性的磨灭是和每一种自由与理智的活动完全矛盾的;因之,每一个由于置身在压迫着他们的专横顽固的影响下面因而个性被磨灭的人,就可能不由自主地、不自觉地干出一些想不到的罪恶来,并且仅仅因为愚笨与缺乏独立性而归于毁灭。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的事实的意义,是非常使人触目的,但它没有在喜剧中充分明朗地表现出来,因为剧本中最先出现的是聪明、严肃的鲁萨柯夫与善良、正直的勃罗达金——跟浮动轻佻的维霍列夫之间的对比。批评家们抓住了这个对比之后,就在他们的评论中,做起作者也许从来也不曾想到过的推测来。有人几乎指责他是道地的蒙昧主义,甚而至于到现在,还有几个批评家不愿意宽恕他这一点:鲁萨柯夫——虽然毫无教养,但居然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②。这倒是真的,奥斯特罗夫斯基由于一心对那些把头脑简单的俄国人弄糊涂的、伪装着有教养的绅士

① 就是那个骠骑兵。

② 在我们第一篇谈到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批评的文章之后,杂志上,又出现了两篇谈到他的文章。一篇是赞美性质的,但另一篇还是重复着前一时已经编派到奥斯特罗夫斯基身上去的那套谬论,并且以向他忠告“思想,思想,再思想”,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但这两篇文章却完全是不足道的。——作者注

象维霍列夫之流，表示愤慨，在这里，就没有以足够的力量与明确性，把俄国人所以会给这一类绅士吸引去的那些原因，揭示出来。但是不能说，这些原因已经被作者完全忘却了；事实的朴实而自然的意义，并没有躲避过他，即使在《各守本份》中，我们也能找出我们在专横顽固这个总的名称下所理解的那些关系的散乱的特征。倘使这些特征能够弄得更明朗一点，这个喜剧就会更加完整与明确了；然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它也不可能说是与作者世界观的基本特征相矛盾的。他使一道外来的光照进鲁萨柯夫们的黑暗的生活中去，把一些粗糙的轮廓弄得平整妥贴起来；但是即使在这缓和的形式中，要是能够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问题的本质就仍旧保持原来的样子。我们要尝试指出鲁萨柯夫对待女儿以及周围人们的态度的若干特征；我们看出，在这里，一切事件的基础，又是这同样的专横顽固，这个“黑暗王国”的一切家庭与社会关系，就立脚在它上面。

马克西姆·菲陀迪奇·鲁萨柯夫，这个古老生活全部美点的最优秀的代表，这个聪明睿智的老人，这个斯拉夫派与柯希亨式^①的批评家用他来挖苦彼得大帝以后时代和一切新法教育的俄罗斯灵魂，——这位鲁萨柯夫，照我们的见地看来，他就是对这种黑暗的生活，对这种在其本质上没有一点知觉、没有什么道德的生活的有力的抗议。在鲍尔肖夫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就是蒙受着这种生活的影响的卑贱的人物；在鲁萨柯夫身上，我们也觉得：即使是正直和温和的性格吧，在这种生活的影响下还是会发生一些什么来的！……真的，——透过那粗野的形式，在鲁萨柯夫的身上的确显露出一种天生的善良，甚至是优雅和婉。他

① 柯希亨或柯托希亨(Г. П. Котшихин [Котошихин] 1630—1667)，曾任外交使署书记官，谤书《论亚历克赛·米海洛维奇统治下的俄罗斯》的作者。

对待一切人都是亲切的，对妻子和女儿说话时总带着温情；当杜尼亚知道了他已经坚决拒绝维霍列夫，突然昏迷了以后（但这一场戏，我们觉得似乎有点夸张），他就害怕了起来，甚至同意为了她改变自己的主意。至少，他的头脑是非常正常的，常识还没有被赶出脑子去。他并不干脆地说：“因为我要这样，所以就应当这样，”——而总是努力给他的决定找寻理由。然而他能够从自己的天性中保存下来的善良的品质，也只限于这些了；再下去就是专横顽固的猎获物了。很明白，由于他天性上的温和，鲁萨柯夫一开头，就柔顺地向既存秩序表示屈服，承认它的合法性；这也就是说，用不到拳打脚踢来向他证明这一种合法性。就因为这样，在他身上，直到衰老之年，还没有那种敌对感情与严厉，这种敌对感情与严厉是我们在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描写的另一些顽固独夫中，常常发现的；就因为这样，他在和下人以及幼小者谈话的时候，甚至不放弃说理。然而这个他就在其中生长的“黑暗王国”的生活，在理性方面，并没有给他什么东西；理性在这种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鲁萨柯夫就陷到了其他许多天赋本性比他更坏的同胞也正在其中彷徨的同样的荒谬无知里，同样的黑暗里。

来注意一下他已经能够上升到的道德，这不是一件乏味的事。服从，忍耐，尊重经验与传统，限制自己的范围，这就是他的基本原则。他是凭着粗糙的经验找到这些原则的，他比较事实，可是 he 不能从这些事实中领悟什么东西，因为他的思想，在同时，又被一种对于支配着人类一切事情的命运的最顽固、最宿命的理解所束缚起来。他念着这样的格言而出场，“你必须到老一辈人那里求他给你忠言，——老一辈人是不会把你教坏的。”后来，在答复勃罗达金求婚时，他说：“我应当慎重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我要为了女儿向上帝负责。”他就根据这一点用这种方

式来安排女儿的命运：“难道可以相信一个女孩子，她爱的是谁吗？不，没有这种规矩：先得让我喜欢这个人，我不愿意把她许给她所喜欢的人，而要许给我所喜欢的人。真的，我喜欢哪一个，我就把她许给哪一个。”专横顽固在这里已经很有力的表现出来了；可是，在鲁萨柯夫身上，这一点却又被下面这一段议论所缓和了：“怎么能相信女孩子呢？她看到一些什么呢？她又知道谁呢？”这是鲁萨柯夫对女儿的一段公正的议论；然而不论是鲁萨柯夫，不论他那些同胞中的任何一个人，头脑里都不会想到问：“为什么她什么都看不出，对谁都不了解呢？在这种任何人都可以欺骗她的天真的无知中，去教育她又是怎样的必要呵？……”倘使他们能够对自己发出这个问题，那么从回答中就可以发现，一切邪恶的根源，并不是别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专横顽固。鲁萨柯夫完全满足于他的地位，他不愿意爬到贵族去，他认为教育是贵族的独占品；由于这样的结果，他就使自己的女儿仍旧保持她原来的、照他的说法、就是傻瓜的样子。在回答维霍列夫的求婚时，他说：“您替自己去找寻有教养的姑娘去，把我们这个傻瓜留给我们吧，我们自己是会去找寻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婿来的。”在这些话中，你还能听出一种讥笑的意味；可是鲁萨柯夫却继续严肃地用同样的腔调讲：“唔，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呀？您自己决定吧，我的爹：她就住在这里的四堵墙壁里，没有见过世面……您绝对不会爱她的：她是一个没有教养的普通姑娘，跟您根本就不配。您有亲人，您有朋友，大家都要笑她，象笑一个傻瓜一样，而且您觉得她比苦艾还要使您讨厌……难道我应当让女儿来受这种苦楚吗！”

在这些议论中最使人悲哀的是，它们完全是正确的。实际上，要是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嫁给一个贵族，即使他不是什么浪荡的人，象维霍列夫似的，等着她的也不是怎样愉快的生

活。她在事实上就是被教养得这样的，在她身上根本没有人的气息。从她父亲的嘴里发出来的，对她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从她的眼睛里，只看到爱情和温柔，她会喜欢任何一个丈夫的，应当替她去找寻一个喜欢她的人。”这就是说——这是一种无所区别的、逆来顺受的善良，这种善良，就是在家庭专制主义的压迫下，在柔弱的性格中培养成功的，这种善良，就是最为顽固独夫所喜欢的。对于那些习惯于以人情常理作为他们行动的依据，以正义的要求以及共同的幸福来考虑他们的行动的人，这样的善良却是令人憎厌的，或者至少是令人可怜的。这是不难明白的，假如一个人对一切都表示同意，那么就是说，他并没有自己的主张；假如他什么人都爱，什么人都是他朋友，那么就是说，——一切人对于他都没有差别；假如一个女孩子会爱上任何一个丈夫，那末很明白，她的心甚至并非是一片血肉，而只是一块发酵的面团，听你的便，什么东西都可以塞进去……

对于每一个不曾遭受专横顽固摧残的人，爱情的全部魅力是在于，另一个人的意志和他的意志和谐地融为一体，没有一点勉强。因此，到得相互关系达到一种敲诈、欺骗，到得要用金钱收买，或者完全要用什么外来的不相干的手段而获得的时候，爱情的魅力，就常常是不完满的，有缺陷的了。只有当爱人之间有着内在的和谐，爱情才可能真正是美好的，那时候，它成为社会幸福的基础和保证，这种幸福将向我们许诺，在人类未来的发展中，要建立兄弟的友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然而专横顽固是不可能让这种感情逍遥自在地留在它的重压之外的：在这种感情的自由自在与顺乎自然的发展中，它感到了对于自己会有一种什么危险，因此，它就首先努力去扼杀作为这种感情的基础的个性。为了这件事，顽固独夫就编造他们的道德，他们的

处世秘诀，并且根据他们的解释，归结说，个性越是磨灭得干净，越是弄得不可区别，不可辨认，它就越是接近完人的理想。“他有一种出色的性格，他能够毫无怨言地忍受一切侮辱，他能够喜欢最没有价值的人，”——这就是他的赞美，比这更高的，顽固独夫就什么都知道了。可是照我们的见解看来，这一类人却是废物、脓包、懦夫；他可能是一个好人，但只不过是这个词的奴性的意义上。对于别的人，他就没有什么用处，能够从他那里期待到的害处，也跟那些好的行为一样多；因为一切都以他将落在什么人的手里为依归。作为一个顽固独夫的鲁萨柯夫，对于这一点，他是什么都不承认的，却坚持自己那一套：“世界上所有恶事，都是为了没有节制才会发生；我们从前是有畏惧的，而且尊重长辈，这样要好得多……现在没有什么人痛打年轻人了，可是这是应该的；用棍子打在他们身上，他们才会哭。”他不论谈到什么东西，——最着重的就是尊重长辈。甚至他恼恨维霍列夫，也多半是为了这个人“不善于跟长辈说话”。因此，当自己的女儿打算说服父亲，他这时就不管他的一切温和，叫道：“你怎么敢跟我这样说话？”接着，他给她一个严厉的命令：“你听着，阿芙陀季霞，这是我最后的话：或者你给我嫁给勃罗达金，或者我连知道都不想知道你。”而且，为了使这个命令更加有力起见，他又用叱骂来巩固它：“我把你抚养成人，我爱护你比眼睛还当心……灵魂里承受着多少罪孽，为了把你引为骄傲……上帝已经为了这些罪恶惩罚了我。”他虽然说得很公正，但这样的态度还不能说是很人道的；不过在我们的“黑暗王国”中，这已经得算是很温和的了，而且凭良心说，鲁萨柯夫也得算是顽固独夫们中的佼佼者了。

然而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的善良的性格，就是在这温和的专横顽固的影响下，培养成功的！要想象更可怜的女孩

子，这已经是很困难的了。实际上，她与其说是可怜，甚至毋宁说是可笑，正象苏斐亚·巴甫洛夫娜怀着满腔爱情去爱莫尔恰林^①，或者苏斐亚·谢尔盖耶夫娜（在波吉兴君^②的《最近的神使》里的）怀着缠绵的热情去爱齐尔别尔巴哈一样可笑。可是对于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却不能去嘲笑：她的环境是太阴暗了。假使我们一个人在深更半夜、在荒冢累累的阴暗的坟堆中走，突然，在一座坟墓的背后，当着我们的面，猛的出现了一个什么丑陋的怪脸，向我们皱眉作态，——那么这种皱眉作态，不论怎样可笑，可是在这一刹那间，你却很难笑得起来：因为你不由自主地感到了恐惧……我们“黑暗王国”中的喜剧也是这样的：事情本身似乎是简单可笑的，可是看到了顽固独夫以及在黑暗中被他们所压毁的牺牲者的形相后，你就失去嘲笑的胃口了……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在全剧的进程中，一直置身在最强烈的激动中，这种激动，你可以说它是无意义的和空虚的，可是在我们身上激起的至少不是可笑，而是同情：这个可怜的姑娘，实际上并没有罪过，因为人们已经剥夺了她内心的一切道德的支柱，而且对她进行教育只是为了终生把她束缚起来。她的心是善良的，在性格中还有许多轻信，正象所有还没有变得凶暴起来的、不幸的、被压迫的人一样；爱的要求是被唤醒了，然而它没有给自己找到活动的地方，找到理智的支柱，找到值得去爱的对象。在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身上，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种真正的观念，并没有得到发展，对于那些鼓舞她内心的事物的尊敬，也没有得到发展，同时，对于道德责任

① 苏斐亚·巴甫洛夫娜与莫尔恰林都是格里包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

② 波吉兴(А. А. Потехин, 1829—1908)，奥斯特罗夫斯基风的剧作家。

的理解，也只发展到这种程度：承认它是一种外来的强迫的力量。这个不幸的姑娘，就在这种情势下奔窜，不知道她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安身。她爱父亲，但同时又觉得害怕，甚至总有点不能完全相信他。她爱过勃罗达金；可是人家告诉她，他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她就手足无措了，不知道想些什么才好，终于达到这地步：她开始讨厌起勃罗达金来。维霍列夫偶然撞来了，这个人除了厚颜无耻和一张脸蛋以外，就什么都没有；——她却被维霍列夫吸引去了。然而即使在这里，她也只是徒然地折磨着自己：她没有在坚实的土壤上站过一秒钟，老是好象在沉下去，——一会儿稍许浮起来一点，一会儿又沉没了……你等着吧，眼看着就要完全沉没了……在第一幕的结尾，她第一次上场时，维霍列夫通知她，她的父亲要把她许给勃罗达金；她天真地说：“别担心，我不会嫁给勃罗达金的。”——“要是你爹命令你呢？”——维霍列夫问。“不，”她说，“他不会强迫我的。”——“要是强迫你，——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时候，”她傻气地回答道，“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这件事情了……怎样的不幸临到了我的身上呵！”维霍列夫，他是不择手段的，——他向她提议偷偷地跟他逃跑；她就陷入恐怖，并且叫道：“啊，不，不，您怎么敢这样说？这无论如何办不到！”为什么要这样恐怖呢？你瞧，这单单是为了，“父亲要咒我的；那时候，我怎么有脸活在世界上呢？”由于这样的结果，她就天真地劝告维霍列夫去跟她的父亲商量；维霍列夫推测这是不会成功的，她就用这些说法去安慰他：“怎么办呢！我的命运是多么坏……昨天，爸爸拿纸牌卜课，恐怕会有什么不幸发生，我真哭了一阵子呢。”维霍列夫威吓她，他要到高加索去，想法在那里让人家把他打死；她就纠缠着他：“不，您别去。您怎么啦，——您说的是多么吓人呀。”总之，——这个女孩子从四面八方感到了恐怖；那边有父亲的诅咒在威吓

她，这里纸牌上在预示要发生什么坏结果，那里可爱的维霍列夫会突如其来地被乞尔卡斯人^①打死。要是在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的心里，对于这一切恐怖，多少有一点内在的抵抗力，这该多么好！父亲的诅咒、纸牌、维霍列夫要跑到枪林弹雨里去——这一切她都天真地一律深信不疑，对于这一切同样她都觉得害怕……她在第二幕的开场，关于自己她说出了真话：“我好象影子一样走路，我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息……我的心只感觉到，这儿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已经知道，我这个苦命的人一定得流出许多眼泪。”真的，在这种情形底下，怎么能不淌眼泪呢！……

更可悲的是，她还爱着勃罗达金，在从前，一碰到他，话就说个不停；她曾经在篱垣小门前等候他，跟他一同消度过秋日幽暗的黄昏，——而且现在还在怜惜他，可是在同时，她又怎么也摆脱不掉关于维霍列夫出奇地漂亮这种念头。不过，她对自己却很不满意，她说：“我看见他就是罪过。”然而，对于她最大的折磨，还是去请求父亲同意她嫁给维霍列夫的愿望。她是怀着一种特别庄严的心境，来进行这件事情的，开头，她迫使维霍列夫发誓表示真正地爱着她，后来，就向他宣布，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情，她决定自己去恳求父亲……“如果您能够知道，这要花费我多少力量，”——她补充着说。最后的一场就完全说明了而且证明了她的恐怖，这种恐怖只有在专横顽固的关系之下，才会发生，才能解释明白，鲁萨柯夫全家的生活就以这种关系为基础。人们也许以为，对于一个做女儿的，还有什么比向她温柔地爱着的父亲表白自己的愿望——更自然更容易的呢？然而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虽然坚信父亲是爱她的，可是她也知道，向她父亲这样公开以后，结果会出现一些怎样的场面，于是她的善良

① 当时散居于高加索山间的一种部族的名称。

的、被压抑的性格，就预先战栗、痛苦起来了。事实上也确是这样，——什么“你怎么敢？”什么“我把你抚养成人”，什么“你这混蛋”，什么“你不配受我的祝福”——这一切就象冰雹一样，落在这个可怜的姑娘的头上，把她弄得这样子，甚至在她那软弱而顺从的灵魂里，都突然浮起了一阵温和的抗议，这抗议表现着她那以前的感情已经起了一种不由自主的、不自觉的改变：父亲命令她嫁给勃罗达金，反而激起她对这个人嫌恶。“我最近还有点可怜万尼亚，”她这样提到勃罗达金，“现在他却使我讨厌……使我讨厌。”然而这已经是她能够做到的反抗的极限了；在她反抗别人的意志方面，比这再进一步，就无能为力了——她终于昏倒下去。在这当儿，出现了一个动人的场面：鲁萨柯夫被感动了，同意让女儿嫁给维霍列夫，但只不过，这个人须得不拿一文钱，就娶她走。欢乐万分的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就急忙跑到教堂去，要想在路上碰到维霍列夫，向他宣布这个愉快的消息，维霍列夫就把她带走了……事情的结果，显示维霍列夫是强把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带走的，这个情形对鲁萨柯夫老人是太重要了。然而对于我们，却没有这样重要，因为我们在喜剧中，看到了被带走的姑娘与维霍列夫在旅店的一场。根据这一场，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下结论说，维霍列夫所以强迫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坐在马车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时间的匆促，如果维霍列夫要去劝服她，她自己是不可能去反对他的。在旅店中，开头她这样央求：“维克多·阿尔卡奇契，亲爱的人！我准备跟您到火里，到水里，只是您得放我见爸爸去……不知道他怎么样啦？”等等。可是在维霍列夫的意志前，她的央求却马上消灭了。他一去说服她，而且略微抚慰了一阵，她就立刻对他说：“你是我亲爱的人！我的快乐，我的生命！要我到哪儿——就跟你到哪儿！现在我谁也不怕，而且什么人也不可惜啦。我就

这样跟你飞到随便哪儿去吧！”在这之后，她又想起了父亲，当然，又是毫无结果。你瞧，当她决定跟维霍列夫走的时候，她是觉得恐惧的；可是一落到了他的手里，她可又害怕离开他了。在她的身上，从来没有显示过坚强的决心，以证明她性格上是独立的。温和地怨诉，柔顺地央求——比这再进一步的，她就不会走下去了。当维霍列夫由于知道了不会给她一文钱，把她推开去的时候，她好象起了一些愤慨，并且说：“维克多·阿尔卡奇契，您欺侮一个可怜的女孩子，您不会有幸福的。”然而她自己却立刻为自己这些话而吃惊起来，就改用一种柔和的语调，人们甚至会从这语调中寻味出一种嘲笑，虽然这在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的地位上，是无论如何都不适当的。对邪恶已经丧失任何表示愤慨的力量的善良，对于命运的浑浑噩噩地顺从——就在这个不幸的姑娘的这些话里表现出来：

“老天爷会替我处罚您的，我倒不愿意您倒霉。您给自己去找一个有钱的老婆，找一个人，爱着您，象我一样，跟她快快活活地过日子，至于我，这个平常的女孩子，只好胡乱的过活，坐在四堵墙壁里面，咒骂自己的命运，赶早度过我的残生。”

可是这个温柔敦厚、娓娓动听的大段说白却是对维霍列夫而发的！维霍列夫这样想：“既然玩弄玩弄是这样方便，为什么不再玩一下呢。”而且更有甚于此者，在戏剧的结束，鲁萨柯夫在庆幸这个教训对于女儿不是白费的之余，他就在她身上，更加加强这个顺从长辈的原则，——还偿付了维霍列夫住旅店时所留下的欠账。你瞧吧，这里正暴露了专横顽固的惯例：据说，做好事是没有什么规律的：我要惩罚就惩罚，我要布施就布施……没

有人能够指点我，——甚至是那些最公正的规则。

这就是在喜剧《各守本份》中两个主要人物的情形和发展。你喜欢不喜欢它呢？你自己愿意不愿意站在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的地位上呢？或者，说不定，你乐意扮演鲁萨柯夫这个角色，把你接近的人们中的随便哪一个人、也弄到象我们所看见的马克西姆·菲陀迪奇女儿所处的一样的境地里去？倘是这样的话，那末当然，你应当歌颂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这个喜剧里所描写的那种生活——它的宗法制度、纯洁以及幸福。但要是不然的话，那末这个剧本应该使你感到一种强烈的抗议——一种要在专横顽固还能够用某些慈悲为怀、深思熟虑的特征来欺骗许多人的一刹那间，就把它抓住的抗议。

“可是，”人们可能会这样对我们说：“在鲁萨柯夫家里所发生的不幸，不过是完全来自他们生活中一连串最平常的现象中的一场而已。在维霍列夫来到这里之前，鲁萨柯夫的全家，平平安安的，过得很幸福。一切不幸的祸根，都得归罪于新观念的传染，这种新观念就是鲁萨柯夫的妹妹——阿连娜·菲陀托夫娜从锻工桥那边带来的。鲁萨柯夫自己曾经对她说：‘这是你做的好事，你乐啦！我教导她知道恐惧，教导她心地善良，她在我身边，好象一头纯洁的鸽子。你一来就带来了你的传染病。你成天只是说些废话……你所有的话都是胡说八道。不应该放你走进好人家去：你是毒药，你是妖魔！’真的，在全剧之中，你会很清楚而且很透彻地看到，这种毒药是怎样渐渐渗透进这个女孩子的灵魂，怎样破坏着她的平静生活的安宁。而在剧终，我们又看到了这种朴实的宗法制度关系的蓬勃的力量怎样战胜了现代一知半解教育的病毒，怎样使得迷途的女儿回到双亲的家里去，怎样通过勃罗达金高奏凯歌，恢复她在一切周围人们中间的、她的亲近人们中间的天赋权利。显而易见，这就是作者自己

所要赋予剧本的意义，这个剧本在任何一切人身上所引起的印象，不是反对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而是跟这种生活妥协。”

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说，我们不知道作者在构思他的剧本时，他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可是我们在戏剧本身所看到的那些特征，根本不可能作为歌颂旧生活的根据。倘使这些特征并不怎样明朗，不能使得每一个人都一目了然，倘使这剧本会引起分歧的印象，——这只不过证明（正象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作者的一般的理论信念、在创作剧本时、还没有和他的艺术天性从现实生活的印象中所提炼出来的东西，达到完全的和谐。然而，我们在观察一个艺术家时，不是把他当作一个理论家来看待，而是把他当作一个现实生活现象的体现者来看待，我们对于他遵奉的是什么理论，并不寄予特别重要的意义。要紧的是，他是诚实的，不曾为了顾全自己的看法，歪曲生活的事实；这样，那些事实的真正意义，就自会在作品里表现出来，虽则，当然的，它不会象有抽象的思考力帮助着艺术作品那种场合，那么明确……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甚至他的敌人都在说：他一直是忠实地描写着现实生活的图画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把作者在创作他的剧本时，究竟抱着什么企图的问题——当作一个片面的、个别的问题，让它搁在一旁。我们推想起来，他是不会有什么企图的，他只是震惊于他所着手描写的“黑暗王国”中常常出现的事件，——他就抓住这个事件，把它写出来。关于事件的意义，他都听凭公众与批评家去判断。有的批评断定，剧本的意义——是在指出一知半解教育的害处，而歌颂俄国生活方式的根本原则。照我们的意见看来，这种说法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有一部分是不完全的。剧本的真正意义是下面这样的。

鲁萨柯夫是旧的生活原则，专横顽固的原则的最好的代表。就其性格说来，他是仁慈的、正直的，他的思想和事业都指向于

幸福，因此在他的家庭里，我们看不到那些压迫的恐惧，而这在其他也是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描写的专横顽固的家庭里却是常常可以碰到的。然而这一个现象，完全是偶然的，特殊的；实际上，在鲁萨柯夫们的生活方式所立脚着的这些原则里，并没有什么幸福的保证。相反，这些原则却消灭了个人的权利，而以恐惧与顺从作为教育与道德的基础，它们只能促成横暴、压迫与欺骗。鲁萨柯夫——他是一个偶然的例外，可是第一件卑微不足道的小事，就破坏了他那整个慈善，这种慈善，在他的家庭里，就是他的个人价值的结果。他认为，一切坏事，都是由于阿连娜·菲陀托夫娜的教唆而发生的；然而他这种说法只是想嫁祸于人。这儿，又用得着不久以前那些反对知书识字的人所运用过的三段论法。“知书识字的农民——都是些恶棍和骗子；他们欺骗着不识字的人；不需要教导农民读书识字。”这种三段论法，就其正确的方式说来，其实应该是下面这样子：“不识字的农民要被识字的所欺骗；因此，应该把求知的方法教给一切农民，让他们可以提防欺骗。”这里也应该这样：阿连娜·菲陀托夫娜引诱了而且欺骗了鲁萨柯夫的女儿；那怎么办呢？这样，应该把防卫自己不受诱惑的方法教导这个姑娘。必须让她自己去打开生活，见见世面，训练她习惯于独立地思想与行动；一个有教养的而且习惯于社会生活的女孩子——她是不会接受卑鄙的阿连娜·菲陀托夫娜的影响的，也不会被轻佻的维霍列夫所俘虏的。然而如果让她作真正的、人性的发展，这就是承认她的个性的权利，排斥专横顽固的权利，违背了“黑暗王国”生活方式所凭依的一切传统；这是鲁萨柯夫所不愿意做、而且也不可能做的。他已经和善而且明智到这种程度：能够不走入极端，能够给那已经被他的同胞手足弄到滥用地步的专横顽固的权利，定下了一个范围和节度。然而在他的心里，却没有足够的智力和性格，来放弃他的生活方

式的最主要基础。他停留在既定的一点上，一切从这一点出发的事情，他都能充分正确地加以研究；他说得非常正确，对他的女儿，要加以欺骗，并不困难；阿连娜·菲陀托夫娜的话，对于她可能是有害的；一个没有教养的商人之女嫁给一个贵族，是不会得到愉快的，等等。然而在他所有的见解中，都可以看出那种无理可喻的、冥顽不灵的保守精神，这种精神是执拗的专横顽固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他停留在事物的既成地位上，他甚至不愿意放纵自己有这种思想：这种地位是可以而且应该改变的。他承认：他的女儿没有教养，因此，不配嫁给一个贵族，然而他对于自己没有去教育她这一点，并没有表示丝毫遗憾。照他的见解看来，这是应当这样的：商人之妻不过是商人之妻，贵族夫人却生来就是贵族夫人。他还认识到，他的女儿不懂得辨别人，因此才会被那个下流轻佻的维霍列夫所迷惑。然而这一点还不能使他达到这样的思想：应该多少训练她有自己判断事物的能力。相反，——按照他的信条来看，这样才算是好：她不论碰到什么人，都会爱起他来。按照自己的口味挑选人们的权利，爱这一些人以及不爱那一些人的权利——尽其最大范围来说，也只可能是属于他的，属于鲁萨柯夫的，一切其余的人都只应当以他们的温柔和顺从作为他的点缀：这是专横顽固的规则。〔鲁萨柯夫，虽然有他那一套慈善和理智，可是作为一个顽固独夫，他还不可能有决心去根本改变他对周围人们的态度，甚至也不可能理解这种改变的必要性。家里一切祸害的发生，都由于鲁萨柯夫害怕让女儿有意见上的自由以及支配自己的行为的权利，他压制着她的思想与感情，使她一直成为未成年的、几乎是低能的女孩子的缘故。他看出有灾祸的存在，他也希望能够没有这种灾祸；可是要做到这一点，他首先应该离开专横顽固，跟自己有支配女儿的智慧 and 意志的权利那种见解分手；可是这是超过他的力量的，

甚至也不是他的理解力所能达到的……因此，他就把罪恶卸在别人的头上：一会儿说是阿连娜·菲陀托夫娜带着传染病而俱来，一会儿就单单是——魔鬼在作怪。“人类的敌人，”他说，“用尽一切诱惑手段，用尽一切迷人方法，来勾引我们……”他还不愿意了解最单纯的真理：倘使要这个人能够顺利地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就不应该麻痹这个人的内在力量，束缚他的脚和手。]

为了父亲的专横顽固，女儿就得牺牲一切她可能获得的真正幸福的、自觉而光明的将来。马克西姆·菲陀迪奇对于生活的总的看法，不可能不违反他对于女儿的爱，而影响到她的发展。他能够保护她不必使用一切可以给人以自卫手段的东西，而因此，他就不能好好地把她保护了。人们也许觉得，没有比这样更好了：使一个女孩子象鲁萨柯夫所说，在“恐怖和慈善”中教育成人，不读不良的书本，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只有到教堂去才出门，那些不尊敬长辈，以及关于良心权利的自由思想——都不得其门而入，离开个性独立的要求也很遥远，正象距离到军队中去服役的念头一样……还有什么更好的呢？既然她是按照鲁萨柯夫所一劳永逸地画定的方式，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的，那么似乎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个最温柔的人，顺从的鸽子，从正路上勾引、诱惑走了。然而凡是在人的内部、在人的理性以及自觉的决心中没有根据和支持的东西，都是动摇的、瞬息即逝的、渺不足道的。只有那些从内在的确信中流露出来、经过一切参加在这种社会和家庭中的人自愿而理智地同意的社会与家庭关系，才可能得到巩固。专横顽固，甚至他的最好的代表，象鲁萨柯夫之流，也不肯承认这一点——因此，它在最初出现的偶然事件中，在最初出现的小波折中，甚至在没有什么一定的意义的简单的儿戏中，就遭受到惨重的失败。还有比阿连娜·菲陀托夫娜的议论更渺不足道，更荒谬的吗？还能想象比维霍列夫对待

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更无耻、更荒唐的吗？然而，这两种卑鄙无耻却扰乱了鲁萨柯夫家庭生活的整个谐和，迫使父亲诅咒女儿，女儿——离开父亲出走，后来又使这个不幸的姑娘落在这样的境地里：在这种境地里，照鲁萨柯夫的意见，不但对于她是最大的悲哀和终生的不幸，而且使全家都蒙上共同的耻辱。在这种场合中，在那专横顽固的生活方式以及它的宗法制度的习惯里，甚至连和解的力量都找不到，因为这里不但是纯洁的外表，而且连服从的原则都被破坏了……为了恢复这个无辜的、但却出乖露丑过的女孩子的权利，需要勃罗达金做出和这个环境的风习完全不同的、完全不适应的慷慨的举动，——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这种非常轻率的行为，还有，和解的无法办到，就是这种环境的愚昧性以及顽固性所造成的。

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重复我们的结论：通过《各守本份》这个喜剧，奥斯特罗夫斯基——不论是有意或是无意，或者甚至是违反意志的，——是要指给我们看，在专横顽固的因素还在生活基础本身存在的时候，即使是最善良、最高尚的人，也是没有能力做出什么好事来的，家庭的幸福，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幸福，也是不会得到巩固的，甚至对最不足道的偶然性，都没有力量防卫。我们从分析鲁萨柯夫的性格以及关系中，引伸出这个可以把它应用到当一个正人君子也置身在专横顽固的地位上，为一己的权利所蒙蔽的时候的真理。我们还可以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其他一些喜剧中，找出这个适用于“黑暗王国”中的另一半人——另一半被支配受压迫的人的同一个真理的更加有力的解释。

〔作为这篇文章题词的那些诗句，有些也可以应用到鲁萨柯夫身上：他有善良的愿望，他也愿意对别人有些好处，可是“白费心机地央求阴影”，他却在专横顽固的炎威底下枯萎了。然而这

些诗句却更适合那些不幸的人，他们禀赋着最赤诚的心以及最纯洁的愿望，他们在专横顽固的压迫下，弄得疲惫不堪，专横顽固窒死了他们内心之中的一切思想与感情。一想到他们时，我们立刻就会想起：

他白费心机央求预言家赏赐阴影：
只给他带来了滚烫的尘沙，
还有那草原上的傲客，竖起冠毛的鹞鹰，
折磨着而且撕裂着它的猎获品。]

四

这多分是由于失去控制，
或者是由于愚蠢无知。

奥斯特罗夫斯基

在鲁萨柯夫女儿的悲苦的命运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愚蠢无知的东西；可是在那里，我们的印象却因为这种压迫还不算怎样粗暴地折磨着她而得到了缓和。我们觉得更加荒谬与粗野的，是在《贫非罪》这个喜剧所描写的那些被压迫人物的命运中。

《贫非罪》十分鲜明地把那些正直而又软弱的性格，怎样在蛮横无理的专横顽固之下憔悴、毁灭，描写给我们看。柳薄夫·戈尔奇叶夫娜的父亲，柳比姆·托尔卓夫的哥哥，以及米佳的主人戈尔奇·卡尔贝奇·托尔卓夫，——这已经是彻头彻尾的顽固暴君了。正象他的妻子巴拉盖雅·叶高罗夫娜所批评，他又严厉、又骄横、又无理性。全家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栗。自从他跟萨维奇·柯尔松诺夫结交，“开始学起时髦”来以后，就变得特别可

怕了。戏剧的情节就建立在这种友谊上，建立在戈尔奇·卡尔贝奇对于新时髦的偏爱上。读者当然能够记得，托尔卓夫要把他的女儿嫁给阿夫里肯·萨维奇，女儿却爱上了那个管事米佳，米佳也在爱着她……批评家就根据这一点来推测，奥斯特罗夫斯基所以写这个《贫非罪》，目的是要表现：这种抛弃旧习惯，神往新时髦，在商人的家庭里，是要产生怎样有害的结果……为了这样，这一边是过分的赞扬奥斯特罗夫斯基，那一边却是无情的痛骂。我们既不想跟这一批批评家争论，也不想跟那一批争论，更不想分析他们的推论是否公正。我们甚至以为，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心里，的确存在着人们硬要派给他的那种思想；但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心思去谈到它。最使我们感到兴味的是，我们在托尔卓夫的身上，发现了专横顽固的新色彩、新式样；在这儿，我们要看到，教育，也就是说，它那唯一为顽固暴君所理解的偶然而渺不足道的形式，通过怎样的方式被他们所接受。我们现在正要谈论这一点。

专横顽固和教育——在本身上是互相矛盾的东西，因此，它们之间冲突的结果，显而易见，就应该是这一个支配另一个；或者是顽固独夫被教育的原则所浸透，那时候他就不再是顽固独夫了，或者，他使教育变成他的任性怪癖的奴仆，这样，他就仍旧象先前一样的无知了。在戈尔奇·卡尔贝奇身上所发生的，就是后者，正象几乎是所有顽固独夫所发生的一样。他怎么也想不透，走向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要使自己的专横去服从理性的要求，同时尊敬别人的同样的要求。相反，他却觉得，一切教育，一切逻辑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加完善地实行他的专横任性。因此，他就只了解教育的粗糙的、物质的一面，纯粹外表的一面。“他们，”他说，“因为自己没有教养，在喝些什么东西呀！他们喝的甜酒，只有各种樱桃酒——却不知道还有香槟酒！”“吃喝的时候，样子多

么粗野：只有穿了短褂的小子，或者小姑娘在旁边伺候！”“我在这个城市里看到的，”他说，“只有粗野，只有无知无识；为了这样，所以我要到莫斯科去，可以在那里学学各种时新的东西。”他以为，教育就在这种摹仿之中，他纠缠着他的妻子，叫她在衰老之年，不裹头巾，却戴起软帽来，叫她举行有音乐伴奏的时式晚会，摆脱一切古老的习惯。然而他并没有看出有改变自己对待家里人的态度的任何必要，让普通常识多少能够参与自己的家庭生活。戈尔奇·卡尔贝奇的苛刻，变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他给予周围人们活动的天地，却比以前更不如了。他的妻子抱怨道：“在他这种暴躁的性格下面，跟他说话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他接受了这种教育以后。“那时候，他多少还有点理性，”巴拉盖雅·叶高罗夫娜这样谈论他说，“可是现在他脑子里完全弄得七颠八倒了”……甚至关于女儿的命运，他妻子也不敢对他说什么：“好象一只野兽瞅着我，一句话都不说，——好象我不是母亲似的……真的，真是这样的……我什么话都不敢跟他说；我只好跟几个不相干的人，说说自己的痛苦，哭一阵，让心里轻松一下，这就是我能够做的了”……戈尔奇·卡尔贝奇对待家里其余一切人的态度，也是很粗鲁，而且压迫到极点的。对于女儿，他唯一要求的，就是她不要越出他的意志之外。对于她的要求——不要把她嫁给柯尔松诺夫，他这样回答：“笨蛋，你自己还不了解自己的运气……一件——你可以过体面日子，不必再呆在这种穷地方了；另一件——我就这样命令你。”于是女儿就回答：“我是不敢违拗你的命令的。”戈尔奇·卡尔贝奇还毫无礼貌地、完全出于故意地叱骂管事米佳。当知道了他寄钱给母亲以后，托尔卓夫就挑剔说：“第一你应该打扮你自己：老天都不知道你母亲需要什么，她不是在奢华里教养大的；咄，她自己就会料理她的猪窝”……在托尔卓夫的眼里，这是莫大的罪恶：一个人把钱寄给

母亲，却不替自己缝制一件新衣服！……但是托尔卓夫并没有想到去增加这个做事勤勉的管事的工资，甚至柔弱的米佳自己都在抱怨这一点了：“戈尔奇·卡尔贝奇给我的工资是那么小，老是侮辱和臭骂，他还老是责怪我穷，好象这是我的错……工资却不肯加。”总之，粗野和放肆不断地、而且是非常强烈地在戈尔奇·卡尔贝奇的身上显示出来。当他走进正在唱歌的职员们的房间，他叫道：“唱什么呀！乱哄哄怪叫，好象是庄稼人！……”就这样臭骂起来了。在第二幕中，当巴拉盖雅·叶高罗夫娜安排晚会，还叫几个跳假面舞的人来的时候，阿连娜突然奔来，说道：“主人来啦，”——于是一切在场的人都惊恐地站起来。戈尔奇·卡尔贝奇真的来了——他以下面这种祝词向妻子和宾客们问好：“哪里来的混蛋！滚开！老婆，来招待客人！……”这个客人——就是阿夫里肯·萨维奇，由于他多少已经抑制了一点戈尔奇·卡尔贝奇怒火的爆发……显而易见，甚至连这种表现在态度和礼节上的外表的教养，戈尔奇·卡尔贝奇也没有达到。他能够穿起新的服装来，陈设起新的家具来，爱好起香槟酒来；然而在他的个性中，在他的性格中，甚而至于在他对待人们的外表态度中——他却不愿意有什么改变，〔在他的一切习惯中，他〕仍旧忠实于他的专横顽固的本性，〔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教育用一种什么方式去影响每一个顽固独夫的最有趣的榜样。看起来，好象这是一个已经走上一条正路的人：他已经认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那种生活方式的缺点，对愚昧无知充满着愤慨，对教育的优点有一般的了解……这真是令人安慰的现象！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一切在他身上还很混沌、脆弱、不真实；但毕竟他是开始做了，停滞毕竟是被扰乱了，活动毕竟是采取新的方向了……也许，他会继续顺着这条路走去，他的性格会变得柔和起来，他的一生会显出新的特征……不，这是你盼望不到的……〕

在其他一切人身上，教育会激起他们的同情心，使他们的性格变得柔和，发展对于公平原则的尊敬等等。然而在顽固独夫身上，教育本身，逻辑本身，德行本身，却都带上了他特有的粗野和荒唐的形式。既然顽固独夫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他的专横应该成为一切人、一切事物的法律，他就喜欢这样利用，使教育给人以舒服，同时也喜欢去要求别人，配合着各种知识上的成就，配合着许多新创见的采用等等，要把他的意志奉行得更好。然而只达到这一点，他就停止了。你不必去盼望，他由于认识教育的种种新要求的结果，就加给自己以随便什么限制；甚至你不用去想，他会对理性的规律以及对科学的结论，怀着严肃的尊敬：这根本同他的专横顽固的性格不相称。不，他永远从高处来俯视那些有思想、有知识的人，好象看那些有义务为了满足他的专横任性，把物质供给他的粗工一样，〔他永远要在教育的种种新成就中，搜寻能够宣布他的新权利的口实，〕而且永远不会认识就是这同样的教育上的成就向他提出的种种责任。否则，他就不可能做什么，就不再成为一个顽固独夫了，因为教育的第一个要求，就在于要他放弃专横顽固。而放弃专横顽固，对于任何一个戈尔奇·卡尔贝奇都是等于——叫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渺不足道的东西。因此，他就对周围的人们这样自慰：他们的愚昧无知使他觉得刺眼，同时追究着他们在知识和一般常识上的每一种表现。他知道，受过教育的姑娘们会说得很好，他就责怪女儿，说她连说话都不会；但是她刚要说什么时，他却叫道：“闭嘴，混蛋！”他看到，那些有教养的管事们都穿得很体面，他就向米佳发脾气，说他的衣服太不行；可是工资他却仍旧给他一个非常微小的数目……他在自己整整一生中，就是这样的，——所以戈尔奇·卡尔贝奇这个人物的主要意义，在我们看来，就在于揭露顽固独夫这一种对待教育的态度。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有些批评家凭什

么能够得出结论说，奥斯特罗夫斯基是要在这个人物身上，在《贫非罪》整个喜剧中，表现新观念对于俄罗斯旧的生活方式的有害影响……全剧之中，写得很明白，戈尔奇·卡尔贝奇所以变成这样粗野、可怕和无知——并非从到了莫斯科，模仿了新时髦的时候起，才开始的。在本质上，他以前就是这样一个顽固独夫了；现在他不过加上了一点新要求而已……

柳薄夫·戈尔奇耶夫娜以及米佳的温柔性格，就是在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关系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就是个性的泯灭可以达到何种程度，压迫甚至使最富有同情心与自我牺牲精神的性格，都会弄得完全无力去从事独立活动的榜样。米佳是能够自我牺牲的；他为了接济他的母亲，就宁愿自己忍受贫困；他为了爱戈尔奇·卡尔贝奇的女儿，就忍受着他的一切粗暴，不想离开他；他不顾主子的愤怒，还是把柳比姆·托尔卓夫安顿到自己的房间里来，甚至还给他钱去喝酒。总之，米佳有这许多自我牺牲的精神，令人觉得，一切牺牲，一切危险，在他好象都是满不在乎的……柳薄夫·戈尔奇耶夫娜的善良，也并不比他有所逊色。她是怎样爱着米佳呀——这甚至是无法用言语说明的，看样子，她是很高兴把灵魂献给他的……要是这些人是正常的，怀着自由的意志，同时多少具有一些毅力，——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们分隔开来，或者至少，这种分隔免不了经过一场艰苦而可怕的斗争。但是请观察一下，一切事件在托尔卓夫的家庭里是怎样爆发的。正当柳薄夫·戈尔奇耶夫娜吐露了她的爱情，打算去恳求父亲祝福的时候，她对米佳说：“可是，假使爸爸不愿意我们幸福，——那时候怎么办呢？”米佳回答：“谁能够预先猜到呢？只好听凭上帝摆布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可是我，要没有你了，我就活不下去了。”对于这些话，柳巴契加就找不到什么话来回答。年轻人们的无力以及被压抑，在这里，描写得

多么明白！他们甚至害怕去设想任何独立的一步，甚至把有关于当前种种阻碍的想法，都竭力从自己身上驱逐开去。她充满着恐惧说：“怎么办呢，如果爸爸不同意？”——可是他却用这种话来代替回答：“听凭上帝摆布吧！……”很明白，只要碰到一点极微小的阻碍，他们就没有能力实行自己的愿望了。真的，——就在这一天晚上，戈尔奇·卡尔贝奇陪着柯尔松诺夫一起来了，他命令女儿亲切招待，跟他亲吻，同时宣布，这个人是她的丈夫。巴拉盖雅·叶高罗夫娜陷入了恐怖中，她抓住了女儿的手，在无意识的激忿中叫道：“我的女儿，我们不能给他！戈尔奇·卡尔贝奇，我的爹，你不要把一个做母亲的心闹着玩吧！放手吧……把整个灵魂折磨得够啦。”然而戈尔奇·卡尔贝奇却大声叫吼道：“老婆！你是知道我的：我怎么说，就怎么办，”——于是妻子就沉默了。现在是轮到女儿来反对了。她是这样开始的，她跪在父亲的脚前，说：“爸爸，我不敢违背你的命令……爸爸，你不要使我的一生都受到不幸！仔细想一想吧，爸爸！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只不要强迫我违背良心，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这种反对，是这样结束的：这位未婚姑娘在父亲严厉拒绝之后，就回答：“听凭你决定吧，爹，”一边鞠躬，一边退到母亲身边去，于是柯尔松诺夫就吩咐姑娘们唱起结婚歌来……斗争显然并不十分顽强，并不怎样长久；然而在柳薄夫·戈尔奇耶夫娜身上，即使是这种个人自己愿望的表现，也有许许多多的意义。只有悲痛到极点，只有沉重的精神上的痛苦，才能迫使她张开嘴巴，喊出一些话：不同意父母亲的意志。但即使是这儿——说的又是怎样的话：“仔细想一想吧！”“你不要！”多么可怜的处境；甚至丝毫都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出来，当有切肤相关的不幸威胁着他们的时候，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别人的决定，寄托于别人的慈悲！……人类的本性，在这恐怖的家庭里，应该得到

怎样的歪曲，甚至连自卫感情在这里都采取何等奴气的形式的时候！……

这个喜剧的第三幕一开场，就是戈尔奇·卡尔贝奇的意志已经完成了：宾客们都来喝他的女儿跟阿夫里肯·萨维奇的订婚酒。那个老女仆阿连娜，咒骂着女婿，忧虑着未婚姑娘的命运；巴拉盖雅·叶高罗夫娜怨诉着自己的不幸，她的女儿就要毁了；米佳跑来诀别，他决定到母亲那里去，以躲避自己的不幸。可是，巴拉盖雅·叶高罗夫娜的眼泪和怨诉却使他失去克制，他开始讥刺她胆怯、无力。“您用不到给什么人伤心淌眼泪，”他说，“是您自己许给的。与其哭，还不如不给的好。为什么您要让女孩子终身受苦，让她去过奴婢生活呢？这难道不是罪过吗？”等等。巴拉盖雅·叶高罗夫娜只有一个回答：“我什么都知道，这不由我作主；米佳，你应当可怜我。”到这地步，米佳就感动起来了，并且把自己的爱情告诉了她，她就叫道：“啊，亲爱的人！你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人，我要怎样来看你！……”她可怜着他的不幸，好象可怜那种已经无法用随便什么人类的方法来挽救的不幸似的，——例如吧，她仿佛听到了米佳把自己的手砍掉了，或者——他的母亲死了的消息似的……然而，柳薄夫·戈尔奇耶夫娜终于自己来了；米佳的心就极度紧张起来，至于向巴拉盖雅·叶高罗夫娜提议，到晚上让女儿穿着得暖和一点，他把她带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就在那边举行婚礼。这个决定是非常勇敢的，但它并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严肃的计划，因此它就命定要很快地归于消灭，正象它诞生得很快一样。米佳自己曾经用这样的辞句来概括他那种激动：“唉，应该让我的灵魂有活动的天地，——我真想畅快一下！只要能够办得到的话，至少我还能够知道，我还有一点乐趣。”所以，这是一种绝望的、没有理性的激发，这种激发是那些最软弱的人在某一刹那间常常会出现

的。可是米佳并没有力量去支持自己的要求，当一碰到母亲与女儿拒绝以后，他就很快自动放弃自己的企图，而说：“唔，显然这是命中注定的了。”至于柳薄夫·戈尔奇耶夫娜——她是完全被压溃了，她甚至不敢去想象同意米佳的提议……这是毋庸置疑的：她比较起米佳来，更要接近戈尔奇·卡尔贝奇，更要蒙受他那专横顽固的影响。因此，她就毫无怨言地决定忍受一切痛苦，只不要越出父亲命令的范围。“不，米佳，不能这样做，”她说，“你不要白白折磨自己，不要撕裂我的灵魂……光是这样，我的心已经是够苦的了……上帝保佑你去吧。”于是米佳就离开了，他知道，“柳薄夫·戈尔奇耶夫娜嫁给柯尔松诺夫，除了必然归于毁灭之外，不会是别的；”她也知道，母亲也知道——大家都无可奈何地而且木然地顺从着命运……专横顽固的压迫到了这种程度：它歪曲了他们心中的人的形象，窒息了一切独立的感情，剥夺了一切保卫自己的最神圣的权利、保卫感情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内心追求的独立性、享受相互之间爱情的权利的能力！……

假使在实际上，压迫着这些不幸的人的是一种不可克制的力量，一种高一级的性格，这倒还有可说！可是事实上全然不是这样！……戈尔奇·卡尔贝奇不但在他的见识上极其狭小，而且还很胆怯，精神也很柔弱。这也是专横顽固的一个拆不开的、无可避免的特质。顽固独夫在没有碰到什么反抗，或者这种反抗暂时还是脆弱和不坚决的时候……他就胡作非为，横暴专制，独断独行……然而他缺乏能够支撑他进行严肃而长期的斗争的支柱。他要求而且命令人家，可是无论是自己的命令的真正意义，无论是这种命令所根据的是什么——他自己也没有好好地理解……更有甚者，他老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怀着一种不确定的、混乱模糊的恐惧；他感到，他的许多要求，是不可能用随便什

么权利，用随便什么一般性的法律来辩护的……他害怕别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采取最平常的手段……威胁。大家都知道，一切卑微渺小、虚伪、肮脏——总之是各种各样毫无能耐的东西，是怎样掩藏在这种手段之下。不学无术的教师，竭力对学生们表示严厉，免得他们来询问他什么问题。不了解事务，或者是手面不干净的官长，竭力把自己装扮得俨乎其然，使得下属们不敢对他太大胆地下判断。没有什么真正价值的贵族，拚命在奴仆面前采取严厉和粗暴的态度……依靠着人们普遍的淡漠以及善良，这种行为几乎常常获得成功；有的人也许要向官长或者教师问个明白，——怎么样而且为什么？可是到得看出这个人是难以接近的，他就只好把手一摆了……“嘿，”他说，“见他的鬼！无缘无故，没头没脑臭骂一顿，倒有份！”由于这样考虑的结果，这种无耻的、专横的愚昧无知和胡行妄为，就能够继续安然享受因自己的无耻而得来的一切利益，享受周围的人们一切外表上的尊敬表示了。普遍的顺从，更加助长了顽固独夫的骄傲，甚至真的赋予他以力量。它补偿了他对于自己的内在价值认识的缺乏。例如吧，假如有一位先生从城市里把垃圾运了来，不管这样东西是毫无价值的，要是他看出所有周围的居民，由于一种不可理解的错觉，给它一个什么反常的价格的时候，他就会凭它来索取一个过高的价钱了……然而顽固独夫只有依靠类似这样的错觉才有意义。只消什么地方一出现强大而坚决的反抗，——顽固独夫的力量就崩溃了，他开始胆怯而且手足无措起来。在第一回，他还显得勇敢而且顽强，但这其实不过是由于习惯：因为他习惯于碰到无言的服从，他在第一次，简直不相信对他的意志竟可能出现重大的反抗。因此，在开头，他就把每一种其中多少包含有企图限制他的专横顽固这种意味的声音，都当作误解的结果，他疯狂地激怒起来，试着比以前所恐吓的还要恐吓得厉害

些,用了这种手段之后,大抵是能够把每一种不满缓和下来,或者把它扑灭的。然而只要他一看到这是有意识地不怕他,一看到要对他进行坚决的反抗,一看到问题已经变得很直率:“宁使毁灭,决不退让”,——他就立刻退让了,软化了,沉默了,把自己的怒火转移到其他事物头上,或者是其他人们头上,他们所以有罪,就只因为他们比较软弱……每一个求过学,干过公家差使,从事过私人商务,总之是和人们有所接触的人,——大概常常会在生活中碰到这种顽固独夫,可以证明我们的话是真正公正的。你害怕说出随便的话去触犯盛怒而无理的官长:因为等待你的是骂人字句的奔流,使人深感侮辱的吓人的手势。这还不够,——以后官长还要对你发出不利的意见:你是自由主义者,你不尊敬官长,你的头脑里充满着骄傲狂妄……然而如果你愿意服务并且要想真诚地进行工作,就不要害怕对顽固独夫实施认真的坚决的反击。在一百次中间,有九十九次你是会占上风的。只是要及早下决心:你不要中途把话停顿下来,而要进行到底,虽然因此会有真正的危险威胁着你——丢掉位置或者丧失什么恩典。当你第一次尝试把你的意见结结巴巴说出来时,可能会被顽固独夫高亢的声音所压倒;可是你得继续反对下去。你的反对,要看你所对付着的人物的的重要性以及习惯,碰到或多或少令人难堪的咒骂和申斥。然而你不要恐惧发慌:你要把你的声音提高得和顽固独夫一样,你要紧跟着他的话旗鼓相当地加强你的语气,你要顺着他的激怒程度,越来越采取坚决的声调。如果谈话中止了,第二天第三天你把它再恢复,不要退回去,而要从你昨天停下来的地方开始,——而且你要相信,你的事情是会得到胜利的。顽固独夫痛恨着你,可是害怕得也更厉害了。他最高兴的是把你赶出去,把你毁灭掉;然而却又知道,对付你会有许多麻烦,他自己就竭力想避免新的冲突,甚至还作重大的让

步：第一，他并没有公开作旗鼓相当斗争的内在力量；第二，他根本就不习惯进行任何一种彻底而持久的工作，同时跟一个勇敢地而且不断地纠缠着你的人作斗争，——这也不是一件等闲的工作……

因此，作为一个顽固独夫说来，戈尔奇·卡尔贝奇，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在他的性格中根本没有什么支柱。一个真正坚强性格的全部品质，在他的身上，都被那种放纵恣肆的专横以及愚昧无知的顽固所取而代之了。这些就是奥斯特罗夫斯基《贫非罪》这个喜剧终局中所描写的明显的突然性所说明以及证明的。当这个喜剧刚出现的时候，一切批评家都为了结局的任性随意而攻击作者。戈尔奇·卡尔贝奇的突然改变，他和阿夫里肯·萨维奇的争吵，以及注意柳比姆·托尔卓夫的要求，这些都显得不自然。而且更有甚者，有的人还想在作者身上看出他是想把某一种慷慨强加到托尔卓夫身上去，并且好象故意使他的个性高尚化起来。现在似乎无须要证明，奥斯特罗夫斯基并没有这些打算：他的文学活动的性质是已经确定了的，在他的最近一个作品中，他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这些话照我们的意见看来，可以作为他的讽刺倾向特点的最好说明。在专横顽固的各种各样形相中去追究它，直到它的最后的托庇之所，甚至在它戴上高尚与慷慨这种假面具的场合加以揭发讥嘲，——照我们的见解看来，——这就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才能所继续不断地追求的真正事业，它甚至完全独立于他的一时的看法以及理论上的信念之外。在他的三部喜剧中，都描写了慷慨在顽固独夫身上的突然发生，而且每一次它们都显得是愚蠢无知、多此一举以及令人难堪。《各守本份》中的鲁萨柯夫，在怜惜女儿之余，慷慨地改变了他的决定，同意她嫁给维霍列夫。若要问：为什么？干吗要这样做？看样子，他不是完全相信嫁给维霍列夫，就要使他的女儿

归于毁灭吗？在几分钟之前，他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证明过这一点；在后来几分钟之间，他又表示了他的坚决态度，威吓如果不听话，就要取消自己对女儿的祝福。而这里却突然慷慨地让步了！是什么东西引起让步的呢？部分是由于心地的善良以及父亲的爱；但大部分是因为对于他以前所采取的决定，完全缺乏强固的基础。一个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同时爱好他的工作的人，他是不会凭着一刹那间的任性，而放弃它的。就是这个鲁萨柯夫，不管他的女儿怎样为这一点而操心，他都不肯剃掉自己的胡须，或者穿起燕尾服来。可是一牵涉到女儿的命运，他的头脑里，甚至连象关于胡子和燕尾服这样的稳固定型并且充分明确的信念都没有。就因为这样，他就能够这样轻率地决定关于她的问题，这种轻率在有些人的眼中，甚至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慷慨，正象他给维霍列夫偿付债款一样！……

托尔卓夫的慷慨也显出同样的愚昧无知。他很喜欢他的未来女婿阿夫里肯·萨维奇。“你现在该明白我了吧？”他这样问，似乎除了要使女婿了解他以外，就什么都不想望了。为了使他满意，而且为了巩固自己跟他的友谊，托尔卓夫就牺牲了他的女儿，无视她的祈求以及母亲的眼泪，甚至自己似乎也在对他表示卑躬屈膝，不惜让对方抬高一点身份来对待自己。但是柳比姆·托尔卓夫却来挖苦这位未来的女婿，女婿吃了侮辱，就非常粗鲁地指摘戈尔奇·卡尔贝奇，用这些字句来结束他的话：“不，现在你必须走到我的跟前来，向我下跪，求我娶你的女儿。”这些话大大地激发了戈尔奇·卡尔贝奇的怒火。他暴跳如雷地问道：“我向你下跪？”可是柯尔松诺夫还要火上浇油，他说道：“你会来的，这我知道你。你需要举行婚礼，甚至上吊都肯，只要全城的人都对你表示惊奇，可是没有做新郎的……这是你的倒霉。”柯尔松诺夫这些话把自己的事情完全弄糟了：他偏偏采取了顽固独夫

所万万不能忍受的那种形式，这种形式本身也就是专横顽固的荒谬的产物。一个顽固独夫说：“你不敢做这件事的。”另一个回答：“不，我敢。”这里的争论已经发展到谁比谁更顽固了。假如争论者之一要从另一个人那儿得到一点什么，那末当然，胜利者就是这个被他所要求的人了，因为后者在这里是无须乎花费什么劳力的：只要不给他，问题就完了。这里也是这样发生的。戈尔奇·托尔卓夫一听到柯尔松诺夫说“你不敢”，他就说：

“你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我自己再也不愿意认识你了！我生来就不向人家下跪。事情既然这样，那么我要给谁就给谁。我付给她一笔钱，随便哪个人——都会要她的……我要把她许给米佳！”

在怒火的爆发中，他好几次重复的说：“是的，我要把她嫁给米季卡！我要把她嫁给米特里亚，让他气一气！……”柯尔松诺夫在盛怒中走掉了！全家的人都很惊奇，都把戈尔奇·卡尔贝奇的话当作严肃的决定：他们对于他的一切行为的荒谬乖张竟然习惯到这种程度。那个满怀着天真想法的被驱逐的青年米佳，他是非常轻信的，而且他不很了解在他的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真正意义，他甚至以下面的话对托尔卓夫说：

“为什么要怨恨呢，戈尔奇·卡尔贝奇？心里有怨恨就不能办这样的事情。我不需要怨恨。我宁愿终生受苦。要是这是您的仁慈，那么您给我们正当的、出于父亲情爱的祝福吧……”

可是这些天真的话，不言而喻，只能激起托尔卓夫怒气勃勃

的惊奇，他对于把女儿嫁给米佳，根本不打算说什么正经的话。

“什么，说什么！”他叫道，“你已经在高兴挨到这个机会了！你怎么敢这么想？难道你配得上她么？记住，你在跟谁说话！……”

米佳开始跪在他的面前，可是这一种顺从并不能打动戈尔奇·卡尔贝奇；他继续叫骂。女儿和母亲的恳求，也依然是无能为力。但是正在这当儿，柳比姆·托尔卓夫却来帮他们的忙了，——他是一个捣蛋家伙，戈尔奇·卡尔贝奇为了应付这个人，已经给弄得够麻烦的了，可是有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柳比姆也象柯尔松诺夫一样的对他说：“你应当跪在柳比姆·托尔卓夫脚边，就因为他使你难堪。”同时那个巴拉盖雅·叶高罗夫娜也加着说：“柳比莫斯加，我们正应该跪在你的脚前呢……”这里似乎又可以期待，戈尔奇·卡尔贝奇为了怨恨全家的人，又要顽固起来，并且真想出什么花样来表示怨恨了。然而他却只是狼狈地问：“怎么啦，我难道是我们家里的一个恶魔吗？”从这段话里，你已经可以看到，他开始被慷慨所打动了。他既然贯彻了他自己的愿望，把柯尔松诺夫赶跑了，因此，他的自尊心就暂时得到了满足。再加——他已经被自己所造成的紧张，弄得疲累不堪，现在可再也没有能力来重新聚积同样的力量，去进行另一场斗争了。而这里他的兄弟柳比姆的议论以及锲而不舍的要求，又连同他妻子的祈求一起来折磨他，——柳比姆勇敢而坚决地跟他说话，他没有一刻停息，他用种种从亲身体验中所抽取出来的证据，来加强他的要求。戈尔奇·卡尔贝奇似乎被弄糊涂了；他看着围在自己周围的人们，他不知道，应该怎样来理解这一切，应该怎么办；他在自己的内部找寻可以倚靠它来作挣扎的东西，但

除了他的专横顽固的意志以外，却什么都找不到。这种专横顽固的意志也表现在他最后的反驳里：“无论你说什么，我总不愿意听你的……”然而柳比姆并不特别重视这种反驳，他继续坚持自己的。戈尔奇·卡尔贝奇完全弄糊涂了，力量也消耗了；对于周围一切事物的认识，在他的头脑里，弄得十分混乱；他没有什么法子可以清理出他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他的内部，从来就不曾巩固地结合过，现在已经完全四散飞开去了……在这决定的一刹那，他就捶胸顿足起来，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感谢兄弟柳比姆的教训，为自己的孩子们欢祝未来的幸福……连他的侄儿古斯林也博得了他的恩典，托尔卓夫原先不准他结婚，现在他请求允许，也如愿以偿了。戈尔奇·卡尔贝奇说：“现在谁有要求的，大家都来吧：我现在已变成另一个人了！……”

请想一想，他的慷慨的范围是多么广阔！……一个东方的苏丹，也会使你这样感觉，他会这样说：“什么都在我的权力范围里！……只要我眼睛一霎，你的脑袋就搬了家；只要我说出一个字，就有一座你听也不曾听见过的豪华的宫殿为了你从地上长出来。你要什么，你就求我什么！我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拿到手里，谁要，就送给谁……”差别只在于范围，但问题的本质却和托尔卓夫的话里所表现的一样。如果让他做一个伊斯兰教国王，他在那里统治起来，也会象现在在他自己的家里一模一样。他会胡作非为，蔑弃一切人类的权利，除了自己的横暴以外，不承认还有别的法律，可是时而又对自己的慷慨，表示惊异，这种慷慨也是以那种思想为基础的，他说，“你们瞧吧：你们什么权利都没有，一切都由我全能的意志来决定；可以惩罚你，也可以对你仁慈宽大！……”读者呵，我们是多么幸福，活在这现在的时代，在我们这时候，象这一类慷慨的激发，是不可能再有了！……在某一刹那间，这种慷慨可能享受到，象米佳与柳薄夫·戈尔奇耶夫

娜现在所享受到的一样；纵然，不言而喻，戈尔奇·卡尔贝奇不会长久地保持这种慷慨，过后就要后悔，就要因自己的决定而咒骂他们的，但他们现在到底是胜利了……然而这一类的胜利是不可靠的。当你打算怎样来安排你的生活的时候，那么，当然，你是不会把你的打算在下面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许大部分财产都可以在摸彩中去获得。同样，在理性的自觉的生活中，你也不可能去打算获得顽固独夫的慷慨……最好别来这一套高尚宽宏的主子脾气，只有尽劳尽瘁到白痴地步的老仆人，才会对它表示感激涕零；可是让那些按照权利应该属于我的东西，保持它的神圣性，它的不可侵犯性吧；让我永远能够自由地而且理性地发挥我的思想与意志吧，不要等到从什么戈尔奇·卡尔贝奇·托尔卓夫心里弄出什么仁慈的决定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然而专横顽固的无力与内心的渺不足道，在这些喜剧中，还不曾刻划得象那个不大的喜剧：《代人受过》中那样惊人地明确。这里什么都有——粗野，缺乏正直，胆怯，以及慷慨的激动——这一切都被那种愚钝的无知所掩盖起来，甚至那些最同情斯拉夫派的人们，都不能赞许季特·季狄奇·勃鲁斯柯夫，而只能指出：他到底还是有点良心的。……教师伊凡诺夫以及他的女儿所住的那家公寓的主妇，阿加拉芬娜·普拉托诺夫娜，她批评勃鲁斯柯夫是一个“粗野的、有权势的、硬心肠的人，总之一句话——他是一个独夫”。对于伊凡诺夫问：什么是独夫？——她这样解释：

“独夫——这是指那种对谁的话都不爱听的人：即使你把棍子架在他的头上，可是他还是坚持他原来的一套。他跺着脚说：我是谁？于是全家的人都得投在他的脚下，这样的躺着，否则就得倒霉……”

她继续她的批评，她指出，“说到诈欺，他的确是一个狡猾的老人；但他虽然能够欺骗，可是却又是一个愚笨的人。他只有在自己的家庭里才是凶暴的，要是一出门，你要怎么样摆布他就怎么样摆布他，——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笨蛋；你可以无缘无故把他弄得害怕起来。”真的，剧本中所表现的，也证明着阿加拉芬娜·普拉托诺夫娜所有的话是公正的。她自己就平白无故地向那闯进伊凡诺夫家去的勃鲁斯柯夫勒索了一千卢布，为了他的儿子，安特莱·季狄奇曾写过一张笔据，答应娶伊凡诺夫的女儿做妻子。这张笔据本身就是什么意义都没有的，而且伊凡诺夫跟女儿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他们也并不曾有什么要求；这一切都是女主人自己为了帮助他们而进行的……然而勃鲁斯柯夫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他已经完全熟习“黑暗王国”的习惯，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样。第一，他时刻在提防人家会欺骗他，因为他自己也打算去欺骗任何一个人。因此，在读完阿加拉芬娜·普拉托诺夫娜递给他看的条子以后，他就镇静地说：“这分明是抢劫。唔，好家伙！……”这以后，就开始谈买卖了，他对这种事情一点都不表示愤慨，而只是惊奇于这种摆布着他的儿子的巧妙的把戏。第二——他非常害怕一切诉讼，因为他虽然重视自己的金钱，然而却又无法想象，他是应当上法庭去呢还是不上法庭的好，——他只知道上法庭去一样要花许多钱。根据这个原因，到得一听到阿加拉芬娜·普拉托诺夫娜说什么现在“还能就事论事，到得法庭上，就要按照法律办事了”，他就搔搔自己的脖子，说：“按照法律办事？……不，还是我们之间自己解决的好。”的确，这在他是更容易做的，因为这一类勾当就他说来甚至是非常习惯的。从伊凡诺夫那里回到家里以后，他向老婆这样解释这笔账：

季特·季狄奇 那斯塔西雅！有什么人敢得罪我吗？

那斯塔西雅·潘克拉季耶夫娜 没有一个人敢得罪您的，
亲爱的季特·季狄奇，只有您自己才可以得罪人。

季特·季狄奇 我能够得罪人，也能够饶恕人，或者给人家
钱。我这一辈子为了这个，已经花了很多的钱。

那斯塔西雅·潘克拉季耶夫娜 不少啦，季特·季狄奇，的
确不少啦。

季特·季狄奇 闭嘴！……

对道德原则的缺乏明确认识，还在勃鲁斯柯夫付了钱，收到
笔据以后对待阿加拉芬娜·普拉托诺夫娜和伊凡诺夫的态度里
表现出来。阿加拉芬娜·普拉托诺夫娜拚命要把他赶跑，可是
他却坐下了，开始骂起人来，因为他想到了这个理由：“不，等一
下，——为了我付出的钱，至少得让我骂一顿。”但他这样做，不
过是想出一口恶气；他在他的咒骂中，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可以侮
辱的，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觉得什么痛心。后来，伊凡诺夫来了，
他一点都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他疑虑地看着勃鲁斯柯夫，季
特·季狄奇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的脸
上，老弟，并没有写着什么东西呀。你们会弄走我的钱。看在我
的钱份上，你们至少应当好好请我一下。”伊凡诺夫请他走；他却
又骂了起来。伊凡诺夫要赶他出去，——他却反唇相讥道：“你
叫什么呀？我倒并没有什么，我不过是——跟你开开玩笑。”伊
凡诺夫继续赶他走，勃鲁斯柯夫却走到他的身边，把他的肩膀拍
了一下，说：“到我的家里去！一块儿喝一杯，咱们就会变成朋友
了。争吵点什么呀！”伊凡诺夫终于发火了，可是勃鲁斯柯夫却
悻悻地说：“瞧你，生气得这副模样。”——他一边走，一边发出新
的咒骂……回到了家里，他吩咐那个嗜酒的管事查哈尔·查哈
雷奇，写一个“这样的状纸，可以根据这个状子把这三个人充军

到西伯利亚去”。他说，“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件事，我不可惜花什么钱。”然而，这当儿，伊凡诺夫却来了，他这时已经弄明白了全部事情，他把那笔阿加拉芬娜·普拉托诺夫娜所勒索到的钱带了来，要求把那张笔据还给他。勃鲁斯柯夫立刻以为，伊凡诺夫所以要把笔据讨回去，为了以后可以再多敲一些。可是这个老教师却引起了他的怜悯，他于是问：“要不要还他呢，查哈雷奇，——还不还呢？”查哈尔·查哈雷奇说：“不，不，不！”——但是勃鲁斯柯夫突然这样决定：“我说，还给他！……你给我住口，不许胡说！……”于是笔据退还了，它被伊凡诺夫当场撕掉，过了几分钟之后，勃鲁斯柯夫觉得“金钱这一套东西——是容易腐朽的”，因此他又觉得，他的儿子可以娶伊凡诺夫的女儿做妻子，虽然她贫穷……“我的话就是法律，”他这样说，一边打发儿子向教师的女儿求婚去。“您别操心吧，爹，他不肯给的，”——儿子回答道。“我命令你，听着，”季特·季狄奇说：“我既然要这样做，他怎么敢不给？……你们不要跟我胡说，”他补充说。——“要是他不肯给你，你以后最好别在我面前现眼！……”

在这一切事情中很鲜明地表现着，整个故事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假使我们仔细去看它，那末就会看出，它的一切参与的人都在要求一种不可能的东西，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他们自己也想不透自己在要些什么。阿加拉芬娜·普拉托诺夫娜不曾问过伊凡诺夫父女，就向安特莱·勃鲁斯柯夫要到了笔据，问他的父亲——要到了钱。季特·季狄奇却又根据这张笔据要把伊凡诺夫父女充军到西伯利亚去，其实就他的利益来说，是应该把它销毁的。伊凡诺夫感觉非常痛苦，他要求的竟不是把笔据销毁，而是把它还给他；其实这张笔据他根本不需要，只不过引起了勃鲁斯柯夫正当的怀疑……这一切都是非常荒谬、无意义的，正象勃鲁斯柯夫自己以及他的整个生活一样。然而比所有的人

更要冥顽不灵的——还有勃鲁斯柯夫的儿子安特莱·季狄奇这个角色，这整个的故事，就是因为他而发生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好象一个疯子在大地上彷徨”，他一味地忧伤：在他们的家庭里，“完全不象人家的那样”，他们要把他“弄成个怪物，不让他做一个人”。而在实际上，——倘要跟他做什么事情，看起来也的确很可笑。他早就是过二十岁的青年了，自然并没有剥夺他的智力：对于他父亲的厂，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预先就知道需要做些什么，除此之外，他还向往于科学，爱好艺术，——“对于提琴，也十分热爱”，总之一句话，他是一个成熟的、善良的而且并不愚笨的青年；他已经成长到可以准备娶老婆了……可是突然他要“避开他的爸爸了！……”只要一听到人家说：“主人来啦，”——他就这样叫起来：“妈妈，让我躲过爸爸，”于是就奔进母亲的卧室里躲藏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是，他的爸爸想用强迫手段给他娶亲……你瞧，这样他就打算逃跑了！……他的确挑选了一个好方法！……可是他爸爸为什么要强迫他娶亲呢，这原因只有一个：他要这样做……可是他母亲却想出了另外的原因：他父亲找来的未婚媳妇是很有钱的，“我们，”按照那斯塔西雅·潘克拉季耶夫娜的说法，“需要一个有许多钱的媳妇——因为这样——我们自己也有钱啦”……这真是无可辩驳的逻辑！……安特莱·季狄奇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正经地反对它：他已经被他父亲的态度弄到这地步，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了。其实，如果他能够听从伊凡诺夫的女儿，里查维塔·伊凡诺夫娜的话，这种态度是可以比较改善的。照他说来，他的“翅膀已经断了，或者说已经砍掉了”。他不应当按照自己的选择结婚娶亲，而应当按照父亲的命令。

“要是你说，‘爸爸，这个媳妇我不喜欢。’他就说：‘把你

送去当兵去！’……嘿，这就完了！不只是这件事是这样，”他接着说，“在别的事情上，他也不让我自己作主的。在我年纪更要轻的时候，我要念书去，他就不准许！……”

里查维塔·伊凡诺夫娜劝告他，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把全部事情——他是有能力的，他要念书等等，公开告诉他父亲。对于这一点，安特莱·季狄奇这样回答：

“他为了这种公开的谈判，会弄得我没有地方可以安身。您以为，——他不知道有学问的人要比没学问的人好？——他不过是要一切都照他的意思做……这一半是任性，一半不过是爱面子，他想，我是没有学问的，你倒比我聪明。”

好，你说吧，有没有什么可能来跟这些人进行有理性的谈话！做父亲的知道，有学问的人要比没有学问的人好，做儿子的也明白他的父亲是知道这个的，可是儿子要去求学了，父亲还是要禁止，而做儿子的也不敢不听话！……父亲承认自己是不学无术的，认识这是不好的，可是却害怕他的儿子会逃过这种不幸！……儿子也知道，父亲只是由于自己愚昧无知，才禁止他去求学，可是他却把服从这种愚昧无知当作一种责任！……谁能够分析这种被专横顽固带到家庭关系中去荒谬可笑的混乱呢？谁能够把一线之光，投射到这个“黑暗王国”的不可捉摸的逻辑所造成的奇形怪状的黑暗中去呢？你会觉得安特莱·季狄奇也是一个疯子，正象他的兄弟卡比托莎一样，卡比托莎本身也是勃鲁斯柯夫家的家规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可是一切周围的人都说，安特莱·季狄奇是一个聪明的人，而且甚至他自己也曾

经这样合乎情理地议论他的兄弟：“他们不放我到戏院里去；”他说，“他们推托的原因是，我的一个兄弟就是在戏院里发疯的；可是他根本就不是因为到戏院去才发疯的，——而是因为，从小就打得很凶”……但是安特留莎虽然还没有遭受过痛打，可是他总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受伤了。如此说来他已经跟他所处的环境妥协了，象千千万万别的人在妥协着一样！并不，——他是不愿意这样的，这使得父亲和母亲非常失望。母亲对于他的忧伤，甚至比对待她的另一个儿子——呆子，还要厉害。卡比托莎的情形，不知道为什么很少使她不安：她好象觉得这是很容易了解的，而且是生来如此的；她甚至还从其中得到消遣，最使她觉得忧心的只不过是：他烟抽得很凶。

“我们的卡比托莎在戏院里好象完全弄得疯疯癫癫了。”她对她的客人涅尼拉·西陀罗夫娜这样解释道：“他抽烟，涅尼拉·西陀罗夫娜，抽得这样凶，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不论什么情形，在屋子里抽烟总是不可以的，使人恶心得要吐……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厨房里。有时候闷气了，就叫他来，他就学戏子的样叫喊起来，——真的，他多少可以使人乐一阵子。他在唱诗班里是唱低音的，——他的声音这样高，简直象枪砰的响起来一样。”

可见，儿子的愚蠢是能够使母亲得到愉快的！……然而安特莱的智慧却引起了她十分强烈的畏惧：

“他，”她说，“和家庭完全合不来：这个不好啊，那个不合他的意呀，他又说，‘我要读书去……’干吗他要知道这许多哇？现在已经很倔强了，要是他那一套都学会了，那时

候，你别想跟他说话啦；他连母亲都不知道敬重呢；只想从家里跑出去……”

由此可见，勃鲁斯柯夫的专横顽固，有一部分已经转移到他的妻子身上了，虽然还只表现在言语上面，——所以安特留莎，不管他怎样爱好知识，不管他天赋的能力怎么样，为了保持对于父亲与母亲的尊敬，他就得成长为无知无识的人。他们这些可怜虫觉得，一个聪明而有教养的人是无无论如何不会尊敬他们的！……

但是既然安特莱·季狄奇真的并不是一个无知的人，为什么他不在实际上，坚决去满足自己的求知热望，甚至多少在这方面发挥一点自主呢？在罗斯不是有过这样的例子，那些被爱好科学的热情所攫住的少年人，往往不顾家长们的意见，也不顾生活中有没有支持，毅然抛弃一切去求学……是的，可是这些少年人，看来多少已经逃避过专横顽固的致命的影响，不曾从小就被摧残；因此，去跟生活作斗争的某种决心，意志的某种力量，就能够在他们身上得到发展。但在勃鲁斯柯夫的儿子安特留莎与卡比托莎那里，你却找不到什么同类的东西。他们这些不幸的人从小就被摧残，就被虐待，直到长大了还要时刻被当作消遣的资料……那些光明而独立的见解以及强大的决心，又从哪里得到发展呢？安特莱·季狄奇也许能够做到这样，以后也象他的父亲一样，暴跳如雷，并且也去欺侮别人，以报复从前别人也曾经欺弄过他……这样一来，这种荒谬可笑的宗法关系，就会一代复一代的递嬗下去，在这种宗法关系中，谁爬到了上面，谁就能够压迫和践踏留在下面的人。此外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现在唯一依靠的，就是这个把他阁下推到上面去的密集的游客好闲的人群；他不论愿意不愿意，都得多多少少用自己这份重量来压

迫他们，——要不然，他自己就会重新落在别人的脚下——越是善良——越是要被践踏……谁又愿意被践踏呢？

但是这里可能使人想到另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游手好闲之徒，要这样顽强地继续支撑自己头上的那个过去与现在除了坏事以外，什么好事都不会给他们做出来的人呢？为什么米佳要对托尔卓夫这样顺从，安特留莎觉得很苦恼，可是却不敢对季特·季狄奇说出一个词，以及诸如此类呢？为什么整个社会在它的习俗中，能够容忍这么众多的阻挠着一切秩序和真理的顽固独夫呢？在那被托尔卓夫们以及勃鲁斯柯夫们的影响所培养出来的社会中，是不会有从事斗争的决心的。然而这里不能不认识到，如果正象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一个顽固独夫本身内部是没有力量的，——那么他的意义，就只有在别人的支持中，才可以得到确定了。这也就是说，这里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英雄精神；只要这个社会不给他什么支持，只要——那个为了让什么托尔卓夫或者勃鲁斯柯夫站在自己头上，因而密集在一起的人群，稍稍让开一点，——他自己就会摔下来的，而且假使他到这地步还要对于专横顽固暴露什么要求，那么就会真的被压死的……为什么在社会中，能够几十年，几百年地忍受这种衰弱、腐烂、老朽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这个社会的一部分真正有教养的优秀人物的意识中，早已成为垂死衰亡的东西了呀？对于这一点，有两个重要的原因，这两个原因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中是表现得很明白的，我们现在就要促使读者来注意这两个原因。

五

耐心地熬受着痛苦

连发牢骚都不企求。

罗蒙诺索夫^①

阻止人们去反抗专横顽固的第一个原因，——说起来也很奇怪，就是守法的感情，第二个原因就是物质保障的必要。我们所想到的两个原因，初初一看，当然是荒唐无稽的。看情形——似乎完全相反：正因为缺乏守法感情以及缺乏关于物质幸福的保障——才能解释人们对于专横顽固的一切要求之所以漠不关心。那些根据抽象的原则来立论的人，现在可能会得出这样的想法：“顽固独夫除了本身的专横恣肆以外，不承认任何法律；由于这样的结果，一切蒙受他的影响的人，就渐渐失去守法的感情，他们已经并不以为顽固独夫的行为是不正确的，是可恨的，因此他们就非常漠不关心地忍受着它们了。加之，——当分配各种福利的时候，顽固独夫，往往顺着他自己的习惯，凌辱他们，享受最大的一部分，什么东西都不留给他们。既然他们忍受着这个，那就是说，他们已经失去对自身幸福的爱了，他们习惯于什么都没有，而且很少关心如何从这个环境中摆脱出来。……就因为这，一切米佳们和安特留莎们这样漠不关心地对待物质利益，顽固独夫就能象戈尔奇·卡尔贝奇所说的，不费力气地按照自己的‘腐朽的幻想’，去驱策他们了。”

这些议论，不管它有怎样明显的根据，总是非常轻率的。怎么能够假定人们心中已经完全失去对自己、对自己的幸福的爱呢？为什么呢？为的是有人要想夺取我的财宝！……不，这只有在一切被专横顽固所压迫的人都非常满足于自己的场合，才可

① 罗蒙诺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1711—1765)，俄国学者与作家。这里的题辞是从《选自约伯书的颂歌》(《啊，你，为什么要徒然悲伤》)中引来的。

能这样说。可是我们却看到，不论米佳、不论安特留莎、不论卡比托莎、不论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还有柳薄夫·戈尔奇耶夫娜——都非常不满意自己的命运。所以，强制他们留在他们现在境地的，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其他什么更深入的东西……这个所谓其他东西就是守法的感情。要是没有这种感情，也就是说，要是被压迫的一方真正能够接受这种见解：随便什么样的秩序、什么样的法律都是没有的，都是不需要的，那时候，一切事情都是另外一套了。顽固独夫的命令，只有在这些命令对于实行者有利的时候，才会得到实行；只要托尔卓夫一触到米佳以及别的职员们的幸福，——他们就会一点都不加以考虑，立刻把他“摔下来”……他们不是比戈尔奇·卡尔贝奇更多，更强吗？……但是他们在他的面前，所以保持沉默者，正是因为他是主人，应当对他表示尊敬。他们把他欺骗他们以及侮辱他们的事实，当作是他的地位的属性……那斯塔西雅·潘克拉季耶夫娜一点都不带什么挖苦，相反，却怀着非常敬仰的声调说起她的丈夫：“谁敢得罪您呢，亲爱的季特·季狄奇？只有您自己可以得罪一切人！……”

事情发生这样的转变，这是很奇怪的；然而这却是“黑暗王国”的逻辑。但是在这种场合中，只有从这些人的智力的昏闇，才可以说明问题。照我们的见解看来，在一般的意义上，——所谓守法感情究竟是什么呢？这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形式的——定型的東西，不是在某种一劳永逸的形式中所昭示的绝对的道德原则。它的产生是非常简单的。在踏进社会时，我就从它那里获得享受某种福利的一定部分的权利，这种福利是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为了这种享受，我就有义务付出代价，来努力增加这个社会所能支配的福利的总数。这种义务，是从关于人类生而俱有的那种公正精神的见解中流露出来的。然而为了顺利

达到共通的目的,也就是说,为了增加公共利益的总数,人们就得采用一定方式的行动,而且还得通过某种决议加以保证,以防止无论从哪一方面对公共事业的擅自破坏。当我踏进社会时,我就应当接受这些决议,并且发誓不破坏它们。这样一来,在我和社会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协定,这种协定虽然没有明说出来,没有加以形式化,但本身却含有这种暗示。因此,假使我要破坏社会的规律,同时又要享受它们的利益时,我就得破坏一部分对我不利的条件,变成一个骗子和诈欺者。按照公平报复的规则,社会可以剥夺我去分享另一半条件于我有利的利益,并且还要责问我,为什么我敢不按照规定去享受。我自己感觉到,这样的处置是公平的,我的行为却是不正当的,——所谓守法感情就我来讲,就包含在这一点上。然而,假使我完全拒绝这种协定(必须注意,这种协定,就其本质来说,在这场合上,还不是指日可期的),假使我自愿抛弃享受它们的利益,我就不愿意承担它们的责任。我就不以为违背守法感情是一种罪恶。例如吧,假使我去服军役,也许,我可以做到一个将军;可是因此,在还是士兵称号的时候,我就有义务按照军队的纪律,向每一个军官行礼致敬。但是我倘使不去服军役,或者离开了军队,这样我就可以拒绝穿军服,抛弃做军官的希望,认为自己可以不受这种义务的拘束——当碰到每一个军官时,就得把手举在帽檐上。农民们到了异乡僻壤,——他们对于每一个在路上相逢的穿德国服装的人,都会深深地鞠躬的。自然,他们也许是自愿这样做,或者也许这是他们所了解的同一种守法感情的特殊形式!……我们却不承认这种感情,并且认为自己是错的,如果我不去当差使,我就不到衙门去;如果我不去领薪水,就不会让他们扣除捐献残废者的款子。同样,例如吧,假使我们到伊斯兰教国家去,我们服从着这个国家的法律,但是却不接受伊斯兰教,我们也认为自

已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国家法律保护我们避免各种各样的暴力和不公正——这种暴力和不公正在这里是被认为抵触法律的，它们可能破坏我们的幸福；因此我们要在实际上承认这种法律。然而到清真寺去，这就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我们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向先知去祷告，不需要从《可兰经》上寻找真理和安慰，不相信穆罕默德的天堂以及他的一切极乐女神，所以我们从伊斯兰教那里享受不到什么东西，而且也不愿意去享受什么东西。”我们在这场合上，按照守法感情的真正意义说来，是应该算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法律对于我们说来，是有其相对的意义。而且，不仅如此：它们本身也不是永久的，也不是绝对的。我们把它们当作一种已经在过去生活条件下提炼出来的东西而接受过来，然而我们决不因此就有义务以为它们是最完全的，而排斥一切其他方面的条件。相反，在我和社会的自然的协定中，就其最本质的地方说来，却也包含着要努力尽可能去寻觅最好的法律的义务。从人类一般的自然的权利这个观点看来，每个社会的成员都应该保证现存法律的日臻完美，保证去消灭那些已经变得有害和不需要的东西。最应该注意的，就是那些有关公共福利的法律的每一种改变，都必须经过普遍的讨论，并且要得到一致的同意。假如得不到一致的同意，那么部分的人就有权利提出争论，提出他自己的建议，最后——拒绝对那些他认为现在的规则是虚假的事情作任何参预。这样一来，由于这种守法感情，就能消除社会机构中的停滞与凝固，给思想与意志带来活动的天地与工作；就是这种守法感情常常要求破坏形式上的 *status quo*①……

① 拉丁语：维持现状。

有教养的人们——象我们似的致力于文明幸福的人们，对于守法感情，就是这样理解和解释的。然而那些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描绘给我们看的阴暗的人，却不是这样理解它的。在他的“黑暗王国”里所提出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一种对于一成不变的、凝固的形式的信仰在那里占据了优势。知识在这儿被限制在一个极狭窄的圈子里，对于思想的工作——几乎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机械地，按照一成不变的规律进行。从这一点上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这里的孩子永远不会成长成人，在没有机械地移动到做父亲的地位以前，他会一直保留着小孩子的样子。还有这一点也可以得到明白：为什么那种置身在顽固独夫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中间分子，完全没有什么明确的个性，而要从他所置身的环境中去剽窃自己的性格：时而趴在阔人的前面，时而，反过来，在下等人面前昂起鼻子。好象一种机械的木偶：你把他们这一头放下去，他们就弯腰鞠躬；把他们倒向另一头，他们就挺胸凸肚，把头拚命向后弯……那斯塔西雅·潘克拉季耶夫娜在丈夫的面前变得失魂落魄，连气都不敢透，可是对儿子却也吆喝起来了：“你怎么敢？”还有“你在跟谁说话？”我们在《自己人好算账》中，在那阿加拉芬娜·康特拉季耶夫娜身上，也看到同样的情形。同样的事件又在另一个环境中——在《肥缺》中的尤索夫身上重演。这一切都是由于缺乏内在的独立性，由于天性被压抑之故而发生的。人们从小就得到这样的暗示，他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他不过是别人意志的一种形式上的工具而已，因此，他不应当考虑什么，他应当听话，听话而且服从。他的智慧还可以应用上去的唯一的对象，这就是获得适应环境的能力。谁能够翻过身来，谁就运气；他可以浮上来……谁要不能呢，谁就倒霉，——要被压死……

由于这种思想停滞的结果，“黑暗王国”中守法感情的一切

积极的一面，便完全归于消灭了，只留下消极的一面。一个什么基施加习知了一句必须听从长辈的话，他就只记住这一点，终生只记住这一点……在教育学中有这样的原则，对于那些没有能力理解抽象概念的孩子们，教师就得把道德规则拟人化起来，因此，孩子们就必须信任教师。然而教师的责任，——教育学中又继续说道，——是在于：在教导孩子了解道德法则的真正本质以后，尽快地使自己成为对孩子无用的人，让他离教师的影响而独立。对于这后面一条规则，所有“黑暗王国”的住民害怕得象大火以及抢劫似的，大家都拚命以完全相反的精神来进行。“要听从老人的话，——老一辈人是不会告诉你坏话的，”——甚至他们中最好的人——鲁萨柯夫都这样说，连他也不承认教育的权利，不承认教育能够训练人自己，没有别人的劝告，就能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因此就产生这样的结果，守法感情只通过听话和忍从的感情而得到表现，当“黑暗王国”的居民自己还没有变成一个顽固独夫的时候，一切其余的东西，对他们来说绝对没有出现的可能。基施加在鲍尔肖夫家洗扫地板，给波德赫留静跑腿去买伏特加酒，从东家那里偷窃一块半块卢布，——这一切在他看来完全是合法的……大人们打发他去买伏特加酒，大人的话是必须听从的；这是直白的道理。人家没有告诉他去偷盗；可是还不是一样——偷盗这件事情，却被大人们奉为神圣化：伙计们多少次在他的面前，称赞狡猾的勾当，多少次命令他不要当着东家的面，把他们的欺诈舞弊说出来，多少次东家自己强迫伙计们怎样去欺骗顾客！……这一切对于一个机灵的孩子，是不会毫无痕迹地过去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切卑鄙龌龊的东西，能够在他身上和深厚的守法感情相安无事地共处一堂的来由……他就用这种手段，从他现在所置身的渺不足道的地位中解脱出来，自己也开始心安理得地欺骗起来，认为专横顽固也

象以前自己的低声下气一样，也是合法的。

可是，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爬上去，而只是极少数的人；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具有十分坚强的性格，接着还得用超自然的手段把这种性格颠倒过来。必须窒息自己身上的一切同情的感情，使得自己的思想迟钝麻木起来，此外，——还得在几年之中，把自己的脚和手都捆绑住，除了能够做到这一切以外，——还得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自尊心以及个人的利益，还得把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还得把花样玩得巧妙迷人……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专家、大师并不怎样多……虽然，野心家多得不计其数，可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坚毅精神，例如吧，象巴甫尔·乞乞科夫似的；——可是没有这种坚毅精神，在这儿是什么都达不到的……因此，大部分蒙受专横顽固影响的人，都宁愿干脆地怀着浑浑噩噩的希望，等待环境说不定会起什么变化……他们缺乏能够激起他们去反抗邪恶的内在力量，而且也不可能，因为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去好好地认识，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好……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的心里，总是缺乏公正的感情，总是对崇高的道德价值缺乏认识，而代替它的，只有被限制在一个狭隘意义上的守法感情的缘故。就他们看来，行为和生活现象并不能分出好坏，而只能区分为准许的，或不准许的两种。凡是准许的东西，凡是被明文规定的法律所确认的，或者单单由命令所确认的东西，他们觉得都是好的，不然就是坏的。倘使对于这事情没有肯定的命令，那么他们就会完全陷在迷惑里了。因此，在碰到各种各样要求改变现存秩序的新问题以及新现象时，他们的脚步常常显得那么怯弱和迟缓……在这儿，就有一种折磨人的不安，笼罩着这些受尽欺压的不幸的人，他们在专横顽固的压迫下，已经失去一切判断的能力。他们虽然知道他们所遵奉的规则已经废止，或者自行死亡了，可是他们却完全不知道，现在

他们应该转向哪里去，抓住些什么，——他们常常对第一个碰到的、允许带领他们走路的人，表示欣喜若狂。不言而喻，这个陌路相逢的人，常常是些欺诈撞骗的顽固独夫，他越是欺骗得出色，那些专靠别人的智慧，别人的意志，甚至是顽固独夫的智慧 and 意志过活的“头脑简单的人们”的群集，就越是在他的后面挤挤攘攘……

上面我们所表现的思想，并不是什么预先杜撰出来的理论的成果：它们只是直接从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所描写的俄罗斯生活现象中所得出的结论。毫无疑问，艺术家并不打算证明我们现在从他的喜剧中所抽出的思想；可是它们自己却就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出奇地正确。他的喜剧中的人物，是始终忠实于被专横顽固的生活方式所给他们设定的环境的。他们不敢有一个词超出这种生活方式的水平，他们的性格在生活中一旦形成之后，他们就不敢把它的主要特征有所改动。甚至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的最好的性格中，我们都看不到那种正直的勇敢，这种勇敢在别的不同环境下是可以向他们要求的，但因此也就不能在专横顽固的压迫之下向他们要求。在柔弱的萌芽中，已经勉强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出崇高的道德发展的开端了；但是这些开端是这样脆弱，它们不可能去刺激和保证什么实践活动。这就是为什么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中，那些正直人的行为的一切道德基础——总是浮面的、而且被限制得非常狭窄、大家都只在奉行别人的意志上转来转去、对于事情的正义性毫无内在的认识的缘故。例如，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所以曾经拒绝过跟维霍列夫出奔，只为了这个原因：她的父亲要咒骂她；后来既然跟他出奔了，她所忧心的，也只是：“父亲要不认她做女儿，全城的人都要用手指向她指指点点。”这种外表上的服从，在柳薄夫·戈尔奇耶夫娜身上，是受一种没有为内在的信念

所领悟的义务支配的，所以特别表现得尖锐。你看她在辩解自己决意要嫁给柯尔松诺夫的时候，怎样对米佳说：

“现在我不应当违背父母的意志。爸爸的意思要我出嫁。我应当服从他——这是我们女孩子家的本分。要知道，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也应当这样。我不愿意违背父亲逃走，免得人家议论我，免得把我当做榜样。虽然我说不定，因此要心痛得裂开来，不过至少我知道，我是规规矩矩做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看着我笑。”

在这些话里，关于行为的道德意义，除了“规矩”这个词以外，连一点暗示的影子都没有……但是所谓规规矩矩究竟是什么呢，按照常理，它又怎样使用到现在这个场合上去呢？——对于这一点，这个姑娘就无法判断了：因为专横顽固的教育，根本就不曾教导她具有这种判断。

而且，把服从抬高成为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法律，这也是顽固独夫自己所努力的，甚至他们比被压迫一边的人们抱着更大的坚忍不拔精神……这是很容易明白的：第一，顽固独夫也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道德见解，所以，他们不可能正确地分辨善与恶，结果，就必然要被横暴精神所操纵指挥；第二，别人无条件服从，对于他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受任何阻碍了。但是当然，就是在这种地方，顽固独夫的逻辑，离开人的一般的逻辑还是很遥远的。依照一般的逻辑说来，既然一个人已经设立了什么规则与要求，即使它是蛮横的吧，——那么他自己总该在此时此地，同别的人一样，对它们加以尊敬。顽固独夫却不是这样想法的：他认为只要他高兴，甚至是那些他自己都承认的，而且还根据它们来批评别人的规则，自己都有权破坏。“黑

暗王国”中的理性是这样昏暗，不但是顽固独夫自己，甚至是那些被他们所侮辱所压迫的人，都承认这种事物的规律是非常自然的。《切勿随心所欲》这个喜剧，就是“黑暗王国”机构中这种惹人兴味的一面的最好的表现。在文学方面，人们认为这个剧本比较别的剧本逊色，指责它构思脆弱，在某几场中发现牵强生硬的地方，等等。我们不打算长时间地谈论这些，——这并非因为它不值得一谈，而是因为第一，我们的文章就是不谈这一点，也已经拖得很长了；第二，剧本本身是十分简单的——无论就情节来说，无论就性格的轮廓来说，因此要说明它们，不需要花费多少的话，特别是在上面我们已经这样谈了以后。这个戏主要是这样的：彼得·伊里奇沉湎在酒里，虐待着他的妻子，把她丢弃了，另外搞上一个相好，当她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她就想离开他，回到自己的父母那里去，可是那些善良的老人们一致认为她也有错处……在收拾回家的路上，在旅店里，她碰到了她的父母，她就把她的一切悲苦告诉给他们听，并且补充说：她已经离开丈夫，要跟他们一块过日子，因为她已经不能再忍耐了。父亲听到了这种自由任性的话以后，只觉得非常惊奇。“干吗到我们家去？”他叫道，“为什么到我们家去呀？不成，一块走，我领你见丈夫去。”达莎说：“不，爹，我不回到他那里去了，”——父亲猜测他的女儿不要神经错乱了，——就这样安慰她：

“啊，你要明白，蠢东西，要明白——我怎么带你回我们家去？他是你的丈夫呀……（他从条凳上站起来。）一块走吧；办不到的事，净说些废话干什么呀！……你怎么能够离开丈夫逃跑，蠢东西！你以为——我不可怜你？咳，我们可以一块为你的痛苦哭一顿——这就是我们全部可以帮助你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要跟你一块哭——我要哭

的。我不是你的爹吗，我的好孩子，我的心肝！（哭泣，同时亲着她。）你应当明白，我的好女儿：上帝把人安排在一块，人就不应该分开。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过的，他们不叫苦，也不埋怨。难道我们比上帝还聪明不成？一块到你丈夫那里去吧。”

这种缺乏人性的话，只能使人感到，这个老人完全没有能力了解：为什么会弄到这地步——要离开丈夫出走呢！在他的头脑里，根本就容纳不下这种思想。这种东西在他看来是这样荒谬绝伦，甚至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反对它——这等于是，如果人们对我们说，人应该用手走路，用脚拿东西吃：我们又怎样去反对呢？……他只能不断地重复：“这怎么可以这样呢？……你得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可以离开丈夫走掉呢！这怎么可以呢！……”

人们也许会想，这同样一套议论同时也应该使用到丈夫身上去。不，他是超于法律之外的！……他——是他的妻子的主宰，他心里高兴怎么样，他就可以怎么样对她横行霸道，甚至于当他自己在她面前犯了过错，而且知道这个过错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打听到了他的“相好”，他的相好也已经探听清楚了他是结过婚的，把他赶走了：他怎么办呢？对妻子表示良心发现吗？感到后悔吗？什么都没有：他是更加放肆了，一回到了家里，就把从相好那儿受到的失败，都发泄在她身上……似乎，这应当使他的可怜的妻子的父母感到愤慨了吧：可是这个彻头彻尾都是错的他，就在他们的眼前，暴跳如雷，甚至忘其所以地威吓着要杀死妻子，并且拿着刀奔到街上去……达莎对父亲说：“您自己瞧吧，我的日子是多么舒服。”可是父亲却劝告她：“要忍耐，要等待！”“我还等他什么呀，连他的父亲都对他断了念头了，”

达莎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荫庇，这样反驳道。“没有什么，要忍耐。”父亲坚持说，接着就努力向她证明，这种不幸也是一种公平的惩罚——一切都为了她不听话，为了她不曾经过父母之命就嫁了丈夫。请听他的话：

阿迦封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呢！唉，唉，唉！这样。坏透了！你自己难道就没有错了？你有没有干过这勾当，丢了你老父老母跑了呢？你说，干过这事儿没有？这样做应该的吗？照法律是应当这样做的吗？魔鬼把你们抓去了！你们——简直不是人。现在你只有忍耐，只有忍耐！而且应当服服贴贴、高高兴兴的忍受这种处罚！……要不这样——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逃走！这算什么规矩？你哪儿见过，丈夫跟老婆分开住的？好吧，你把他留下来，撇开他跑了，可是他就会弄得灰心绝望——那时候是谁的过错呢，谁呢？嘿，他害病了，——谁又去照顾他呢？这是你第一个本分呀。到了他临死的时候，他要想向你忏悔，可是你却为了骄傲，已经离开他，跑了……

达莎（抱住父亲的头颈）爹！

阿迦封 你得好好想一想，好孩子，好好的想一想……（哭泣。）我们是多么愚笨，啊，多么愚笨！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您瞧，这个老人是多么善良，多么令人感动，而同时他的心肠又是多么狠，这仅仅是因为他对人格的道德意义，并没有什么认识，他只习惯于使一切事情都去服从为专横顽固所制定的外表规律的缘故。他在自己女儿的心即使没有这个都要碎裂成一

片片的一刹那，去斥骂她的过去，这不是由于冷酷，或者怨恶，而完全是出于天真。后来——他又想象些什么理由呢？他并不这样说：你的丈夫要痛苦，要害病，等等，这样你不应该可怜可怜他吗？——或者是别的什么打从心里涌出来的一套说法。不，他根据的完全是另外一套：“那时候是谁的过错呢？”以及“这是你第一个本分呀”……他根据这个纯粹是表面的道德，规劝他的女儿：“要忍耐，要忍耐——什么都会顺顺遂遂的。”

这倒是真的，——真有一种荒谬的偶然来给老人的话作辩解，真好象——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一个商人的老婆突然完蛋了，

一条愚蠢的狗就在她的跟前，

昂起了鼻子，叫号了三天三夜。

那时候你可以尝试去劝劝它了！……

喝酒喝到昏天黑地的彼得·伊里奇，手里拿着刀奔到莫斯科河河畔，他什么都看不清，什么都不了解。突然他的听觉被钟的敲响所惊动了：因为在什么地方正在开始做早祷。他，由于机械的习惯，举起了手，打算划十字——他看见，他的手里有着刀，自己正站在冰洼的边沿上面……于是恐怖立地把他攫住，醉态也立刻消失了，他记起了父亲的劝诫，就满怀悔恨回家去。达莎的父亲听到了他的故事以后，就沾沾自喜地并且心平气和地责问她说：“孩子，我对你怎么说来着！……”这样，事情就完结了。

倘使你把这个故事深深地思索一下，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在其中体会到一种恐怖的幻想的意义。有些人断言，这剧本是在

证明：钟声对于人是多么有益，一个人在最艰苦的时分，是怎样得到从儿时就已领会的信神的习惯所搭救。这一套说法奇怪到什么程度，这里没有说明的必要。不，按照我们在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有其他剧作所发现的共同思想说来，我们觉得在这个剧本中，完全是另外一套东西。在彼得·伊里奇的悔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以及一切跟他有关系的人所处的地位，是多么凄惨和绝望，这种地位就是专横顽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陷进去的。彼得·伊里奇，无论是父亲的劝告，姑母的央求，被他的行为所毁损了的妻子的恳请，同学们的开导，那个就为了她使他抛弃妻子的姑娘的拒绝，——对他，都不能起什么影响。他的心里并没有什么热烈的道德原则，他的心彻头彻尾都是粗野和糊涂的。甚至于他心中的爱情都是那么粗野，那么奇形怪状！他爱上了达莎，而且把她从她的父亲那里带走，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却已经在虐待她了，而且认为她的不问酬报、全心全意的爱情，是对于他的生存的惩罚。为了格鲁莎，他爱到发疯了；可是当她嘲笑着他，把他赶跑的时候，他又能怎么办呢？他只好向叶辽姆卡求教，因为他认得一个魔法师，他问道：“那个人能不能去迷惑这个女孩子，使她喜欢我，让我心里乐意怎么样，就怎样去向她逞威风，不要让她向我逞威风呢？”这就是他追求的目标，这就是他的爱：能不能心里高兴怎么样，就怎样去向他所爱的女人逞威风！……想起来是多么可怕，通过奥斯特罗夫斯基，我们知道有多少“黑暗王国”的住民，假如他们自己并没有被压挤到完全丧失他们的个性，他们就都会具有这种专横顽固的习惯……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开导这些愚昧的人呢？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拯救那些被迫忍受着他们的凌虐的不幸的人呢？什么都没有，在普通方法中实在什么都没有。随便什么自然的手段都无法改变他们的观念和性格。要使他们清醒，需要有一种非常的、极端的、强

迫的，甚至是毫无道理的手段。必得使彼得·伊里奇爬到了莫斯科河的冰洼边沿，而且恰在那时候，人家开始做早祷了，——这才能使他恢复知觉！——好吧，要是不曾碰到这个呢？那么彼得·伊里奇跟他妻子许多年月来所度过的可怜的生活，可又要继续下去了，正象它在“黑暗王国”别的许多人中继续下去一样。而且现在谁又能够担保，彼得·伊里奇的忏悔是可以持久的？在他的性格里，有没有什么使精神得以改变转化的力量？不说——要使一个酒徒清醒过来，要使一个喝得昏天黑地的人稍稍停留一下，喘息一下，然后聚积起精力，这种力量实在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它是不是能够持久呢？别忘记，彼得·伊里奇的幡然改悔，是当醉眼朦胧的时候，在他错觉到的幻影和奇迹的影响之下发生的……他可能相信，他的邻人也可能相信，这一定是什门河神或者别的神祇在呵护他；然而我们却知道得千真万确，这完全是精神错乱、胡思乱想的结果，脑子发烧的结果。这里有什么可以使人的精神得以改邪归正的保证呢？当他刚刚经过狂饮滥喝，还觉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当不久以前那种变故的恐怖，还留存在他的意识里的时候……他是还有点戒惧的……可是过后，他可又要回复到老样子；人如果知道，在那种关于正直而有益的生活的必要性的内在认识，还完全没有在他的心里得到发展时，就会满有自信地等候着这个的……那时候如果不再有什么奇迹出现，那么这个可怜的女人——他的妻子——就得照旧在她的悲苦的命运中受折磨。还有那些老人——她的父亲和母亲——也得照旧要为她而忧伤，并且劝她忍耐！……他们觉得这样毕竟轻松些；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个性了，他们都浸透着这样的信条，人应当——

耐心地熬受着痛苦

连发牢骚都不企求……

然而，这个在年轻的天性中还保留着生命的残余的、虽然软弱、但却随时都在对毫无理性、毫无来由地压迫着她的黑暗势力表示抗议的不幸的女人，能不能忍受这个呢？……

当然不！她不可避免地要弄到堕落，——但她不是陷在按照我们做作的道德的一种庸俗不堪的语言说来，所谓可以充分享受到爱情的堕落，——而是陷在真正的堕落，陷在丧失道德的纯洁和力量的那种堕落。象女子似的，男子也可以同样达到这种堕落；然而在一个充满情爱的女子的性格中，却都有一条通到堕落去的道路，这条路每一分钟都可以把她引诱过去，只要在这条路上跨出一步，就要使她在整个社会的眼前犯罪和毁灭。这条路——是跟男子联系起来的。男子也可以在跟女子的亲密关系中，寻求庇护，来摆脱那些实际生活中包围着他的黑暗和肮脏。他在这里得到休息和安静，他在这里拚命忘掉一切。可是对于男子们说来，这一类关系，并非是什么毁灭；大家都把这些东西当作一种天真的玩乐，他们并不因此在社会的面前留下可耻的污斑。他每分钟都可以摆脱它们，回到他的事业上，踏进他已经混熟的环境里去，而一点都不丧失他的道德意义。对于女子就不然了：只要有一次她跨错了一步，按照正站在统治地位的道德势力看来，她便失去了安然回到原来道路的可能。她被瞧不起，被侮辱，被唾弃，——在她的面前，一切门都紧闭了，——最低限度，要到她的羞耻被一个顽固独夫的金子所装饰起来，她敢于傲慢地把这种羞耻，正面向社会投掷过去的时候为止。到那时候，说不定，有人还会对她表示尊崇，甚至对她表示阿谀。但是就是在这种场合，深入的道德上的腐烂，还是要在她的性格中实现的。由此可见，不论这个姑娘怎么走，到处她都感觉困苦、危险，没有一

条路不要把她引向道德品质的丧失。当她还没有完全变得粗野，变得庸俗的时候，——就有贫困，普遍的轻视、无力抵抗每个遭遇的人——这些问题来折磨她，——因此她就不得不自主地、而且不知不觉地习惯于欺骗，习惯于放荡，习惯于倚靠别人而生活……这以后，如果她是幸运的，当她已经习惯于她的环境的时候，她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出卖她的感情，享受奢侈逸乐的生活，——那时候，周围人们公开的崇拜，嫉妒以及卑劣，就会把她心中的一切善良的感情都扫除出去，而把淫荡一直塞到她的灵魂深处……如果她碰不到什么好运气呢，那时候……对于这些女人，那些道德君子，甚至连提都不提了，至少，在清醒的时候……

可是这些女子，从前也是纯洁与道德的人，能够配得上那些讲究形式上贞节的最拘泥的清教徒的尊敬的。她们是怎样开始堕落的呢？是些什么样的原因迫使她们踏上虚伪的道路的呢？是什么东西决定了她们的“第一步”的呢？关于这一点可以推想出许多事情来；可是我们不愿意推测，我们只是这样解决这些问题：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中，找寻它们的直接回答。富有生气的道德发展的缺乏，内心缺乏支柱，外部有专横顽固的压迫——这就是“黑暗王国”中妇女之间的不道德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正象男人之间的不道德所以产生一样。我们已经看到，精神独立性的缺乏，对一切为专横顽固所造成的东西仇恨的缺乏，是怎样在那些有血有肉、生理上充满情欲的性格中表现出来。普查托夫的妻子与妹妹，活着只是为了欺骗他，推说到教堂去，偷偷地跟青年男人去游荡。里波契加·鲍尔肖娃被军官们所诱惑，惧怕着父亲，对于母亲却一点都不尊敬，后来，她嫁了波德赫留静，为了不愿意从就是父亲的财产中，替他按照二成半的比例偿还债款，就冷冷地打发他坐牢去……我们还看到，那些顺从而温柔的妇女性格，怎样在专横顽固的压迫下，堕落和枯萎。阿芙陀季

霞·马克西莫夫娜在成熟之年，在她的发展上仍旧保持孩子的状态，既不了解她自己，又不了解自己的环境，也不了解周围的人，她被阿连娜·菲陀托夫娜的教唆所诱惑，做了维霍列夫的俘虏……甚至把自己对米佳的爱都不敢告诉父亲的柳薄夫·戈尔奇耶夫娜，准备嫁一个她对他感到恐惧和厌恶的柯尔松诺夫。达莎所处环境的荒唐，也不下于前面那些人，她为了她的喝醉了的丈夫要把她钉起来，就被迫去喝他的酒……然而所有这些事实都是无可指望的了；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个性已经完全死亡，我们只能猜测，年轻的灵魂在跌入这种环境以前经过怎样的最后挣扎。可是奥斯特罗夫斯基也有这样的剧本，从这剧本里可以偷听到一颗纯洁的心，在它刚刚感觉到有一种不纯洁的思想正在迫近的一刹那之间所作的私语，——这剧本向我们解释了那些被专横顽固的势力所扼杀的女孩子，在她们的无知的迷恋发生以前，内心斗争的整个过程……这个剧本，当然是我们读者们大家都记得的，因为它是今年才出现的，得到了普遍的注意。我们已经在《现代人》中谈起过它了，因此现在关于它所要谈的，只是对于解释我们的思想直接有关系的东西。邬兰别柯瓦的养女那奇亚——是一个心地善良而聪明的姑娘，她有一个非常朴实、非常纯洁的愿望。她梦想着跟亲爱的人在一起的家庭幸福，她关心着如何使自己“高尚起来”，她要使没有一个人会耻于做她的丈夫；她想象着在嫁了丈夫之后，如何把家里弄得井井有条；她努力使自己的态度谦虚有礼，对那年轻的主人——邬兰别柯瓦的儿子保持着距离，甚至对莫斯科的姑娘表示奇怪——她们非常热心地谈论着骑兵和近卫兵。“她们从哪儿知道这许多的？”她疑惑地自己问自己……总之，这个姑娘，在别的各种情境中，她是可以符合许许多多人的理想的：她全心全意地、发乎天性地愿望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主妇。如果给她稍微受点教育，她还能成为一

个好母亲，把自己的孩子教得很好。可是现在她住在邬兰别柯瓦——这个女性中的无法无天的顽固独夫的家里，——因此对于可怜的那奇亚，一切东西便都归于乌有了。邬兰别柯瓦这个人物，是一个从商人家庭移到另一个世界去的顽固独夫所以为顽固独夫的典型，这个典型是值得注意的。它在这里是更加强有力了，它的影响是更加广泛了，因此它也更加令人嫌恶。商人还只把他的专横顽固限制在家属以及同他接近的人们身上发挥；可是在社会里他就不可能任性乱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一个顽固独夫说来，在碰到每一个独立的人的时候，他就显得胆怯，显得精神软弱了。就是那个季特·季狄奇·勃鲁斯柯夫吧，——连他也不敢对伊凡诺夫们怎样放肆，逞强，在回到家里以后，他就自行招认：“他们能够占上风，只不过为了我走到了他们的屋子里；他们要是到这儿来，那我就可以摆布他们了。”暴躁的彼得·伊里奇被他的情人赶跑以后，回到了家里，也愤慨起来了：“大家都讥笑我，赶我走路！……现在我回家啦，——我要把一切东西打得粉碎，不留下一点活的。”由此可见，许多商人出身的顽固独夫，他们虽然“发怒，却并不激烈”，因此社会还不会从他们那里遭受怎么多的痛苦。然而专横顽固的总的特征，是在一切范围里都存在的，范围越是广大，这种专横顽固就越是可怕，越是有害。邬兰别柯瓦的行动圈子是相当大的。第一，她家里的人很多——有养女，食客，女管家，女佣，听差……其次她还有农民。除此之外，她还是邻近方圆之中的一个有力人物，具有巨大的影响。她甚至连别人的婚姻也要特强包办，还给别人介绍职业，还出席法庭辩护……她的影响究竟有着怎样的性质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根据某些特征来判断。她为了自己的教子——涅格里庚托夫去请托警察署长，让他做一个重要职员；警察署长说，没有位置。邬兰别柯瓦就因此生起气来，对他说：“您好象

不明白，是谁在拜托您。”警察署长就被迫答应了。由于这件事，邬兰别柯瓦的食客——伐西里莎·彼列格里诺夫娜就这样议论道：

“我简直就想不透，他怎么敢违背您的意思。现在我到底看明白他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啦！即使涅格里庚托夫，照他的为人来说，连谈都谈不上吧，可是不管他怎样坏，看在您的面上，就该替他把世界上一切能够做的事办到……他是您的教子，这不结了，——他不该听到随便什么议论……大家都知道这个的，恩人，只要您乐意，您可以用泥土做一个人；要是您不乐意，那末不管他怎么聪明，——他都只好在不声不响里埋没掉。这是他自己的过错：为什么不会伺候您呢……”

顽固独夫的道德与逻辑的整个鄙陋无耻，在这里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顽固独夫的个性，在这里变成整个道德世界的中心：一切都从它那里出发，一切又应当都回归到它那里去。除了顽固独夫的个性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法律，除了迎合他的意志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道德规则……因此，关于法律的问题，在这里就无耻得有点赤裸裸：法律并不是别的东西，只是顽固独夫的意志，大家都应当服从它，而他却不应当受到什么限制……在这种道德底下，人们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是过的这样的生活。邬兰别柯瓦把她的养女们关得很严紧。要是她们有谁敢张开她的嘴巴，她就得这样对她说：

“我不喜欢人家发议论，我就是不喜欢，这就是了。我谁也不准许这样做。每个人都得听我的话，我从小就是这样

习惯的；你总该明白这个！我真觉得奇怪，我的宝贝，你居然敢回我的嘴。我知道，这是我纵坏了你；现在你的眼里已经没有人啦……”

可是另一面，她却又听从老人波塔贝奇的话，把养女们打扮得漂漂亮亮，不让她们干活。她说：“我要大家都对她们表示羡慕。”到得她们长大了，她就按照自己的选择，把她们出嫁。波塔贝奇把这一点这样告诉邬兰别柯瓦的儿子——列昂尼德道：

“她会这样说：我给你找到一个丈夫啦，或者这样说，在什么时候结婚；这就完了，那时候你就一个词儿都不用说啦！她命令什么人去结婚，什么人就应该去结婚。因为，少爷，我是这样想的：谁高兴呢，抚养了你，却又不肯听话……可是少爷，有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未婚小伙子不喜欢那个未婚姑娘，那个未婚姑娘不喜欢这个未婚小伙子，那时候她可要大发脾气了……连自己都管不住了……有一次，她要把一个养女许配给一个城里的伙计，可是他是一个粗人，他打算反对。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姑娘，而且我也不打算结婚。’当时，她就跑到市长那里去申诉，还向神父去申诉；结果，终于把这个傻瓜弄得回心转意了。”

按照波塔贝奇的见解，就是说这个太太“要把她的操心扩展到所有的人的头上去”。是什么东西激起这种操心的呢？邬兰别柯瓦自己在她的训诫中，努力解释过这一点，据波塔贝奇说，她在打发养女们出嫁的时候，总是眼睛里含着泪水，感动地向她们宣读这个东西。

“你们，”她说，“在我这儿过着富庶、体面的日子，什么都不用做；现在你嫁给一个穷小子，终生都要在贫穷里过活，必须干活，必须担起自己的责任。”“你应该忘记，”她说，“你是怎样在我这里过活的，因为我不是为了你才这样做；我只是为了安慰自己，随便什么时候，你都不该想起这种日子，你要永远记住你的低微，记住你是从什么人家出来的。……”

您不要以为，她是带着怨毒，带着讽刺的口气说出这个来的；根本不是——这是出于邬兰别柯瓦的全心全意，出于她的真正的确信。在她的心里，对于邪恶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癖好；最糟糕的是，在她的思想范围里她什么都不能够认识，只除了自己。其余一切东西，她觉得，都不过是为了服务于她而创造的，正象田里的谷物不是为了本身而存在，而实在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而存在一样……对付这种见解，你说该怎么办呢？……她对于自己养女们的丈夫的操心，可以证明，她甚至的确想做些善事。波塔贝奇这样说，如果这些养女嫁的是法院录事，那末这个丈夫的日子就能过得顺当起来。

“因为，倘使法院里把他撤了职，或者完全把他开除，他就可以立刻跑到我们太太这儿来哭诉，她会给他做靠山的，甚至连州知事那儿都要麻烦到。在这种时候，这个录事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喝酒，什么都做，对谁也不害怕了……”

当然，您要说，这也是不好的；可是这里毕竟可以看出：邬兰别柯瓦——并不是一个折磨人的人，也不是一个女恶棍，而是一个富于同情心、有善良的愿望、善良的行为的女人。

邬兰别柯瓦由于她的善良(不是由于别的什么),打算把那奇亚嫁给酒鬼涅格里庚托夫。她非常直率地把这件事说给瓦西里莎·彼列格里诺夫娜听:

“你看,他过的是乱七八糟的生活;这样就应该赶紧结婚。那奇亚在我们这儿——是一个很有规矩的姑娘,她能够管束他,不然的话,他就要在这种光棍生活里糟蹋完啦。”

那奇亚这时也坐在那里,她听到了这些话,可是她什么反对的话都不敢说……最后,她恳求,并且哭泣了,却遭到了呵斥,人家对她这样说道:

“你的眼泪对于我一点意思都没有。我既然决定这样做,那就得照我的意思做,这世界上随便什么人的话我都不想听!……以后你就会知道,你这种倔强是不会有什结果的,只不过惹我发火。”

这一套话说得很堂皇,很庄重,可是当然,在那奇亚却是并不轻松的。顽固独夫在这里算是把他的拳头和鞭子藏了起来,然而,他并不见得更好,说不定,只有更坏。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一个剧本里,在那商人的家庭中,就有着同样的一场戏;这一场戏虽然显得更加粗鲁,可是却已经不是那么令人痛恨了。下面这一场戏就是在《性格不合》中的,卡尔普·卡尔贝奇在这场戏里,告诉自己的女儿^①关于他的侄女要结婚的事情,同时他又跟他

^① 卡尔普·卡尔贝奇的女儿绥拉菲玛·卡尔波夫娜是个寡妇,她为了再嫁,这一天到家里和父母商量。

的老婆——邬丽塔·尼基季斯娜，把这件事情议论了一通。我们把这一场戏抄录下来，以供比较，它是很短的：

卡尔普·卡尔贝奇 咱们也快要举行婚礼啦：有人发现马特辽娜^①跟管事一起在花园里，所以我要给他们安排结婚（马特辽娜用一只袖子掩住面孔）；我给他一千个卢布，结婚费都归我的账。

邬丽塔·尼基季斯娜 你不过是想在什么地方痛喝一顿；所以就想起结婚这个玩意儿来了。

卡尔普·卡尔贝奇 好，还有什么要说的？

邬丽塔·尼基季斯娜 再也没有了。

卡尔普·卡尔贝奇 （严厉地）不，你说！

邬丽塔·尼基季斯娜 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了。

卡尔普·卡尔贝奇 （更严厉了）不，一定得说些什么出来，我听着。

邬丽塔·尼基季斯娜 你又不肯听，说什么呢。

卡尔普·卡尔贝奇 听什么呀！你说的话没有一句是中听的。嘿，邬丽塔·尼基季斯娜！（用手指威吓她）告诉你——闭嘴！我要使这个女孩子能够理会得，可是你却说你自己的一套……（马特辽娜用另一只衣袖遮住眼睛）。我就要这样把第三个侄女儿嫁掉。我是所有亲属的恩人。现在我还有一个小的侄女儿，我要弄她来顶替马特辽娜的位置，让她在社会里也能够站得稳。

这里有叱骂，有威吓，有强迫，总之一句话——这是一种发

① 卡尔普·卡尔贝奇家的使女，也是他的远亲。

挥得最完全的专横顽固……然而它在这里还没有发展到象邬兰别柯瓦那样巧妙。在这儿，马特辽娜因为人们在花园里碰到她跟管事在一起，就跟这个管事结了婚，——这件事情是很简单、明白的。看样子，卡尔普·卡尔贝奇就是这样嫁掉其余几个侄女儿的。倘使他能够想到把她们嫁给那些她们所不喜欢的，而那些人也不愿意娶她们的人，那么这种念头很可能使他乐一阵的……可是他还不能细致到想出这种花样；只有邬兰别柯瓦才能够享受到这种快意。而且，卡尔普·卡尔贝奇的态度也是另外一套的：他对待他的老婆，比邬兰别柯瓦对待她的养女还要坏；他不让她说话，说不定，他甚至还殴打她；可是做妻子的到底还能对他表示一些意见，然而那奇亚在邬兰别柯瓦的面前，却是完全沉默的。你看，这种文明形式的专横顽固所带来的乐趣是多么少！

就因为遭受到这种冷酷而严肃的态度的打击，在那奇亚的心里就出现了一种痛苦而碎裂的感情，这种感情迫使人失去意识，变得不顾一切起来，跑到哪里是哪里，——水里就水里，投到第一个撞见的人的怀里，就投到第一个人的怀里。她这种感触，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里，是用令人震惊的力量与明朗性传达出来的；这种深刻真挚的勾勒，在我们的一切文学作品中，还并不多见。我们已经在《现代人》（第十一期）上把这场戏引过一次，可是我们现在不能不把这场戏的若干地方再向读者们提醒一下：

“我连自己都不知道，冷不防究竟遭到了什么，”那奇亚说，“刚才太太告诉我，叫我不要乱说，她命令我嫁给谁，就嫁给谁，我的整颗心好象都翻过来啦。我想，我的生命值得什么呢，老天呵！（哭泣。）我这是为什么呀，我规规矩矩的

过日子，不但当心自己别听到什么言语，而且别看到什么人的眼色？……我简直就恼恨起自己来啦。我想，我爱护自己是为什么呢？我不愿意，真不愿意呢！……我的心快要僵硬了，——我觉得，如果她再说一个词儿，我就要当场死了。”

在这种忏悔中，可以看清楚，专横顽固已经把一切被它的影响所擒获的不幸的人引到了怎样绝望的境地。那奇亚还没有养成这种控制自己的习惯，矢忠于从她内在的信念里所引出的见解，相信它的正义性和力量；她的朴实和真诚有着一个直接的目标——为了结婚而爱护自己……然而她这种自然的感情，却突然被那个要她嫁给一个酗酒、肮脏的坏蛋的命令所侮辱了……她的一切处女的幻梦都被打碎了，她的沉重的命运以它最冷酷的粗暴姿态浮现在她的面前。以前她曾经幻想过，她怎样跟未婚夫婿坐在一起，——好象一个公爵小姐似的，她仿佛每天都在过节，——她嫁了丈夫以后又怎样过日子，好象在天堂里，好象有一种什么东西值得骄傲……可是现在她却有了另外一种念头；她被专横顽固所压溃了，她对前途什么都看不见，只除了这同样的专横顽固：

“你倒想一想，”她说，“这个无法无天的人要怎样侮辱你，折磨你，把他的威权显给你看，他要无缘无故摧残你一辈子！……你跟他在一起，活还没有活，人就变老啦……真的，这样倒是嫁给少爷好……”

真的——正象她所说，她在她的“绝望”中，发觉自己是爱列昂尼德的，这个列昂尼德是早就在向她追求了……以前，她看见他就避而却走，可是现在她却在晚上，到花园里去见他，投到了

他的怀抱里；他把她抱上小艇，向湖中小岛驶去，他们被瓦西里莎·彼列格里诺夫娜窥见了，她就向邬兰别柯瓦告发，邬兰别柯瓦立刻大发雷霆，吩咐马上送信给涅格里庚托夫（这个人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为了他喝醉了酒跑到她这里来，——因此就对她有点不尊敬，已经被她赶跑了），告诉他，他跟那奇亚的婚礼，应该尽快的进行……

就在这时候，列昂尼德怀着委曲的心情上场……然而他已经被专横顽固的空气所腐坏了，他什么实际的工作都不能做。在《养女》里，虽然是浮光掠影地，但却以令人震惊的真实，描写着专横顽固的传染病怎样在整个“黑暗王国”的氛围里渗透开来，不知不觉地、连那最有朝气的性格也免不了遭受荼毒。列昂尼德——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他并不凶恶也并不完全愚蠢，他的性格还没有形成。然而您瞧，他已经染有着怎样的习气，他是怎样被连根腐坏，一切周围的事物正在怎样促使他继续腐化，一切事物正在怎样把他训练成一个令人痛恨的顽固独夫。光是他跟波塔贝奇的谈话，就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他顾盼着产业，向波塔贝奇提醒道：“这一切，将来都是我的！”于是波塔贝奇回答道：“是呵，少爷，什么都是您的，我们也都是您的……我们怎样伺候老爷，伺候这故世的老爷，那末也就该怎样来伺候您。因为——这是一个血统……这是很自然的事呵……”后来，列昂尼德又解释，为什么不打算做事去，因为“那里要强迫我写字……”波塔贝奇在这一点上，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少爷，为什么您自己要做事呢！这算什么规矩！您应当找寻一个这样的差使，——一个最配得上贵人身份的，最有气派的差使；至于事情自有您的下属去做，您只要在他们头上，做大家的长官。官衔自会寻上来的……”之后，列昂尼德又抱怨，那个姑娘看见他就跑掉。波塔贝奇解释道：这是因为妈妈要保护他，也要

保护她自己。接着，他又加了几句：

——怎么不要这样呢，少爷：您的妈妈应当管得严厉一点，因为，她是一个太太呀。为什么您要盯着她呢！您应当象一切年轻的绅士一样循规蹈矩。您不应当败坏这种规矩。为什么您要落在别人的后面呢？这是要使您失去体面的。

列昂尼德 说是这样说，可是我不懂应该怎样跟姑娘们说话。

波塔贝奇 您为什么要跟她们长久的说话？您可以跟她们讲哪一套学问？她们懂得什么！您究竟是一个绅士，这就完了……

于是列昂尼德很快就把这种见解吸收进去。在花园里他跟那奇亚的一场，显露了他是一个空虚而猥琐的孩子，——此外再没有别的了；可是在最后一场，当他知道了母亲的愤怒以及威胁着那奇亚的命运时，他就简直是可恶了……他忙乱着，并且问道，能不能给她帮助，从表面上看，他是怜悯那奇亚的，然而在实质上，她对他已经毫不相干了……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挽救这种不幸：邬兰别柯瓦最生气的，是那个十九岁的仆人格里斯加，她的宠儿，没有在家里过夜；格里斯加跑出去，倒在干草堆上睡觉，一点不理睬女主人的愤怒。但是应该打发他去请求宽恕，——那时候邬兰别柯瓦就会高兴起来，就可以代那奇亚去劝劝她了。瓦西里莎·彼列格里诺夫娜嘲讽地向列昂尼德提议——去求求格里斯加，要他到女主人跟前去。可是这孩子，没有想得多久，就回答：“不，那要使他的脸上太光彩了……”他用这种回答对那奇亚的命运下了威胁性的判决以后，又开始问：“怎么办呢？”而且

勉强装出怜悯的样子……那奇亚终于忍不住了，就对他说：“对于这些劳什子的事情，操心得也够了；您还是赶快到彼得堡去吧；到那儿去乐一阵吧。至于我，对于你又有什么关系！”列昂尼德觉得受了屈辱，就问：“为什么对我这样说？”“就为了您还是一个小孩子，”那奇亚回答，并且结束道：“您还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好！至于我，万一忍不住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小池子离得并不远！……”于是这个略微有点狼狈、可是暗地里却十分高兴、能够把她甩掉的列昂尼德，就说：“真的，我还是到邻近住它一两个星期的好……”这样就丢弃了那奇亚，这个姑娘在昨天，就由于现在打算投到池子里去的同样的感情所吸引，曾经投入过他的怀抱……

由此可见，这就是堕落的根源，这就是道德腐化的原因，这种腐化是这样广泛地在顽固独夫整个“黑暗王国”里泛滥！

“当我想到，我是一个跟大家一样的人的时候，”那奇亚说，“我就有另外一种想法。可是在她开始把我当作木头人一样，向我发号施令的时候，我就看清楚：我是什么意志都不许有的，也没有什么保护，我变得绝望起来……恐怖，羞耻都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即使只能活一天吧，我想，这一天总应当是我的，——将来怎样就怎样吧，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个姑娘就在这种思想下，冲向自己的毁灭，而且真的，她只能享受几个钟点的生命……可是连这一点也终于被剥夺走了，因为关于昨天爱情景象的回忆，已经被现在列昂尼德的行为所毒害、所玷污了。“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这个人，我已经把我清清白白的处女的爱，糟蹋在他的身上啦！”现在这个不幸的姑

娘应当想一想，这痛苦的错误所造成的羞耻，将要比悲哀丧失天真更要强烈地而且久远地迫害着她。是的，说实话，她的行为的不道德，只是因为在她最激动的时候，她非常愚笨地安排了自己……可是否则，她又该怎样办呢？……阻止她公开反抗“恩人”的意志的，不只是一种守法感情，而干脆是无力、不可能。她能够躲到哪里去，她能够用什么方法去寻觅保护，最后，她又用什么方法去生存呢？……除了她已经做过的以外，剩给她的，只有一个法子：跳到池子里淹死……可是这里也是没有多大乐趣的！……

在这里，还向我们揭开了另一个我们认为既然专横顽固本身已经毫无能力，内部早已经腐烂，为什么它还能撑持下去的原因。不管专横顽固的一切花样是怎样荒谬、丑恶，如果它没有什么更加生命攸关的更加重大的东西支持着它，这种已经完全变成被动的并且僵死东西的守法感情，这种已经变成对别人意志的威权漠然无知地崇拜的守法感情，就不可能这样平顺无事地在被压迫人们中间保持下去。真的，它所以经常得到支持，这是因为人们对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有着不可避免的欲望和要求。这种跟愚钝无知的守法感情联结在一起的要求，对于专横顽固的发荣滋长，是极其有利的。如果在“黑暗王国”的人们中，守法感情不是这样僵硬和被动的話，那末当然，这种改善物质生活的要求，就会完全引出别的结果来。米佳就不会背着人眼泪汪汪地抱怨主人，当着主人的面却又一言不发，把他的话当做法律，——而是直截了当地找出一个正当的理由，要求他增加薪俸。波德赫留静自己也不会克扣尺寸，算计顾客，唯主人的意志是从，把它当作最高的法律，还把几文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而干脆要求分享鲍尔肖夫的利益，因为他已经在经管着他所有的事情了。那时候，当然连鲍尔肖夫也不必闹什么破产了。而且那

种专横顽固的行为，对于他也没有多少的诱惑力了。从另外一面看来，如果物质幸福对于人没有什么必要，那末，当然，安特莱·季狄奇就不必在他的爸爸面前战栗，而那奇亚也可以不住在邬兰别柯瓦那里，甚至基施加也不必去尊敬波德赫留静了……然而现在事情却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物质幸福，可是它们却已经被顽固独夫所夺去了，因此，这个置身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的衰弱无力的、被压迫的一边，在这方面，就只有依赖什么托尔卓夫和邬兰别柯瓦的任性的慈悲；你可以向他们要求那些他们没有权利占有的东西；然而那种守法感情，却禁止你去破坏对他们的应有的尊敬……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果来呢？人们会以为，结果是明白的：必须“毫无怨言地恳求”顽固独夫，要他们除了自己过活以外，还要让别人过活……然而要他们实行这个要求，就必须获得他们的慈悲；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一件事情上都对他们表示同意，并且怀着如果必要的话，就以“耐心忍受重压”的精神，对他们表示服从……然而按照戈尔奇·卡尔贝奇，或者是邬兰别柯瓦太太的“严厉的性格”来看，按照他们的无可理喻的愚蠢来看，这种重压实在是使人够受的……要达到这一切，人就必须为了它预先训练好自己，培养好自己，这就是说：要毁折自己的性格，要把愚思妄想，也就是说，要把自己的信念，从头脑里赶出去，要克制自己，也就是说，要把一切关于自己的权利以及关于人类尊严的思想，搁在一边。所有这一套，都被那些顽固独夫在对付所有生长在他们的影响范围之下的人中，顺利地实现着了。因此，在他们的手下，就常常有许多逆来顺受的米佳，安特留莎，奴颜婢膝的波塔贝奇之流。如果在谁的身上，经过专横顽固精神的制伏以后，还留得有什么个人独立的感情，他的智慧也保持有构思自己的判断的能力，那末对于这种个性和智慧，就有一条现成的路给它们预备着：我们已经相信，专横顽固就其本

质来说，它是愚昧而且粗野的，因此，对付任何一个顽固独夫，就再没有比欺骗他更容易了。一个还保持有智慧残余的人，只要他一开始从事实际活动，他一定得用这个方法才能进入“黑暗王国”里的顽固独夫的圈子；有一句谚语，“聪明人不得不做骗子”，就是从这里发生的。

由此可见，在顽固独夫下面，可以把他们所豢养、所庇护的人分成两类——活跃的和死气沉沉的。那些死气沉沉的、被压溃的以及僵硬不动的人，——他们就是这样躺着，什么企图都不显露出来：你把他们从这一地方拖到另一地方——你就来吧，不拖开去，——那就在这里腐烂……相反，那些活跃的人，却一直在努力坐得更舒服一点，坐得更靠近顽固独夫一点，假使运气碰得好，那么就用脚把他绊倒，骑在他的上面，让自己也来专横一番。新的顽固独夫是比以前更坏，更危险，更要历时长久了，因为他比以前更要狡猾，已经熟习他的痛苦的经验。一切就是这样进行：在一个顽固独夫之后，又来了另一个，他采取另一种更要文明一点的形式，例如吧，邬兰别柯瓦就比勃鲁斯柯夫更要文明点，然而在本质上，却怀着同样的要求，同样的性格。被压迫一边的活跃的人物为了保障自己，开始从事欺骗，而那些没有活气的人却努力以自己的漠然不动和顺从，来为自己博得顽固独夫的慈悲，博得点点滴滴的活命之水（但他所给他们的的水却十分少，使他们不至于太有活气）。

从这些简短而单纯的推想中，不难明白，为什么在“黑暗王国”中，那专横顽固方面的重压，极大部分总是压在妇女们身上。我们在上面一篇文章中，答应过要注视一下在奥斯特罗夫斯基那些喜剧里所表现的、俄国家庭中妇女的奴性的地位。我们觉得在现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很充分地指出这一点了；剩下的我们还要谈几句关于它的原因，同时还要指出另一个我们到现在还

没有谈过的喜剧，——这就是《穷新娘》。

按照我们的社会结构来说，妇女几乎到处都只具有古代寄食者所具有的同样的意义：她一辈子都该依靠别人而生活。这就很明白，因此在社会中，对于妇女，就要形成怎样令人屈辱的见解。固然，连“黑暗王国”的一家之主，象勃鲁斯柯夫，鲍尔肖夫之流，他们自己都是依靠别人而生活的。然而这些人的手里却牢固地掌握着固然没有什么人明言，但却大家都承认的寄食的权利。同时，他们甚至还能够引用政治经济权来辩护：他们有资本（资本从哪里弄来，怎样弄来的，——这跟谁都不相干了！），他们就有权利来享受利润……倘使在他们的买卖中，这些利润有点显得过分，那末在这方面，也是谁也没有错的：这是因为，竞争得并不激烈。最后，还必须谈到这一点：顽固独夫，按照一般的认识，按照他自己的确信来说，他是所有围绕着他而动作的事物的准则、中心与首脑；因此，虽然他自己什么都不做，可是别人的活动却是属于他的。进行活动的权利和方法就是由他所赐予的；倘使没有他，其余的人就渺不足道了，正象《肥缺》里面的尤索夫所说：“留神你一下，好，你就是一个个人啦，会呼吸啦；不留神你，——你又是什么呢？”所以，关于顽固独夫本身的无所事事，这是应毋庸议的。但还得谈一谈“黑暗王国”的另一半，谈一谈我们叫作被压迫者的人们。在这里，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得劳动。当然，这种劳动不是自由的，不是独立的；劳动者一切都以顽固独夫的癖好为依归，而且常常被强迫做一切他们完全不该做，也不愿做的事情……让我们回忆一下，安特留莎·勃鲁斯柯夫怎样拚命要去求学，米佳怎样努力“教育自己”，他们又怎样不成功吧。可见他们在自己的活动中，所以被压迫得很厉害，也正是由于自己的地位毫无保障的结果，他们的物质资料要以顽固独夫的先入癖好为依归的结果……然而他们却仍旧还可以希

望，顽固独夫不至于突然把他们撵走或者丢弃；他们毕竟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还可以给顽固独夫带来好处。假定说托尔卓夫也象《肥缺》里那个维斯涅夫斯基对待职员们一样，不重视自己的伙计，那末，每天都可以把他们更换的。可是在这被换走的位置上，总得有一个什么人确定下来；因此，一般说来，托尔卓夫对于人们总是有所需要的，而因此，虽然由于他的保守精神，却还不至于平白地斥逐那些并不违抗他，而是逢迎他的人们。加之，不管这些男子是次要的或是附属的，他们所做事情的本身，还是要求他们有某种程度的发展，因此，一个男孩子的知识范围，从童年时代起，甚至就是照勃鲁斯柯夫的看法吧，推想起来，也要比女孩子的更要大大的宽广。例如，安特留莎·勃鲁斯柯夫，在他父亲的工厂中，——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为了这一点他就得多少留心一些什么东西，纵使 he 不能作什么有系统的必要的学习。可是这同一个安特留莎的母亲，对于女儿们，却又十分天真地说：“女儿是什么东西！女儿，简直可以把她们关起来，用不着怎样给她们操心——不论是读书，不论是别的。”照她的意见，对于女儿们，只需要监督，防范她们少接近小伙子，一直到嫁丈夫就是了；到了那时候，做丈夫的自会防范他的妻子避开闲人们的……在所有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观察过的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中，我们看到了他那“黑暗王国”的一切住民对于妇女们表现了怎样彻头彻尾的蔑视，这种蔑视尤其无可救药的是，它已经完全达到温柔敦厚的地步了。在这种场合甚至连这种程度的愤怒都没有，例如吧，象一个绅士怀着这种愤怒去斥骂一个敢于提起关于农民问题的商人似的。在那种愤怒中，无论它怎样自高自大，毕竟还是可以看出来一种胆怯的注意，一种模糊的自觉，知道在对方身上多少还是有一些力量的；因此蔑视的声调就比较技巧些。可是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中的“黑暗王国”里，在丈

夫对待妻子，父亲对待女儿的态度中，却找不到什么同样的东西。这些绅士并不对妇女的意义表示愤怒，也并不一本正经地去反对它；他们甚至允许自己的妻子跟他争论，……然而他们的脑子里根本放不进这样的思想：妇女也是跟他们一样的人，有她们自己的权利。而且连妇女们自己都不这样想。“女人算是什么！鸡不是鸟，女人也不是人”，——她们跟《节日好梦》中的尼契金娜一起这样反复说。她自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得不到，在社会中也不起什么作用，也并不在什么事业中占据什么地位。无论她变得怎么样，她只知道顺从父亲，顺从丈夫……她毫无怨言地服从这个原则，因为她认为这是应当这样的，这是自古已然的，这就是她的命运……她想要表现自己的意义的那种怯懦的企图，只局限在这一种谈话——象《性格不合》中，邬丽塔·尼季基斯娜跟卡尔普·卡尔贝奇所作的下面这一类的谈话。我们现在要征引这段对话，因为在这场对话中，除了证实我们的见解以外，我们还找到一个奥斯特罗夫斯基才能的范例，他善于运用这种才能，来传达到处在“黑暗王国”里泛滥的庸俗和愚蠢的不可捉摸的特征，这种庸俗和愚蠢，连同专横顽固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基础。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煮着茶）现在只有古派波纹绸最时行。

卡尔普·卡尔贝奇 什么波纹绸？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这是一种衣料。

卡尔普·卡尔贝奇 好，去它的吧。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我是这样想……要是绥拉菲莫契卡出嫁了，我真想替自己做一件……一班太太现在都穿这个。

卡尔普·卡尔贝奇 难道你也是一个太太？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当然是太太。

卡尔普·卡尔贝奇 你可以这样想，——我可实在听不惯这个词儿……当你把自己称做太太的时候。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太太这个词儿有什么不好？这个词儿里面……(寻找字眼)有什么不体面吗？

卡尔普·卡尔贝奇 只要我不喜欢！这就是了！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那末，绥拉菲莫契卡是不是太太？

卡尔普·卡尔贝奇 当然是太太：她有学问，而且又嫁过贵族。你是什么东西？你左右不过是个村婆子，现在你丈夫有钱了，你算是个太太啦。要靠自己的聪明做到太太才算希罕。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不！我到底是……可不是吗！

卡尔普·卡尔贝奇 告诉你，给我闭嘴，这就完了！（静默）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那一场仗是什么时候打的？

卡尔普·卡尔贝奇 什么打仗？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唔，就是不久以前的那回。难道你不记得啦？

卡尔普·卡尔贝奇 那又怎么样呢？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有许多平常人物当了军官。

卡尔普·卡尔贝奇 他们又不是村婆子。每个人都应当接受他合适做的事情。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可是前回不是有一个女人到我们这儿来，说什么，等到她侄子毕业以后，她也是一个贵太太啦。

卡尔普·卡尔贝奇 好吧，等着瞧吧。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人家说，不知在哪一个国家，有女人

编成的军队。

卡尔普·卡尔贝奇（笑起来）是近卫军！（静默）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人家说，喝茶是罪过的。

卡尔普·卡尔贝奇 这又是为什么？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因为——这是从异教国家传来的。

卡尔普·卡尔贝奇 从异教国家传来的东西，真不止这一些。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譬如，面包是从基督教国家传来的，我们到时候就吃它；可是茶——是什么时候喝的呢？人家做祷告去，我们却喝茶；譬如现在人家在做晚祷，我们却在喝茶。这就是罪过。

卡尔普·卡尔贝奇 你却是到时候，总要喝的。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不，这到底是……

卡尔普·卡尔贝奇 到底是给我住口。你没有脑子，却偏偏喜欢说话。够啦，给我住口！（静默）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绥拉菲莫契卡是多么运气！她嫁过一个贵族——她就是一位太太啦；做了寡妇——到底还是太太。要是现在她嫁给一个爵爷，那末，她大概就是一个爵夫人了。

卡尔普·卡尔贝奇 到底还是要靠丈夫。

邬丽塔·尼季基斯娜 不过，要是绥拉菲莫契卡真的嫁了爵爷，我难道还是一点没有什么吗？她是我生的呀。

卡尔普·卡尔贝奇 跟你说话，脑子只会越搞越糊涂。我在这里考虑事情，你却偏在这里说些蠢话。你那村婆子的废话，一辈子都听不完。告诉你，给我住口！这样事情就完啦。

在这场谈话以后，卡尔普·卡尔贝奇自己寻思道，“婆子们你不吓她一下，简直就对她没有办法”……她们，他说，想尽方法来引诱男人，“年轻的人，他要是没有经验，很容易被她们的妖媚引得发昏，可是一个已经明白事理，已经到了血气固定年龄的人，女人的妖媚，对于他，就毫无意义了，甚至反而觉得下流”……在“黑暗王国”中，大家都从这一面来观察妇女，甚至这样还是算作一种恩惠……显而易见，东方见解的残余，到此刻在这里还十分显著。妇女们固然还不至于象在东方似的，被公开在市场上买卖，然而却不能说，她们根本没有被买卖。甚至买卖的方法也要远比前者来得荒谬、无耻，这可以从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各种不同的喜剧里所描写的几个媒婆的例子中看出来。我们不想讲到这些人物，因为就是这样，已经把读者的忍耐浪费得太久了；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指出《穷新娘》中做媒的一场戏。这整个的剧本就是以彻底的单纯和平凡见胜的，而缺乏，例如吧，象在《肥缺》里库库斯金娜寡妇所发表那套议论的一切尖锐性。可是，虽然如此，替女孩子说媒，母亲关心女儿的出嫁，关于女婿的谈话——这一切还是要使得一个对这喜剧作深思的人感到恐怖……马丽亚·安特列耶夫娜的母亲安娜·彼得罗夫娜，——她是一个衰弱、虚胖、善遗忘的女人，正象她自己所介绍。她的每一步都显明地表现出，她的大部分生命也都是在一种压迫底下长大而且熬过来的，这种压迫夺去了她的各种能力以及对于独立活动的趣味。她什么都不能思索，她不知道应该去面对谁，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无缘无故地忙来忙去，奔来奔去，老是抱怨着女儿，这么长久还不嫁丈夫。她认出自己是一无用处用的，她不断地说：

“要是家里没有男人，我简直就不知道了……我们坐在

这儿，我们懂得什么……万一有巡警拿什么字条来，那时候谁又能够来辨认呢？你看女人的命是多么糟糕！好象傻瓜似的奔来忙去……整个早上，还不能把钱算计清楚……要是没有男人，那我简直就不知道了；这种时候，就是没有祸事，也已经坏透了。”

您瞧，这大约就是那种在丈夫面前，或者在无论哪一个比她强一点的人面前，连气都不敢透的可怜虫。然而专横顽固的空气连她都沾染上了，她也不择手段，毫无理性地摆布着女儿的命运，叱骂她，呵责她，提醒她听从母亲是她的义务，一点影子都显示不出，她是了解人类的感情，以及人类的活跃的个性是什么的。这一切都是专横顽固精神的锻炼的直接而毫无疑问的征象，这种锻炼只是证明了它就是对付最低能的人，要影响他也是何等的容易。对于专横顽固，大家都知道，它是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称呼的。一般说来，在“黑暗王国”里，就是那么受压迫和轻视的妇女，也可以发挥她的专横暴虐，这还有什么说的！例子有邬兰别柯瓦……。孩子们与老人们，商人，官员，地主，——这一切人，只要谁愿意，一有可能，就可以实施专横暴虐……譬如拿一个被大家所轻视、被大家打击和污辱过千百次、在一切人面前都要发抖的人来说，看起来，他是那么和顺，连水都不敢去搅混！……然而要是他一旦养了一个孩子，或者有什么养子、奴仆、从属者落到了他的手里——他就会立即对他们专横暴虐的，而同时却又不停地对那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不向他鞠躬的人发抖战栗……“黑暗王国”就是这样建立的，它的宗法制度就是这样规定的；在这儿，一个人的个性，甚至连很少的意义都没有……正象勃罗达金所表示，“大部分事情都是因为按捺不住才会做出来，要不然，就是因为愚蠢。”

在第一篇关于“黑暗王国”的论文中，我们已经努力指出，那种最沉重的罪行怎样在它里面实现，那种最无人道的关系怎样在人与人之间树立起来——没有特别的怨恶和险毒，而仅仅是由于一种最偏狭、最混沌的见解所产生的愚昧和顽固。我们向读者提醒这一点以后，在这里只想指出：安娜·彼得罗夫娜就是这种出于愚蠢的不道德的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她对女儿的态度是极端地不道德的：她每分钟都在用她的不间断的抱怨和叱责，折磨着马辛加，把她弄到神经恐怖地紧张，弄到精神错乱的地步：

“我生你出来，抚养你成人，你就这样来报答它啦！……你只管逞你的性子，不去找寻丈夫，叫你母亲在这衰老的年龄，还要哭泣……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呀；叫我在衰老的年龄，躲到哪儿去呀——难道让我住到厨房里去吗？你只管逍遥作乐，把母亲就忘掉啦，什么事情都不肯替母亲做……说不定，万一碰到几个善心人，他们倒不会舍弃老婆子的！”^①

她就用这一套话每天、每个钟点，在马丽亚·安特列耶夫娜面前经常反复的说。对于女儿有着这种唯利是图看法的母亲，这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呵！在她的身上，那种虽然还只是轻微地触到她，和她的性格根本不相合，但却还是要使周围的人不能忍受的专横顽固习癖的特征，不是很明显吗？这样的个性和这样的态度应该使人觉得由衷的愤慨……可是安娜·彼得罗夫娜却以她的异乎寻常的善良与见识浅薄把我们解除武装。在她的心里并没有一定不移的不道德，而只是因为在她的躯体里，缺乏道德性，

① 与一九四九年版《奥斯特罗夫斯基全集》中的文字，略有出入。

缺乏各种人道主义的原则。把女儿出嫁——这是她的偏执；在这件事上你能跟她怎么办呢？至于她强迫马莎同意嫁给别涅伏林斯基，这是由于两个原因而产生的：其一，别涅伏林斯基愿意负责给她们到元老院里去奔走，其二，她简直想象不出，无论嫁给哪一个人，对于女孩子就会有什么不同。当马辛加宣说，别涅伏林斯基跟她合不来，对这一点安娜·彼得罗夫娜简直怎么也想不透，——开头，她没有怎么注意，只是说，马莎的头脑里塞满了胡思乱想，还说，她自己就会把自己的打算作二十次的改变，——可是后来，在女儿作第二次的拒绝以后，她就把它解释作，“这不过是使性子，只不过故意想出什么来，跟母亲作对。”然而必须指出，关于别涅伏林斯基，她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也不赞成。在结束的一场，当一切已经终结的时候，她忽然想到了，对马莎说：“你爱不爱他？我应当承认，事情是搞得快了一点；可是谁又知道呢，——又不能爬进他里面去。”对付这种天真你能怎么办呢？甚至对她生气都不可能……你只会觉得奇怪，而且更加凄然地来审视那些类似的人物就在这里面成长和苟且偷安的环境。

马丽亚·安特列耶夫娜，这个单纯、智慧不大发展、然而禀性温婉和高贵的姑娘，就在这个环境里遭受折磨。她最受折磨的，就是母亲急于要把她摆脱开，她不满意于媒人，就自己亲自四面去物色女婿。进行这一切事情的细致性达到何种程度，这可以从——例如吧，安娜·彼得罗夫娜的朋友、善良的老人陀勃罗特伏尔斯基写给她的信中，看明白：

“关于您要我效劳的一点，”他写：“我已经到您所指定的地方去过了；并没有什么配得上马丽亚·安特列耶夫娜的独身官员；只有一个，但我怀疑，您是否会喜欢，因为他的

身材很高——远高出寻常的人——而且是个麻子。不过，根据我从秘书以及他的其他同事那里打听到的消息，他却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也不喝酒，因此，我又觉得您是会非常满意的。是否尚须到其他地方进行察访，倘蒙吩咐，我当竭诚奉行。”

安娜·彼得罗夫娜还强要马辛加自己诵读这一封信！自然，这个可怜的姑娘是感到屈辱了；然而做母亲的却怎么也想不通，这里也会有什么屈辱的！

为什么这个不幸的姑娘要忍受这一切侮辱呢？在这深渊里，她能够倚靠些什么？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她是一个贫穷的新娘，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获得庇护，没有什么办法，除了等待或者找寻有利的女婿以外。出嫁——这是她的责任、她的工作、她的前程、她的生活的使命。正象打杂的找寻工作，官员找寻位置，乞丐找寻施舍，女孩子也应该找寻她的丈夫……现代的自由主义者是会对这种事情发笑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姑娘要是不去嫁丈夫，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又能怎么办呢？假使我们仔细想一下，那就会明白，安娜·彼得罗夫娜说得非常有理：

“不嫁丈夫的女人这是什么呢？简直不成样子！……她这算是什么意思？一个寡妇情形已经不大好了，一个姑娘家也要这样简直糟透了！女人应该和丈夫在一起过活，管理家务，教育孩子，你倒预备做一个老处女，编结袜子吗？……”

这些话是在愚蠢中透着公正的，它们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十分肯定的回答：为什么我们的女子在家庭中，会落在这种奴隶

的地位，为什么专横顽固要以特别沉重的力量来压迫她。

如果她的手头有钱的话，是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已经在《性格不合》中，描写过女人生活的这一方面了。那个文雅的波尔为了要向妻子要钱用，对待她就非常小心谨慎和顺从。然而就是金钱本身，在女人手里的意义，也不知道为什么跟在男人的手里不一样。我们对于随便什么顽固独夫的财产的看法，总是很快地就和对于他的个性的看法，融化在一起，这大约是因为，他究竟可以让自己来支配自己的钱，自己加以运用。因此，每一个人一和有钱的人发生关系，总是拚命想尽可能多分享他一点利益；可是到得和有钱的女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干脆只操心如何去占有她的财产了。至于女人个性的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那个谨守她的双亲大人的训海的绥拉菲玛·卡尔波夫娜，对于这一点，就了解得很透彻。她在出嫁的时候，预先允诺，不给丈夫什么钱，她说：“我要没有了资本，那时候我会怎么样呢？我真是什么都不值得了。”——她的双亲大人就以意味深长的“那个自然！”来回答这一点……在出嫁之后，她果然牢守她的诺言：逢到丈夫向她要钱了，她就跑到爸爸那里去，还写了一封信给丈夫，在这封信里，她顺笔解释了这样的哲学：

“到得我没有钱的时候，我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时候我就什么意义都没有了！到了我没有钱了，——我可以去爱一个人，但是相反，这个人却不会爱我的。可是到了我有钱的时候，——我要爱谁，谁就会爱我，这样我们就幸福了……”

真的，绥拉菲玛·卡尔波夫娜的判断是正确的！……

然而要使钱落在女人的手里，这种情形是很少有的。要达到这一点，她得很早就做一个有钱丈夫的寡妇。要不然——钱怎么会落到她的手里呢？而且她又怎样去发落它们呢？她们会按照年龄和爱好的不同，把它花费在时髦的店铺里，或者布施给修道院。此外，她就无能为力了。最好自然是把钱用在实际而重要的地方……可是按照法律，女子在财产中，只能获得十四分之一，倘要越过法律，那是不应该的……那么到底还是一样：女人无法持久掌握金钱……除非她替自己买一个好的丈夫……但是就是这种好丈夫，也几乎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能够做有钱的未婚姑娘的夫婿的，都是那些维霍列夫、巴伦契夫斯基、巴尔查明诺夫、普列日乌夫……这一批先生，都属于《节日好梦》中的涅乌叶琴诺夫所形容的那种类型：

“有的人去钻求工作，不管它什么都干，一年做不满一星期，就摇摇尾巴，看出——这太难啦，脑子不够用，学得太蹩脚了，连二加二都不会，懒惰比他生得还早，可是他却要按照绅士的气派过日子；于是就跑到街上去蹀躞，去放荡作乐，——能不能发现有钱的傻瓜……”

实在的，这些先生都是这样漂亮而又愚蠢，想起他们来就叫人作呕：他们大部分或者去当差，或者打算到军队中去服役，他们都倾向于专横顽固，而且最喜欢人家把他们当作有教养的人。然而他们在各方面的愚昧无知，是和顽固独夫本身的昏暗愚昧不相上下的，唯有依赖这种专横顽固制度去禁止下层的人们、尤其是妇女们去求知学习，他们才不至于在这一群人里面显得可笑。在分析《各守本份》的时候，我们已经充分谈过，为什么阿芙陀季霞·马克西莫夫娜能够被维霍列夫所引诱。这里只消附加

指出在《穷新娘》里，马丽亚·安特列耶夫娜对梅里契那种同样的关系。我们预先就避免去分析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的种种场面和人物中的局部的艺术价值；因此我们不想详细地去分析梅里契的性格。然而却不能不指出，这个人物，就技巧方面说来，是很使我们惊奇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善于用这种技巧在他身上描写出一个体面的、并不恶毒、也不可厌，然而从头到脚都是虚伪的人。这并不是那种在我们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有好几个标本的典型的一个摹写：他不是奥涅金，不是彼巧林，甚至也不是格鲁斯尼茨基^①，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多余的人。在那些人身上，到底还有一些内在的什么东西，他们以此作为他们的价值，以此为可贵，想象自己是满怀着这些东西的。糟糕的只是，他们的性格却是脆弱的，而且缺乏严肃的发展，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进入他们的意识的奥底，他们不能以整个灵魂来奉献给随便什么东西。然而在梅里契的身上，就是连这种不深刻的观念也都没有：一切真理，一切严肃的感情和愿望，好象都从他那里跳走了；他好象不但从来没有度过有意识的生活，甚至根本就不了解，这会有什么意义……无穷无尽的虚伪，一点没有做作，一点不加文饰，出于天性的真正的虚伪，在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中反映出来……那个并不愚蠢而且怀着优美感情的女孩子，就热恋着这样的人！……这就是专横顽固的教育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尽可能把年轻的个性加以束缚，加以压抑，尽可能使这种个性长期留在漆黑一团的黑暗里。

马丽亚·安特列耶夫娜是贫穷的，因此，梅里契当然不会去娶她；他也是属于那些需要娶一个有钱的妻子的人。然而在“黑暗王国”中，也有这样的事情，一个糊涂的穷光蛋也会娶一个贫

^① 格鲁斯尼茨基也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人物。

穷的姑娘……于是那种地狱里的苦难就从这里开端了！……这种苦难在《肥缺》里，已经被奥斯特罗夫斯基很出色地描绘下来了。我们的读者当然都记得年轻的查陀夫的故事，他是一个重要人物的外甥，他因为他的自由主义使得舅舅生了气，失去了他的照顾，后来，他就娶了那个漂亮而善良，但却贫穷而愚蠢的波林娜做妻子，他忍受了若干时期穷迫之后，就抱怨起妻子来，又回到了舅舅那里——请求谋一个肥缺。描写这些家庭关系，并且指出它们对于社会活动的影响，在我们看起来，就是这个喜剧最好的一面。其次，令人感到兴味的，还有那些我们在外表上是这样鄙视的、要给他们烙印上作奸犯科与贪赃枉法者称号的人的内在的、精神的一面的生活。奥斯特罗夫斯基才能中一个重要的特质，在这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善于窥视人的灵魂，把他的不受外部环境节制的人性的一面，描写出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分析《自己人》的时候，已经说过许多，因此，现在只想指出对官吏们特别有关系的一些特征。还在《穷新娘》中，就已经通过那个善人陀勃罗特伏尔斯基，把贪赃者的大度与别出一格的廉耻心的某些简略轮廓勾勒出来了。然而在《肥缺》中，这些轮廓通过尤索夫和别洛古博夫，却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人物直率地使我们浮起这样的思想，所有他们的枉法行为——纯粹是他们在社会中虚假的地位以及因虚假的地位而获得的虚假的观念所造成的后果。而他们的虚假的地位则又是“黑暗王国”一切卑鄙龌龊行为的共通原因——专横顽固的结果。这种专横顽固在官吏们的世界里，比之在商人中，更要显得恶毒和可恨，因为在这儿，事情常常要牵涉到公共的利益，并且以权利和法律的名义作掩护。除此之外，在这儿，我们还看到了不计其数的背景和等级；地位越是高，这种专横顽固的内部就越是显得狰狞无耻，对公共福利就越是显得有害，而在表面上，也越是显得

庄严和道貌岸然。当尤索夫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那些小官儿对待他，好象对待一头恶小狗一样；尤索夫对待别洛古博夫，就已经不是那样粗暴了；维斯涅夫斯基曾经以这种自得的声调对尤索夫讲，我们的心里只应该怀着虔敬，一点都不必觉得内疚。可是在实际上，在维斯涅夫斯基的衙门里，一切麻烦都是由于他自己传染上了专横顽固的习气，大家都跟从在他后面而发生的。谁也不承认随便什么法律，谁也不明白荣誉是什么，他们的智力除了判断发财的方法，就不会做别的，他们最重要的美德，就是承认应该对长者表示恭顺。尤索夫天真地承认，他不想对什么人表示骄傲，不过他不喜欢现在这批受过教育的人们的目空一切：“对付这种人，”他说，“我是严厉，而且苛刻的；我的规矩是这样——我用种种方法逼迫他们对工作有好处；因为——他们只会带来损害。”用不到奇怪，他有这样的看法，因为他自己“就有两年给人家跑腿，去干各种差遣：有时去沽伏特加，有时去买馅儿饼，有时有谁酒醉以后头痛了——还得替他买喀瓦司^①，——而且坐的也不是椅子，而是坐在窗子旁边的一堆纸上，写字也不是从墨水瓶里蘸墨水写，而是从用旧了的生发油瓶里，——我就是这样踏进社会来的，”——现在他承认，“这一切事情都不由我们作主，是上帝！……”因此，他所以压迫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既非出于恶意，也非出于欺诈，而是在实际上，他的心里已经形成这样的见解：他们对于服务尽职只有害处……这同样的见解又传授给了别洛古博夫，他说：“学问有什么好处呢，人倘使没有畏惧，——在长官面前不发抖的话。”他们是无法作别种想法的，因为一切围绕着他们的事物，每一步都在证实他们的意见。甚至是那些同他们发生争论的有教养的人，——他们也是多么

^① 一种清凉饮料。

频繁地以自己的行为来暴露自己的错误！——查陀夫就碰到这样的事。开头，别洛古博夫在查陀夫的面前，很有点儿畏缩，承认在他的智力的优越中包含有某一种力量。他模糊地感觉，低声下气，阿谀逢迎，依靠别人突然出现的奇想，抛弃自己的意志——这不会一直都是轻松愉快的。别洛古博夫看到查陀夫在他的行动中，要比他自由得多，比他更少依赖性，他就几乎有点羡慕他了。对于他的未婚妻问他的问题，为什么他要把婚事拖一拖，而查陀夫却并不拖延自己的婚事，他回答：

“这根本是另外一回事。他的舅舅是有钱的人，而且他自己又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到处可以有他的位置。即使做个教员吧，——也总能挣到面包。我能怎么办呢？只要长官们不给我位置，我就什么办法都没有……”

然而当别洛古博夫获得了这个位置，同时查陀夫却失掉了他的位置以后，他却开始对查陀夫感到一种自满的怜悯了，他在酒馆里碰到查陀夫时，就这样对他表示。真的，没有畏惧的学问，对于查陀夫有什么用处呢？只有这种用处：他折磨自己，把他的妻子整整折磨了一年，最后，又跑到舅舅那里去，恳求把别洛古博夫的位置给他……于是做舅舅的就给他一顿应得的责骂……“看呵，”他说，“他们这批英雄！这个年轻的人，他在十字路口到处叫喊什么贪官污吏，谈论什么新的一代，——现在却跑到咱们这儿，恳求赏给一个肥缺，可以收受贿赂！……好一个新的一代！”

总之，维斯涅夫斯基，是在status quo^①的观点上确立他的

① 拉丁语：维持现状。

看法的，他非常合乎情理地把查陀夫高尚的言辞打得粉碎，并且正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他向查陀夫证明，在现在这种事物的规律中，不可能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正直清白。正直清白的方法所能获得的是忒渺小了，而且就连这一点也不会轻易给那种不愿意逢迎，却要来反抗的人的。这并非是不幸的偶然，而是沉重的必然，这种必然就是从这种已经在“黑暗王国”里得到发展的专横顽固制度中直接而不可避免地迸发出来的。“即使他十分聪明伶俐，但要是您不喜欢，那还是只好渺不足道；这是他自己的错处：谁叫他不会博得您的恩典呢。”看吧，这就是“黑暗王国”全部法则，全部哲学！所以根本用不到奇怪，当尤索夫知道了维斯涅夫斯基整个衙门都被告发的时候，表示了这种比较真诚的见解，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对骄傲的处罚……”维斯涅夫斯基也做了同样的，但稍微要合理一点的解释，“我升得快，”他说，“发财发得太触目——使得有势力的人都来反对我了……”于是，这两个长官在这个解释上达到一致以后，对于自己的行为合法性，已经完全心安理得了……真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心安理得呢，当他们的活动也跟他们的一切见解和欲望一样，是和“黑暗王国”中的事情的总趋势以及“黑暗王国”的结构这样谐和的时候？

“然而，从这种黑暗中，总应该有什么出路的呀？……奥斯特罗夫斯基，既然能够这样忠实而完全地向我们描绘‘黑暗王国’，能够把这个国度里的居民的形形色色指给我们看，能够使我们窥视他们的灵魂，使我们捉摸到人性的某些特征，那末就应该指示我们有可能从这种黑暗的深渊里获得自由世界的出路……要不然——这未免太可怕了——我们陷在无法解决的抉择之中：还是饥饿而死，投到河池里去，发疯呢，——还是扑灭自己的

思想和意志，丧失一切道德品质，做一个别人的意志的奴气十足的执行者，做贪赃受贿的人，做骗子，以便安静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呢？……假使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全部艺术活动，仅仅是引导我们到这地步，这未免是太可悲了！……”

这真是可悲的，——但却是真实；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中，找不到“黑暗王国”的出路。而因此就应该归罪于这位艺术家吗？看一看自己的周围，去向这样萎顿而单调地在我们的周围蠕动的的生活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不是更好吗……诚然，置身在那个从奥斯特罗夫斯基戏剧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以各种各样形式咆哮叫嚣的专横顽固的致人死命的重压下，我们要呼吸是很困难的；可是在读完之后，把书搁在一边，或者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一个剧本表演完了之后，从戏院里走出来的时候，——难道我们不会恍然大悟地看到在自己的周围，正有无其数同样的勃鲁斯柯夫们、托尔卓夫们、郎兰别柯瓦们、维斯涅夫斯基们，难道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他们的致人死命的呼吸吗？……我们应该为了艺术家能够让我们在他们的辉煌描写的光华下，多少把这个黑暗王国观察一下，向他表示谢意。就是这一点，已经有很多的意义了……出路应该在生活本身中寻找；文学不过是把生活再现出来，它永远拿不出现实里所没有的东西……

但是，要从黑暗中挣脱出来的尝试，在生活里还是有的：就是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中，也不能置之不顾。只是这些尝试却是很可怕的，因此，它就依旧只不过是一种尝试。完全出生活的污泥而不染的纯洁人物，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里，我们还找不到。《肥缺》里那个梅金，也许是纯洁的，因为他什么公共职务都没有参加过，只不过“略微教点书”。可是从他跟查陀夫的谈话中，我们还不认识他，因此还不能给他担保。还有在

《穷新娘》中也有一个女孩子，她是这样可爱，有着这样高尚的道德，只要一见到她，就要跟随在她的后面，永远不再离开她。然而就是这个姑娘，也被别人的罪恶的泥污所溅污了。杜尼亚，这个别涅伏林斯基在结婚之前同她生活了五年的姑娘，现在，趁结婚时乱哄哄的时候，跑来了，她从人丛中望着她这个不久以前的朋友的新娘。她在小食堂似的穿堂里碰到了别涅伏林斯基本人，跟她在一起的是她的女朋友巴莎，她在这以前只是三言两语地告诉巴莎：他在喝醉酒的时候，曾经怎样对她发威肆虐……别涅伏林斯基一看见了，就红起脸来，请求她小心点儿。——“要不要现在就闹一场？”她说。——“蠢东西，蠢东西！怎么啦，你！”——别涅伏林斯基惊恐地叫喊起来，可是她立刻安慰他，答应，再也不到他这儿来了。后来，他就竭力打发她走路，于是在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下面这场戏，这场戏在我们的面前揭开了女孩子的感情，就其纯洁和崇高性来说是很使人吃惊的：

别涅伏林斯基 杜尼亚，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看一看新娘，
就走吧。

杜尼亚 已经见过啦。很可爱是不是，巴莎，——我应该说，
她真可爱！……（对别涅伏林斯基）只不过你能不能和
这个妻子一起过日子呢？当心，你可别无缘无故葬送
人家一辈子。那是你的罪过。可以收心啦，好好的过
日子吧。可不要象待我一样：过着，过着，结果就变成
这样了（擦眼泪）。

巴莎 可是你说过，你并不可惜他……

杜尼亚 在从前，我不是爱过他的吗……既然不能一辈子
过下去，那末总得有一个时候要分开。这还算好，他
结了婚，说不定，他会规规矩矩过日子了。可是到底，

巴莎，你得明白——一起过了五年……还能不可惜吗……当然，我从他那里得不到多少好处……多半是用眼泪过日子……挨到的只有耻辱。青春就是这样胡里糊涂过去的，什么都记不起来啦。

巴莎 怎么办呢，杜尼亚……

杜尼亚 可是也有过这样的時候，他来啦，我就觉得很高兴……留神，好好的过日子吧。

别涅伏林斯基 那，那个自然！

杜尼亚 这样才好。这一次你应当过一辈子啦，别象跟我一样……好吧，再见，不要记住我的坏处，好处我也没有。说实话，我是多么傻，竟然哭啦！呃，别提了吧，巴莎，——让我们忘记这种悲伤吧！

别涅伏林斯基 再见，杜尼亚。

杜尼亚 Adieux, monsieur^①！我们走吧，巴莎。（同下）

比这再要纯洁的道德感情，我们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的随便哪个人物身上，都看不到了。这已经不是鲁萨柯夫的女儿所显露的那种浑浑噩噩的善良，已经不是我们在柳薄夫·戈尔奇耶夫娜身上所看到的那种绵羊似的温柔，已经不是那奇亚奉以为指导的那些毫无经验的见解了……出于有自觉的决心的力量就在这段话的每个字里显现出来；这个姑娘的整个灵魂并没有被压溃，被扼杀；相反，它却更高扬了，被那种由于放弃自己对别涅伏林斯基的权利而产生的善良的自觉所照耀着。实际上，她要闹一场，使得内心畅快一下，这是很容易的；可是她不想这样做，她很坦白诚恳地给予新娘的美丽以公正的评价，而且她的心

① 再见，先生！

里为了她的旧朋友的幸福，而充满了喜悦。她满怀着宽大的感情，高兴着他结婚了，因为这使她希望他能够在道德上改邪归正……后来——她又多么愉快地，多么纯洁地关心着那个姑娘，关心着她那个竞争者……而，到得临末，那性格上动人的魅力，又怎样在这个要把它忘却的哀伤里，在这个断肠的诀别里表现出来，虽然，在这诀别里还不能不看到一颗到底还有恋慕之意的心灵的忧伤和愤懑……真的，这个姑娘在她的身上保持了心地的纯洁以及一个人所能达到的一切高贵品质的。然而她在我们的社会里又能怎么办呢？她难道没有被社会所抛弃吗？可是另一方面她所以能够在我们的面前，这样愉快地辉耀着她的心地的崇高和明净，难道不应该看作这是因为有了这种抛弃的缘故，——不就是因为远离开这种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是这样密布着的专横顽固精神的乌云的缘故？……

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那些喜剧中，还有一个显露着巨大道德力量的人。这就是——柳比姆·托尔卓夫。他肮脏，酗酒，阴沉；他已经被生活所败坏了，而且非常自暴自弃。然而就是这同样的生活，它一方面剥夺了他求生存的既有手段，使他低声下气，逼迫他忍受穷乏，同时却又给他这样的恩典，把他心里的专横顽固的基础都粉碎了。他是戈尔奇·卡尔贝奇的亲兄弟，照他自己所叙述，他从小就是一个顽固独夫，并不比哥哥差。可是当他不得不在冰雪封冻中为了五文钱扮演把戏，恳求布施，并且要指望哥哥的慈悲过活的时候，于是人的感情，真理的自觉，对贫苦兄弟们的爱，甚至对劳动的尊敬，就一下子在他心里苏醒过来了。柳比姆·托尔卓夫请求他哥哥把女儿嫁给米佳，接着补充说：

“他让我有一个角落安身；我已经冻得够了，饿得够

了。我的青春已经过去了，为了一片面包，在冰雪天里做把戏，实在太苦了；我至少要在这老年时候，规规矩矩过日子。我是骗过人的，我恳求人家做好事，我自己却把它都喝掉了。现在要是给我一件微小的工作，我就可以有自己的一碗汤喝啦……”

从这些愿望和认识中已经可以看出，穷迫已经真正在柳比姆·托尔卓夫的性格中，促成了转变，这转变迫使他觉得以前的专横顽固的习气，是和不久以前的放荡胡来一样是可耻的。

在托尔卓夫的例子中，可以部分地看出走出黑暗王国的道路；如果他的其他兄弟，戈尔奇·卡尔贝奇，也能受到这种叫着上帝保佑、去乞讨面包的教训的时候，那时候他大概也会感到为了正直地生活，“应该做点微小的工作”的愿望了……然而，不消说，戈尔奇·卡尔贝奇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敢于想象可以使他遭受同类的磨炼，因此，这专横顽固的势力，就仍旧可以对一切在他控制下的人，保持他的黑暗！……

可是关于教育之光呢？它在最后是应该把这种黑暗驱逐出去的呀。这毫无疑问！……可是请回想一下，我们已经谈过的关于教育怎样培植到顽固独夫身上去的情形……并且再回想一下，教育究竟给予维霍列夫、巴尔查明诺夫、普列日乌夫，给予里波契加、卡波契加、鄂斯金加，给予阿连娜·菲陀托夫娜一些什么结果……看一下你的周围吧，使你震惊的是一些怎样的场面，怎样的谈话。在那儿，黎斯波洛任斯基在说什么在一个荒凉的国家里，住着一个年老的老人和十二个女儿，她们都很年轻，他跑到十字路口去，——看能不能从慷慨解囊的人那儿得到点什么；在这儿，一只假扮的熊跟山羊在客厅里跳舞，在那儿，叶列姆卡玩着魔术，教堂的钟声尽着道德上改邪归正的作用；在那儿，有

人说喝茶是一种罪恶，等等，等等……而且还有这样的谈话！那斯塔西雅·潘克拉季耶夫娜说，不应该学得太多；于是涅尼拉·西陀罗夫娜就附和着说：“是呀，这就是读书的好处，我们那儿有一个邻居，打发儿子读书去，他读得眼睛都突出了。”或者，涅尼拉·西陀罗夫娜这样说：“年轻小子，应该听听老年人的话，你们还不知道人们是怎样狡猾”；那斯塔西雅·潘克拉季耶夫娜就证实着说：“是呀，是呀，我们那儿有个赶车的偷了一件长袍——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或者，再举个例吧：

尼契金娜 还有，您倒告诉我，人家说，法老皇帝每天夜里，都要带了军队渡海去。

巴尔查明诺夫 是的，这是很可能的。

尼契金娜 可是海在哪儿呢？

巴尔查明诺夫 大概，不会离开巴勒斯坦怎么远。

尼契金娜 巴勒斯坦大不大呢？

巴尔查明诺夫 是的，它很大。

尼契金娜 离开察里格拉得远不远呢？

巴尔查明诺夫 是的，不怎么远。

尼契金娜 大概是六十里吧。人家说，离开这一类地方大概总有六十里……只有基辅最远。

再请回想一下卡尔普·卡尔贝奇跟邬丽塔·尼基季斯娜——关于太太们的谈话吧！……还有赶车的关于奥地利的对话！或者还有——维霍列夫跟巴伦契夫斯基关于工业以及政治经济的谈话，或者普列日乌夫跟他母亲关于怎样在社会中露头角，或者涅陀彼金跟里萨夫斯基（在《一个年青人的早晨》中）关于美与教育，或者卡波契加与邬斯金加关于礼貌和公共生活（在《节日

好梦》中)的谈话。您瞧,这就是教育;教育对于象涅陀彼金、维霍列夫这些绅士,对于象里波契加与卡波契加这些女孩子,已经起了足够的作用了。可是它如果要做出什么更多的事情,顽固独夫就不准许了!……而且就是这样,他们还要说,为了对事业有利,应该尽可能压迫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所看到的有教养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呢?他们害怕的是谁呢?查陀夫!可是查陀夫自己却又承认,他没有意志,毅力也不够……

可是说实话——如果连查陀夫都变得可怕的话,专横顽固是应该变得衰弱了!……这倒是很好的征兆!……

最后,我们就停留在这个良好的征兆上。我们不想做出任何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才能的一般结论。我们已经努力指出,他凭着他的艺术家的感觉在俄罗斯的生活中,把握到了什么,而且怎样去把握的,他把他所感受到的以及体会到的东西,通过什么形式传达出来,还有在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种种现象,在我们的见解中,应当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中,找到了俄罗斯生活完整的图画,连同它的波德赫留静的长外套,维霍列夫的手套,那奇亚的泪迹斑斑的手帕,查陀夫的手杖,以及托尔卓夫那顶顽固而丑形怪状的帽子……有许多东西我们还没有说透彻,而相反,关于有的问题,却说得太冗长了;可是这要请求有耐心读完我们的文章的读者们原谅。〔我们所不得不坚持的那种表现法——一部分是比喻——该是所有一切罪过中的最大的罪过。我们在谈到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人物时,当然,要想指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可是我们在主要方面,还是应当针对作者的想象所产生的作品,而不是直接谈论真实的生活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所发现的思想的共通意义,要求作广泛的传播,并且把这同一东西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反复加以叙述——这样可以弄得更明白,而在同时,却也要求能够保持

譬喻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于论题对象本身的要求，是我们必须给我们的文章采取的……有些事物，在这种比喻形式中，是怎么也不能满意地传达出来的，因此我们就以为暂时最好完全把它们搁在一边。〕但是，也有许许多多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说透彻的结论与断语，那是自会在那些有耐心和注意力把文章读到底的读者们的思想上出现的。

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①

（《前夜》，伊·谢·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俄罗斯通报》，一八六〇年，第一、二期）

[Schlage die Trommell und
fürchte dich nicht. Heine.]^②

审美的批评，现在已经变成多情姑娘的癖好了。纯艺术的信徒们，在和这些姑娘谈话之间，可以汲取到许多细致而正确的意见，从而写出这一类批评^③。“这就是屠格涅夫君新的小说的内容（叙述了内容）。从这简略的轮廓已经可以看出，这儿有多少最新鲜、最馥郁的生活和诗。然而只有阅读小说本身，才能使你领会对生活中精细入微的诗的色彩的敏感，领会尖锐的心理分析，领会对社会思想的看不出的细水和巨流的深刻理解，领会对现实的亲切而又大胆的态度，这些就是屠格涅夫君才能的卓越不凡的特征。例如，你瞧，这些心理特征是被怎样细致入微地揭露出来（重述故事的一部分内容，然后是摘录）；您读一下这一段充满这种优雅美妙东西的奇妙场面（摘录）；请记住这个诗意的生动图画（摘录），或者这种崇高、激越的描写（摘录）。不是吗，这种描写透进灵魂深处，迫使您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使您的生命变得活跃起来，美化了您的生活，人的庄严，真、善、美这些神圣观念的伟

大而永恒的意义，就在您的面前高高的升起！Comme c'est joli, comme c'est délicieux！”④

我们还不熟悉多情善感的姑娘，因此我们还不会写作这种令人愉快和无害的批评。我们既然公开承认这一点，既然不想担当“公众审美趣味培养者”这一角色，——我们就挑选另一种比较平凡、比较和我们的力量相称的工作。我们只想把那些在作家的作品里所散布的、我们当作已经实现的事实、当作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生活现象的材料归纳一下。工作并不难，但却是必要的，因为在许多工作和休息之间，很少人会有胃口自己来观察文学作品的一切细节，对一切数字——对反映出我们社会生活某一方面的繁复的统计报告所从而组成的数字进行分析、考查，把它们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然后再考虑它的结果，考虑它预示的是什麼，要我们负担些什么义务。可是这一类考查和思索，一涉及屠格涅夫君的新的中篇小说，却是十分有益处的。

我们知道，纯美学家们马上就要责备我们，说我们拚命拿自己的意见去束缚作者，向他的才能分派任务。因此，得预先说明一番，虽然这是沉闷的。不，我们一点都不要束缚作者，我们要预先说，我们可不知道，究竟为了什麼目的，究竟为了哪一些先入之见，他就描写起构成中篇小说《前夜》这个内容的故事来。在我们看来，重要的还并不是作者要想说什么，而是他说了什麼，

① 本文最初发表在《现代人》一八六〇年第三期，曾被检查官大段删节。车尔尼雪夫斯基于一八六二年编辑《杜勃罗留波夫全集》时，将删节之处加以恢复。

② 德文：敲起鼓，别害怕。——海涅。

③ 杜勃罗留波夫在下文模拟的是纯艺术论的信徒：巴·华·安宁柯夫、斯·谢·杜台希金、亚·华·德鲁日宁和阿·亚·格利高里叶夫的批评文章的风格。

④ 法文：“这是多么美呵，这是多么动人呵！”

即使是无心的、即使单单只为了忠实地再现生活的事实。我们珍重每一种有才能的作品，就因为其中可以研究我们祖国生活的事实，倘没有它，普通观察者的眼光就很少能够发现这些生活事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到现在为止，还是缺乏公开精神，只除了官样文章；我们到处碰见的不是充满活气的人，而是在某个部里服务的官方人物：在法庭里，你碰到了录事，在舞会里碰到了跳舞的人，在俱乐部里碰到了赌棍，在戏院里碰到了戴假发的病人，等等。每个人都想远远隐匿他的精神生活；每个人都这样看着你，仿佛在说：“我到这儿来，为的是跳舞，或者是给你赏鉴赏鉴头发的式样；好吧，你就满足于这一点吧；我在干着自己的事情，你可不要动脑筋从我的身上套出我的感情和见解”。的确，没有一个人在套引别一个人，谁也不关心谁，整个社会都各走极端，都在抱怨：在那些正经堂皇的场合，譬如上演新歌剧，酒席宴会或者开什么会议的场合，不得不保持一致。一个自己不肯专心致志观察社会风习的人，又从哪儿去认识和研究生活呢？何况在我们社会的各种不同集群和等级里又是如此复杂多样，甚至还是互相对立的！在这个集群里已经变成平庸和落后的观念，在另一个圈子里——却还在热烈争辩；这一种人认为不充分和脆弱的东西，在另一种人看来，却是过分尖锐和大胆了，等等。至于什么东西崩溃，什么东西胜利，什么东西在社会的道德生活中得到确立和占据优势，——对于这，在我们这儿，除了文学，特别是它的艺术作品以外，就找不到其他证明了。作为艺术家的作家虽然不关心那些关于社会思想和道德状况的一般结论，但是，却总是能够抓住它们的最根本的特征，把它们明亮地照耀出来，并且直接把它们放在深思熟虑的人们的眼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一个作家只要被认为有才能，也就是说，只要拥有一种能够体会和描写生动逼真的真实现象的本领，那么由于这一

种承认，他的作品就使人有充分的理由，去探讨唤起作家写出某一种作品的生活环境，探讨它的时代。在这里，衡量作家才能的尺度就是，他所概括的生活的广阔到了什么程度，他所创造的那些形象，又是怎样巩固和包罗一切的。

我们认为所以需要说明这一点，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方法——以文学作品为依据，解释生活本身的现象。而并不把任何预先编撰好的观念和课题强加在作者身上，读者看到，对于我们重要的就是这些作品，生活在其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不是按照作者预先设定好的纲领而写的。例如关于《一千个灵魂》^①我们就根本不打算说什么，因为依我们的见解看来，这个长篇小说的整个社会的一面，是和预先构思好的观念强制凑合起来的。从而，这里除了谈谈作者把他的作品写得怎样巧妙以外，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要相信作者所叙述的事实的正确和生动的现实性，这就办不到，因为作者同这些事实的内在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也不是真诚的。我们在屠格涅夫君新的中篇小说中所看到的作者对题材的关系，就完全不是这样。在《前夜》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活和思想的自然进程这种不容反驳的影响，作者本身的思想 and 想象就不由自主地受这种影响所支配。

既然举出文学批评的重要课题，就是解释那些唤起某一种艺术作品的现实现象，因此我们就应当指出：这个课题在应用到屠格涅夫君的小说去的时候，有更特殊的意义。公正一点说来，可以把屠格涅夫君称为最近二十年在我们有教养的社会中占有

① 《一千个灵魂》，这是阿·费·庇谢姆斯基(1821—1881)所写的长篇小说，它发表在一八五八年的《祖国纪事》杂志中。杜勃罗留波夫所以对这部小说采取否定的态度，是因为这部小说有着自由主义的倾向，小说的中心不是进步的社会活动家，而是干一些“身边琐事”的英雄卡里诺维奇。

优势的那种道德和哲学的写生画家和歌唱家。他很快猜到了新的要求，猜到了渗透进社会意识里的新观念，在他的作品中通常〔一定〕注意到（只要情势许可）那些已经轮到、已经开始朦胧地扰乱着社会的问题。我们打算在别的机会再去研究屠格涅夫君的全部文学活动，因此，现在不打算详细谈论这一点。我们只想说，我们要把屠格涅夫君在俄国公众中间所得到的成功，极大部分都归给作者对社会中充满生气的弦索的这种敏感，归给这种立刻对刚刚开始渗透进优秀人们意识里的高贵的思想以及真诚的感觉表示反应的才能。当然，就是文学才能本身对这种成功也有许多帮助。但是我们的读者都知道，屠格涅夫君的才能，还不是属于有巨大才能之列的：他们通过诗的想象的唯一的力量，使你震惊，把你慑住，吸引你对你完全不会寄予同情的现象和观念表示同情。作为他的才能的主要特征的，不是一种激烈的、突发的力量，相反，却是柔和以及一种诗意的温文。因此我们认为，假使他接触的问题和要求是和读者大异其趣的，或者它们还没有在社会中被唤起来，他就不可能引起公众普遍的同情。有些人在他的小说中，发现了诗的描写的魅力，在各种人物和情势的勾勒中，发现了精细和深刻，但是，毫无疑问，要使作家获得持久的成功和光荣，光是这一点还是不够的。甚至每一个最有才能和最富于同情心的小说家，要是对于现代问题没有痛切的关注，他也不得不遭受费特君的命运，对这位费特君，从前虽然也有人赞美过，但现在在这些人中间，只有十来个爱好者还记得十来首较好的诗^①。对于现代问题的敏感的态度拯救了屠格涅夫君，使他在读者群里的经常的成功得到巩固。有一些思想深刻的批评

① 以鲍特金和安宁柯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贵族的批评，他们十分推崇费特的诗歌，想拿他来和涅克拉索夫抗衡。

家^① 从前甚至责备屠格涅夫君，说是在他的活动里，是这样强烈地反映着“社会思想的一切动摇”。然而尽管是这样，我们却看出，这正是屠格涅夫君的才能的最活跃的一面，同时这一面也说明了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人们总是抱着如此的同情、甚至几乎是热狂来迎接他的每一种作品的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说，屠格涅夫君在他的小说中，只要已经接触到了什么问题，只要他描绘了社会关系的什么新的方面，——这就证明，这个问题已经在有教养人们的意识中真正出现，或者快要出现了，这个生活的新的一面已经开始漏脸，很快就会深刻而鲜明地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了。因此，每一次，当屠格涅夫君的小说出现的时候，总会发生一个好奇的问题：其中描写的是生活的哪一方面，触到了怎样的问题？

现在，也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而且就屠格涅夫君新的小说看来，这一问题比任何时候更饶有兴味。到现在为止，可以看得很清楚：屠格涅夫君的道路，同我们的社会发展道路相适应，正在同一个方向上行进。他从崇高的观念以及理论上的追求这个范围出发，努力求得：把这些观念和追求贯彻到离开这些观念和追求很远的粗野和庸俗的现实里去。为了使自己的原则得到胜利而奔走的主人公准备斗争，受苦，接着他在人间平庸鄙陋的压倒势力之前屈服下来，这就是屠格涅夫君的小说通常的关心所在。当然，斗争的基础，即，观念和追求，——在每一种作品中都在改变其形态的，或者，随着时间和情势的流驶，说得更明确和深刻了。因此，巴辛柯夫就代替了多余的人，罗亭就代替了巴辛柯夫，拉弗列茨基就代替了罗亭^②。这些人物中的每一个人都比

① 杜勃罗留波夫这里是暗示《祖国纪事》的撰稿人杜台希金而言。

② 多余的人是屠格涅夫的《多余的人日记》(1850年)中的主人公，巴辛柯夫是他的《耶柯夫·巴辛柯夫》(1855年)中的主人公。

前面的人更果敢、更完整，但是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的整个生存的本质、基础，却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把一些新的思想灌输到某一个圈子里去，他们是启蒙者，宣传家，——虽然只是对一个女子的灵魂而发的，但总是一个宣传家。因此，人们就很尊敬他们，而且的确——他们在当时是人们所需要的，他们的事业是十分困难的，是十分可敬的，是十分高超的。大家怀着这样的爱去迎接他们，对他们的真挚的痛苦这样表示同情，这样惋惜着他们的无结果的努力，这不是无故的。当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去注意：所有这些先生都是杰出的、高贵的、聪明的、但在本质上却是懒惰的人，这也不是无故的。屠格涅夫君自己，在描写处于各种不同的情势和冲突中的他们的形象时，通常也总是对他们怀着令人感动的同情，对他们的痛苦感到衷心的疼痛，在读者群众之间也常常激起这样的感情。一旦这种斗争和痛苦的基调开始显得不足，一旦性格的高贵和卓越的某个特征开始被一种庸俗性所掩盖，屠格涅夫君就能找到别的基调，别的特征，而且又能够击中读者的心坎，又能够激起人们对自己以及自己的人物兴奋的同情。

然而，在近一时，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同号召追求罗亭以及他的所有弟兄们的生活完全大异其趣的要求，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了。在对待这些人物的态度上，在大多数有教养人们的见解中，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现在谈的问题，已经不是关于他们的追求的某一种基调，某一种原则的变体，而是关于他们的活动的本质。在那个时期，当所有这一切思想开通的真和善的保卫者，这一切能言善辩的高尚信念的受难者还在我们的眼前装模作样的时候，那些新的人就已经成长了，他们并不把对真理的爱以及愿望的真诚当作希罕的事物。过去，那些优秀的人在成熟之年不得不为之战斗、怀疑、受痛苦的一些见解和愿望，新的

人们从幼年时代起，就在不知不觉地、经常地摄收着了①。

因此，在今天的青年人的社会中，教育的性质已经获得另一种色彩。那些以前作为优秀人物标志的概念和愿望，现在已经变成最普通教育中第一个必要的属性了。今天，你可以从中学里、从中等士官学校里、甚至有时从规规矩矩的神学校里，也能听到那些在以前、例如别林斯基不得不为之争论、为之激动的信念的表现了。而且中学生或者士官生在说出这些概念，——这些以前经过战斗、如此困难地才能获得的概念时，完全是平静的，没有什么激动和自满，正象在谈论换一个样子就说不通，甚至就无从想象的事物似的。

现在凡是有相当水平的人倘使碰到一个有所谓进步倾向的人，可没有一个人会一味感到惊奇和狂喜，没有一个人会满怀无言的虔敬去看他，没有一个人会偷偷地握握他的手，低声邀请他上自己家里来，参加特选人们的集会，——谈谈枉法和奴役对国家的危害。相反，现在的人们可都带着不自觉的、蔑视的惊奇，来观察对言论自由、无私、解放之类缺乏同情的人。今天，就是那些衷心不爱进步思想的人，为了可以走进体面的社会，外表上也得装出喜欢它们的样子。面临这样的情势，很明白，以前的善的传播者，罗亭型的人们，就丧失掉他们以前极大部分的信用了。人们把他们当作旧时的教师而尊敬他们；然而凡是有独立智慧的人，很少有心思再去倾听以前在幼年时代和最初发展时期那

① 有一次，已经有人责备过我们偏爱青年一代人，还指出青年一代人中间，大部分的代表人物都全神贯注在平庸鄙俗和空洞无聊上。然而我们也从来不打算笼统地回护青年人，而且，这跟我们的目的也是不一致的。平庸和空虚也是一切时代一切年龄的人的特性。可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所谈的都是关于那些特选的、优秀的人们，而不是关于公众的，因为要知道不论罗亭，不论象他一类的人们，与其说是属于当代的公众方面的，不如说是属于优秀的人们之列的。但是，我们若是说，在最近，就在公众中间，教育的水平也到底有了提高，这也不能算是不对。——作者注

么贪婪地接受过的教言。现在已经需要另一种东西，需要走得更远了^①。

“然而，”人们会告诉我们说，“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它的极境；智慧和道德还可以继续向着完美而发展。因此，社会还需要领袖，还需要真理的说教者，宣传家，总之，是罗亭型的人物。我们假定说，凡是过去所接受的东西已经深入一般的认识中去了。然而这一点决不排除出现新的罗亭，新的、更高倾向的说教者的可能，于是又得奋斗，又得受苦，又会唤起社会对自己的同情。这个题目就其内容来说的确是无穷无尽的，它经常把桂冠带给象屠格涅夫君这样的富于同情的作家。”

假使这一类意见偏偏在今天得到证明，这倒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幸而，它看来是被我们最近的文学运动所推翻了。如果抽象地议论，就不能不承认，以为思想在社会中是永久在运动的、永久在变换的、从而就断言必须有这些思想的说教者的意见——是完全公正的了。然而，应该注意，社会并非只是为了议论和变换思想而存在的。思想和思想的逐步发展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它们是由已经存在的事实所产生的，因为事实在现实中已经先有了变化。某一种局势造成社会中某一种要求，这种要求得到了承认，在这种要求得到普遍的认识以后，为了满足已经被大家所承认的要求，就应当有事实上的改变。因此，经过某一

① 和这种看法相反的，似乎可以举出四十年代我们某些作家作品的出版所遇到的非凡成功来作证。别林斯基是其中最辉煌的例子，据说，他的作品迅速散布达一万二千本之多。然而，依我们的意见看来，这一事实却是我们的看法的更好确证。别林斯基是进步人们中最进步的人，他的同辈没有一个比他跑得更远，在一万二千本在数月中被争购一空的地方，罗亭简直想不出有什么可以做。别林斯基的成就所证明的完全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对我们的社会说来还是新的，要求多多努力加以传播，而正是因为它们现在对大多数人是可贵而神圣的，所以宣扬这些思想，现在既不要求新的活动家有什么英勇精神，也不要求什么特殊的才能。——作者注

种思想和追求的认识时期以后，在社会中就应该出现它们的实现时期；在思考和谈话之后应该继之以工作。现在假使问：在最近二十以至三十年间，我们的公众做了什么？暂时还没有做过什么。他们学习过，发展过，听过罗亭们的话，同情过这些人在为了信念而进行的高贵的斗争中遭到的失败，准备过工作，但却什么也没有做出来……在他们的头脑和心里蓄积着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而在既存秩序中却发现这么多荒唐和可耻的事物；“认识自己是高于周围现实的”人群，每年都在增长，——也许很快大家都会高出现实之上了……看来谁也不愿意我们继续永久地走那纷乱、怀疑、空洞的悲哀以及安慰的这种令人疲倦的道路。看来很明白，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不是那些越来越“高出于周围现实”的人，而是那些把现实本身提高到——或者教导我们提高到我们已经认识的理性要求的水平上的人。总之，我们需要实践的人，而不是抽象地、永远是伊壁鸠鲁式地^①议论的人。

这一种认识虽然还是混沌的，然而当《贵族之家》出现之际，已经在许多人身上显示出来了。屠格涅夫君的才能，连同他对于现实的正确感觉，在这一次，又引导他凯旋脱出困境。他能够把拉弗列茨基描写得你不好意思去讥笑这个人，虽然这个人也是属于无所事事这一类典型的，是我们要讥笑地相看的。拉弗列茨基处境的戏剧性已经不是因为他和自己的无力作了斗争，而是因为跟这样的见解和风习起了冲突——跟这些见解和风习进行斗争是可以把坚毅和勇敢的人都吓退的。他结了婚，后来抛弃了他的妻子；可是他爱上了一个纯洁而神圣的人，这个人是在这样的见解中教养出来的；如果爱上有妇之夫，这就是可怕的罪恶。但是虽然如此，她却也同样爱着他，他的要求也能够无

① 伊壁鸠鲁派追求享乐的感情、追求荒淫游惰的生活；至于这里，是指那些远离生活、远离现实要求的意思。

休无止地、可怕地折磨着她的心灵和良知。对于这种处境你不由得会忧郁而沉痛地思索起来，同时，我们也会记得，当拉弗列茨基和丽莎诀别，对她说：“唉，丽莎，丽莎，我们怎么才能够幸福呢！”还有，当她心里决定做一个顺从命运的女尼，回答：“您自己看吧，幸福不由我们作主，是由上帝决定的”，于是他开始说：“是啊，因为您……”没有把话说完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样疼痛地蜷缩起来。《贵族之家》的读者和批评家会记得，他们曾经为这个小说中其他许多地方而赞叹。可是在我们，它的最使人感到兴味的地方，就在拉弗列茨基的悲剧性的冲突，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被动性是我们不能原谅的。在这里，拉弗列茨基似乎一反他这种典型的一个属类的特征，他甚至并不是一个说教者。从丽莎去做祷告，他跟她第一次相见的时候起，在整个小说中，他总是在她的不可动摇的见解前面，胆怯地低下头来，没有一次他敢说出冷淡的话劝她不要相信。然而就连这一点，当然，也是因为在这儿，说教也是拉弗列茨基所害怕的一种工作，正象他的所有兄弟们一样。但是不管这一切，我们觉得（至少，在阅读小说的时候曾经感到），拉弗列茨基的处境本身，屠格涅夫君所选择的、在俄国生活中是如此熟悉的冲突本身，应当〔成为强有力的宣传，并且〕引起每一个读者对支配着我们生活的整整一大套概念的意义有种种的想法。现在，根据各种不同的文字上或者口头上的批评，我们知道，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正确：拉弗列茨基的处境的意义是被许多读者作另外一种理解了，或者完全解释错了^①。可是其中有一种真正的悲剧性的东西，而不是虚

① 在一八五九年间，斯拉夫派格里高列耶夫在《俄罗斯丛谈》中发表第三篇文章。作者在分析《贵族之家》时，得出结论说：我们在《罗亭》中发现它是指责对现实的“永久的无结果的抗议”，而在拉弗列茨基的形象中，则是肯定“对现实妥协”的必要。——原本编注

幻的东西，——这却很明白，这一点，连同艺术执行上的优点，吸引了所有俄国读者对于《贵族之家》表示一致而激动的共鸣。

在《贵族之家》之后，是值得为屠格涅夫君新作品的内容而杞忧的。创造一个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打击下的高贵性格的道路，已经变得十分难以捉摸了。在对《贵族之家》而发的欢呼声中，也听到了对这个大家有更多期待的拉弗列茨基表示不满的声音。作者自己认为有需要把米哈列维奇引到小说里去，这样一来，就可以使这个人去叱骂拉弗列茨基是懒汉了。而那个也在这时候出现的伊里亚·伊里奇·奥勃洛莫夫，却彻底而且尖锐地向所有俄国公众说明，现在一个没有力量 and 没有意志的人，与其经年累月无聊地奔跑、忙碌、喧闹、议论、扯淡，还是别惹人发笑，还是躺在沙发上。在读完了《奥勃洛莫夫》之后，公众会了解他和“多余的人”的耐人寻味的个性有血缘的关系，并且想象到，这些人现在是真正多余了，对他们所能期待的结果，也象期待于善良的伊里亚·伊里奇似的。“现在屠格涅夫君究竟创造出什么来呢？”——我们这样想，于是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来阅读《前夜》。

对当前一刹那的感觉这一次也没有欺骗作者。他既然认识，以前的英雄已经完成自己的业绩，不可能再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优秀人们那里激起以前那种同情，他就决定放弃他们，而去捕捉生活新要求的风向的一些断续现象，开始走上今天的进步运动正在实现的道路了……

在屠格涅夫君新的中篇小说中，我们碰到了另一些情势，另一些典型，这些情势和典型是和前一时期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所已经习见的不同的。对行动，对生气蓬勃的行动的普遍要求，鄙视死的、抽象的原则，鄙视消极的善良，通过新的中篇小说的全

部结构而表现出来^①。无疑，凡是打算来读我们的文章的人，现在都已读过《前夜》了。因此，我们不再叙述小说的内容，只介绍它的几个主要人物的扼要的轮廓。

小说的女主人公，就是那个拥有严肃的智慧风貌，坚毅的意志，人道主义的内心追求的姑娘。她的发展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是十分独特地完成的。

她的父亲和母亲是一种极无远见的人，但却并不粗暴；她的母亲甚至充分显出善良以及心地温柔。叶连娜从幼年时代起，就能避免受到家庭中专横顽固的荼毒，这种专横顽固把许多优美的天性在萌芽时就摧残了。她是单独成长的，没有女伴，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没有什么形式上的东西挤压着她。她的父亲尼古拉·阿尔吉米奇·斯塔霍夫，是一个有些愚笨的人，但却装出是一个怀疑主义派的哲学家，他对家庭生活是离得很远的，在开头，对这个很早就显露非凡才能的小叶连娜，只表示赞美。叶连娜，在她还是很小的时候，她也是崇拜父亲的。然而斯塔霍夫对妻子的态度，却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他娶安娜·华西里耶夫娜是为了她的妆奁，他对她并没有感到什么感情，他对待她简直带着轻蔑的态度，并且远远避开她，加入了把他搜刮一空、愚弄着他的奥古斯丁·赫里斯季安诺夫娜的社会。安娜·华西里耶夫娜是一个有病而多愁善感的女人，有点象《贵族之家》里的玛丽亚·狄米特里耶夫娜，她温柔地忍受着她的处境，可是却又不能不问全家的人，甚至还在女儿面前埋怨他。因此，叶连娜就立刻

① 屠格涅夫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写信给伊·谢·亚克萨柯夫讲到《前夜》的思想，他说：“我的中篇小说包含了这一种思想：自觉的英雄人物是必要的（当然，这里讲的不是人民），——这种人物可以把事业推向前去”。屠格涅夫所谓“事业”，不是暗示革命，而是即将实现的“改革”。他的意思是，那种自觉的英雄人物应当和凶恶农奴制拥护者进行斗争。——原本编注

成为她的母亲的悲哀的寄托，并且不由得变为母亲和父亲之间的裁判官了。由于她的天性上富于感受力，这对于她的内在力量的发展就有巨大的影响。她实际上在这种事情中所能做的越是少，她的智慧和想象所要努力的也越是多。叶连娜由于从幼小时候起就被迫观察了她的亲近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内心和头脑同时来解释这些关系的意义，对它们下判断，因此她很早就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对周围一切事物有自觉看法的能力了。斯塔霍夫家的家庭关系，在屠格涅夫君的笔下，钩画得十分简略，然而在这个钩画中，却有一种十分透彻地说明叶连娜性格的最初发展的深刻而正确的指示。就天性来说，她是一个富于感受力的聪明的孩子；她在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地位，很早就唤起她进行严肃的思考，很早就使她达到独立、自主的能力。她开始和年长的人站在同一水平，使他们变成她的评判对象。同时，她的思考并不是冷漠的，她的整个灵魂都和这些思考合而为一，因为问题关涉到的是同她十分亲密、她所最尊敬的人们，是和女孩子的最神圣的感情，最生动的关心互相连接起来的关系。因此，她的思考就在她的内心的情绪上直接反映出来。她从崇拜父亲转而向母亲表示热情的眷恋，在母亲身上她看到被压迫、受痛苦的人。可是在这对母亲的爱中，并不曾对父亲含有什么敌意，他既不是什么恶棍，不是十足的笨伯，也不是家庭的暴君。他只是一个十分普普通通的人，于是叶连娜对他冷心了，——本能地，而后来，可能也是自觉地断定，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爱他的了。可是很快，她又在母亲身上看到同样的平庸，于是在她的心里，代替热情的爱和尊敬，就只剩下怜悯和宽恕的感情；屠格涅夫君把她对母亲的态度钩画得十分成功，他说，她“对待母亲有如对待一个多病的老祖母”。母亲承认她比女儿低；至于父亲呢，只要女儿在智力上一旦长过了他，变得十分容易的时候，就对她表示冷

淡，断定，她变得古怪了，于是就离弃了她。

但在这时候，在她的身上，那种同情的、人道的感情却日益成长，日益扩大了。母亲的受欺压，在她的孩子气的心灵中，激起她为别人的受苦而哀痛，当然，这还在她真正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以前。她经常感觉到这一种疼痛，这一种疼痛在她每一步新的发展上都伴着她，赋予她的思想一种特殊的、沉思而严肃的性质，逐渐在她的心里唤起要活动的愿望，把这些愿望确定起来，从而促使这一切愿望热烈而不可遏止地探索有利于一切人的善和幸福。当叶连娜在和求乞女孩卡佳奇怪的相识中，给自己的思考和幻想找寻新的养料，给自己的同情和爱找寻新的对象时，这些探索还是朦胧的，她的力量还是贫弱的。在十岁那年，她跟这个小女孩交了朋友，偷偷地跑到花园里去同她相会，把糖果带给她，送给她手帕，十戈比的钱币（玩具卡佳是不要的），整整几个钟头跟她坐在一起，带着喜悦而顺从的感情嚼着她的黑面包；听着她的故事，学唱她的可爱的歌曲，怀着隐秘的尊敬和恐怖倾听着卡佳发誓说，她要离开那个可恶的婶母逃走，去自由自在地生活，她自己也幻想着，怎样背上背囊，和卡佳一起逃跑。卡佳很快就死了，可是跟她的相识，不能不在叶连娜的性格中留下深刻的痕迹。这次相识给叶连娜的纯洁的、人道的、富于同情心的精神添上新的一面；它启示她去鄙视、或者至少对富家生活的不必要的奢侈表示严厉的冷淡，这种感情永远浸透在这个由于看到了困苦无告的求乞者，因而还没有完全被奢侈所败坏的人的灵魂里。叶连娜的整个灵魂，很快就被对于真正的善的渴望所燃烧起来，这种渴望，在最初只是满足于做一些叶连娜能够做到的布施穷人这种习见的事情。“贫穷的、饥饿的、害病的人使她思念，使她不安，使她苦恼；她在梦中看见他们，她向一切熟悉的人打听他们。”甚至“一切受虐弄的动物，瘦削的看家狗，垂死

的猫，从巢里跌下来的雀儿，甚至昆虫和爬虫，也都在叶连娜那里找到荫庇和保护；她亲手喂养它们，并不觉得它们是可厌的。”她的父亲把这一切叫作庸俗的婆心；可是叶连娜不是多情善感的，因为多情善感的特点就是，由于完全缺乏真正的爱，感情和言语就变得过剩，而叶连娜的感情却一直在追求见之于事实。空洞的亲昵和温柔她是不能容忍的，一般说来，她是不重视没有行动的言论的，她只尊重实际有益的活动。甚至她连诗都不喜欢，甚至也并不了解艺术的意义。

然而灵魂的积极的追求，只有在阔大而自由的活动中，才能成熟而巩固起来。应当使自己的力量经过几次试验，经受失败和冲突，认识各种努力的价值，认识怎样去克服各种不同的困难，——为了获得进行积极斗争所必需的勇敢和坚决，就得知道本身力量的程度，善于给它们找到适当的工作。叶连娜，尽管她的发展有着一切自由，她却无法充分找到积极锻炼她的力量、找到满足她的追求的手段。没有人会妨碍她愿意做的事情，可是却没有什么可以做。她没有受到按部就班教育这种学究气所拘束，因此她能够不接受许多和制度体系、课程教本以及一般说和教育上陈规旧套拆不开的偏见而进行自我教育。她读了很多，而且是带着热情阅读的；可是光是阅读无法使她满足；阅读只能对她产生这样的影响：理智的一面在叶连娜身上发展得比其他东西更强烈，智力上的严格要求，甚至超越了内心上蓬勃的愿望。布施周济，照顾狗、猫，保护苍蝇躲过蜘蛛——也是无法使她满足的；当她变得更大和更聪明的时候，她不能不看到这种活动的贫乏性；何况，这些事情只需要她花费十分微小的努力，却不能填满她的整个生存。她需要一种更巨大、更崇高的东西；可是这是什么呢——她却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善于去实行。因此，她常常感到一种烦闷，她老是在等待什么，探索什么；因此连她

的外表也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性质：“在她的全身，在那关切而微有惧怯的面部表情里，在明亮而多变的眼光里，在那似乎勉强的微笑里，在那温和而不匀称的声音里，有一种神经质的、电力似的，一种突发的、急速的东西……”

很明白，她对自己还有模糊不定的怀疑，她还不能确定自己的作用。她理解，她不需要的是什麼，并且骄傲而独立地观察着她的生活的相沿成习的环境；可是她需要的是什麼，而且更重要的——如果要达到她所需要的东西应该做点什麼，——对于这，她却还不明白，因此她的整个生存都是紧张的、不平衡的、急速的。她老是在期待，她老是过着一种前夜的生活……她准备从事最蓬勃、最有力的活动，可是自己单独去干——她却不会。

在内在的力量如此丰富充沛，对活动如此苦苦地渴望之下，女主人公这种胆怯，这种实践上的被动性，——不由得使我们颇为吃惊，而在叶连娜的脸上，也促使人看到一种未完成的东西。可是在个性的这种不完备中，在实践作用的缺乏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屠格涅夫君这个女主人公和我们整个有教养社会的活跃的联系。按照他所构思的叶连娜的性格的基础说来，她应当是一种特殊现象，既然在实际上她在任何场合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愿望——那么她在俄国公众的眼里，就显得是陌生的了，而对我们来说，也不会产生象今天这样的密切的意义了。她可能是虚构的人，可能是一种从其他国家的什么地方移植到我们土壤上来的没有成功的植物。可是对现实的忠实的感觉，不允许屠格涅夫君让他的女主人公拥有和她的理论见解以及灵魂的内在的激动完全相适应的实践活动。我们的社会生活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向作家提供什麼材料。在我们整个社会中，现在所能发现的还只是已经觉醒的、想从事真正工作的愿望，对五花八

门的漂亮玩具的庸俗性的认识，对高超的议论以及一成不变的形式认识，我们从前曾经长时间拿这些议论和形式来安慰自己，欺骗自己。然而我们到底还没有脱出我们在其中可以安安稳稳睡觉的环境，而且也没有深切知道出路在哪里，即使有什么人知道了，也还害怕去发现它。这种艰苦的、令人疲倦的社会过渡状态，必然也要在那些就从社会环境中产生的艺术作品上镌刻下印记。在社会中有个别的强大的性格、个别的人物可能会达到道德的高度发展；就在文学作品中也有这样的人物。可是这一切还只是停留在人物性格的勾画中，还没有转移到生活里去；可能性是已经提出来了，但还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实现。在《奥勃洛莫夫》的奥尔迦身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理想的妇女，她的发展远超出整个落后的社会；可是她的实践活动在哪里呢？她似乎有能力创造新的生活，不过她却也过着她的所有女伴所过的同样平庸的生活，因为离开这种平庸她就没有地方可以去。她爱上了斯托尔兹，因为这是一个富有毅力的积极的人物；但是，不管《奥勃洛莫夫》的作者在描写性格方面的一切技巧，连斯托尔兹在我们的面前，也只是一个虽然拥有一切才能、却不让人家看到他怎样把它们发挥的人物；他在脚底下是失去基础的，他在我们的面前，仿佛在烟雾中飘浮。现在，在屠格涅夫君的叶连娜身上，我们看到了创造坚毅、积极性格的新的尝试，并且不能说，作者在性格本身的描绘方面并不成功。假使人们很少碰到象叶连娜这样的女人，那么当然，许多人一定会有在最最平凡的妇女中，发现她的性格某一些根本特征的萌芽，她的追求有许多是有发展的可能的。作为一个根据我们的社会中正在发展的成分所构成的理想人物来讲，叶连娜是我们所理解的、亲切的。她的追求的意义我们十分清楚：奥尔迦在跟斯托尔兹一起生活以后，感到痛苦和忧郁，她自己也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叶

连娜仿佛就是奥尔迦的问题和怀疑的解答。这种不管他本身的处境是多么好，必然会使每个正常的俄国人震惊的忧郁，在叶连娜的形象中，是可以找到它的原因的解释的。叶连娜渴望着真正的善，她在自己的周围找寻安排幸福的可能，因为，假使在她的周围，有她所接近的人们的悲哀、不幸、贫穷和屈辱包围着她，她就非但无法想象有幸福的可能，甚至连个人的安宁都不可得。

可是屠格涅夫君究竟可以拿什么样的同这种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活动给予他的女主人公呢？对这个问题，甚至用抽象的方式，都很难回答；而艺术地创造这种活动，大概，连今天的俄国作家都还不可能。既然没有地方去寻求活动，作者就不由自主地强使他的女主人公以廉价的方式，在布施周济以及拯救丢弃的猫方面，表露她的高超的追求了。对那种要求紧张努力和斗争的活动，她或者不会，或者害怕去担当。她在周围的一切人中，看到这一个压迫另一个，因此，由于她的人道的、富于同情心气质的发展，她就竭力避开一切，不让自己胡里胡涂地也去压迫别的人。她的影响在家里是一点都看不出来的；父亲和母亲对她好象是陌生人；他们害怕她的权威，但是她从来就不对他们进行劝告、指点或是要求。在家里，有年轻而善良的德国人索亚给她做女伴；叶连娜避开她，几乎就不和她说什么话，她们的关系十分冷淡。住在这里的还有年轻的艺术家的苏宾，关于这个人我们马上就要讲到；叶连娜以严厉的判决把他摧毁了，然而也没有想到要对他产生什么于他有益的影响。对真正的善的渴望，在整个小说中，没有一个地方曾经迫使叶连娜去干涉正在她的周围进行的事件，多少表现一点自己的影响。我们并不以为，这是作者偶然的错误所造成的；不，那种以其远离周围的人群而自豪的特殊的典型人物，在我们的社会中屹然而立，自命不凡，这还并不

是怎样长久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在女人中间，而是在男子中间产生的。“在这里是无法使自己保持清洁的，”他们说，“何况，这个环境又是这么卑微而庸俗，最好还是远远躲开他们。”于是他们当真远远离开了，不曾为了改正这个庸俗的环境作过任何有力的尝试，而且还把他们的逃避当作他们的处境的唯一真正的出路，把它当作丰功伟绩而夸耀。自然，既然看到了这样的榜样和见解，作者除了使叶连娜完全离开这种生活以外，就无法更出色地阐明她的家庭生活了。但是，正象我们已经说过的，叶连娜的无力，在小说中是归结为从她的女性的、人道的感情所流露出来的特殊原因的：她害怕任何冲突，——不是由于缺乏坚毅精神，而是害怕这会侮辱了或者损害了什么。她从来没有体验过丰满的、真正的生活，却还是想象她的理想是可以〔不经过斗争〕，不损害随便什么人而达到的。在一个事件之后（当英沙罗夫英勇地把醉酒的德国人抛到水里去的时候），她在日记中这样写：“是的，跟他是不能胡来的，他是见义勇为的。可是为什么要这样粗暴，要嘴唇发抖，眼睛里要露出这种毒火呢？或者，说不定，换一种方法就不行？难道做一个英雄，做一个勇士，就不能照旧温存、柔和吗？”

这个简单的思想，只有现在才来到她的头脑里，可是连这也就是保持她还无法把它解决的问题的形式。

在这种混混沌沌、无所事事之中，在不断地、疲倦地期待什么东西之下，叶连娜活到了二十岁。有的时候她感到十分沉重；她认识到，她的力量是白白浪费了，她的生命是空虚的；她自己思索道：“即使到什么地方去做一个女仆，真的，这样我倒更好。”在她的心里的这种沉重的情绪，由于她在谁那里都找不到对她的感情的反响，在谁那里都看不到支持，变得更加加强了。有时候她觉得，她在企求一种全俄国没有一个人会企求、没有一个人

会想到的东西……她觉得可怕了，同情的要求发展得更有力了，于是她紧张而不安地期待另一个能够了解她、能够给她的神圣感情以回声，帮助她，教她应该怎样做的灵魂。在她的心里出现了一种想献身给什么人的愿望，要把自己的生存和什么人融合为一的愿望，她甚至对她那赖以孤独地站在她的亲近的人们中的独立性，感到很不愉快。“从十六岁以来，她就过着自己的生活，可是这生活是多么寂寞。她的灵魂寂寞地燃烧，而又寂寞地熄灭，她好象笼中的鸟一样跳动，可是实在并没有笼子；没有人压迫她，也没有人拘束她，可是她却绝望，苦闷。她有的时候连对自己也并不了解，甚至对自己感到害怕。在她的周围的一切，她觉得不是无意义的，就是无可理解的。‘没有爱怎么能活呢，可是没有人值得去爱，’——她想着，她由于这种思想、这些感觉而感到恐惧起来了。”当她在小说的情节里出现的时候，正是夏天，在孔卓伏地方的别墅里，那时她的心里就怀着这样的情绪。在短短的期间，在她的跟前，出现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的整个心灵都吸引去了。但是，这里还有第四个、插引进来的人物，他也不是一个多余的人，我们也要把他计算在内。这三位绅士是俄国人，第四个却是保加利亚人，在这个人的身上，叶连娜找到了自己的理想。我们把所有这些绅士都观察一下。

在年轻的人们中间，有一个按照自己那一套热烈地爱着叶连娜的，这是艺术家巴甫尔·耶柯夫里奇·苏宾，他是一个约莫有二十五岁的温文尔雅的青年，善良而机智，愉快而热情，无忧无虑而又才气焕发。他算是叶连娜的母亲，安娜·华西里耶夫娜的远房侄子，因此他跟年轻的姑娘十分接近，并且希望博得她真正的好感。可是她却一直居高临下地看他，认为他不算愚蠢，但却是娇生惯养的子弟，跟这种子弟无法严肃相待。虽然如此，苏

宾却对他的朋友说：“从前，她是爱我的”，的确，他具有许多使人爱他的条件；毫无疑问，就是叶连娜也会在一刹那间，给他的优点比缺点更多的意义。可是她很快就看到这种性格的人的艺术的一面，看到，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刹那之间，没有什么持久的、可靠的东西，整个机体都是由矛盾所构成的：懒惰窒息了才能，平白浪费光阴，后来却产生无结果的悔恨，肝火升起来了，引起对自己的鄙视，而鄙视反过来又变成失败时候的安慰，使自己感到骄傲，自我陶醉起来。叶连娜本能地理解这一切，没有被怀疑所沉重地折磨，因此她关于苏宾的决定完全是平心静气的、没有恶意的。“您以为我的身上一切都是假装的吗？您不相信我的后悔，不相信，我能够真心的哭一场！”苏宾有一次在绝望的激动中对她说。她没有回答：“不相信”，而是直截了当说“不，巴甫尔·耶柯夫里奇，我相信你的后悔，我也相信你的眼泪；但是我觉得，你的后悔是给你消遣的，眼泪也一样。”苏宾听到了这种简单的判决发抖了，这个判决的确是深深地刺中了他的心灵的。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够把他的激动、矛盾、痛苦、反复无常，体会和解释得这样简单而正确。在这种解释以后，他甚至不再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了。真的，当叶连娜关于他的见解刚刚形成的时候，——他已经不再使她感到兴味了。他在不在这里，想起他还是把他忘了，爱他还是恨他，在她都无所谓；她跟他没有什么共通之点，虽然，他如果做了什么和他的才能相称的事情，她也不会拒绝去真心称赞他的……

另一个人开始把她的思想吸引住了。这完全是另一个类型的人；他笨重而古板，他的脸并不漂亮，甚至有点可笑，然而却表现着深思的习惯和善良。此外，照作者的说法，“在他的全身，虽然都显出笨拙，却有着优良教养的痕迹”。这就是苏宾的亲近的朋友，安得莱·彼得罗维奇·别尔森涅夫。他是一个哲学家、科

学家，读着荷亨斯托芬^①的历史以及其他德国书籍，并且满怀着谦逊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苏宾的叫喊：“我们需要幸福，幸福！我们来给自己争取幸福吧！”——他不相信地反驳：“没有比幸福更高尚的东西吗？”——因此，在他们之间就发生了这样的谈话：

——比方说是什么呢？——苏宾问，于是停住了。

——比方说，我们两个人，象你所说的，——都是青年人，或者说，我们都是好人，我们都希望自己幸福。可是，“幸福”这个词，是不是能够使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燃烧起我们俩的热情，让我们互相握手呢？这难道不是一个自私的词，我是说，这难道不是一个使人分离的词？

——难道你知道有一种使人联合的词？

——是的；而且它们并不少；而且你也是知道它们的。

——你倒说说，这是什么呢？

——就说艺术吧，因为你是一个艺术家；祖国，科学，自由，正义。

——可是爱情呢？——苏宾问。

——爱情也是一个联合的词；可是这不是你现在拚命追求的东西，不是享乐的爱情，而是自我牺牲的爱情。

苏宾皱了皱眉毛。

——这对于德国人倒是合适的；我只要为了自己而爱；我要做第一号。

——第一号，——别尔森涅夫重复着说。——可是我倒以为，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倒是我们人生的全部使命。

——假使大家都照你的劝告去做，——苏宾扮了一个

^① 荷亨斯托芬是德国王室的姓氏。这里是指德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弗里得利希·罗美尔(1781—1873)所写的《荷亨斯托芬世家》。

可怜相的苦脸说：——世界上可没有人再吃到波萝蜜了，大家都要把它们送给别人吃啦。

——这是说，波萝蜜并非是必需的，可是也别害怕：总可以找到一个甚至喜欢从别人的嘴里夺面包的人的。

从这场对话中可以看到，别尔森涅夫有何等高贵的原则，他的灵魂是怎样倾向于所谓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示，为了一个他叫作“联合”的词，他真的打算牺牲自己的幸福。这样说，他应当吸引象叶连娜这样姑娘的同情了。然而为什么他不能占有她的全部心灵、她的全部的生命的原因，也立刻可以在这里发现。这是一个消极地善良的人物，这个人能够忍受许多东西，牺牲许多东西，一般说来，当事情发展到必要的时候，他是能够表现出高贵的行为来的；可是现在和将来他都不敢去担当广泛而勇敢的活动，去从事自由的斗争，在随便什么工作中起独立的作用。他自己想做第二号，因为他认为这是一切有生之物的使命；真的，他在小说中的作用，使人想起《多余的人》里比席明柯夫的一部分，以及《两个朋友》^①中克鲁比茨恩的更多地方。他热爱着叶连娜，但却做了叶连娜和她所爱的英沙罗夫之间的介绍人，他宽宏大量地帮助着他们，在英沙罗夫生病的时候，去看护他，为了有利于朋友，他放弃自己的幸福，虽然他的内心不是不感到难过，甚至不是没有怨言。他的心善良、富于爱情，可是显而易见，他所以有善良的举动，这与其说是受到内心的诱导，不如说是为了应当做善良的事情。他觉得，必须为了祖国、科学等等牺牲自己的幸福，因此，他就强使自己成为某种观念的永久的奴隶和受苦者了。比方说，他把自己的幸福和祖国分了开来；

① 《两个朋友》也是屠格涅夫的小说。

他，这个可怜的人，无法达到这个水平：理解祖国的幸福是和本身的幸福分不开的，不把自己的幸福看成是在祖国的幸福之外的东西。相反，他仿佛在担心，他的个人的幸福不要妨碍了祖国的幸福、正义的庄严、科学的成就等等。因此他就害怕希望自己幸福，并且，根据他的崇高的原则，决定为了他认为有意义的观念而牺牲自己，因为当然，他认为大部分的责任是在他这一边。显然，这样的人只能够做一种消极的好事。他却不能使他的灵魂同随便什么伟大的事业联合在一起，他不能为了一种他所珍爱的思想而忘怀全世界，他没有得到这种思想的鼓舞，也没有为了它而战斗，象为了自己的欢乐、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战斗一样。他干的是义务命令他做的事情，追求的是在原则上他认为是公正的东西；可是他的行动迟缓，没有自信，因为他经常怀疑自己的力量。他在大学里以优异成绩毕了业，爱好科学，不断钻研，希望做个教授；还有比这更单纯的吗？但是，当叶连娜问到她关于教授的事情时，他却认为需要带着令人赞美的谦虚说：“当然，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还够不上那么崇高的……我想说，我的修养太差了；不过我希望得到许可到国外去……”这很象科学演说：“诸位先生，诸位女士，我希望，你们会大度包涵我讲得草率，讲得空洞”之类……

但是别尔森涅夫因之发表这种意见的关于教授的问题，却是他最神圣的幻梦！当叶连娜问他假使他得到了教席，他会不会满足于他的地位，——他回答：“完全满足，叶连娜·尼古拉耶夫娜，完全满足了。还有什么更高尚的职使呢？请想一想，能够追踪季莫菲·尼古拉耶维奇^①的足迹……只要一想到这一类事

^① 季莫菲·尼古拉耶维奇·格伦诺夫斯基（Тимоф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рановский，1813—1855），俄国学术和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世界史的教授。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朋友。

业，就使我充满了欢乐和惶恐……是的，惶恐，……这是因为我认为我的力量很单薄。”也就是这种认识自己的力量是单薄的想法，使他固执地不相信叶连娜是爱他的，可是后来到了叶连娜对他表示冷淡了，他却又悲伤起来。这一种认识还在这件事上显露出来：当他介绍他的朋友英沙罗夫的时候，他说起英沙罗夫不愿意向人家借钱。甚至在他议论自然界的时候，也反映着这种认识。他说，自然界在他心里唤起一种不安、惊惶、甚至悲哀的感觉，他问苏宾：“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自然界面前，和自然界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大家的不完全，我们的不明朗，或者还缺少自然界所享有的那种满足，或者另一种，就是，我想说——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它却没有？”别尔森涅夫的议论，大多数都是空虚而又富于幻想的。但是小说的某一处却提到，他议论了费尔巴哈：听听他怎样谈论费尔巴哈，这是很有意思的！……

因此，别尔森涅夫——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俄国贵族，他在关于责任的原则方面是受过熏陶的，后来沉潜在学术和哲学中。他远比苏宾干练、可靠，假使有人把他引到了一条道路上去，他就心甘情愿一直前进。可是他自己不但不会引导别人，甚至也不会引导自己：他的天性中没有首创精神，不论在教育，不论在往后的生活中，他都无法获得这种精神。叶连娜开头为了他是善良的人，而且老是谈论事业而对他表示同情。由于他老是把她无法阅读的书带给她，她甚至在他面前惭愧自己的无知。可是对他发生最尽情的眷恋，把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命运都献给他，她却办不到：她还在看到英沙罗夫之前，就本能地理解：别尔森涅夫并非是她所需要的人。而且的确，我们可以满有自信的断言，假使叶连娜忽然想到强要抱住别尔森涅夫的脖子，别尔森涅夫也会胆怯起来的，同时，一定还要借用种种好听的借口逃跑。

但是，在叶连娜所生活的寂寞无人的环境中，她在刹那之间是会受别尔森涅夫的吸引的，并且她已经问过自己：他是不是就是她的灵魂如此长久、如此渴望地等待的，应当引导她脱出一切怀疑，指引她一条活动道路的人呢？然而别尔森涅夫自己却把英沙罗夫引到她这里来，于是魅力消失了……

在英沙罗夫的身上，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非凡的东西。别尔森涅夫和苏宾，连叶连娜自己，最后，甚至还有小说的作者，也总是从消极方面来刻画他。他从来不说谎，从来不改变自己的话，不向人借钱，不喜欢谈论自己的功绩，不会把已经决定的事情搁在一边，他的话和事业是分不开的，等等。总之，在他的身上，并没有一个要求把自己看作规规矩矩的人因此就必须苦苦责备自己的那些特征。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在灵魂里感到要解放自己祖国的热烈愿望的保加利亚人，他公开而信心坚定地把一切都倾注在这种思想里，因为在这里包含着他的生活的终极目的。他不打算让自己的个人福利和自己的生活目的对立起来；这一类想法在俄国有学问的贵族别尔森涅夫身上是很自然的，但是它甚至进入这个平凡的保加利亚人的头脑里去都不可能。相反，他所以为了祖国的自由而奔走，是因为在其中看到自己个人的安宁、看到他的整整一生的幸福；要是他能够在其他什么事情上找到满足，他就会放弃被奴役的祖国而不顾。然而离开祖国，他是怎么也不能设想的。“在自己的同胞受苦的时候，这怎么能够满足和幸福呢？——他想。——在他的祖国受奴役和被压迫的时候，这个人怎么能够安宁呢？假使所做的事业不是去减轻可怜的同胞们的命运，还有什么事业可以使他愉快呢？”因此，他在进行他的真挚的工作时，是十分平静的，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吹牛，正象吃喝一样简单。直到现在为止，他还很少为了直接实行自己的观念，做过什么事；但是去做什么

呢？现在他不得不吃得又坏又少，甚至有的时候还得挨饿；但是食物，即使是最菲薄的吧，也是他的生存的必要条件。解放祖国也是这样的：他在莫斯科大学里求学，以便受到充分的教育，并且和俄国人接近，可是在小说的进行中，他暂时还满足于把保加利亚歌谣翻译成俄文，给俄国人编保加利亚文文法，给保加利亚人编俄文文法，跟自己的同胞通讯，当东方战争^①刚刚爆发的时候（小说的情节是发生在一八五三年），他打算回到祖国去——准备起义。当然，这就是英沙罗夫的活跃的爱国精神的菲薄的食物了；可是他自己也没有把他的来到莫斯科当做真正的生活，没有认为他的微弱的活动甚至能够满足他个人的感情。他也是生活在他的祖国获得解放的伟大日子的前夜，他的生存将在祖国得到幸福的自觉所照耀，他的生活也将是充实的，而且是真正的生活。他盼望着这样的日子，好象在盼望节日一样，因此，他的头脑里不会想到去怀疑自己，或者冷静地计算和斟酌他可以做多少， he可以和什么样的伟大人物去抗衡。他是做季莫菲·尼古拉耶维奇还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呢，——这对他毫不相干；他做第一个呢还是第二个，——对于这，他连想都没有想到。他要去做的天性诱导他做的事情；假使再不能找出比他的天性更优秀的人来的时候，他就做第一个，带头前进；假使能够找到比他更坚强、更勇敢的人，他就跟着这个人前进，在这两种场合中他对自己都是忠贞不变的。他从哪里出发，到哪里为止，——这是由种种情势来决定的；但是他要前进，他不能不前进，这不是因为他害怕毁弃什么责任，而是因为，假使他不从这地方前进，他就要死去。他和别尔森涅夫之间的巨大差别，就在这里。别尔森涅夫也敢于牺牲，也能建功立业；但是在这方面，他好象一个

^① 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是在一八五三年夏季揭开的。

大度的姑娘，为了拯救父亲，就答应了她所深恶痛绝的婚姻一样。她怀着隐隐的痛楚以及对命运的痛苦的屈从，等待着结婚之日，可是只要有什么事情来阻挠婚事，她可就会高兴起来。相反，英沙罗夫却是热情而不可忍耐地等待着他的建立功勋的日子，等待着他的奋不顾身的活动的开始，正象热恋的青年等待着和可爱的姑娘结婚的日子一样。只有一种恐惧使他不安：不要有什么东西来扰乱或者拖延他的渴望的时刻。对祖国自由的热爱，在英沙罗夫身上，不是在理智中，不是在心灵中，不是在想象中：它是存在于他的整个有机体中，不论什么东西渗透到他的身上去，一切都会变成这种感情的力量，受他的驾驭，和他融合在一起。因此，不管他的才能的平凡，不管他的天性中如何缺乏光彩，他却比才智焕发的苏宾和聪明的别尔森涅夫站得无可比拟地高，对叶连娜的影响，也比他们更要无可比拟地强烈、诱人，虽然苏宾和别尔森涅夫都是高贵和可爱的。叶连娜在日记里（作者通常在这方面是毫不吝啬他的深思与机智的），给别尔森涅夫写过十分正确的批评：“安得莱·彼得罗维奇，也许比他（英沙罗夫）更有学问，甚至也许更要聪明……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他的跟前是这样幼稚。”

要不要谈谈叶连娜跟英沙罗夫的接近和他们的恋爱的经过呢？我们觉得，这并不需要。大概，我们的读者都把这段故事记得很清楚；何况，这又不容易讲得好。我们害怕用又冷又残酷的手去触动这个温柔的诗的创作；我们害怕这枯燥而没有感情的转述，甚至会亵渎读者的必然要被屠格涅夫小说的诗意所激起的感情。屠格涅夫君，这个纯洁的、理想的女性之爱的歌唱家，他是这样深刻地透进年轻无邪的处女的灵魂，把她理解得这样完整，带着这样兴奋的颤动、这样热烈的爱描写她的最好的时刻，使得我们在他的故事中能够感觉到她的处女胸怀的波动，悄

悄的叹气、温和的眼光，能够听到激动的心灵的每一下跳动，因此我们的心就由于深沉的感动而茫然失措，而停止了，欢乐的眼泪也将一次次涌到眼睛里来，并且有一种什么东西要从胸怀中突破出来，——好象我们在长久分离之后，又和老朋友重逢了，或者从异国回到了故乡。这种感触又忧郁又愉快：时而是不会再回来的、一闪而过的童年时代辉煌的回忆，时而是青年时代骄傲和愉快的希望，时而是还没有被生活经验的磨炼所调和、所侮辱的、纯洁而强大的想象中的亲切的梦想。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不会再来了；可是一个人即使只能在回忆中重温这灿烂的幻梦，重温这纯洁的童稚时代对生命的狂喜，这理想的、宏伟的想象，并且——后来一看到他现在的生活所经历过的肮脏、庸俗和琐碎，还能够感到战栗，这个人还不能算是毁了的。凡是能够在别人心里激起这样的回忆，唤起这一种情绪来的人，这种人该是幸福的……屠格涅夫君的才能在这方面，始终是很强的，他的小说通过一般的结构始终能够产生纯洁的印象，当然，它们对社会的根本意义也就在这里。《前夜》在描写叶连娜的爱情方面，也包含有这样的意义。我们相信，即使没有我们，读者也能在作者自始至终所描写的叶连娜和英沙罗夫的恋爱中，对那些热情、温柔而且迷人的场景，那些细致而深刻的心理细节的所有魅力表示尊重。我们且不去叙述一切故事，只提一提叶连娜的日记，当英沙罗夫应当到来话别时她的期待，在小礼拜堂中的一场，叶连娜在这一场之后回到家里去，她的三次拜访英沙罗夫，尤其是最后一次^①，后来和母亲、和故乡的分别，出发，最后她和英沙罗夫沿着大运河^②作最末一次散步，看《特拉维亚特》^③，回家。这最后的描写以其严格地真实的、无穷地忧郁的魅力特别强烈地感动着我们；在我们看来，这是整个小说中最真诚、最动人的地方。

我们既把回忆小说的全部发展的享受交托给读者自己，因

此我们现在又得转到英沙罗夫的性格去，或者，说得更妥当一些，就是转到他跟周围的俄国社会的关系方面去。我们已经看到，他在这儿，对于达到他的主要目的几乎毫没有作为；只有一次，我们看到他跑到六十里以外，给居住在特罗伊茨村的同胞们排除纠纷，而最后，到了他回到莫斯科时，他提起，他曾经跑遍全城，秘密和各种人物会见。理所当然，——当他住在莫斯科时，他没有什么可以做；要进行真正的活动，他必须到保加利亚去。他果真到那里去了，可是在路上，死神把他攫住了，因此我们在小说中就看不到他的活动。从这一点可以明白，这一小说的本质，绝对不象有一些人所要相信的那样，在于向我们描写一个建立公民的、即社会的辉煌功业的人物的形象。在这儿，既没有对俄国年轻一代人的责备，也没有关于应该怎样做一个公民英雄的指示。假使这是包括在作者的构思里的，那么作者就应当使他的主人公和事业——和党派、和人民、和外国政府、和他的同志们、和敌对势力针锋相对……然而我们的作者根本就不打算

①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想象已被污染、败坏到了这种地步，他们在这两个相爱的人的美满、热烈的融合这种富于魅力、纯洁而深刻的道德图画中，只看到这可以作为好色的想象材料。由于凭着自己的想法评判一切人，他们甚至叫号，这种场面对道德会有坏影响，因为它要激起不纯洁的思想。然而就让他们叫喊吧：要知道会有这样的人的，他们在看到米罗的维纳斯④的时候，也只感到肉感的刺激，而在看到圣母玛利亚像的时候，却露着淫猥的微笑说：“她倒是……[合适]……那个……”可是艺术和诗不是因这些人们而存在的，真正的道德也不是为他们而存在的。在他们心里，一切都变成令人讨厌的、不纯洁的东西。然而假使你把这些场景读给一个天真无邪、心地纯洁的少女听，那么，你会相信，她在这个诵读中，除了最光辉、最高尚的思想以外，是不会得出别的什么来的。——作者注

② 意大利威尼斯的一条运河名称。

③ 《特拉维亚特》(1853年)，意大利作曲家魏尔迪·裘西普(1813—1901)的歌剧。

④ 希腊著名雕像，一八二〇年发现于米罗斯岛。

这样做，的确，这是我们根据他以前所有的作品多少可以判断的，而且他也没有能力写出英雄的诗篇。他的工作完全另外一套：从整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吸收的，只有关于优利雪斯莅临卡里普斯岛的故事，不能走得比这更远了。屠格涅夫君让我们理解和感觉英沙罗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落在怎样的环境里以后，——他就完全沉潜在描写英沙罗夫怎样恋爱，以及从这恋爱中产生了什么。在那恋爱最后应当让位给蓬勃的公民活动的地方，他却中断了他的主人公的生命，结束了小说。

然则，保加利亚人在这个故事中出现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保加利亚人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是俄国人？难道在俄国人中就没有这样性格的人，难道俄国人就不能热情而果断地爱，就不能由于恋爱而不加思索地结婚吗？或者这只是作者的奇想，不需要在其中找寻什么特殊的意义？人们会说，“他给自己挑选一个保加利亚人这就完了；也许，他也会挑选一个茨冈人，一个中国人呢……”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于对小说整个意义的看法。我们觉得，真的，在这里，说不定可以拿别的民族的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来代替保加利亚人，可是〔只不是波兰人，也〕不是俄国人。〔为什么不是波兰人，关于这一点，当然不应该有问题的^①；可是为什么不是俄国人呢，——全部问题就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尽力之所能努力回答这个问题〕。^②

问题是在这里，在《前夜》里的主要人物是叶连娜，我们应当

① 杜勃罗留波夫暗示，由于检查条例的限制，俄国作家不可能去创造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的形象。

② 在杂志原文中，代替这几句的是：“俄罗斯人出现在英沙罗夫的地位上是虚伪的——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根本不能产生这样性格的人，而是因为俄罗斯生活赋予他们另一种方向和发展。我们现在更走近一步来看问题。”——原本编注

根据人们对她的关系来分析别的人物。在她的身上表现出一种为了一件什么事而引起的朦胧的忧郁，一种几乎是不自觉的、但却是新的生活和新的人们的不可阻挡的要求，这种要求现在几乎笼罩着整个俄国社会，甚至不光是限于所谓有教养的社会。在叶连娜的身上是这样明白地反映着我们的现代生活的最好愿望，而在她的周围的人身上，却是这样突出地表现着这同一种生活的相沿成习的秩序的全部脆弱性，使得你不由自主地想要作详细的对比。〔在这儿所有的人都是恰如其份的：那个并不凶恶、但却空虚而迟钝地装腔作势的斯塔霍夫，他和苏宾称之为母鸡的安娜·华西里耶夫娜勾结在一起，还有叶连娜冷淡地相待的德国女伴，还有精神萎靡的、但是有时也有深入之见的乌瓦尔·伊凡诺维奇，只有关于中音部喇叭的消息才能引起他的兴味，甚至还有那个其貌不扬的奴仆，当一切事情已经结束以后，却在叶连娜父亲面前把她告发〕……然而这一类毫无疑问证明着想象的轻松的对比，当一深入到细枝末节的时候，就变得勉强和可笑了。因此我们避免深入细节，我们只发表一些最一般的意见。

叶连娜的发展不是根据渊博的学问，也不是倚赖生活的广泛经验；她一看到她的亲人的温和的悲哀，一看到她到处都能发现和见到的，甚至在梦中也能发现和见到的贫病交迫、受压榨的人们之后，她的天性中美好的、理想的一面，就在她的心里显露、生长、成熟了。俄国社会中一切优秀的人物不都是在这一类印象中成长和得到锻炼的吗？我们这里每一个真正正直的人，他的特征难道不也是仇恨一切强迫、专横、虐待，不也是怀着要帮助弱者和被压迫者的愿望？我们所以不说：“为了保护弱者不受强者侮辱而进行斗争”^①，这是因为并没有这种斗争，而只有一

① “斗争”一词在另一俄文本上为“活动”。

种愿望，这种愿望完全象叶连娜的一样。当善事本身只包含积极的一面，也就是说，不要求什么斗争，也不会引起什么不相干的矛盾的时候，我们也高兴做善事的。我们布施，举行义演，甚至在必要场合牺牲自己一部分财产；可是事情就只限于这方面，我们可不能为了某一个贫困的人或者受侮辱的人，去同形形色色的麻烦纠缠和斗争。我们是有“积极从事善事的愿望”的，而且也有力量；可是害怕、不信任自身的力量，最后还有，无知：怎么办呢？——经常在阻挡我们，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来，——突然觉得自己是离开社会生活的，是对社会生活的利益表示冷淡，表示格格不入的，正象叶连娜在她周围的环境中一样。但是，愿望却依旧在胸怀里沸腾（我们说的是那些不打算竭力故意地窒息自己的愿望的人），因此我们老是探求、渴望、等待……〔等待总会有什么人向我们解释可以做些什么。〕叶连娜带着怀疑的痛苦，几乎是绝望地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啊，假使有谁告诉我：这就是你应该做的！心地善良，这还太少；去做善事……只有这才是生活中的要着。可是怎样做善事呢？”我们的社会中凡是自觉有活跃的心的人，谁不是痛苦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呢？〔谁不是承认按照能力的高下他的善良的愿望所赖以表现的一切活动形式，是可怜而且渺小的呢？谁不是感觉到有另一种更崇高、甚至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去着手的東西呢？〕……而且怀疑又从哪里去得到解答呢？〔我们疲劳地、如饥似渴地在自己的生存中最辉煌的时刻去找寻它，可是哪里都找不到。我们觉得，一切周围的人倘不是象我们似的给这种怀疑弄得神昏志倦，就是灭绝自己心里的人的形象，使自己缩小到只追逐一些渺小的、自私的、动物的利益。于是生命就这样一天天的逝去，直到生命在人的心里死亡为止，一个有生命的人只是一天天的等待，明天是不是变得更好，自己的怀疑是不是可以

在明天得到解决，那个能够告诉他怎样去做善行的人，是不是会在明天出现……

这一种期待的忧郁，早已把俄国社会弄得疲惫不堪，我们也象叶连娜一样，在想到我们所期待的人已经出现的时候好几次犯错误，后来心就冷下来了。〕叶连娜曾经热烈地眷恋过安娜·华西里耶夫娜；可是安娜·华西里耶夫娜在她看来是渺小的、没有定见的……象我们的社会有一阵时候曾经受艺术的吸引一样，她也对苏宾表示过好感；可是在苏宾身上没有什么真实的内容，光只有俏皮和任性；叶连娜在她的探索中，可不能只停留在玩赏小玩具上。她有一时也被别尔森涅夫身上严肃的学问所吸引；可是这种严肃的学问在她看来不过是谦逊，怀疑自己，等待第一号人出现，以便跟着他走而已。而叶连娜需要的却不是一个受人指定的、等待人们吩咐的人，而是独立地、百折不回地追求一个目标，又能够使别的人们也去追求它的人。这样，最后，在她的面前终于出现了英沙罗夫，〔就在他的身上，她找到自己的理想的实现，就在他身上看到有回答这个问题：她怎样去做善事的可能。

但是〕为什么英沙罗夫不可能是俄国人呢？要知道他在小说里并没有什么作为，只是准备做工作而已；这就是俄国人也能做到的。他的性格在俄国人的皮肤里也是可能存在的，特别在这些现象中。他在小说里显出他能够强烈而果断地爱；但是难道这在俄国人身上就办不到吗？①

① 在《现代人》中，代替下面五段以及第六段前面几句的是：“自然，凡是在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中英沙罗夫能够做到的一切事情，就是俄罗斯人也能做到。可是问题是在于：这一个英沙罗夫并没有亲身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号召他奔向生活的那种思想。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坚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英沙罗夫——不是指那个在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物，而是按照作者的意图应当形成的这个人物，——他还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实现。——原本编注

「一切正是这样，但是正如我们对叶连娜所理解的，象她这样姑娘的同情，还是不可能象对待这个保加利亚人似的，以同样的理由，同样的自然性，转到俄国人身上去。英沙罗夫的全部感召力，就在于渗透在他的整个生命里的那种思想的宏伟和神圣。渴望着积极进行善事、但却不知道如何做的叶连娜，她在还没有见到英沙罗夫时，由于有人讲到他的抱负，就在刹那之间，被深深地打动了。“解放自己的祖国，”她说，“这些话说说就是可怕的——它们是多么伟大！”于是她觉得，她已经找到了她的衷心所希求的话语，已经得到了满足，已经不能设想比这再崇高的目的了，她还觉得，只要她能够追随着这种人走，她的整个一生、她的整个将来就能够得到积极的内容了。于是她就努力去观察他，她要想透入他的灵魂，共享他的梦想，洞悉他的计划的细节。在他的心里只有一种恒久不变的、跟他融为一体的思想：祖国和它的自由；于是叶连娜满足了，她爱上了他的愿望的明朗和坚定不移，灵魂的平静和充实，他的抱负的宏伟有力，于是她自己很快就变成鼓舞着他的思想的回声了。“当他谈到他的祖国的时候，”她在日记里写，“他成长了，成长了，他的面容也变好了，声音象纯钢，似乎，在这时候，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使他的眼睛低垂下来了。而且他不但说说而已，他还在做，一直会做下去。我要盘问他……”过了几天，她又写：“这岂不是奇事吗，我现在已经长到二十岁了，还没有爱过谁哩！我觉得，狄（我要叫他狄，我喜欢这个名字：狄米特里）的内心所以这样明朗，是因为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的事业，献给他的理想。他为什么还要烦躁呢？凡是一个人完全地……完全地……完全地献身以后……他也就不大会有忧虑，他就不会如负重担。不是我要这样，而是那件事要这样。”

她既然明白这一点，自己所以要跟他合在一起，不是因为她

要这样，而是他，而是鼓舞着他的那件事要这样。因此我们就十分了解她的处境；我们相信，整个俄国公众虽然还没有象叶连娜一样，被英沙罗夫的个性所吸引，但是俄国公众是会理解叶连娜的感情是可能而且自然的。

我们说：公众自己还没有受到吸引，我们这个推想是根据这一点：这个英沙罗夫在我们看来还是一个陌生的人。〕屠格涅夫君自己虽然透彻地研究过俄国公众的最优秀部分，他却不能使英沙罗夫成为我们的。这不仅因为他把英沙罗夫从保加利亚拉了来，甚至单单作为一个人吧，他也没有充分让我们去熟悉他。即使你只从艺术方面来观察，那么这一点也是小说的艺术方面的主要缺点。〔我们理解这种缺点的一些不由作者自己作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不想责备屠格涅夫君。然而，虽然如此，〕英沙罗夫轮廓的苍白，对小说所产生的印象本身是有影响的。英沙罗夫思想的伟大和美，没有以其充沛力量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使我们自己也充满这力量，并且在骄傲的兴奋中叫喊：我们跟你走！〕但同时这种思想又是这样神圣，这样崇高……而那些热烈地贯穿在艺术形象中、极其缺乏人性、甚至简直是虚假的思想，对社会却产生了狂热的影响；卡尔·莫尔、维特^①、彼巧林唤起了一大群的模仿者。英沙罗夫却不能引起这些。诚然，当他居住在莫斯科，无事可为的时候，要完全表示自己的思想是困难的；要知道他不能沉溺在浮夸的空谈之中！然而我们从小说中还不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内心世界是我们所不理解的；他做的是些什么，想的是些什么，希望的是些什么，在他的亲属之间遭受了怎样的变故，他怎样观察事件的过程，观察在他的眼前疾驰

① 卡尔·莫尔，这是席勒戏剧《强盗》中的人物。维特，即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

过去的生活的，这些对我们都是掩蔽起来的。甚至他对叶连娜的爱情，在我们看来，也不是完全得到揭开的。我们知道，他狂热地爱着她；可是这种感情怎样钻进他的内心，在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他，当他发现这种感情，准备远离的时候，它到了什么程度，——所有这些屠格涅夫君能够如此精细地、如此诗意地描绘的内在的细节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在英沙罗夫的个性中都是暧昧的。作为一个活的形象，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物而论，英沙罗夫离开我们还是遥远的，这就是为什么《前夜》比起屠格涅夫君以前的小说来，会在公众心里引起一种脆弱的、甚至一部分是不愉快的印象的缘故，在他以前的小说里所出现的人物，都是作者研究到细微之处、并且生动地感受过的。我们理解，英沙罗夫该是一个优秀的人物，也理解，叶连娜所以能够以其灵魂的全部力量去爱他，是因为她是在生活中看见他的，而不是在小说中，可是他对我们所以亲切而可贵，却只是因为他是一种思想的代表，这种思想以其刹那间的光华使我们震惊，正象使叶连娜震惊一样^①，并且照耀着我们生存的阴暗。因此我们理解叶连娜对英沙罗夫的感情全部自然性，因此我们自己，由于满足于他是刚毅不屈地忠于思想的，最初，就不注意他在我们面前还只是苍白而一般的轮廓。

人们还希望他是俄国人哩！“不，他不可能是个俄国人”——叶连娜在回答心上所浮起的惋惜他不是一个俄国人时，自己这样叫道。的确，这样的俄国人今天至少不会有，不应当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我们不知道，新一代现在和将来是怎样发展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正在行动的人，他们的发展却完全和英沙罗夫不相象。对每个个别的人的发展起着影响的，不仅有他的私人方面的关系，还有他必须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氛围气。这一种社会氛围气，发展了英雄传统，另一种发展了和平倾向；第

三种令人愤慨，第四种给人安慰。俄国生活安排得这样好，其中所有的东西都唤起了宁静而且和平的梦，因此每一个并不昏睡的人，不是没有根据的，都被社会看作不安分的、完全是多余的

- ① 在杂志中，在“以其刹那间的光华使我们震惊，正象使叶连娜震惊一样”之后以及代替所有下面一段的是：“……而且吸引了我们的尊敬。只要一旦在英沙罗夫身上夺去这种思想，在他心里就什么都不剩了。作者明白，爱祖国应当和这个保加利亚人整个存在有机地生长在一起，需要把它们不可分割地表现出来；因此他就努力在小说中表现这一点。然而这种积极的爱国主义感情究竟怎样穿透英沙罗夫的整个生存，怎样照耀着他的全部生命，怎样决定他的所有愿望，怎样驾驭他的一切行为，——要把这一切生气勃勃地、完全地表现出来，显而易见，作者还不曾从他的艺术观察力所接触的现实生活里找到充分的材料和颜色；因此英沙罗夫只是头脑的产物，而不是心领神会的创造，甚至叶连娜对他的爱情我们也认为这是头脑的产物。英沙罗夫全心全意所向往的对他说来，就是穿透他的整个存在的那种思想的伟大和神圣。叶连娜在还没有见到英沙罗夫的时候，她就被他那爱国的打算刹那间、深深地震动了。‘解放自己的祖国，’她说，‘这些话就是说出来都是怕人的——这些话是这么伟大！’于是她感觉到她的内心的话终于找到了，她得到了满足，不能再给自己设想比这更高的目的了，只要她能够跟着这个人走，那么她的整整一生，她的整个将来都能得到积极的内容了。于是她努力去观察他，她要渗透到他的灵魂里去，分享他的梦想，参预他的计划的细节。而在他的心里却只有一种和祖国及其自由的观念融合在一起的持久不变的思想，叶连娜感到了满意，她喜爱他身上的愿望的这种明朗性与确定性，灵魂的平静与坚定，抱负的生气勃勃，因此她自己很快就变成鼓舞着他的那种思想的回声。‘他在谈到自己的祖国的时候，’她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他长大了，长大了，他的脸色也变好了，他的声音好象钢铁一般，这时候，在这世界上好象没有一个人，他会在这个人的面前低声下气。他不但是说，而且实际干，将来还要继续干。我要问他……’过了几天，她又写：‘但是，这岂不是奇事吗，我现在已经长到二十岁了，还没有爱过谁哩！我觉得，狄（我以后要叫他狄，我喜欢这个名字：狄米特里）的内心所以这样明朗，是因为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的事业，献给他的理想。他为什么还要烦躁呢？当一个人完全地……完全地……完全地献身以后……他也就不会有什么忧虑，他也就没有什么负担。不是我要这样：是那件事要这样。’她既然这样理解这一点，她自动跟他结合在一起，这已经不是由于她要，而是他以及鼓舞着他的那件事要她这样。这样一来，我们就十分清楚地了解她对英沙罗夫的感情可能性与自然性。根据这短短的解释可以明白，叶连娜，以及她的‘渴望积极的善’和我们的生活的接近，是和英沙罗夫作为一个爱国活动家离开我们的生活的遥远，在程度上是同样的。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的目的对我们来说是不相宜的，他的发展上的完整也是我们不可企及的。同土耳其人作斗争，在他看来是稀松平淡的事情；类似这样的目的在东方战争时我们这里也曾有过，那时候在我们这里也有不少英雄。然而在和平时期——俄国的爱国精神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英沙罗夫所追求的东西，我们已经完全达到了，要是把他的追求照样直搬到俄国人身上去，这应该算是一桩纯粹的罪行，因为这种精神在我们这里找不到什么根据，也无法找到辩护的。”——原本编注

人〕。真的，请把英沙罗夫的生活所凭以开始，所凭以度过的环境去和迎接着每一个俄国人的生活环境作一比较吧。

保加利亚受到了奴役，她在土耳其的羁轭下受苦。我们，托上帝的庇佑，没有被什么人所奴役，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止一次用自己的武器解决各个朝代、各个民族的命运；我们统治着别人，但却没有谁来统治我们……

在保加利亚没有社会权利和保障，英沙罗夫对叶连娜说：“要是你知道，我们的土地是多么肥沃。但是有人在蹂躏它，把它宰割，把我们的一切都夺走了，一切：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土地；可恶的土耳其人把我们当作牲口似的驱赶，杀害我们……”俄国却和这相反，她是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其中有〔英明的〕法律，它保障着公民的权利并且规定他们的义务，司法在其中居于统治地位，有良好效果的言论自由〔已经盛行〕^①。没有什么人的教堂遭受剥夺，而信仰也〔绝对不会遭受什么〕排挤，相反，传道者〔开导走入迷途的人时〕的热心却受到了奖励；权利和土地不但不剥夺，而且要是谁到现在还是没有，还要赠送给他们哩；〔也没有人被当作牲口驱赶〕。

“在保加利亚，”英沙罗夫说，“最困苦的农民，最卑微的乞丐和我，——我们都盼望同一样事情：大家都只有同一个目的”。〔这种单纯性〕，在俄国生活中〔是根本没有的，在俄国〕，每一个等级，甚至每一个小集团都过着他们的互不相同的生活，都有他们的特殊的目的和追求，都有他们的特定的使命。在我们既存的〔良好〕的社会结构中，每个人都只关心巩固自己的福利，因此，

① 杜勃罗留波夫这里拿英沙罗夫的生活环境和俄国人的生活环境作比较，在这比较里浸透着尖锐的嘲讽，以至于本文在《现代人》发表时，受到严厉的检查删改。

他就不需要和整个民族在一个总的思想中结合起来，正象这在保加利亚所发生似的。

当土耳其的阿加^①抢走英沙罗夫的母亲，后来又把她杀死，他的父亲为了向阿加报仇，用匕首刺伤了阿加因而被枪杀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俄国人有哪一个、在什么时候会在生活中碰到这一类印象呢？在俄国土地上听到过什么类似的事情呢？当然，刑事罪是到处都可能发生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假使有什么阿加抢走了、后来又杀死了或者谋害了别人的妻子，那么丈夫要报仇是不准许的，因为我们有法律，惩罚罪恶对一切人都是一视同仁、大公无私的^②。

总之，英沙罗夫从母亲的乳汁里就吮吸着〔对于侵略者的仇恨，不满意既存的事物秩序。他不需要使自己紧张起来，他不需要通过长长一连串的三段论法，去确定自己的活动。只要他并不懒惰、并不胆怯，他就知道他该做什么，并且怎样处置自己；决不分散力量。而且〕他的使命也是容易理解的，正象苏宾所说：“只要把土耳其人赶出去——这就是最大的事业了！”同时英沙罗夫也知道，不仅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而且在人间的裁判面前，他的行动都是正确的：他的抱负在随便哪个正直的人那里都可以找到同情。现在请想象一下俄国社会中同样的什么事吧：这是

① 阿加，土耳其官员和军官的称号。

② 一接触到尖锐的政治问题，杜勃罗留波夫就不得不用“伊索式的——可诅咒的伊索式的——语言来写，这是一切革命者要提起笔作‘合法的’宣传的时候，沙皇政权强使他们求助于这种语言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一七五页）。杜勃罗留波夫在写给友人斯拉夫京斯基的信中说：“总之，要使您的文章不落在检查之中，您必须说出事实 and 数字，不但不叫出每件事物的名字，而且有时甚至还要用和它们的实际性质迥不相同的名字来称呼它们。”结果，检查官也觉察在“良好的国家”这句话里所藏的嘲讽意味，认为应该把杜勃罗留波夫文章中的“兴奋”的调子稍稍减弱一点了。——原本编注

难以设想的……在俄国翻版中的英沙罗夫，无非是一个强盗，“反对社会分子”的代表，关于这一点，俄国公众已经从《俄罗斯通报》所发表的索洛维尧夫君^①的学术研究中知道得颇为详细了。人们会问，谁会爱上这样的人呢？哪一个有教养并且聪明的姑娘不要恐惧地避而却走呢？

英沙罗夫为什么不可能是一个俄国人，现在是不是明白了呢？象他这样的性格^②，当然，在俄国也会生长的，而且也不在少数，但是他们不可能这样毫无阻碍地发展，这样毫无顾忌地出现，象英沙罗夫一样。同时代的俄国英沙罗夫一直是胆怯的，两重性的，他得隐瞒掩藏，用种种掩饰语和双关语来表示意见……而这就减少人们对他的信任。有的时候，说不定，他甚至还得撒谎，而且还会违拗自己的本意，大家都知道，人们撒谎通常总是出于私利，出于胆怯。对贪婪和胆怯会抱着怎样的同情呢，特别

① 杜勃罗留波夫这里提到历史学家索洛维尧夫的名字，是在挖苦他在阐释人民运动时所表现的忠君爱国倾向。

② 这一段在现在保存下来的校样中还要比较详细：“象他这样性格的人物的诞生，当然就在俄国，他们的为数也并不少，可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他们就应当获得另一种倾向和发展。他们的工作更要复杂、更要困难，因此也更模糊不定。我们不需要对外部进行斗争，可是却必须对内在敌人——对社会的恶与不义进行激烈的、不间断的殊死斗争。这个敌人就在我们中间，时常就在我们自己身上，这就是我们的最优秀的、最真诚的爱国者、要跟根源就在他自身的邪恶开始进行斗争所以如此困难的原因所在。在反对社会的罪恶、堕落、专横、冷淡，在这些行为中找寻我们一切罪行的根源时，我们常常突然发觉，自己在专横、或者在堕落，或者在其他方面的过错也不比别人少。在这样的形势底下，一种英雄精神还有可能保持它的充分力量吗？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开始追逐琐事，而以为全部事业就在这里，或者去和幻影作战。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许多人身上是可以发现对弱者、被压迫者的爱和同情的，想帮助他们的愿望的。然而因为这里问题涉及的是比较把土耳其人赶出保加利亚更要复杂得多，因此我们的英沙罗夫尽管他们的追求高贵透顶，可是在实践活动中通常却只能变成一个可笑而又可怜的唐·吉珂德……”——原本编注

在心灵受到渴求活动的愿望所折磨，并且寻找着强毅的头脑和有力的手牵引着他走的时候？

虽然，我们也有过少数英雄，他们在大胆无畏和同情被压迫者方面，和英沙罗夫有几分相象。然而他们在我们的环境中，却是一个可笑的唐·吉珂德。唐·吉珂德的最突出的特征——既不了解他为什么而斗争，也不了解他的努力会得出什么结果，——在他们的身上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他们突然想到，应该把农民从地主的暴虐下拯救出来；但是他们却不想知道，这里谈不到横暴不横暴，地主的权利是法律严格地规定好的，只要这些法律还存在，它应当是不可触犯的，要唆使农民自己去反对这种横暴，这非但不能使他们逃脱地主的手，反而要使他们遭受法律的处罚。或者，譬如说，给自己安排这样的工作：把无罪的人从不公平的裁判下援救出来，——仿佛我们这里的法官在顺着自己的好恶为所欲为似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的一切事情，都是按照法律而实行的，要这样或者那样去解释法律，——这不需要英雄精神，而只需要对诉讼上用辞的习惯。因此我们的唐·吉珂德就只好扑空了……或者他们突然想到要根绝贿赂，——一个为了一份什么证件收受了一文钱的穷官员，他就该怎样倒楣呵！我们的以保护受苦者为己任的英雄，是要把他们置之绝地的。这当然是高贵而伟大的事情；我们难道可以对这些愚笨的人表示同情吗？但我们谈的还不是那些冷淡地履行自己职责的人，他们干脆只是按照职责而从事工作；我们说的是那些对被压迫者确实、真正感到同情，甚至准备为了保护他们而奋斗的俄国人。可是这些行为结果都是毫无益处、而且可笑的，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在其中行动的环境的普遍意义。而且他们又从哪里去理解呢，当他们自己就置身在其中，当他们的顶端向上伸张，而根株却还是固定在这同一个土壤上的时候？他们打算赶走

亲近的人们心里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就取决于那些悲哀的人以及想要去安慰的人所赖以在其中生活的那种环境的结构。这里该怎么办呢？要把这个环境全部倒过来，——那么连自己也必须倒过来；来吧，请坐在一只空箱子里，你试试把它连自己一起倒过来吧。这要你花费多大的努力！——但是，如果你从旁边来，那么你只一推就可以应付这只箱子。英沙罗夫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他没有坐在箱子里；他的祖国的压迫者是土耳其人，他和他们没有什么共通之点；他只要走过来，尽力之所能把它们推动就是。至于俄国的英雄呢，他们通常是从有教养的社会中出身的，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应当反对的东西是血缘相通的。他所处的境地，举个例吧，等于是打算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人手下解放出来的土耳其阿加的儿子所处的地位一样。简直很难推想这样的现象；但是万一当真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要使这个儿子在我们看来不觉得是愚蠢和可笑的小人，就需要他背弃一切使他和土耳其人联系的东西：——背弃信仰，背弃民族，背弃家族亲戚，背弃朋友，背弃他的社会地位中的俗世的利益。你不能不同意，这是极顶困难的，这一类决心除了要求一个土耳其阿加的儿子在通常所能得到的东西以外，还要求另一些其他的发展，这种英雄精神，对俄国人来说，也不见得更容易多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富于同情的、毅力充沛的性格却以渺小而不需要的轻举妄动来满足自己，不能达到真正的、严肃的英雄精神，就是说，不能背弃他用来跟社会环境联系的一整套见解和实践关系的缘故。他们对庞大的反对势力的胆怯，甚至反映在他们的理论的发展上：他们所以害怕，或者因为不善于挖掘到底，因此例如吧，当他们打算挹伐邪恶时，他们只去打击它的一种细小的现象，并且甚至在还没有想到它的根源的时候，就一蹶不振了。他们不愿意把手举到他们自己就在那上面生长的树木；但是他们却还要竭力

使自己和别人相信，它的腐烂只是表面的，只要把它清洗清洗，就万事顺遂了。〕把几个贪污受贿的人革职，把几处地主的产业监督保管起来，揭发在酒店里出售劣等伏特加的酒店老板，——于是司法就将威镇一切，全俄国的农民就将幸福，包税制度对民众将成为出色的东西了。许多人真诚地这样想，他们的确把许多精力花费在这一类功业上，而因此就一本正经地认为自己是英雄了。

有人告诉过我们一个这一类的英雄，他们说，这个人充满毅力，富有才能。当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和一个教师闹了起来，为了这个教师吞没了规定要分给学生们的纸张。事情的结果并不妙；我们的英雄还敢去触痛学监，触痛校长，因此就被开除出学校了。接着他就准备进大学，但是结果却去教书。在教书的开头几天，他就发现，他所教的那些孩子的母亲打了她的女仆的耳光。他发火了，他就在家里闹了起来，他叫来了警察，一本正经地告发女主人残酷对待女仆。侦查审讯是拖拖拉拉的，当然，在侦查审讯中他不可能出示什么证据，他差一点为了伪证和诬蔑而挨到严厉处罚。自此之后，他就得不到教书的工作了。花了很大的力气，仗着某个人的特别的好心肠，才得到了一个差事；有一次，他们叫他抄一份内容十分荒唐的决定；他忍不住了，又争了起来；他们告诉他，别作声，——他没有听从；他们就叫他滚蛋了。由于无事可做，他接受了一个旧同学的邀请——和他一起到乡间度夏去。他到了那里，看到了那里的所作所为，他就向他的同学、向同学的父亲、甚至还对田庄管理人和农民宣说——〔把农民赶去干三天以上徭役劳动是多么不合法，不经各种审讯和裁判就把农民鞭挞，是多么不能容忍，每天夜里把农家之妇拉到老爷的家里是多么不体面，等等。〕结局是这样的，〔同情地听他讲的农民挨到了鞭挞，而〕老主人却给他备马套车，请求他，如

果他想保全性命，从此再也不要在他们的这地方出现。勉强挨过了夏天，我们的英雄在秋天依赖考试时所碰到的一切问题都是无从放肆、无从争论的平淡无奇的问题，就进了大学。他读的是医学院，功课的确很不错；可是在实习课上，当教授在病人床铺之旁解释他的创见的时候，要不去打断这个落后和吹牛的教授的话，他可实在忍不住了；只要这一个胡扯了什么出来，就马上向他证明，这是胡说八道。由于这样的举动的结果，我们的英雄就不能见容于大学，也没有被派到国外去，却被指派到一个僻远地方的医院里去。在这里，他在最初一阵时候，就揭发了监埋人，并且威吓他要去控告；后来，有一次，他当场捉出了破绽，又去告发了，但是因此却挨到了主任医师的痛斥；受到了申斥之后，他当然要郑重其事理论一番，于是很快就被医院里调出来了……在这之后，他奉命去伴送一个远征队；他为了士兵而和远征队的领队以及管理给养的官儿发生了争论。他看到言语无济于事，就写了一个报告，说是士兵们由于官僚们的恩典，都弄得吃不饱，喝不够，远征队的领队也放任不管。当远征队到达目的地以后——就进行侦查；他们盘问了士兵，士兵都说：足够；我们的英雄大为愤慨了，就对司令部的医官出言不逊起来，于是过了一个月，就被降为副医官的助手。这个工作他只干了两星期，由于不能忍受人们故意野蛮地对待他，他终于自杀了。

难道这不是不平凡的现象，不是坚强、激烈的性格吗？可是你瞧，他是为了什么而毁了的。在他所有的行动中，没有一点不是属于一个正直的人在他的地位所应该有的直接的责任；但是他要这样做，需要许多英勇精神，需要〔为了善而毁灭的自我牺牲的决心。现在有人会问：既然他的身上已经有着这种决心，那么用它来进行真正能够得到重大好处的事业，不是更好吗？但是糟糕的也就在这里，他既不认识这种事业的必要和可能，又不理

解包围在他周遭的东西。他不想看到一切在他的眼前活动的事物是互相牵连的，却以为他所发现每一件恶事，无非是对完美的法规的滥用，这种滥用可能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在这种见解之下，俄国的英雄当然不能考虑到整体，而只能局限在微小的局部事件了，而这时英沙罗夫却相反，他总是让局部受共通性所支配，他相信，“它到底还是跑不了的”。因此，在回答叶连娜的问题，他是不是要向杀死他的父亲的人复仇，英沙罗夫回答：“我没有去找他。我不去找他，不是因为我不能杀死他，——我可以问心无愧把他杀死，——但是因为现在不是私仇问题，现在要紧的是解放民族。前一件事是要妨碍后一件事的。好在到了那时候，它总是跑不了的。”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所以比一切俄国英雄们更卓越伟大，就在这种对共同事业的热爱中，就在他的预感中，就是这种预感让他能够平静地熬受个别的侮辱，在俄国英雄那里，关于共同事业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

然而，就连这一类英雄在我们这里也是为数很少的，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不能坚持到底。在我们的有教养的社会中绝大多数都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感到感兴趣的是思考。在这些中间，也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思考了，但却什么都不理解；但是我们却不打算说这些。我们要说的只是那些真正有着清醒的头脑的人，他们跋涉了长时间怀疑和探索的道路才能获得思想的统一和明朗，而英沙罗夫却并没有花费什么特殊的努力，就能怀着这种思想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前面那些人理解邪恶的根子是在哪里，而且知道，要使邪恶能够戢止，应该怎么做；他们深刻而真诚地充满了他们最后获得的思想。然而，他们却再也没有进行实践活动的力量；他们尽量折磨自己，他们的性格不知怎么一来就显得疲倦无力了。他们怀着同情观察新生活的临近，但是要他们自己去迎接它却办不到，那些渴望着进行积极的善事

并且给自己找寻领袖的人，是不能以他们为满足的。

我们中间，谁也没有找到一些将来必须为了它们进行殊死斗争的已经形成的人道的概念。因此无论在谁那里，都缺乏一种观点和看法的明朗性和完整性，例如，至少象在英沙罗夫身上这样自然地所显示似的。在英沙罗夫身上，那些对内心起着影响、唤起了他的毅力的生活印象，经常得到理性的要求、同时得到他所获得的一切理论上的教育所巩固。而我们这里却完全相反。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个人，能够坚持进步的见解、热烈地渴望着进行积极的善事，但他却是最温柔不过、而且是于世无害的人，请听这就是他在解释他今天的无所事事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他的发展。

“就我的天性来说，”他说，“我是一个十分善良而且容易动感情的孩子。我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故事，我就哭起来，苦闷起来，我看到了别人的苦难，我就觉得难受。我记得，家里逢到有什么人害病了，我就通夜不睡，胃口也倒了，什么都没法做；我记得，我一看到我的一个亲戚折磨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朋友，我常常变得有点疯狂起来。凡是我所看到的、凡是我所听到的，都在我的心里发展了沉重而不满的感情；在我的内心里，很早就萦回着这个问题：为什么老是要这样受苦，难道就没有方法来克服这个似乎已经把一切人都征服的悲哀？我贪婪地寻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很快就有人给我合情合理、有条不紊的回答。我开始学习了。我所写的第一个字帖是这样的：‘真正的幸福是在良心的平静中’。我询问人家关于良心的问题，人们向我解释，如果做了坏事，良心就要惩罚我们，做了好事可也会奖励我们。现在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去知道什么行为是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并不难：道德法典是现成的——字帖里有，家训里有，专门的教科书里也有。‘尊敬长辈’，‘不要只依赖自力，因

为你渺小’，‘要满足于已有的，不要贪得无厌’，‘忍耐和顺从可以得到普遍的爱戴’之类，我所写的字帖大概都是这一类。我从家里以及从所有周围的人那里听到的，也是这一类；而从各种各样的教科书里，我又知道了在地球上完美的幸福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秩序良好的国家里，却也能够尽量达到这一点，而其中最好的国家就是我们的祖国。我知道，现在的俄国不但是伟大而且富庶，而且其中统治着的秩序也是最美满的；现在只要奉行法律以及老一辈人的命令，只要顺从，那么人就能够盼望到一种最完满的幸福了，不管他什么地位，什么出身。这一切启发使我都很快，我贪婪地抓住它们，把它们看作我的一切怀疑的最好解答。我很想凭着我的没有经验的智慧，来考查它们，可是我的力量还差得远，凡是我的能力能够达到的，结果总证明都是正确的。因此我就轻信而兴奋地沉浸在新发见的体系里，我把我的全部愿望都投放在里面，我约莫在十二岁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哲学家，就已经是法律的最严格的拥护者了。我得到了这种信念：无论哪种不幸，错处都在人自己，——或者因为他没有留神，太大意了，或者因为不愿意在小事情上安分守己，或者因为对法律以及对长辈的意志没有充满充分的尊敬。法律本身我还没有很好体会，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通过每一个长者前辈而拟人化了。因此在我的生涯的这个时期，我是常常站在教师、长官等等一边的，我是长官和老一辈人最宠爱的人。有一次，我差一点被同学摔出窗外去：有一个教师告诉全班人说：‘你们这些蠢猪！’下课之后，大家都激怒了，我就起而维护教师，证明，他有充分权利说这话。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同学为了对校长态度粗鲁而被开除了；大家都惋惜他，因为他在我们的学生中是优秀的人，可是我却断定，他受到处分完全应当，而且我觉得十分奇怪，为什么象他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并不理解尊

重长辈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是幸福的第一个条件。因此奉公守法的精神在我的见解中是一天比一天巩固了，慢慢的，我就习惯把大部分人看作仅仅是奉行上面命令的工具。同时我断绝了跟人的灵魂之间活的联系，我不再为了同胞们的不幸而惊惶不安，不再寻找使他们缓和的可能了。‘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我自问自答，甚至对他们感到一种近乎憎恶、近乎轻视的感情，认为他们是一些不会安分谦恭地享受那些由于社会组织的力量所提出的福利。在我的天性中一切善良的东西，都转向另一边——拥护老一辈人对我们的支配权。我觉得这里就包含着自我牺牲，这里就包含着脱离本身的独立性，我相信，我这样做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认为自己差一点就是英雄。我知道，许多人就这样留在这一步，而别的人却把它轻轻改变一下，就宣说他们已经完全改变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很早就已真正改变自己的倾向。我大约还在十四岁的时候，我自己就已经是别人的长辈了——在课堂里，在家里都是这样，因此，我就变成一个最坏的人。我能够去做人们要求我做的事情，但是叫我去要求别人并且怎样去要求——这我就知道了。何况我又是严厉而不可接近的。可是很快我就良心发现了，我就去考查以前关于长辈的见解。有一件事触动我这样做，这件事在我的僵死的心灵中唤起生动的感触。我既然是一个长兄和聪明的人，我就去教育我的一个妹妹。他们授我以权，可以为了她的懒惰、不听话之类而责罚她。有一次，她不知为什么心不在焉，怎么也不想理解我的解释；我命令她双膝跪倒。她立刻就集中了思想，装出很注意的样子，要求我再把话重说一遍。可是我要求她首先得执行命令——双膝跪倒；她倔强了起来。我于是抓住她的手，把她从地上拉起来，然后拿我的肘子用尽一切力量把她的肩头往下压。可怜的姑娘跪下去了，尖声叫起来：她的腿在这个动作底下脱臼了。我感到十分恐惧；

可是当母亲为了这样对待妹妹而骂我的时候，我就十分冷静地努力证明，这是她自己的过错，假使她能够立刻听从我的命令，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是，我却偷偷地感到痛苦，特别因为我是十分喜欢我的妹妹的。在这时候，我就弄清楚了一个念头，即使长辈也可能不公正，也会干出荒唐的事情来；应该按照法律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按照在某一个人的解释中所显现的样子去尊敬它。因此我对人的行为就抱着批评的态度，我就从保守的默然服从立刻跳到 *légale*（合法的）反对立场去。可是长久以来，我都把一切不好的东西只归作个别的人滥施权威，只对他们进行攻击——我不是为了社会的根本要求，不是为了悲悯不幸的兄弟们的遭遇，而单单为了积极的法律。〔在这时候，我当然是激烈反对残暴地对待黑人的，但是，也象莫斯科的某一个评论家一样，我又真心诚意地责备勃朗^①，因为他打算完全违背法律去解放黑人。〕不过，我在那时还很年轻，〔大概，我比可敬的评论家还要年轻，〕我的思想动荡而摇摆；我无法停留在这一点上，在经过许多思索之后，我终于认识就是法律也可能是不完美的，它们只有相对的、暂时的、局部的意义，应当随着时序的推移，由于情势的要求而有改变。但是我究竟为了什么要这样议论呢？是为了高超而抽象的正义的法律，而完全不是由于受到对同胞们的爱这种活的感情所暗示，完全不是因为已经认识到在我们面前通过的生活所指示的直接而真正的需要。你以为怎么样呢？我终于走上最后一步，从抽象的正义的法律，我转到了人类幸福的更现实的要求；我使我的一切怀疑和智慧最后都集中在一个公式上：

① 约翰·勃朗(1800—1859)，他是为了使美国黑人从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奋斗的战士；曾鼓动黑人举行反对奴隶主的起义，未获成功，遭受反动派的严惩。至于“莫斯科的某一个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大约是指反动的杂志作家，《俄罗斯通报》的出版人米·尼·卡特柯夫，他曾经责备勃朗的行为是“违背法律”的。

人和他的幸福。可是这种公式还在童年时代，还在我学习各种学问，在临写富有教训意义的字帖之前，就已经在我的心灵里存在了。这还用说吗？——现在我是把它理解得更透彻了，而且我可以把它说得更有根有据，但是那时候我却比现在更强烈地体会到它，它和我的生存比现在联结得还要紧，甚至我那时还打算为了它比今天做更多的事。我今天正在努力不要做出随便什么和我所自觉到的法则相违背的事情，我在努力不要去剥夺人们的幸福；但是我只局限在这种消极的作用。冲上去找寻幸福，使它跟人们接近，〔破坏一切阻碍它的东西〕——这只有在我的童年的感情和幻想能够毫无阻拦地发展和巩固的时候，我才可能这样做。但是，它们早已在十五岁左右在我的心里枯萎、死亡了，只有现在我又重新恢复这种感情，而且觉得它们是苍白、憔悴、衰弱的。我还需要把它们恢复过来，首先要把它们付之实行；可是谁又知道能不能恢复成功呢？……”

我们觉得在这个故事里，绝不止是一些特殊的特征，相反，却可以作为一个俄国人在独立发展道路上所碰到的那些阻碍的一般证明。不是所有的人都以同样的力量对字帖上的道德表示向往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种道德的影响，它对一切都要起麻痹的作用。人要摆脱它，就应当耗费许多精力，而且在和怀疑、矛盾、让步、转弯等等乱七八糟的纠葛的不间断的斗争中丧失他的许多自信。

〔因此，在我们这里，即使有谁对英雄精神还保持力量，他也无须乎去做一个英雄，他看不见真正的目的，他不懂得怎样去实践，这样就只好起一个唐·吉珂德的作用了。就是一个人理解需要的是什么，怎样需要，他却把整个自己都集中在这种理解上，而实际活动却一步都做不来，还要躲避一切扰乱，象叶连娜在家庭环境中似的。但是叶连娜到底要更勇敢，更自由一点，因

为对她起着影响的，只是俄国生活的一般的气氛，而且正象我们所指出的，她还没有让学校生活和纪律的陈规旧习打下烙印。]

根据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看到的我们的优秀人物，他们还只有能力理解燃烧着叶连娜的对积极的善的渴望，[他们能够给她同情，可是怎么也不能满足这种渴望。]而且这还是进步的、还是我们这里叫作“社会活动家”的人哩。至于大部分聪明而容易感动的人呢，他们都逃避公民的光荣事业，而投身给各种各样的艺术之神。至少《前夜》中的苏宾和别尔森涅夫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出色的人物[，无论这一位，无论那一位都能够尊重英沙罗夫，甚至还是真心诚意地追随在他的后面；假使让他们稍稍作另一种发展，放在另一种环境里，他们也不会睡觉的]。然而现在，[在这个社会里，]他们能够怎么办呢？[将它]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吗？]但是他们却拿不出什么方式，而且也没有力量。把[其中的]什么东西修补一下，把[社会构造中的]各种废物稍稍割掉和抛掉一些吗？但是从死人嘴里拔牙齿这有什么味道呢，而且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只有象班辛^①和库尔那托夫斯基先生之流才能够这样。

顺便——这里我们要对库尔那托夫斯基讲几句话，他也是俄国有教养社会中的优秀代表之一。这是新式的班辛，只是他并没有交际和艺术的才能，而且更要实际些。他是十分正直的，甚至很慷慨的样子；认为 he 可以做叶连娜夫婿的斯塔霍夫为了证明他的慷慨，引了这个事实，说他只要他能够做到倚靠自己的薪水宽裕地过活，他就立刻为了兄弟们的利益而放弃他的父亲指定给他的年金。一般说来，他有许多优点；这就是在叶连娜写给英沙罗夫的信中把他描写一番时，甚至也承认的。下面就是

① 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的人物。

她的议论，只有根据这个议论我们才能够构成关于库尔那托夫斯基的概念：因为他在小说的过程中并没有参预过什么。不过叶连娜的故事是这样完美和精确，我们简直不需要更多的了，因此，代替转述，我们就直接引用她写给英沙罗夫的信：

“向我祝贺吧，亲爱的狄米特里，我有了求婚人啦。他昨天在我们家里用午餐；爸爸好象是在英国俱乐部里认识他的，就把他请了来。当然，他昨天并非以求婚人的身份而来。但是爸爸已经把他的愿望告诉过妈妈，我那好心的妈妈凑着耳朵低声告诉我他是什么样的客人。他叫做叶高尔·安得莱耶维奇·库尔那托夫斯基，他在枢密院里担任秘书长。我先给你描写他的外表吧。他的身材并不高，比你矮，可是模样却不错；他的五官很端正，他的头发剪得很短，留着浓浓的胡子。他的眼睛不大（正象你一样），褐色，转得很快，嘴唇扁平而阔；在他的眼睛里和嘴角上老是挂着照例的微笑；好象这是一种责任似的。他的举止十分单纯，话说得很清楚，他的一切都是明白清楚的：他走路，笑，吃东西，都好象在办公事。‘她在怎样研究他呵！’也许，你在这一刹那会这样想。是的，就为了把他描写给你看。而且她为什么不能研究求婚人呢！在他的身上有一种钢铁似的、但却是愚钝而空虚的、同时也是正直的东西；人家说，他的确是十分正直的。你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钢铁样的人，却又不象这个人。席上，他坐在我的旁边，坐在我对面的是苏宾。开头，谈的是关于什么商业方面的事情，人家说，他这方面很熟悉，他为了经营一个大工厂，几乎把他的官职都弃之不顾了。这简直是猜不透的事情！后来苏宾谈起了戏剧：库尔那托夫斯基先生说，——我应当承认，他毫无虚伪

的谦逊，——他宣称，他在艺术方面什么都不懂。这使我想起了你……但是我想：不，我和狄米特里毕竟不理解艺术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这一位却仿佛要想说：我并不了解它，它没有用处，不过在一个美好的国家里却是可以允许的。可是他对于彼得堡以及对 *comme il faut*（上流社会）却又颇为冷淡的样子；他有一次甚至把自己叫做无产者。他说，我们都是劳动者。我想：假使狄米特里说出这个来，那我就要不高兴了。至于这个人他愿意怎样，就让他去说吧！就让他去自吹自擂吧！他对待我倒十分有礼貌的；但是我总觉得，跟我谈话的是一个极其宽和的长官。当他要称赞谁某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是一个有法度的人——这是他的心爱的用语。他好象是个自负、勤劳、能够自我牺牲的人（你瞧，我是多么公正），就是说，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是他是一个很大的专制君王。落在他的手里是不幸的！席间，他们谈到了贿赂……

——我明白，——他说，——在有许多事情上收受贿赂，不能算是有罪；因为此外他就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既然把他捉住了，就应当处罚他。

我叫了起来。

——惩罚无罪的人吗！

——是的，为了原则。

——什么样的原则？——苏宾问。库尔那托夫斯基似乎是慌张了，又似乎是奇怪了，他说：这是用不到解释的。——爸爸好象是很崇拜他，他插嘴说，当然，这用不到解释，这使我感到很遗憾，这场谈话就此中断了。晚上，别尔森涅夫来了，和他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辩。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善良的安得莱·彼得罗维奇这样激动过哩。库

尔那托夫斯基先生根本否定科学、大学等等的利益……但是我也了解安得莱·彼得罗维奇的愤慨。那一位好象把一切东西都看做一种体操。苏宾在散席后走到我面前来，对我说：这一位和另外一位（他不能叫出你的名字来）——都是重实际的人，可是你瞧，这里有多大的差别：那一位有着真正的、活跃的、生活所赋予的理想，而这一位甚至连责任感都没有，只有例行公事的正直和没有内容的活动而已。——苏宾是聪明的，我就为了你提一提他的智慧的话；可是依我看来，你们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呢？你能够信仰，而那一位却不能，因为一个人不能单单只信仰自己。”

叶连娜一下子就了解库尔那托夫斯基，而且批评他起来毫无什么好感。但是你假使深入这个性格，回想一下你所认识的真诚地为了公共利益而活动的重实际的人们吧；大概你会觉得许多人比库尔那托夫斯基还要坏，要寻找一个比他好的——这是很难保证的。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生活、环境既不能使我们成为聪明的人、正直的人，也不能使我们成为能干的人。无论智慧，无论正直，无论进行活动的力量，我们都只能从外国书本中去获得，〔而这些书又必须和《法典》保持一致，必须和它相称。〕毫无疑问，每个人的心都为了这个困难的工作而发冷了，一切活跃的东西也都变得木然了，他变成一个能够均衡地、不变地实现他所应该做的事情的自动木偶。但是，还是要反复说，这还是比较好的。在他们的后面又开始了另一个阶层的人：一方面是沉沉入睡的奥勃洛莫夫们，他们甚至已经完全丧失从前曾经把少女们俘虏过的雄辩的诱惑力，而另一方面，则是能干的乞乞科夫们，他们为了得到他们的狭隘的、卑鄙的利益而一心一意地、不屈不挠地、勇敢地进行活动。而勃鲁斯柯夫、鲍尔

肖夫、卡彭诺娃、邬兰别柯瓦们却发展得还要高，所有这些邪恶之徒宣布他们有控制俄国人的生命和意志的权利……〔在这里又从哪里去找寻英雄精神呢，就算英雄能够产生，为了不致把它的力量白白浪费，为了能够给善和真理服务，他又从哪里去得到光明和智慧呢？就算最后终于得到了，可是他这个衰疲、虚弱的人又哪里去发挥英雄行为呢？一只没有牙齿的松鼠哪里还能去咬嚼坚果？最好还是不要徒然去迷恋什么东西，最好还是〕给自己挑选一种抽象的、远离开生活的专门东西，钻进里面去〔，却把不由自主地艳羡那些活着、而且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人的不满感情压抑下去〕。

《前夜》里的苏宾和别尔森涅夫就是这样的。苏宾当知道了叶连娜和英沙罗夫结婚以后，他就嘲笑起来了，他说：“英沙罗夫……英沙罗夫……这种虚伪的谦虚有什么用处呢？好吧，就算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就算他能够自己站稳脚跟；难道我们完全是废物吗？比方，就说我吧，难道竟然是废物吗？难道上帝在各方面都对我吝啬吗？”云云……因此〔这个可怜的人，〕立刻转到艺术方面去了：“也许，”他说，“我也可以凭着自己的作品而成名……”的确——他就努力发展他的才能了，他终于成为一个卓越的雕塑家。连别尔森涅夫，这个曾经如此真诚而亲切地看护过害病的英沙罗夫、如此慷慨地在英沙罗夫——他的敌手和叶连娜之间做过居间人的、善良而自我牺牲的别尔森涅夫，——英沙罗夫所谓黄金的心的别尔森涅夫，——当完全相信英沙罗夫和叶连娜正在互相恋爱的时候，连他也忍不住有恶毒的想法了。“由他们去吧！”他说：“父亲告诉我的话，不是没来由的：孩子，我们两个既不是西巴利斯人^①，也不是贵族，也不是命运和自然

① 西巴利斯，是古希腊的殖民地，据传当地的富人生活奢侈淫荡。以后这个名称就变成一个普通名词。

的宠儿，我们甚至也不是殉道者，我们是劳动者，劳动者，劳动者。穿上你的皮围裙，劳动者，走上你的工作台，到你的黑暗的工场里去吧！就让太阳照耀着别人吧。但是在我们的冷漠的生活中却有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幸福！”

在这些不公正的责难中，发散着怎样的艳羡和绝望的痛苦，——责备的是谁，为的是什么，这都不甚了然！……这一切已经发生的事应该归咎于谁呢？不是别尔森涅夫自己吗？不，是俄国生活的过错：“假使我们中间真有个有出息的人，”照苏宾的说法，“这个姑娘，这个敏感的灵魂也不会离开我们了，也不会象鱼一样溜到水里去了。”但是人的有出息没出息是受生活，是受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的生活的共通组织所决定的。我们的生活组织使得别尔森涅夫只有一种〔得救的方法〕：“用无结果的科学来消耗智力”。他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据作者的说法，学者们是很恭维他的著作的：《从刑罚上所见的古日耳曼法若干特点》和《论人类文明问题中都市原则之意义》。总算还好，他至少在这方面得到了救星……

因此，叶连娜在碰到英沙罗夫、而且了解另一种生活以后，她在俄国已经找不到什么泉源了。这就是为什么她不能留在俄国，在她的丈夫死后也不能单独回来的缘故。作者是十分真切地理解这一点的，因此与其让她回到父母亲的荫庇之下，迫使她在家乡的莫斯科，在孤独和无事可做的忧郁中度过余生，他宁使置她的命运于不可知之中。她的亲生母亲的召唤，差不多就在她失去丈夫的时候到达她那里，可是这并没有缓和她对这种平庸、苍白、无所事事的生活的憎恶。“回到俄国来吗？为什么？在俄国干什么呢？”——她这样写信给母亲说，同时她〔为了让自己消失在起义的波浪中〕，她就出发到萨拉去。

她采取了这个决定，这是多么好！真的，在俄国等待着她的

是什么？在俄国对她来说生活的目的在哪里，生活又在哪里？重新回到不幸的猫儿和苍蝇身边去，把不是由她挣来的、上帝才知道她是怎么得到、凭什么理由得到的钱布施给穷人，欣赏苏宾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和别尔森涅夫讨论谢林^①，把《莫斯科时报》读给母亲听，观察通过各个不同的库尔那托夫斯基而显现的法度在社会舞台上活跃，——〔没有一个地方看得到真正的工作，甚至也听不到新的生活的微风……〕于是逐渐地、缓慢地、令人疲沓地枯萎、生病、死亡吗……不，她既然已经〔尝试过另一种生活，〕既然已经吸收过另一种空气，那么她与其让自己受这种沉重的折磨，受这种慢性的惩罚，宁愿让自己投身到随便那种危险里去……我们很愉快，她逃过了〔我们的〕生活，并且在她身上并没有证明有一位诗人的这些无望、忧郁、撕裂灵魂的预言，——这些预言是被俄国优秀的特选人物〔一再无情地〕证实过的：

在远离太阳和自然的地方，
在远离光明和艺术的地方，
在远离生活和爱情的地方，
你的青春年华一闪而过，
活跃的感情消歇了，
你的梦想也粉碎了。
而且你的生命也会在
阒无人迹的、没有名字的地方，
在那没有人注意的土地上
不知不觉地掠过去，
正象一缕烟云在秋天

^① 谢林(F. Schelling, 1775—1854),德国观念论哲学家。

模糊不清的烟雾中，

在晦暗不明的天空中消逝无踪一般……①

现在我们将应当把散处在这篇文章中的个别特征归纳起来（文章的不完全和不连贯，这要请读者们原谅），做出一个总的结论。

英沙罗夫这个自觉而彻底地浸透着〔解放祖国〕这种伟大思想，〔同时准备在祖国起积极作用〕的人，他无法在今天俄国社会中得到发展和表现。甚至就是叶连娜，她虽然能够如此全心全意地热爱着他，和他的思想如此融合，连她也无法在俄国社会中逗留下来，虽然她的所有亲属朋友都在这里。那么说来，伟大的思想，伟大的同情在我们中间竟得不到活动天地吗？……〔一切英勇而积极的人假使不愿意因无所事事而死去，或者徒然地牺牲，就应当逃开我们吗？〕我们所分析的小说的构思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想，并不然。诚然，我们这里并没有可以用来公开进行广泛活动的场地；诚然，我们的生活是在琐碎中、是在诈欺中、是在阴谋中、是在流言和谄媚中度过的；诚然，我们的公民领袖已经丧失良知，常常变得很无耻；我们的才智之士袖手旁观，不想使他们的信念得到胜利，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派的政纲根据的是法律的细节，而不是根据不幸的兄弟们的呻吟和号叫来说明的。这一切都不错，这一切有一部分可以在《前夜》里看到，同时也可以在最近其他十来种小说中看到。然而我们还是以为，〔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有容纳伟大思想和同情的天地，

① “在远离太阳和自然的地方……”，这些诗句是从俄罗斯诗人 菲·伊·丘特契夫的《给俄罗斯女人》的诗里引来的。

这些思想见诸实行的时候已经并不遥远。〕

问题在于，我们的生活不论怎么坏，然而在其中已经能够出现现象叶连娜这样的现象了。这些性格不但已经可能在生活里出现，而且还被艺术感觉所占有，被带进了文学里，上升为典型了。叶连娜是理想的人物，但是她的特征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理解她，而且同情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她的性格的基础——爱受苦的人和受压迫的人，渴望积极的善，〔苦苦地探索能够指示怎样做好事的人〕——这一切，在我们社会的最好部分终于也感觉到了。这种感情是如此强烈、如此接近于实现，以至它已经不象先前一样：不再受辉煌的、但却是无结果的智慧和才能，不再受真诚的、但却是抽象的学问，不再受例行公事似的美德，甚至是善良、慷慨，但却是消极地发展的心灵所引诱了。为了满足我们的感情^①，〔我们的渴望，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我们需要象英沙罗夫似的人，——但是应当是俄国的英沙罗夫。

为什么我们需要他呢？我们自己在上面说过，我们不需要解放者的英雄，我们是统治地位的民族，而不是受奴役的民族……

真的，我们从外部来说是有保障的，假使发生了对外的斗争，我们可以放心无忧。我们一直有足够的英雄去建立军事武功，在今天年轻姑娘对军官制服和髭须所体验的兴奋中、可以看

① 在“感情”一语之后，代替下面三段以及第四段的开头几行，在杂志上是比较压缩的：“需要一种跟内部敌人进行斗争的英雄人物，需要生气蓬勃、坚强有力的人物，需要的不是饶舌家也不是好反省的人物，而是实践活动家。需要他们善于理解俄罗斯生活的要求，愿意贡献自己灵魂的全部力量来疗治我们的创伤，完全献身于共同利益的思想，将自己的整个生存和它交融在一起，吸引忠实于、热心于祖国的新的活动家追随自己进行真和善的事业。我们到此刻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利于他们的发展的。他们做得到吗？永久的平庸。”——原本编注

到一种无可争辩的证据，我们的社会是善于珍重这些英雄的。然而我们的内部敌人难道很少吗？难道不需要和他们进行斗争吗，难道在进行这样的斗争时候不需要英雄精神吗？可是我们这里从事这种事业的人在哪里呢？那些从小就被一种思想牢牢吸住、使自己和这种思想习惯到这种程度，他觉得倘不能争取这一思想的胜利，那就为它而牺牲的完人，在哪里呢？并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发展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利的。因此这些新的人——这些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切优秀的、一切清新的人这样迫不及待地、热烈地希望出现的新的人，应当使我们从它的下面、从这种环境下面、从它的平庸和琐碎下面解脱出来。

这样的英雄的出现还很困难，允许他发展的，特别是允许他的活动最初表现的条件是极其不利的，而任务却比英沙罗夫所担负的更要复杂，更要艰巨得多。对外部的敌人、享受特权的压迫者，也许比内部敌人更容易袭击，更容易打败，——内部敌人以千千万万形态分布在各处，无可捉摸，不动声色，但是却到处使你惊惶不安，毒害着你的整个生命，在斗争中不给你休息，也不让你回顾。跟这一伙内部敌人作战，普通武器是不济事的；要摆脱这种内部敌人只有改变他们就在其中诞生、长大、猖獗的、我们生活中的潮湿和阴沉的氛围气，让一种使内部敌人无法呼吸的空气在我们四周弥漫开来。

这是能够做到的吗？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呢？在这两个问题中，能够严格回答的只有第一个。是的，这是可能的，理由是这样。我们在上面说过我们的社会环境怎样压迫着象英沙罗夫似的个性的发展。可是我们现在还可以对这些话作这样的补充：这个环境此刻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它自己也在帮助这样的人的出现。]永久不变的平庸、琐碎与冷淡不可能成为人的合法命

运，那些组成我们的社会环境、又受这种环境的条件所箝制的人，很早就已经了解这些条件的全部重量和荒唐了。〔有的人觉得烦闷，有的人却竭尽全部力量想冲到什么地方去，只要能够摆脱这种压迫。〕人们考虑了各种不同的出路，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想尽可能使得我们的生活从僵死和腐朽中复活；但是这一切都是软弱的，无济于事的。现在，我们曾经在叶连娜身上看到的那些见解和要求，却终于出现了；社会抱着同情接受这些要求；而且，他们还在努力求其真正的实现。这是说，古老社会的陈规旧习已经活完它的岁月〔；再经过一些摇摆，再有一些激烈的言论和有利的事实之后，活动家就会出现！〕

我们在上面已经暗示过，一个有坚强性格的人的决心和毅力，在我们这里，还在开头时候，就被一种对世界一切东西的田园式的赞美，对懒惰的自满以及昏睡的平静所表示的好感所毁灭了，这种好感是我们中间每个人当他幼小时候在周围所遇到的一切事物中都能碰到的，而且人们还竭力通过一切忠告和训诫教导他也该有这种习惯。可是最近时期，就连这个条件也大大改变了。无论什么地方，在一切事物上，都可以发现自觉，事物旧秩序的脆弱无力，已经家喻户晓，到处都在等待〔改革〕和整顿，已经没有一个人再歌唱这种歌曲来催眠孩子们了；现在俄国每个地方的事物秩序都是不可思议地完美。相反，今天每一个人都在期待，每一个人都在希望，孩子们今天也成长了，他们充满了对美好将来的希望和幻想，不再被人家强力束缚在垂死的过去时代的死尸上了。当轮到他们进行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把毅力、彻底性、内心和思想的谐和投到事业里去，而对这些东西我们却只能勉强获到一些理论上的概念。

〔到那时候，就在文学中也能出现完整的、鲜明而生动地刻划的、俄国的英沙罗夫的形象了。我们不会等待他很久的；我们

盼望他在生活中出现时的热病似的、痛苦的不耐烦，就是这一点的保证。他是我们所必要的，没有他，我们的整个生活就会不知所措，而且，每一天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另一天的前夜。这一天，它到底是要来的！而且，无论如何，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下一天总是不远的，拢共只有一夜之隔吧！……】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①

《大雷雨》，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作，五幕剧。

圣彼得堡，一八六〇年。^②

当《大雷雨》在舞台上出现之前不久，我们就把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全部作品十分详细地研究过了。为了指出作者的才能特征，我们当时就注意过他的剧本里所再现的俄国生活现象，努力捉摸它们的共同特性，探索我们的戏剧家通过作品所表现给我们看的这些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是否这样。读者如果没有忘记，——我们当时曾得出这个结论：奥斯特罗夫斯基对俄国生活有深刻的了解，有把俄国生活的最根本方面深刻而生动地描写出来的伟大本领。《大雷雨》很快就成为我们的结论正确的新证据。我们那时就想谈谈《大雷雨》，可是却感到，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重复许多我们以前的想法，因此就决定不谈《大雷雨》，让那些对我们的意见感到兴味的读者，根据《大雷雨》来考验我们还在这个剧本出现前几个月所发表的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总的意见吧。到得我们看到因《大雷雨》之故在一切杂志和报纸上出现一连串从各种纷纭不同的观点来解释问题的大小批评文章时，我们的决定在我们中间是更加确凿有据了。我们以为，在这许多短文中，对于奥斯特罗夫斯基，对于他的剧本的意义，终究会比我们在关于“黑暗的王国”第一篇文章开头曾经提到

的那些批评中所看到的，说得更透彻^③。既然存着这样一种希望，既然认识到我们自己对奥斯特罗夫斯基作品的意义和特色的意见已经说得很明确，我们就认为，最好还是不去批评《大雷雨》。

可是现在，重新见到奥斯特罗夫斯基剧本的单行本，想起了以前对这剧本所说过的一切，我们觉得，从我们这方面对它再补充几句，也并非完全多此一举。这个剧本使我们有机会对我们论“黑暗的王国”的文章有所补充，继续论证当时我们所说的若干意见，而且——顺便——也向几个惠赐我们以直接或者间接谩骂的批评家简单解释几句。

对于某几个批评家是应当给以持平之论的：他们能够理解使我们和他们分道扬镳的分歧。他们责难我们，说我们采取了笨拙的方法——观察作者的作品，然后作为这个观察的结果，说到其中的内容是什么，这种内容是什么性质的。他们却完全采取另外一种方法：他们首先告诉自己的是——作品中应当包含什么内容（当然，照他们的意见），一切应当包容的东西在作品中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又是按照他们的意见）。显然，正因为有这种观点上的分歧，他们就愤愤不平地观察我们的评论了，他们中间的一位把这些评论比拟作“搜寻寓言中的道德”。然而我们十分高兴，分歧到底揭开了，因此准备忍受任何比喻。不错，假使你要这样说，我们的批评方法，的确也象在寓言中搜寻道德结论；比如，就对于向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而发的批评来说，这中间的

① 参阅《现代人》一八五九年第七以及第九期中《黑暗的王国》一文。——作者注

② 本文最初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一八六〇年第一期。当时曾受到检查官的大段删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编辑《杜勃罗留波夫全集》时就将删去之处悉予复原。

③ 参阅《现代人》一八五九年第七期。——作者注

差别，至多只等于喜剧和寓言之间的不同，喜剧中所描写的人类生活，对于我们，要比寓言中所描写的驴儿、狐狸、芦苇以及其他人物更重要，更接近。无论如何，照我们之见，分析寓言时说：“这就是其中所包含的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我们觉得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这就是它的原因”，——是比一开头就断定：在这个寓言里应当表现这样的道德（例如，孝顺父母），这种道德应该怎样表现出来（比如，以一只小鸟不听妈妈的话，从窠里掉下来做例子）要好得多；然而这些条件并没有得到遵守，它表现的是另外一种道德（例如，家长不当心孩子），或者表现得并不好（比如，以布谷鸟做例子，它撒下自己的蛋，飞到别的鸟巢里去），——这就是说，这寓言不对头。这种批评方法，我们看到，常常落到奥斯特罗夫斯基头上，虽然似乎没有一个人肯承认这一点，而且有的还嫁祸于人，竭力责备我们：我们是抱着先入的观念和要求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分析的。但是还有比这更明白的吗？——难道斯拉夫派不曾说过：应当把俄国人描写得很善良，并且证明，万千善事的根本，就是按照古风旧习而生活；奥斯特罗夫斯基在最初几个剧本中并没有遵从这一点，因此，《家庭幸福图》和《自己人》跟他是不相称的，这是因为当时他还在模仿果戈理。可是西欧派难道没有叫过：应当通过喜剧教导人们迷信是有害的，可是奥斯特罗夫斯基却用钟声去挽救一个人物的毁灭；应当向大家开导，真正的幸福在于教育，而奥斯特罗夫斯基却在他的喜剧中，让有教养的维霍列夫在无知妄人勃罗达金面前出丑；显而易见，《各守本份》和《切勿随心所欲》是两个坏剧本。〔死抱住纯艺术的人难道没有声扬过：艺术必须为了永久而普遍的审美要求而服务，而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肥缺》里，却把艺术贬低到只为刹那间的卑微的利益而服务；因此《肥缺》算不上是艺术，只应当看作是暴露文学！……〕莫斯科方面的涅克拉索夫君^①难道没有断

言过，鲍尔肖夫不应该在我们中间激起同情，但是《自己人》第四幕的描写却是企图在我们中间唤起对鲍尔肖夫的同情；所以，第四幕是不必要的！……巴甫洛夫（尼·菲·）君^②难道不曾采取迂回曲折的方法，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老百姓的生活只可能给人作杂耍表演的材料；其中并没有什么因素，可以使人根据这种生活建立起随便什么同艺术“永久”要求相适应的东西；因此很明白，从平民生活中选取题材的奥斯特罗夫斯基，至多不过是杂耍的编剧家而已……此外还有一个莫斯科批评家难道没有定出这样的结论：戏剧应当向人表现浸透着崇高观念的英雄；《大雷雨》的女主人公，相反，却是浑身都浸透着神秘主义，从而，算不上是戏剧，因为这不能激起我们的同情；所以《大雷雨》只有讽刺的意义，而且连这个也是不重要的，等等，等等……

谁要是注意一下我们这里因《大雷雨》而写的文章，他就会很容易回想起还有几篇相同的批评。不能说，这一切全是智力方面〔极其〕贫乏的人所写的；他们大家对事物都缺乏直率的认识，使得公正不阿的读者也因而震惊，这一点究竟用什么话来解释呢？旧时的批评八股应当为这件事情负责，凡是在柯桑斯基、〔伊凡·达维陀夫、〕契斯佳柯夫和席林尼茨基^③的教科书里研究了烦琐的艺术论的人，许多人的头脑里都残留着这种八股。人人都知道，照这些令人起敬的理论家的意见看来，所谓批评，就

① 这里的涅克拉索夫是指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涅克拉索夫，他是文学批评家、哲学家。

② 巴甫洛夫（Н. Ф. Павлов, 1805—1864），俄国作家，诗人。他曾经写文章攻击过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是不道德的。

③ 所谓柯桑斯基等三人的“教科书”，是指他们所编的“修辞学”和“艺术文学理论”教科书而言。他们的教科书在当时十分流行。他们在反动的评论家攻击现实主义以及整个进步文学的斗争中，是支持“陈腐的批评八股”的。——原本编注

是把这些理论家的教本中所叙述的一般规律套到某一个作品上去：符合这些规律，就是出色的；不符合，就不好。你看，对那些行将就木的老人说来，这想得可不坏：他们可以相信，只要在批评界这种原则还存在，不管文坛上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总不能算是完全落后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根据他们以为是优美的作品，把这些原则在他们的教本里巧妙地确立下来了；当一切新的事物都要根据他们已经确立的原则来评定、只有和这种原则相符合的事物才被承认是典雅的时候，那就没有一种新的事物敢于声张自己的权利了；正象那些对模仿拉辛的人表示惊叹不置，步伏尔泰之后尘骂莎士比亚是一个酗酒狂人，或者向《弥赛亚颂》^①顶礼膜拜，却据此来否定《浮士德》的可敬的人以为自己公平正直一样，老人们信任卡拉姆静、不承认果戈理，这也是公平正直的。批评一变成低能学究一成不变规则的消极检查，那么甚至是最没有才能的八股家，也不会对它感到丝毫害怕的，——而在同时——那些最有才能的作家，只要他们能够把某种新的、独创的东西献给艺术，他们也不会对这种批评存什么希望的，他们应当鄙弃这种“正统”批评的一切责难，鄙弃它而树立自己的声名，鄙弃它而创建一个学派，而在制定新的艺术法则时，还要努力争取一个新的理论家和他们商谈。那时候批评就会谦虚地承认他们的价值了；可是，到今年的九月初，这种批评还是不得不落在不幸的拿波里人的境地里，——他们虽然知道，加里波底^②不是今天，那么明天就会来到他们这里，可是在皇帝陛下不乐意放弃他

① 《弥赛亚颂》，这是德国民族抒情诗人克洛普斯托克(1724—1803)的叙事长诗。他对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表示欢迎，但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他却逃避革命并放弃革命诗歌。

② 加里波底(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在一八六〇年进军攻击拿波里王法兰西斯二世，粉碎了他的军队，占领拿波里，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

的国都的时候，还是应当承认法兰西斯是他们的国王】。

我们感到奇怪，那些令人起敬的人竟承认批评只能起一种渺不足道的、一种卑屈的作用。他们既然把批评局限在是以艺术的“永久而普遍的”规则应用到局部的和临时的现象上去，这样他们就会指责艺术是停滞不动的，而使批评具有完全是官派的、警察的意义。而且许多人这样做都是心安理得的！有一个我们曾经对他发表过一些不大恭敬的意見的作者，他提醒我们，法官对被告不恭敬是一种罪恶。嗨，天真的作者！他是怎样满脑门都是柯桑斯基〔和达维陀夫〕的理论呵！他是一本正经接受这种庸俗的譬喻的，什么批评是法庭，作者在批评面前就是被告！显然，他还把这种意見当作真知灼见哩：拙劣的诗，是对阿波罗^①的犯罪，拙劣的作家是要在忘川里^②受淹死的刑罚的！……否则——在批评与审判之间，怎么会看不出区别呢？人们被拉到法庭去是为了行为中有可疑之处，或者犯了罪，法官的工作就是裁决：被告是对的呢还是有罪；可是作家受到了批评，这难道是被控告犯了什么罪吗？看来，著书立说被看作异端和罪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批评家发表自己的意見：他喜欢不喜欢这个事物。为了证明他不是空话胡说，而是一个头脑清新的人，他就努力说出理由，为什么他认为这一个好，那一个不好。他不认为自己的意見是一定不移的判决，每个人都要强制执行；要是从法律方面选取比喻，那么他与其说是法官，却更象律师。他根据在他看来是比较公正的观点，向读者们叙述案情的备细，他对这案情是怎样理解的，同时努力暗示读者，对这位被评判的作者，自己的见解是同情还是反对。理所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

①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与艺术之神。

② 忘川即厉司河，希腊神话中的阴界河流。

他可以利用一切他认为合适的手段，只要它们并不歪曲案件的实质：他能够把你引入恐惧，或者惊奇，弄得发笑或者流泪，迫使作者做出不利于他的招承，或者弄到无言可答。〔贯彻着这样精神的批评，就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理论家以自己那套教科书为南针总能够看出他们所分析的作品和他们的一定不移的规则是否一致，于是充当了法官的角色，断定，作者是正直还是有罪。但大家都知道，在公开审判的时候，事情时常会这样，出席法庭的人完全不同情一个法官按照某章某条法律条文所宣布的判决：因为在这些事情上，社会良知和法律条文产生了分歧。在评判文学作品的时候，尤其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要是作为律师的批评家以适当方式提出问题，搜集事实，以一定的见解加以阐述，那么舆论就是不注意诗学法典，也已经知道他应该支持什么了。

假使仔细注意一下批评是对作者的“审判”的这个定义，那我们就会发现，它会立刻使人想起我们的外省姑娘以及太太们是拿什么样的概念和“批评”这个词结合起来，从前我们的小说作家是机智地嘲笑过这种概念的。直到现在还时常可以碰到这样的家庭，他们多少抱着恐惧来看一个作家，因为他“会写文章批评他们”。这些不幸的外省人只要让这种念头一旦钻进了头脑，就真的想到自己做一个命运操诸于文学家诛伐之笔的被告时的可怜情景了。他们看着他的眼色，感到局促不安，抱怨自己错了，语言失掉伦次，仿佛他们真的是罪人，正等待着处罚或者宽恕。但是必须说明，这样天真的人今天就在穷乡僻壤，也渐渐减少了。同时，所谓“敢于自己下判断”的权利〔也不再是某一等级或某种地位的人所专有，而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了，而且，就是在私人生活中，人们也比较更有团结心和独立性，对任何旁人的批评都不大感到惶恐了。今天人们发表自己的意

见,无非是因为与其隐忍不说,还是把它说出来的好,今天所以说出来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交换意见是有益的,承认每个人都有权表示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要求,最后甚至还认为参加公共活动,表达他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观察和想象,正是每个人的职责。这一点离开法官的作用还是远得很。要是我对你说,你在路上丢了一块手帕,或者你走的不是你需要的方向,等等,——这还不能说,你是我的被告。同样,你为了使你的朋友对我有所了解,把我绘声绘影一番,在这种场合,我也不是你的被告。当刚刚进入新的社交集会时,我深切知道,人们应当对我进行观察,对我形成一种意见;可是难道因此我就应当想象自己正置身在一个最高法院里——由于等待判决,预先就战栗起来吗?毫无疑问,人们会得出对我的意见:这一个觉得,我的鼻子太大;另一个说,我的胡子是红的;第三个以为,领结打得很糟;第四个觉得,我是忧郁的,等等。好吧,就让他们说长道短去,这同我有什么相干?要知道我的红胡子,不是我的罪恶,而且谁也不能够问我,我怎么敢有这么大的鼻子的。所以,这里我连想都不必想:我的身材姿态他们是否喜欢,这是趣味问题,我无法禁止哪一个对这一点发表意见;而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以为我不善辞令,而我的确是一言不发的时候,我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损失。这样一来,批评的第一个工作(在我们的意义上说)——发现事实,指出事实——就能够十分顺利地、不致引人反感地完成了。接着另一个工作——根据事实进行评判——也能够根据下面这一点而相继进行了:凡是批评别人的人,和他所批评的人完全享有同样的机会。这是因为,一个人既然根据某些材料说出自己的结论,那么他自己也会时常受到别人来评判和检验他的意见是否公正,是否切实。例如,要是有人说我的领结打得难看,于是断定我的教养很差,那么这个评判人就要冒着使得周围的人都把

他的推断看得并不怎样高明的危险。同样，假使有什么批评家责备奥斯特罗夫斯基，《大雷雨》中卡德琳娜这个人物是令人憎恶而且不道德的，那么他也不会使人对他的道德感情的纯洁感到特别信任^①。由此可见，当批评家指出事实，分析事实，做出自己的结论的时候，对作者并没有危险，对事情来说，也并没有危险。可以指责的，只有到了批评家歪曲事实，说谎的时候。如果批评家表达的事实是正确的，那么正象随便什么滔滔不绝、事实确凿的评论一样，不管用什么语气说话，不管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作者本人，只要是好的，从批评中所得到的好处总比坏处多，就是作者是低能的，对文学来说好处无论如何总比坏处多。批评——正象我们所理解的，不是法庭判决，而是普通的批评——它的好处就是：向那些还不曾习惯在文学上集中他们的思想的人，对作家作所谓扼要的叙述，从而使他们能够容易理解他的作品的特点和意义。只要通过适当的方式来理解一个作家，那么关于这个作家的意见就会很快形成，而且不必取得可敬的法典编纂家的允许，也会给他以公平。

虽然，一个批评家〔有时〕在解释某一个作者或是作品的特点时，也会在作品中找到其中根本没有的东西。可是在这样的场合，批评家常常会自己暴露自己。要是批评家打算给他所分析的作品，添上一种比作者实际所放到里面去的更要生动、更要阔大的思想，——那么显而易见，他无法通过作品本身的引证考据，充分证实自己的思想，因此，既然批评家已经指出他所分析的作品应当如何，那么这样一来，就更加清楚地暴露作品构思的

① 说卡德琳娜是“无耻的女人”，“激起了……愤慨”，——这是当时态度中庸的自由主义者尼·菲·巴甫洛夫写的。杜勃罗留波夫这里暗示巴甫洛夫在担任卖身投靠的《我们的时代报》的编辑以及直接参与镇压农民方面的卑劣无耻。——原本编注

贫乏和描写的不彻底了。可以作为这一类批评的例子的，例如，别林斯基对《旅行马车》的分析^①，这篇文章是用最辛辣最鞭辟入里的嘲讽笔调写成的；许多人都把这个分析信以为真，但连这许多人也感觉到，别林斯基在他的批评中，对自己所赋予《旅行马车》的意义，虽然作了十分深切的发挥，可是和索洛古勃伯爵作品的本身却是很不合拍的。不过这一类批评的夸张却很少会碰到。更多的却是另一种情形：批评家真的不理解他所分析的作者，从这位作家的作品中抽出根本不应该得出的东西。但就是这里，问题也并不大：批评家评论的方法马上会告诉读者，他在同谁打交道，在批评中他只提出事实，——虚假的空论是不能欺骗读者的。例如，有一位 П 君^②在分析《大雷雨》时，也决定承袭我们在《黑暗的王国》这篇论文中所援用的同样方法，他叙述了剧本的主要内容之后，就得出了结论。原来，照他的想法，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大雷雨》中，是在讥笑卡德琳娜，想通过她来羞辱俄国的神秘主义。一个人读了这样的结论，当然，立刻就能看出 П 君的智慧属于哪一类，他的想法是不是可以信赖。这样的批评是不会把谁弄昏的，它对谁都没有危险……

对付作者，好象对付被送到征兵站去的农民一样，拿着一管规尺，时而叫“前额！”，时而叫“后脑勺”，看新征的人是不是合格，这样的批评，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在那里决定事情是简单而且果断的；如果你相信教科书中所刊的艺术的永久法则，那你就逃避不了这种批评。它会逐点指示给你，你所赞美的东西，是没有一处合适的，而那个因而使你打盹、呵欠或者发偏头痛的东

① 关于索洛古勃的《旅行马车》，别林斯基曾经写文评述这部小说。这篇文章在表面的恭维之下，隐藏着尖刻的讽刺。

② “П 君”，即巴尔霍夫斯基(А Пальховский)，他在《莫斯科公报》中写过文章批评《大雷雨》。

西，这却是真正的瑰宝。例如，就拿《大雷雨》来看吧：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对艺术鲁莽的侮辱，再不是别的，——而且要证明这一点十分容易。请打开那本由〔名实相符的教授和科学院院士伊凡·达维陀夫〕所编的《文学读本》，这本书是依赖勃列尔^①讲义的翻译而编的，或者就看一看普拉克辛君^②的〔军事学校〕文学教程吧，——在这些书里明白清楚地规定了典范戏剧的条件。戏剧的主题必然应当是使我们可以看出情欲和道义进行斗争的事件，当情欲得胜，就带来不幸的后果，而当道义得胜，就带来幸福的结局。在戏剧的发展中应该遵守严格的统一性和连贯性；结局应当从情节中自然而又必然地流露出来；每一场戏都必须促进剧情的进展，并且把它推向结局；因此，在戏剧中就不应当出现一个不是直接、不是必须参加到戏剧发展去的人物，不应当有一场对话和戏剧的主要内容无关。剧中人的性格应当明明白白展示出来，在性格的展示中，一定得照应剧情的发展，渐次而来。语言应当和每一个人物的地位相适应，可是又不能违背文学语言的洁净，不能流于庸俗。

这看来就是戏剧的全部最重要的规则。我们且把它运用到《大雷雨》去。

“戏剧的主题实际就是卡德琳娜身上所表现的一个妻子必须忠贞不渝的责任感以及对年轻的鲍里斯·格利高里耶维奇的热恋之间的斗争。那么，第一个要求已经找到了。可是接着，当我们根据这个要求出发，我们却发现，《大雷雨》中，那典范戏剧的另一个条件，却被十分蛮横地破坏了。

“因此，第一，——《大雷雨》并不能满足戏剧的最根本的内

① 勃列尔(1718—1800)，苏格兰的作家与批评家，古典主义的拥护者。

② 普拉克辛(В. Т. Пляксов, 1796—1869)，俄国反动倾向的教育家、批评家。

在目的——激起人们尊重道德义务，指出受情欲所引诱的结果就是毁灭。卡德琳娜，这是不道德的、无耻的（根据尼·菲·巴甫洛夫的很恰当的用语）女人，丈夫一离家，她就夤夜私奔到情人那里去，可是在戏剧中这个女罪人给我们所表现的，不仅没有充分带着阴沉的色彩，甚至头部四周还带着一种受苦受难的光辉。她说得这样美好，这样悲哀地受着痛苦，在她周围的一切人都是这样可恶，使你对她不会感到愤慨，你可怜她，你要磨拳擦掌去反对欺压她的人，〔因此，通过她，你倒给伤风败俗作了辩护〕。所以，这个戏剧并没有奉行自己的崇高使命，即使它还没有成为有害的榜样，至少也已经变成消闲用的玩具。

“再说，从纯粹艺术的观点来看，我们也发现有十分严重的缺点。情欲的发展表现得并不充分：我们看不出，卡德琳娜对鲍里斯的爱情是怎样开始，怎样强烈起来的，爱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因此，情欲和道义之间的激烈斗争，在我们看来并不十分明白，并不十分有力。

“印象的统一也没有得到遵奉：不相干的因素——卡德琳娜对婆婆之间关系的掺入，妨碍了这种统一。婆婆的阻扰常常妨碍我们对那应当在卡德琳娜的灵魂里产生的内在斗争集中注意。

“此外，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中，我们还发现一种违反任何诗歌作品最起码、最基本规则的错误，这种错误甚至在初学写作的人都是不可饶恕的。用戏剧中专用语来说这种错误就是——‘纠葛的双重化’：在剧本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爱情，而是两个，——卡德琳娜对鲍里斯之爱以及瓦尔瓦拉对库特里亚希之爱。只有在法国通俗笑剧中这才是好的，而不是在严肃的正剧中，在正剧中，观众的注意力绝对不应当分心旁骛。

“发端和结局也是大大违背艺术的要求的。发端是一件很普

通的事件——丈夫出门；结局也是完全偶然的、任性乱来的：一场大雷雨，它吓破了卡德琳娜的胆，迫使她把一切都向丈夫坦白，这场大雷雨无非是 *deus ex machina*① 而已，它并不下于美国来的滑稽戏中的丑老头。

“因为剧本中充塞着完全不需要的戏和人物，所以全部剧情的进展是懒散而缓慢的。库特里亚希和莎普金，库里庚、菲克露莎，贵族夫人和她的两个仆人，还有奇各伊本人，——这一切人物和剧本的基调根本不相联系。多余的人物不断出场，说一些和故事毫不相干的话，于是下场了，但又不知道为什么走，走到哪里去。库里庚那一套大言壮语，库特里亚希和奇各伊的一切无礼行动，至于半疯半癫的太太，在大雷雨时刻市民之间的谈话，这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些场景都可以删掉，对故事的基本内容却毫无损害。

“在这一群多余的人物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些轮廓分明、神态毕露的性格，至于说到这些性格的逐步展露，那就更不必问了。他们在我们看来简直是 *ex abrupto*② 带着标签而出场的。幕拉开了：库特里亚希和库里庚议论奇各伊是一个怎样的骂人精，接着奇各伊就上场了，他还在后台就骂了起来……卡彭诺娃也是这样的。就是库特里亚希也是这一套，他第一句话就使你知道，他‘在追求一个姑娘’；那库里庚也是一出场就自我介绍是一个自修成功的机械学家，爱好自然。他们就是这样一直到终场：奇各伊猜猜而冒，卡彭诺娃嘟嘟囔囔，库特里亚希夜晚和瓦尔瓦拉散步……可是我们在全剧中却看不到他们的性格的完全而多方面的发展。女主人公本人也描写得很失败：可见，作者自己

① 拉丁文，意思是“以机器开动的神怪”，这是古代戏剧中经常采用的。

② 拉丁文：“突然”。

还没有完全明确理解这个性格，因为，他没有把卡德琳娜描写成为一个伪善者，却强使她吐露令人回肠荡气的独白，而实际上却使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受一时肉欲诱惑的无耻女人。关于男主人公更不在话下了——他是这样苍白。就是奇各伊和卡彭诺娃自己，这些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君的 *genre*① 中屡见不鲜的人物，他们也是（这根据的是阿赫萨鲁莫夫君或者其他同道的福至心灵的结论）一种接近毁谤的故意夸张，我们觉得，他们不是有生命的人，而是俄国生活中‘畸形怪物的结晶’。

“最后，还有剧中人所说的语言，它们也是越出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任何忍耐之外的。当然，商人和小市民不可能用优美的文学语言说话；可是究竟也不能同意，一个戏剧作家为了忠实，就可以把俄国人这样丰富的所有市井野语都搬到文学中去。戏剧人物的语言，不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可能很单纯，但是应当永远很高尚，不应当损害有教养的口味。可是在《大雷雨》中，你听听，所有的人物是怎样说话的：‘讨厌的家伙！你张着鬼脸往哪儿钻！把人家的五脏六腑都烧起来了！女人绝对不应该糟蹋自己的身体！’……这算什么话，这算什么说法？你不由得要重复莱蒙托夫的诗：

他们照谁的模样画肖像？
从哪儿听到过这样的谈话？
如果他们碰到过这种事情，
我们连听都不愿意听它们。②

① 法文：“体裁”。

② 引自莱蒙托夫的《编辑、读者与作家》。

也许，‘在伏尔加河河滨的卡里诺夫城中’，的确有这样说话的人，可是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

读者会理解，我们使这种批评能够说服人，并没有特别花费气力，因此在这批评中，有一些地方容易发现把它缝起来的活线脚。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一旦采取〔学校〕教本的观点，就可以使这个批评变得十分有力而且攻无不克，就可以用这个批评来消灭一个作者了。假使读者同意授我们以权，以预先设想好的要求去批评一个剧本，一个剧本应当写些什么，怎样写，——那么此外，我们就不需要什么了：凡是和我们已经接受的规则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消灭。从这本喜剧中抄引几点，就能够十分中肯地证实我们的论断；上起亚里斯多德，下迄费歇尔^①，这个大家都知道拟订了美学理论的最后、最终原理的人为止，从各种不同学术著作中摘引材料，都可以向你证明我们的教养的坚实可靠；叙述的轻快和机智帮助我们吸引你的注意，于是你自己也不曾察觉，慢慢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了。只不过在你的头脑里一分钟也不要怀疑我们是否有充分权利给作者规定责任，从而去评判他：他是不是忠于这种责任，还是背弃了它……

然而可悲的是，今天没有一个读者会放过这一类怀疑。这些受到轻视的人群，过去张大嘴巴，虔诚地注意着我们的预言，而今天他们对我们的权威来说，已经变成可悲而又危险的景象了，照屠格涅夫君的出色的话来说，他们就是一群装配着“双刃分析刀”^②的人。在读了我们的声如霹雳的批评时，每个人都会

① 费歇尔(1807—188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美学或美的科学》一书。

② “双刃分析刀”，语出屠格涅夫论《汉姆雷特和唐·吉珂德》这一讲演中。这篇讲演尖锐地攻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青年们的民主的倾向。杜勃罗留波夫把屠格涅夫的用语作了相反的解释。屠格涅夫强调了特选人物的作用，缩小了“群众”的意义。而杜勃罗留波夫却能看到他那时代的最伟大收获，就是“群众”自己开始掌握了“双刃分析刀”。——原本编注

说：“你说服人家，在《大雷雨》里现有的东西都是多余的，而需要的东西，其中却没有，这是你向我们刮起了自己的‘暴风雨’。可是《大雷雨》作者的想法，显然完全是相反的；请允许我们把你分析分析。请你给我们叙述并且分析一个剧本，指出它是怎么样的，然后根据它本身，而不是根据什么完全不需要、不相干的陈腐想法，告诉我们你对它的意见。照你的意见，这一点、那一点都不应该存在；可是说不定，它在剧本里却是十分合适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应该呢？”现在每一个读者都敢这样议论了，例如，象尼·菲·巴甫洛夫为了《大雷雨》而写的庄严宏博的批评实践所以彻底失败，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实。事实上，不论是文学家，不论是公众，大家所以攻击在《当代》上批评《大雷雨》的人，当然不是因为他打算揭露对奥斯特罗夫斯基尊敬中的缺点，而是为了他在批评中对俄国公众的常识和善良的意志表现了不敬。大家早就看出，奥斯特罗夫斯基有许多地方违背旧时舞台剧的陈规旧习，在他的每一个剧本的构想中，都有一种一定会引诱他越出我们上面所指出的某种理论范围去的因素。一个不喜欢看到这种违背的批评家，应当从这一点开始：把它们发现出来，指出它们的特点，加以概括，然后直率而公开地在它们和旧理论之间提出问题，这不但是批评家面对他所分析的作者时的责任，在公众之前，这种责任还要更大，公众是一直鼓励奥斯特罗夫斯基和他的一切自由以及离经叛道的，随着每一种剧本的出现，大家越来越敬爱他了。假如批评家觉得，公众对作者的同情已经陷入谬误，这个作者实在是反对他的理论的罪人，他就应当保卫这个理论，郑重地证明，如果离开这种理论，这就不会有好结果。那时候他也许就能够说服几个人，甚至是很多人，因为在尼·菲·巴甫洛夫的作品中，那种出神入化地运用文句的才能，是无法抹煞的。可是现在，他做了什么呢？他丝毫都没有注意这

件事实：旧的艺术规律，〔虽然还在教科书中继续存在，而且还在中学和大学的讲台上讲授，〕〔可是〕在文学和公众之中，早就失去不可触犯的神圣性了。他果敢地根据他的理论逐条粉碎了奥斯特罗夫斯基。强使读者认为他的理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认为最妥当的，只有去嘲笑照第一排座椅的位置以及照“簇新的”手套说来，应该是巴甫洛夫君的“近邻和兄弟”，——可是却敢于去赞美尼·菲·巴甫洛夫所反对的剧本的那位先生。对公众如此轻视，对批评家所着手解决的问题如此轻视，自然一定激起大部分读者宁愿反对他，而不会赞成他了。读者已经促使批评家注意：他跟着自己的理论打转，好象松鼠抓着轮子转一样，因此要求他，应当跳出轮子，走到坦直的大道上来。他们觉得精炼的文句和巧妙的三段论法，这还是不够的；他们要求严肃地证明巴甫洛夫君从而做出他的结论、把它当作公理的前提。他说过，这个剧本是低能的，因为剧本中许多人物对剧情的直接发展并没有影响。可是人们却坚决驳斥他：在剧本中为什么不能有不是直接参预戏剧发展的人物呢？〔批评家断言，这个戏剧光是因为它的女主人公是寡廉鲜耻的，就已经毫无意义了；读者们打断他，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你以为她是不道德的？你的道德观念以什么为根据？〕批评家认为，夜间相会，库特里亚希大胆的啸声，还有卡德琳娜向丈夫认罪的场面，都是污秽庸俗的，和艺术不相称；于是人们又问了：为什么他认为这是庸俗的，为什么上流社会的活剧以及〔贵族的〕情欲是比市民的嗜好更和艺术相称？为什么年轻人的呼啸是比一个〔什么〕上流社会青年的意大利抒情小曲的悲惨歌声更加庸俗？尼·菲·巴甫洛夫为了加强自己的论据，他居高临下地断言，象《大雷雨》一类剧本并不是戏剧，而是草台戏。但就在这里人们也会回答他：为什么你这样轻视草台戏呢？何况还有这个问题，一切油头光面的喜剧，即使其中三一律都得

到遵守，是否真的就比一切草台戏表演好呢。说到草台戏在戏剧史以及在人民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我们以后还可以和你争论。这最后一个反驳，却在刊物上得到了十分详尽的发挥。它从哪里来的呢？大概是在《现代人》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杂志本身也附设有《啸声》，因此，它不会从库特里亚希的啸声中找岔子，笼统说来，它应当偏爱各种各样草台戏。不，所谓草台戏的想法，是在《读书文库》中发表的，安宁柯夫君曾经说，这本杂志就是以“艺术”的一切规则的庇佑者出名的，谁也没有责备安宁柯夫过分沉醉于“庸俗”^①。假使我们正确了解安宁柯夫君的思想〔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担保这一点〕，他觉得，现代戏剧及其理论，比原始的草台戏更加远离生活的真实和美，要使戏剧再生，必须首先回到草台戏去，重新开始戏剧发展的道路。请看，就是在俄国批评界可敬的代表人物中，巴甫洛夫君就已经听到了怎样的意见，且不要说那些被〔好心的人〕责备轻视科学，排斥一切崇高事物的人了！显而易见，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拿一些比较动听或者不动听的抗辩来敷衍，而是在于应当严肃地观察批评家在发出他的判决时所依赖的根据。然而，只要问题一转到这个基础上，《当代》的批评家就显出是贫弱无力的了，不得不暗暗打住他的批评的饶舌……

显然的，一个变成了小学生的盟兄契弟，让自己按照教科书的章节来检查文学作品的批评家，势必常常觉得自己正陷在一种可怜的境地：他一方面批评自己在当前主导理论之前奴气十足，一面又注定自己对文学中任何一种进步，任何一种新的、独创的东西，不断地抱着没有结果的敌视。新的文学运动越

① 杜勃罗留波夫是指安宁柯夫的这篇论文：《谈谈对奥斯特罗夫斯基君的〈大雷雨〉粗暴的批评，谈谈人民性、教育及其他》。这篇文章是对《我们的时代报》上评《大雷雨》的回答。——原本编注

是蓬勃有力，他就越是对这种运动满怀恼恨，他的衰弱无力也越是表现得清楚。这种批评的门徒们既然去搜索一种死气沉沉的完美，把一种衰朽的、对我们毫不相干的理想表现给我们看，把那些从美的整体上割裂下来的碎片向我们猛掷，他们就常常离开生气勃勃的运动，对新的、活跃的美闭起眼睛，不打算了解新的真理、生活新进程的成果。他们居高临下俯视一切，严格地下判断，只要随便哪个作者及不上他们的 chefs-d'oeuvre^①，他们就要责备他，无耻地蔑视作者对他的公众、对他的时代的活跃关系。可是要知道，这一切全是“片刻的利益”——正经的批评家难道可以受这种利益所吸引，去糟蹋艺术？这真是可怜的、没有心肝的人！在一个懂得尊敬生活事业、生活的辛劳和幸福的人眼里，他们是多么可怜！一个普通的、思想健全的人从生活中选取生活给他的东西，而把他能够给生活的东西给生活；可是学究们老是居高临下观察生活，拿死气沉沉的理想以及抽象性去麻痹生活。当一个人看到了一个美妙的女人，就突然饶舌说，她的身段不象米罗的维纳斯一样，嘴的轮廓不及梅提契的维纳斯漂亮，眼神也缺少我们从拉斐尔圣母像上发现的表情，等等，等等，你说，对这种人你怎么想呢。象这一类先生所作的一切议论和比较，也许十分公平，十分机智，可是他们要得出什么结果呢？他们有没有向你说明，他谈到的那个女人，本身是不是漂亮呢？他们有没有能力说服你，即使是这点吧：这个女人是比这一位或者另一位维纳斯生得难看？当然，不能，因为美并不包含在个别的轮廓和线条中，而是在面部共通的表情中，在脸部所表现的生命意义上。假使这个表情是使我起共鸣的，假使这种意义是我容易接近而且满意的，那时候我就老老实实、全心全意地沉潜

① 法文：名作、杰作。

在美中，不作什么死板的比喻，也不提出那些被艺术传说所神圣化的要求。假使您要以生动的印象来打动我，要使我去爱美，——那么您就得在美中捉摸这种普遍意义，这种生活气息，就该把它指出来，解释给我听；只有这样，您才会达到您的目的。对真理也是这样：真理不在于辩论的细节，不在于个别推理是否正确，而是在于所议论的事物是否具有活跃的真实。您应该使我了解现象的性质，这现象在一连串其他现象中的位置，它在生活的共同趋势中的意义和作用，而且，您得相信，您用这个方法就能使我对问题下正确的判断，这种判断比凭借为了证明你的思想而使用的五花八门的三段论法还要可靠。如果到今天为止，粗野和轻信在人们中间还很强烈，那么这就是因为正受到我们现在所攻击的那种批评议论方法所支持。综合方法到处都占上风；人们预先说，这是有益的；于是就向四面八方乱钻，搜集为什么这是有益的理由；他用一些清规戒律把您弄得目瞪口呆〔怎样才是道德的〕，——从而判断一切不合乎清规戒律的东西是〔如何不道德〕。这样一来，人的思想就常常受到歪曲，每个人自己下判断的胃口和本领，也被剥夺了。如果人们熟习了分析的评判法，那么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这就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是它的结果，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害处；于是您就衡量和判断它的好处达到什么程度。这样一来，人们就常常能够把材料放在自己的面前，他的判断，就可以从事实出发了，而不致迷失在综合论的乌云里，不致拿〔从前某时、某人所制订的〕抽象理论和理想把自己束缚起来。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使一切人都有靠自己的智慧来生活的愿望〔而不是倚靠别人的监护〕。当然，这一点在人类之中还不是马上可以盼望到的。可是那些我们叫作“读者公众”的为数不多的人们，却使我们有权利想，在他们中间，这种追求独立灵智生活的愿望已经觉醒了。因此，我们认为居高临下地

藐视他们，并且目空一切地向他们投掷上帝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理论的箴言和判词，这是十分不合宜的。批评的最好方法，我们认为就是把问题叙述得这样，使读者能够自行根据列举的事实做出自己的结论。我们归纳事实，发表对作品的总的意义的看法，指出这个作品对我们就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的关系，做出自己的结论，并且努力尽可能把结论安排得很妥当，但是因此我们就得常常这样坚持：要使读者在我们和作者之间能够充分自由发表他的判断。为了一些带着嘲讽性的分析，我们不止一次挨到责备，人们对我们说：“从你的引文中，从你所叙述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这个作者并不好，而且还有害，可是你却赞美他，——真不害臊。”我们承认，这一类责备一点也不使我们难过；虽然，读者对我们的批评才能，不会表示完全赞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还是能够达到〔主要〕目标的，——一本不好的书〔（对这种书，我们有时候还不可能直接下判断）〕，依靠摆在读者眼前的事实，还是会使读者觉得不好。而且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意见：只有从事实出发的现实的批评，对读者才有某种意义。假使作品中有什么东西，那么就指给我们看：其中有什么；这比一心想象其中所没有的东西，或者其中应当包含的东西，要好得多。

当然，一个人在判断任何问题的时候，心目中一定有一些普遍的概念和规律。然而应当把这些从事实本身流露出来的自然规律跟某种体系所制定的定理和规则区别开来。有某一种公理，没有它就无法思维，每一个作者都预料他的读者能够了解这种公理，正象每一个谈话者预料他的交谈的人能够了解一样。说一个人是驼背或者斜视眼，这已经足够使人看出这是他的生理上的缺点，而不是优点。同样，若是指出某一种文学作品是文理不通的，满纸谎话，这也足够使每个人都不把它当作有价值的东西了。可是当你说，一个人戴着制帽走路，而不是戴呢帽，这还不

足以使我对他作出不好的意见，虽然在某一种社交场合，人们也认为一个正派人物不应该戴制帽。文学作品中也是如此——假使你发现有人不遵守什么统一律，或者你看到有一个人物，他不是剧情发展所必要的，那么这对那些并不预先肯定你的理论的读者，还是什么都没有说。相反，每个读者都必然以为破坏了事物的自然规律、侮辱了普通的常识之作，我却认为可以不必由我再来反驳，因为我推想，只要一指出事实，读者的脑子里自己就会出现这些反驳的。然而过分扩张这一类推论，这是永远都不需要的。象尼·菲·巴甫洛夫、莫斯科的涅克拉索夫君、巴尔霍夫斯基君一流的批评家，最大的错处，就是他们所估计的在本人和公众意见之间绝对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了实际所发生的。换句话说来说，——他们认为只有许多他们觉得是绝对真理，可是大多数人却认为甚至和某几条公认的见解都是矛盾的意见，才是一定不移的、大家都一目了然的公理。例如，每个人都了解，一个愿意做出一些正经事来的作者，不应当歪曲现实；不论理论家，不论公众的舆论，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可是理论家同时却要求，而且还是当作公理提出的，——作者应当使现实变得更完美，抛弃现实中一切不需要的东西，而只选取为了促进情节的发展以及作品的结局所特别需要的因素。根据这第二种要求，人们就一再抱着极大的愤怒攻击奥斯特罗夫斯基；可是这种要求不但不是定理，甚至还和大家公认是必需的、忠实于现实生活的要求，形成明显的矛盾。事实上，你怎么能够强使我相信，在约莫半个钟头之内，在一个房间里，或者在广场的某个地方，挨次来了十个人，他们正就是你所需要的，正就是这个时候需要他们在这里露头，碰到的正就是他们需要的人，一上来就 *ex abrupto* (突然) 讲到需要说的话，需要走开就走开，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当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再上场。在生活中这是这样进行的吗？这和

真情实事相近吗？谁不知道，在生活中最困难的事就是，使顺利的事件互相凑合起来，按照逻辑的必然来安排事情的进程。通常，一个人是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可是他却不能这样随心所欲地使用一个作家如此轻易地驾驭着的一切手段来支配自己的事情。需要的人没有来，信也没有收到，谈话的进行并不能使事情进展。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许多事情，很少有人乐意做一架机器，象我们的戏剧中似的，让一个作者为了他的剧本的情节，高兴怎么样，就怎样去推动它。关于开端和结局也应该这样说。所谓结局就是开端的纯粹的、逻辑的发展的事件，我们是不是看到很多呢？说到历史方面，我们还可以在各个不同时代之中发现这一点；可是个人生活中就不是这样了。诚然，历史规律在这里也是同样的一套，可是区别却在距离和规模。假如绝对地说，并且一直考虑到细微末节，当然，我们会发现，圆球也是多角形的；然而你试试在台球桌上玩玩多角形的球吧，——完全不是这样的结果。关于逻辑发展以及〔报应不爽〕这种历史规律，也是这样的——它们在个人生活事件中，也远没有各民族历史这般明朗和完整。要是把这种明朗性故意加在个人生活上面，这就是强制和歪曲既存现实。在实际上每种罪行的本身是否都附带有惩罚？要是没有外来的惩罚，它是否永远会随伴来良心的痛苦？节俭是否总是能够致富，正直是否总是能够得到普遍的尊敬，怀疑是否总是能够得到解决，乐善好施是否总是能够得到内在的满足？〔我们不是常常看到相反的情景吗，虽然，从另一方面说来，这相反的情景不可能当作是普遍的规律……不能说，人们的天性就是恶的，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不能采取这样的原则，例如，罪恶总是得到胜利，而善行总是挨到惩罚。然而要使戏剧在善行获得胜利之上建立起来，这也是不可能，甚至是可笑的！〕问题是在于：人的关系还很少按照理性的打算而建立，大部

分是偶然地形成的，因此，大部分的行为一个接一个地实现，仿佛是不自觉的，是依着古风旧习，依着刹那间的好恶，依照许多不相干因素的影响而实现的。一个为了满足主题发展的逻辑要求，决定把这一切偶然性都抛在一边的作者，通常就失去中庸的尺度，而变成一个一切都是按照 maximum^① 来衡量的人了。例如，他觉得，人可能一昼夜工作十五小时，对自己也没有直接的害处，于是就根据这种计算向在他手下工作的人提出自己的要求。当然，这种只有在紧急的场合，只有在两三天之间还能办到的打算，要当作日常工作的标准原是十分荒唐的。理论向戏剧所要求的生活关系的逻辑发展，也常常是这样的。

人们对我们说，我们落入了否定一切创造，除了银版照相式的艺术以外，不承认有艺术的地步。还有更甚于此者，——人们要求我们把我们的意见继续向前发挥，一直发展到极端的结论：就是，戏剧作者既然没有权利丢掉随便什么东西，既然不能故意去凑合自己的目的，结果就势必只能去描写一切邂逅相逢人的一切没有用处的谈话了，因此一件持续了一星期的事件，就要求这个戏剧在戏院里上演的时候，也要达到同样的一个星期时间，而对于另一个事件，也要求所有在涅瓦大街或者在英吉利河河滨散步的成千的人们都出场。假使我们此刻争论的那种理论的原理将来还是我们文学中的最高规范，那结果的确是这样的。然而我们根本不要这样做；我们要改正的不是两三个论点；不，这样改正以后，这种理论只有变得更坏，更混乱，更矛盾；我们索性根本不要它。要判断作者和作品的优点，我们有其他根据，倚靠这些根据，我们就有指望，不至于达到什么荒唐的结论，也不至于背离公众的常识。关于这些根据，我们已经在开头几篇论

① 拉丁文：最高标准。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文章〔以及后来在论《前夜》的文章里〕说过了；但是，也许，还要把它再简单地谈一次。

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人类的自然追求，用最小分母归纳起来，可以用这两个词儿来表达：“要大家都好”。很明白，人们在追求这个目的时，由于问题本身的性质，开头势必离开这个目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好，因此，在建立本身幸福的时候，就阻碍了别人；要安排得互不妨碍，他们还不会。例如，没有经验的跳舞者就不善于控制自己的动作，甚至在十分宽敞的大厅里，也常常要和别的几对相撞。到以后，习惯了，他们甚至在面积比较小的厅子里，在人数较多的跳舞者中，也能行走自如了。可是当他们还并不灵活的时候，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放许多对到舞池里去跳圆舞；为了不要彼此相撞，许多人必须等待，最笨拙的人根本放弃跳舞，也许，就坐下来打纸牌，而且甚至输掉很多……生活的安排也是这样的：比较灵活的人继续寻求自己的幸福，另一种人坐着，做着不必要做的事情，输掉钱；生活的共通假日一开头就受到破坏；许多人都得不到乐趣；许多人都相信，只有能够灵巧地跳舞的人，才能得到快乐。可是给自己安排好幸福生活的灵巧的跳舞者，却继续受到自然的诱导，竭力给自己争取越来越多的空间，越来越多的愉快的手段。最后，他们失去节度了；其余的人由于他们的关系，挤得很紧，因此他们就从自己的座位上一跃而起，跳蹬起来——这已经不是要想跳舞，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甚至坐也不会坐了。但是在这种动作里可以看出，就是在他们中间也不乏多少还有若干灵活性的人——连他们也想试试加入快乐的人们的一伙。然而这些享着特权的第一批跳舞者，他们却很不高兴地看着他们，好象看待不速之客似的，不让他们闯进他们的一伙。因此开始了复杂而

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多半是对新来者不利的：人们把他们嘲笑，推撞他们，要他们支付娱乐费，从他们手中夺走女舞伴，或者从这位太太手里把男舞伴夺走，把他们完全从假日晚会中赶出去。可是人们越是处境不利，就越是感到有改善的需要。剥夺手段并不能阻止这些要求，而徒然把他们激怒；只有吃了东西才能消除饥饿。因此，一直到现在为止，斗争并不停止；自然追求，有时好象给压住了，有时好象更强烈了，大家都寻求使自己满足。历史的本质就在这里。〕

在一切时代，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里，都会出现健康而性格上得天独厚的人们，在他们的身上自然追求是叫得这么有力而且响亮。他们在实际活动中，〔常常因自己的追求而受难，然而他们从来〕不是无踪无迹地过去，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在社会活动中获得了同道，在纯科学中有了发明，在艺术，在文学中，形成了一个学派。我们且不谈社会活动，〔社会活动在历史中的作用，经过我们上面几页说明以后，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了。〕可是我们还要指出：在科学和文学事业中，伟大的人物，始终能保持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特征——自然的、生气勃勃地追求的力量。由于这些追求在人群中遭受歪曲，许多关于世界、关于人类的荒唐观念就趁势立下脚跟；这些观念反过来又来扰乱公共的幸福。〔为了不要绕得太远，我们只提一提，偶像崇拜的荒唐，形形色色开天辟地的梦呓，此外，还有各种法门的星相占卜以及神秘的宗教奇迹已经带给人类多少危害。〕从事纯科学的人们，他们致力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发明，或者创建了新的哲学原理，他们就善于倾听智慧的自然而正常要求的呼声，帮助人类摆脱那些危害公共幸福措施的人为的权变机诈。人类，依赖每一个这样的人，使得正确而自然的见解的发展跨出了新的一步，根据这些步伐的是否重要，我们就可以断定每个活动家的个人价值。

对于具有实际知识的人们，对于技术师、机械师、天文学家、医生之流，也可以这样对待。就在艺术，就在文学方面，我们也看见这一点。

直到今天为止，在这人类追求自然原则的运动中，文学家所起的作用还并不大，人类是曾经离开过这个原则的。实质上，文学并没有行动的意义，文学或者只是提出需要做什么，或者描写正在进行以及已经完成的事情。在第一种场合，也就是说，在打算未来的活动时，文学是从纯科学中选取材料和根据的；而在第二种场合，则是从生活事实本身中选取的。所以，概而言之，文学是一种服务的力量，〔它的意义是在宣传，它的价值决定于它宣传了什么，它是怎样宣传的〕。但是，在文学，到现在却出现了几个这样的活动家，他们在宣传中站得这样高，不论〔致力人类幸福〕的实际活动家，不论从事纯科学的人，都不能超越过他们。这些作家是得天独厚的，他们能够凭着天性去接近他们同时代的哲学家要靠严格的科学之助才能找到的自然的见解和追求。更有甚者，哲学家还只是在理论中预料到的真理，那些天才作家却能够从生活中把它把握住，动手把它描写出来。因此，正因为他们是一时代人类认识最高阶段的最充分代表，从这一高处来观察人们和自然的生活，把这种生活描写给我们看，他们就能够高出于文学的服务作用之上，而跻身在一群能够促进人类彻底认识自己的活跃的力量和自然倾向的历史活动家的队伍。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的。他的剧本中有许多东西，可以叫作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他的文学活动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达到过这种阶段，而且只有几个哲学家能够从老远地方把它指出来。这就是莎士比亚所以拥有全世界意义的原因；他指出了人类发展的几个新的阶段。但是因此莎士比亚就站在平常的作家队伍之外。但丁、歌德、拜伦的名字常常和

他的名字结合在一起,可是很难说,他们每个人都是象莎士比亚似的这样充分地标示全人类发展的新阶段。至于说到平常的才能们,那么留给他们的确实只有我们已经说过的所谓服务的作用了。他们既不能献给世界任何新的、未知的东西,又不能指出全人类发展的新的途径,甚至也不能把人类推上已定的道路,这样他们就势必局限在比较局部、比较专门的服务了:他们把人类先进活动家已经发现的东西,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去,向人们揭示和阐明在他们心里还是朦胧和模糊的东西。但是通常并非是这样发生的:文学家向哲学家借用他的思想,然后把它们贯彻在自己的作品里。不,它们双方都是独立进行的,双方都从一个原则——现实生活的原则出发,〔但只是彼此都以不同方式进行。一个思想家,假如发现人们,例如,不满意他们现在的地位,于是就考虑一切事实,努力搜寻能够满足方生的要求的新原则。诗人的文学家发现了这同一种不满,却把他的图画描写得这样生动:使得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来注意它,让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人们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结果只有一个,两种活动家的意义彼此也一样;〕可是文学史告诉我们,除了少数例外,文学家通常总要迟一步。而那时候一个思想家却密切注意最渺不足道的症候,锲而不舍地研究每种偶然一现的思想,一直穷究到最后底蕴,时常在一种现象的还很渺小的萌芽中就把这种现象看出来,——大部分文学家都比较不大敏感:他们要在〔一种方生的运动〕已经变得十分显明、十分强烈的时候,才发现和描写它们。但是因此,他们却比较接近群众的见解,时常在群众中间获得成功〔他们好象晴雨表,每个人都要把他们查看一下,可是对气象、天文计算和预测,却没有一个人想知道了〕。因此,承认文学主要意义是解释生活现象之后,我们还要求文学具有一个因素,缺了这种因素,文学就没有什么价值,这就是真实。应当使得作者所从而

出发的、他把它们表现给我们看的事实，传达得十分忠实。只要失去这一点，文学作品就丧失任何意义，它甚至会变得有害的，因为它不能启迪人类的认识，相反，把你弄得更糊涂。这里，除了胡说八道的才能以外，我们要在作者身上找出别的什么才能，已经是白费心机的了。在历史性质的作品中，真实的特征当然应当是事实的真实；而在艺术文学中，其中的事件是想象出来的，事实的真实就为逻辑的真实所取而代之，也就是用合理的可能以及和事件主要进程的一致来代替。

然而真实是必要的条件，还不是作品的价值。说到价值，我们要根据作者看法的广度，对于他所接触到的那些现象的理解是否正确，描写是否生动来判断。〔首先，根据我们已经接受的规准，我们要把担当着人民的自然的、正确的追求这方面代表的作者，跟那些变成各种虚伪做作的倾向和要求的代言人的作者分别开来。我们已经看到，虚伪做作的社会结合，它就是人们最初不善安排自己的幸福的结果，这种结合在许多地方窒息了对自然要求的认识。〕我们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中，找到许多作家对虚伪做作的利益表示最彻底的忠诚，而对人类本性的正常〔要求〕却一点都不关心。这些作家可能不是撒谎家；可是他们的作品却是虚伪的，除了涉及形式方面的以外，我们无法承认其中还有什么价值。例如，一切为了灯彩焰火、军事武功、为了那受一个野心家之命进行屠杀抢劫而歌唱的人，写作拍马奉承的颂歌、题铭以及情歌的作者〕——在我们的眼睛里，都不会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距离〔人民的〕自然追求〔和要求〕还是十分遥远的。他们在文学方面和真正的作者相比，也等于在科学中星相家以及炼金术士与真正的自然学家、详梦书与生理学教科书、占卜休咎书与可靠理论的相比一样。我们要从那些还没有离开自然见解的作者中、把多少深刻地贯穿着时代的根本〔要求〕、〔多少广泛

地理解人类所完成的运动、]多少对[人类]表示强烈同情的人们区别出来。这里的等级可能无穷无尽。这第一个作者可能穷究一个问题，另一个穷究十个问题，第三个可能把这一切问题都放在一个最高问题之下，[于是把这个问题加以解决，]第四个可能指出要在解决了那个最高问题之后才出现的问题，等等。这第一个可能冷静地、叙事诗地叙述事实，另一个却以抒情之力抨击谎话，歌颂善与真。这第一个可能从表面上解决问题，[指出必须进行一些外表的局部的修补；]另一个却能够连根把整个问题都抓住，[揭穿事物的内在的丑恶和脆弱，或者指出在人类新的运动下所建立的新建筑的内在力量和美。一个作者由于眼界的宽广以及感情的力量，同时也可以使得事物描写的方法，以及每种事物的叙述方法，也变得多种多样起来。要分析这种外部形式跟内部力量的关系，这已经并不困难了；对批评最重要的，就是弄清楚作者和人民身上已经觉醒的，或者，由于当前事物规律的要求立刻应当觉醒的那些自然追求是否站在同一水平上，然后才是，他究竟能够把它们了解和表现到什么程度，他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它的根呢，还是只是它的表面，他是抱住了对象的共同性呢，还是只是它的几方面]。

再要仔细说明我们这里所指的不是理论上的议论，而是生活事实的诗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多余的。在以前几篇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论文中，我们已经充分谈过抽象的思考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区别了。在这里，我们只是再复述一个意见，这个意见是为了使纯艺术的保护人别再责备我们又在把“功利主义的题目”强加到艺术家头上所必需的。我们一点都不以为，每个作者应当在某一理论的影响下，创造自己的作品；只消他的才能能够敏锐地体会生活的真实，他可以满足任何意见。艺术作品可能是某一种思想的表现，这并不是因为作者在创作的时候热中

于这个思想，而是因为现实事实引起了它的作者的惊异，这种思想就是从这些现实事实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因此例如象苏格拉底的哲学和阿理斯托芬的喜剧，就对于希腊人宗教学说的关系来说，它们是同一种共同思想——〔破坏〕古代信仰的表现；然而根本不应当设想，阿理斯托芬给自己的喜剧设定的就是这样的目的：他的作品所要达到的目的仅仅只是描写当时希腊的风俗景象。根据他的喜剧我们绝对可以相信，当他写作的时期，希腊的神话〔王国〕已经消逝了，就是，他从实践上引导我们达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哲学方式所证明的东西。诗的作品和专门的理论作品的写作方法，它们的差别通常总是这样的。这种差别是跟艺术家与思想家的思考方法本身的差别相适应的：这一个具体地思考，从来不放过局部现象，局部形象，另一个却努力把一切都概括起来，融局部特征为共通的公式。然而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诗之间不会有根本的区别：才能是人的本性的属性，因此这才能毫无疑问会向我们保证，在我们承认是有才能的人身上，都有一定的力量和一定广度的自然追求。从而，他的作品也应当在天性的这些自然而正确的要求的影响之下而创造出来；对事物〔通常规律〕的认识，在作品中应当是明白而生动的，他的理想应当是单纯而合理的，他所以不让自己向虚伪矢忠，为荒唐所驱策，这并非因为他不愿意，而仅仅是因为他办不到，——假如他打算强制自己的才能，那么在他的笔下，就不会产生什么好东西。〔正象巴兰^①一样，他要诅咒以色列，可是在欢欣鼓舞的庄严时刻，他却违拗自己的意志，在他的嘴里出现的，不是诅咒，而是善颂善祷。即使他能够说出诅咒的话，它也

① 按照《圣经》中的传说，以色列的敌人要求预言家巴兰诅咒以色列人。可是每一次代替诅咒，总是向他们预言他们有伟大的前途。事见《旧约·民数记》。

会丧失内在的热烈，变得萎靡不振，难以索解。我们一点都不想超出例子的范围之外；我们的文学是充满着这种例子的，几乎比任何一个国家还多。即使拿普希金和果戈理来说：普希金那些奉敕写的诗多么贫乏，多么过甚其词；果戈理在文学中的禁欲主义的尝试又是多么可怜！他们有着许多善良的愿望，可是想象和感觉并没有提供给他们充分材料，好根据钦定的、做作的题目写出货真价实的诗作。〕诗人是从现实生活汲取材料，汲取灵感的，毋庸置疑，这种现实生活有它的自然的意义，当这个意义被破坏的时候，那末事物本身的生命也就毁灭了，只剩下它的一副骸骨。那些打算赋予生活现象以另一种和它们的本质相冲突的意义以代替其自然的意义的作家，不得不永远和这些骸骨留在一起。

然而，我们已经说过，人的自然追求以及对事物的健全而单纯的见解，有的时候在许多地方遭受歪曲。由于发展方向的不正确，人们常常把那种在实质上是对自然荒唐地逞强施暴看作是十分正常而自然的举动。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越来越摆脱矫揉造作的歪曲，而接受自然的要求和看法了：在每座森林里、湖泊里、在雷轰和闪电里、在太阳和星星里、我们已经不再看见神秘的力量了；〔在有教养的国家里，我们已经不再有门第阀阅，不再有贱民了〕；我们不再象东方民族一样，把两性关系相混了；〔我们不再承认奴隶阶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象希腊人和罗马人曾经有过的那样了；〕我们也摆脱了在中世纪的欧洲占有优势的宗教裁判的原则。假如今天在某一个地方还能看到这一切，那么这无非是一种例外；至于一般的情势却已经〔向好的方面〕改变了。然而直到现在还是有人、他们远没有达到明确认识一切自然追求，甚至还无法同意什么对人是自然的，什么不是。一般的公式——所谓人会自然地追求美好的东西——这是大家都能

接受的；然而分歧却是由于究竟应该把什么东西算作对人类的幸福而产生的。比如说，我们以为，幸福是在劳动中，因此我们认为劳动对人是自然的；可是《经济导报》却坚信，人们懒惰是自然的，因为幸福在于资本的利用。我们以为偷盗是〔反自然的〕掠夺方法，人有时迫于极端而走上偷盗；可是克雷洛夫却说，这是某一些人的自然品质，而且——

纵然给偷儿一百万，
他还是把偷盗犯。①

但是克雷洛夫是一个杰出的寓言作家，而《经济导报》却是维尔那德斯基君②〔，一个博士和五等文官〕出版的；他们的意见你无法加以轻视。那么怎么办呢，怎样解决呢？我们觉得，要把它彻底解决，这里没有一个人担得起这个干系；每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的意见最公正，可是在这种场合，比随便什么时候更应该授权给公众来决定。这个问题对公众有关系，只有依赖公众我们才能确立我们的原则。我们对公众说：“我们觉得，〔这就是你所擅长的〕，这就是你的感觉，〔这就是你不满意的，你所愿望的。”〕公众的意见将会告诉我们：我们错了呢还是对。尤其是在这样的场合：分析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我们可以直接依靠公众的评判。我们说：“这就是作者所描写的，照我们的意见，这就是他所再现的形象所指出的；这就是它们的来源，这就是它们的意义；我们觉得，这一切对你们的生活和风习都有活生生的关系〔而且它们也说明了为了满足你们的幸福，什么样的要求是不能缺少的”〕。请问，除了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所请求的公众自己以

① 见《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农人和狐狸》（1811年）。

② 维尔那德斯基（И. В. Вернадский, 1821—1884），俄国经济学家。

外，还有谁能够判断我们的言论的正确呢？公众的决定，无论对我们，还是对被评论的作者，都理该是同样重要、同样彻底的。

我们的作者得到公众十分亲切的接待，这就是说，问题的一半得到了积极的解决：公众承认，他把它理解和描写得很正确。剩下的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正确理解奥斯特罗夫斯基，把一定的意义归给他的作品呢？我们有某些希望可以获得有利的回答，第一，就是这个事实：凡是和我们的见解相对立的批评家，没有得到公众特别鼓励，第二，是这个事实：作者自己原来也是同意我们的，因为在《大雷雨》中，我们找到我们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才能以及关于他的作品的意义的许多想法的新证据。但是，再说一遍，——我们的文章和我们确立自己的判断的根据，一切都在人们的眼前。凡是不想同意我们的人，他在根据自己的观察阅读了、而且检验了我们的文章之后，就可能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这样也就满足了。

现在既然解释了我们的批评的根据，〔我们要请读者原谅我们这些解释的冗长。当然，它们也可以用两三页篇幅来叙述，可是这样一来，这些篇页就永远不能得见天日了。冗长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常常要用无穷委婉的说法来解释只消用一句话来说明的事情；然而糟糕的也就在这里，这些在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中原是十分普通的话，倘使俄国的文章平常也使用这种形式，它就不能和公众相见了。因此为了使得一个读者能够深入所叙述的思想的实质，不得不把文句翻来覆去的讲。

但是〕我们得转到我们现在的题目，转到《大雷雨》去。

《现代人》的读者也许记得，我们把奥斯特罗夫斯基放得很高，因为我们觉得，他能够完整而多方面地描写俄罗斯生活的根本方面和要求。我们且不说这样的作者，他们选取局部的现象，偶然的、外表的社会要求，把它们描写得多少有点成功，〔例如：

关于公正裁判、宽容异教、健全行政机构、废止包税制、取消农奴制等等的要求。〕但就是那些选取生活的比较内在方面的作者，也只局限在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里，并且只指出一些根本没有什么全民意义的现象。例如：在无数中篇小说中，描写了一群就发展来说比他们周围的人更高，但却缺乏毅力、意志，并且在无所事事中归于毁灭的人。〔这些中篇小说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对那妨碍着良好活动的环境明白表示自己的愤懑，虽然它们对于这种要求——大力实施在理论方面我们认作是真理的原则，还只有朦胧的认识。由于作者才能彼此不同，这一类中篇小说的意义或者比较大些或者比较小些；可是这种小说本身都包含有这一种缺点：它们只对社会中一小部分人（比较之词）起作用，对大部分几乎就没有什么关系。且不要说民众了，甚至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中等阶层中，我们看到，还需要获得和认清一些正确概念的人们就比那些已经获得一些观念，却不知道怎样对付它们的人多得多。因此，上面所举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意义现在还是十分专门的，某一个圈子的人要比大多数人较能体会这种意义。不能不承认，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工作，实际效果更大：他抓住的也是贯穿在整个俄国社会中的普遍的愿望和要求，这些愿望和要求的声音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现象中都可以听到，满足这些愿望和要求是我们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此刻不想重复我们在头几篇论文中已经详细说过的同样东西，但是这里要顺便提一提，由于我们的文章在《大雷雨》的一个批评家——亚波隆·格里高列耶夫君心里所产生的奇怪的困惑。应当指出，亚波隆·格里高列耶夫君是欢欣鼓舞地崇拜奥斯特罗夫斯基才能的人之一；但是，——当然，正由于这种过度兴奋，——他从来不曾多少明白地表示他尊重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读了他的文章怎么也不能了解它的意义。但是，格里高列耶夫

君分析《大雷雨》的时候，有好几页却针对我们而发，责备我们，说我们把标签贴到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的人物身上去，把他们所有的人分成两大类：顽固独夫和逆来顺受的人，而把我们喜剧作家的全部工作，归纳为描写他们之间——也就是通常在商人生活之间的关系的的发展。格里高列耶夫君在发出这种责备之后，就叫嚷道，不，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特点和功绩不在这里，而在人民性。但是人民性是指什么呢，格里高列耶夫君不曾说明，因此他的批评在我们看来是十分可笑的。好象我们不曾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里看出人民性似的！其实我们就是从它开始，以它为继续，为结束的。我们寻找过，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究竟把人民生活、人民的追求怎样表现，表现到什么程度，如果不是人民性，那又是什么呢？但是我们并不是每隔两行，就加上惊叹号，为它而叫嚷，而是努力阐明它的内容，格里高列耶夫君从来不认为应该这样做。假如他尝试这样做了，说不定，他也会得出我们下判断时同样的结论，不至于毫无根据地责备我们，好象我们认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功绩就是忠实描写按照古风旧习过日子的商人们的家庭关系。〔凡是读过我们文章的人，都可以看出，当我们指出一种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占有主要地位、而且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中被描写得如此出色的关系的主要特征时，根本不单是指商人们而言。俄国生活对现代的追求，在喜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里，从否定的方面，在最广泛的范围中，得到了它的反映。他既然给我们描写了虚假关系的明显图画以及它们的一切后果，从而，他的作品就成为要求更好制度的这些愿望的回声了。一方面是专横任性，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个人权利缺乏认识，——这就是奥斯特罗夫斯基大部分喜剧所展开的相互关系的整个混乱状态所立脚的基础；权利、奉公守法、尊敬人的要求——这是每个仔细的读者从这个混乱状态中

都听到了的。怎么，你难道要否认在俄国生活中的这些要求的广泛意义吗？你难道没有认识，这一类喜剧的背景和俄国社会生活状况的适应，是比欧洲任何一种状况更接近吗？你拿起历史来看，你回忆一下自己的生活，看一看自己的周围吧，——我们的话你到处都可以找到证明。这里没有篇幅让我们作历史的探索；光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在最近以前，我们的历史还不曾促使守法的感情在我国得到发展（庇罗果夫君也同意这一点；参见基辅区的《惩戒条例》^①），还没有对人格作出坚定的保证哩，却让专横任性得到了广大的天地。这个样子的历史发展，当然会造成社会道德堕落的后果：对个人尊严的尊重是消失了，对法律的信任，从而对义务的认识，也削弱了，专横任性践踏了法权，狡诈在专横之下跃跃欲试。）有几个〔对正常要求失去感觉的〕作家，他们被一些人为的谰语弄胡涂了，他们承认了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事实，要把这些事实合法化，把它们当作生活准绳来歌颂，而不是看作是因不利的历史发展而产生的对自然追求的歪曲。例如，在所谓“天性豪放”的说法之下，他们想把专横任性当作俄国人天性中独特而自然的品质，加在俄国人身上；他们要把欺骗、奸诈也以机警、灵巧的名义在俄国人身上合法化起来。有几个批评家甚至要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里看出他是歌颂俄国人的豪放性格的。有一次为了柳比姆·托尔卓夫，为了这个比他高超的在我们作者那里就没法找到的人物，就掀起过这样的喧嚷。然而奥斯特罗夫斯基是一个有强大才能的人，因此，他就有对真理的敏感，对自然的正常要求怀着天性上的向

① 庇罗果夫(Н. И. Пирогов, 1810—1881)，俄国著名外科教授，教育家，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这里所讽刺的是，庇罗果夫编辑出版的《基辅教育区中学惩戒条例》（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被鞭笞所破坏的全俄罗斯的美梦》）。

——原本编注

往，他不可能向诱惑低头，那专横任性，甚至是最豪放的专横任性，在他的笔下，总描写得和现实生活一样，是一种笨重、丑恶、无法无天的专横任性，——而在剧本的思想深处总可以听到对这种专横任性的抗议。他能够察觉这种天性豪放究竟是什么，因此，就通过几种典型的描绘以及专横顽固的名称，把它烙印下来，〔让它示众出丑。〕

然而这些典型不是他杜撰出来的，正象他不曾去虚构“顽固独夫”这个词儿一样。这两者， he 都是从生活中撷取来的。生活给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顽固独夫们经常在其中活动的那种喜剧情势提供了材料，给他们定出了合适的名字，不言而喻，这种生活还没有完全被顽固独夫们的影响所吞没，在生活本身，还包含着比较理智、〔比较合法〕、比较正确的事物规律的萌芽。在读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每个剧本之后，的确，每个人的内心都会体会到这种认识，他们环顾四周，在其他人们的身上也发现同样的情形。若是你聚精会神注意这种思想，比较长久、比较深入地把它观察一番，你就会发现这种对于〔新的〕、更自然的社会关系结构的追求，本身就包含着我们称之为进步的整个本质，它是我们的发展的直接目标〔，它耗费了新的一代人的全部工作〕。不管你往哪里看，你到处都可以看到人格的觉醒，〔它主张自己有合法的权利，〕抗议强迫和专横任性，〔虽然这抗议大部分还是怯生生的，模糊不定的，准备躲藏的，但还是〕能够使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你就从立法和行政方面来看吧，虽则在它们的种种局部表现中，老是出现许多偶然性，可是它们的共通性，还是可以作为人民状况的指标。当立法措施带着减免、特许、扩大权利的性质时，这个指标尤其显得正确。不顾人民生活的要求，压迫着人民权利的苛重措施，可能是单纯由于专横任性的影响而产生的，这是符合享有压迫其他人们的权利的少数特权分子的利益的；然而

那些目的在缩小特权,扩大共同权利的措施,除了在人民生活的直率而锲而不舍的要求中,无论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无法找到它的根据,这些要求势必要影响享有特权的少数分子,甚至不顾他们的个人的、直接的利益。请你放眼看一下,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农奴获得了自由,而那些以前表示过要给农民自由还太早的地主,现在也相信而且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时候,这个问题的确在人民的意识里成熟了……倘不是缩小专横任性,倘不是高扬人的人格权利,那末在这个问题的深处还包含着什么呢?在其他一切改革和改善中,也是这样的。社会舆论在财政改革问题上,在这一切讨论关于银行问题,关于征税问题等等的大小会议中,看见的又是什么呢?除了希望规定一个比较正确、有条不紊的财政管理制度,从而,贯彻守法精神以代替各种各样的专横任性以外,还希冀什么?是什么东西迫使当权者把一些以前他们是如此害怕的公开权利授给人们的呢,——假使不是认识了在多年之间累积而成、最后终于无法抑制的反对无权和专横的那共同抗议的力量?在公安与行政改革中,在对于正义裁判的关心中,在公开审判的拟议中,在缓和对分离派的严厉态度中,在取消包税制中,又表现些什么呢?……我们谈的不是这一切措施的实践意义,我们只是断言,这些措施试行的本身正在证明我们所指出过的普遍观念的有力发展:虽然它们遭受破坏,或者毫无成就,但这一点可能只是证明:为了实现这些观念而采取的手段还是不充分的,还是虚假的,然而这还无从证明可以去反对因这些观念而引起的要求。] 这些〔要求〕的存在是这样明显,甚至〔只要它们一经显露有在事实上出现的可能,就会立即在〕我们的文学中表现出来。这些要求也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中得到完整而有力的表现,正象我们在少数作者中所已经碰到的那样。然而他的喜剧的价值并不是只在于力量的程度;我们

引为重要的是，他在生活的普遍〔要求〕还是隐藏着、表现得很少而且很微弱的时候，就发现了它们的本质。他的第一个剧本是在一八四七年出现的；〔大家都知道，从那时直到最近几年，甚至我们最优秀作者也几乎失去了人民自然追求的痕迹，甚至开始怀疑它们的存在了，假使有时也感觉到它们的影响，那也是十分薄弱的、模糊不定的，只表现在一些偶然的事情中，而且除了少数例外之外，几乎从来就不曾给它们找到过真正而合适的表现。这一般状况〕当然也有一部分反映到奥斯特罗夫斯基身上去；这种状况也许在许多地方说明了在他以后几个剧本中的那种模糊不定的成份，这种模糊不定在五十年代初期是授人以攻击他的话柄的。然而现在，当注意地考察他的作品的统一性，我们就会发觉，他对俄国生活的真正〔要求和〕愿望并没有丧失敏感；这种感觉有时候也许不可能一眼就发现，可是却始终在他的作品深处保存着。因此，谁要是愿意不偏不倚地搜求它们的根本意义，那么他总会找到；其中的事情不是从表面上、而是从问题深处显露出来的。这个特征使得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就是到现在，当大家都在努力表现我们在他的剧本中所发现的〔同样的愿望〕的时候还是始终屹立在它们的高峰上。为了不要把这一点再扯开去，我们只指出一点：〔要求权利〕，尊敬人格，抗议强迫和专横，你可以在晚近几年我们许多文学作品中发现；但是在这些作品中，大部分问题都不是通过生动、实践的形式而贯彻的〔，人们感觉到的是问题的抽象的、哲学的一面，一切都是从这方面引伸出来的，它们指出了权利，可是对于实际的可能却又置诸不顾〕。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可不是这样：在他的作品里你找到的，不但是问题的道德的一面，而且还有实生活的、经济的一面，这就是问题本质所在。在他的作品里你清楚地看出，专横顽固怎样依靠着厚厚的钱袋，〔人们把钱袋叫作“神的赐予”，人们在它的面前〕所以

默然服从，就决定于在物质上是〔以〕它为依靠的。此外，你还看到，在实际生活的一切方面，这物质的一面怎样控制着抽象的一面，那些丧失物质保障的人很少珍重抽象的权利，甚至对它们失去明确的认识。在实际上，一个吃得饱饱的人他可能冷静而理智地考虑，他该不该吃这种食物；然而饿肚子的人不管在哪里发现食物，不管这食物是什么样的，都要冲上去抓食物。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一再重现这种现象，奥斯特罗夫斯基已经把它们看得而且理解得很清楚了，他的剧本是比任何议论更明白地告诉细心的读者，专横顽固所造成的无法无天的以及粗暴卑微、自私自利的制度，同时又怎样传染到那些蒙受它的折磨的人身上去；而这些人，只要自身多少还保持力量的残余，就竭力利用这种制度去获得独立生活的机会，因此就不再选择什么手段，什么权利了。在我们以前几篇论文中，我们已经过分详细发挥这一题目了，因此现在不必再来重复谈；但在同时，我们虽然提到奥斯特罗夫斯基才能的各方面也象以前他的作品一样，都在《大雷雨》中得到再现，我们还是应当对剧本本身作一番简短的观察，并且告诉大家，我们是怎样理解的。

照现在来说，这也许是不需要的；可是到现在为止因《大雷雨》而写的批评，却又告诉我们，我们的意见并不见得是多余的。

就在奥斯特罗夫斯基以前几个剧本中我们也指出过，这不是纠纷喜剧，这也不是真正的性格喜剧，而是一种新事物，我们要想把它叫作“生活戏剧”，假使这个名称不算太广泛，因此也就不算限得太死的话。我们要说，在他的剧本里，那个不受任何剧中人所左右的共通的生活背景，一直居于重要地位。它既不惩罚恶棍，也不处分被害人；他们俩你都觉得可怜，两者常常都是可笑的，可是剧本在你的心里所唤起的感情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他们身上。你看出，他们的环境正左右着他们，你可以责备他们的

只有这一点：他们没有充分发挥力量，从这个境地中脱身出来。至于顽固独夫自己，你的感情对他们自然应当觉得愤慨，而在仔细审视之后，你就觉得与其去憎恨，不如去怜悯他们了：他们可能是仁慈的，甚至就他们自己来说，在古风旧习给他们限定的、他们的环境所支持的天地里，他们也可能是聪明的〔可是这种环境就是这样，人无法在其中获得完满而正常的发展〕。我们特别是在鲁萨柯夫性格的分析中看到这一点。

因此，理论所要求于戏剧的斗争，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中，它不是通过剧中人的独白，而是通过控制他们的事实而实现的。喜剧人物自身，对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斗争的意义，时常没有清楚的认识、甚至完全没有认识；然而因此，这斗争在那些对产生这种事实的〔环境〕不由得感到十分愤慨的观众的心灵中，就会变得十分清楚而容易认识了。所以我们绝对不把奥斯特罗夫斯基剧本中那些没有直接参与的，看作是没有用处的多余人物。依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些人物也象主要人物一样，也是剧本所必要的。他们告诉我们剧情所以发生的那种情势，描写了决定着剧本主要人物的活动意义的环境。倘要深切了解植物生活的特征，就必须研究植物赖以生长的土壤；脱离了土壤，就只能看到植物的形式，却无从完全知晓它的生活。同样，假使你只从几个不知什么道理彼此互相冲突的人物的直接关系中来观察社会生活，你也不可能认识这种生活的：在这种地方，只有生活的实际的、外表的一面，但是我们却需要知道生活的日常的环境。生活戏剧中那些不相干的没有活动的参加者，每个人忙着的看来都是各人自己的事。——可是他们常常依靠自己的存在，去影响事情的发展，这种影响是什么东西都阻挡不了的。多少热烈的观念，多少远大的计划，多少兴奋的激情，当一看到冷漠而平凡的人群抱着轻蔑的冷淡态度在我们面前走过

去,就突然崩溃!多少纯洁而善良的感情,为了害怕不要成为这个人群嘲笑和谥骂的对象,在我们的心里窒息了!而另一方面,有多少罪行;多少专横顽固的冲动和强迫,要等待这个人群,这个仿佛一直是冷漠而顺从、但在实质上只要有一朝能够认清楚就绝不退让的人群来解决。因此,对我们极其重要的就是,这个人群对善或恶的概念是怎么样的,在他们,什么东西是真理,什么是谎话。这决定了我们对剧本中主要人物的处境的看法,从而,也决定了我们对他们同情的程度。

在《大雷雨》中,所谓“多余的人”特别显得是不能缺少的: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了解女主人公的面目,而且也容易歪曲整个剧本的意义,正象大部分批评家所碰到的那样。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作者终归是错的,假如不能这样容易理解他的话;然而我们得指出这一点,作者是为了公众而写的,而公众,假如不能一下子完全领会他的剧本的实质,那么也不会去歪曲它们的意义的。至于说有几个细节可以写得更好一点,——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毫无疑问,《汉姆雷特》中的掘墓人是比,例如吧,《大雷雨》里的半疯的贵妇人和剧情的发展更合拍,更接近;然而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作者就是莎士比亚,而只是说,他的那些不相干的人物有他们出现的理由,甚至还是为了剧本的完整所必要的,这个完整我们是就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就绝对完美的意义上来观察的。

《大雷雨》正象你知道的,在我们看来它是“黑暗王国”的田园诗,奥斯特罗夫斯基施展他的才能逐步向我们解释了这个王国。这里,你看到人们都生活在幸福的地方:城市座落在伏尔加河岸之上,完全掩藏在万绿丛中;从陡峭的高岸上可以看到远方满布着村落和耕地的空间;美丽的夏日,在河岸上,在户外,在辽阔的天空下,在这从伏尔加河吹来的清新的微风中,是那么诱人

欲醉……的确，这里的住民有时就在这河岸上的林荫道上漫步，虽然他们已经看惯伏尔加河景色的美丽了；晚上，他们坐在门前的土垣上，进行着虔诚的谈话；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都在自己的家里消遣光阴，忙着家务，吃喝，睡觉，——他们睡得十分早，一个不习惯的人要忍受他们给自己安排好的多梦的夜晚，会觉得很痛苦。然而他们吃饱了，要是不睡觉，那又干什么呢？他们的生活是这样平平稳稳地过去，尘世上什么利害都不能打扰他们，因为这些利害从来不会牵涉到他们；许多王国可能灭亡，新的国家建立起来，大地上的面目可以随它高兴怎么改变就怎么改变，世界可以根据新的原则建立起新的生活来，——但是卡里诺夫镇的住民对其他世界虽然毫无所知，还是照旧可以生存下去。偶然，他们也听到一些模糊不清的传闻，拥着二十种民族的拿破仑现在又重新崛起，〔或者，反基督运动已经蠢蠢欲动了；〕然而他们连这也至多只是理解作希奇古怪的笑话，好象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有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长着狗头似的；他们摇着头，对自然的奇迹表示惊奇，于是就回到家里去吃喝了……他们从小就有几分好奇心，可是却没有地方可以去找食料：正象古代罗斯朝圣者达尼尔的时代一样，他们只有从进香的人那里去听到一些新闻，但是现在道道地地的朝圣者已经所剩不多了；他们不得不满足于一些这样的人，这些人也象《大雷雨》中的菲克露莎一样，“因为身体衰弱，不能出远门，但是倒听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卡里诺夫镇的人们，从这些人那里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他们就会想，全世界都跟他们的卡里诺夫一模一样，〔过一种和他们不同的生活，这是绝对办不到的。〕然而就连菲克露莎告诉他们的那些新闻，结果也无法唤起一种伟大的愿望，〔使人们按照别种样子来变换自己的生活。〕菲克露莎是〔属于拥护封建宗法制度一派的，而且极其保守；她〕在虔诚和天真的卡

里诺夫人中间相处得很好：人们都尊敬她，款待她，供给她一切必需的东西；她会得郑重其事地〔说服你，她的最大罪过所以产生，是因为她比其余一切该死的人高超：〕“说到普通人，”她说，“每人只受一个魔鬼的引诱，可是对我们这些朝圣的人，有的给六个魔鬼缠住了，有的给十二个，所以一定要把他们都收服。”于是人们都相信她了。〔显而易见，有一种自我保存的简单本能必然促使她不对其他地方的人们所做的事情说一句好话。事实上，你只要听一听边鄙州县的商人、小市民、小官员的言谈，——你可以听到多少关于无信仰、异教邪说王国的奇闻怪事，可以听到多少当人们受到烧灼、挨尽折磨，强盗洗劫城镇时代等等的故事传说，——可是关于欧洲生活，关于建立更好生活的消息，却又那么少！甚至就在所谓有教养的社会中，在欧化的人们中，在许许多多赞美巴黎新式街道和家具的热心家之中，你难道没有看到几乎是同样多的一本正经的鉴识家，他们在恫吓人家，除了奥地利以外，全欧洲都没有秩序，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正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菲克露莎这样斩钉截铁地说的那个结论上去：“好看极啦，我的人哪，好看极啦，出奇的好看哪！怎么说才好，——你们简直是住在天堂里！”〔当你去想象旁的国家是怎样过日子的时候，〕毫无疑问，你是会得出这个结论的。现在且听听菲克露莎的话：

“人家说，有好些个国家，好姑娘，那里就没有信正教的沙皇，管理国家的只有苏丹。有一个国家，皇位上坐着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还有一个国家，皇位上坐的是波斯苏丹穆罕默德；所有的老百姓，好姑娘，都归他们审问，可是不论审问什么，都是审得不对的。他们简直连一件小事情，好姑娘，都没有法子审得好，——他们天生就这样。我们有公平的法律，可他们的法律，姑娘，就不公平；照我们的法律要这样办才对，他们可完全相反。

在他们那里，在他们国家里的法官，也都是不公平的；所以，姑娘，人家要是向他们告状，状纸上总是写：‘审不清的法官老爷，判我的罪吧！’另外还有一个国家，人人都长着狗头。”

“为什么长着狗头？”格拉莎问。“为了是邪教，”菲克露莎简短地回答，她认为再继续作什么解释，都是多余的。然而格拉莎光是这样就已经满足了；她的生活和思虑，处在昏昏欲睡的单调中，能够听到一些新奇古怪的东西，她就觉得很高兴。有一种念头在她的心里模糊地觉醒：“到底还有一种人，过的生活和我们不是一样；我们的生活当然比他们的好，可是，谁知道他们呢！就是我们也有人过得并不好；说到那种国度，我们还没有怎么知道呢；只能够从好心人那里听几句”……因此，一种想要知道得更多一点，更确切一点的愿望，已经溜进她的灵魂。当朝圣者出去以后，从格拉莎的话里我们已经可以听明白了：“还有这样的国度哩！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呵！可是我们坐在这里，却什么都不知道。幸而还好，还有好心人；到底还能够听到这个世界在做些什么事情；要不然，到死了可还是一个傻瓜啊。”可见，异国他乡的不公平和无信仰，并没有在格拉莎心里引起恐惧和愤慨；只有那些在她看来总有点可以猜测的，——她叫作“奇事”的消息她才感到兴趣。你可以看出，菲克露莎的解释只能在她的心里引起对自己无知的一番怜悯，她并没有感到满足。显然，她正走到了通向怀疑精神的半路。然而当她的怀疑老是遭受象菲克露莎那套故事所破坏的时候，她又怎样保存这种怀疑呢？当她的求知欲被禁锢在卡里诺夫镇的环境在她的四周所划定的范围里时，她又怎么得到正确的见解，即使只提出有理性的问题？何况，不仅如此，当老成长者、优秀人物对这种见解都是完全心安理得的时候；以为他们所承受的见解和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新东西都是因邪教势力而产生的，她还有胆量去怀疑和质问

吗？每个新来的人要去尝试反对这个天真和真诚已经到了令人恐怖地步的愚昧的人群的要求和信念，那是可怕和困难的。该知道，这个人群会把我们当作传染病毒的人，诅咒我们，逃开去，——这并非由于痛恨，也并非由于谨慎，而是坚决相信，我们是反基督分子的同类；假使仅仅把我们当作一知半解的人，把我们嘲笑嘲笑，这还是幸运的……他们寻找知识，喜欢议论，但是仅仅限于那些把理智都弄糊涂的基本概念给他们划定的范围。你可以把一些地理知识传授给卡里诺夫住民；然而不要去触到什么地球是建筑在三根鲸鱼骨上面的，〔耶路撒冷是地球的中心〕——对这一点他们可不会向你让步，虽则，说到〔地球的中心〕，在《大雷雨》中，也象关于立陶宛一样，他们也有明白的认识。“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和平的公民指着图画，问另一个。“这是立陶宛的灭亡，”这个人回答，“这是打仗！你看！这就是我们和立陶宛打仗的情形。”——“立陶宛是什么呢？”——“立陶宛就是立陶宛，”——解释者回答。“朋友，人家说，立陶宛是从天上掉到我们这儿来的，”——第一个继续说；然而和他谈话的人对这一点已经不感到兴趣了：“唔，天上掉下来？就算是天上掉下来吧，”——他回答……这里，一个女人插进谈话里来了：“这还用说！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凡是和他们打过仗的地方，都留了坟墓做纪念。”——“对的，朋友，这是千真万确的！”——问话的人已经完全满意了，他这样叫道。在这之后，你可以问问他，他对于立陶宛是怎么想的呢！天性上喜欢寻根究底的人们所提的一切问题，在这里都会得到这一类结局。这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是比我们可以在科学院和学术团体里遇到的许多人更愚笨，更无理可喻。不，问题的症结在这里：〔由于他们在专横顽固的压迫下所处的地位，所过的生活，他们大家对于愚昧糊涂和空洞无意义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因此〕他们就觉得，如果要

顽强地找寻随便什么合理的根据，这就会显得笨拙，〔甚至显得大胆无礼了〕。提出问题，——这，他们还能做，但是假使回答是这样的，“大炮是一回事，白炮又是一回事”，——那么他们就不敢再尝试去追问，而是顺从地满足于眼前的解释了。这一类对逻辑表示冷淡的秘密，首先就在于，在生活的各种关系上缺乏〔一切〕逻辑性。例如，在《大雷雨》中，奇各伊下面这段谥骂就告诉了我们这个秘密的来由。库里庚为了回敬他的粗暴，他说：“莎维尔·普罗柯菲伊奇先生，干吗你要侮辱一个清白正直的人呢？”奇各伊这样回答他：

“难道我还得向你解释！就是比你更重要的人，我也不跟他解释呢。我要把你看成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对别人你是一个清白正直的人，我可要以为，你是一个强盗，——这就完了。你想从我的嘴里听到这句话吗？那么你就听着！我说你是一个强盗，这就完了！你说你要跟我打官司吗？那么你得知道，你不过是一条蛆虫。我高兴饶你就饶你，高兴压死你就压死你。”

〔在生活是以这些原则作为基础的地方，还有哪一种理论上的判断可以站得住呢！什么法律都没有，什么逻辑都没有，就是这种生活的法律和逻辑。这还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一种比这更坏的东西（虽然，有教养的欧洲人还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无政府状态更坏的东西）。在无政府主义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则：每一个年轻人都以自己为榜样，谁也不去命令谁，每个人对别人的命令都可以回答，说，“我连知道都不想知道你”，因此大家都可以任性胡来，什么事情都不能得到协议。经常受到这种无政府状态（只要它有可能）所影响的社会情势，的确是可怕的。可是你且想

象一下，假如，这种无政府的社会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想保持胡闹的权利，不知道任何法律，另一部分被迫承认前者的任何要求都是合法的，毫无怨言地承受着他们的一切任性举动，忍受他们的一切粗鲁……难道这不是更可怕吗？无政府状态还是无政府状态，因为在社会里还是没有什么合理的原则，任性胡闹还是照旧继续；可是另一半人却不得不蒙受他们的糟蹋，经常不断地以自己、以自己的温顺、自己的恭维去哺育他们。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胡闹任性和目无法纪所采取的规模，是在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下所永远不会采取的。事实上，不管你怎么说，一个放任自己为所欲为的人，他不可能老是在社会中干些傻事的，他很快就会感觉到必须为了共通的利益，同意别人的意见，和别人取得协议。但是一个人假使在许多象他一样的人那里，让锻炼自己的任性胡闹得到广阔天地，假使在这些人的依人篱下、受垢忍辱的处境中看到自己的专横顽固可以得到巩固持久，那么这个人就永远也不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了。因此，专横顽固在缺乏任何法律和人权方面同无政府精神虽然有共通之处，而在实质上却比无政府状态更要无比恐怖，因为它使胡闹任性获得更多的方法和活动天地，去迫使大多数人都蒙受他的荼毒，——而且在这一点上它还比无政府状态更危险：它可以支持得更长久。无政府状态（再重复一遍，假使一般说来，这是可能的话）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本身应当逐步变得合理起来，而达到多少比较正常的境界；相反，专横顽固却竭力使自己合法化，把自己当作一个不可动摇的制度。因此，他一面对本身的自由抱着一种漫无边际的见解，同时又竭力采取各种手段，使自己能够永远保持这种自由，使自己能够避免一切大胆果敢的尝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仿佛也承认某几种崇高的要求，虽然自己也在违反这些要求，但是对别人却又坚持这些要求。当奇各伊为了维护

自己的任性，坚决反对在判断一个人的时候要有一套道德和逻辑根据，说了那段道白以后，过了几分钟，——库里庚为了解释大雷雨，说到了电气，就是这位奇各伊又开腔骂起库里庚来了。“哼，你真是一个强盗，”他叫道，“打雷是老天要罚我们，要我们能够理会，可你倒要发明什么枪儿，刺儿，去挡住它，真是罪过。你难道是鞑靼人吗？你是鞑靼人？你说，你是鞑靼人不成？”但是就在这种关头，库里庚也不敢回答：“我乐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谁可以命令我”。他怎么敢呢，——他连解释都不敢解释哩：他们总是以叱骂来回答他的解释，甚至连话也不让他说。〔到了对每一种理由都用拳头来对付，到了拳头最后永远是正确的时候，到这地步，你不得不停止争论了……〕

然而——真是奇怪的事！——俄国生活中的顽固独夫依靠他们的谁都不能抗拒、谁都要服从的黑暗统治，虽然让自己的怪癖有了充分的自由，把随便什么法律和逻辑都放在脑后，但在同时，他们也开始感觉到一种不满和恐惧了，自己也弄不清怕的什么，为什么怕。一切似乎都照旧，都很好；奇各伊要骂谁就骂谁；当有人对他说，“全家的人为什么没有一个合你的胃口呢！”——他颇为自得地回答：“你想对了！”卡彭诺娃坚持要使孩子们照旧陷在恐惧里，强制媳妇要遵从古时的礼节，好象腐蚀铁一般地折磨她，认为自己什么罪过都没有，〔接受各式各样菲克露莎的讨好。〕可是他们还是不能安心，还是感到不舒服。基于另一些原则的另一种生活不曾理会他们，也不曾征询他们的意见，就生长起来了，虽然这种生活还是遥远的，还不能好好看清楚，然而已经让他们预感到了，〔而且给顽固独夫们的阴沉的专横送来了不吉利的幻象。他们恼怒地搜索着敌人，准备攻击最最无辜的人，准备攻击随便那个象库里庚这样的人；然而没有一个仇敌，没有一个罪人是他们能够消灭的；时间的规律，自然

和历史的规律占了上风，于是老卡彭诺娃们只好沉重地太息，领会到，有一种比他们更高的力量在，这种力量是他们无法制服的，而且连如何去接近它的方法都不知道。他们不打算让步（暂时也没有什么人要求他们让步），然而却蹉缩、痉挛起来；从前他们要想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永世都不毁灭地存在下去，现在他们也竭力这样宣传；但是希望已经黯淡了，他们现在实际上忙碌着的，就是能够使这种方式尽可能比他们的一生更久远……〕卡彭诺娃断言什么“末日来啦”，当菲克露莎把当前各种可怕的事情——关于铁路等等告诉她时，——她〔预言地〕注解道：“你知道，将来还要更坏呢。”——“但愿我们不要一直活到这个时候”，——菲克露莎叹口气地回答。——“说不准我们能够活到吧，”卡彭诺娃又是带着宿命论的口气说，暴露了自己的怀疑和不信。但是她为什么要不安呢？老百姓要坐着火车来了，——可是这和她有什么相干呢？你不是看见吗：她，“即使你把所有金子都撒到她身上”，她也不会要坐魔鬼发明的车子；可是老百姓坐车的却越来越多了，他们并没有注意她的诅咒；难道这是不值得悲哀的吗，难道这不是她的无力的证据？人们探测到关于电气，——这看来，〔对于奇各伊和卡彭诺娃〕有什么侮辱的地方呢？然而听见没有，奇各伊说，“打雷是老天要惩罚我们，要我们能够理会”，但是库里庚却并不理会，或者理会的完全不是这回事，他还是在扯淡关于电气。难道这不是放肆，这不是轻视奇各伊的〔权力和〕重要性吗？大家不愿意相信他所相信的事情，——那就是说，连带对他也不相信，而认为自己比他更聪明了；你评评吧，这会得出什么结果来呵？无怪卡彭诺娃对库里庚要发表这样的意见：“时势变啦，出现了什么样的教师！老年的人都这样说啦，年轻小子，你还希望他说什么呢！”因此，卡彭诺娃十分沉重地为她已经度过一生的古老秩序的前途而忧伤。她预见到它们

的终结，她竭力维护它们的意义，可是却已经感觉到，大家对它们已经没有先前那么尊敬了〔，大家已经不大愿意保持它们，只是出于不得已，一有可能，就要把它们弃如敝屣〕。她自己也感觉到，已经失去她的一份〔武士的〕热情了；她已经没有先前那样的精力，去关心古风旧习的遵守了，在许多事情上她已经只能挥挥手，〔对着无法阻止的洪流垂头丧气，〕只是绝望地看着〔这股洪流〕渐渐淹没她那古怪的迷信的驳杂的花坛。正象最后一批异教徒在基督教的威力之前一样，被新生活的进程所当头拦住的顽固独夫的成长，一碰到新的生活的洪流，也一蹶不振，也被冲涤光了。在他们身上，甚至连进行直接的公开斗争的决心都没有；他们只是拚命想出些什么来欺骗时代，同时对新的运动倾倒下毫无结果的怨诉。这些怨诉经常可以从老年人那里听到，因为新的一代总是经常把一种跟旧秩序相对立的新事物带到生活中来。但是现在顽固独夫们的怨诉已经带着一种特别阴沉的、〔送葬的〕调子了。卡彭诺娃还感到安慰的只有这件事，就是凭着她的帮助，古老秩序多少还能维持到她的死亡；到了那时候，随它怎么样吧，——她反正看不到了。在送儿子上路的时候，她说，随便什么事情，都不是顺着她的心意做的；儿子甚至并不向她屈膝下跪，——这一点应当要他做到，但他却没有想到；甚至他对自己的老婆都不“命令”；当他出门以后，她该如何过日子，而且他也不懂得发号施令，就在分别的时候，也并不要求她下跪磕头；做媳妇的呢，把丈夫送走之后，也并不号啕大哭或者躺在台阶上，以表示自己的爱情。卡彭诺娃竭尽可能把秩序建立起来，可是她已经体会到，完全按照古风旧习来安排事情，这是不行了；例如，关于在台阶上痛哭一顿的事情，她只是装出劝告的样子，向媳妇提了一下，却没有决心认真地要求……但是送走儿子这回事，是引起了她产生这种忧悒的想法的，“年轻小子算是什

么！连看看他们都觉得好笑！他要不是我的儿子，我真会笑一个痛快。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规矩都没有。他们连告别上路都不会。家里有了老年人才象话，——只要活着，就好给他们撑持门户。可是这些傻瓜也想要自由自在；但是真给他们自由，他们就会闹得乱七八糟，使得好心肠的人也会发笑。当然，也有可怜他们的，可是大多数人都要笑他们。不笑可办不到；把客人叫来了——却不知道怎样请他坐，真的，他们连谁是亲戚都会忘记。这真是笑死人了！老法就是这样废绝的。有的人家，你连进去都不想进去。就是进去了，你也会要呕吐，得马上退出来。要是老年人有一天死掉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世道会变成怎样呢，我简直就不知道啦。呃，这样也好吧，到那时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当老年人快要老死的时候，年轻人也要渐渐衰老了，——在这一点上，这个老婆子大可不必担心。然而，说实话，你可知道，在她，要紧的可不是：任何时候都有人留心规矩，去教会没有经验的人；她需要的是：她认为良好的规矩，应当千古不灭地保持下去，她认为是良好的见解要永远都不遭受侵犯。〔由于她的褊狭而粗野的自私自利，她甚至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只要原则获得成功甚至不惜牺牲既存公式而求得妥协；而且也不可能向她期待这一点，因为在她实在并没有什么原则，实在并没有什么驾驭着她的一生的统一的信念。在这方面，她比所谓开明的保守派实在更要卑下。那些人究竟还能够把自己的自私自利稍稍打开一点，让公众对秩序的要求和这种自私合在一起，因此为了保持秩序，甚至不惜牺牲某一些个人趣味和利益。例如，他们要是处在卡彭诺娃的地位，就不会吐露关于叩头鞠躬以及丈夫对妻子的侮辱性的“命令”这些畸形而低级的要求，而只是关心共同观念的保存，——比如妻子应当害怕丈夫，顺从翁姑。这样做媳妇的

就不会亲身经历这些沉重的场景，虽然她也同样完全依赖着这个老婆子。于是结果便变成这样：不管这个青年女人处境怎么坏，可是由于她受到的是一种缓慢而均匀的压迫，她的忍耐心总比被强烈而残暴的行为所刺激时，更能维持得无比长久。这里当然很明白，就卡彭诺娃自己、就她所捍卫的那个旧时代来说，若要保持事情的实质，放弃某一些空洞的形式，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实在是更加有利的。然而卡彭诺娃之流并不理会这一点：他们甚至并没有达到这一境界：为了表现和捍卫一些在他们以外的原则，——他们本身就是原则，因此，凡是一切和他们有关的东西，他们都认为是绝对重要的。他们所需要的，不只是要人家尊敬他们，而且这种尊敬必须通过一定形式表现出来：请看，他们还站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正因为这样，当然，凡是他们的影响所及的一切事物的外表，总比较那些放弃了专横顽固、只想竭力保持自己的利益和价值的实质的人所表现的样子，保有更多的古风，更显得不可动摇；然而在实质上，顽固独夫的内在价值是比那些善于作表面让步以保护自己以及自己的原则的人的影响，更加接近自己的结局。〕正因为这样，卡彭诺娃就怏怏不乐，正因为这样，奇各伊就丧魂落魄：他们直到最后的时刻还不愿意收缩自己的漫无限制的习癖，〔他们现在正置身在一个破产前夜的富商的境地中。〕他的一切都照旧，〔他今天举行庆祝宴会，早晨决定了百万金元的投资，借贷关系还没有破坏；然而已经在流传着一种谣言：他的手头已经没有资金了，他的买卖是不可靠的，于是明天便有几个债权人故意来提出要求；钱没有，延期办不到，整个欺诈性的、变成财富幻影的大厦明天就要垮台了。——事情不妙……当然，在这种情势之下，一个商人全副精神所贯注的，就是欺骗他的债权人，促使他们相信他的财富：同样，卡彭诺娃和奇各伊们现在操心的，也只是要别人继续信仰他们的力量。至

于挽回自己的事业，他们已经不这样打算了；然而他们却也知道：当大家看见了他还是胆怯战栗的时候，他们的放肆任性可还有相当的活动余地；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到了最后的时刻，当他们自己也感觉到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顽固，这样妄自尊大，这样咄咄逼人的原因。他们对现实的力量越少体会，向他们指出他们已经丧失任何理性依靠的那种自由而健全思想的影响越是强烈，他们对任何理性要求的反抗也就越是荒唐和疯狂，就越要以自己和自己的专横来代替这些理性要求。〕奇各伊和库里庚说话时那种天真态度：“我要把你当一个骗子就是一个骗子；你是正派人，这跟我不相干，我也不打算告诉人家，为什么我这样想”，——假使库里庚没有用一个谦逊的责问去激怒他：“为什么你要侮辱一个正直的人？……”这一种天真也许不会通过他那一套〔蛮横的〕荒唐而表现出来。〔可见，奇各伊一上来就企图打消要求他明白答复的任何尝试，就想指出，他不但超出于任何说明解释之外，而且还超出人类普通逻辑之上。他觉得，假使他承认一切人都公认的常识的规律是超过他的，他的重要性就要因此大大遭殃了。在大多数情形下，的确这样发生了，——因为他的要求总和常识相敌对。〕那种永恒的不满和激怒，就是因此在他身上发展起来的。当他谈到，要他付钱是多么难过的时候，他自己就说明过他的处境：“我的心里既然这样想，你就没法命令我这样做！我也知道，应该付钱，可是我心里却不愿意。你是我的朋友，我应该付给你，可是假使你跑来求我——我就要骂你。我付是会付的，可是骂也得骂。因为只要一跟我谈到钱的问题，我的心里就会发烧，浑身都发起烧来……在那种时候，我就会无缘无故骂起人来。”付钱，这是物质的显而易见的事实，甚至在奇各伊本人的脑子中，都会激起这一种想法：他自己承认他是多么荒唐，却把罪过推到“他的心就是

这样的！”而在其他一些事情中，他甚至并不怎样认识自己的荒唐；然而由于他的性格的本质，当常识每一次占据上风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感觉到正象必须把钱付给别人时的同样的激怒。他所以舍不得付的原因是：由于天生的自私心肠，他希望自己过得幸福；周围一切事物都告诉他，这种幸福可以用金钱去获得；对钱发生剧烈的眷恋就因此而起。然而他的发展就在这里停止下来，他的自私自利就留在个人的范围里，却不知道它跟社会的关系，对自己亲人的关系。他需要越来越多的钱——这他是知道的，因此他只愿意把钱收进来，却不愿意付出去。到了按照事情的自然趋势，必须付给的时候，他就动火、骂人：他看待这种事，好象一种灾难，惩罚，好象失火，淹水，罚款，而不是看作人家给他做了事应有的、合法的支付。在一切事情上都是这样：由于希望自己幸福，他需要有活动天地，需要独立不羁；然而他却不想知道规定了取得和享受社会中一切权利的法律。〔他只希望给他的权利更多些，尽可能更多些；到得需要承认别人也有这些权利的时候，他就认为这是侵犯他的个人尊严了，发起火来，竭力使用各种手段把事情拖延，阻碍着它。甚至当他知道必须让步或者以后必须让步的时候，他首先还是竭力耍无赖。“我高兴付——我就付，可是我要骂人！”因此可以想见，要付的钱的数目越大，钱越是绝对非付不可，奇各伊就越是骂得凶……根据这一点可以归结说：第一，他的冒骂和那一套装疯作傻，虽然是令人不愉快的，然而却并不特别可怕，因此，谁要是害怕了，让步不要钱，并且想，钱已经无法收到了，这个人就是愚不可及的；第二，要用什么手段去开导奇各伊，希望他改邪归正，这也是徒劳无功的：做荒谬勾当的习惯在他的身上是这样强烈，他甚至不顾自己的常识的呼声而宁愿受习惯的支配。显而易见，在一种他所明白看到的、外在的力量还没有跟理性见解联合起来的时候，任何

理性见解都不能去阻止他：他咒骂库里庚，根本不注意什么理由；可是到他自己有一天在伏尔加河的渡船上挨到骠骑兵的叱骂时，他就不敢和骠骑兵接口了，结果还是回到家里去出气：在这件事以后，大家总有两星期都避开他，躲在顶楼和仓房里……

所有这一切类似的关系]使你感觉到：奇各伊们，卡彭诺娃们以及一切和他们相似的[顽固独夫们]的处境，已经远不象先前幸福的封建宗法风习时代那样安静和坚定了。假使相信老辈人的传说，从前[奇各伊是能够不依靠强力，而是凭大家一致同意，来贯彻他的狂妄的怪想的。他胡作非为，并不想到会碰到什么对抗，而且也的确没有碰到对抗；所有周围的人都浸透着一种思想，一个愿望——迎合他；除了实现奇各伊的苛求以外，他们就想象不出自己的生存还有其他目的]。一个寄生者越是蛮横无理，[越是赤裸裸地践踏人权]，那些以自己的劳动去喂养他，被他当作他的幻想的牺牲品的人们就越是觉得满意。年迈的仆人恭恭敬敬讲到他们的[身为高官的]老爷怎样欺压小地主，[侮辱别人的妻子和无邪的姑娘，怎样在马棚里鞭打派来见他的官员，]等等的故事，——[军事史家讲到了拿破仑的伟大，他为了娱乐自己的天才，毫无顾忌地牺牲几十万生灵，]善于向妇女献媚的老人回想起他们从前那个唐·璜，他“一个人都不放过”，对每个姑娘都要玩弄一下，使每个家庭都弄得反目，——所有这一类故事都证明，这个宗法时代离开我们还并不十分久远。[然而，使得顽固的寄生者大为伤心的是，——这个时代早就远远离开我们了，现在奇各伊们和卡彭诺娃们的处境远没有这样愉快：他们应当关心，如何使自己巩固起来，保卫自己，因为到处都产生了和他们的专横任性相敌对的要求，这种要求威胁着他要和极大多数人已经得到觉醒的常识来一场斗争。——顽固独夫们的不断的怀疑，拘泥不化、挑剔苛求，就是从这里产生的：虽然他们

在内心上也认识到自己是不值得尊敬的，但是他们甚至自己对自己都不肯承认这一点，由于他们的要求渺小卑微，不断地、反复地提醒人家、暗示人家他们应当得到尊敬，因此就暴露了他们是缺乏自知之明的。在《大雷雨》中，在卡彭诺娃和孩子们的一场中，这个特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当她回答儿子所说的那种俯首帖耳的话：“好妈妈，难道我会不听你的话吗？”她反驳道：“现在的年头，老一辈已经不大受人敬重了！”——接着就唠唠叨叨的埋怨儿子和媳妇，使得在一旁听着的人都觉得忍不住了。]

卡彭诺夫 好妈妈，我想我从来没有违背过您的意思吧。

卡彭诺娃 要是我没有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现在的年头，儿女是怎样敬重父母的，我的儿，我简直要相信你的话啦！你只消想一想，做母亲的为了儿女吃了多少苦。

卡彭诺夫 妈妈，我……

卡彭诺娃 要是做母亲的有时为了你傲慢无礼，发起火来，那我想，你该受得住的吧！你怎么想呢？

卡彭诺夫 妈妈，我什么时候受不了呢？

卡彭诺娃 妈老了，胡涂了；你们这些聪明伶俐的年轻小子，不应当跟我们这些胡涂蛋抬杠。

卡彭诺夫 （叹一口气——旁白）啊呀，我的天！（向母亲）妈妈，我怎么敢这样想呢！

卡彭诺娃 要知道父母对你们严厉，是为了爱，责骂你们，也是为了爱，什么都是为了教你们学好。可是现在这种事情做儿女的是不欢迎的。而且做儿女的还要逐个面前去张扬，说是妈妈老是叽叽咕咕，不给他一条生路，把他们折磨得要死……唉，老天保佑，要是不说些什么话巴结巴结媳妇，——咳，她就要到处去讲，婆婆

已经完全把她吃啦。

卡彭诺夫 妈妈，难道有谁讲过您吗？

卡彭诺娃 没听说过，我的儿，没听说过，我不想撒谎。要是我听到这样说，我的儿，那时候我就不会这样跟你讲啦。

在这个承认之后，老婆子还是继续向儿子唠叨了整整两页之多。她这样做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可是她的内心却老大不安：她的心是个预言家，这颗心使她体会到总有些什么不对劲，她和家庭里年轻一代人们的内在的、活的联系，〔早就〕绷断了，现在，他们只是机械地和她联系在一起，只要有随便什么机会离开，他们都是高兴的。

我们对《大雷雨》中主要人物讲得特别详细，因为，照我们的意见看来，卡德琳娜所经历的变故，完全决定于这种情势，——只要置身在这样的人物中，置身在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建立的生活方式中，这种情势就必然落在她的命运之上。《大雷雨》，毫无疑问，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最果断的作品；专横顽固和默然顺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剧本中达到了最悲剧的结果；但是尽管如此，大部分读过和看了这个剧本的人都会同意，这个剧本所产生的印象，并不比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其他剧本更沉重、更悲哀（当然，且不谈他的纯喜剧性质的试作）。在《大雷雨》中甚至有一种使人神清气爽、令人鼓舞的东西。这个所谓“有一种东西”，照我们的意见看来，就是我们所指出的、暴露了专横顽固的动摇〔和日暮途穷〕的剧本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上所描写的卡德琳娜性格的本身，也使我们呼吸到了一种新的生命，这种生命正通过她的毁灭而被揭示出来。

因为问题在于，《大雷雨》中所描写的卡德琳娜的性格，不但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中，而且还在我们整个文学中迈步前

进了一步。这种性格是和我们〔人民〕生活的新阶段相呼应的，他早就要求要在文学中有他的存在，我们的优秀作家都围绕着他而活动；然而这些作家只能理解他的必要，却不能领悟和体会他的实质；奥斯特罗夫斯基却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那一篇批评《大雷雨》的文章都不打算、或者也不善于对这个性格下适当的评价；因此我们打算还要延长我们的文章，以便比较详细地叙述我们是怎样理解卡德琳娜的性情的〔，这种性格的创造对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这样重要〕。

〔俄罗斯的生活最后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善良的、令人尊敬的但却软弱而没有性格的人，已经不能使社会认识感到满意，而且到处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了。人们已经感到迫切需要一些虽然并不怎样美丽、但却比较干练、比较有毅力的人物了。否则就不行：〕只要对真理〔和权利〕的认识、健全的思想一旦在人们心中觉醒，他们就必然要求不但要在抽象上对这些认识和思想表示赞同，〔（过去时代有德行的英雄一直是以这种抽象的赞同来炫耀的）〕，而且还要把它们灌输到生活中去，贯彻到行动中去。然而要把它们灌输到生活中去，就得克服〔奇各伊们、卡彭诺娃们等等所造成的〕许多阻碍；而为了克服这些阻碍，就需要一种〔有进取心的、〕果敢而坚毅的性格。那种〔最后终于〕突破〔顽固独夫奇各伊们所造成的〕一切障碍而迸发出来的真理〔和人权〕的〔共同〕要求，应当在这些性格中得到体现，应当和他们合而为一。今天的巨大课题就是，〔在我们这里〕为社会生活的新转变所要求的人物应当怎样形成和出现。我们的作家曾经尝试过解决这个课题，但是多少都遭受了失败。我们以为，他们所有的失败都是因这一点而发生的：他们只是通过逻辑的过程达到这种见解，以为俄罗斯生活找的就是这种人物，于是就按照自己对一般的勇敢、尤其是对俄国式勇敢的

要求的理解，裁制成这种人物。例如，象卡里诺维奇^①这种人就是这样而出现的，他差一点要拉住商人胡子，要他为了社会的福利而牺牲成千上万的钱，并且还在监狱里拷问老公爵，为了安排自己的前程，他娶了这个公爵的情妇做妻子。斯托尔兹也是这样出现的，他善于治理产业，〔而且还能够在好心的官长帮助下，机灵地把那张假期票作废〕。还出现了一个英沙罗夫，〔他把一个德国人丢在河里，〕他不同意在朋友的别墅里作客，白白浪费光阴，他甚至打算和随便那个姑娘结婚〔!!〕。还有公爵夫人齐那伊达^②，这个介乎巾幗彼巧林和女中罗士特来夫之间的人……这一切都是对坚强的、彻头彻尾的性格的追求。然而在他们之外，去年，还出现了一个安那尼·雅各武来夫^③，由于他的出场，莫斯科的阿波隆·马伊柯夫先生^④就在《圣彼得堡时报》发表了一篇奇妙的短文，我真不懂，库齐玛·普鲁特柯夫^⑤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不曾根据这篇短文编出一连串新的警句来。你也许已经知道，安那尼·雅各武来夫当发现了在他出门以后他的妻子和地主所生的婴孩时，他就暴跳如雷了，他一方面虽然十分恭敬地和地主理论，但是另一面他对园丁的态度却是粗暴的，他还刺死了妻子，最后，由于狂怒得实在不能忍受了，就抓起婴孩把头往墙角撞去，在这之后，他逃到森林里去，但是，由于饥饿难忍，就向法院自首。显而易见，这个人物该是坚强有力的了，

① 卡里诺维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一千个灵魂》中的主人公。

② 公爵夫人齐那伊达，她是屠格涅夫中篇小说《初恋》中的人物。

③ 安那尼·雅各武来夫，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戏剧《痛苦的命运》中的人物。

④ 所谓“莫斯科的阿波隆·马伊柯夫先生”，是指写过论《痛苦的命运》的作者，立场反动的评论家阿·亚·马伊柯夫。作者所以特别加上“莫斯科的”，意思是不要把这个马伊柯夫和俄国著名诗人阿·尼·马伊柯夫相混。

⑤ 库齐玛·普鲁特柯夫，这是诗人亚·康·托尔斯泰、席姆楚瑞尼柯夫的集体笔名；他们用这个笔名发表了许多寓言、谐谑诗、警句等。

虽然这多半只有生理的意义，而道德与文学的意义却比较少。然而从俄国生活的秘密源泉中迸发出来的，还不是这种力量〔，而且它的表现也不可能这样〕。因此我们根本不理解，《痛苦的命运》为什么可以高出无数揭发了农奴制〔，官僚的愚蠢〕以及俄国庄稼人的粗鲁的中篇小说、喜剧和正剧之上。假如你把它当作一种没有特殊的要求的、纯粹是通俗笑剧情节的、和苏①的残酷的作品相似的剧本，——那我们就会无话可说，甚至还觉得很满意：因为这总比，例如吧，尼·尔伏夫君和索洛古勃伯爵的〔令人安慰的〕想象好〔，他们把所谓义务和荣誉的概念完全曲解了，使你感到吃惊。〕然而假使你们强说这个剧本具有一种更高、更普遍的意义，那么我们绝对看不出有什么可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安那尼·雅各武来夫，〔并不是当作一个特殊胆怯的人来描写的，〕照我们看来，这是一种诬蔑了俄罗斯性格〔和俄罗斯生活〕的典型，俄罗斯生活无论对于象安那尼这种性格的发展，无论对于象契格洛夫②这一类地主性格的发展，都没有多大用处。两者必居其一：假使安那尼的确是个有坚强性格的人，正象作者要把他描写的那样，——那么他〔应当使自己的愤怒直注使他不幸的原因〕，或者领悟到这里谁也没有错，而克制住自己；当一些坚强性格的人物和敌对的环境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样的收场，我们在俄国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假如正象实际的剧情所表现的，他真是一个胆怯而头脑糊涂的闯祸鬼，那么就应当承认，剧本中为剧情所选取的情势，和这种典型完全不相适合，而且它的发展也还完全不足以明白解释它的根本特征。但是，——上帝保佑它，保佑这个剧本：它已经被人们忘却了，正象《鲁波维茨基公爵》③以

① 即欧仁·苏(Eugène Sue, 1804—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他写过一本通俗小说：《巴黎的秘密》。

② 契格洛夫，他也是庇雪姆斯基的剧本《痛苦的命运》中的人物。

③ 《鲁波维茨基公爵》，这是斯拉夫派康·谢·亚克萨柯夫的喜剧。

及其他一些目的在于表现具有独特色彩的民众典型,用心良好、但却虚伪的作品,被人们遗忘一样。我们所以对这个剧本讲了一些时候,仅仅是因为,许多人把安那尼当作彻头彻尾的俄国典型。可是相反,我们却以为,在他的身上仅仅只使我们觉得这是某几个作家所谓“俄国人天性豪放”的一种夸张。照我们的意见看来,《痛苦的命运》却在无意中达到了象根据彼得大帝反对分离派教徒的敕令而写的喜剧所达到的同样结果。大家都知道,在那些喜剧中,总是把分离派描写成一些粗野而没有意义的怪物,因此,这个喜剧就这样嚷道:“瞧,他们就是这样的;难道能够相信他们的学问,同意他们的要求吗?”《痛苦的命运》也是这样的,它向我们描写安那尼·雅各武来夫的时候,也说:“当一个俄国人〔多少体会到自己个人的尊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由于这样的结果〕,他就丧失自制了!”所以那些承认《痛苦的命运》有普遍意义、承认安那尼是一个典型的批评家,他们就变成了这种毁谤的同谋犯,当然,这种毁谤从作者说来是出于无心的。

这种俄罗斯的坚强性格,在《大雷雨》中却不是这样理解、这样表现的,他首先使我们震惊的是,他表现了和任何专横顽固的原则都是势不两立的。他表现于我们之前的,既不是带着一种狂暴〔与破坏〕的本能,但是也缺乏一种〔为了崇高的目的〕从而安排自己的活动的干练机灵,他既不是抱着无意义的、夸张的热情,但也没有外交的、学究的算计。不,他是意志集中而坚决的,百折不回地坚信对〔自然的〕真实的敏感,对〔新的理想〕满怀信仰,乐于自我牺牲〔,就是说,与其在他所反对的原则底下生活,他就宁使毁灭〕。他不是受抽象的原则、不是受实际的想象,不是受一刹那间的激情所左右,而纯粹是受形成他的全部本质的天性所左右的。当老朽而粗野的关系已经丧失任何内在的力量,继续依靠外表上机械的联系来维持的时候,这种坚强人物的力

量以及他的实质上的必要就在于性格的完整与和谐里。一个人假使只从逻辑上来理解奇各伊们和卡彭诺娃们的专横顽固的荒谬，那么由于任何逻辑在他们面前都已消失无踪，要反对他们就毫无什么办法；〔你们随使用什么三段论法都不能说服锁链，要它在囚徒身上断裂开来，说服拳头，让挨打的人不至于因为吃了拳头而疼痛。同样你们也无法说服奇各伊，叫他放聪明一些，而且也无法去说服他的家属，叫他们别听从他的怪癖，他要折磨他们大家，这就完了，你对这种事能怎么办呢？〕显然的，一个只有在逻辑方面是坚强的性格，他的发展一定是十分贫弱的，在那控制整个生活的不是逻辑，而是〔彻头彻尾的〕专横顽固的地方，他只能对生活活动有极微弱的影响。奇各伊的统治，就是对那些所谓有实际头脑的坚强的人的发展，也都不是十分有利的。不论怎么解释这个意义，可是在实质上，这无非是善于利用时势，使时势符合自己的利益而已。所以，只有到了形势是按照正常的逻辑，从而，也就是按照人类道德的自然要求而形成的时候，务实精神才可能引导人去诉诸直接而正直的行动。然而在一一切都取决于〔粗野的〕力量，在某几个奇各伊狂乱地为所欲为，或者某一个卡彭诺娃迷信的执拗破坏了最正确的逻辑打算，赤裸裸地蔑视相互权利的最起码基础的地方，所谓善于利用时势，显而易见，就转变为迎合顽固独夫的脾胃，在他们那一套荒唐底下弄虚作假，以便给自己造成通到有利地位的道路。波德赫留静和乞乞科夫，就是〔“黑暗王国”〕中坚强的实际人物；其他的人们，在这些彻底的实际性格的人中间，在奇各伊们统治的影响下，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从这些实践家中，我们所能够幻想的最好的东西，这就是象斯托尔兹一样，就是说，他们能够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琐事琢磨得很周到；然而在他们中间是不会出现生气勃勃的〔社会〕活动家的。至于那些只有刹那间生命、倏然一现的悲

壮的性格，对他们〔自然更不可能有所指望了〕。他们的奋发是偶然的、短促的〔；他们的实际意义决定于成功〕。当一切都按照他们的希望而进行时，他们是勇敢的，是有进取心的；可是一旦碰到坚强的对抗时，他们就丧魂落魄了，就气馁了，就置身事外了，只限于声音虽然高亢、但却是无结果的叫嚷。〔正因为奇各伊以及象他一样的人，不遇到对抗，就完全不会显出他们的价值和力量，正因为他们的影响，已经在生活本身刻下深邃的痕迹，从而无法一下子把它们消灭，因此，说到悲壮的性格你丝毫都不能把他当作严肃的东西来观察。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势之下，当显然可见的成功已经鼓励着他们的时候，就是说，当顽固独夫可能了解本身地位的动摇，开始让步的时候，——就是到了这时候，那些悲壮的人们还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他们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只注意事情的外表〔和最切近的后果〕，几乎从来就不会窥入事情的深处，窥入事情的本质。〔因此，他们十分容易得到满足，容易受到他们那些原则的局部的和细小的成功征象所欺骗。〕到〔了〕他们的错误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很明显的时候，那时他们就变得绝望了，沉入到麻木和束手无策的境地。〔于是奇各伊和卡彭诺娃继续得到胜利。〕

因此，我们在分析我们生活中所出现、我们的文学中所再现的各种各样典型时，我们总是有这种见解：他们不可能成为我们今天所感觉到的、〔我们上面已经尽可能详细说过的那种社会运动的代表〕。当我们看到这一点，就问自己：但是，〔在个别人物身上的新的追求，又怎样解释呢？那些和生活中的老朽、荒唐和强暴关系断然决裂的性格，应当有哪一种不同的特征呢？〕在〔已经觉醒的〕人群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看到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暗示，而在文学中，还只能看到这些暗示的微弱的重复；然而在《大雷雨》中，它们已经构成一个整体了，已经具有十分明显的轮廓

了；《大雷雨》所显现在我们之前的人物，是直接从生活中选取出来的，但是他们都经过艺术家头脑的解释，而且是置身在这样的境地中：这种境地能够使他们比日常生活的大多数场合暴露得更加全面而彻底。因此，这里并没有银版照相的细节，象某几个批评家所责备于奥斯特罗夫斯基似的；然而却有通过俄国生活各种不同情势而表现出来、但目的只在于表现一种观念的同一类特征的艺术结合。

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中，在奇各伊们和卡彭诺娃们的环境中活动的那种坚决而彻底的俄罗斯性格在妇女典型中出现，这并不因此丧失其严肃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极端一定会得到极端的报复，最强烈的抗议最后总是从最衰弱的、而且最能忍耐的人的胸怀中迸发出来的。奥斯特罗夫斯基所赖以观察俄罗斯生活、并把它描写给我们看的舞台，〔还没有触到纯粹的社会和国家方面，而只〕限于家庭方面；在家庭里面，除了妇女以外，哪一个比随便什么人忍受更多专横顽固的全部压迫呢？奇各伊的管事，工人，佣仆，哪一个会象他的老婆一样受到驱逐、压迫，还要鄙弃自己的人格呢？在哪个个人心里会对顽固独夫的幻想充满如许悲痛和愤懑呢？而且同时，有谁还会比她更缺少可能去吐露怨诉，更缺少可能去拒绝执行她所反对的事情呢？仆人和管事只是在〔人事关系上〕有物质的联系；只要一旦找到别的地方，他们就立刻撤下这个顽固独夫了。至于妻子〔，照流行的见解看来，〕和他，却在精神上，通过隐秘的方式，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不论丈夫做什么事情，她都应该顺从他，和他共同经历〔无意义的〕生活。最后，她即使能够离他出走，她又躲到哪儿去，去干什么？库特里亚希说：“我是奇各伊需要的，因此我就不怕他，我不会让他来作践我。”一个人有这样的自觉，认为他是别人真正所需要的，这是容易的；然而妇女，妻子呢？她有什么用处呢？相反，她

自己不是一切都取之于丈夫吗？丈夫给她住所，吃食，衣着，保护她，给她在社会中的地位……通常不是以为她可以替丈夫生孩子吗？〔明达的人们在劝阻年轻人结婚时，不是说过：“妻子不是草鞋，穿上脚脱不下”吗！而在一般的意见中，妻子和草鞋的最重要区别就是：她随身带来了一大堆麻烦，做丈夫的要逃也逃不掉的，可是草鞋只给人舒服，如果变得不舒服了，就可以随便把它抛掉……〕一个女人落在这样的境地中，当然，就该忘记她同样也是一个人，〔也有同样的权利〕，象男人一样。她只能堕落，假使她的人格是坚强的，她也会接受使她吃了这许多苦痛的同样的顽固暴戾的习癖。例如，我们此刻在卡彭诺娃身上所看到的，也正象在邬兰别柯瓦身上看到的一样。只不过她的专横顽固要更渺小些，而因此，也许比男人的专横顽固更要荒唐：这种专横顽固的范围比较小，然而因此在它自己的范围里，对它所遭遇的人，它所起的影响可还要显得难以忍受。奇各伊骂人，卡彭诺娃唠叨；这一个做到打人，也就完了，可是那一个却是长时间地、锲而不舍地咬啮着自己的牺牲品；这一个为了自己的幻想而叫嚷，当你的行动还没有触到他的时候，他对这种行动还是相当的冷淡；卡彭诺娃却给自己开辟了一个包括一些特殊规矩和〔迷信〕习惯的完整的小天地，她就抱着她的全部愚昧糊涂坚持着这些规矩和习惯。一般说来——在妇女方面，甚至一个已经达到独立地位、在专横顽固的王国可以 *con amore*① 发号施令的人，也经常暴露她的相对的无力，暴露她所蒙受的世世代代的压迫的结果；她的要求显得比较沉重，比较多疑，比较冷酷；她所以不肯屈从正常的见解，不是因为蔑视它，而只是因为害怕无法和它周旋，她说：“假使你开始议论，你真不知道会得出什么结

① 意文：任性地。

果，——马上就会受骗”——因此，她就严格遵守古风以及那个菲克露莎告诉她的各种各样的教训……

由此可见，假使一个妇女打算从这种境地中脱身出来，那么她的事情就是严肃而坚决的。一个什么库特里亚希和奇各伊对骂是什么意思都没有的：他们彼此互相需要，在库特里亚希这方面要表示自己的要求，并不需要特殊的英雄精神。因此他的行为不会造成严重的结果：他也骂人的，奇各伊威胁他〔要送他去当兵，结果却并没有送〕；库特里亚希为了自己能够回骂会觉得满意：可是事情还是照旧进行。对女人就不是这样了：她就是要吐露自己的愤懑、自己的要求，也应当拥有巨大的性格的力量。在第一次尝试中，她就会体会到，她是渺不足道的〔人家可以压迫她〕。她知道，这的确是这样的，她应当听天由命；否则危险就要在她的头上发作——人们要打她，要把她关起来，〔留给她面包和水，要她忏悔，〕剥夺她看见阳光，用风俗淳厚的古代家庭中那一套纠风正俗的办法去训练她，一直把她弄得从顺为止。一个妇女，假使要在抗议俄国家庭中老人的压迫和专横中坚持到底，她就必须充满英勇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应当什么都敢做，还要有万一的准备。她用什么方法使自己坚持下去呢？她从哪里去获得这样的性格呢？〔对这一点，只可以这样回答：人类本性的自然追求要完全消灭是办不到的。你可以使这些自然要求扭转方向，你可以把它们挤压，把它们紧紧扼住，然而这一切只能达到某一种的程度。那些虚伪原则所以占了上风，这不过显出，人的本性的弹性可以达到什么程度；然而环境越是不自然，就越是迫切、越是必需从这中间脱身出来。因此，一旦到了甚至连那些最柔顺的性格——最容易受到这种环境所产生的力量所影响的人都忍受不住的时候，那么，可以想见，它该是极其不自然的了。假如连孩子的柔软身体都不能承受某一种体育把戏，那么显然的，

这种花样在四肢更要坚硬的成年人看来是更无法办到的了。当然，成年人不肯让自己去玩这种花样；可是他们却会很轻易地拿孩子去做这种尝试的。〕然而怎样让孩子获得一种性格，使他们去反对一切势力，即使由于这种反抗而招致最可怕的惩罚？回答只有一个：他无法忍受强迫他干的事情……说到决心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奋斗的柔弱的妇女，她们也是这样的，事情终于达到了这个地步，她已经不能再继续忍受她的卑屈了，因此她就从卑屈中冲了出来，这一冲已经不是因为考虑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而只是出于想求取一种容易担当、容易办到的东西的这种本能的愿望。在这里，本性代替了理智的推论，代替了感情和想象的要求：这一切汇合成为要求空气〔、要求食物和自由的这种有机体的普遍感情〕。类似这样的象我们在《大雷雨》中所看到的环境中所出现的、在包围着卡德琳娜的环境中所出现的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它的奥秘就在这里。

由此可见，妇女中坚毅性格的产生，是和奥斯特罗夫斯基戏剧中那种专横顽固所造成的局势，完全适应的。在《大雷雨》所表现的局势里，专横顽固已经达到了极端，达到了否定一切正常见解的地步；这种专横顽固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敌视人的自然要求，也比以前更加凶暴地竭力阻挡这些要求的发展，因为在这些要求的胜利中，它看到自己已经逼近无法避免的毁灭。这样一来，这种专横顽固甚至在最软弱的人们中间也越来越引起怨愤和抗议了。〔而在同时，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专横顽固已经丧失它的自信，丧失它的行动中的坚定，而且还丧失了那种在他看来能够引起大家恐怖的巨大威力。因此，对它而起的反抗，在一开头就是不可压抑的，而且还发展为顽强的斗争。那些还能够将就着生活下去的人，现在却不打算冒险进行这一类斗争，只指望专横顽固不会活得长久。〕卡德琳娜的丈夫，那个年轻的卡彭诺

夫虽然必须在老卡彭诺娃下面忍受许多事情，但是他到底是比较独立的；他可以跑到萨维尔·普罗柯菲伊奇那里喝酒去，他还可以离开母亲跑到莫斯科去，在那里随心所欲一番，要是在老婆子那里实在受不住的时候，总有人让他的怒火得到发泄——他骂老婆……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就是这样养成什么事都不适合做的性格的〔他老是偷偷希望，不管好歹总要得到自由〕。他的妻子就没有什么希望，没有什么欢乐，她得不到喘息的时机；要是可能，她宁愿停止呼吸而生活，〔忘却在这世界上还有自由的空气〕，她宁愿排斥自己的天性，去和老卡彭诺娃的作威作福的贪欲〔以及专横〕沆瀣一气^①。然而〔不管垂死的专横顽固的一切防范，〕〔自由的〕空气和阳光还是能够突入卡德琳娜的静室，她感到有办法满足自己灵魂的〔自然的〕渴求，不能再继续停滞不动了；于是她冲向新的生活，虽然在这冲动中她可能不得不死亡。〔但死对她会怎么样呢？横竖一样——她并不以为在卡彭诺夫家里落在她的头上的那种苟且偷安就是生活。〕

这就是《大雷雨》中所描写的人物的一切行动的根据。〔这个根据比任何理论与热情更可靠，因为它是立脚在这一种情势的最本质地方的，它吸引人立即投入行动，它不受任何一种特殊的才能、尤其是印象所左右，而是受一个有机体的要求的全部复杂性，人类整个天性的锻炼所决定的。〕现在来看一下这一类性格在个别情形之下，是怎样发展和出现的，该是饶有兴趣的事情。我们可以根据卡德琳娜的个性来研究它的发展。

首先使你震惊的是，这种性格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在这种性格身上，没有一点外来的、别人的东西，一切都好象从他的内

^① 俄文《三卷集》本中，这一句为“和老卡彭诺娃的作威作福的专横沆瀣一气”，兹据《哲学选集》版订正。

心涌出来一样；每一种印象在他身上都经过改造，然后和他有机地生长在一起。例如，这一点我们在卡德琳娜天真地叙述她的幼年故事以及关于在母家的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原来，教育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什么东西都没有给她；在她的母亲家里，也象在卡彭诺夫家里一样，——到教堂里去，在天鹅绒上绣金线，听朝圣的人讲故事，吃午饭，在花园里闲逛，又和那些朝圣的人说话，接着就是自己做祷告……卡德琳娜丈夫的妹妹瓦尔瓦拉听完了卡德琳娜的故事以后，就奇怪地说，“就是我们这里也是这样的呵。”然而卡德琳娜立刻用三五句话说明了其中的差别：“可是在这儿总好象坐牢受监禁一样！”所以后来的谈话就表现出：卡德琳娜能够从所有这种在我们这里到处都已经习惯的表面性中，找出它的特殊意义来，她能够在卡彭诺娃沉重的手还没有压在她身上的时候，把它贯彻在自己的要求和愿望里去。卡德琳娜根本就不是那种永远不知道满足，〔不管怎么样，只喜欢破坏〕的狂暴性格。相反，这种性格主要是〔创造的，〕富于爱情的、理想的性格。这就是为什么当她想象的时候，总是竭力要领会每件事物的意义，把它美化起来的原因；照一个诗人所讲，在这种情绪之下，——

全世界都在他面前

受到高尚的幻梦清刷、冲洗，——①

这种情绪一直到最后一刹那，都没有离开过卡德琳娜。每一个外来的杂音，她都竭力使它和自己的内心和谐保持协调，每一种缺点，她都凭着她的内在力量的丰满加以掩盖。朝圣者的粗鲁

① 这两句诗是从莱蒙托夫的《编辑、读者和作家》一诗中引来的。

而迷信的故事〔以及无意义的幻想〕，在她的心里，都变成黄金的、诗意般的想象的梦，并不恐怖，却是明净而高贵。她所掌握的形象是贫乏的，因为她在现实中所见到的材料，是这样千篇一律；然而她的想象就凭这些贫乏的资料不知疲倦地工作，把她带到静穆而光明的新世界去。〔在教堂里引起她的兴趣的不是仪式：她根本就不听在那儿唱着和朗读着的东西；在她的心灵里有另外一种音乐，另外一种幻象，在她看来，祷告仪式是在不知不觉中完结的，好象只有一刹那工夫。〕她注视着〔画像上〕画得很奇怪的树木，于是她就想象到处是花园的国家，那里到处都是树木，到处都灿烂开花，芳香袭人，一直都洋溢着天堂的歌声。或者在晴朗的日子，她看到“一道明亮的光从天窗上射下来，在这股光华下，烟雾好象云朵似的缥缈”，——而且她还看到了，“好象有天使在光华里飞翔、唱歌”。有时她还想到，——为什么她不能飞呢？当她陷到深沉的悲哀里的时候，她真想飞呵：就这样逃走，张开手，于是飞去了。从周围人们的眼光看来，她是一个古怪而疯狂的姑娘；然而这是因为，她自己怎么也不能接受他们的看法和习癖。她从他们那里选取材料，因为否则她就无从去找到这些材料；然而她却并不接受结论，而是自己去找寻，她常常得出完全不是他们能够放心的结论。这一类对外表印象的态度，我们在其他人群中、在那些按照教育程度来说习惯于抽象议论、还善于分析自己的感情的人们中，也可以发现。整个差别是在这里：在卡德琳娜这方面，她的个性是直率而活跃的，一切都顺着天性的启示去干，没有抽象的认识，而在那些理论上比较开展、并且有坚强智慧的人中，起主要作用的却是逻辑和分析。有坚强才智的人所以显出一种拥有内在力量的特征，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力量使他们能够不受既存见解和体系所摆布，而是由自己根据生动的印象、创造自己的看法和结论。他们开头什么都

不排斥,但是也并不赞成什么东西,而只是把这一切作为知识而接受过来,并且把它们照自己的意见加以改造。我们觉得,在卡德琳娜的身上也有类似的结果,虽然她不能把自己的感觉说出一个道理,甚至也并不理解,而是直接由天性所驱策。在她的青年时代枯燥而单调的生活中,在包围她的人群的粗野而迷信的见解中,她时常能够撷取一种和她对美、和谐、满足、幸福这些自然追求相一致的东西。在朝圣者的谈话中,在朝拜叩头和哭泣中,她看到的不是〔死板的形式,而是〕她的内心不断在追求着的另一种东西。她就以这些东西作为根据,给自己建立一个没有苦难、没有匮乏、没有忧愁的理想世界,充满着善和幸福的世界。然而人类的真正的善和真正的幸福究竟表现在哪里呢,她就无法向自己说清楚了;她所回想到的那些本能的、暧昧的追求,它们所以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迸发,原因是这样的:

“有时候,一清早,太阳刚出来,我就跑到花园里去,——跪在地上祷告,哭,连自己也不明白,祷告些什么,为什么哭;人家就这样找着我。那时候我究竟祷告些什么,求些什么——这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很满足。”

这个可怜的姑娘,由于不曾接受过广泛的理论教育,由于不明白世界上所进行的一切,甚至对自己的要求也没有好好了解,因此,当然,她就弄不明白她需要的是怎么了。当她暂时还在母亲身边过日子,享受到完全的自由,没有什么生活的操劳,当成年人的要求和热情还没有在她的身上显露的时候,她甚至无法分辨她的个人梦想、她的内在世界和外在印象之间的区别。她〔置身在朝圣者中间〕,忘怀在美妙的想象里,在她的光明灿烂的王国里漫游,同时她〔还是以为,她所以感到满足,就因为有这些

朝圣者，就因为屋子的四角点着灯，就因为在她四周迸发出来的哭声；〕〔她〕通过自己的感情使得她在其中生活的死寂环境有了活气，使自己灵魂的内在世界和它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要使许多人久久向往不已，但到底有它的尽头的童年时期。假使尽头来得十分晚，假使一个人当他的大部分生命都已经过去的时候，才开始了解，他需要的是什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他除了惋惜他这样长久地把自己的梦幻当作现实之外，已经什么都不剩了。到这时候，他就等于落在一个这样的人的可悲境地：这个人在自己的幻想中把自己的美人想象得尽善尽美，让自己的一生和她结合在一起，突然他发觉，一切完美都只存在于他的想象里，而在美人本身它们却是连影子都没有的。然而有坚强性格的人很少会受这种彻头彻尾的迷惑所摆布，在他们的心里，对于明白清楚、真情实况的要求是十分强烈的，因此他们不会停留在模糊不清之上，无论如何总要竭力在其中找些什么出来。当发现自己有不满意的时候，他们就努力去赶走它；然而，当一看到它不会就此消失的时候，他们就这样来收场：让灵魂里所产生的〔新的〕要求的吐露有完全的自由，从此，只要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不会安顿下来。在这时候，生活本身也来帮忙了——这对某一种人是有利的，它开拓了印象的限界，可是对另一种人却是困难和痛苦的，因为要承受压迫和操心，这种压迫和操心破坏了青年人梦想的和谐均衡。后面一条路就落在卡德琳娜的命运上。〔正象它也落在奇各伊和卡彭诺娃们的“黑暗王国”中的大部分人们的命运上一样〕。

在新家庭的阴暗的背景中，卡德琳娜开始感觉到从前以为可以充分享受的外表生活现在是贫乏的。在没有心肝的卡彭诺娃的沉重的魔掌下，她的灿烂幻想并没有活动的天地，她的感情也得不到自由。在对丈夫柔情的激发中，她很想去拥抱他，——

那老婆子却叫道：“不要脸的东西，你要挂在脖子上吗？跪下去呀！”有一次，她要想一个人留下来，悄悄地悲哀一番，可是那婆婆却说：“为什么不哭呀？”她要想找寻光明，空气，要想幻想，要想跳跃，浇灌她的花朵，欣赏太阳，欣赏伏尔加河，问候各种各样动物，——可是人们却强把她束缚起来，那种肮脏而腐朽的想法不断在她的心里得到成长。她照旧〔在宗教仪式中、在参拜教堂中、〕在拯救灵魂的谈话中找寻庇护之所；然而就在这里，也已经找不到先前的印象了。她既然受到日常的操劳以及永久的束缚所摧残，就无法再象以前一样清晰地〔幻想一个仙女，在那为太阳所照耀的缥缈的光华中歌唱，也无法〕再想象什么天国的花园以及花园里恬静的景色和欢乐。在她的四周，一切东西都是沉郁而可怕的，一切都发散着冷气以及一种不可抗拒的恐怖；就是〔神道的圣容也是如此严峻，就是教堂里的朗诵也是如此吓人，就是朝圣者的故事也是如此怪诞……它们在本质上还是这副模样，它们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改变的是她自己；〕在她的心里，已经没有胃口去建立空洞的幻象，而且连她先前曾经享受过的幸福生活的模糊不定的想象，也不能再使她满足了。她长大成人了，另一种更现实的愿望已经在她的心里觉醒了过来；她既然除掉家庭就不知道有别的活动场所，除掉她所居住的小城镇的社会给她所造成的世界以外，就不知道还有别的世界，那么她从人类各种不同追求中开始认识的，当然是那个越来越无法避免、越来越迫近她的追求——爱情和忠诚的追求了。在以前，她的心里过分充满着幻想，她没有去注意朝她看的年轻人，而只是笑。嫁了吉洪·卡彭诺夫以后，她连他也并不爱，她还没有理解这种感情；人们告诉她，每个姑娘都得嫁人，就把作为未来丈夫的吉洪介绍给她，她就嫁给他了，她对这一步完全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就在这里也显出性格的特点；照我们平常见解推测，

假使她有一个坚决的性格，她是应该反抗的；然而她对反抗却想都没有想，因为她没有这样干的足够基础。对于嫁丈夫她并没有特别的欲望，然而对出嫁也并没有厌恶；她的内心对吉洪并没有爱情，但是无论对其他什么人她也并没有什么爱情。〔直到现在〕她总是满不在乎的，这就是她会让人家高兴怎样就怎样发付她的原因。在这方面，你既不能看到无力，也不能看到冷淡，而只能找到经验的缺乏，以及过分花心思为了别人去做一切事情，而对自己却漠不关心。她的知识并不多，却过于轻信，因此她〔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对周围事物表示反抗，却决定宁愿忍耐，而不去触犯它们。

然而〔当她了解她的需要，她打算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她就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她那没有在琐事细节上浪费掉的性格的力量就完全显露了出来。在开头，由于她灵魂上天生的善良和崇高，她可能尽一切能够尽的努力，不去破坏其他人们的和平和权利，尽可能履行和她有某一种联系的人们所加于她的一切要求，从而获得自己所愿望的东西；要是他们能够利用这种最原始的情绪，决定让她得到充分的满足，——那时候不论对她，不论对他们，都是有益的。然而假使不是这样，——她就会什么都不在乎，——法律、亲属、习惯、人们的裁判、理性的规律——这一切在内心的吸力之前，在她看来，都消失无踪了。卡德琳娜所能想象的就是这样的出路，在她所安身的环境中，实在也无法期待其他的出路。〕

对人热爱的感情，要在别人心里寻找亲切反应的愿望，享受温柔感情的要求，已经以最自然的方式在年轻女人的心里出现了，它们改变了她以前的模糊而没有结果的幻梦。“晚上，瓦里亚，我睡不着，”她说，“我好象老是听到一种低低的声音：有什么人跟我很亲热的讲话，好象鸽儿咕咕叫似的。可是，瓦里亚，从前

那些天堂的树木，还有高山，我是再也梦见不到了；我好象觉得有谁把我亲亲热热的抱住，带着我走到什么地方去，我就跟着他，跟着他走……”她认识这些幻梦，把它们捕捉住，这已经是很晚的事了；但是，当然，这些幻梦在她自己也还没有把它们弄明白的很久以前就纠缠过她，把她折磨过了。在这些幻梦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她立刻把她的感情集中到最接近她的人，——集中到丈夫身上。她长时间努力使自己的灵魂和他结合起来，要自己相信，只要和他在一起她就什么都不需要，在他的心里有一种她这样惊惶不安地寻求着的高贵。她恐怖地，而且疑惑地看到有可能在他之外，在其他什么人身上找寻相互的爱情。当剧本揭出卡德琳娜对鲍里斯·格利高里伊奇已经开始萌发爱念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卡德琳娜最后的、绝望的努力——做丈夫的一个亲爱的人。她和他分别的一场使我们能够体会到，就到这时候，吉洪实在还没有失去什么，他还能够对这个女人保持爱的权利；然而也就是这一场，通过简略、但却深刻的缩写，向我们传达了迫使卡德琳娜强行忍受、把她对丈夫的最初感情推拒开去的那种折磨的全部始末。吉洪在这里显出是这样的一个人：冷淡而有点庸俗，不算十分狠毒，但是无性格却达到了极点，他不敢违背母亲的意见，去做随便什么事。至于母亲——她是一个没有心肝的、狠毒的人。不论是爱，〔不论是宗教，〕不论是道德，她都拘守着中国式的礼教。〔吉洪在母亲和老婆之间，就是人们通常认为无害的许多可怜的人物中的一个，虽然就总的意义说来，他们也象顽固独夫本人一样，也是有害的，因为他们就是顽固独夫们忠实的帮手。〕吉洪自己是真正爱妻子的，为了她准备什么都做；然而他就是在压迫下面成长的，这种压迫已经把他毁损到这副模样，在他的心里，随便什么强烈的感情、随便什么坚决的愿望都不能得到发展。他是有廉耻的，有善良的愿望

的，但是他却常常违背自己，变成母亲听话的工具，甚至在对待妻子的态度上也是如此。还在卡彭诺夫一家在林荫路上出现的第一场，我们就看到卡德琳娜在丈夫和婆婆之间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卡彭诺娃叱骂儿子，怪他的老婆不怕他；他决定反驳：“为什么要她怕呢？只要她喜欢我，这就够了。”那老婆子立刻向他怒斥：“怎么说——为什么要怕你？怎么说——为什么要怕你！你难道发疯了？要是她连你也不怕，我更不用说了，这样家里还有什么规矩！嘿，你跟她是合法夫妻呀。难道照你看，法律什么意义都没有？”当然，在这么一些原则之下，爱情在卡德琳娜的心里，是找不到活动天地的，只好躲在她的内心，只有偶然，才会在痉挛的激发中露一露。然而就连这样的激发，她的丈夫也不知道利用；要他去了解她那充满热情的困惑的力量，他是被压得太厉害了。“我简直猜不透你，卡佳，”他对她说：“有时候你一句话也不跟我说，更别提亲热了，可是有时候你却自己来缠着我。”通常，一个平庸而腐朽的人总是这样议论一个坚强而生气勃勃的人物的：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形下判断，他们并不理解保存在灵魂深处的感情，他们把一切聚精会神都看作是冷淡；最后，到了那种内在力量再也不能继续隐藏，以广阔迅速的奔流从内心中迸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引为奇怪，认为这是一种把戏，一种怪事，正象他们有时候也会浮起幻想，激起热情或者胡闹狂欢一样。但是这些激发在坚毅的性格身上却是必要的东西，它们越是长时间找不到出路，就越是显著突出。它们不是思维出来的，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被自然的必然性所呼唤出来的。天性的力量在实际上既然无法发展，就只能作被动的表现——忍耐，沉着。然而却不要把这种忍耐去和那由于一个人的个性发展的贫弱而产生、终至于对一切侮辱、一切困苦都能习以为常的忍耐混淆在一起。不，卡德琳娜从来就不习惯这些东西，她还不知道她

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做，她一点都不想破坏她对婆婆的责任，为了和丈夫相处得很好，她做一切能够做的事情，然而在一件事情上都可以看到，她是体会到她的处境的，有什么东西正在引诱她脱离丈夫。她从来不抱怨，不谩骂婆婆；老婆子自己也无法在这一点上责备她；但是这个老婆子还是感觉到，卡德琳娜对她总有点合不来，总是对立的。害怕母亲象害怕火的吉洪，他并不特别显得温顺、柔和，但是当按照母亲的吩咐，应当命令妻子，在他出门的时候“不要往窗子外边看”以及“眼睛不要膘年轻小子”的时候，他在妻子的面前就感到羞愧了。他看出，用这样的话去侮辱她是痛苦的，虽然他自己也没有很好理解她的情形。母亲一跑出屋子，他就这样安慰妻子说：“要是把什么事都放在心上，那你马上就会害肺病。你干吗要听她的话！她总得有什么事儿唠唠叨叨。好吧，随她去说去，你只当它耳边风！”

〔这种漠不关心的确是不好的，没有救药的；但是〕卡德琳娜却永远不会达到这地步；虽然从表面上看，她是比吉洪更少愁苦，更少抱怨，然而在实质上，她所受到的痛苦却更厉害得多。吉洪也感觉到，他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在他的心里也有不满〔；然而这种不满在他的心里，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比如，好象一个有着放荡想法的十岁孩子可能为一个女人而迷恋似的。〕他所以不敢十分坚决地求取独立〔以及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好；他的愿望多分是〔做作的，〕表面的〔，他自己的天性，由于被教育上的压迫所制服，因此对于自然追求，几乎是充耳不闻的〕。因此，找寻〔自由〕这件事在他的心里，只有畸形的性质，〔变得令人讨厌，正象一个没有意识、没有内在要求、只管重复着从大人那里听来的肮脏话的十岁孩子的无耻，令人讨厌一样。吉洪显然也从什么人那里听到过，他“也是一个男人”，在家庭里，应当有一定的权力和影响；因此，他把自己放

得比妻子更高，并且以为，是上帝判定她要这样忍耐和顺从的，——可是对自己在母亲的原则之下所处的地位，却又看作是一种痛苦和屈辱。于是，他就嗜好喝酒，认为最重要的自由就在于此了；〔他也象那个男孩一样，这个孩子无法达到问题的真正本质、为什么女人的爱情是这样甜蜜、只看到问题的外表一面，于是这一面在他的心里就变成了淫荡猥亵：吉洪〕在准备出门的时候，妻子要求带她一同走，他以无耻乖戾的样子对妻子说：“为了这种不自由，一个人甚至会离开漂亮的老婆逃跑！你倒想想：不管怎么样，我总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一生都过着象你看到的生活，他就会离开他的老婆。现在我既然知道，有两个礼拜在我的头上可以不打雷，脚上没有镣铐，我还能顾到妻子吗？”

卡德琳娜对于这些话只能这样回答他：“你会说出这种话，我怎么还能爱你呢？”然而吉洪却并没有辨别出这句忧郁而果断的责备所包含的全部重要的意义；象一个已经抛掉理智的人似的，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这是老老实实的话！——此外我还能说什么！”——于是他就急急地离开了他的妻子。可是这是为什么？他争得了自由之后，要干什么去，他要在什么事情上舒散他的心胸？后来他自己把这一点告诉库里庚说：“在上路的时候，妈妈几次三番向我叮嘱教训，可是我一出了门，就喝起酒来了。我挣得了自由，我的心里高兴极啦。一路上我都喝酒，到了莫斯科，我也尽是喝酒；我大大的喝了一阵子。我要把全年的酒都喝一个光！……”

就是这么一回事！应当说明一下，在过去的时代，当人格〔和人格权利〕的自觉，还没有在大多数人的心里高扬起来的时候，〔对于专横顽固的压迫的反抗几乎只限于这一类举动。就是现在，也还能碰到许许多多吉洪，他们假使不是沉湎在狂饮里，就是陶醉在什么议论和演说里，并且在言语的宴会上排遣自己

的情怀。这就是那些不断抱怨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但同时又被自己可以有特权、自己是凌驾在别人之上的这种骄傲的念头所玷染的人：“不管怎么样，我总是一个男人，——这样我怎么能够忍受下去呢。”这就是说：“你忍耐一些吧，因为你是一个婆娘，当然，就是一块废物，我可是应当得到自由，——这不是因为这是人类的、自然的要求，而是因为这种权利是我的特权”……显然，从这样的人们以及这样的习惯中，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永远得不出什么结果的。

然而我们上面所说到的、在卡德琳娜身上找到反映的人民的新的运动，就和他们不一样。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从整个有机体的深处产生的、〔已经成熟了〕的关于〔人权和〕生活空间的要求。〔在这里，我们觉得，这已经不是想象，不是道听途说，不是做作而兴奋的冲动，而是天性上的真正必需。〕卡德琳娜不是拿她的不满和愤慨来逞性胡闹，来卖弄风情，——这和她的天性并不相容；她不打算去感服别人，也不想去炫耀、吹嘘。相反，她却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而且准备服从所有的人，只要并不违反她的天性；她的原则，假使她能够认识和阐释它，它就是这样：尽可能不要以自己的个性去压迫其他人的个性，不要去〔打扰事物的共同趋势〕。然而，既然她承认而且尊敬其他人们的〔愿望〕，她就要求别人对她也得有同样的尊敬，因此，随便哪种强制，随便哪种压迫，都使她感到切肤而深刻的愤慨。如果她办得到，她要把一切不是正直地过活、对别人有害的人，都从自己身边远远赶开去；然而她没有能力这样做，她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她自己就从那些毁灭和侮辱她的人那里逃开。只要不受他们的原则所左右，违反她的天性，只要不和他们的〔不自然的〕要求妥协，那么不管产生什么结果——她得到好运气呢，还是毁灭——她都在所不计；〔这两种结果总有一个她

可以摆脱……]卡德琳娜在回忆童年时代时，曾经把她的性格的一个特点告诉给瓦里亚听：“我的性格生来就象一团烈火！我还只有六岁的时候，不会再多——我就这样干过！家里有一件事情侮辱了我，事情发生在晚上，天已经黑了——我奔到伏尔加河去，坐在小船上，把船推离岸边。第二天早晨，人家找到我已经在十俄里开外了……”这一种孩子的激情还保存在卡德琳娜的心里；只不过随着各方面的成长，在她的身上又增加了能够忍受种种印象并且控制它们的力量。成人的卡德琳娜，置身在必须忍受侮辱的境地里，发觉自己有力量，能够长时期忍受这些侮辱，而没有〔徒然的〕怨诉，〔半推半就的〕反抗以及任何喧闹的行为。当一种和她的心灵特别接近、在她的心目中也认为是合法的利害关系还没有向她发言的时候，当一种不得到满足、她就不会安下心来的天性上的要求在她的内心还没有遭受侮辱的时候，她总是忍受的。在这种时候，她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她并不乞助于外交上的权诈，也并不求教于欺骗，——她不是这样的人。假使临到不得不施用欺骗，她也宁愿竭力克制自己。瓦里亚劝卡德琳娜把她对鲍里斯的爱隐藏起来；她却说：“我是不会骗人的，要隐瞒起来我怎么也办不到”，在这之后，她就强行克制自己的心，又对瓦里亚说了这样的话：“不要向我提起他，行行好吧，快别提啦！我连知道都不想知道他。我要爱丈夫。亲爱的吉莎，我决不对你变心！”然而这种努力已经超过她的能力了；过了一刻之后，她就感觉到，她是摆脱不了已经产生的爱情的：“难道我要想他吗？”她说，“它在脑子里不肯走，又怎么办呢？”在这几句简单的话中，十分清楚地表现出，卡德琳娜自己也没有觉察的〔自然追求〕的力量，怎样在她的身上战胜了一切〔外来的〕要求〔、偏见、以及人为的阴谋诡计，她的生活就是在这种阴谋诡计中给搅得乱七八糟的。〕我们得指出，卡德琳娜从理论上是无法否认这

一种要求的，〔是无法摆脱随便哪一种落后的意见的；〕她所以反对这一切，唯一就因为她是她的感情的力量，〔她对生活、幸福和爱情这种直接而不可剥夺权利的本能的认识武装起来的……〕她一点都不喜欢辩论，然而她却十分轻易地解决了她的处境中的一切困难。这就是她和瓦尔瓦拉的谈话：

瓦尔瓦拉 天保佑你，你这人真古怪！要依我呀——一个人应该照自己的意思做，只要不让人知道就行啦。

卡德琳娜 我就不愿意这样，这有什么意思呢！只要能够忍耐，我宁可忍耐。

瓦尔瓦拉 要是忍受不住，你又怎么办呢？

卡德琳娜 我怎么办？

瓦尔瓦拉 是呵，你怎么办呢？

卡德琳娜 想到怎么办就怎么办。

瓦尔瓦拉 那么试一下吧，这儿的人们会把你吃掉的。

卡德琳娜 我可不管！我会走，就是这么样。

瓦尔瓦拉 你到哪儿去！你是有丈夫的女人。

卡德琳娜 唉，瓦里亚，你不了解我的性格！当然，上帝是不肯让这种事发生的，可是，如果我这里真真耽不下去的时候，那么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拦我。我会跳窗，跳到伏尔加河去。只要我不想在这里耽下去，就是你宰了我，我也不留。

这就是无论什么场合都可以依赖的一种性格的〔真正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生活在他们的发展中所达到的高峰，然而在我们的文学中，达到这个高峰的，却只有很少的人，而且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象奥斯特罗夫斯基坚持得那么好。他感觉到，左

右一个人的，〔不是抽象的信仰，而是〕生活的事实，一个坚强性格的形成和出现所需要的，不是思想的方式，〔不是原则，〕而是天性，因此他能够创造这种成为伟大的人民思想的代表者的人物，这种人物并不把〔伟大的〕思想挂在舌头上，也不放在头脑里，而是在敌众我寡的斗争中奋不顾身地坚持到底，直至毁灭，而又完全不计及自己有责任去作〔崇高的〕自我牺牲。她的行为和她的天性保持着和谐，这些行为在她看来是自然的，必要的，她没有法子弃之不顾，即使这会招致毁灭的后果。在我们文学的其他创作中的那些〔自命不凡的〕坚强的性格，却象喷水池一样，水喷得又美丽又汹涌，然而它们的显现，却依赖于装在它上面的不相干的机械；相反，卡德琳娜也许就和波澜壮阔的河流一样，它依照自然本质所要求似的流着，它的流动的性质因流过的地区不同而起变化，然而流动决不停止；在河底平整〔良好〕的地方，——它流得平稳，碰到了巨石——河水就激溅而过，碰到了断崖，就倾注为瀑布；筑堤把它拦住——它就汹涌澎湃，冲到了旁的地方去。〔河水汹涌，不是因为它突然要想喧闹，或者对障碍发怒，而只是〕因为，为了贯彻它的自然要求——为了继续奔流，必须这样做。〔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描写给我们看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不管有什么样的阻碍，他总是坚持了下来；万一力量涸竭了，那就毁灭，但是决不使自己改变。那些高声宣扬真理的人自称“要为伟大的思想牺牲自己”，他们的结局却常常是这样：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们说，和恶进行斗争，这是过分渺茫的，这种斗争只能招致无辜的毁灭，等等。他们是对的，不能责备他们怯懦；然而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这一点：他们所要尽劳尽瘁的“思想”，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缺了它，他们也能过得去，他们能够十分清楚地同自己个人的、直接的要求划分开来。显然，他们对于思想的狂热，不论怎么巨

大，总是远比左右着象卡德琳娜这类的人、甚至左右着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崇高的“思想”的人们的一种单纯的、本能的、不可抗力的向往更脆弱，更低微。]

在卡德琳娜的处境里，我们看到，[相反，]一切从童年时代起就在熏陶着她的“思想”，周围人群的一切原则——都是反对她的[自然追求和]行为的。这个青年女子注定要进行的恐怖的斗争，在戏剧的每一句话中，在每一个动作中都得贯彻，这就是那些插入人物所以出现的整个关键所在，人们就为了这些插入人物而责备奥斯特罗夫斯基。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看到，卡德琳娜是在一种同她所生活在其中的人群所抱的一模一样的见解中教育成长的，她不可能摆脱它们，因为她没有什么理论上的修养。朝圣女客的故事，家庭里的教导，固然都会按照自己那一套把她改造，然而却不能在她的灵魂里留下[丑恶的]痕迹：的确，我们在剧本中看到，卡德琳娜既然失去了她的美满的幻梦以及理想的、高傲的愿望，在她的教养中就只保存了[一种]感情，这就是：对某一种黑暗势力，对她所不曾见过的、她无法好好说明、无法加以否定的事物[，感到恐怖]。[她害怕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她为了每一种极平常的感情，都在等待自己受处罚：她觉得，雷会把她打死，因为她是一个罪人，教堂墙壁上火红的地狱图画，在她看来就是她永久受磨难的预兆……同时]周围的一切事物也支持着并且发展着她心中的[这种恐怖]：菲克露莎到卡彭诺娃家来，谈论什么最后的时刻；奇各伊证实，打雷就是要处罚我们，要我们能够省悟；[那个走近过来把全镇的人都弄得恐怖起来的贵妇人，好几次出场，用恶毒的声音向卡德琳娜絮聒：“大家都要在永远不灭的火里烧死。”]一切周围的人都充满[迷信的]恐惧，就是卡德琳娜自己，她也以为一切周围的人应当把她对鲍里斯的感情，看作是弥天大罪。甚至果敢的库特里亚希，

〔这个人群中的 *esprit-fort*^①，〕连他也认为，一个姑娘和青年小伙子可以要怎样游逛就怎样游逛，——这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妇女就应当关在家里。这种信念在他的心里是这样坚固，当他知道了鲍里斯对卡德琳娜的爱情之后，尽管他是果敢的，尽管他有些肆无忌惮，但他却说，“这勾当应该停止了”。每件事物都在反对卡德琳娜，甚至她自己关于善恶的观念都是如此；大家都应当强制她窒息自己的热情，沉浸在家庭中无声而顺从的、寒冷而阴沉的形式主义里，〔没有任何生气勃勃的追求，〕没有意志，没有爱情，——或者学会欺骗人、欺骗良心。〔但是不要为了她而害怕，甚至到得她自己说出违背自己的话时，也不要害怕：她也许暂时作表面上的服从，或者甚至去进行欺骗，正象河水会隐在地下而过或者远离开它的河床；然而流着的河水是阻止不了的，也不会后退，而是一直流到底，流到它可以和其他水流合而为一，一起奔流到海洋里去的地方。〕卡德琳娜所生活的环境，要求她说谎和欺骗。“不这样做不行，”瓦尔瓦拉对她说：“你记住，你是在哪里过日子；我们全家都靠它过活。我本来也不是个爱欺骗的人，可是有了需要，我就学会啦。”卡德琳娜受了环境的支配，夤夜跑到鲍里斯那儿去，一连十天不让婆婆知道自己的感情……你可以想，〔又是〕一个女子〔迷了路，〕她学会了欺骗家里的人，并且还要偷偷干出伤风败俗的行为，一面却虚伪地讨好丈夫，戴上淑女贤妻这个〔令人憎恶的〕面具！〔就是这一点也不能去严厉责备她：她的处境是这样困难！〕不过要是这样，她只是那种描写“环境怎样吞噬好人”的小说里已经写烂了的典型中一个平凡人物而已。卡德琳娜却并非如此：处在整个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她的爱情的结局——还在她开始这件事的时候就露出端倪了。她并不进行

① 法文：自由思想家。

什么心理分析，因此对自己不可能表现精细的观察；当她谈到自己的时候，那么这是因为她已经有强烈的感觉了。在瓦尔瓦拉第一次提议去会见鲍里斯时，她就叫道：“不，不，决不能这样！你说的是什么呀，天保佑你：我只要看见他一次，我就要离开这个家，永世也不会回来了！”

〔这不是理性的谨慎在她的心里发言，——这是热情；这里也〕可以看出，不管她如何克制自己，她的热情是凌驾在她之上，凌驾在她的〔一切偏见和恐惧之上，凌驾在〕她儿时所听到的一切开导之上的。对她来说，全部生命就包含在这种热情中；她的天性的所有力量，她的所有充满生气的愿望，也都在这里汇合起来。她所以倾心于鲍里斯，不是单单因为她爱他，因为他在仪表上以及在言谈上跟她周围其余的人迥不相同；使她倾心于他的，还有爱情的需要，这是她不曾在丈夫身上找到反应的，还有作为妻子和女人的忍辱负屈的感情，还有她的单调枯燥的生活的令人痛苦的忧郁，以及对意志、对活动天地，〔对热烈而无可阻拦的〕自由的渴望。她一直在幻想，“她要到哪里去，就能不知不觉飞到那里去”；否则，就是想到这样的念头：“要随我的心呀，我现在就坐一条船，唱着歌，到伏尔加河上去玩，或者坐在考究的三驾马车上，拥抱着……”“只不过不跟丈夫在一起，”瓦里亚暗示她说，于是卡德琳娜就无法掩藏她的感情，立刻向瓦里亚发出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知道的？”可见，瓦尔瓦拉的暗示对卡德琳娜本人来说，是说明了许多事情的；她虽然这样天真地诉说自己的幻想，她却还没有怎样了解它们的意义。然而光一句话就已经足够使她的想法具有她自己害怕把它说出来的那种明确性了。在此刻以前她还可以怀疑：她这样苦苦探索的幸福，是否真的就在这种新的感情中。然而只要一旦嘴里说出这句隐秘的话，在她的思想中，就已经无法避开它了。恐怖、怀疑、对恶罪以及对人们的

议论的想法——这一切都来到她的头脑里，然而已经对她无能为力了〔这不过是使良心能够不受谴责的形式上的举动〕。在滔滔沫沫的独白中（在第二幕的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女人：在她的灵魂里已经跨了坚定的一步，然而她却还打算尽可能说服自己。她所做的尝试，多少有点离开她自己，因此，她判断起自己决定做的行为时，也好象当作外人的事一般；然而她的思想却一直在努力辩护这种行为。她说：“一个人要毁灭并不难……过着不自由的日子哪一个会觉得快活……我此刻虽然活着，却要受苦，看不到一线希望……婆婆把我毁了……”等等，——这一切都是辩护的条文。后来还有更加缓和的想法：“这是命运明明要这么做……要是我看他一眼，这有什么罪过呢……就是讲讲话，又有什么不好。说不定，我一生再也碰不到这种机会了……”这一段独白在好几个批评家中引起嘲弄卡德琳娜的兴头，好象嘲弄无耻的伪善者一样；然而我们却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断言我们〕、或者〔我们某一个理想的朋友似乎不曾做过昧着良心的事更无耻的了〕……〔在这些昧着良心的勾当中，错的不在个人，而是那些从小就牢牢印入脑海、常常和灵魂中充满生气的追求的自然趋向相敌对的见解。当这些见解还没有从社会中驱逐出去的时候，当思想与自然的要求还没有在人类之中建立整然的和谐的时候，这一类勾当都是不可避免的。要是做了这些以后，结果还能够凭着天性和常识来思索，并不屈服于人为道德的、因袭教训的压迫之下，这还得算是好的。卡德琳娜所以有力量，就在于此，天性在她的身上越是表现得坚强有力，她就越是能够安详地正视她的周围的人正在教她害怕的那种幼稚的幻想。〕因此我们甚至以为，在彼得堡舞台上扮演卡德琳娜这一角色的女演员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她在我们所谈的独白上，加过多的热情和悲剧性。她看来是想表现卡德琳娜的内心里所发

生的斗争，从这个观点出发，她是出色地传达了困难的独白的。然而我们却觉得，依卡德琳娜在这一场的性格和处境来看——应该把她的话表现得更加安详、更加轻快些。斗争其实已经结束了，只留下一阵短暂的思索〔，一件破旧的衣服还掩盖着卡德琳娜，它已经渐渐从她身上卸下来了……〕独白的结尾表露了她的心思：“要怎么就怎么吧，我还是要见鲍里斯”，她这样结束道，并且在朦胧的预感中这样叫道：“啊，黑夜，你快点来吧！”

这样的爱情，这样的心怀，是无法带着装假和欺骗在卡彭诺娃家的墙垣之内生存的。卡德琳娜虽然决定去秘密相会，可是就在第一次，在爱情的欢欣中，鲍里斯相信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什么事情，她却对鲍里斯说：“唉，为什么要可怜我呢，谁都没有错呵，——这是我自己干的。别可怜我，把我毁了吧！我做的事情，让大家都知道好了，让大家看到好了……只要我不怕为你犯罪，难道我还怕人家说长道短吗？”

的确，除了害怕失去看见她的意中人，和他说话，和他一起享受这夏天的夜晚，享受这在她觉得是新的感情这种机会以外，她是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丈夫来了，生活又变成死气沉沉的。她应该隐藏，她应该耍狡猾；但她不想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那么她应该重新恢复她的无情的、悲惨的生活，——这对她比前面一种更加痛苦。她还得每分钟都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每一句话而担心受惊〔，尤其在婆婆的面前；还得害怕灵魂会受到残酷的惩罚……〕这样的处境是卡德琳娜所不能忍受的：她日日夜夜，老是思索，痛苦，把想象力刺激得紧张起来，就是不这样做，也已经很兴奋了，到了最后，她终于无法忍受下去——她当着所有挤集在古老教堂的回廊里的人，向丈夫忏悔了一切。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母亲将会说什么。“别说啦，别说啦，妈妈在这里”，他慌张起来，喃喃地说。可是母亲已经听到了，她要求卡

德琳娜统统忏悔出来，在结语中她就抽出了她那一套道德：“儿子，你看自由、自由带来了什么结果？”

〔当然，嘲笑常识要比卡彭诺娃在她的叫喊中所做的更加困难。然而在“黑暗王国”中，所谓常识是算不上什么的：他们对“女罪人”采取了和常识完全相背、然而〕在这种生活风习中却已成为习惯的手段：丈夫遵从母亲的命令，傀儡似的打了他的妻子，婆婆把她用锁关了起来，不断地责骂她……这个〔可怜的女人的意志和安静都垮台了〕：在以前，至少人们还不敢责骂她，她至少感觉到自己在这些人面前，是〔完全〕正直的。可是现在，不管怎么样，她在他们之前总是有罪的，她破坏了自己对他们的责任，把悲哀和耻辱带到家中来；现在人们以最残酷的态度对付她，已经有理由和根据了。那么她应当怎么办呢？惋惜这种想挣得自由的失败尝试，撇却对爱情、对幸福的幻想，正象她曾经抛弃过关于神奇的花园以及天堂的歌曲这种幸福的梦想一样。从此俯首帖耳，抛弃独立的生活，变成最能迎合婆婆心意的人、她的丈夫的温柔的奴婢，永远没有胆子再作任何尝试，来暴露自己的〔要求〕……可是不，卡德琳娜不是这种性格的人〔；俄国生活所创造的新的典型，在她的身上所反映的，不是仅仅为了表现无结果的尝试，在第一次失败以后就归于毁灭〕。不，她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的生活里去了；假使她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切人的面前〔完全合法而神圣地〕享受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意志，要是从她身上夺去了她所找寻的、对她是如此可贵的东西，那么她在生活中就没有什么需要，而且她连生活也没有需要了。《大雷雨》的第五幕就是对这个如此朴实、如此深厚、〔同时又是和我们社会中的每个正派的人的处境和内心如此接近的〕性格的颂扬。艺术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女主人公放在任何高跷之上，甚至也没有把英雄精神赐给她，而还是让她保持在“犯罪”以前她给我们

看到的一个朴实而天真的女人的样子。在第五幕中，她一共有两次独白以及和鲍里斯的对谈；但是它们的内容的紧凑，却充满着这样一种力量，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坦率：使我们一看到它们，害怕又要写一大篇文章来解释了。现在我们要努力只用几句话来说明。

从卡德琳娜的独白里可以看出，就是现在，在她的心里，也还没有什么明确的东西；她一直到底都是受她的天性所左右，而不是受预先设想好的解决方法所驱策，因为要实施这种解决，她就得有逻辑上坚定的根据，可是一切促使她作理论上思考的原则，都是和她天性上的憧憬绝对相反的。因此，她非但没有采取英雄的姿态，而且也没有发表什么格言，证明她的性格是坚定的，甚至相反——却变成一个软弱的妇女的样子，她既没有能力去反抗自己的憧憬，还要给她的行为中所显示的勇敢竭力作辩解。她决定去死，可是死是一种罪恶的念头却在恐吓着她，她好象竭力要向我们和自己证明，应该原谅她，因为她已经十分痛苦了。她要想享受生命和爱情，可是她知道，这是犯罪，因此她在她的辩解中说：“现在什么都一样，我反正已经把我的灵魂毁啦！”她谁都不抱怨，也并不归罪给什么人，甚至类似这样的念头她连想都没有想起过；相反，她对一切人都感到有罪，甚至对鲍里斯她都问，他是不是对她生气，是不是要咒她……在她的心里没有怨恨，没有嫌恶，也没有一个自愿离开尘世的绝望的英雄通常所炫耀的那套东西。然而她再也不能活下去了，她无法活下去了，这就是唯一的结果；她打从心底里说：“我的苦已经受够啦……还要一直受苦下去吗？现在我活着为的什么，——嘿，为了什么呢？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不觉得可爱，人世也并不可爱！——可是死却还不来。〔你叫它来，它却反而不来。〕我不论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只觉得这儿（她指着胸口）痛。”

当念头想到了坟墓，她就变得轻快一点，——安宁之感好象一直注入她的灵魂。

“这么安静，这么好……关于生命连想都不愿意想了……再活下去吗？……不，不，不想活了……没有意思。这些人使我讨厌，屋子也使我讨厌，墙壁也使我讨厌！我决不到那边去！不，不，决不去……我要是到他们那边去，他们就要到处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呢？……”

日后必须忍受的所谓生活苦的念头，它是这样伤害着卡德琳娜，使她落到了一种半疯半狂的境地。到了最后的一刻，家庭中的一切恐怖，在她的想象中，特别活跃地闪着光。她尖声叫道：“如果他们把我捉住了，就会把我强力拖回家去！……我得赶快，赶快！……”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她不再成为〔没有心肝〕的婆婆的牺牲了，她不再和那个没有性格、使她讨厌的丈夫在一起，受着禁锢之苦了。〔她得到解脱啦！……〕

这样的解脱是悲哀的、痛苦的；然而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时候，又能怎么办呢。〔在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能够找到哪怕是走上这种可怕出路的决心，这也是好的。她的性格的力量，就在这里，《大雷雨》所以能使我们产生象我们上面所说的新鲜印象，也就在这里。〕毫无疑问，假使卡德琳娜能够采取别种方式摆脱折磨她的人，假使她的周围的折磨她的人能够改变态度，使她和自己、和生活得到协调，这就好了。然而不论前者，不论后者，都不合乎事物的规律。卡彭诺娃无法抛弃把她教养成人、让她活了一辈子的东西；她那没有性格的儿子也决不会无缘无故，突然获得坚强决心和独立精神，能够割绝老妇人所暗示默引的一切荒唐行径；周围的一切事物也不会突然变得使生活对这个青年女人显得甜蜜起来。他们所能够办到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对她表示宽恕〔，让她的家庭禁闭稍稍得到一些缓和，对她说几句宽大

仁慈的话，说不定，碰到在家务方面征询她的意见时，也会赏赐她发言之权。〕也许，这对于另一种逆来顺受的、无力的女人〔，在另一种时候，当卡彭诺娃们的专横顽固还是立身在普遍的沉默上，还没有多大理由对常识和一切权利表示它的赤裸裸的鄙视的时候，这还是满不错的。〕然而我们却看到，卡德琳娜并没有丧失她的人的天性，而且就她的处境来说，她只是在外表上处于专横顽固的生活的压迫之下；至于内部呢，心〔和理智〕都认识这种生活的一切荒唐的地方〔，这种荒唐，现在由于奇各伊和卡彭诺娃们碰到了反抗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他们没有力量去打倒它，却又很想坚持自己的立场，就率直宣布自己是反对逻辑的，就是说，让自己在大多数人们面前变成傻瓜笨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卡德琳娜当然无法得到〔顽固独夫的慷慨的宽恕，让她恢复家庭中她的以前的权利〕；她知道卡彭诺娃们的仁慈是怎么一回事，在这样的婆婆之下，一个媳妇的处境会怎么样……〔不，她要的可不是对她作一些让步和缓和，而是她的婆婆、丈夫，所有周围的人都能够满足浸透在她身上的那种活跃的追求，承认她的天性上要求的合法性，放弃一切对她强迫的权利，把自己改变得同她的爱情和信赖相称。这些改变在他们身上究竟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另外一种解决办法——摆脱家中的专横和强暴，和鲍里斯逃跑，这是比较可能办到的。〔尽管形式上的法律是严厉的，尽管粗暴的专横顽固是残酷的，这一种步骤，就它本身说来，还不是不能做到的，尤其是对于象卡德琳娜这样性格的人。她也并不轻视这种出路，因为她不是一个打算为原则而死的抽象的女英雄。当她从家里逃出来，要去见鲍里斯时，她已经打算死了，但是她决不反对逃跑：她一知道鲍里斯要走得很远，要到西伯利亚去时，她就十分单纯地对他说：“带我一起离开这里吧。”然而就在

这时候，在刹那间，在我们的面前，却浮起了那块把人们羁留在我们叫作“黑暗王国”的深渊深处的石头。〕这块石头，就是物质上的依赖。鲍里斯什么都没有，他完全依赖他的叔叔奇各伊；奇各伊和卡彭诺娃安排好了，把他打发到恰克图去，当然，不会让他把卡德琳娜带去的。因此，他回答她：“不，卡佳；不是我自己愿意去，是叔叔打发我去的，马也预备好了，”等等。鲍里斯不是英雄，他远不如卡德琳娜，她的爱他多半为了她的孤寂。他受过“教育”，然而却绝对没有力量对付旧生活，没有力量控制他的内心，驾驭常识，——他好象一个失魂落魄的人似的彷徨。他依附叔父而生活，是为了“如果他和他的妹妹对他表示尊敬”，叔父就得把祖母的一部分遗产分给他们。鲍里斯深深明白，奇各伊永远不会承认他是尊敬他的，因此，什么也不会给他；不仅如此，鲍里斯还这样议论：“不，他开头总是逞着性子千方百计折磨我们，骂我们，到了末了，还是什么也不给，或者只给一注很小的数目，还要说什么，这是为了好心才给的，连这也是不应当的。”然而他还是住在叔父家，忍受着他的辱骂；为什么呢？——不明白。当第一次和卡德琳娜相见，卡德琳娜说到为了这次相见她会遭受什么事情的时候，鲍里斯却打断她的话：“咳，想这个干什么，我们现在很幸福。”然而到了最后一次相见，他却哭泣道：“谁又料得到，为了我们的相爱，我们两人要受这样的折磨！当时我其实还是逃走的好！”总之，这是一种并不十分少见的人，他们不懂得去做他们能够了解的事情，也并不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这种典型，我们的文学是一再在描写的——描写时，时而对他们抱着夸张的同情，时而对他们怀着过分粗暴的态度。奥斯特罗夫斯基把他们本来面目描写给我们看，并且以其特别的、他所独有的本领，描写出他们那种彻头彻尾的卑微中的两三种特征，虽然这种卑微还没有丧失某种程度的精神上的高贵。关于鲍里斯这是

用不着多讲的，其实，也应当把他看作是剧中的女主人公所陷身在其中的环境。他就是造成她不得不遭受不幸的结局的一种情势。假使这是另一种人，并且是另一种处境的话——那时候就不必有投水之举了。〔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奇各伊们和卡彭诺娃们的势力所支配的人群，通常就只会产生吉洪们和鲍里斯们，他们没有能力振作和承受他们的人的本性，甚至在和卡德琳娜这样性格的人物接触的时候，都是如此。〕关于吉洪，我们上面已经谈过几句了；鲍里斯——实质上也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是“有教养的人”。教育去除了他为非作歹的能耐，——这是对的；然而它并没有授给他抵抗别的人们所做的坏事的力量；教育甚至也并没有在他身上发挥一种控制自己的能力，对一切在他的周围挨挨挤挤的脏东西不理不睬。不，他不仅没有抵抗，不仅受到别人的脏事丑行所支配，而且他不由得也参加在其中，不得不承受它们的后果。可是他了解自己的处境，也谈论这种处境，甚至在最初，常常欺骗那些真正活跃的、坚实性格的人，这些人自己思忖，既然某人这样想，这样理解的，那就应当这样做了。〔这些人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观察，他们毫不犹豫地告诉那些远远躲开悲哀的生活处境的“有教养的”受难者说：“把我也带去吧，我到处都跟着你走。”可是这里却暴露了受难者的无力；原来，他们并没有预见，他们就咒骂起自己来，他们乐意做一些什么，可是办不到，他们没有意志，而主要的——他们的灵魂里什么都不存在，为了继续使自己生存，他们只好为了这同一个奇各伊而鞠躬尽瘁，虽然他们也打算和我们一起摆脱他……〕

对这些人既不用赞美，也不用咒骂，〔然而却需要注意问题所以会变成这样的实际基础；〕应当承认，一个盼望叔父交给他遗产的人，要抛弃自己对这个叔父的依赖，这是困难的，〔因此对于这种等待叔父给他遗产的子侄们是不必寄予过分的希望的，

虽然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已经好到无可再好了。假如这里要辨别出罪魁祸首来，那么有罪的与其说是侄子，不如说是叔叔，或者，最好还是说，他们的遗产。〕

然而，关于物质上的依赖，〔这个“黑暗王国”中顽固独夫们全部力量的主要根据，在我们以前几篇文章中，已经详细谈过了。〔因此〕这里，我们只提醒这件事：既然说在《大雷雨》中卡德琳娜所遭受的那种不幸的结局是绝对必然的，那么，这个面临这样的境地、准备迎接这样结局的人物的出现，也是绝对必然的了。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结局在我们看来令人高兴；这是容易明白的，因为：在这个结局里对专横顽固势力已经发出激烈的挑战声，它对这种势力说，已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再跟强迫的、濒死的原则共生同处了〕。在卡德琳娜身上，我们看到了对卡彭诺娃们的道德见解的反抗，在家庭折磨之下，在可怜的女人投身进去的深渊之上，发出了坚持到底的抗议。她不想妥协，她不想享受人家为了换取她的活跃的灵魂而赏赐的可怜的苟安。〔她的毁灭，这是巴比伦俘虏之歌^①的实践：“把郇山之歌演唱给我们听，”——犹太人的征服者对犹太人说；然而悲哀的先知却回答：陷入奴役之中，无法歌唱祖国的神圣之歌，与其让他们去弹动竖琴，唱起郇山之歌，去安慰他们的主子，还是让他们的舌头紧贴喉头，让双手枯槁起来吧。尽管充满绝望，这首歌却能够产生十分愉快而雄伟的印象：使你感觉到，假使大家永远受这种感情所鼓舞，那么犹太民族就不会毁灭了……〕

然而即使没有任何崇高的理由，单单凭人的本性来说，我们也乐于看到卡德琳娜能够〔摆脱〕，〔——即使没有别的法子，通

^① “巴比伦俘虏之歌”据说是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到十世纪初的大卫皇所写的圣歌。

过死而完成吧。我们这是指戏剧深处那个可怕的证据，这个证据告诉我说，生存在“黑暗王国”里，这比死还糟〕。吉洪在冲到刚从水里拖起来的他的妻子的尸体时，他忘其所以地叫道：“你倒好了，卡佳！可是我为什么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受着苦呢！”剧本就以这一声感叹结束，我们觉得，再不能设想比这更强有力、更真切的绝望了。吉洪的话使得那些以前甚至不了解剧本的实质的人，都能够找到领悟它的关键；这些话引起观众思索的，已经不是恋爱的纠葛，而是关于这整个的生活，〔生者羡慕死者，而且还有什么自杀的人哩！〕说老实话，吉洪的叫喊是愚蠢的：伏尔加河近在咫尺，假使他活得无聊，没有哪个人会打扰他跳下去。然而他的悲哀也就在这里，他的确也是痛苦的，他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可以做〔，甚至连那种他承认其中有他的幸福而且能够得救的事情都是如此。这种道德上的腐朽，这种人性的灭绝，在我们的心里，唤起比任何最悲剧性的事件更沉重的印象：在那里，你看到的是一刹那之间的毁灭，那痛苦的终结，常常是逃掉了再去充当某一种卑劣行为的可怜工具的必要；可是在这里，却是经常不断的、沉重的痛苦，衰老疲惫，半死半活，在漫长的岁月中活活的腐朽掉……而且还得想到，这种活着的尸体，不是个别的人，不是一种例外，而是蒙受奇各伊和卡彭诺娃的腐烂的影响的一大群人！假使不希望他们能够逃脱，你会承认，这是很可怕的！因此，那个在自己身上找到这样的决心：不管怎么样，都得结束这腐朽的生活的健全的人，就使我们感到他有一种多么欢乐、多么清新的生命力呵！……〕

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没有谈到的还有许多事情——关于夜间相会这一场，关于在剧本中也并不丧失其意义的库里庚，关于瓦尔瓦拉与库特里亚希；关于奇各伊和卡彭诺娃的谈话，等等、等等。这是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指出剧本的普遍意义，由于

专注于普遍的事物，我们就无法充分地深入分析详细情节了。文学的裁判官们还是要感到不满的：剧本的艺术价值的程度没有充分得到阐释和说明，它的优秀之点没有给指出来，次要的和主要的性格没有严格地区分开来〔，而尤其荒唐的是——艺术又成为一种不相干的思想的工具了！……〕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个回答：〔让读者自己判断（我们推想，大家都读过《大雷雨》，看过《大雷雨》的戏），——我们所指出的思想，——是我们强行加上、和《大雷雨》完全不相干的呢，还是从剧本本身中真实地流露出来、形成剧本的实质、阐明了它的直接意义的？……假使我们错了，就把这一点指给我们看，把另一种和剧本更适合的意义赋予它……假使我们的思想是和剧本一致的，那么我们就请求再回答一个问题：俄罗斯人的充满生气的性格是不是真的通过卡德琳娜而反映出来，俄罗斯的环境是不是真的在包围着卡德琳娜的一切事物中反映出来，俄国生活成长运动的要求是不是真的在剧本的意义中表现出来，象我们对它所理解似的？假使“不”，假使读者不承认这里有他们的内心所熟悉的、亲切的，同他们的根本要求相接近的什么东西，那么，当然，我们的劳作是白费了。然而假使是“是”的，〕假使我们的读者，把我们的意见考虑之后，发现艺术家的确在《大雷雨》中号召俄国生活和俄国力量〔采取坚决的行动，假使他们体会到这个行动的合法性和重要性〕，那时候不管我们的学者和文学裁判官怎么说，我们都会满意了。

逆来顺受的人^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两卷本，一八六〇年。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包括四部分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损害的》，

《时代》，一八六一年，第一至七期)

—

“又是讲什么逆来顺受的人！在《黑暗的王国》里，难道还没有把他们谈够，说得广一点，《现代人》的批评栏难道还没有因为谈他们而使人感到腻烦！人的头脑里分明已经钻进了一种胡涂思想——想把艺术批评工作转变为对俄国社会进行病理学的钻掘……但是今天，关于我们文学中一个杰出活动家的创造才能的实质和水平——这个对艺术极其重要的问题，多少应该轮到注意了，这问题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在十五年中间，人们对他发表了最最纷纭不同的意见。《穷人》一出版，那个承认果戈理的文学派别，大家都以最大的兴奋来迎接它；别林斯基声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固然应该多多感激果戈理，正象莱蒙托夫应该感谢普希金一样，——然而，虽说这样，他其实根本不是果戈理的模仿者，而是独立的、巨大的天才。别林斯基补充说，他开创了俄国作家中还没有一个人开创过的工作。不仅如此，——别林斯基

还这样预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才能是这样的，他们不会立刻得到理解和承认。在他的活动时期会出现许多有才能的人，来和他分庭抗礼，可是到了结局：就在他达到光荣的极境时候，人们就会把那些人都忘却了。’（《祖国纪事》，一八四六年，第三期，第二〇页）这还是在索洛古勃、路冈斯基、格列平卡^②君一流人的中篇小说还在流行的时候写下的；冈察罗夫君当时还没有挟其《平凡的故事》而出现；屠格涅夫和格里哥罗维奇君还刚刚发表几篇不足称道的小说；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庇雪姆斯基、托尔斯泰以及其他几个后来蜚声文坛的作家，在当时也还毫无所闻。从这时起，又过了三年，新的作家诞生了，获得了可敬的声名；陀思妥耶夫斯基君还是继续写作，但是他的新作品，没有一种是可以和他的第一种中篇小说相比拟的。在一八四九年中间，他的文学活动中辍了^③，可是文学界并没有因此表示特别的惋惜。假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十年来的沉默期间，人们有时候也回想到他，那也只是为了嘲笑嘲笑那种特有的天真，凭第一种小说就天真地宣布他是个天才，嘲笑嘲笑由于一致崇拜所造成的他的过分自尊。然而，两年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文学界出现了，虽然，他的名字放在最近十年来那些在俄国文学的地平线上晶晶发光的巨星之前，是显得太苍白了。在这两年中间，他出版了四部大作品^④，但对于这些作品，批评家还没有发

① 本文发表在《现代人》一八六一年第九期中，署名为《Н.-бов》。

② 格列平卡（Е. П. Гребенка, 1812—1848），俄国散文作家。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参加彼得拉雪夫斯基小组，在一八四九年被判死刑，后来改为四年苦役，然后放逐。至一八五九年始获准重返彼得堡。——原本编注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这些作品：《小英雄》（1857年），《叔叔的梦》（1859年），《斯吉邦契柯伏村和它的居民》（1859年），《被侮辱与损害的》（1861年）。

表过不偏不倚的评判。现在批评家的面前，就放着这个任务，要弄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才能究竟发展和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他跟别林斯基的批评还没有注意到的那些新作家相比起来，有什么样的美学特点，他的新作显出什么样的缺点和美，在这些作家，象冈察罗夫君、屠格涅夫君、格里哥罗维奇君、托尔斯泰君等等的队伍里边，它们把他放在哪一个确当的位置上。批评家正面临一个对我们的文学史是十分重要的艺术问题，——可是他却打算议论什么逆来顺受的人，——这个甚至根本不能算是美学问题的题目。”

每一次，我动笔写批评文章的时候，这一类要求和呼声就来批评我。照一位批评家的意见看来，除了公开承认之外，我就没有其他可以摆脱它们的法子，要解决如此重要的问题，我的力量还够不上。我说不定也会准备承认；可是，第一这对自尊心是一种侮辱，第二，为什么我要诬蔑自己呢？当然，批评应当是永久的艺术法则对个别作品的应用，应当象镜子一般，使作者的优点和缺点呈现出来，指示他正确的道路，又向读者指出应当赞美和不应当赞美的地方。真正的批评岂不是应当这样的吗？可是，你可知道，纯理论的批评，也象谈谈怎样发财，怎样享福，怎样得到女人的爱情的理论一样，也是不切实际的。假使这种理论碰到一个总有许多机会取悦一个女人的人，假使致富和获致幸福的理论能够合上一个稳健、精明、善于逢迎、并且灵巧的人的口味，——那么说不定，这倒还有点用处：因为这种人有取得幸福和财富的保证——这种保证促使他和书本上的理论原则相接近。然而要是这种道德根据的是一些庸俗的教条，它们以“指导走向幸福与富裕生活”为幌子，内容就是所谓“必须省吃俭用”，“永远不要放纵热情”，“要安分守己”，“要耐心忍受你倚靠的人加在你头上的一切侮辱”等等，等等，——要是把这种道德用到

热烈的、挥霍无度的、不安分的人的头上，那又怎么样呢？显然，到那时候，也不值得再去研究幸福论了，正象一个衰弱而丑陋的老头儿不值得去研究“取悦女人的本领”一样，因为在这种场合，最重要的条件便是放浪不羁，青春年少，仪表端正，且不提美貌了。对批评也如此：假使你见到一种作品，它多少接近理想的要求，并且也有福分“成为永久的、幸运”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是依仗它对别的什么利益的关系，而是凭着自身内在的优点以构成它的独立的，这自然很好。在这等场合，你可以从美学观点来研究它们，也可以专心研究艺术的细节，在其中追寻一切瑕疵。然而这在那时候是会自然而然发生的，它出于一种和这同样的、不由自主的感情：为了使一幅美丽的图画得到充分的亮光，就在这种感情之下着忙起来：你不由自主地做了动作，想赶走栖息在画幅上的苍蝇……然而，在谈到现代俄国小说家作品的艺术美时，要抬出艺术的永久法则，谈谈艺术的美——这（要请安宁柯夫君和他的所有信徒原谅我！）等于为了鼓励一个搅错了节拍的舞蹈者，就发挥一通关于低音的理论，或者，为了一个还不能正确解决一次方程式的学生的错误，就一味絮述关于或然率的数学理论，同样是可笑的。

对于那些老是沉潜在“自己的文学”里，除了出版新的一期杂志以外，就不觉得还有社会生活其他事件的人，他们的蚁垤的确应当看作是异常重要的东西。既然只知道抽象的艺术理论（但是，在从前它是有过生动的意义的），而且一心一意要把屠格涅夫君的中篇小说，例如吧，去和希施金君的小说或者拿冈察罗夫君的长篇小说去和卡尔诺维奇君^①的长篇小说作比较，——那

① 卡尔诺维奇(Е. П. Карнович, 1824—1885),俄国作家,杂志评论家和历史学家。

么的确，会很容易激动起来，并且叫嚷：

这一种蚂蚁有过人的力量……①

然而你得相信，只有那些闲空无聊的人才会围聚在这只蚂蚁的周围，整整好几个钟头欣赏着它怎样表现自己的力量。大部分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事情，假使他们有时也要好奇地看看力量的表现，那么也决不是这一种。

我很想在这里谈谈在当代俄国小说文学中所呈现的力量的大小，可是这会扯得很远……还是另外一次再说的好。这个题目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现在还是专门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主要的就是他最近的长篇小说，以便问读者：对这样作品进行审美的分析，是不是显得可笑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长篇小说真出色，它是这样出色，人们几乎就没有不怀着喜悦之心来读它的，几乎大家都赞不绝口地谈到它……阿赫萨鲁莫夫君的《异姓》，曾经显示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敌手，可是人家说，从这个长篇小说的第二部起，就暴露了一种带着波列伏依的长篇小说情调的、有伤大雅的庸俗，使得读者没有读完就把它丢开了。波吉兴君的《穷贵族》，也是这样，人们说，它远远落在《被侮辱与损害的》之后。总而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长篇小说，直到今天，还是今年最好的文学现象。请你试试把严格的艺术批评的规则用到他身上去吧！

我们的大部分读者，当然都知道《被侮辱与损害的》这部小说的内容。因此我们要努力在最简短的几句话中，叙述长篇小说的主要轮廓。

① 克雷洛夫的寓言《蚂蚁》中的文句，略有变动。

故事的叙述是以伊凡·彼得罗维奇，这个“一事无成”的文学家的名义而进行的。小说的主人公，是华尔柯夫斯基公爵。伊凡·彼得罗维奇是由地主伊赫美涅夫养育大的，伊赫美涅夫同时还管理着邻近华尔柯夫斯基公爵的田庄。华尔柯夫斯基十分信任伊赫美涅夫，甚而至于把他的那个在彼得堡花天酒地胡闹的十九岁的儿子阿列莎，送到伊赫美涅夫这里来托他监管。可是过了一年，为了有人毁谤伊赫美涅夫好象阴谋要叫阿列莎娶他的十七岁的女儿——那塔莎做妻子，——公爵来到了田庄上，和他发生了龃龉，夺去他的管理产业之权，说他宕用款项，还打起官司来。伊赫美涅夫为了“奔走讼事”，就迁居到彼得堡去。这就是长篇小说的开头。

伊赫美涅夫一家人就在彼得堡遇见伊凡·彼得罗维奇；当然，他热烈地恋爱着那塔莎，她也爱他，他们彼此互相吐露心事，还向她的父母提出，他们得到了愉快的应允和祝福——只等伊凡·彼得罗维奇挣的钱比现在更多的一年。然而就在这时候，阿列莎也偷偷避过父亲，开始到伊赫美涅夫家串门；老人们殷勤接待，因为他才二十一岁，还是一个可爱无邪的孩子哩。他爱上了那塔莎，那塔莎也爱上了他，——以至于在一个美丽的晚上，她离开亲人的家，出奔到他那里去。这一切，伊凡·彼得罗维奇都知道，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帮助他们，把消息从女儿那里传给她的父母，又从父母那里传给女儿等等。然而他的活动很快就分成两叉了：他到一个公寓里拜访过一个在他的手上死去的老人；那个外孙女，十三岁的女孩子涅丽有时也到老人这里来；她还到过伊凡·彼得罗维奇那里，但是一发现找不到外祖父，马上就跑走了。伊凡·彼得罗维奇终于把她访问到了，从一个已经把她卖给什么浪荡子的淫荡女人手下，把她救出来，让她住在自己身边。从这时候起，伊凡·彼得罗维奇就不停地从涅丽那里奔向

那塔莎，又从那塔莎奔向涅丽那里去。但是，华尔柯夫斯基公爵一看到儿子还是没有断绝和那塔莎的来往，就想出一个刻毒的法子：他跑到那塔莎那里，当着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面，请求她同意嫁给他的儿子。大家都十分高兴事情会有这种转变，然而那个只有碰到阻碍还能使爱情维持下去的性情浮动的阿列莎，现在对那塔莎已经完全安心了，他有好几天不露面，却去出席了舞会，而且一点也不要人强迫，就和父亲给他预备好的未婚妻认识了。过了几天，他当然就热烈地爱着她了，就象他爱着那塔莎一样，再过了几天他就断定，他的爱她比爱那塔莎更厉害。老公爵的打算显然是正确的；那塔莎也很快就了解他，而且激烈地、象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向公爵说穿了一切。公爵感到侮辱了，因此，过了好几天，他就无耻地夹杂着各种各样的侮辱，吐露了这件事，就是说，他向伊凡·彼得罗维奇承认了他的一切算计。但是，当公爵坐车到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公寓里时，他却看到了涅丽，涅丽被他骇坏了，生起病来。伊凡·彼得罗维奇又忙碌起来：这里有病人，那边在闹分离；阿列莎的父亲要儿子结婚，他的未婚妻卡佳要和那塔莎认识，请求她原谅和同意；那塔莎的父亲为了女儿而忧心忡忡——时而咒骂她，时而要叫公爵决斗；母亲一心想到女儿那边去，那塔莎自己差一点倒下。最后，一切都安排停当了；阿列莎和卡佳以及她的全家一起到了乡间，那塔莎决定回到父母那里。为了使父亲的心能够缓和下来，让他宽恕她，就用小涅丽作为工具，要她把自己的遭遇，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也就是把她的母亲的遭遇告诉他。事情是这样的：涅丽的母亲受到一个绅士的引诱，离开父亲出奔，遭到父亲的诅咒，后来她被那个情人掠夺一空，被他抛弃，她白费气力恳求父亲的宽恕，她还是在—一个阴沉潮湿的角落里，由于害肺病和饥饿而死掉了。这个故事的确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以至于伊赫美涅夫决定到那

塔莎那边去。可是结果这是完全不必要的：那塔莎自己就跑到父母的面前，当然，她得到最最热烈的欢迎。在这之后，由于伊凡·彼得罗维奇的朋友，好打听的玛斯洛鲍耶夫的帮助，打听到涅丽就是华尔柯夫斯基的女儿，就是他引诱了她的母亲，而且同时——他还以合法的方式娶过涅丽的母亲做妻子哩。然而从法律上反对公爵的罪证并没有，不能对他采取任何措施。阿列莎当然娶了卡佳做妻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就这样毫无报复地活下去。涅丽此后不久就去世了；那塔莎却和父母一起到外省去，伊赫美涅夫老人在他和公爵间的官司彻底输掉，失去了他的最后一个村子伊赫美涅卡以后，就在那里给自己张罗到了一个地方。

在长篇小说中，有许多描写得很出色生动的细节，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虽然落入了通俗喜剧的窠臼，可是有不少地方还是写得并不坏，小涅丽的性格描写得着实好，伊赫美涅夫老人的性格也勾勒得十分生动而自然。在今天优秀的中篇小说普遍苍白贫乏之下，这一切却使长篇小说有权引起公众的注意。然而这一切也还没有把它提高到这种境界：可以对长篇小说所有的细节都采取普遍的艺术要求，使它成为进行详尽的审美分析的对象。

譬如举个例吧，就拿作者的手法本身来讲：把那塔莎和阿列莎的相爱和痛苦的故事讲给我们听的人，自己就在热烈地爱着她，决心为了她的幸福而牺牲自己。老实说，——对所有这些精神上的伟大已经达到这种境界的绅士，愿意装聋作哑地听任自己的未婚妻和情人接吻，并且还到他那里去跑腿，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们或许根本并不相爱，或者只是在头脑里相爱，只有那些对头脑中的爱情比发乎内心的爱情更熟悉的创造者，才会在文学中把他们虚构出来。假使这些充满浪漫气息的自我牺牲者真的在相爱，那么他们的心灵该多么孱弱，他们的感情该多么萎靡！

可是人家却把这些人当作一种理想来描写给我们看哩！据我所记得，第一个安排下这一种恋爱上自我牺牲的纠葛的是屠格涅夫君^①，他不久以前还在《前夜》中重复着这种纠葛，不过这一次，却小心翼翼地要使读者了解，当别尔森涅夫必须帮助英沙罗夫的时候，他自己还没有弄明白自己对叶连娜的感情哩。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挑中这样的主人公，也不是第一次；我们已经在《白夜》中的幻想家身上看到过它了。然而比起他眼前这部长篇小说来，这不过是笑话而已。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聪明、高贵而且头脑发达的人，他也落到了这种纠葛里，并且准备向我们述说这一点。不管我们对他的功绩的道德价值怎么看法，但是使我们感到兴味的还是通过他的叙述来研究他。在长篇小说所有受到侮辱与损害的人们中，他受的侮辱与损害几乎比任何人都厉害；请想象一下，这些侮辱怎样反映到他的心里，当他看到自己的日趋毁灭的爱情时，他尝到了什么痛苦；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念头和感情去帮助那个诱惑他的未婚妻的小子的；有的一些什么样的爱情、嫉妒、骄傲、怜悯、嫌恶、仇恨的无穷变化在他的心灵里勃发；当他看到他的未婚妻和她的爱人之间的决裂逼近的时候，他体会到了什么，——通过这个最受侮辱的人本人的生动而真实的叙述把这一切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大胆的课题，为了完满地把它实现，这需要磅礴的才能。爱奈斯特·菲陀^②在解释这个课题的一小部分时，光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就一下子在欧洲声誉四播，并且获得大批拥护者。假使我们对整个课题都能找到良好的、诗意的解决，这该多好！其次，要是我们能够达到艺术上的完整，——那么我们就能够弄清

① 这是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勃列退尔》(1846年)。

② 爱奈斯特·菲陀(1821—1873)，当时法国的一个通俗作家。这里杜勃罗留波夫是指他的长篇小说《法尼》而言。

楚各种类型的人物，弄清楚一连串的道德现象；我们就知道怎样去评判这些心肠温柔的人物，应该给予他们的人道的、抹煞自己个性的精神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正象我们现在，例如吧，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之后，我们就知道怎样来观察俄罗斯性格中封建宗法式的豪放似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以喜欢描写心理上的精微奥妙之处著称。关于他的，似乎就是《两重人格》吧，“根本不是小说、而是心理学的发挥”的这个意见，甚至给人借口，编造了一个十分出名的笑话。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君要攻击我谈过的思想，这原在意料之中。当然，只有到了那时候，才能谈到描写方面的艺术性。然而在实际上，你在长篇小说里别说找不到伊凡·彼得罗维奇内心状态的轻微的描写，甚至也看不到些微暗示说明作者是关心这一点的。相反，他却回避可以揭开这个充满爱情、嫉妒而且受折磨的人的灵魂的一切地方。在阿列莎能够诱惑那塔莎，并且把她吸引过去的那五个月，——还占不到五行。阿列莎和那塔莎最初半年的生活，简直是毫无什么说明就略过去的。长篇小说的情节延续了一个月光景，伊凡·彼得罗维奇在这个时期就是不断地奔跑，以致他最后有两次发晕，差一点得了热病。然而这就是全部了；他的心里是怎么样，这我们不知道，虽然我们也看到，他并不舒服。总之，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谈论爱人的迷误和痛苦，谈论他的内心所蒙受的侮辱，谈论神灵对他的呵斥的那个热情地恋爱着、爱到甘愿牺牲自己的人；我们看见的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很好给故事选取一定的形式，没有考虑过形式对故事担负什么责任的作者。因此故事的调子是极其虚伪、极其做作的；而那个实质上应当成为一个剧中人的故事叙述者自己，在我们看来也变成一个类乎古老悲剧中的心腹密友似的人物了。那塔莎的父亲跑到他这里来——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他，在他之后，

那塔莎的母亲又打发他去打听她的事情，那塔莎为了当他的面可以疗治自己的心，也叫他过去，阿列莎来拜访他，吐露他的爱情、轻浮和悔悟，阿列莎的未婚妻卡佳也来和他结识，好和他谈谈阿列莎对那塔莎的爱情，涅丽为了表现自己的性格，玛斯洛鲍耶夫为了打听和谈谈涅丽对公爵的关系，也都和他相遇，最后，连公爵自己也到鲍列里酒馆中来拜访他，为了告诉伊凡·彼得罗维奇他的性格中一切脏东西，甚至在那里喝得酩酊大醉。而伊凡·彼得罗维奇尽是听着，尽是记着。这就是他在长篇小说中所参与的一切。

既然甚至这个负责要把他的切肤相关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用户对问题的态度是这样的，这就不必盼望他能够十分深入地把我们带到其他登场人物的内心生活中去了。正因为这样——长篇小说在我们看来就只是我们在街上、在客厅里，在别的什么顶楼中可以偶然亲眼看见的那些风波的万花筒，在进行这种表现的时候，总有一个能够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这般事情的人在场。例如，长篇小说的情节是以那塔莎对阿列莎的爱为基础的。那塔莎是聪明，严肃，道德感情充分发展的姑娘，她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甚至也没有任何感官上的要求。而阿列莎，却在二十一岁上就变成轻浮无耻的人了，他的性格丧失任何道德基础已经到了这地步：他对自己的下流一点都不觉得害臊，相反，立刻自己就把它说出来，还要补充，他知道这是不好的，可说了之后，还是重复着这同样的下流行为。但是这个讲故事的人还打算赞美他的天真哩，他说：“他根本就不会扯谎，要是他扯了谎，他根本就不会怀疑到这是不好的。”可见，这是一个看不见善恶区别的天真可爱的赤子，虽则他已经年届二十一龄，受过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教育培养，他的心里已经体会过什么东西，同时又是象华尔柯夫斯基公爵这样的父亲的儿子。故事讲述者为了

把阿列莎的性格理想化（按照武士道的规矩，在谈到对手的时候，应该这样），他指出：“受到一种强大势力的逼迫，他也会犯一件恶行，然而，只要他认识这种行为的后果，他就后悔得要死了。”再过了两页，就发生了阿列莎和从家里出奔的那塔莎相见的一场。伊凡·彼得罗维奇试着去提醒他：“您干的什么呀，”他说，“您给了她的父母多么可怕的打击”等等……阿列莎回答：“是的，这是可怕的……我以前就说过啦，可是怎么办呢，要改变也没有法子”……可是这里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那个把人家女儿从家里拉出来的阿列莎，并没有因绝望而死去，甚至以后，丢掉了那塔莎，娶了卡佳做妻子，也并没有死去……总之，按照描写中所说，这是一个诱惑人的可爱的孩子，只不过十分轻浮，可是在事情的发展中——却变成一个早已败坏、自私自利而且空虚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倾向，没有什么信念，随时都会向任何一种不相干的影响屈膝，但对自己的任性与肉欲，却是一直忠心耿耿的，他并不以此为羞耻。很难说清楚，他的诱人之处在哪里，他凭什么能够左右象那塔莎这样的又聪明又严肃的姑娘。就在阿列莎见到那塔莎，要把她引诱到他那里去的时刻，他对伊凡·彼得罗维奇开始胡说八道起来，她为了他而脸红了，她使眼色恳求伊凡·彼得罗维奇——不要把他批评得太严厉……好吧，请问，在这样的关系之下，有什么吸引力，什么爱情呀？

可是这种不合情理的地方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君要去描写它们，自有他的所谓特权。从高略特金君^①直到《斯吉邦契柯伏村》中的福玛·福米奇为止，他描写了当时许多病态的、不平常的现象。他要描写那塔莎对这位极其卑劣的、照常识所能预料的一切来说，不会不变成她的仇敌的花花公子的特殊而又

① 高略特金是《两重人格》中的人物。

不自然的爱情，这也并无不可。甚至我们还能假定，就正是这一类关系中的非凡、奇特，引起了艺术家的惊异，促使他把它们再现出来。然而我们可也知道，~~艺术家~~艺术家不是一块只反映现在一刹那的照相感光板：要是这样，在艺术作品里既不会有生活、也不会有意义。艺术家用他那富于创造力的感情补足他所抓住的一刹那的不连贯，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把一些局部的现象概括起来，根据散见的特征创造一个浑然的整体，在看来是不相连续的现象之间找到活的联系和一贯性，把活生生的现实中的纷纭不同而且矛盾的方面融合而且改造在他的世界观的整体中。因此，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写作他的作品时，在他的灵魂里总是包容着它的完全统一的方面——包括它的开始与终结，包括它的常常是逻辑思维所不能了解，但却是艺术家灵悟的眼光所能发现的秘密的动力和秘密的结果。真正的艺术家所以要把他的创作呈现给别人的，也就在于这些方面；它们在一切人看来都是单纯、容易了解而且合乎规律的。有一些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我们感到十分陌生的事物，在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却会觉得是亲切的：不论那浮士德的痛苦的探索，不论那李尔王的疯狂，不论那恰尔德·哈洛尔德的残酷无情，我们都很熟悉，仿佛是亲人一样；读了它们之后，天才的创造力量所加于我们的影响达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力量，甚至置身在一切撒满在我们身上的泥污和庸俗之下，都能把头伸到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中去，而且认识到，诗人的创造的的确确忠实于人类的本性，只应当如此，否则就不成……当然，不是所有的天才，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你都可以希冀这一类作用，可是在每一部艺术作品中，它到底达到了某一种境界，而同时，那些才能比较差的诗人，通常所呈现给公众的作品，其中所反映的思想在重要和广度上，也总比较差；然而它毕竟多少——即使是一个极小的范围吧，毕

竟多少完全而独立地反映一些什么出来；否则，那艺术才能的特征，在作品里就一点都找不到了。

因此，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长篇小说，就其完整性而言，即使只反映了生活中这样细小微末的题旨^①：一个象阿列莎似的奇臭的甲虫如何引诱循规蹈矩的姑娘去爱他。作者即使只对我们解释这一点，——我们也准备一步一步探索他的小说，和他一起参加随便哪种艺术和心理学方面的讨论。然而连这也没有，那塔莎的恋爱热病从而产生并且达到它可怕的爆发的五个月，连短短一页都不曾赏光提到。女主人公的内心对我们是掩藏起来的，而作者对这颗心的秘密所能想象的，看来也不比我们多。我们信任地面对着他，问：这是怎么会发生的呢？他回答：你瞧——就是这样发生的。——是的，也许，他还补充这一点：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可是，这却是发生过的。——你乐意在这一类作品里找寻艺术意义吗？

还有以后，当那塔莎已经实践她的奇怪的一步——这一步的荒唐她是早就知道的，在这一步之后——她同阿列莎又怎么生活呢？从这一种新生活的开头几天直到我们又第一次看见她和伊凡·彼得罗维奇谈话，以及她表示了和阿列莎之间应当分手的决心的那天为止，在她的内心之中，又产生过怎样的过程？关于这一切，我们只看到几句无关宏旨的话，这几句话是在描写那塔莎的公寓中情境时偶然带到的……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兴趣所在，在他这里这还不是主要的工作。那么在哪里？由于

① 我不说，要艺术家给自己提出题旨，而是说这个题旨在他那里自动得到反映，得到解决，否则人家可又要说，我是拿功利主义的题目强加在艺术家身上。②——作者注

② 杜勃罗留波夫是暗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波夫君以及关于艺术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一八六一年二月《时代》杂志上。这篇文章责备杜勃罗留波夫轻视艺术性，以功利主义态度对待艺术。——原本编注

长篇小说的情节，在那塔莎的遭遇和涅丽的遭遇之间作了奇怪而多此一举的重复，它彻底毁坏了印象的完整，要分析它就更加困难了。可是这两种遭遇既然以华尔柯夫斯基公爵为中心，那就可以假定：长篇小说的基调，它的实质，就正是在于再现这个公爵的性格。然而你若是深入观察这个人物的描写后，你就会发觉，作者是怀着喜爱之心来描写这混沌一片的丑恶，来搜集这些邪恶而无耻的特征的，你在这里找不到人性的面目。……那种在艺术中起着如此巨大作用、~~让~~让一个完全的人站在你们之前，使你通过一切漂浮起来的丑事窥见他的人类本性的、使问题得到协调、得到解决的原则，——这种原则在公爵个性的描写中，并没有什么痕迹。因此你不会对这种个性感到怜悯，不会对它感到高度的仇恨，一种不是专对个人，而是对典型、对一定种类现象而发的仇恨。即使作者多少不成功地、多少尝试过窥视主要人物的灵魂也好……不，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尝试，也没有暗示……公爵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的？最使他感到兴味、感到波动的是什麼？他怕的是什麼？最后，他相信的又是什麼？假使他什么都不相信，假使他的灵魂中是挖得精空的，那么这个值得查究的过程又是怎样、而且依靠什么东西而产生的呢？即使不向作者提出什么特别巨大的要求，我们也有权要求他来解释这一类事情。我们且不说诗歌中的巨人，即使只谈谈能够满足这种谦逊要求的作品吧：例如，我们知道乞乞科夫和泼留希金是怎样达到他们现在这样性格的，我们甚至还约略知道伊里亚·伊里奇·奥勃洛莫夫是怎样变得懒惰起来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完全忽视这种要求的。这样一来，你怎么还能够从审美观点来分析公爵的性格呢？

既然这个长篇小说甚至在叙述中也暴露出它对艺术意义是缺乏要求的，要一本正经地、详细地、引经据典、罗致例证以分析

它的美学意义，这实在是过于天真，过于无知了。在整个长篇小说里登场人物所说的话都象作者自己一样；他们使用着他喜欢说的话，他的心爱的表达法；他们的语句节奏也是一模一样的……很少有例外。开头，所有人物彼此一定互相称呼亲爱的（也许，只有公爵例外），而结局，他们总是喜欢在同一句话上盘旋或是把话拉得很长，象作者自己似的，——在所有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作者自己，而不是那种代表自己而说话的人物。假使我对于要使读者相信我对这一点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兴味这件事并不感到腻烦，我就可以把这一切化较多时间谈一谈；我还可以旁征博引几段合在一起就能表现出一种相当可笑东西的文字。可是这一切我都不想干。姑且，我只举一个例子，但却很长，——这是当那塔莎明白了公爵的打算，告诉他，他的求婚用意何在的时候的事情。那塔莎开头按着历史的顺序叙述了在阿列莎向他的未婚妻卡佳宣布他爱那塔莎那个晚上以前的种种往事。然后她继续说：

“您在那天晚上问自己：现在怎么办呢？阿列莎什么都服从，可就是这一点是绝对不肯服从的；这味道已经完全尝到了。而且，您越是逼他，折磨他，他身上的反抗也越是厉害；因为他也正象每个软弱、但倒是正直的人一样；你要是不去追逐他们，不去逼他们，他们就不会想到反抗；可是您一逼，您自己就会在他们身上挑起反抗，要是没有您的追逼，他们的脑子里也许根本不会想到反抗。要去引诱他现在看来也不济事；以前的影响还是非常厉害，您只是在这天晚上才完全捉摸到这种影响是厉害的。怎么办呢？”

您于是打算了：

要是停止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逼，该会怎样呢？要是

能够从他身上去掉现在使他的内心感到痛苦的东西，去掉他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东西，又该怎样呢？说不定，到那时候，对这种义务的热情和迷恋，都要在他心里消失了。

譬如，现在他爱上了这个那塔莎；还有比这更好的吗？直截了当告诉他，他现在不但可以爱她，甚至还答应他可以实行他对她的一切义务，实行一切他为了那塔莎而痛苦的事情，而且不单是答应哩，甚而至于还几乎尽量使这个答应变成命令，告诉他，应当娶她做妻子，三翻四覆对他说，这是他的义务，——总之，凡是一切他对自己每天无拘无束从心里说出来的话，这一切现在甚至都变成强迫了。好吧，那时会怎么样呢？

——那塔里亚·尼古拉耶夫娜！——公爵叫道：——所有这些是您想象上的一种混乱，您的猜疑；您有点失神了，您夸张了！——于是公爵带着怜惜的样子耸耸肩膀。

——到那时就会这样，——那塔莎继续说下去，好象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公爵的话。——‘第一，’你打算，‘我要把他的心完全引到自己身上，这样，随便哪次对我不忠实，他都会感到羞耻了；这个办法现在对我是最合适的！第一个印象也许看来会不利；他高兴了。他虽然受到新爱的引诱，可是他对这新爱，自己还毫无所知；他到现在还是以为，还是相信，正象半年之前一样；他还是抱着同样的热忱，同样的激情，照旧爱他的那塔莎。他虽然迷恋着卡德琳娜·费陀罗夫娜，可是却以为，这不过如此而已；他觉得和她在一起很好，很愉快，——却不知道所以然；而且他也不去询问这一点！因此他心里虽然一天比一天热烈迷上新爱，可是他还是十分相信，在那塔莎那里的旧爱，还是一切照旧，没

有变化。他因此还更加高兴哩，的确，到现在为止还是爱这个那塔莎；她是他的朋友，他和她是这样厮熟；他甚至跑到她那里，跑到第一个人那里，谈他的卡佳（他现在对卡佳已经称你道我了）；她的痛苦他已经看到了多少次，他自己又从她的痛苦里受到多少痛苦！……因此他就愉快了，既然这样，那就让它这样吧；这样甚至很好，愉快得到了新的生命，为了愉快就把旧的忘记了；只有一种悲哀还是记得的，这一切只有一刹那的工夫；未来到底占了上风……

因此，在这整整半年中，他第一次能够心里轻松愉快的安安稳稳睡大觉；他的心已经不再为那塔莎而疼痛了。他不会在睡梦中醒来，忧悒的想：‘她怎样了？她碰到了什么？结局如何？应该怎样安排？’现在一切都好了，在第二天他会完全不由自主的，毫无什么考虑的理会到，托上帝的福，他已经不是一个欠债的人了；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她已经收到了一切，他付给她的甚至比她自己所想的还要多；他把自己整个的将来都交给了她，她应该珍重这一点，正象在此刻以前他应当珍重那塔莎为他所牺牲的一切一样。因此他就心安理得，呼吸也自由舒畅了，这一套他都是这样不由自主、这样毫无考虑、抱着一种善良而温和的感情想出来的！您看到了以后，心里就想：‘这样真是万事大吉；再过几天，在他身上，也会发生一切热爱的人在婚后常常发生的事情；并没有阻碍，什么都会来的，爱情自己就会冷下来；无聊来临了，渴望着新的；生活不喜欢平静；心渴望着生活’……

可是好象故意似的，新爱在这以前就预先准备好啦；它已经出现，用不着再去求啦。

——怪事，真是怪事，——公爵小声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孤独、幻想、读小说的结果。

——你把一切事情都寄托在新爱上，——那塔莎继续讲下去，对公爵的话没有听，也没有注意，她在这狂激的热情中，是越来越恍惚了：——对这个新爱有多好的机会呵！他还没有知道这个姑娘的所有好处以前，它就开始啦。就在那天晚上，就在他向这个姑娘表示，他无法来爱她，因为责任和另一个爱情禁止他这样做，就在这一刹那中，——这个姑娘突然在他面前显出这样的高贵，对他和她的情敌怀着这样的同情，这样一种从心底流露的宽恕，他虽然已经相信她的美，可是在这一刹那之前，他却没有想到过她会这样美丽！他那天还到我这里来，——可是只谈她的事情；她使他太惊奇了。真的，到了第二天，他不能不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要求，要去再看看这个美丽的人，即使只是为了感谢也好。为什么他不到她那里去呢？现在那个旧恋不是已经不再悲痛了吗，她的命运已经解决了，他整整一生都是留给她的，而那边只消化这么一分钟罢了……假使这个那塔莎连这一分钟都要嫉妒，那她就不是一个高贵的人了。于是不知不觉的，这个那塔莎被夺去的，不是一分钟，而是一天、两天、三天……可是在这当儿，这个姑娘却在他面前显出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特别的新姿态了；她是一个这样高贵、热情的人，同时她又是一个这样天真无邪的孩子，在性格上跟他这样相象。他们互相起誓，要结成友谊，结成兄妹，终生都不分离。虽然，他们之间谈到那塔莎的时候，也怀着爱情，可是他们却希望三个人生活在一起。‘谈了五六个钟头的话’，他的整个灵魂都向新的感觉打开了……他的心整个都被吸去了……这里还有新的思想，它们的来源又是卡佳。您会想，他也许还不至于马上来比较，然而这是逃不掉的。时间一到，他就会拿他的旧爱去和他的新鲜的感受作比较：

那边一切都是熟悉的、一成不变的；那边是这样正经、严格，那边他碰到嫉妒和责骂；那边是眼泪……即使有时也和他闹闹玩玩，那也好象不是对待平等的人，而是对待孩子一样……可是最坏的是：一切都是老样子、一切都是人人共知的……”^①

那塔莎的三段论法是惊人地正确的，好象她曾经在神学校里学过它。她的心理的洞察力也是出奇的，演词的结构可以和任何一个演说家、甚至是古代的相颉颃。然而，你会同意，这岂不是明白：那塔莎是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调在讲话。而且大部分登场人物都带有这种语调。

此外还得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正象我们许许多多文学家一样）喜欢接二连三的回到同一类型的人物去，从各种不同方面来检验这些人物和环境。他有几个心爱的典型，譬如，那种发展较早、病态的、自尊的孩子的典型，——他在涅托契加身上，在小英雄的身上，现在又在涅丽身上一再重现这个典型……涅丽的性格——也和《涅托契加》中的卡佳的性格一样，只有他们的环境是各不相同的。有这一种人物的典型，由于自尊心和怀疑起了病态的发展，他变得极度畸形，甚至达到神经错乱的地步，因此他给我们描写了高略特金先生，音乐家叶菲莫夫（在《涅托契加》中），福玛·福米奇（在《斯吉邦契柯伏村》中）。还有厚颜无耻、没有心肝的人的典型，他们只具有自私和肉欲的力量，——他在贝柯夫（在《穷人》中）身上把这种典型指认出来，在《女东家》中对这典型作过失败的描写，在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涅托契加》中）身上没有告一段落，如今在华尔柯夫斯基公爵身上终

^① 这里所引原文与现在通行的版本中的原文有不同。这里有许多地方是现在版本所没有的。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损害的》第三部。

于把它完全揭开了(巧得很,人们甚至也叫他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除此之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那里,还有他怎么也不能成功地表现的一种姑娘的理想:《穷人》中的瓦林卡·杜勃罗雪洛娃,在《斯吉邦契柯伏村》中的那斯金卡,《被侮辱与损害的》中的那塔莎——所有这些都是十分聪明、十分善良的姑娘,她们在见解上以及在说话的方式上都和作者相象,可是在实质上却是色彩苍白的。作者善于把她们安插在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环境中,可是这就是他给她们所做的一切了。说老实话,即使是瓦林卡·杜勃罗雪洛娃吧,她的不幸遭遇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为她所编写的那些故事所引起我们的兴味,也超过作为纯粹诗的创作来看的她自身所引起的。

✕ 这一种形象的贫乏和模糊,这一种不得不把自我作反复表现,这一种不善于细心创造每一种性格,甚至也不能让他得到外在表现的适当方法,——所有这些,一方面暴露了作者观察到的内容缺乏多样性,另一方面,也直率说明他的创作是违反艺术上的完整性和一贯性的……美学的爱好者呵,你们是不是以为,只要对这个小说作家的作品的艺术上的缺点和优点作了详细的——détaillé et raisonné^①——分析,就可以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或者对艺术有了贡献了?你们难道认为,眼前的文学尽管只有最小可能远远倾听公共利益的呼声,尽管只可以用不清楚而简短的喃喃语表达自己对这种利益的同情,——难道由于……嘿,简直 à propos de bottes^②,由于波吉兴君的新戏剧,冈察罗夫君的新特写^③,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新小说的出

① 法文:周详的、有根有据的。

② 法文:没头没脑;毫无来由。

③ 杜勃罗留波夫是指冈察罗夫的长篇小说《悬崖》的片段,这个片段曾在一八六〇年的《现代人》中以《苏菲亚·尼古拉耶夫娜·别洛伏陀娃》的题目发表过。

现，你们甚至就想拿最出色的美学探讨来引起什么人的关心吗？……这恐怕只有等到文学又一次坚决和社会割断任何（虽然，即使现在也是太弱的）联系，只限于一种自己个人的、家庭方面的利害，只有等到文学家不得不只写关于文学家、而且只为了文学家而写的时候，——那时，象梅尔兹里亚柯夫对《俄罗斯颂》^①的分析，或者鲍特金^②君论费特的出色文章这一类现象，大概，才会成功地、三翻四覆地出现吧。然而现在文学（即指艺术文学本身）虽然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艺术价值，至少还有实际的意义，那么就让批评本身添上一种实际的性质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大概不会因此埋怨我：我声言他的长篇小说是在所谓“美学的批评以下”的。要知道我这是指我们一般的现化文学而言，我所以通过一些对他的长篇小说的走马看花的意见来印证自己的想法，这是因为，我手边恰巧有这个小说。倘使选取晚近几年其他在我们这里获得成功的创作，那么其中有许多也许更要站不住脚。陀思妥耶夫斯基君，至少我们以为，照他的作品中的某几处看来，——并没有象别人似的，有这么自负，把自己看得这么重要。他在伊凡·彼得罗维奇的记事中，描写过他自己的某一些文学关系，我不以为说出这一点就是不谦虚，因为作者自己分明也不想掩饰。他在小说中这样详尽地述说算是伊凡·彼得罗维奇所写的中篇小说《穷人》的内容，——这里不会有什么错误。但是就在这里，他也承认，为了必需，他写得很多，他为了定期交稿而写，他两天两夜写了三张半印刷页；他把自己叫作是文学界的羸弱驿马；他嘲笑那些深信他的作品散

① 《俄罗斯颂》是黑拉斯柯夫写的长诗。

② 鲍特金(В. П. Боткин, 1811—1869)，自由主义倾向的批评家，著有《关于西班牙书简》等。

发着汗气、他把它们琢磨得太过分的批评家^①。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看待自己的作品，分明也象我们所有平常人一样，——并不是当作传之后世的永不隳毁的纪念碑，无非是看作一种杂志工作。大家都已经知道，这种杂志工作是怎么一回事：这里谈不到琢磨，谈不到详情细节，谈不到在思想发展上对自己的严格……只要马马虎虎把这种思想能够胡乱放到纸上去，这就够了。这可以同这种事相比：假定您是诗人，此刻在您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感情，有一种您可以用华丽的诗句描写出来的印象使您吃了一惊。在您的脑子里已经闪过了一些形象，想好了几句诗，想好了几种精确的表现……然而人家妨碍了您，要求您立刻说出您的印象，最后，您就完全失去一种沉醉在您的感情里、给这种感情找寻生动的声音的能力。没有办法，您只好拿起铅笔和记事本，用粗糙的散文勾划出了已经在您的头脑里组织好的优美诗句的骨架。为杂志写文章的人，在他整整一生中，就是常常这样做的。人当然还是可以看得出，——就是在诗的骨架中也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分析：诗人凭哪一种想象才能够把它描写出来；也许，其中也保存几张成功的篇页，好象在原稿上出现神来的诗句似的。然而一般说来这总是十分可怜的。不论它是匆促而成的作品，不论每一页都经过多少深刻思索的检验，只有一桩事情是不变的，——这就是这个人的见解的共通特性，他对生活的看法，他的同情和反感。由于作品中的匆忙草率，可能犯局部的错误，说得不清楚或者比较片面，落入琐碎的矛盾里，或者作了飞跃，失去严格逻辑结论的线索。然而假使有谁打算把他的作品中共通见解和同情的矛盾来辩护作品写得匆促草率，

① 从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就是这样批评的，要是没有弄错的话，就在《现代人》吧。②

② 德鲁日宁在《外埠读者致“现代人”编辑部信》（1849年）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这个评价。

这人就只不过证明，他对随便哪种见解都是无力领会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离开抽象的美学论断转而来观察某一作者所发挥的思想和原则的时候，我们就能找到理解他的才能实质的理由。这里，我们的要求的尺度已经改变了；作者也许没有给技术提供什么东西，也许在文学史之中自己并没有前进一步，但就其作品主要倾向和意义来说，对我们也还是卓越的。就使他不能满足艺术的要求，就使他又一次落了空，表现得不好；我们已经不再注意这一点了，只要他的作品有某一种意义对社会是重要的，我们还是准备长时间多多地谈到他。当然，也会有这样的作家，他们对什么东西都没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对什么都不能说出自己的话；这些先生的作品，——都是空洞无物、光润滑溜、大部分都很容易读的鄙陋见解，象平常报纸中的小品文，托尔宾君或者库古歇夫公爵的小说，或者格列柯夫君、阿普赫京君的诗等等^①。对他们，的确是无话可说的。还有另一种作家，在他们的头脑里反映着一种渺小的、早就见惯的、片面的或者是虚伪的思想，他们就为这些东西而忙碌憔悴；关于这些事情有时也可以谈一谈，这要看描写的成就如何。例如，象柯尔巴辛君^②有一种这样的想法，“男人个个是负心汉，真正的爱情他们是无法理解的”；他就根据所有欧洲民族的生活风习用这个题目写了五六种中篇小说。要是有谁觉得，柯尔巴辛君叙述得很出色，那么这个人也许也可以谈谈柯尔巴辛君了，——他会说，他的思想贯彻得

① 托尔宾(В. В. Толбин, 1821—1869), 俄国诗人与速写作者, «火花»讽刺杂志的同人。库古歇夫(Г. В. Кугушев, 1824—1871), 俄国小说家, 上流社会小说的作者。格列柯夫(Н. П. Греков, 1810—1866), 俄国诗人与翻译家。阿普赫京(А. Н. Апухтин, 1841—1893), 俄国诗人, 六十年代时曾经为急进的讽刺杂志写过稿, 后来却变成“纯艺术论”的拥护者。

② 柯尔巴辛(Е. Я. Колбасин, 1831—1885), 俄国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 文学史家。

多么好！在其他作家那里所见到的思想，虽然不怎样平庸、渺小，但却比较虚伪。举个例吧，照庇雪姆斯基君的世界观来说，就会得出：一个俄国人是不知道什么节制的，——要是他不是饥饿而死，那他就沉湎于酒；要是他不是怕老婆，那他就把她痛打，要是他看到自己随便哪里都不会挨到脚踢鞭笞，那他就象野兽一样，对一切人都要猛扑；倘不是收受贿赂，那就是为了一文钱的贿赂而硬把每个人都用镣铐铐起来。可就是关于这一点也得说明一下，这还得要一个人的确觉得，这些思想在庇雪姆斯基君的作品里是令人信服地说出来的。

然而还有另一批他们的兴味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式的作家。这些作家是这样的，他们的艺术感觉虽然甚至显得有点薄弱，方向却是正确的，他们不但忠实反映生活的现象，而且多少能够理解生活的共同的隐秘意义。只要他们的感受力是无所不包的，只要他们所揭露的生活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它的包括一切的完整过程，只要他们关怀的不只是现象的一个外表方面，而且还关心它的内在联系与一贯性，这样的作家就能成为出色的艺术家。那时候，他们就会创造出一种能够在文学界持久流传下去的作品，成为社会自觉的推动者了。然而即使那些感受力比较受局限感觉比较薄弱但却忠实的人们，只要能够把这个生活中的一个特征解释清楚，或者仅仅是指给我们看，他们就不会毫无影踪地消逝，就会获得人们的注意，——因为这个生活就呈现在我们大家的眼里，和一切人都有关系，但是它只是促使少数人作严肃的思索，为少数人所能理解。

二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作品中，我们找到一个共同特征，这

个特征在他所写的一切作品中多少总可以发现：这就是他为了这种人而哀痛：他们承认自己没有力量，或者最后，竟至于承认自己没有权利做一个真正完美而独立的人，名符其实的人。“每一个人应当是一个人，对别人，都应当以人对人的态度相待”，——这就是一种在作者心灵中形成的理想，它不理睬任何因袭的和局部的看法，看来，甚至也不理会作者本身的意志和自觉，它是一种 *priori*^①，这是他本身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当他踏进生活，环顾自己四周的时候，他却看见，人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而作的探索，还是依然如故，从来没有获得成功，在探索者中间，谁要不是很早就死于痼疾，或者死于其他令人困累的疾病，那么他的结果也无非落到残酷、孤独、疯癫里，或者落到彻头彻尾的昏沉痴呆里，窒息自己身上的人的本性，或者真正认为自己的确有一种比人低下的东西。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好象一诞生就抱着后面这种认识，关于本身人的价值的想法，好象有生以来从来就不曾产生过。这的确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在这种人身上，的确没有和其余的人相一致的东西……在人类关系中的这种蜕变，这种反常，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它是如何发生的？这一类现象的主要特征究竟是什么？它们会引出一些什么结果来？这些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作品自然而然、一定要使读者想到的问题。虽然，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把他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解决；然而要是他果真把它们解决了，那当然，他也就不会把它们写中篇小说了。一种文学作品，只有当它所概括的事实的主要基础和彻底解决还成为问题，对它的推测还为作者自己所注意的时候，那时候它才能够是真诚的，而不是奉命而写的。然而在力量强大的天才的笔下，他的创造活动本身是这样贯串着生活真

① 法文：先入之物。

实的全部深刻性，以致有时候只消表现艺术家所发现的事实和关系，它们的解决就会自然流露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才禀的力量，还不曾达到这个境界，他的故事还需要补充和注释。但是虽然如此，他的问题既然提了出来，每一个读者，在读了他的中篇小说之后，他自己已经没有法子摆脱这个问题了。每部中篇小说的调子都是阴沉，凄凉，病态的，因此，在你的心里就会迸发出一种使你恼火的问题，在你的身上就会掀起一种神经质的疼痛……这一类印象使得许多人都觉得很愉快；有一个批评家就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中篇小说阴郁的色调而直率地责备他^①；不知道为什么，批评家觉得俄国文学需要愉快、华丽、玫瑰色的故事。他的愿望立刻得到实现：在他批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在一八四九年初）之后，俄国文学真的沉溺在上流社会生活的故事里了，这些上流社会的生活故事都是从那搬移到了科斯特罗姆省^②的世外桃源的生活风习中，从世世代代、一切民族都未能免俗的夫妇诟谇的氛围中，从那些十分频繁地、模糊地议论着崇高的题目的有教养的青年人的聚会中汲取出来的……许多权威的名字（现在——呜呼！——都已经失去他们的魅力了！）都在这个不算长的空隙中创造出来，一直到新型的文学——暴露文学再次获得普遍的注意为止。这一类文学的消逝，要比施企格罗夫的汉姆雷特^③、痴呆的乡村牧童以及莫斯科近郊的伯爵夫人这一类还要快，——它的消逝不是因为它的代表人物缺乏有才能的人，而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走上虚伪的道路。有一种

① 安宁柯夫曾在《现代人》（一八四九年第一期）撰文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的阴暗色调。——原本编注

② 科斯特罗姆省是现在苏联欧洲部分的中心，伏尔加河流过它的南方，河流很多。

③ 《施企格罗夫的汉姆雷特》，是屠格涅夫写的小说。

人是由于外在的要求，必须如此，而另一种人，却是幼稚、天真的结果，——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又偏狭又片面；在官吏的身上就只看见官吏；在为了市长受贿而招来的不幸中，只看见这是他受贿的结果；把每一个警察局长都描写作他是现存秩序的终极目标与最初出发点。“俄国能不能繁荣昌隆”——这决定于那个正直的官员福罗洛夫是否愿意担任职务；在我们这里，在亚历山大剧场上演时也还获得过一些成功的整个喜剧，就是建立在这个思想上的^①。看来，除了谢德林君以外，没有一个人想过窥探这些官吏——恶棍和贪污受贿犯——的灵魂，去观察他们的生活所通过的那些关系。在接触这些谈到他们的丰功伟绩的小说时，没有一个人会抱着这样单纯的思想：“可怜的人！为什么你要偷盗呢？你不是生来就是一个小偷，就是一个强盗的呀，岂不知这些所谓‘荨麻籽’的家伙，事实上，也并非是从特别的种族中产生出来的？”只有在谢德林君的作品中，我们才能到处找到这一类质询，因此，到现在为止，不但在暴露文学方面，他高出于他的一切敌手之上，而且一般说来，还超过我们许多依靠一些要求广泛理解生活的小说吸引过公众注意的文学家。然而不能不看出，就在谢德林君那里的“暴露”也是十分紧张的。在他的《外省散记》中没有一篇不使我们对贫穷的人不感到一种兴奋到发痛的、充满生气的同情——其程度正象他十二年前发表《乱七八糟的事情》时使人感到的样子^②。显然，在当时是另外一种年月，另外一种力量，另外一种理想。当时有过充满生气的、现实的倾向，真正的人道的倾向，这种倾向还没有为五花八门的法律上的和经济上的箴言所削弱和打乱。那时候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为什么人要

① 这是指索洛古勃的喜剧《官吏》。

② 谢德林这篇小说发表在一八四八年《祖国纪事》上。这篇小说就是他后来被放逐到维亚特卡的原因。——原本编注

作恶或者偷盗，是和对待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受苦并且老是害怕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们在开始对类似问题作病理学的探索时，是怀着爱和疼痛的〔，因此，这个倾向要是还能贯彻下去，那么毫无疑问，它就会比一切随之而来的倾向更坚实了〕。今天我们这里的解决是简单的：假使人们偷盗了，这就是说，警察的工作干得很糟；假使收受了贿赂，那就是说，长官是个脓包……等等。但在这时又有另一回事情发生了：一个人偷盗是为了找不到工作，饿得快要死了；受贿是为了他要赡养全家十五个人……在道德方面的结果是极为分歧的：一种结果是唤醒你的人类的感情和坚毅的思想，另一种促使你到警察局出首，强使事情窒息在法律的形式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在他的第一个作品中，就是我主要是指人道主义倾向而言的那种倾向的杰出活动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穷人》，是受了果戈理的优秀方面以及别林斯基的最富于生命的思想的清醒的影响而写成的，他抱着一个年轻天才的全部毅力和朝气着手分析我们的贫困的现实生活中使他吃惊的反常，并且还能够通过这个分析表示他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这种理想不是他所专有，也并不是由他灌输到俄国文学中来的。作为箴言而提出的所谓“最受轻视的人，还有甚至犯罪的人也都是我们的兄弟”之类——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由于卢骚的思想和著作在上世纪末在我们中间的传播，还在当时就已经在我们文学中出现了。然而这种舶来的箴言在当时是和俄国生活极不调和的，很少有人能够对它们作严肃而深刻的领会。杰尔查文老是歌颂一般人们的渺小，少数特殊显贵的伟大；关于人的权利是想得这样少，只要——

允许他知道而且思索！……①

他就要感激涕零到发狂了。

至于卡拉姆静当然更不消说：要看看他对人的共同权利和利益的认识相背到什么程度，翻翻他的《俄国旅人书简》就够了，尤其是从法国写来的^②。至于普希金在有些地方固然可以看出他对人的本性、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尊敬，可是连这大部分也带有享乐主义的意味。一般说，他是太不严肃了，或者用美学家的话来说，他在研究生活中的什么反常时是太会调和了。他在一切中间只看见美，只描绘诗的一面：豪华宴会的美妙，出发去厮杀的纵队的整齐有序，雪崩的雄伟，一种从什么“圣灵的高峰”流到他身上的“言语圣油的香气馥郁”等等、等等。只有果戈理，就是他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把人道主义的因素灌输到我们的文学中来：他在《旧式的地主》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可是，显而易见，当时果戈理自己还没有充分估计它的重要性。至少，《钦差大臣》在这方面的提炼总是十分差的，因此就给某些人有了口实把整个喜剧叫作滑稽戏，把所有人物都叫作漫画。可是越是往后，果戈理作品里所表现的他的才能的人道主义一面也越是强烈，甚至违反他自己的意志，而在期待光明而纯洁的理想中，他也总是用“贫穷复贫穷，我们的生活并不美满”^③这种坚毅有力的话来描写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君通过各种形态和场合，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对自己如何缺乏尊敬以及其他人们对这个人也如何缺乏尊敬。当你读到这些中篇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事情似乎很简单：一个人既然生了下来，那就应当生活，那就应当有生存的权利；

① 这个诗句是杰尔查文的《费里察》中的，文字略有变动。

② 这些《书简》是针对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而发的。

③ 引自果戈理《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

而这种自然的权利同时就应当获得能够支持它的自然条件，即，生活的资料。但由于这种对资料的要求是普遍的要求，因此，满足这种要求对一切人都应当一视同仁，不应该分出轩輊，说，这些人有权，那些人没有权。在这种场合，要是否定什么人的权利，那就是否定生活权利的本身。既然这样，那么在自然条件的范围内每个人绝对应该成为一个完全而独立的人，当他参加社会关系中的复杂的联合时，他就把自己个人完全投身进去，从事适当的劳动，即使最渺小的也行，无论如何，他可以不再偷窃了，可以不再毁弃、不再压抑他的人的直接权利和要求了。看来，这很明白。可是，为什么这个马加尔·亚历克山耶维奇·杰乌希金要“躲躲闪闪，偷偷摸摸，战栗发抖”，不断地为自己的生命而感到羞耻，“用惊惶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的周围，倾听着每一句话”，他所找到的唯一的安慰就是他是一个小人物，一个渺不足道的人呢？为什么高尔希柯夫^①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虚弱的人：他的脚膝会发抖，手会发抖，头会发抖，胆怯畏缩，对一切都害怕，挨着旁边走路”呢？为什么这个普克罗夫斯基^②的父亲会有这副模样，“好象他总在为着什么事而感到羞辱，好象他就为了自己而羞愧”，在和儿子谈话时——“他总稍稍地离开椅子站起身，悄悄地、卑躬屈膝地、几乎带着虔敬的神情回答”呢？为什么高略达金先生在“他要取得自己的权利”和“他要走自己的道路”这种困苦而无结果的尝试中——会退缩到他的真正权利的最后一些让步，最后他的衰弱的头脑终于无法再忍受这种思想——大家都在偷偷损害他的权利、扰乱他的理性呢？为什么普罗赫尔钦^③先生二十年来总是吝惜金钱，过着穷困的生活，老

①② 高尔希柯夫和普克罗夫斯基都是《穷人》中的人物。

③ 普罗赫尔钦是同名小说《普罗赫尔钦先生》中的人物。

是挂念着没有保障，最后也终于为了这种思虑而害病死去呢？为什么这个青年官员苏姆柯夫^①自命自己是个人类的怪物，却在这件事上弄昏了头，为了他用柔情诱惑了一个未婚姑娘，为了他没有如期抄好大人交给他的其实根本并没有什么期限的文件，据说人家要送他去当兵了？为什么这个小涅托契加在卡佳的面前要这样局促不安？为什么罗斯塔尧夫^②要在福玛·福米奇面前排斥自己的意志，认为自己根本配不上他所热烈地爱着的、他的家庭教师那思金卡的爱情？为什么在轻佻的阿列莎之前，娜塔莎会丧失她的意志和理性，伊凡·彼得罗维奇要恭敬地让在一旁？为什么伊赫美涅夫老人忍受着父爱的各种各样的苦恼，不愿意宽恕他的女儿，免得人家看见他向公爵和公爵的儿子作了让步？为什么小涅丽这样粗暴地对待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厚情，却走去要饭行乞，好积钱给他去买被她打碎的杯子？这一切粗野的、奇怪到令人吃惊的人间关系，其原因何在呢？在应当遵照自然而合理的律令以及在实际上所表现的之间这个令人不解的分歧的根源又是何在呢？

我们已经说过，个别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并没有提出一个人物，一种小说直接回答过这些询问。为了找出回答，我们应当把它们汇集起来，逐一去说明。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作品里所看到的那些人类尊严受到侮辱的人中，有两种主要典型：温柔的和冷酷无情的。第一种人已经不再进行任何抗议，他们在环境的重压下避让开去，开始认真地要自己相信，他们是零，他们一无所有，要是和一个大人和他谈话了，他们应当看作是自己的幸运，受了恩宠。另一种人却

① 苏姆柯夫是《脆弱的心》中的人物。

② 罗斯塔尧夫是《斯吉邦契柯伏村》中的人物。

相反：他们看到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合法要求、那种他们引为神圣的、带着它一起走进世界的东西——遭受人们的蹂躏和否认，他们就打算和周围一切断绝关系，对一切都表示合不来，只求满足自己，对人世上的任何人都没有要求，他既不为人效劳、发挥兄弟爱的感情，对凡事也并不怀着善良的看法。十分明白，由于他们性格上不能坚持到底，因此他们对自己永远感到不满，咒骂自己，咒骂别人，打算自杀等等。

在这两种极端之中，还站着一种人，也许把他们归入第一种典型更妥当：这是一种对自身的人的权利已经丧失广泛自觉的人们，然而他们却狭隘地虚构一种因袭的权利来代替它，坚信这种虚构，小心地把这种虚构保护起来。不论什么场合，这一类先生都在设想，他们的个人尊严正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准备反复说，例如：“我是九等文官”，“华西里·彼得罗维奇亲自把手伸给我”，“校官波赫列斯柯夫知道我”等等。这也是一种胆怯、多心、拘谨、最容易动气、而由于他的动气就显得比一切人都不幸的人们。

谁要是观察了我们社会中那些所谓“小人物”，他就会知道：温和而顺从的人们有时候也是容易动火而且是一丝不苟的。这决定于这样的关系：一个副科长在科长之前，——没关系，他是完全服从的；可是和其他副科长相比，他又认为他有“自己的权利”，从而嫉妒而阴沉地坚持这个权利了。关于这后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在《两重人格》中就有所发挥，所可惜的是，其中有许多美妙之处，却由于普遍的拖沓以及故事中失败的幻想而湮没了。可是现在我们还是来分析第一个特征——彻底的顺从，以及对自己所遭遇的环境的木然的安心。

看来，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一个人只要相信，他是愚蠢的，或者是乱七八糟的，或者是缺乏仪表的，——那，这就够了，就到此为止吧……这里有什么值得拖拖拉拉的！而尤其使

他觉得安心的是：他知道瞎子什么都看不见……只好坐着听别人讲。描写瞎子如何看不见——这有什么意思呢？……

然而艺术家的功绩也就在这里：他发现，瞎子并不完全是盲目的；他在愚笨的人身上发现一种最明白的健全思想的闪光；他在逆来顺受、失魂落魄、缺乏性格的人身上，发现人的本性中一种蓬勃的、永远不会被窒息的愿望和追求，把它们指给我们看，剖剝出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个人对外部强制压力的反抗，让它引起我们的裁判和同情。果戈理曾经在一些小说中为我们作过这种发现；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穷人》以及其他一部分小说中也可以找到，只不过它们多少披着奇妙的形式。

例如那个官员杰乌希金，他独自过活，一直活到白发苍苍，他不声不响、谦卑地在一处连续做了不下三十年的事情，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求。“为什么你写信给我，”他向瓦林卡解释，“提到舒服，提到安静，还提到各式各样的事情呢？我的小亲亲，我不是一个爱抱怨，好挑剔的人，从来没有比现在过得再好的了，为什么到了垂老之年倒要吹毛求疵呢？我吃得饱，穿得暖，有鞋着，我们还要往哪里动脑筋呀！我可不是伯爵的子弟！……父母亲不是贵族出身的，我的全家收入，比我还少。——我不是娇生惯养的人！”的确，他不是娇生惯养的人：他租的房子是厨房中用板隔开的小间，房钱每月只要付两个卢布，并且以此自慰：他能够“避开大家独住一间，平平常常过日子，安安分分过日子！”他说，“我吃得饱，”——他的饭食每月付五个卢布，请想象一下，可以饱到什么程度。他的着鞋和穿衣，——也是相差无几的，可是他总是反复地说：“我不发牢骚，我很满足，薪水正好够用，好几年来都是够用的。”说到他的智力状况，他也承认：他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为了家贫没有怎样受教育，他的文体也不高雅，也无法懂得高超的话题，因此就总是爬不上去。他善于和他的社会

地位妥协。他达到了这样一种令人安慰、颇有道理的结论：“一切地位都决定于支配人类命运的上帝。这一个注定佩戴将军的肩章，那一个做九等文官，这一个发号施令，那一个奉命唯谨。这完全是按照各人的才能而安排好的；这一个擅长这种才能，另一个有另一种，而才能都是由上帝自己安排好的。”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既然深信这种颇有教益的思想，因此在他的内心，在他的理性中，就完全失去任何一种支柱了，他认为可以衡量自身的价值的最高而唯一的尺度，已经不是自己的认识，而是长官的意见和形式上的关系。他这样描写自身的价值：“我已经当了将近三十年的差事，我的工作是无法非议的，行为是稳重的，从来没有给人发现过不规矩。作为一个公民，我认为自己颇有自知之明，虽然有缺点，但同时也有好处。我得到长官的敬重，大人自己也非常满意（自知之明到哪里去了！）；虽然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向我表示特别关怀的意思，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满意的。”接着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又证明：他的自知之明是多么强烈：他说，“我从来没有被人发现有重大的过错，或者蛮不讲礼，以致触犯了什么法令，或者破坏了公共安宁，——这方面我从来没有暴露过，这是从来没有的，甚至还得到一个奖牌哩”……可见，奖牌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就是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的哲学基础，他的最崇高和最后的一个论据。他并没有失去自尊心，可是这种自尊心的满足，也是十分轻易的：例如，据他说，有一次他不小心，曾经喝醉了酒，大叫大闹了起来，事后他为了安慰瓦林卡，写信给她：“您不要为我担心不安；我要赶快向您说明，我特别看重我的自尊心，我得告诉您，我的上司没有一个人知道一点什么，而且将来也不会知道的，因此将来大家还是会照旧尊敬我的。”一般说，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甚至靴子和外套，都不是为自己而穿的，而是为了别人，特别是大

人；就是喝茶多半也是为了别人，一切都是为了自尊心而做给别人看的。“即使在冻得彻骨的严寒天气，没有外套，不穿靴子走路，在我也是无所谓的一——我会忍受，我会忍受一切，我是没关系的；我是一个朴实、渺小的人。”然而“需要靴子是为了保护名誉和体面；穿了有洞的靴子就会丧尽名誉和体面。”究竟如何丧失掉呢？是这样的，“我的大人突然发现了，无意中记了我这一笔帐——这就糟啦！……”除了这种在马加爾·亚历克山伊奇的头脑里提炼出来的道德戒律和生活真谛之外，还可以补充在他的心里所留下的一种令人感动而触目的印象：一粒扣子当着将军的面，从他的身上飞下来，将军就给了他一百卢布，并且握了他的手。这个景象的确是动人的，曾经时常被人引用，因此，当然是读者所能记忆的。你看马加爾·亚历克山伊奇自己对这景象是怎样想法的：“我向您起誓，”他写信给瓦林卡说，“在我们挨穷受苦的这种艰难时日里，看到您，看到您的穷困，看到自己，看到我的卑贱，我的无能，不论我的灵魂怎样发痛得要死，不论这一切如何，我要向您起誓，我对一百卢布的珍重，还不如大人亲自答应我，让我这根稻草，这个酒鬼可以伸出我的完全不配的手去握一握！他这样做使我恢复了神智。他用这种行为使我恢复了勇气，他使我的生活永远变得甜蜜起来，我坚决相信，在上苍面前，不论我犯下什么罪，然而为我的大人祈祷幸福和愉快，还是能够上达他的宝座的！”在这种至性的流露中，你可以看出马加爾·亚历克山伊奇的善良、敏感、高贵，如果你再要——甚至还有细致的温柔；可是你会同意，你会可怜他给自己所设想的那种屈辱，只有怜悯的力量才能把你心里的那种厌恶感情驱逐出去，否则，这种感情就会在你的心里不由自主地激起对人类本性的歪曲了……〔乌里斯^①的那头受尽欺侮、精瘦的狗，吠叫着

^① 乌里斯，即奥特赛，荷马史诗《奥特赛》中的主人公。

亲切地迎接它的主人，和这个官员对他的仁慈的上司相比起来，它和主人之间实在更接近，更平等。〕完全缺乏对本身价值的任何认识，完全承认自己的卑微低贱，把自己排除于不论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不论他的恩人实在都属于其中的人类之外，——这就是你在他的感恩戴德里可以看到的。但同时他却很幸福，为了自己能够忍辱受屈而感到幸福，他在感动之中，祷告上帝宽恕他的“抱怨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些是“在先前悲苦的时候……”放纵出来的。

请看，这就是为了使事情顺利进行在共同组织中所需要的一个榜样。比这更好似乎没有了。一个已经在其中锻炼出这一类典型来的社会，从〔国家〕论的意义上说来，似乎可以把它称之为示范的、彻底的、无可非议的社会。〔这里所建立和支持的不单是一种宗教等级制度……这还不完全：可以凭势力建立和支持的东西岂在少数，——教会统治到现在为止还在罗马坚持下去哩……然而这里不是这回事：这里所建立的宗教等级制度甚至是不需要人家来支持的：它的利益和必要，一切人都是这样明白，它是这样得到每个人内心上的拥护，甚至它所带来的最小恩惠，〕大家在它的面前，都同样认识到自己是幸福和满足的。不可能大家都是富翁，大家都是有才能的人，大家都是美丽的人；不可能大家都做长官，大家都位居要冲；然而国家的真正理想，就在于：每个人都满足自己的地位，每个人都认识自己的地位是合法的、绝对公正的，象其他许多人高兴发号施令一样，他也应该本着同样的高兴去服从，象其他人对待两万卢布进款一样，他也应该对他的几十卢布的薪水感到同样的安心和幸福。到这时候，黄金时代的理想就能实现了；那时候，即使还有谁要从其他人那里忍受不愉快，这既不会打乱事情的共同进程，也不会妨碍他个人的幸福，因为在这些不愉快中，他会看出这是合法而有

益的事情，会对这些不愉快表示和解，正象对待岁月的变换似的。理想的宗教阶级制度中每个成员都会象，例如吧，正象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为了一个喜欢嘲讽的人鲁莽无礼地批评讥讽了长官^①，他就这样议论对长官的申斥道，“假使有必要把我们同事斥骂一顿，为什么不斥骂？譬方举个例：为了维持威严而骂人，——嗨，那就为了维持威严而骂人吧；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一定要警戒他一下……而且官位各有不同，每一个官员就需要一种和他的官位完全配得上的申斥口气，这样一来，申斥的调子就当然各不相同了，这是自然的道理！要知道世界也就立脚在这里：我们大家既然可以彼此对别人发号施令，那么我们每个人自然也可以彼此去斥责别人了。没有这种预防，世界就不能立脚，秩序也会荡然无存了。”

请你想象一下这种理想的国家——它的组织机构就建立在这一类哲学的基础上，国家中全体成员都深刻而真诚地，全心全意地浸透着这种哲学：这个国家是多么幸福！有一种什么样的永恒而无法破坏的安宁、什么样的连绵不断的静穆、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温和在其中主宰！没有一个人会去强求没有给他的东西，没有一个人会从给他安排好的位置上离开，没有一个人敢去谈论地位比他高的人。想发财致富的念头同一个穷人之间的距离，是同想从针孔中钻出去的愿望同样渺茫的；一个科长要是不想去批评黑夜继白天而来，他也就不会去批评他的秘书的布置，或者相反；甚至一个被安置在抄写文件的小人物出身的年轻小子，只要现在的头脑里没有去幻想，例如，让自己变成一条栖息在埃及的鳄鱼，或者变成一头曾在北方冰天雪地中被发现过

① 这里所谓“嘲讽者”即指果戈理。马加尔·杰乌希金在七月八日写给瓦林卡的信中，提到了果戈理的《外套》，所以这样说。

的太古时代的剑齿象，他也就不会去幻想什么功勋，什么光荣之类了。到处都会洋溢着美满的平静，没有任何激动，任何不安。〔大家都会安于自己的地位。一种人出入坐四轮马车，住华丽的邸宅，对别人进行申斥，另一种人穿着破靴，徒步在泥淖里跋涉，住在灰暗的角落里，挨受申斥，——可是这两种人彼此都很安心，都满意自己的命运。他们两种人都可以在一道生存，彼此互相依靠，正象橡树和荨麻一起生存一样安静似的，那个林内^①虽然按照他的体系，也把橡树和荨麻归入一个门类，可是却没有想到彼此之间有这种诱人的平等。〕在这样的情形下，就不会出现卑鄙的艳羡，难以容忍的愿望，各种各样的恐惧和破坏行为；人们好象天堂上的神仙一样生活着；在天堂中会有许多居民，会有种种不同等第的幸福，可是低等的会对高等的表示亲切的同情，自己也享受着那种赏赐给特选人物受用的崇高幸福的余泽。在大地上那个理想国家，实在也应该如此，其中一切成员也应该浸透我们刚才引用过的关于社会阶级制度的那些纯洁的见解……而比一切都重要的——就是这一类组织结构，可以世世代代延长下去，因为它的本身并不包括什么破坏的因素，——没有什么东西在预示即使只在遥远的未来才破坏公共的安宁和幸福。这种以关于社会等级制度的健全见解为根据的理想社会，是可以世世代代安宁地、和平地、幸福地生存下去，只有一种地理上的变革才可能破坏它的理想的完美……

然而，最使人类的友人遗憾的是：仙丹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在大地上还没有彻底的完美，我们所设想的这种理想社会，什么地方都不存在……据说，在我们和读者大家已经记不起来的

① 林内(Karl von Linnè, 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家。他按照种类和形态，拟订过动植物的分类。

久远的时代，在印度曾经建立过类似的社会，但就连这也依仗婆罗吸摩本人的助力。贱民和婆罗门的距离也是很遥远的，他们之间的鸿沟，据说，也象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和大人之间的鸿沟一样难以逾越。据印度人说，在那个世界里，在那给了死者各种各样幸福的七大界里，最高的境界就是：在那里人完全失去他的个性、意志、自觉，投身在婆罗吸摩的怀抱里，在他的怀抱中消失无踪。这是一种只有印度学者才能想象的最高幸福的极峰。看来，——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拥有这一类原则的社会它是不应该毁灭的，而是应该经常扩大它的幸福的成员的范围……然而——这是人类本性的缺点！——不论印度的学说，不论这种结构都被破坏了，倘使现在还有残留，那也只有一种离开原始模范的完美很遥远的可怜的模仿和改作。〔在巴拉圭共和国中〕那些耶稣教徒的神父们曾经建立过这一类东西；然而〔就在那里〕成就也是很不完美的。〔至于其他一些想达到这种理想的衰疲无力的尝试，例如，在那不勒斯、在奥地利以及其他国家所进行的，是更不值得挂齿了。〕理论却是得到重视的，它在各种学术机关中得到研究，在学校里讲授，在教堂里有各种教团的僧侣布道说教，甚至渗透到家庭教育里去，这样一来，就能够在一个人的最温柔、最富于感受力的年岁，就把他抓住不放了：可是——这什么都没有用！大部分人接受了理论，说不出什么话来反对它；然而却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在这种理论上安心下来。某一种绝望不断扰乱着人们，终于因为一种空洞的偶然性，一种不足称道的冲突——大家都波动起来了，这连续不断的静穆的理想，就化成尘埃飞上天空去了……道德家们断言，这一切都由人类的堕落而起，都因智慧被掩蔽壅塞所致；相反，另一种人却叫道，这种仿佛是主张理想组织的理论，目的在于取消人的个性，它是和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相敌对的，因此应当作为无用的东西而被排斥，而把

位置让给另一种承认个性的一切权利、承认无止境地发展、无止境地前进这一原则的理论,即是说,让步给和停滞相对立的进步。

我们,就是说俄国人,尤其是文学家,平常都让自己站在西欧所发生的一切争论之旁。我们在这个时候,正在研究自己的问题:关于古代罗斯的贸易,关于谢尔宾纳君的才能,关于伊亚柯夫—穆尼赫^①,关于斯拉夫人的兽面神;称颂马里奥^②的歌曲和伊凡·亚历克山大罗维奇·车尔诺克尼日尼柯夫^③的书信,惋惜茹柯夫斯基、果戈理和札果斯金几乎在同一时候去世,对那打算反对我们的英国人的圈套表示惊讶……〔总之——我们,象往常一样,干自己的事情,希望不要碰到我们,不要受到妨碍:“简简单单、默默地过日子,对谁都不要触动——努力安分守己。”〕虽然,在那并不十分久远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什么人嚷过:“进步!”但接着他就躲起来了,——于是歌颂进步,咒骂停滞从此就一去不返。这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的——你解释解释吧!有人说,这是因为,进步是人所必需的,要强使他不追求进步,还是把他宰了的好……我不知道,可能,这的确是如此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所选取的为艺术家的力量所再现的人物,是否会回答我们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艺术家总是不偏不倚的:他并不去触犯争吵与理论,他只观察生活的事实,尽他可能把它们描写出来,——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为谁在服务,凑合了哪一种观念^④。一个卓越不凡的艺术家,在社会的意义上所以重要,

① 伊亚柯夫—穆尼赫 (Иаков-Мунх), 十一世纪时俄国的编年史作者。著有《佛拉奇米尔公赞纪》。

② 马里奥是意大利的歌唱家。

③ 车尔诺克尼日尼柯夫, 这是俄国自由主义的批评家和小说家А·В·德鲁日宁的笔名。

④ 杜勃罗留波夫在这里是挖苦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文章里就写过同样的话。

就在于此：在生活中到什么时候你可能也会搜集到这些事实，但就是这些事实可能也是苍白的，断断续续的，动机不清楚，原因也是混缠的；而这里虽然还只表现一二种现象，但也许在这之后，对一连串这一类现象，已经不再有什么怀疑了。

应该说，艺术力量的某一部分是经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而在他的第一种作品^①中，甚至表现得十分显著。生活的真实没有在他笔下溜过去，他在人的冠冕堂皇的精神状态，在人的外表的、合法的方面以及在组成他的内在本质、隐藏在他的天性深处、只有偶然当他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才会闪现到表面上来的东西之间，精确而清楚地划下了界线。从作者通过他的小说所传达给我们看到的观察中可以看出，事实上，能够全心全意地热爱着这种允许给人们许多和平与满足的理想组织的人，连一个也没有。甚至受它豢养最多的人，连这些人也在不断地漏出话来，也在回避。就拿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自己来说吧：你也许以为，他对于这一点：“每个人都注定有他自己的地位，地位是按才能而分配的”等等真的很安心吗？完全不是；这是当他置身在安静的地位里的反应，因此他就这样说了。可是只要有什么东西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就完全改变了，“自由主义思想”就自动钻到他的脑子里去了。他那时候就会问：“为什么老是碰到这样的事情呢，好心的人在废墟上受苦，幸福却自动向别的人迎上去？……我知道，我知道，亲爱的（他在对瓦林卡说时，急急补充道），——这种想法不好，这是狂妄的念头；可是说老实话，说真正实在的话，——命运这个乌鸦，为什么对这一种人、当他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对他呀呀的啼叫好运气，而让另一种人在教养院里开始生活？一个傻瓜伊凡常常鸿运高照，这是时

① 即《穷人》。

常发生的。‘你，’他说，‘傻瓜伊凡，可以安顿在祖宗的钱袋里，吃、喝、玩乐，至于你这个家伙，只能舐舐嘴唇；你，’他说，‘只配这样子，兄弟，你就是这样料子！这是罪过，小亲亲（胆小心寒的马加爾·亞歷克山伊奇又急急忙忙作退一步言），这样想法是罪过的，可是不知不觉，一种罪过就爬到你的心里去了。’”你会体会到，马加爾·亞歷克山伊奇已经不只是限于怀疑，甚至发展到了愤懑，而且还要去刺痛比他更体面的人了：“为了他是一个穿着燕尾服的花花公子，为了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朝您看，这无耻的家伙，——他就能够为所欲为了，您就只好忍住气去倾听他那套淫秽的谈话！够了，是不是这样呢，亲爱的？”——不管你怎么想，这几乎就是从一個贫穷的官吏方面发出的挑战：显而易见，他的心灵还没有完全疲倦，他还没有完全在这一点上安分下来：“假使我们不是互相发号施令，这就不会有世界，秩序也会荡然无存了。”不，他现在也要发出由衷而来的哭泣声，并且认识自己有权号叫、有权抱怨。他说：“穷人大声怨诉自己的不幸的命运，那有钱的人还要不高兴呢——他们说，这些人弄得人心绪不安，他们可厌之至。真的，贫穷总是令人讨厌的；他们的饥饿的呻吟难道不会妨碍人们睡觉吗？”一颗充满悲哀的心暗示给他这样的念头，触发了这样的本能暴露出来——在平常的场合，对这些东西，他自己都会觉得可怕，都会加以排斥，可是现在它们却自动地、以其全部的力量不可阻挡地表现出来了。“现在，这样的忧郁已经找到了我，”愤激的杰乌希金写，“我怜惜我的思想一直到灵魂的深处，虽然我自己也知道，亲爱的人，这种怜惜是无济于事的，可是多少总要对自己公平相待。我的亲爱的人，一个人的确会无缘无故自轻自贱，把自己看得一文钱不值，把自己看得比什么木屑还不如。要是用比喻来说明，那么这也许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发生的：我自己受了惊吓，受了逼迫，至少好象这个向我要求

布施的穷迫无依的男孩子一样。”这是一种深入人心，凭着人的天赋本能之助，在人的心里以飞快速度和力量发展着的思想，——这种思想会毁灭我们上面如此眉飞色舞地描写的理想社会制度中那种笼罩万有的静穆和安宁。不能说这里作者是在杜撰、是在毁谤人类的本性。也许可以指出，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就他的教养和地位来说，他实在是生活的表面基础和生活的真实要求之间的矛盾的一个过分目光锐利的评价人；但这是因为，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在半年之间，差不多每天都在写信给瓦林卡，就使他的文体得到了琢磨；而从另一方面看，作者为什么不能多少帮他一点忙呢？然而这种帮助唯一关连到的是思想的文辞的表现；至于思想本身，这纯粹还是属于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所有的，——每个人只要在他的境地中经历过一次，即使时间不长，也都会这样说。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在给瓦林卡的信里把他的沉重的疑虑扼要讲了出来；其他的人们除了通过自己的行为，各种奇怪的举动以及它们的悲惨的结果以外，就无法把它们叙述出来了。譬如，假使你有耐心，就看看喋喋不休的高略达金先生吧，——你会看到，他所以苦恼，他所以神经错乱，也是完全为了这同样的共同原因，——由于他的人性的可怜的残余和他的处境中表面的要求之间一种失败的冲突的结果。高略达金不象杰乌希金这样穷，这样受人欺压；他甚至能够让自己享受一点安乐；甚至在他自己的圈子里，接见一些人，按照官阶来说，他有权把他们看得比自己还低，因为在部里，他是一个副科长。由于这样，他就得到人家对他的某些相对的尊敬，他对“本身权利”也有一种蒙眬的见解。可是就在这里他弄糊涂了。他碰到了一件事情，在这种事情中需要表现的，完全不是这官员的权力，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他爱上了一个姑娘。由于他是一个平庸的追求者，他被人家抛弃了，因此，他的一切见解就完全兜底

翻过来了。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找到机会来满足他心中的仁慈，他变成所爱的人的一个有用处的人，因此，人道主义的自觉，对人的真正价值的理解，就能够在他的心里越来越频繁地、越来越明朗地发挥出来。相反，耶柯夫·彼得罗维奇·高略达金却从他的所爱者的亲戚以及他的竞争敌手方面遭到一些羞辱，因此，他的人的感情就受到了委屈，可是却又不能好好认识这一点，而直接诉诸于他的职权。“这是我的私人生活，这和我公务上关系不相干，”——当他被拒绝参加爱人父母家里的宴会时，他只能这样说。这样一来，他的思想就给完全扰乱了；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他只觉得一件事，——这里有一点异样，有点不对头。他要想和大家——敌人和不友好的人解释，——总是不成功，因为他不够坚强……于是他得到了一种 *idée fixe*①，一种他所特别热中的想法：只有使用奸诈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只有那种使用诡计、玩弄手段、欺压别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幸福……因此在他的心里终于下了决心——也要玩弄诡计，也要暗底破坏，也要进行阴谋……然而他到什么地方去进行这些勾当呢？他以前不是这样生活的，不是这样锻炼出来的，他的性格不是这样的……“你的性格是这样的；你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他自己对自己这样计议，“不，我们最好还是忍耐吧，耶柯夫·彼得罗维奇，——还是等待，还是忍耐吧。”在这之外，他还有这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也可以暴露他的性格，——这想法就是：什么事情“总还可以说清楚，总还可以安排得更好。”因此他什么决心都不敢下，甚至有条理地把它说出来都不会，于是，尽管“他的心里有可怕的力量”，——他永远迟疑，胆怯，中途退却。他心里的一切蓬勃、正常而自觉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总不曾流到

① 法文：固执不化的想法。

他到现在还在其中好好安身的习熟的套子里去，因此它们刚一升腾起来，就又沉落到他的灵魂的奥底里，可是沉落得总有点乱糟糟、病态的样子，和他原来插身在里面的那个〔官僚〕机构的整齐有序完全合不来。作者在勾出高略达金的矛盾之时，同时又说：“他断乎不能容忍自己被人凌辱，而尤其是——容忍人家象抹布一样，把他挤掉，可是最后，还是完全听任一个放荡的人这样做……不必争论，毕竟是不必争论的；说不定，要是真有人打算，例如，要是真有人一心打算把高略达金先生变成抹布，那就可以这样去变，你可以毫无阻碍、毫无风险地把他变过来（有一次，高略达金先生自己就这样感觉过），那结果就会是抹布，而不是高略达金，——就会是一块污秽齷齪的抹布，可是这可能是一块并不简单的抹布，这块抹布可能是赋有自尊心，赋有兴奋和感情的，固然它赋有的是一种沉默无言的兴奋，沉默无言的感情，而且还是深藏在这块抹布的肮脏的褶皱里的，然而它毕竟是赋有感情的。”我觉得，很难把象高略达金一类逆来顺受的人的处境特征说得再好了，这些人们仿佛的确变成了抹布，只有在肮脏的褶皱中还保留一些人性的残余，虽然听不到，虽然沉默无言，可是到底能够使人偶尔感觉到。就是高略达金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件事，那些沉重的怀疑和问题已经以全部重压冲垮了耶柯夫·彼得罗维奇的理性和想象。“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这里也要使用诡计吗？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也使诡计吧……可是我哪里去使诡计呢？我的天性是愚笨的——老实的，——从来不会转弯抹角……可是别的人却老是在转弯抹角地走路，否则就是把人挤开去，我可不答应人家把我挤掉……但是事实上，假使我……”于是这位一向总是陷在忧郁和梦想里的高略达金先生，就开始以阴暗的推测和梦想刺激自己，刺激自己去进行和他的性格不相适合的活动。他的精神分

裂了，他自己也看到了这种两重性……他积聚他所幻想到的一切卑鄙的、充满世故的狡猾的手段，一切丑恶而有效的手段；可是有几分是实际上的胆怯，有几分是深邃褶皱里的某个地方还隐藏着道德感情的残余，阻挠了他采取他所设想好的一切阴谋诡计，丑恶行为，于是他的幻想就使他变成“两重人格”；这就是他癫狂的基础。我不知道，我是否正确理解《两重人格》的基本思想；据我所知，在解释这种基本思想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超出“小说的主人公就是疯子”这个范围之外进行分析。然而我以为，既然每一种疯狂都应该有它的原因，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叙述了一百七十页的疯狂，尤其应该有它的原因，那么我所提出的、当我翻阅这篇小说时在我的脑海里自动形成的解释，也是十分自然的了（要把这小说全部领悟，我得承认，还做不到）。大概作者自己也不会反对这种解释的：至少，在小说的某几个地方是这样表现的。例如，高略达金先生第一次认识和自己酷肖的人时，作者是这样描写的：“这不是担任副科长的那位高略达金先生；不是喜欢躲藏、隐没在人群中的那位，最后，也不是他的行为就是明白说出‘不要触犯我，我也不会触犯你的’，或者：‘不要触犯我，——要知道我也没有触犯你呀’的那位，——不，这是另一个高略达金先生，完全是另一个人，然而同时，又完全和第一个相象。”接着这个小高略达金先生就接二连三让自己要弄这种只有在幻想中才有可能实现的狡猾和无耻的勾当：他强行插手到一切事情中去，对一切事情都趋之若鹜，带着上司的皮包跑腿，老高略达金先生从而得出结论说，他已经“特殊化”了……只要有必要，小高略达金先生永远能够做得很正直，他能够避免解释，不理不睬，或者阿谀逢迎；他甚至可以强迫人家给他付掉他所吃掉的馅饼钱；尽管这样，他同一切人都很好，他能够在老高略达金举止失措的场合，毫无忌惮地侃侃而谈，他能够在老高略达金连门厅

里都害怕去露面的地方，昂然坐在会客室里……不需要说明，高略达金先生还是继续把自己本人画成他的酷肖的人的样子。他所以想出荒诞而幻想的勋业，就因为他有下面这种想法：只要他这样做了以后（正如有些人在做的样子）——那么在工作方面就能得到成功，不必再挨受同事们的嘲笑，不会被一个在他之前做到八等文官的红人所排挤，而最重要的——就是不必再受这位岂有此理的、亲爱的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和她的家属所侮辱了。然而高略达金先生并没有欣赏这一类勋业，却倾其所有经过多少年来在他心里沉积起来的、在生活的有节奏而沉默的压迫之后还残存着的受欺压、被折磨的认识，对这些勋业表示了愤慨。“有几个人”所采取的行为和手段，他甚至在幻梦中也感到憎恶；他经常怀着恐惧把自己的幻想投到别人身上去，千方百计去侮辱和仇视这个人。可是到了清醒的时分，当他重新清楚认识自己的个性的时候，他回想到他要玩弄狡猾的这个企图，他就恍惚听到了安东·安东内奇老人的严厉的声音：“怎么啦，连你也打算耍滑头吗？”——于是面色发白，丧魂落魄了，——于是他又想到他那个奔走趋奉、竭力想从这一切中间脱身出来的面貌相似的人的形象，高略达金先生对这种卑鄙而险恶的个性的激怒也更加强烈地增长了……有时他又回复他原来的想法，就是，说不定，一切都可以安排妥当，——有一次他甚至想象，这个已经被他的品性所迷住的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写信给他，嘱咐他要把她从阴险恶毒的阴谋家手里救出来。于是高略达金先生真的跑到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的窗下——等着她，人们就从这里把他送到疯人院去……

好，请你判断吧——这个人为什么要发疯？只要他还是信守这与世无争的道理：他有他的权利，大家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假如新的八等文官比他擢升得早，——那么这是应该如此的，假

使克拉拉·奥尔苏菲耶芙娜丢开他，那么这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去对她纠缠不清，——总之，他应该继续走他自己的大道，对谁都不去触犯，记住人世上的一切都是按照才能合法地安排好的，而才能则是出于自己天性之赐，等等，——那么这个人就可以继续在先前的知足和平静之中过日子了。可是事情却不是这样：有一种什么东西从灵魂深处上升了，表现为最阴沉的抗议，只有阴沉的抗议才是这位没有多大能耐的高略达金先生能够做的，——这就是疯狂……我不预备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以特有的本领发挥了这个疯狂的观念；然而应当承认，他的主题就是：一个软弱、无坚定性格、教育不高的人在行动胆怯、品性老实以及对阴谋诡计的虚妄的追求之间的人格分裂，这种人格分裂最后使得一个穷困的人的理性在它的沉重压力下觉得痛苦烦恼——这个主题，要很好把它实现，要求有十分强大的才华。假使描写得好，高略达金先生可能不会变成一个特别的人，奇怪的人，而是一个可以在我们许多人中找到许多特征的典型。请你回想回想您同做官人物的相见；回想回想那些自称是一个无所需索、安分守己、爱好规规矩矩生活的人吧。回想回想他们如何喜欢谈论自己的无所需索，如何有时候只消一提到同僚、长官和朋友中的某人，他的成就比其他的人大，他就会突然地急急改变话题。这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话：或是“朝里无人莫做官”，或是“真理不能当饭吃”，或是抱怨自己无力进行卑鄙的勾当，或是挖苦地、仿佛是轻蔑地列举自己的功绩，他说，“我们每天接连六小时脊梁不弯一弯，一切事情都依靠我们——这是多么重要……可是您看——参加大人家里的舞会，在舞会中跳跳波兰舞，每天早晨，事情不做，却到店铺里面去跑腿——办完长官夫人的托付——凭着这样的工作却得到了荣誉……可是我们——算什么呢？运水的瘦马，牵挽耕作的牛——只配做辛苦的工作……”

等等。接着，谈话就一定会采取这种措辞，岂不知，他们说：“我们，也可以玩弄诡计的，我们也可以拍马屁的呀”……可是要他告诉您几件关于一个人的确很容易去玩弄诡计的事情作为证据，他却不愿意……在这一类先生中，的确潜伏着一种象高略达金先生走到疯人院去的倾向；只要让这种幻想和忧郁变得更厉害些——那么这种转变就为期不远了……

但是高略达金先生到底是一个完全疯狂了的人；我们且把他撇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笔下，还有一个人物，他也发了疯，但还只是一个偏狂的人——这就是普罗赫尔钦先生。这个人在开始他的宦海生涯时，也当然会想到：“在这个世界上一种人命中注定可以坐马车，另一种人却穿了破鞋烂靴在泥泞里跋涉，”他把自己归入后面这一类，给自己找一个穷巷破屋居住，不考虑去试试他的命运。然而在他的灵魂里并没有持久的宁静；他的性格是胆小怕事的，好象一切受欺压的人一样，虽然他坚决相信他的哲学是不能毁损的，然而在人世上，他却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偶然性：疾病，大火，按着长官的心愿的突如其来的解职……于是一种关于他的地位不牢靠，没有保障这种想法就来折磨这个穷人。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自然的。它的结果也是很自然的——他决定把钱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他的做法很奇怪，虽然这在普罗赫尔钦的身上还是容易明白的：他把丁丁当当的银币藏在褥垫里……事实上他可以藏到哪里去呢？放在箱子里吧——人家会拿走的；托给什么人吧——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存放在当铺里吧——那么这等于就是宣布自己是个有钱的人，是一个克列梭斯^①。“他有钱存在当铺里呢”——你可知道，这句话在佐杂小官的圈子里，尤其在穷巷破屋的居民中，

① 克列梭斯，吕底亚国王之名，以富著称。

具有什么意义呵！……因此，普罗赫尔钦先生就决定把钱藏在褥垫之中了，藏了十年，或者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也许，还要更长久一些，他在那里究竟放了多少钱，甚至他自己都会觉得，简直无法好好计算，他为了褥垫而耽心——害怕好奇的眼光……他的生活过得十分安静，就是，他对每件东西都避开身去，老是担惊受怕，他高兴人家不来触犯他。突然，有新房客同他住在一起了，他们都是好人，可是却都是“爱嘲笑的人”。他们发现普罗赫尔钦胆小怕事，发现他老是耽心没有保障，——他们中间就编造起谣言来——时而说是要裁员了，时而说是要考核老官员了，时而说到大人打算解除所有模样生得不魁伟的官员，时而泛泛地谈到时世的艰难……你是怎么想的呢？那个可怜的普罗赫尔钦完全昏了头：走路有点身不由主，面容也失色了，一心等待把他从职位上赶走，可是到那时候该怎么办呢？固然弄了一点积蓄，现在可不得不花掉它了，再要补足就没有法儿……普罗赫尔钦的波动，向例总要形于面色，就在这时，他碰到了个固执的酒鬼，喝过了量，等到人们把他扛回家去时，他已经人事不省，害病了。他刚一醒来，他就开始说胡话，忧虑着这样的问题：越活越不成样子，弄到只好提着小包走路了；今天要你，明天也要你，后来就不需要你啦，你只好要饭去……人们劝说他，他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他是个好人，温和的人之类……他回答：“他是个自由人，我也是个自由人，可是只要你仔细想一想，就有点不同了”……——“什么？”——“变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大家一想到普罗赫尔钦可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都陷入了恐惧和愤慨里；可是他反驳说：“慢着，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你只消知道，你这傻瓜：我是一个和气的人，今天和气，明天也和气，可是以后就不是和气的人了，我会出口伤人；要用皮带抽你，这就变成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总而言之，普罗赫尔钦变成了一个

真正没有信仰的人：不但对地位的能不能持久，甚至就是对本身的温和能不能持久，也不再相信了。他好象是要挑起别人进行决斗，他说：“难道我一辈子都得摇尾乞怜吗？要知道，说不定我也会破口骂人的，——我是会骂的……只不过，到那时候要变成怎么样呢？……”然而这位普罗赫尔钦在临死前却荒唐放肆起来了：就在这同一天夜里，由于他抑制不住激动，他死了，在房客中间引起了普遍的哀怜。在他死后，人家在褥垫里找到了一包包的银币，二千四百九十七个卢布，还有半卢布的纸币，——因此，房客们，尤其是女房东，就变得愤慨起来了……

普罗赫尔钦先生，他是一个逆来顺受，受折磨的人，这是明明白白的，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需要再谈的了。说到他的突如其来的忧悒，以及对解职的恐惧，也是没有许多话要说的。我们只征引和他一起住的人在他害病时候说过的意见：“大家都叹气、惊叫；大家都觉得可怜、觉得难过，尤其大家都觉得奇怪，一个人怎么会彻底胆小到这个地步？究竟为了什么事情而胆小呢？倘使他弄到一个好位置，得到一个老婆，生一大群孩子，倘使无缘无故把他拖到法庭上去受审，这倒也罢了，可是这个人完全是一块废料，只有一只箱子和一把德国锁；在屏帷后面度过二十多年，一声都不响，不知道光明和忧愁，省吃俭用，不料现在为了一些卑鄙、无聊的话儿，这个人突然乱想起来了，他的头脑里完全弄得七颠八倒了，一味的耽心，说是，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已经突然变得困难了……可是这个人并没有想到，大家都是困难的！……只要他能够想到这一点，”奥凯扬尼耶夫接着说，“大家都过得很苦，这个人就会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停止胡闹，并且随遇而安了。”

奥凯扬尼耶夫是对的：的确，普罗赫尔钦就为了在正常的哲学思考上迷了路，就毁灭了。

然而哪一个没有在这道路上迷失过呢？哪一个身上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生活这个和平而有秩序的机构的均衡趋势、突然受到激情和迷恋所破坏？我们不妨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君那里看一个例子：那个青年官员瓦西亚·苏姆柯夫，由于出身低微，所以酷爱工作，品行端正，他的书法和温和深得长官，特别是他的顶头上司——尤里昂·马斯塔柯维奇的垂爱，从他那里弄到一些私人文件来抄写，由于这个殊宠，还不时从他手里获得金钱的奖赏。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忠诚的友人阿尔卡莎；不仅是他爱上了她，还得到了她的回报，并且宣布他是未婚夫……他还要什么呢？他充满着幸福；生活向他含笑。有三百卢布的薪水，还有从尤里昂·马斯塔柯维奇那里收到的副业收入——他和老婆还愁不能生活！何况他们彼此又这样相爱！瓦西亚除了他的未婚妻之外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想；他手边有尤里昂·马斯塔柯维奇给他抄写的文件；期限还只剩两天，可是瓦西亚，他以一个热恋着的青年所特有的轻率态度说：“还来得及，”他不能克制自己不和朋友在除夕那天一起到未婚妻家去……然而一回到家里，坐下来抄写了一整夜以后，他就给严酷的现实吓昏了：全部文件如期抄完绝对办不到，——可是明天就是元旦了——还得到他上司那里去应卯，阿尔卡莎虽然答应代他抄写，却无法使他安顿下来，——瓦西亚害怕，尤里昂·马斯塔柯维奇可能要生气。那个善良的朋友也提醒他尤里昂·马斯塔柯维奇是个大度的人，劝他不要忧急，这也没有用处：这只有使瓦西亚更加难过。简直不成！他是一个渺小的虫，令人轻视的、可怜的人，——受到这种高度的眷顾，受到私人的委托，听到慈祥的话……可是突然之间——怎么了？——怠慢懒惰，事情办不好，忘了恩，负了义！瓦西亚简直无法估量自己行为的整个乖张、卑鄙，因为他是从他和尤里昂·马斯塔柯维奇之间所横隔开来的距离来估量

乖张和卑鄙的，——谁又能够估量这个距离呢？！一看到这个可怕的深渊，这个可怜的人的头脑就只会打转……他曾经打算跑到尤里昂·马斯塔柯维奇那里去，请求发落；可是如何下决心进行这种大胆举动呢？他的朋友打算为自己的友人去解释，甚至真的到大人那里去了，可是也没有决心开口。可怜的瓦西亚对着抄件坐了两天两夜，他的脑子里苦恼着，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只是用那枝干枯的笔在纸上乱涂。最后，爱情，卑微，尤里昂·马斯塔柯维奇的愤怒，不久前的幸福，卑鄙的忘恩负义，为了自己完全无力而恐惧——把不幸的人冲毁了，他相信，他现在只有一条路——当兵去，一想到这个念头上他精神错乱了。可是尤里昂·马斯塔柯维奇却慈祥地说：“上帝，多么可怜！托他做的事，并不重要，而且根本不急……这是怎么回事，无缘无故一个人就毁啦！”

似乎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太喜欢叫他的主人公发疯了；似乎可以说，在他的瓦西亚身上，那颗衰弱的心（正象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仔细观察这个中篇小说的基调，——您可又会得出那同样的结论：主张所谓一切人都可以各安其位、各安其事的理想的社会结构论，根本不能保证全体成员富裕幸福。要是在瓦西亚的地位上换了书写机器，这倒的确是出色的。然而问题却在这里，一个人还绝对没有法子十全十美到完全变成一架机器；在大多数人的场合还可以这样，这，我们可以〔在军事演习中，〕在工厂中以及其他场所看到，可是问题一涉及单独的人——这就不对头了。有这样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对随便什么形式，什么压迫都不肯屈从，而且它激起这个人对事物抱着完全扞格不通的看法，因此，就在事物的正常的秩序中，也会造成他不幸。就拿瓦西亚对这一点说吧，——既然感情在他的心里已经觉醒，既然他无法使自己摆脱人类的要

求，——那么对自己的卑微，对自己在尤里昂·马斯塔柯维奇面前只是一个极其可怜的没有价值的人这种令人可敬的认识，在他身上最好根本并不存在。要是照平常的方式来观察，他会简单地说：“咳，怎么办呢，——办不到呀；环境就是这样安排的”，——因此还是好好地安心下来吧。处在瓦西亚的境地中，而能够发挥这样一种果敢精神的人多不多呢？大多数人都浸透着关于自己的无力以及长官仁慈伟大这种认识，——他们战战兢兢地为了长官交给他们的使命而忙碌，要是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或者做得完全不象交下来的样子，纵使不是发疯，也多少要忍受一番恐惧、怀疑，多少要经历一番沉重的时刻……而且这一切不是为了正经事情（不论瓦西亚，不论其他这一类的人，对于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关系的），而只是为了人家会怎样看，会怎样说，——为了瓦西亚的生活就是以这种看法为准绳的，他的整个命运就是包括在这句话里的。

〔据说，人最愉快的就是自己有这样一个人：此人能够关心他，为他而思索，解决，给他安排好他的一生、他的行为、甚至还有思想。据说，这是和人的天生的惰性、和他要忠心耿耿献身给一个人的要求，给心灵设定一种榜样和主宰，在这个人的意志下酣然大睡，十分一致的。这一切，在某种程度说来，可能是十分正确的，甚至还可以得到历史的证明。然而这种意见在现代社会的趋向中，却未必可以找到证明。这或者是为了新时代的社会是从幼稚状态发展而来，在那个时期，衰弱无力这个自然的感觉一定迫使人去找寻别人的庇护；或者是为了我们从历史中所熟悉的以前那些社会庇护者或者保护人常常辜负了把个人命运托付给他的人们的希望，——然而只有到了现在，社会的趋向才能采取比较坚定和独立的性质。盲目的极端的忠诚、无条件信奉权威、无意识地信仰别人的话，这些崇高的美德——已经越来越

少了；全心全意死死地服从某一种形式上的教规——就在耶稣教僧团中，也几乎只剩下一纸具文了。“人所天赋的惰性”，正象水会结冰的能力一样，人们已经看作是一种应该排斥的品性了，相反，^①现在主动精神，即，人的独立活动，独自进行工作的能力，却站在第一位了，——对人的价值的评判，也根据他身上的主动性达到什么程度，根据它的倾向如何来决定。大家都努力要做一个独立的人，认为依靠别人的恩典而生活已经和自己不相称了。上世纪末叶，欧洲各个新民族的社会中，已经发生过这种倾向上的变化。可以说，就是我们有一部分也免不了这种变化。〔且不提现在我们的描写所不会接触的范围，〕我们就以文学为例吧。它今天是不是还象五十年以前的样子呢？一方面，文学在其本身范围之内，——是一个并不去搜寻什么恩人，对恩人也并无什么需要的独立人物；只在有的时候，十分偶然的，会有一个什么诗人从遥远的省份里寄给杂志同人几首淡而无味的诗，恳求他能够照顾登在这个杂志里。可是这些怪人大部分都是旧时代的人，在他们垂暮之年勃发了诗兴……另一方面，你再看看公众跟文学的关系：不可接近的台柱已经没有，绝无瑕疵的权威，也不再有人承认了，所谓“只要能够写出什么来，当然，这就是尽善尽美的了”的意见，你未必还能常常听见；所谓“这所以是美的，因为它有人赞成”的评语——显然是更少了。每一个人，不管是坏也吧，好也吧，都努力自己来判断，开始自己的理性的发展过程，现在，就是最平凡的读者要发表这种意见，完全不是人云亦云，也不会感到困难，——譬如说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自家的狗》^②，是色彩苍白的、并不新鲜，屠格涅夫的《初恋》是庸俗

① 一九四七年版俄文本《选集》这一段是：“然而这个时代——惰性在其中是这样自然的时代正在过去”。

② 这是指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所著剧本：《自家的狗相咬，他家的狗勿扰》（或译为《莫管闲事》）。

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战的美》是无耻到不成体统的等等。另一批读者也许会发表完全相反的意见，他会极口称赞《初恋》，而把《奥勃洛莫夫》叫作腐朽……彼此都可能有错误；然而这些人到底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并不害怕对那些在文坛中居高位、大家所公认、令人尊敬而有才能的人发表意见。我们不想提到是什么东西造成读者公众中间这种改变的，甚至也许还会同意，这种文学评判的普遍放任一上来就产生了可怕的混乱：每个人脑子里只消想到什么东西，就胡说八道一番。然而，人的一切工作否则又能怎么办呢？岂不知只有弥那华才是十全十美地从丘比德的头脑里走出来的，而我们地上的事情总是慢慢开始的，带着错误，也带着缺点。你觉得怎么好呢——公民的社会倘不是从巴比伦的摩天塔开始，又从哪里着手呢？

应当可以预期，一旦到了大家都要求维护自己的人的尊严的时候，那些我们已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作品里取得几个模型的逆来顺受的人，也就会消失无踪了。但是，你如果环顾一下四周，你就看见，他们还没有消失，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主人公，还是一种没有完全消亡的现象。他们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呢？难道他们觉得很好吗？不，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受欺，逆来顺受，摒弃自己的意志，摒弃自己的人格，这些都并没有把幸福带给他们中的谁某。那么，他们心中的一切人性的东西都麻木了吗？不，也没有麻木。我们特地研究了四个多少是作者描写得成功的人物，发觉，这些人正活着，他们的灵魂也活着。他们变得浑浑噩噩，沉潜在半兽性的梦里，失去个性，磨灭自己，似乎连思想、连意志都失去了，而且自己还竭力故意这样做，他把一切思想蛊惑从身上赶走，说服自己，这不是他们的事情……然而神圣的火花还是在他们的心里冒烟燃烧，只要这个人还活着，随使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把它扑灭。你可以抹煞一个人，把他变成一块肮脏的

抹布，然而在这块抹布最肮脏的褶皱里，还是保持着感情和思想，——虽然是沉默而不易觉察的，然而这到底是感情、是思想……

“既然它们不容易发现，是沉默的，那么它们中间究竟还有什么呢，”读者会说，“反正一样，还是一个没有。这些逆来顺受、落到一块用来擦脚的肮脏抹布境地的不幸的人，所以到今天为止，还能生存下去，大约就是为了这缘故。”

读者，尽管这是不易察觉的，——这个不易察觉是为了人们不想发觉它。暂时虽然不易察觉，可是总会到这样的时刻，一切都暴露无遗。要知道这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所以能够在他的主人公的麻木僵化的特征中，观察到活跃的灵魂的缘故。可是也会有这样的事情，那种深深潜藏在人心里的“沉默顺从”的感情，会突然大声叫出来，大家都听到。问题是在于：公平正直的感情，在人的心里是绝对无法扑灭的；他也许一言不发地看着各种各样的虚妄，也许他会毫无怨言地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并不表示一点愤懑的征象；然而只要他多少看到和理解一点，对这虚妄，他到底不能不有所感触，对侮辱和屈辱，在他的灵魂里到底会有痛苦的反应，甚至最受摧残、最胆小的人的忍耐，也有一个范围。同时，在人的心里，必然会有爱情，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他所尊敬的人，——朋友、妻子、子女、亲属、爱人。在他们身上他衡量自己的地位，把他们和其他人们作比较，考虑他们的满足快乐，由于他站在旁观的地位，他就能更随心所欲地、明白地下判断。譬如，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注定自己要遭受痛苦的命运，对自己就毫不怜惜：他说：我已经是这副模样了，——让大家来折磨我吧……即使我吃不饱——这也不要紧，即使人们侮辱我——反正我不是了不起的老爷。然而他的感情一旦转到这个纯洁而温柔的人，这个转眼就成为他一生中最可贵人物的人，

这个瓦林卡，他就一心只怜悯她的不幸了，觉得这种不幸不应该由她忍受，他窥视马车，看见里面坐着的贵族夫人，实在比瓦林卡更差；他的头脑里已经出现了这种想法，命运是不公平的，他开始觉得，同这些坐着马车从这一家豪华店铺驰骋到另一个店铺去的人们，似乎已经势不两立了，总之，从前蓄积在胸中的隐痛，现在已经浮到了表面上，让自己感觉到了。这样的事情实在并不少，即使不知道事实，也可以推测；而尤其是因为，在大多数场合，一个受折磨、受欺压的人，就在物质方面，也总是受着压迫的，可是同时，却又不得不奉行各种不同的社会义务。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感到很伤心：大人如果看到他的寒酸的制服以后，就要找他说话了，他说，他喝茶实在也是为了别人，部里的看门人的嘲笑使他一直愤激到灵魂的深处，这个看门人借口他的外套会把公家刷子弄坏，拒绝把刷子借给他清刷外套……真的，——这是什么样的处境呀：一个人既然置身在其他人们当中，那就应当和他们打交道，跟他们一样穿衣，跟他们一样吃喝，但在同时，他却甚至连作勉强的模仿都绝无可能。且不要谈漂亮的靴子，——就是随便什么样的靴子，——也都没有；从前他虽然有过一双，可是连这双也只剩下鞋底了……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惨痛的叫喊是容易明白的：“也许，我自己也要说，不需要它，不需要这胆怯；可是虽然如此，请您决断一下，明天我穿什么靴子办公去呢！就是这么回事，亲爱的人；这样的想法是要把一个人毁掉的、完完全全毁掉的。”在这一类焦虑中痛苦而憔悴不堪的人们，是在少数吗？如果再加上他所爱的人，还有他的家庭？这里有多少悲哀，多少最枯燥平板的忧郁，但因此也同样都是令人难过、令人可怕的！在这些焦虑中，一个人体会到生活把他损毁到什么程度，侮辱到什么程度；因此，他就对这种——照以上所提到的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的哲学说来，换一个时候

人们似乎就会在其中甜蜜地安顿下来的东西，发出了怒气勃勃的责骂〕。就在这种人的意识的觉醒中，他越来越博得我们的同情了，他就依靠这一种自觉行动的能力，来补偿那可厌的冷淡〔、胆怯和沉默顺从——他一生就以这种态度要自己去承受别人的专横和一切侮辱〕。

然而，这一类“神圣火花”的一现，究竟为什么这样衰弱呢，结果为什么这样苍白呢？在刹那之间惊醒过来的自觉，为什么又这么迅速地熟睡呢？为什么人的本能和感情在实际活动中显露得这样少，多半只局限在叹气、怨诉以及空洞的幻梦之中呢？

这个缘故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人就是有这样的性格。要是他们拥有另一种性格，——他们就不会落到这种屈辱、平庸和渺小的境地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极大多数的人中，会造成这一种性格，那种损害了力量的积极性和灵活性的惰性，是以怎样一些〔共通的〕条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

也许，错处是在我们的民族性格吧？可是这样说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把它推远了：为什么民族性格会变成这个样子，尤其是既懒惰，又衰弱呢？要加以解决，只有撇下现在时代，转到历史的基础上去。

何况这还是一个在争论中的问题：我们中间，叫嚷什么俄国人性格又阔大、又豪放的人，岂不是并不少吗？我们不想对全人民发表自己的判断；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它的一个有限的范围。然而我们应当承认——为这种豪放而兴奋，是可笑的，这种豪放就表现在：有的先生在澡堂里做梦，在蒸气浴炉石上添上香槟酒，另一些人在餐馆里砸碎碗碟和镜子，第三种人在带着猎犬狩猎中度过一生，在从前时代甚至对人，也进行这种狩猎的，他们把小地主家的帮闲用熊皮缝起来，然后叫几只狗去虐弄他们……这一种豪放只在每一个粗野不文的社会里流行，没有一处不是

随着教育的发展而衰落的。然而在普通人之中，我们的豪放究竟在哪里呢，它又从哪里产生呢？就拿我们这里还没有成熟的学习科学的青年来说吧：他们所期待的是什么呢？他们给自己在生活中设定一个怎样的目的呢？大部分人的一切幻想都局限在追求地位，生活的整个目的就是能够安排得更好。在欧洲其他民族中，你所遇到的这种情形，却要稀少得无法比较。且不说法国人，法国人素有吹牛家的雅誉——就谈谈其他民族吧，例如，谦恭质朴的德国人。德国的大学生心中不抱着一种他所珍爱的观念的，数目很少，——他们大多数都热中于理论，——一种宏伟的幻梦。他或者开创了哲学的新原则，或者给思想铺平了新的道路；他或者激进地改革现行的教育方法，这样一来，人类就可以在新的原理上接受教育了；或者他变成一个伟大的作曲家，诗人，艺术家……最后，就是他安静了下来，缩小了自己的愿望，决定做一个什么地方乡村教师，他也总是给自己提出问题，而且思索，他该如何教学，怎样去获得孩子的好感和社会的尊敬，等等。在这一切行为中你可以看到一种积极而独立的东西：“我就是这样做，——至于因此我可以收到什么，就让它自己来吧”……这不是这样一种奔放的幻想性格，例如象那个市长似的，他幻想靠了赫列斯塔柯夫娶他的女儿的便，做一个将军①……我们已经举过德国人做例子：要是你再要找别的国家的什么人，你到处都可以发现他们的想象境界比我们更要宽广，在幻想和计划本身也比我们更多主动性。例如，一个英国人，在走出学校之后，就不再幻想做一个查坦姆②、威灵顿③或者拜伦了，

① 这是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情节。

② 查坦姆(Chatham)，即威廉·庇特(William Pitt, 1708—1778)，英国政治家，一七六六至一七六八年的英国首相。

③ 威灵顿(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 1769—1852)，当时英国的一个统帅，反动的政治家。

却开始，譬如说，安排一个发财的计划。当然，这，就在我们这里，也会激起许多人的梦想。可是不论在手段上，不论在规模上，有什么样的差别呵！我们那些梦想发财的人，大部分都抓住一种墨守成规的手段，撷取随手可以拿到的放得不好的东西，常常在获得了各色各样的舒适以后，停步下来。但就在这同一时候，英国人却在他的想象中——发明了几种机器，跨越了几次重洋，开辟了几处殖民地，建立了几个工厂，作了好几次巨大的转变，使自己盖过了所有的罗特希尔德^①……而最重要的，就是他一心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连一半都不能完成，但他总能够做到一些东西。……对法国人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好象已经故意把他们一笔抹煞了，批评他们是爱说闲话的人。不，就是他们有时候也完成了并非微小的使命，而且在随便什么场合，他们的规模也总比我们来得宽广。你看，我们就要编撰一种百科辞书〔，就要研究什么护照制度、消费税制度的改革了〕……可是他们呢——他们说，“我们要编一部百科全书”——结果就编出来了，——不象我们的样子〔；他们说，“我们就要出版一部全新的法典”——结果立刻出版了；“要革除我们生活中的某种东西”——它们就革除了〕。甚至在今天的〔，庸俗而卑微的〕法国人社会中，在每一个法国人的谈话方式上、行为中，您还是可以发现一种十分豁达奔放的作风。〔在那里，你会听到：我一看到拉马里西埃^②，我就要对他说：他做得不大体面；在另一处，我简直想写信给皇帝，谈谈他对意大利的政策；在第三个地方：不，我要写信给彼尔西尼^③，这样的措施不适当，——如是之类……您〕可

① 罗特希尔德(De Rothschild, 1777—1836)，当时的一个金融寡头，他是德国籍犹太人。

② 拉马里西埃(1806—1865)，法国将军，一八六〇年时是教皇军队的统帅。

③ 彼尔西尼(1802—1872)，法国政治家，波拿巴分子，在拿破仑三世时他任内政部部长。

以看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点儿什么，让自己努力去评判，去争论〔，绝对不甘心在即使是 Moniteur〕^①的每一句话前，无条件遭受粉碎^②。虽然，他不会做出多少正经的事来；可是，至少，他不会垂头丧气，不会向那种胆怯、绝望的无力感情屈服，在这种感情之下，〔“一个人是会变成一块肮脏的抹布的”。〕

可是在我们中间，这种“变成抹布”，为什么如此容易，如此方便呢〔，——关于这一点，目光锐利的读者当然不会等待我们作出肯定的解释，做这种解释，时机还没有到〕。我们现在只援引几个最普遍的特征，我们甚至直接在作者的作品中找到对这些特征的提示，靠了这种提示我们才提出这一切问题的。

首先，你可以回忆一下，当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因为过分忧伤，从他的灵魂深处引出一些大胆议论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我知道，这是罪过……这是自由思想……罪恶钻进了我的灵魂”……你可以看出，他这种想法是和对过失和罪行怀着迷信的恐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间哪个人还不了解这种迷信恐怖的来源呢？哪一个父亲在放自己的孩子到学校去的时候，教他们只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劳动，把科学放在一切之上，只寻找真正的知识，只在这种知识中看到自己的支柱等等的呢？相反，我们中的每个人不是这样说过：“要努力获得长官的青睐，要十分温顺，要毫无抗拒的执行命令你做的事情，切勿自作聪明。假如你要自作聪明，即使对的也变不对了：长官不喜欢你，——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你完啦”……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原则下，这样的暗示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的血缘相通的亲人从我们的孩提时起，就竭力教导我们要有这种想法：我们是卑微

① 法文：领袖。

② 作者这里主要是痛心当时俄国一部分人满足于一些表面上的豪放，而不敢和沙皇统治正面搏斗。这段文字当时也是经过检查官删改的。

的，我们得完全依靠教师、家庭教师以及一般说、在地位上比我们高的人物的见解。你可以回想一下，您不是常常听到家里的人这样说：“好小子，教师夸奖你哩”，或者反过来：“你这个下流坯，——长官对你不满意哩”，——此外，就不再作什么解释和说明了，可是您是不是常常听到，为了您的什么独立的行为而夸奖您，或者甚至直白地对您说：“好小子，这件事情你已经研究得很透彻，可以把它继续干下去”，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呢？

从童年时代起就得到了这样的指导，那么我们踏进了现实生活中又怎样呢？我且不说财主和少爷；他们和我们不相干；我们说的是中等阶级中的穷人。有几个人就是在求学时期结束之后还是能够不离开父母亲的羽翼；为了他们而请托，恳求，阿谀奉迎，教导他们也得低声下气，阿谀奉承，钻营一个总是温暖的好地方……这一类小鸟总有机会得到相当的地位。可是大多数贫苦的人，他们却一贫如洗，不知道哪里可以安身，——这一大批人怎么办呢？也不得不献媚、恳求，首先就是苦苦给自己求得在顶楼的一个角落里能够安稳地住下来，每天花两文钱买东西充饥，——但就是这样也得仰仗什么人的恩惠，因为，说老实话，在我们这里，无论什么地方，都不会感到需要什么人，而且这些人自己也不会感到会有什么事情需要他……您会发现，我们这里，要是有一个稍稍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之后，除了去做官之外，就别无其他出路了。在近来，每一个多少学到某种程度知识的人，即使是一门外国语吧，都竭力想拿文学作为谋生立业的手段；然而在我们的文坛中，却泛滥着各种各样钻营竞争的人，它无法尽量养育他们。于是每年都有一大群人不得不又瞩目于官场宦海，不得不忍受一切，认识自己的多余，自己的毫无用处。普罗赫尔钦的病态的感情，以为他今天有人需要，明天有人需要，后天就可能变得不需要了，好象公事房里其他的人员一样，——

光是这一种感情，已经充分向我们说明使他赖以忍受生活中一切侮辱和痛苦的顺从和驯服……

否则又能怎么办呢？〔要进行反抗，又从哪里去汲取力量和决心？若是问题是在不同个性之间，一个对一个问题，——那时候，人的激怒感情也许会比较有力，比较坚决地表现出来；可是要知道这里，除了无辜的人以外，根本谈不上什么个性，因为他们创造的不是自己的意志。〕我们〔甚至〕还看到，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的上司，例如，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尤里昂·马斯塔柯维奇，是一个十分温和的人哩……究竟是谁挤压、逼迫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呢？环境！可是〔当这种环境是这样坚固，这样难以更易，和我们的秩序、我们的文明这样难舍难分的时候〕，又怎样对这种环境进行反抗呢。环境的庞大力量所能压迫的不止是一个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每天清早，我急急忙忙上班去，我看着这城市开始觉醒、起身、冒烟、沸腾、喧闹，——一个人在这种情景面前，有时候会觉得这样渺小，好象有什么人在你那好奇的鼻子上弹了一下，于是你就比水还沉默，比草还低微，慢慢地走自己的路，挥着你的手！……”集中在彼得堡的现代文明奇迹也在瓦西亚·苏姆柯夫的友人——阿卡奇身上引起同样的印象。但是我们不打算再在这里描写它了……

的确，人正遭受那个庞大机体普遍的印象所吞噬，所贬损，对这种机体他甚至没有力量凭自己的理智把它领会。好象古代的异教徒对自然界不曾见过的宏伟现象屈膝膜拜一样，今天的人也要屈膝在伟大文明的奇迹之前，这种文明虽然在他的心里引起痛苦的反应，可是它的宏伟的规模却使他吃惊生畏。这里已经谈不上什么斗争，这里就是那些比较坚强有力的人物，也只能发发毫无结果的愤怒，充满肝火的怨诉和绝望。就再拿陀思妥

耶夫斯基君最近的长篇小说来看吧。譬如，那个强硬、热情的人物小涅丽；可是你看，她是被放在什么地位之上，在这个环境中她能不能多少想到斗争——持久而正确的斗争？她的母亲死了，欠了布白诺娃的债；她没有钱埋葬母亲；涅丽变得困苦无告、毫无保障了。布白诺娃把她领到自己家里，当然，她就充分发挥抚养人和女主人应有的一切权利了。人们想尽方法打涅丽，折磨她，虐待她，能拿他们怎么办呢？布白诺娃是涅丽的恩人，假使布白诺娃不是这样干，那么别人在她的地位也会干出同样的事情来……涅丽甚至恶意地喜欢这种殴打：她认为殴打可以抵偿布白诺娃赏给她的一片面包和破衣烂衫。可是另一件事却使她感到难过：她看到布白诺娃准备怎样摆布她，她觉得又气，又害怕，又难过……可是又来了，她能够怎么办呢？总不能去杀死布白诺娃！要离开她而逃跑——要使人找不到，又往哪里去呢？她终于被出卖了，一直等到要摆布她的卑鄙勾当已经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她才有一个偶然的机会逃脱……后来她知道，她是公爵的女儿，合法的女儿。然而这有什么结果呢？需要证明文件，她却没有；需要请教律师，进行诉讼，可是就是这样，公爵也有的是钱，有的是关系，他比一切律师更有力……可怜的涅丽虽然到底碰到了好心的人们，可是这一种感情——她依靠别人，依靠慈悲而生活的感情却又不断地折磨着她……

不过，也许，因为这是一个孩子吧。我们且拿同一长篇小说的另一个人物——伊赫美涅夫来看。这是一个有坚强性格的人，可是这一种坚强不是为了斗争，而是在激怒时候固执不化。他把他的怒火，他的悲哀时而倾注到默默顺从的妻子身上，时而落到他热烈地爱着、然而又好几次咒骂着的女儿身上。为什么他不把他的全副力量直接发挥到应该发挥的地方，——去反对侮辱他的人——公爵呢？……在这世界上，他实在是比任何人更愿意这

样做的，可是和公爵打交道，就必须遵守早经确立的礼节和规矩。想要涉讼公庭吗——好吧，按照法律程序，经年累月的，可进行得很慢。这种法律程序其实是和公爵有利的，——一切都和公爵有利，——不管你怎么控告——一切都有利于他……不得不付款，不得不把伊赫美涅夫卡的产业卖掉……那老人岂不是也知道而且也感觉到，这是不公正的、令人屈辱的、丧失体面的；可是你怎么能够挽回呢？〔而且力量又在哪儿呢？力量甚至也不在公爵身上。〕伊赫美涅夫就是杀死公爵：——他还是得出卖他的村落……〔何况要杀死公爵，这是办不到的；他是保卫得这样好！〕当伊赫美涅夫知道公爵曾经对一个官员说，“为了某些家庭中的缘故”，——他要把老人付给他的一万卢布罚金还给老人时，他想到过这个打算。所以要付这笔钱，是为了给他的女儿遮羞。老人气极了，决定要和公爵进行决斗。下面就是伊凡·彼得罗维奇所叙述的老人去尝试的成绩：

“他离开我之后，就一直往公爵家里去了，在家里没有碰到公爵，就留给公爵一封短信：他在信中这样说，他知道公爵告诉一个官员的话，他认为这是致命的侮辱，而公爵不过是个卑鄙的小人，因此，要叫他决斗，同时还警告公爵不要规避这个挑战，否则就要当众加以羞辱。

“安娜·安特列耶芙娜告诉我，他回到家里时是这样激动和伤心，甚至要倒下来。他对她十分温存，可是对她的问题却不大肯回答，看样子，他好象是抱着热病似的不耐烦等待着什么事情。第二天一早，市区邮局送来一封信；读完信以后，他就叫了起来，还抓着自己的头，安娜·安特列耶芙娜给骇得发呆了。可是他立刻抓起帽子、手杖，跑了出去。

“信是公爵写来的。他枯燥、简短而又客气地告诉伊赫

美涅夫，他对一个官员所说的话，没有义务随便告诉任何一个人，虽然他对伊赫美涅夫打输官司，十分同情，可是不管他如何同情，一个打输官司的人可没有权利为了复仇，挑逗他的对手进行决斗；至于说到拿‘当众羞辱’来威吓他，公爵也请伊赫美涅夫不要为了这一点而焦心，因为随便什么当众羞辱都是不会发生的，而且也无法实现，他的信就要立刻送到应该送的地方去，能够事先防范的警察当局，一定有能力采取适当措施，维护秩序和治安。

“伊赫美涅夫手里拿着信，立刻跑到公爵家里去。公爵还是不在家；但老人终于在仆人口里打听到，公爵现在的确在N伯爵那里。他没有考虑多久，就奔到伯爵家去。他刚奔上楼梯，伯爵家的看门人就把他挡住了。老人气极了，用手杖打了看门人一下。人家立刻把他抓住了，把他拖到台阶上，交给了警察，警察就把他带到警察分局去。他们还报告了伯爵。当那个当时正在场的公爵向这位沾名钓誉的老人说明了这个人就是伊赫美涅夫，就是娜塔丽雅·尼古拉耶芙娜的父亲（公爵时常拿这些事情去逢迎伯爵的）以后，这个位居显要的老人只是笑，把怒火化为慈祥；他吩咐把伊赫美涅夫开释；可是直到第三天才真的把他放出来，而且（显然这是出于公爵的吩咐）还向老人宣布，是公爵自己请求伯爵饶放他的。

“老人回到家里时好象一个疯人，他冲到床上去，一动不动地整整躺了一个钟头，最后，他终于起来，冲着安娜·安特列耶芙娜的恐怖，郑重其事地宣布，他要永远诅咒女儿，剥夺她家长的祝福。

“安娜·安特列耶芙娜陷在恐怖里了，可是应该照顾老人，她自己也几乎失去了知觉，几乎侍候他整整一天一夜，

用醋润湿他的头，用冰放在头部四周。他发烧而且人事不省。”

你看这就是一切了。〔这里力量不在公爵身上，而在于：不管他怎么样，他总能够凭着他的轻便马车、司阍人、交游，最后，甚至凭着为了维护社会安宁所必需的警察秩序，保护他不受伊赫美涅夫之流的算计。

那么，这些不幸的、逆来顺受、受尽屈辱、受尽诬蔑的人的处境，就应当是毫无出路吗？他们可以做的，就只有沉默，忍耐，还有，变成一块肮脏的抹布，把自己的默默顺从的感情掩藏在最模糊的褶皱里吗？

我不知道，也许，是有出路的；然而文学未必能够把这个出路指出来〔；无论如何，读者呵，要是你盼望我对这个题目作详尽的解释，你是太天真了。我从前也曾尝试过这一类解释，可是当然，这种尝试从来也不曾达到它的目的。现在连写都不想写了。而且究极说来——读者，你难道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和我们的文学还只是在重复旧调〔？〕。我们的生活在许多年以前已经产生了一连串值得注意的人物；二十年以前，艺术家已经注意到他们，把他们描写出来；现在批评又不得不转过来分析这些艺术家之一的作品了；它根据艺术家的图画把几个人物汇集在一起，作出某一种概括，归纳出某一种结论或是意见……这一切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我们发觉，受欺压、受贬抑以及受凌辱的人物，在我们这里最多的是在中等等级里〔，不论在道德意义上，不论在生理意义上，他们都是困苦的〕，虽然他们和自己的处境保持外表上的妥协，可是他们却体会到这种妥协的悲痛，〔准备发怒和抗议，〕渴求着出路……〔然而我们的观察范围，就在这里终结。〕〔这一条〕出路在哪里，〔什么时候而且怎样出现〕——这应

当由生活本身来显示。我们只是努力跟着它走，把现实生活中某一种共同的情势表现给那些不喜欢、或者不会亲自去研究这种生活现象的人看。也许，你可以选取报刊上所发表的〔事实、暗示或者说明〕充作你想象的材料；然而，最重要的，您得探究这从不间断、井然有序、威力强大、又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的生活的奔流，这样您才会活跃起来，而不至于意气消沉。从马加尔·亚历克山伊奇和他的兄弟们出现的时代以来，生活已经做了许多事情〔，只是这许多还没有成为定理〕。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大家都在努力恢复人的尊严〔以及恢复人在一切事情上的充分权利〕。也许，这里已经可以发见脱出这种受迫害、受欺压的困苦境地的一条出路〔，当然，这不是凭他们自己的努力，而是由于那些遭受这一种折磨人、压迫人的环境的重压比较轻的人物的帮助。因为这一种人本身拥有充分的主动性，他们就能有效地深入实际情势中，就能深切地知道〕，这些逆来顺受的人的大部分——过去，也许是被〔他们〕看作是道德上已经毁灭、死亡的人的，——在这些人的心里还是牢牢地、深邃地，甚至连他自己也是漠然无知地保持着活跃的灵魂以及对自己在生活和幸福方面的人的权利一种永恒而又不为任何痛苦所能根绝的自觉。

译 后 记

一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另一位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赫尔岑称他是“未来风暴中年轻舵手”。杜勃罗留波夫的全部社会、政治活动，文学、批评活动，都指向一个目标：反对国内的土耳其人，即反对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是俄国农民革命的思想家。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俄国农民要求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猛烈冲击了腐败的沙皇农奴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各自的文章中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强烈的解放要求。

杜勃罗留波夫的一生十分短促，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一共只持续了四年，但是他对俄国人民所作的贡献却是十分巨大的。伟大的列宁十分重视杜勃罗留波夫，他称杜勃罗留波夫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①，又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称杜勃罗留波夫是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②。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一些俄国进步作家以及许多学生和工人集会纪念这位批评家和革命家逝世的第四十周年。但是当时的莫斯科当局禁止了这次集会。次日，就有许多人举行示威抗议。列宁主编的《火星报》把示威的消息传送到俄国全

国各地。列宁还在这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报上发表了《示威游行开始了》的文章。列宁说：“人们嘲骂了专制政权在莫斯科的代表，他们正如俄国所有受过教育的和有思想的人一样，敬爱这位痛恨专横，热望人民起来反对‘国内土耳其人’，即反对专制政府的作家。”^③

马克思、恩格斯也很器重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才智。由于地域和语言的隔阂，他们虽然只能读到一部分文章，但是就凭这一部分文章，就看出这两个俄国批评家是伟大的天才。恩格斯称他们俩是“社会主义的莱辛”，并且说，一个国家要是能够推举出这样两个作家，这个国家就不会因为产生了象巴枯宁这一流老奸巨猾而致毁灭了。^④

二

杜勃罗留波夫一八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历二月四日）出生于俄国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即现在的高尔基市）一个神父家中。他从小就爱好读书，在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里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一八五三年，他去彼得堡，不顾父亲的反对，考进了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他在师范学院里接触了当时俄国的先进思想。一八五六年杜勃罗留波夫写出了第一篇论文《论“俄国文学爱好者谈话良伴”》，从而认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八五七年秋，杜勃罗留波夫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建议，加入《现代人》杂志编辑部，主持批评栏。在《现代人》的编辑部中，批评家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工作里，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他同车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十九卷五七页。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十八卷十二页。

③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五卷二九〇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俄文版第一卷五三六、五三七页。

尔尼雪夫斯基一样，不仅写了许多文学方面的论文、书评，同时也写了关于哲学方面的、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和书评。但是不论文学理论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每篇文章主要所向都在于探讨俄国封建农奴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真相和实质问题。他对沙皇农奴制度充满无比的愤怒。但是在沙皇当局异常严密的图书报刊审查制度的罗网下，为了使文章能够发表，他在写的时候，不能不采用迂回的笔法，用暗示的手段，伊索式的寓言，把要讲的真实思想曲折地传达出来。有时为了使文章能够发表，他同检查官当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短短几年期间，杜勃罗留波夫就写了许多重要的论文和书评，他所写的字数是惊人的，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所编的全集就有九大本之多。

一八五九年，在杜勃罗留波夫建议之下，创办了《现代人》杂志的讽刺性附刊《哨声》，他是主编人和主要撰稿人。

杜勃罗留波夫对于工作是不知疲倦的，白天担任编辑工作，晚上还得写文章，往往写到次日早晨四点钟才停笔。由于劳累过度，由于他的身体素质不好，他的健康日益恶化，出现了结核病的明显征象。一八六〇年，在朋友们的敦劝下，他不得不出国治疗。他先后到了瑞士、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但是没有多久，到了一八六一年七月，他就匆匆回国。一回来，只在家乡逗留一个极短暂时间，他立即返回彼得堡，投入杂志的编辑写稿工作。及至这一年的十月，他只能完全躺在床上了。杜勃罗留波夫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七(二十九)日去世，死时只有二十六岁。

三

杜勃罗留波夫是别林斯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继承者。由

于俄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当时俄国的无产阶级的队伍还很小,他自然还没有充分理解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现象的新社会的最主要力量,而只是认为在农民革命获得胜利后可以由农民村社达到社会主义。但是他在1859年所写的《从莫斯科到莱比锡》一文中,已经明白指出: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只是变换了剥削的方式。他说:“随着剥削阶级中教育的发达,只不过剥削的方式起了变化,它变得更灵活、更精细了;然而只要剥削的可能还是存在,那么其实质还是仍旧如此的。”他还认为:工人阶级受到了“双重压迫”。这“双重压迫”来自残余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以及来自“把全部工业都抓在手里的”资产阶级的压迫。因此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在这种情势底下,不可避免地要爆发新的斗争,这是任何改良手段都遏制不住的。

杜勃罗留波夫这种观点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他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承认世界上一切都受到发展规律的支配。他在《论概念的真实性或人类知识的可靠性》(1858年)中曾经说:“我们感觉到,到处都有什么东西对我们起着作用,它是和我们不同的,是外在的,总之这是非我。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我们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感到外界会对我们的自我起随便什么作用了。”他在《论“外省散记”》中也说过:“如果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细沙子的话,人是没有能力虚构一粒细沙子来的。”同时杜勃罗留波夫也探讨了哲学根本问题的另一方面,他认为人能够认识而且一定会认识他周围的物质世界,他揭穿了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错误。他也反对哲学上的二元论,他认为不应该把世界分成两截,一种是思维的世界,一种是物质的世界,互相独立。

但是杜勃罗留波夫的唯物主义还不能摆脱一些较大的缺点,并且受到历史认识局限性的制约。尽管杜勃罗留波夫在社

会学方面发表了一些使他接近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十分卓越的观察,但是他在探索某种社会生活所以形成、所以如此发展的原因方面还是依然留在唯心主义者的立场。因为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就取决于在某一个时代,人对世界的认识处于什么样的情势中。杜勃罗留波夫似乎认为社会生活中一切不幸和不公平的原因是由于“不理解真正的幸福究竟在哪里,却竭力在没有这种幸福和不可能有这种幸福的地方去寻找”。如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中所显示的那样,杜勃罗留波夫也未能克服人本主义的观点。

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的哲学观点决定着他的美学观点和文学观点。他说,文学就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文学是社会愿望的第一个表达者;从而要求于它的,不但是要它成为社会机体的“喉舌”,而且要它成为社会机体的“耳目”。文学要将社会生活反映出来,给予“判决”,这就是“艺术活动在社会生活其他各种机能中的意义”。

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杜勃罗留波夫也把艺术对现实的关系的问题看作是美学的中心问题。他从唯物主义的原则出发,认为不是生活按照文学理论而前进,而是文学适应着生活的方向而改变(《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艺术创作是客观现实在艺术家意识中的反映。这个观点是和他在哲学上反对把客观世界倒过来当作是纯粹观念的反映完全一致的。他要求作家应该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而反映生活。

杜勃罗留波夫强调生活决定文学的趋向,一点都不是抹煞文学反过来给予生活以影响的意思。相反,他十分重视艺术作品对促进正确概念的传播作用。他在《黑暗的王国》中曾经阐述过这一点。他说:“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好象一个焦点一样,把现实生活的许多事实都集中在本身之中,它大大地推进了事物

的正确概念在人民中间的形成和传播。”文学既然具有这种能力，它就能对生活现象进行评判，从而就具有改造生活的作用。

同样，杜勃罗留波夫要求如实地反映生活，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也决不是主张照相式地描写现实生活，看见什么东西，就不加分析地按照表面现象“如实地”写出来的意思。他的所谓“本来面目”，是指揭露现实生活的本质。他认为艺术家应该从局部现象中找到活的联系和它们的一贯性。艺术家不应该局限于并且满足于揭露现实生活的个别现象，而要表现能够从一定角度反映出现实生活本质的过程。他说，有一些长篇小说和通俗剧所以显得虚伪，就是因为它们所选取的都是现实生活中偶然的虚假的特征，这些特征并不是现实生活本质的表现，并不是它的典型的特点（《黑暗的王国》）。他在《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中更进一步断言：“真实是必要的条件，但还不是作品的价值。说到价值，我们要根据作者看法的广度，对他所接触到的那些现象的理解是否正确，描写是否生动来判断。”

杜勃罗留波夫在这里提出的要求是十分明确的。所谓作家要反映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紧扣生活中的典型方面，把握现实生活中的主要动向的意思。在杜勃罗留波夫展开写作活动的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中的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广大人民从沙皇和地主贵族的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的要求。杜勃罗留波夫就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评价作品的价值和深度的。他认为一个忠实地描写生活的作家不可能不接触到这个最本质的方面。他说：“对批评最重要的，就是弄清楚作者和人民身上已经觉醒的那些自然追求是否站在同一水平上，然后才是，他究竟能够把它们了解和表现到什么程度，他是抓住问题的本质，抓住了它的根呢，还是只是它的某几方面。”

杜勃罗留波夫曾经研究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前面说过，他

的哲学思想中带有人本主义的因素。他在解释人类意识的起源或者说到人们的行为时，时常显露人本主义的观点。但是虽然如此，在另一方面，他却十分重视人和社会、历史环境的血缘关系，他已经开始看到社会分成劳动者与寄生者，即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事实。他在文章里时常提到的所谓“自然追求”，结合每篇文章的全文的内容来看，这主要应该是指劳动人民的解放要求而言。他在《论瑞列勃卓夫君所捏造的俄国文学》中曾经说：“只有劳动者和不劳而获者之分，消灭不劳而获，这是历史的真正传统。”他就要求有才能的作家应该和劳动人民这种解放要求站在同一水平。杜勃罗留波夫所以很高估计了谢德林、屠格涅夫、冈察罗夫、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的价值，首先就因为他们直接或者间接、或多或少表现了这个方面。

杜勃罗留波夫不但要求艺术家必须反映生活的真实，还要求他不要停留在眼前的一刹那、而要向前看，提出“崇高的问题”，发现、搜集和阐释其中包括有“新的抒情的萌芽”的生活事实。他一直是聚精会神地在冈察罗夫、奥斯特罗夫斯基、谢德林和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里，谛听着新时代的声息。他在冈察罗夫所创造的妇女形象奥尔迦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当时“俄国生活中仅仅能够找到的最高理想”，批评家说，“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更多的关于俄罗斯新生活的暗示”，可以期待她“把奥勃洛莫夫性格烧成灰烬”。后来，他又在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描绘的“黑暗王国”中，从卡德琳娜的天性中看到了已经在成长的、从整个有机体的深处产生出来的对于生活权利与自由的要求，以及将这要求化为行动的性格力量。这种要求虽然还只是“一线之光”，然而“这已经不是想象”，“不是传说风闻”，“不是人工的激情”，而是出于生活所激发的迫切重大的需要。

杜勃罗留波夫一方面密切注意各种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新

思想、新概念，坚决要求作家反映生活的主要动向，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作家不是深入到生活中去，不是从生活本身中揭示那些反映着这个主要动向的现象，而是单凭胡乱架搭起来的三段论法，从逻辑上轻易把它们“创造”出来。

批评家十分不满意那些只有骨架、没有血肉的人物。他在赞叹奥勃洛莫夫和奥尔迦这一类典型人物刻划得生动逼真时，同时却也批评小说《奥勃洛莫夫》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斯托尔兹的苍白无力。冈察罗夫原想拉出斯托尔兹来做奥勃洛莫夫的“解毒药”，竭力渲染他的果敢决断，精力充沛，“一切思想立刻表现为追求，接着就转化为实际行动”，一举一动处处和奥勃洛莫夫针锋相对。——然而这位“正面人物”斯托尔兹究竟有些什么具体的果敢行动呢？杜勃罗留波夫勉强列举了这几件：替奥勃洛莫夫到乡间去整顿产业；后来又给他去料理假期票的事情；再加上他同奥尔迦结婚，这就是他的全部行动了。然而，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出现既然是和他所由生长的环境——奥勃洛莫夫卡，是和包围奥勃洛莫夫卡的整个“黑暗王国”，整个满布毒蛇爬虫的“沼泽”拆不开的，而且这沼泽同时也包围着斯托尔兹，他也许站的地方比较高燥一点，对他的威胁也许比较小些，但毫无疑问，他的脚底下也是沼泽地带。他对这一点做了什么没有呢？在冈察罗夫的小说里毫无表现，但是这也不必奇怪，从斯托尔兹婚后劝慰奥尔迦不要自寻烦恼，要“低下头，顺从的熬过这个艰苦的时际”一点上来说，可以断定：他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去触动社会环境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连罗亭都不如，更不要说其他积极有为的人物了。一个作者心目中的积极有为的人，却无视沙皇农奴制桎梏下广大群众的悲惨遭遇，这样的积极人物实在是很难想象的。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冈察罗夫所以能够生动地、深刻地描写出奥勃洛莫夫的性格，却不能同样有力地描绘斯托尔兹，这

绝对不是他的才能有什么问题，而是作者“跑在生活之前太远”了，他想象不出能够深刻有力地表现出斯托尔兹的性格来的具体的思想感情，具体的行动。一句话，作者非但想象不出斯托尔兹有什么了不起的行动，而且就连给奥勃洛莫夫“整顿产业”这类行动，作者都无法作深入的描写，而只能一笔带过。因此斯托尔兹的个性就不可能不是暧昧的了，不可能是完整了。对于《前夜》中的英沙罗夫，杜勃罗留波夫也怀着同样的不满。虽然，就抽象的意义上说，他是重视英沙罗夫对于未来俄国革命所具有的意义的，然而批评家远不能以此为满足，他除了知道英沙罗夫是一个侨居在俄国待机而动的保加利亚的爱国志士以外，还需要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希望些什么”；在他的遭遇中他体验到了怎样的变故，如何观察在他的眼前掠过去的生活的……然而屠格涅夫却只是淡淡地说起他有一次曾经跑到六十里外去排解同乡们的纠纷；末了，还曾跑遍全市，跟各种人物偷偷地见面，但是到此为止，再也没有更具体的东西。不仅如此，“甚至他对于叶连娜的爱情，”杜勃罗留波夫说，“都没有完全揭露出来。我们知道，他热烈地爱着她；但是这种感情怎样钻进他的心里，在她身上吸引他的是什麼，这种感情到了什麼程度，什么时候他发现了它，准备远离——这一切内在的详细性……在英沙罗夫的性格里都是暧昧的。倘作为生动的形象，真实的人物来说，英沙罗夫离开我们太远了。”

杜勃罗留波夫一再认为艺术家处理的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思想或者观念就孕育在其中的活生生的形象。自然，他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忽视先进思想对艺术创作所起的作用。他激烈反对热心描写潺潺的小溪流、小叶片，却逃避严酷的现实生活的诗人；他十分尊重那些反映俄罗斯生活、反映俄国人民的性格和

力量、反映劳动人民的解放要求的作家。他认为,艺术家把才能运用在什么地方,是用在描写小叶片、小溪流上呢,还是发挥在生活的主要方面,这比去研究艺术家的才能在抽象、潜在的状态中具有怎样的范围和性质的问题,远来得重要。他重视正确原则对艺术家的作用。他在《黑暗的王国》中指出,“有正确原则指导的艺术家总要比那些没有发展的或者不正确发展的艺术家来得有利”。因为它可以帮助他自由地省察他的艺术感觉所把握到的东西,帮助他区别许多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的本质与非本质的东西,从而使他更加全面地、正确地反映生活。

四

除了艺术描写的真实性,杜勃罗留波夫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本身还应该包含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它的人民性,也就是反映在艺术作品里的人民大众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与感情,意志和愿望、风俗和习惯等等。不消说,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与人民性是有机地相连的,人民性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应该就是生活的真实性最充分的地方。这个问题在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里总是密切相连的。还在做学生的时候,杜勃罗留波夫就已经这样宣告,在任何一个民族中,文学应该都是“人民生活的印记”。杜勃罗留波夫以后在他所有的论文和批评中都贯彻了这个原则。不过,把这个想法发挥得最完整、最有条理的还是在《论俄国文学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和《俄国平民性格特征》这两篇长文中。

杜勃罗留波夫对人民性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反对仅仅把人民性局限在摹拟一些方言,记叙一些风俗习惯方面,他说:“我们不仅把人民性了解为怎样善于描写当地自然的美丽,运用从民众那里所听到的鞭辟入里的表现法,忠实地表现其仪式、风习等

等……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贯穿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水平，丢弃等级的一切偏见，书本上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

当时沙皇的御用文人、斯拉夫派以及自由主义批评家也侈谈什么人民性。沙皇御用文人竭力把“那罗达诺斯基”（人民性）曲解成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俄国国粹主义或者“国民性”，竭力缩小这个词的深广意义。他们提出了一切人都应当谨遵恪守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正教、专制政治、国粹主义。他们认为“国粹主义”就是俄罗斯“民族观念的圣殿”，必须保持“俄罗斯原则的纯洁性”，防止“现代政治思想的混入”云云。所以批判沙皇集团的“国粹主义”，捍卫人民性的崇高意义，也是当时社会思想以及文艺批评方面一场重要的斗争。

杜勃罗留波夫在《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中指出，在俄国有很长一段时期，文学一直停留在贵族、御用诗人、僧侣的手里。但是“不是生活按照文学理论而前进，”杜勃罗留波夫说，“而是文学顺应着生活方向而改变”。沙皇和主教为了使得臣民或信徒看得懂文告、箴言、经书，能够替他们做更多的事情，终于也让平民走进了教育之门，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而贵族中间也还有一些不甘于给沙皇写“颂歌”的“叛徒”。他们开始怀疑、探索、追求，渴望暴风雨，甚至用生命来证明他们所信仰的。这样俄国文学就以迅速的流程向生活、向现实、向人民这个汪洋大海直奔。

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文学运动终于达到了一个波浪激溅的高潮。在普希金身上，“社会终于兴高采烈地看到真正的、并非供玩乐的诗”，“从他的时期起文学就进入了社会生活里，成为有教养阶级必需的特质”。普希金

善于以诗的节拍表达出生活的美，而果戈理则是以同样的诗的手法来表现生活中的缺陷。“至于莱蒙托夫，他是一个禀赋巨大才华的人，他早就理解当代社会的缺点”，他更知道，“要从这条虚伪的道路上得救，只有在人民中才找得到”。在他的诗里充分地表现出他对人民的爱戴。

杜勃罗留波夫一方面肯定上述种种成就，一面又提出更高的愿望，他要求俄国文学家不应该停留在描写人民性的形式，而要表现人民的内在生活。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除了忠实地观察人民的生活以外，还需要深刻地、强烈地感受和体验这种生活，跟人民血肉相连，“穿进他们的皮肤和灵魂”。

杜勃罗留波夫愤慨地抨击那些悲观主义的作家，他们竭力在作品里散布对人民力量的不信任，要人相信，在农奴制重压之下，人民中间的生命源泉已经枯竭了。杜勃罗留波夫热烈地、关切地注视那些表现人民生活的作品的每一个表现。他十分重视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奥斯特罗夫斯基、柯尔卓夫、谢甫琴柯等作家的作品。他对于任何一点最平凡的有关人民性的表现都不放过。

五

杜勃罗留波夫既然对艺术创作要求按照现实生活的实际的样子来反映生活，另一方面他要求于批评的就是要建立一种“现实的批评”。他在《黑暗的王国》和《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等长论中反复解释过所谓“现实的批评”指的是什么。

杜勃罗留波夫首先认为，批评家与创作家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能把批评或者文学批评看作是法官断案。他说道：“在批评与审判之间怎么会看不出区别呢？”人们被拉到法庭去是为了他的行为中有可疑之处，或者犯了罪，法官的工作就是裁决：

被告是否有罪，可是作家受到了批评，这难道是被控告犯了什么罪吗？批评家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喜欢不喜欢这个事物。为了使公众相信他的正确，他就应该“努力说出理由，为什么他认为这一个好，那一个不好。他不认为自己的意见是一定不移的判决，每个人都要强制执行”。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要是从法律方面选取比喻，那么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官，却更象律师。”

杜勃罗留波夫也坚决反对把批评看作是塾师授课：耳提面命。这一类批评家往往把他读过的教科书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典。拿了教科书中干巴巴的规定对每一种作品进行硬套。符合教科书里规定的就是好的，不符合的就是不好。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让自己按照教科书的章节来检查文学作品的批评家，势必常常觉得自己正陷在一种可怜的境地里……新的文学运动越是蓬勃有力，他就越是对这种运动满怀恼恨，他的衰弱无力也越是表现得清楚……对新的、活跃的美闭起眼睛，不打算了解新的真理，了解生活新进程的成果”，而是居高临下地看待一切作品。只要某一种作品及不上他们的教科书所规定的条件，他们就要加以斥责，加以蔑视。

说到“现实的批评”，在批评家看来，就不允许强要作家接受别人的思想。一个作家所创造的人物以及他们的行动，就放在批评家的批评之前。批评家应当说出，作品的这些人物在他的心里引起了一些怎样的印象，如果这个印象是不完全的、不明朗的，暧昧的，到那时候，才可以去责备作者。

杜勃罗留波夫还说：“对于现实的批评，这儿，首先着重的是事实……批评家应当去研究，这样的人物是不是可能的，是不是真实的。如果看出它是忠实于现实的，那么批评家就进而用自己的看法，来思考它所以产生的原因。假使在被研究的作者的作品中已经指出了这些原因，批评家就应该利用它们……如果

没有,也不要用匕首直指他的咽喉,对他说,为什么他胆敢描写这样的人物,而并不解释这个人物生存的原因?现实的批评对待艺术家的态度,应该正象对待真实的生活现象一样:他研究着它们,努力明确它们本身的界限,搜集它们的本质的、典型的特征。

杜勃罗留波夫还认为:批评的最好方法,就是把问题叙述得这样,使读者能够自行根据列举的事实做出自己的结论。批评的责任,他指出,就在于“归纳事实,发表对作品的总的意义的看法,指出这个作品对我们就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的关系,做出自己的结论,并且努力尽可能把结论安排得很好,但是因此我们就得常常这样坚持:要使读者在我们和作者之间能够充分自由发表他的判断”。杜勃罗留波夫自己所写的论文和书评,就是严格按照上述这些原则而写的。总之,杜勃罗留波夫在美学、文学理论等方面所遗留下来的财产是十分丰富的,这不但是苏联人民的宝贵财富,对我们来说也有比较巨大的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译 者

一九八四年七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 B E X P

S S □ =

□□□□ =

□□ = 5 0 0

□□□□ = h t t p : / / b o o k 5 . 5 r e a d . c o m / 3 0 0
- 5 5 / d i s k j y / j y 6 1 / 1 0 / ! 0 0 0 0 1 . p d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